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策划 张余胜

準噶尔汗国史

（修订版）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苏联〕伊·亚·兹拉特金 著
马曼丽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项目执行/施援平　责任编辑/许　景　施援平
封面题字/冯天亮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4084-0
9 787311 040840 >
定价：86.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准噶尔汗国史

（修订版）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苏联〕伊·亚·兹拉特金 著

马曼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准噶尔汗国史 / (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 —修订本.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3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084-0

Ⅰ.①准… Ⅱ.①兹… ②马… Ⅲ.①准噶尔—民族历史—研究 Ⅳ.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0160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准噶尔汗国史(修订版)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苏联〕伊·亚·兹拉特金 著
马曼丽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084-0
定　　价 86.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淘宝网邮购地址:http://lzup.taobao.com

修订版出版说明

本书写的是蒙古族西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这是蒙古族仅次于成吉思汗时代的又一次崛起，尤其是15到18世纪期间它作为西蒙古的新兴势力，活动的领域曾从杭爱山西部，扩张到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包括中亚和中国西北边疆的广大地域，因此它的历史不仅曾影响过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史、边疆史，也是研究蒙古、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等民族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特别是由于作者伊·亚·兹拉特金精通蒙、藏、汉、俄等多种文字，写作中利用了多种文字的原始资料，包括档案，所以该书1964年出版后立即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传播开来。由于该书中引有不少古俄文和蒙文等多种资料，翻译难度较大，所以我国到1980年才由本人艰难地首次翻译出版。此后随即在我国被中俄关系学界、边疆学者和民族学家们，甚至研究军事战略的军区研究家们广泛利用。应该说，这本译著曾使有关学界的一批新人才脱颖而出，现在一些著名的研究西北民族史、边疆史、清史、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大都曾受益于这本译著的史料或受到其启发，并推动了我国当时约10年的有关领域的研究热潮。有些院校则以此书做教材，开出了“西蒙古史”的课程。正因此，当时出版的2500册著作较快被购买一空。上世纪90年代起，学界就呼吁再版，包括南京军区也有人向我索要，商务印书馆也希望重版。但由于本人新的科研任务不断，至今才得以抽空修订，回报学界。

当年翻译本书，正值外交部调集西北5省区有关专家学者编写《沙俄侵华史》之际，而本人也为此刚从一个口语翻译转入史学界承担笔译本书的任务，对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可以说只是个小学生，一无所知，但因编写《沙俄侵华史》工作的急需，日夜笔耕，仅用半年时间赶译而成，因此粗糙错误在所难免，我一直觉得有必要修订一下。没想到日

月如梭，本书修订竟一拖30余年。现在的我已经有过一段研究西蒙古卫拉特人的学术生涯，所以本书修订版的主要目标，除了要修正人名、地名的不规范译法之处外，还就自己研究的肤浅心得，加了一篇导读，并补充了一些新的注释，与大家分享，期望进一步提高译本的质量和学术性，使之能与这本名著的国际地位相称地流传后世。

马曼丽

2012年6月

修订版译者导读

一、一部超越各国同类著作的、最完整的卫拉特蒙古族的全史

这本《准噶尔汗国史》是苏联著名蒙古学家伊·亚·兹拉特金的代表作。本书的目标，正如他自己在导言中所期望的："叙述准噶尔汗国存在时期的历史……编纂出一部内容广博、翔实可靠、基本上可以解决这项任务的史料学基础资料。"实际上，作者不仅完成了他的目标，而且从这本著作的影响来说，其所说史料学的价值，实事求是地说，甚至超过了以往被世界公认的一些汉文史籍。所以本书在出版后被各国迅速翻译传播。在它问世前，各国都认为，研究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中国的《明实录》、《清实录》、《藩部世系表》、《钦定准噶尔方略》等许多汉文史籍才是最主要、最可靠的史料依据。写过《卫拉特概述》的俄国著名东方学家比丘林也认为，在这方面"中国作者的著作是真相的标尺"。"讲述明（1368—1644 年）、清（1644—1912 年）的中国历史著作和王朝实录，长期以来成了论述卫拉特问题的唯一的资料来源……其中大部分在欧洲还未为人所知。"[1]

但自从《准噶尔汗国史》出版后，各国纷纷翻译传播，迅速取代了中国史籍的权威地位。连我国学界读到此译著后，也被其丰富全面的新史料所吸引，随即掀起了研究卫拉特蒙古史新问题的热潮，因为发现了兹拉特金这本书中有许多过去汉文史籍中完全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全新的资料。

史学界周知，由于卫拉特蒙古与中国交往主要是在元亡以后的北元时期，但交往刚刚开始时期记载寥寥。汉文资料主要集中在明代妥懽、也先时期。而且也先去世（1453 年）后，即 15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

[1]见本书导言第 24－25 页。

初，哈喇忽拉崛起，期间约150年的卫拉特蒙古人的活动，因不知其所向，在中国史籍中几乎销声匿迹。唯在兹拉特金的笔下，却挖掘出了卫拉特人向西扩张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生机勃勃地开发着中亚两河流域和蒙兀尔斯坦一带，填补了中国史料的空白。

这有赖于兹拉特金具有阅读多种文字的能力，他不仅能够利用蒙文原著《蒙古源流》、《黄金史》、《黄册》等这些卫拉特贵族记录他们祖辈的家谱性质的历史故事，还利用了突厥文、藏文和英文等史料。于是我们中国史学界也得以因《准噶尔汗国史》的这些原始资料而耳目一新，弄清楚了汉文史籍中鲜有记载的四卫拉特联盟及卫拉特初期发展史等一系列史实；研究出了也先死后，卫拉特人并非真的销声匿迹无所作为了，而是向西寻求到更大的发展，中国学者于是根据这一启示，并刻意发掘记载较少的汉文史料做旁证，写出了《试论准噶尔分布地域的变迁》（杜荣坤）、《明代瓦剌与西域》（马曼丽）等这类至今还在被不断转载的论文[1]，主要还在于这方面的研究更丰富和补充了历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包括卫拉特蒙古族，开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这块被沙俄侵占的中国西北历史疆域的史实。

尽管兹拉特金在论述中、俄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时，有意把中国与俄国同列为侵占卫拉特领土的帝国，而回避卫拉特蒙古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史实，但作为一位寻求史料翔实可靠的学者，他在摆出各种史实时，也“漏出”了不少能真实反映原貌的史料，如他如实记录了巴图尔珲台吉对沙俄的抗议，即“吉尔吉斯人是他的属民，即使现在沙皇陛下要收吉尔吉斯人的实物税……他珲台吉也仍要收他自己该收的实物税”[2]，这才形成了双重缴纳实物税的真相。特别是他所发掘的俄文原始档案，也违背他的原意而成为中国史学界揭露沙俄侵略的武器。比如，他公布了沙俄政府命令托博尔斯克扩张领土，寻找“没有向我们缴纳实物税的新州，迫使那些牧民臣服于沙皇陛下，若他们不臣服，不

---

〔1〕这类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现在仍在被转载，如《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2008年版均刊有此两文。

〔2〕见本书第135页。

交税，就用武力胁迫”，并记录了后来，托博尔斯克在马杜、吐托什、凯捷盖比等一批地区执行这项命令的情况，还有引起了巴图尔珲台吉抗议等论述。[1] 从而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沙俄的本质，反映了我国古代西域在清初由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管辖的分裂时期被沙俄逐步蚕食的真相。

另外，关于喇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蒙古民族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等其他许多内容都是过去有关研究没有涉及的。总之，仅以这些例子就可以说明《准噶尔汗国史》的确是一部超越前人的、该领域前所未有的、史料翔实可靠而且研究深入独到的著作。

二、重读《准噶尔汗国史》对进行更深入的新课题研究的价值

虽然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1980 年代曾被学界热切关注过，也被广泛引用过，但是，本人重读之后，发现其实它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发掘完毕。我以为，我们过去对他的研究的深度还是理解不够的，今年我重读此书时，觉得若深入体会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更多新的研究论题和科研课题。

(1)循着作者的创新思路再创新。可以剖析一下作者的一项填补空白的创新，即他考察研究了那段中国史籍几乎没有记载的 150 年(15 世纪到 16 世纪末)的历史时期卫拉特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迅速变迁。这里，他从考察“斡孛黑”、“兀鲁思”、“乌木奇和鄂托克”等社会组织的性质及其演进入手，研究了蒙古帝国时代土地“斡孛黑”反映血缘关系，并属于军事帝国统治者的世袭财产，到卫拉特崛起后日益独立地向西发展时期，达延汗的一个孙子必里克墨尔根(1506—1550 年)有 9 个儿子，就把自己的“兀鲁思”分成 9 部分给 9 个儿子，并使用了“兀鲁思”、“乌木奇”这类词。这类现象说明，土地已经转为领主们可以自己分送的私人财产。他的研究证实，这种封建关系的跳跃式加速发展是与元帝国骤然灭亡、东西蒙古分裂、领主们各自为政的背景密不可分的，土地因而变为由分别游牧的领主来私人管辖。

[1]见本书第 136 - 137 页。

而一般从血缘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需要上千年历史的过程，在卫拉特人那里，却出现了不到100年便从农奴制跳到了封建私有财产制度的跳跃进程，即由带有血缘关系的“斡孛黑”迅速演化成了“兀鲁思”、“乌木奇”、“鄂托克”这类封建制度。

这也使本人近年来顺着他的思路扩大思索，重新审视沙俄侵占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发现，正是因为沙俄掌握了卫拉特西蒙古社会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初期，以及他们的土地随游牧领主成为私人掌控的所有制的特点，所以采用了逐个悄悄收买卫拉特蒙古民族领主和宗教人士的手段，威逼利诱这些实际掌控土地的领主，避过宗主国清政府而搞什么让单个游牧领主“臣服沙皇”的把戏，而进行对一块块“兀鲁思”的交往和蚕食，到实际控制后，才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正式认可。因为那时，清政府就无法赶走已经实际控制了那些“兀鲁思”领主及其土地的沙俄侵略者了。

具体地说，沙俄就是利用这种特点再物质利益引诱、加上显示他们先进的枪炮武器进行威逼的手段，使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宣誓臣服”的。这类记载在档案中比比皆是，也是它分别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各部都直接交往，并派出仅几位军人组成的使团就能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而当时沙俄的所谓“宣誓臣服”之所以会被中国边境民族接受，也是因为沙俄了解，在游牧民族看来，那既可以是一种争取和平贸易与和平交往的协定，又可以拿到所谓的皇赏，即游牧民族方面是被需要卖牲畜和取得生活用品等那个时期的核心利益所驱动的。比如，1620年10月6日卡尔梅克台吉和鄂尔勒克、楚库尔和伊希姆王子派使节到俄国边城乌法来贸易时，乌法当局给沙皇汇报说：“陛下，他们卡尔梅克台吉们……来请您恩准时，您可要他们接受您的庇护，但同时要让我们到乌法城跟他们贸易，台吉们和伊希姆王子叫我们对您说，若这样，他们可以让其使节代表他们台吉们和兀鲁思属民宣誓。……陛下，10月9日您的臣仆我，就让卡尔梅克使节来我处，并让其进行了

宣誓仪式。”[1]

再看看这最初宣誓的内容:“陛下,他们代表其各自的台吉们和伊希姆王子宣了誓,保证他们不派人攻打乌法城镇和巴什基尔地区,不杀掠巴什基尔狩猎人,愿意接受您的庇护并向您全俄伟大的沙皇陛下米哈伊尔 · 费多罗维奇大公叩首请求让他们赶 200 匹马来卖,让他们免关税卖这些马。并请陛下您赏赐他们皇赏。于是,您的臣仆我,吩咐当地人和外地来人买下了这些马,应付地换给了卡尔梅克人一些破旧东西。”[2]

综上可见,清代西北边疆民族由于大多是游牧民族,他们民族传统的核心利益是兀鲁思游牧地和实物税,他们最缺乏的是生活用品和与农耕民族进行贸易。这些特点也是决定他们与谁可以和睦,与谁则征战不休以及决定各种民族关系的关键因素。

本人现在看来,兹拉特金在写本书时,已经认识到沙俄利用这些非军事手段的意义。他在书中说:“借助这些措施,不使用武力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领地。”[3]而这些本人却是最近重读《准噶尔汗国史》才领悟到的。所以,我觉得,此书多读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建议不妨尝试重读,一定会发现还有值得我们再深入研究的内容。

(2)扩大古为今用的研究领域,寻找新课题。如本书涉及的噶尔丹和清廷的军事战略、处理国家安全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等,都是可以寻找和再深入研究的。

国家安全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是南京军区一位同志向我索取本书给我的启发。的确,本书中作战的噶尔丹和康熙、乾隆皇帝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都有军事才能。还有像乌尔会战役这样精彩的战役,噶尔丹战胜大兵压境的清军,其中就有很值得研究的军事战略战术,如他使用过计诱清军越过戈壁来追击他的疲劳战术,而乾隆最终能平定准

[1]《俄蒙关系史档案文献集(1607—1036 年)》第 48 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 1959 年版。
[2]《俄蒙关系史档案文献集(1607—1036 年)》第 48 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 1959 年版。
[3]见本书第 113 页。

噶尔，也很值得研究。试想，清廷在外有沙俄支持噶尔丹的强大势力，在内有噶尔丹和西藏民族宗教人士的分裂势力，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不能说不严峻，但最终他孤立了主张分裂的军事势力，主要依靠蒙古本民族，还是在群众一路欢迎下统一了新疆，这对今天研究其中运用的战略战术，尤其是民族群众路线和民心战略，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3)关注的启示和研究线索。如有关民族关系方面，其实有一些是兹拉特金的研究给我们提了醒，或开了头的问题，特别是兹拉特金不像他的前人那样，认为游牧民族的民族关系充满矛盾，无非是穷兵黩武的游牧民族本性造成的。兹拉特金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去找寻原委，剖析了卫拉特由于封建经济初期牲畜、人口都得到大发展，因而土地大为缺乏，所以与临近的哈萨克、东蒙古以及中、俄各方的关系，都以土地与交换牲畜的贸易这类核心利益作为准绳。这对我们现代学者研究民族关系与其不同时代的核心利益之间的原委，应该有所启发；也可以从卫拉特和哈萨克的关系，或者是卫拉特自己内部各大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验证。而且，兹拉特金在书中对这些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只给我们提示了一点线索，他只断断续续写到过哈萨克民族形成过程中卫拉特的介入，写到过后来巴图尔珲台吉时期甚至动员全卫拉特各部声讨哈萨克杨吉尔，还有要对没有参战的昆都仑等台吉严惩不贷等等事件，却并没有彻底阐述清楚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即是言犹未尽的，或者说给我们研究西北民族关系留下了很大空间。

我们既可以在吸收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当代民族关系，因为即使在现代，民族关系问题仍然是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最影响民族之间的和谐与交恶？民族的核心利益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又有何关联？我们都可以通过本书的事件来验古思今；也可以配合其他史料的挖掘，来解决兹拉特金那些言犹未尽的问题。比如，卫拉特内部也有几次重大的遗产之争，像关于卡尔梅克楚库尔之死和有关的卫拉特大内讧问题，也是《准噶尔汗国史》为我们提到过的。但兹拉特金只写到这是一场争夺遗产的大内讧，哈

喇忽啦不得不出面调解，其他首尾详情概不清楚。而现在笔者发现《俄蒙关系档案（1607—1636）文献》中有关于这场延续数年的大内讧的新记载，应该可以联系起来研究其原委、影响等等。再如，从《准噶尔汗国史》这本书中可以发现研究民族宗教间的复杂关系的线索。兹拉特金论述了喇嘛教在东蒙古和卫拉特的传播，进而深入人心的历史，从而对噶尔丹、藏传佛教和清政府等的相互关系，对蒙古民族社会政教间的利益关系和相互的经济社会根源等都有一定的分析和观察。如果我们能抓住当时的这些素材做线索，深入地研究宗教是如何在卫拉特社会中逐渐实现其社会控制和文化传播的，深刻了解其政教之间、民族与宗教之间各种微妙的维系作用与互动的深层次内涵，更将是十分有新意的课题。因为一部真实反映历史、研究历史的好著作，能为后人留下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并体现其珍贵价值。所以如果能深入研究《准噶尔汗国史》这样的珍贵资料，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

三、本书的观点与争论问题

虽然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相当权威的好书，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学术界周知，兹拉特金把准噶尔，或者说把我们中国的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部称作“汗国”，甚至把土尔扈特部等等也叫汗国，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方面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史学界就已经通过论文著作，特别是中国版的《准噶尔史略》这类专著，公布了清准关系的宗主与藩属的无数史料，证实了准噶尔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这个史实，公正的学者应该会尊重史实。兹拉特金的“汗国论”无非是想把沙俄侵占准噶尔的领地，说成是与侵略中国无关的事而已。这里似已无需重复。

但是与此相关，兹拉特金把俄准关系说成是交往频繁、友好和睦的朋友，而把清准关系说成是敌对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却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这个问题应该在此书新版后，列为学术论战的争论内容。这里本人先抛砖引玉说一点。

的确，沙俄与准噶尔有频繁的交往，这是游牧民族需要交换生活用品的游牧经济特性决定的。问题在于沙俄与准噶尔交往的目的和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本质是敌还是友，其目的是不是侵略掠夺。限于篇幅，这

里仅略提一下其目的和侵略史实：

俄国史书也承认："俄罗斯的扩张运动在西伯利亚迅猛推进，在西西伯利亚，……1604 年俄国建立托木斯克堡之后，次年，游牧在鄂毕河流域、离托木斯克不到 5 日程的捷列乌特人（从属于准噶尔）就表示愿臣服俄国，并于 1609 年正式臣服。……最初对其天然资源给予极大关注的是毛皮产品，因为 17 世纪时，毛皮在欧洲市场是价格极为昂贵的商品，这就是俄国边境总督们迫切要从西伯利亚那些狩猎、畜牧部落那里获得皮毛实物税的原因。"[1]

可见沙俄与准噶尔等卫拉特蒙古人交往，是利用他们需要贸易的特点，而一步步蚕食其领土。如沙俄在侦察到离托木斯克 10 日程的库兹涅茨克山区有铁矿石和开矿的山民后，就于 1622 年前后在那里悄悄建立了库兹涅茨克堡。当时的俄国档案记载："在喀山省廷盘问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万沃洛吉篾列茨一行人时才知道：从托木斯克城走陆路要 10 天的地方。康多木河与博拉什河畔群山峻峭，这些山上栖息着开采矿石以交纳实物税的库兹涅茨克山民；这种矿石经炉火熔炼……可以打造成铠甲、头盔、标枪、长矛和军刀等各种铁器；那些铠甲、头盔一般卖给卡尔梅克人换取马匹和牛羊；他们交给卡尔梅克人的其他实物税也是铁器。库兹涅茨克地区的库兹涅茨克山民都擅长做这种行业。这些库兹涅茨克人中，只有住在靠库兹涅茨克城堡最近的少数人，是给沙皇陛下缴纳实物税的山民，总共只不过 200 来人……而那些住在离库兹涅茨克城堡较远的库兹涅茨克人都被卡尔梅克人统治着，卡尔梅克人从他们那里收取的实物税是貂皮和各种铁器。至于皇上陛下的那些库兹涅茨克属民也还没有任何皇上的人来保护，因为我们库兹涅茨克城堡军队很少，每年从托木斯克派去的军队平均只有 50 人左右。如果在库兹涅茨克城堡能有 200 名军队保护那些库兹涅茨克山民不受卡尔梅克人侵犯，就可以为皇上去收缴那里的实物税。估计那许

[1]阿·普·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历史纲要》（俄文版），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3 年版，莫斯科—列宁格勒，第 166 页。

多卡尔梅克人也会臣服皇上，接受陛下庇护，因为卡尔梅克人除了在库兹涅茨克地区，别无他处可以买到任何武器。所以，特按皇上指令给库兹涅茨克城堡发去一份谕旨，令他们关注：一旦托博尔斯克派军人来到库兹涅茨克城堡，立即……派往库兹涅茨克地区能缴纳实物税、但还没臣服沙皇的库兹涅茨克山民那里去，以温和的方式让他们宣誓臣服沙皇陛下。"[1]由这类记载可见，沙俄是如何依靠仅50人的边堡，仅指派200军人，就侵入了当时处于中国西北边疆的卫拉特卡尔梅克人领土的，其侵略领土的手法以及逐利的目的和原因，一目了然。这样，到1628年其建堡战略已经推进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些地区在清初分裂时期大多由当时中国准噶尔地方政权所管理。

准噶尔一直是坚持为其领土被占领的事与沙俄交涉的，或采取不放弃自己收实物税的权利以示反抗。如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清朝派图理琛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时，途经托姆斯科（今托木斯克），他在《异域录》中记载道："此处所居塔塔拉并巴尔巴忒人与鄂罗斯、策旺阿拉布坦两国皆纳税。"这说明直到策旺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人民对被沙俄侵占的地区，仍一直在坚持行使自己传统的主权，但沙俄已经侵入而形成双重纳税的情况，这也说明他们长期对沙俄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主权斗争。直到1667年5月，僧格还率领4000余人组成的军队，包围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据俄国文献材料记载，1713年策旺阿喇布坦就沙俄在他的领地上建立了比斯克和比卡图斯克两个要塞提出抗议。翌年，策旺阿拉布坦公开声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库茨涅茨克和托木斯克都是俄国人在他的土地上建立的城市，必须拆除。1719年他又指出："近百年前（即17世纪20年代），由于多次谈判，确定了准噶尔和沙俄的领土以鄂木河和鄂毕河上的黑岬沿线为边界线，但俄国方面越过上述国界而修建了托木斯克、库茨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堡和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要塞，还在库茨涅茨克县建

[1]引自《俄蒙关系史档案集（1607—1636年）》第58号。

立了杰米多夫铜矿，准噶尔要求将这些城堡和矿厂，必须拆除。”[1]可见确实是沙俄侵占了准噶尔的这些领土。这点连伊·费·巴布科夫于《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俄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国界是曾经定在沿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后沿鄂木河向上至鄂毕河的。

本人相信，本书修订版的问世，会帮助有关学界发掘出更多新的研究内容，从而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也会通过更有理有据的批判，纠正兹拉特金的一些错误观点。让我们利用本书的修订版，共同努力开创有关研究领域的新局面！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1729—1730年，第1卷，第33页；1737年，第2卷，第5-6页；1742年，第3卷，第178-182页。均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见本书第290页。

中译本序言

准噶尔是中国厄鲁特蒙古的一个游牧部落。17 世纪上半叶，准噶尔部崛起，其首领逐渐成为厄鲁特各部的统治者。在准噶尔部统治时期，我国厄鲁特蒙古的势力更加强大，厄鲁特各部的领地进一步扩展，其活动遍及苏联的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中亚和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以及当时的喀尔喀蒙古，并直接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历史。由于准噶尔统治的年代是厄鲁特蒙古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其影响又远及中外，所以，厄鲁特蒙古就以准噶尔的名称著称于世，他们的历史引起了中外历史学者的注意，到现在，已在世界历史学领域中，形成了以研究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及其在亚洲中部地区历史上的作用为主要对象的“准噶尔学”。

《准噶尔汗国史》的作者伊·亚·兹拉特金，是苏联的蒙古史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论文集）》、《蒙古近现代史概要》、《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概论》，编辑有《俄蒙关系档案（1607—1636）文件集》、《俄蒙关系档案（1636—1654）文件集》，参与编写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世界通史》、《东方各国近代史》，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条目，等等。他的《准噶尔汗国史》于 1964 年出版。

此书分 6 章，还有一篇很长的导言。导言评述了俄国和西方学者对准噶尔历史的研究和他们的主要著作，介绍了汉文、蒙文、俄文和其他文种有关准噶尔的史料。对汉文史料，作者特意采取了很大的保留态度，并认为只有对汉文史料给予“客观的批判”之后，才能加以利用。

作者在第一章中用很大篇幅探讨了厄鲁特四部的起源，叙述了明代瓦剌[1]（即厄鲁特）的情况及其与东蒙古（明史称鞑靼）、蒙兀儿斯坦（即察哈台诸后王）、明朝政府的关系。这一章还探讨了厄鲁特游牧社会宗法制度的性质、演变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章分析了16世纪后半叶厄鲁特各部的矛盾斗争和一些部落的西迁及其原因，叙述了这一时期厄鲁特各部与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书中称其首领为阿勒坦汗）、哈萨克部、诺盖人、古楚汗国（即西伯利亚汗国）的关系。作者对所谓“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各种条件作了分析。这一章还叙述了西藏喇嘛教在厄鲁特各部的传播及其作用。第三章主要是讲巴图尔浑台吉和僧格时期准噶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准噶尔与中亚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关系。作者特别突出了沙俄与准噶尔的所谓友好交往，极力冲淡和贬低准噶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第四章专门讲噶尔丹及其活动。作者认为噶尔丹是“拉萨喇嘛教一些权威人士的傀儡，这些人受达赖喇嘛和第巴的操纵，力求在喇嘛教领导人控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神权的独立蒙古国”，噶尔丹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这一目的”。第五章主要写了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时期准噶尔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俄国、哈萨克和中亚其他民族的关系。作者还特别突出了准噶尔与清政府的冲突和战争。第六章讲了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阿睦尔撒纳支持达瓦齐夺取汗位和他归属清政府而后又背信弃义掀起叛乱的过程。作者谴责阿睦尔撒纳对清政府的归顺，而极力讴歌他“幡然悔悟”、叛变投俄的行为，并把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中国西北边疆说成是对外扩张和侵略。与此相联系，书中所附的一幅《15—18世纪卫拉特封建领地和准噶尔汗国示意图》（见本书第358页），把中国地域画得不超过长城，更是别有用心。

这部书虽然提出并探讨了若干准噶尔学方面的新问题，但是，就其贯穿于全书的思想来看，作者反反复复加以论证的主要是：（1）厄鲁特

[1]对其称呼，元明清三代的音译略有差异：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为瓦剌，清代称厄鲁特，而在国外对厄鲁特蒙古人一般称卫拉特或卡尔梅克。本书各章中的不同称呼即源于此。

的首领也不干为延安王。[1] 但厄鲁特及其活动地区在中国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事实，在这部书中毫无反映。

元朝被推翻后，蒙古贵族逃入大漠南北，建立了割据政权。明初，这种割据集团主要有3个：一个是东部兀良哈部，这个集团于1389年归顺明朝；一个是由元帝室的后裔直接控制的鞑靼部，这个部以后也逐步归顺明朝政府；另一个割据集团就是厄鲁特蒙古——当时称瓦剌。瓦剌和其他蒙古一样，在政治上和明朝也建立了明确的隶属关系。1408年，瓦剌部首领马哈木等向明朝政府"请印信封爵"[2]，要求归顺明朝。次年，明政府赐封瓦剌的3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派大臣亦剌思到瓦剌亲授印诰等物。[3] 1416年，马哈木死，明政府命其子妥懽袭顺宁王爵；1426年，贤义王太平死，明政府任命其子捏列忽袭爵。妥懽死后，其子也先自称太师，但也没有忘记向明政府上书请袭王爵。明正统帝回信说："太师继承祖父爵位，恭事朝廷……深表嘉悦"[4]。在这期间，明政府还根据妥懽、也先等人的请求，多次任命瓦剌各级首领为都指挥佥事、指挥佥事、都督等官职，任命瓦剌僧侣为"慈善弘化国师"、"都纲"等僧官，并向各级僧官颁发印册。一直到明末，沙俄派往瓦剌的"使者"还亲眼看到明朝政府的官员在向瓦剌部征收赋税。[5] 而本书的作者对这些反映厄鲁特蒙古与中原政权本质关系的事实轻描淡写，却极力突出明朝政权与瓦剌的战争，并对战争的性质加以严重歪曲。诚然，瓦剌和明朝政府之间曾发生过战争，但这个战争正好说明，瓦剌确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因为自元朝政权被明朝政权取代以来，蒙古贵族，包括瓦剌贵族在内，时怀恢复元朝统治之志。1370年，元朝末代皇帝死于漠北，其子嗣位，仍以元朝自称，与明朝政权继续进行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到15世纪80年代，蒙古贵族伯颜猛可仍自称大元大可汗。明朝屡次出兵蒙古，

---

〔1〕《元史》卷109《公主表》。

〔2〕《明成祖实录》卷59"永乐六年十月丙子"。

〔3〕《明成祖实录》卷64"永乐七年六月癸丑"。

〔4〕《明英宗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甲子"。

〔5〕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版，第37－39页。

蒙古或准噶尔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政权;(2)俄国对准噶尔从来都是友好的,俄国的侵略活动对准噶尔历史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3)准噶尔对清政府的战争,大都是以为自己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统一的蒙古国为目的的正义战争;(4)清政府对准噶尔始终怀有侵略野心,并最终征服了准噶尔,侵占了准噶尔的领土。一言以蔽之,在兹拉特金的笔下,准噶尔的历史就是准噶尔首领为反对清朝政府的吞并威胁、争取建立统一的蒙古国而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清朝政府始终是侵略者,而俄国则是把友谊与进步奉献给准噶尔首领及其人民的天使。

作者的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兹拉特金在他的书中极力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厄鲁特蒙古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厄鲁特蒙古的基本领地从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12 世纪末,他们活动于叶尼塞河河源地区,即所谓"八水灌溉之地"[1],被称为斡亦剌惕。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以忽都哈别乞为首的一部分斡亦剌惕部归附成吉思汗,并帮助术赤统一了万斡亦剌和其他 10 余个部落,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和嘉奖,他将自己的女儿扯扯干嫁给忽都哈别乞的儿子脱栾勒,从此,斡亦剌惕部贵族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关系,在蒙古贵族中处于显赫的地位。成吉思汗曾在他们居住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驻兵屯守,建立起重要的后方据点。到窝阔台时,在叶尼塞河地区设有"工匠数局",手工匠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汉人"[2]。忽必烈时,厄鲁特游牧的叶尼塞河、谦谦州地区属岑北行省管辖。元朝政府在这里设万户府,派万户率军屯守,命汴梁祥符(今河南开封县)人刘好礼为谦谦州等五部断事官,他在这里"修库廪,置传舍","教为陶冶舟楫"[3],并在斡亦剌惕部与吉利吉思部之间,设置 6 个驿站,[4]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到元代后期,元朝政府还册封斡亦剌惕部

[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 1 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4 页。

[2]《元史》卷 63《地理志六》。

[3]《元史》卷 63《地理志六》。

[4]《元史》卷 12《世祖本纪九》。

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元末国内战争的继续。1451 年，瓦剌也先自称大元田盛（即天圣）可汗，他与明朝的战争，也是这一斗争的继续。甚至以后准噶尔首领与清政府的几次斗争，就准噶尔贵族来说，也有恢复大元江山的意思。因此，不论是瓦剌与明朝的战争，或是准噶尔与清政府的一些战争，都具有国内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争夺国内统治权的性质，它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事实，一方面又否认厄鲁特蒙古是中国少数民族，这怎能自圆其说呢？

14 世纪末到 15 世纪初期，厄鲁特蒙古已向西南发展，逐渐越过杭爱山，到达由中国突厥族、回纥族、契丹族和蒙古其他部长期开发、活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西南到达吹河、塔拉斯河流域。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中国满族逐渐强大。漠南、漠北蒙古的首领看到明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遂纷纷归顺满洲。1635 年，漠南蒙古 16 个部、49 个首领正式议决，推满族首领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同年，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车臣汗硕垒向皇太极上书、贡马。此后喀尔喀蒙古各部相继归属清政府。在漠南、漠北蒙古的影响下，厄鲁特各部的共主，即书中所说厄鲁特“丘尔干”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于 1637 年向满洲遣使进贡。次年，他率领一部分和硕特部落进入青海、西藏等地，成为以后清政府直接管辖下的青海厄鲁特蒙古。1643 年，厄鲁特各部共主拜巴噶斯去世，其子鄂齐尔图率部分厄鲁特部落进入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成为以后清政府管辖下的西套厄鲁特蒙古。1642 年，图鲁拜琥又偕同五世达赖喇嘛一起，向清政府上表进贡，表示归服。1646 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厄鲁特共主，“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1]。1653 年，清政府又册封他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并赐金册、印。[2] 自 17 世纪前期，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各部之后，从巴图尔浑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9《厄鲁特要略一》。

台吉到阿睦尔撒纳，准噶尔的首领对清政府也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17 世纪 70 年代初，噶尔丹成为准噶尔的首领后，他每年都向清政府派遣大批“贡使”，特别是 17 世纪 80 年代左右，准噶尔的“贡使”经常达千余人或数千人。噶尔丹还向清政府“吁请恩赐白金，以育众庶”[1]。1679 年，我国西藏五世达赖以黄教首领的名义授给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号，他立即向清政府报告，请求批准。清政府也不断派遣官员前往准噶尔。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后，康熙曾派大员到边疆各地告捷。康熙在给噶尔丹的谕旨中特意指出：“……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兹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赍捧重赏。”[2]1688 年，噶尔丹发动了叛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还承认准噶尔“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与中华一道同轨”[3]，表示不敢“自外于中华皇帝”[4]。1695 年，噶尔丹叛军被清政府击溃后，五世达赖特意请求清政府不要削除噶尔丹的汗号，“仍使留存，且加敕印恩赐”[5]。这些情况都表明，就是在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在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兵进入喀尔喀蒙古后，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占领了准噶尔地区，他立即向清政府“告捷”，并保证“嗣后大君凡有谕旨，俱愿遵行”[6]。策妄阿喇布坦统治准噶尔时期，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他遵照清政府的指示，在阿尔泰地区切断了噶尔丹的归路，加速了噶尔丹叛乱的彻底失败。1697 年，噶尔丹去世，策妄阿喇布坦遵照康熙的指令，将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儿一并送交清政府，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也要奏请清政府批准。如 1698 年，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了战争，策妄阿喇布坦立即向

---

〔1〕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2“康熙二十九年九月癸未”。

〔2〕《清圣祖实录》卷 103“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3〕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7“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4〕《清圣祖实录》卷 137“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5〕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15“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庚子”。

〔6〕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9“康熙三十年二月戊午”。

康熙报告说，哈萨克头克汗杀掠厄鲁特人民，抢劫厄鲁特所属乌梁海部落，“臣是以兴兵而往，恐圣上谓臣喜事好兵，故陈此自白”[1]。对策妄阿喇布坦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当时的俄国人也是承认的。例如，曾经代表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的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在他给沙皇的报告中曾说：“浑台吉（指策妄阿喇布坦。——引者）……将来可能脱离中国人而成为俄国的藩属和最有益的同盟者，那么对他保持友善关系不是坏事情。”[2]这段话说明，老沙皇对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并不隐讳，而兹拉特金却对上述许多体现厄鲁特是中国蒙古族的史实，讳莫如深，不敢触及。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兹拉特金还在清政府武力平定准噶尔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这就是清政府“征服”、“侵略”准噶尔的铁证。这个观点是苏联某些史学家常持的论点之一。但是，这种渲染手法是蒙蔽不了人的。清政府用什么方式统一自己的国家，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且事实上，清政府对准噶尔贵族叛乱活动的平定，也并不完全是靠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厄鲁特各部广大人民反对准噶尔贵族的叛乱，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起了重大的作用。

广大厄鲁特人民要求祖国统一，反对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斗争，由来已久。早在噶尔丹发动叛乱时期，大批厄鲁特蒙古部落就曾分两路离开准噶尔地区，一路向西，迁移到早已游牧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土尔扈特部那里，一部分向东迁到和硕特部游牧的青海一带。[3] 1684 年，以憨都台吉为首的一部分准噶尔部落，也逃入内地，其首领还向清朝政府控告噶尔丹的残暴统治。[4] 在噶尔丹进入喀尔喀蒙古后，厄鲁特各部落大半归附策妄阿喇布坦，跟随噶尔丹的准噶尔牧民也大批逃亡。噶尔丹的叛乱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平定的。此后只要准噶尔首领有叛乱活动，总有大批厄鲁特部落摆脱准噶尔贵族的

〔1〕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48“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

〔2〕转引自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彼得堡，1912 年版，第 126 页。

〔3〕见本书第 190－191 页。

〔4〕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3“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统治向东迁徙。到1726年,迁入阿尔泰地区推河一带的厄鲁特牧民,数量已经很大,清政府把他们编设为6个旗。[1] 到18世纪50年代,即达瓦齐统治时期,厄鲁特各部牧民向东迁徙趋之如归,已是势不可挡。1753年,杜尔伯特6000余户由额尔齐斯河牧地东迁,清政府安置他们在阿尔泰一带游牧。[2] 次年,辉特部与和硕特部4000余户东迁。[3] 其他各部也纷纷"挈数万众屯内汛"[4]。这种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向东迁徙,集中反映了厄鲁特各部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1755年出兵西北边疆。在进军途中,厄鲁特牧民"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5]。在厄鲁特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兵不血刃,不到百日,就进入伊犁。这充分说明,清政府进军准噶尔,反映了厄鲁特各阶层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顺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垮台、祖国西北边疆的统一,绝不仅仅是靠清政府的"武力"所能办到的。

至于沙俄与中国准噶尔的关系,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却多方粉饰,硬把沙俄的侵略活动说成是"友谊",是"善意关怀"。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在17世纪初,沙俄就派遣所谓"使者"对中国厄鲁特蒙古的一些部落进行拉拢、利诱,妄图诱骗他们加入俄籍。到17世纪80年代,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遭到清政府的反击时,他们就公然煽动和支持噶尔丹的叛乱。沙俄全权大使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使者",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6] 1690年,戈洛文又致函噶尔丹,通知他俄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与噶尔丹"采取共同行动",进攻土谢图汗,并就如何共同对付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指清政府。——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1《厄鲁特要略三》。
〔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1《厄鲁特要略三》。
〔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2《厄鲁特要略四》。
〔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2《厄鲁特要略四》。
〔5〕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首。
〔6〕沙斯季娜:《17世纪中俄关系》,第2卷,第18页。

引者)的问题进行谈判"[1]。1691 年,沙俄又派遣马特维·尤金到噶尔丹处,鼓励他继续扩大叛乱。事后噶尔丹即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侵"。但是,由于当时清朝国力强盛,在康熙亲征下,噶尔丹的叛乱被平定了,沙俄利用噶尔丹实现其侵略的目的并未达到。

18 世纪初,沙俄政府得到中国叶尔羌地区盛产黄金的消息,遂积极策划侵占从我国边界直到叶尔羌的中国广大地区。1713 年,沙皇批准了从额尔齐斯河上游修筑一条直到叶尔羌的堡垒线的计划,妄图侵占中国准噶尔的广大地区。1715 年,以布赫戈利兹为首的沙俄侵略军竟公然侵入额尔齐斯河上游亚梅舍夫湖地区修建堡垒,准备南侵。1716 年,在准噶尔人民抗击下,沙俄侵略军不得不退出亚梅舍夫湖地区,但在撤退途中,仍在准噶尔领地修建堡垒,侵吞了准噶尔大片领地。在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沙俄多次对他表示支持,西伯利亚总督米雅特列夫还建议沙皇直接出面干涉。只是在清政府迅速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后,沙俄侵略准噶尔的阴谋才破产。兹拉特金虽然极力为沙俄的侵略行径辩护,但是事实是难以掩盖的,这部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沙俄侵略准噶尔的历史事实。而且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当局极力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2]。

这部书虽然问题不少,但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这不仅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苏联学者在准噶尔历史问题方面的种种观点,透露了不少沙俄侵略准噶尔的罪行,而且还因为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准噶尔的历史和中亚、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等地的许多民族、国家以及他们与准噶尔的关系,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厄鲁特蒙古和这些地区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部书对俄国有关准噶尔历史的著作以及西方学者对准噶尔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作了综合性的评述,观点虽不一定正确,但可以

[1]见本书第 210 页。

[2]见本书第 119 页。

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俄国和欧洲研究准噶尔的情况。特别是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引用了大量我们无法见到的俄国档案资料，为研究准噶尔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因此，翻译出版这部书，对我国研究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和其他有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书中引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资料，译者都用了该两部书的原文；对兹拉特金引用错了的内容，加了必要的注释。兹拉特金对准噶尔的一些人名，译音不尽准确，译者也尽量以《皇朝藩部要略》和《西域图志》等书的译音为准译出；个别差别较大的，作了必要的注释。

杨建新

1979 年 4 月

导　言

3

准噶尔汗国形成于17世纪30年代，存在到1758年，在当时中亚、中央亚细亚和东亚的国际关系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汗国在跟它毗邻的大小国家和民族——包括西藏和喀什地区在内的中国、俄国、蒙古、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卡拉卡尔帕克——的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遗迹。

在许多欧、亚文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准噶尔汗国的历史及其内部体制和对外政策问题，也提到过这个汗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和所起作用的评价。仅用俄文一种文字，就出版了这类作品150种以上，这反映了准噶尔汗国与俄国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的特殊性质和紧密程度。虽然目前还很难确定这类中文作品的数量，但是根据现有的全部资料看，数量也颇为可观。在中亚突厥语作者的著作中，提到准噶尔汗国及其民族情况的也不少。至今仍几乎一无所知的是这一论题的藏文著作。我们只能根据蒙古学者比拉[1]的藏文蒙古历史著作中所提供的资料来揣想它的丰富程度和科学价值。许多研究准噶尔汗国史的著作，已经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可惜，研究这个问题的蒙文——准噶尔汗国基本居民群众的本民族语——著作却出版得最少。 4

现有的和不断出现的文献证明，对准噶尔汗国历史的兴趣，过去是不小的，现在也未见减弱。就这个意义上说，准噶尔汗国比起某些汗国，比方说：比起跟准噶尔汗国同期存在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以及中亚和中央亚细亚的许多国家来，要远为“幸运”得多，如果

〔1〕比拉（Ш. Бира）：《藏文蒙古历史文献》（17—19），乌兰巴托1960年版。还可参阅罗埃雷奇（G. N. Roerich）：《蓝皮年鉴》（The Blue Annal's），纳格—库鲁（Naggar-Kulu），喜马拉雅山，1946年版。

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过，说准噶尔汗国“幸运”，是对研究它的著作的数量而言，而对这些著作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则无论如何还不能这么说。在现代，论述东方民族历史的篇章不多，而且是资产阶级历史专著所特有的观点继续占着统治地位，大部分研究准噶尔汗国的文献，正是这类著作的明证。这类文献的特点就是对史料不加批判，对历史事件不作客观分析，不能把历史过程的真相搞清楚。上述缺陷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史料根据比较贫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人员在方法论上的无能。

用各种语言写的有关准噶尔汗国及其基本居民——西蒙古人，他
5 们自称为人们所知的卫拉特人[1]——的著作所依据的史料是什么呢？可能用来创立一部科学的准噶尔汗国史的新史料又有哪些呢？

讲述明（1338—1644）清（1644—1912）[2]的中国历史著作和历代王朝的官方年鉴，长期以来成了研究有关卫拉特情况唯一的资料来源。著名的俄国蒙古学和西藏学学者施米特院士，在1833年12月科学院学术会议上作了一个《论蒙古部落》的报告，其中说道：“我们至今才知道有关这些部落的命运，有关他们的游牧区、管理条令和管理方式，这一切我们几乎全要特别归功于当前中国朝廷出版的资料，其中大部分在欧洲还未为人所知，因为不论在各种传教士团和外交代表团的游记中，还是在北京布道会教士的著作中，或者狄庚和现代巴黎汉学家所掌握的有关蒙古的资料，都极为零碎、贫乏，而且错误百出，因而不能作为

---

〔1〕科特维奇（В. Л. Котвич）在他写的一部关于卫拉特的著作中写道：“在俄国和外国文献中，常使用3个术语来表示西蒙古人：卫拉特——出自蒙古史料，卡尔梅克人——出自古代俄国史料（其中包括档案资料）所遵循的伊斯兰教史料，厄鲁特——出自中国史料。这里采用了蒙古术语卫拉特，而卡尔梅克人这个术语，专门用来表示那批住在伏尔加河、顿河及乌拉尔河一带的卫拉特人，他们已习惯于卡尔梅克人这个名称，而遗忘了古名——卫拉特”，见科特维奇：《有关17—18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сношениям с ойратами в XVII－XVIII в. в.），载《俄罗斯科学院院报》，彼得堡，1919年，12－15期，第791页。

我们赞同科特维奇的观点，也把准噶尔汗国的居民叫卫拉特人，而把17世纪在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卫拉特人叫卡尔梅克人。

〔2〕这里清朝统治的年代有误，应为1644—1911年。——译者

可靠的史料。”[1]可以看出，施米特认为，只有中国史籍可以作为研究蒙古人历史的可靠史料。

俄国汉学奠基人尼·比丘林（雅金夫）[2]也对中国史料持有同样的评价，甚至更高。比丘林认为中国史料最大的优点是，这些史料的作者“在描述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毗邻民族时，都只以官方提供的事实为根据，而这些事实，都是事件发生当时记载下来的。”[3]

有关新疆的中国地理著作，是比丘林所写的那部有关卫拉特人的著作的主要基础。比丘林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写道：“我这本卫拉特历史概述，在说明跟这个民族有关的事件时，是按照事件的真实状况和顺序来反映它们的，这就使读者有可能正确无误地判断作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4] 可以看出，这本卫拉特历史概述的作者认为，中国作者的著作是真相的标尺。按比丘林的意见，有了这个标尺，读者 6
就有可能正确无误地判断其他作者的观点了。

比丘林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从中国封建史籍中吸取来的论述西蒙古人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际资料。在对他的这种伟大学术功绩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由于他对文献中的史料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所以中华帝国王朝的官方编者和历史编纂家们所提出的那些说法（无论是就一般蒙古人的历史来说，还是特别就卫拉特历史来说），都长期地得到了肯定。

比丘林的研究方向由俄国学者波科季洛夫和普·波波夫继承了下来。他们两人用中国官方编年史和历史著作的新译本、新论述丰富了

---

〔1〕施米特（И. Я. Шмидт）：《论蒙古人的民族部落》（О народных племенах монголов）。这是施米特院士 1833 年 12 月 29 日在皇家科学院公开学术会议上所作的专论，载《国民教育杂志》，圣彼得堡，1834 年 3 月，第 307 页。

〔2〕尼·比丘林（Н. Бичурин），僧名雅金夫（Иоакинф）（1777—1853 年），俄国著名东方学家。著有不少论述中国、蒙古、中亚的历史著作、人文地理学著作和经济方面的著作。——译者

〔3〕《纪元前 2282 年到纪元 1227 年的西藏和青海史（附有各时期历史地图）》（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ода до Р. Х. до 1227 года по Р. Х. с картю на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сей истории），雅金夫·比丘林译，1－2 卷，圣彼得堡，1833 年版，第 5 页。

〔4〕雅金夫：《从 15 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 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 о времени），圣彼得堡，1834 年版，第 3 页。

有关蒙古的学术研究。在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记述卫拉特的珍贵资料。[1] 可是，他们对历史事件所作的解释证明，作者对史料也抱着不加批判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两人作品的倾向性。例如，波科季洛夫写道，在两部蒙古编年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和《黄金史》中只有"迅速更迭的蒙古领主姓名的罗列，对这些领主安排了几个传奇式的故事，如果按照蒙古史料直接研究这些故事，要揣想出它的历史涵义是太难了，而且有一部分则是完全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上述期间所留存的蒙古史著作远不只限于上面所说的两部古代文献，但是，无论已经发现多少新的编年史和传说，它们的特点无疑地都具有同样偶然的、传奇的性质。只有对中国史料中有关这一论题的全部现有资料进行精细研究，才能把所有这类传奇故事联系起来，编写出明朝时期历史事件的或多或少完整的图景，即唯有中国史料能为我们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一系列可靠事实，而蒙古的故事则只能是这些雄辩事实的例证"[2]。

7

中国的编年史和某些史籍对于研究东亚和中央亚细亚各民族的历史具有巨大意义，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仍然需要对中国史料持客观的、科学的批判态度，而不能单纯地加以转述，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史料才能得到充分可信的利用。然而，不管是比丘林本人的，还是其继承人的研究蒙古历史的著作，主要的缺点就是对史料不加批判，他们忽视了中国王朝的官方年鉴以及有关中国邻近民族的某些历史著作中有受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制约的情况。[3]

---

〔1〕波科季洛夫（D. Покотилов）：《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Исторця восточных монголов в период династий Мин. 1368—1634），圣彼得堡，1839 年版；《蒙古游牧记》，普·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译，圣彼得堡，1895 年版。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的东蒙古人史》，第 11 页。

〔3〕兹举 17 世纪末出版的历史名著《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为例。从 1691 年玄烨皇帝（他 1162—1722 年执政的年号是康熙）所写的出版序言中，我们得知，按皇帝圣旨组织有一个宫廷直属的翻译委员会，译出后，"朕几务之暇，留神披阅，博稽详考，纤悉靡遗"。写序言的这位皇帝，作者认为，对这部作品"详考"是必要的，因为他在《通鉴纲目》的第三部分论述宋、辽、金、元各执政者的言行里，就发现了许多"陋"、"疑"之处。参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ЦГАДА），第 181 号档，第 203 卷，第 1－5 张。

弗拉基米尔佐夫有充分根据地指出，比丘林的著作给史学界带来了许多有关蒙古和蒙古人历史的错误概念。他写道："许多对卫拉特完全不正确的观点……肇端于比丘林的……那本名著《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说》，这本书到处是不确切的和错误的说法。"[1]著名的东方学家勃列特史奈德由于同样的原因，也狠狠批判了比丘林论述蒙古和卫拉特的学术著作。勃列特史奈德认为，特别是对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描述最薄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转述中国史料《西域同文志》(《中亚史地辞典》，1763 年按弘历皇帝的命令写成并发表的著作)为基础的。[2] 勃列特史奈德对乌斯宾斯基的类似著作《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一书的评价，要比对比丘林的著作的评价高得多，因为乌斯宾斯基不是拿一部，而是拿许多部中国史料作为其学术著作的基础，并且批判地对待了这些中国史料。然而，必须指出，比丘林的著作对于写作西伯利亚、中亚、哈萨克斯坦、卡尔梅克等历史的许多 19 世纪我国学者以及对于研究草原民族法律的法学家，都有过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作者在他们必须提到蒙古人的历史时，总是跟着比丘林，一再讲述中国官方的那些说法。

上述文献中的中国史料及其利用情况就是这样。

闻名欧洲的第一部蒙古史料是《蒙古源流》[3]（或译作《诸汗系谱宝史纲》）。这部著作的作者——蒙古领主萨囊彻辰生于 1604 年，死的时间不会早于 1662 年，蒙古诸汗史他只写到 1652 年。在萨囊彻辰的编年史中，包括许多 15、16 世纪的卫拉特史料。萨囊彻辰把 7 本较

---

[1]弗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蒙古的社会制度——蒙古的游牧封建主义》（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Монгольский коцевой фиодалмзм），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 年版，第 157 页。

[2]勃列特史奈德（E. Bretschneider）：《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Mediaval Resea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第 2 卷，伦敦，1888 年版，第 168 页。弘历（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 1736—1795 年执政，年号乾隆。——译者

[3]乾隆年间，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将家藏蒙文抄本《蒙古源流》进献乾隆皇帝，乾隆命史馆译为汉文。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共 8 卷。——译者

早期的蒙古历史著作(我们见到的只有3本)作为他的著作的根据。[1] 萨囊彻辰的著作最初被译成德文,并于1829年由施米特在彼得堡出版。[2] 后来,又被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和西欧文字摘录重版。只是在不久以前,这部作品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海希斯全文出版,后来又在美国由摩斯塔尔特出版。我们多半引用摩斯塔尔特的译文。[3] 1958年,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抄本,萨囊彻辰的著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全文出版。[4]

9

第二部(按发表时间)论述蒙古和卫拉特历史的蒙古史料,是无名氏的作品《黄金史》,它由喇嘛学者伽尔萨·贡布耶夫译成俄文,1858年第一次发表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上。这部作品是一个无名作者在1600年至1625年间写成的,即比萨囊彻辰的著作早20—30年。我们在下面将说到,这两部蒙古著作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说法很不一致。苏联和外国的文献都已经指出,贡布耶夫的译本和他所使用的抄本,同样都不完善。1955年,巴乌登的著作在维司巴登问世。[5] 这本书中有拉丁文拼写的《黄金史》原文和英译文,附有批评意见,并指出了与一系列其他抄本异文的现象。为了力求把可能的错误缩小到最少的程度,我们既利用贡布耶夫的文本,也利用巴乌登的文本。与萨囊彻辰的著作同样,《黄金史》作为准噶尔汗国的史前期的一部史料,[6]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蒙古史料以简称《宝贝念珠》(它的全名是《编年史"宝贝念

---

[1]普契科夫斯基(Л. С. Пучковский):《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及木刻家》(Монгольские,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ие и ойра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第1分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25-28页。

[2]萨囊彻辰(Ssanang Ssetsen):《鄂尔多斯萨囊彻辰洪台吉撰的东蒙古人及其王家史》(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r Fürstenhauses verfasst von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us),施米特译自蒙文,圣彼得堡—莱比锡,1829年版。

[3]萨囊彻辰:《蒙古源流》(Erdeni-gin Tobči)——萨囊彻辰著的蒙古编年史,附有摩斯塔尔特的评序,1-4卷,剑桥—马萨诸塞,1956年版。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乌兰巴托,1958年版。

[5]巴乌登(Ch. R. Bawden):《蒙古编年史——黄金史》(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či),维司巴登,1955年版。

[6]原文如此,此处指准噶尔的早期历史。——译者

珠”》)闻名,由波兹德涅耶夫译出一部分,于1883年在彼得堡出版。 10
1960年,这部编年史在乌兰巴托全文发表。《宝贝念珠》的作者——噶尔丹台吉担任土谢图汗的爱马克中一个旗的协领职务。写成《宝贝念珠》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但按其内容来看,是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的。这部作品中有一些关于准噶尔汗国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部蒙古史料是《黄册》(《蒙古诸汗的世谱大黄册》),由沙斯季娜翻译并于1957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作者是谁不知道,也不能确定这部史料的创作时间。无疑的一点是,它是萨囊彻辰所了解的,因为他曾引用过《黄册》这本史料。[1] 因此,这本书的写成时间不会迟于16世纪中期。《黄册》中有涉及准噶尔汗国形成以前的卫拉特历史资料。

已经发表的,在不同程度上阐述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历史的蒙古史料只此而已。可见数量不多,并且这些古代文献发表的时间间隔很大:第一部——1829年,第二部——1858年,第三部——1883年,第四部——1957年。[2]

除了这些发表过的以外,还有一系列有待出版的很有价值的蒙古史料。其中许多珍藏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分所的手稿 11
部。在这些史料中,首先得指出的是《咱雅班第达传》。咱雅班第达是西蒙古驰名的喇嘛教活动家之一,在17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初期的喀尔喀和准噶尔社会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搞到的《咱雅班第达传》是出自他的一个学生和信奉者——拉特纳勃哈德勒之手笔。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藏书中,有一个《咱雅班第达传》的卫拉特文影印本,曾交我们使用。1961年我们收到乌兰巴托寄来的这

---

[1]普契科夫斯基:《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及木刻家》,第26页。

[2]我们没有提1866年卡法罗夫(帕拉基)第一次翻译出版和1940年柯津第二次翻译出版的《元朝秘史》,因为这本史料中所提到的有关卫拉特的情况属于12—13世纪。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没有提拉施特的《史集》。没有谈到的还有1912年在彼得堡用蒙文发表过,但没有包含卫拉特历史资料的蒙古编年史《青史》。

译者按:拉施特(1247左右—1318年),原为波斯伊儿汗国宫廷医生,他的著作《史集》是研究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料。

个传记的蒙文本，它是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抄本于1959年出版的。[1] 本书中我们一般使用乌兰巴托版本的原文。

上面列举的全部蒙古史料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大封建主或这个阶级出身的人所写的著作，都具有喇嘛教及其思想影响的痕迹。在清朝统治蒙古时期写成的作品，与其说是反映蒙古封建主的利益，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反映了满、汉封建主的利益。

必须指出，蒙古史料长期以来为专家们所忽视，也没有得到科学界应有的重视。19世纪的东方学家们认为，想借助蒙古著作作为研究蒙古历史的史料是徒劳无益的，这些东西最多只不过是对民族志学者以及考古学家有用的一些材料。例如，19世纪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家萨维利耶夫就是这样认为的。[2]

19世纪末的一位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这一方面如果不是唯一例外的人，也是罕见的人。他的很多有关蒙古和蒙古人历史方面的
12 很有意义的著作，一般是以蒙古史料为依据的，但是波兹德涅耶夫的学术著作却具有不少缺点，这些缺点大大降低了他的著作的科学价值。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待整个蒙古人采取傲慢的、一定程度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而且不是始终客观地解释历史事件。上述某些缺点早在19世纪时就受到了批判。[3]

只是到了现在，蒙古革命前的历史著作才成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细致研究的对象。这就为认识蒙古人民的历史，了解其社会制度和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许多著作在这方

---

[1] 拉特纳勃哈德勒（Ratnabhadra）：《咱雅班第达传》（Rabj' amba Caya-bandida-yin tuguǰi saran-u gerel kemekü ene metu bolai），乌兰巴托，1959年版。

[2] 萨维利耶夫（П. С. Савельев）：《序言》（Предисловие），见《蒙古编年史——黄金史》（原本和译本）所附《卡尔梅克文的乌巴什洪台吉及与卫拉特的战争史》，伽尔萨·贡布耶夫译，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卷4，圣彼得堡，1858年版，第8－9页。

[3] 米纳耶夫（И. П. Минаев）：《佛教的强辩》［评论，Апология ламства（рец.）］，载《国民教育部杂志》（ЖМНП），1888年6月；波兹德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答米纳耶夫教授的评论》（Ответ на рецензию профессора И. П. Минаева），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88年12月；维谢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评论，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Эрдэ нийн Эрихэ》），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64年6月；波兹德涅耶夫：《答维谢洛夫斯基》（Ответ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ому），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84年12月。

面是令人信服的证明。不过，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像对待其他任何史料一样，批判地对待蒙古史料。

有些卡尔梅克历史著作跟上述史料描述的范畴很相近。这些著作的作者出身于17世纪定居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封建贵族阶级。我们首先指的是1739年加班沙拉勃医生所写的《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和1819年卡尔梅克领主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所写的《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第一本《故事》的作者说明，他汲取的资料来自跟主教谷曼喇嘛、喇嘛学者阿尔达加勃士、著名的卫拉特执政者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寡妇多尔士拉卜丹、卡尔梅克执政者阿玉奇汗以及塔朋乌罕大臣等人的交谈。加班沙拉勃向所有这些人详细打听过以往一些事件，把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尽量加以验证。有时还补充一些他自己的评价和注释，根据土尔扈特族系起源的传说，他们的始祖是13世纪时客列亦惕执政者王罕的内侍官。在叙述这个传说时，加班沙拉勃写道，他无法说明这个内侍官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了王罕，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但是，也可能在喀尔喀会有这方面可靠的书面资料。[1]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卡尔梅克编年史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这类保留意见。例如，他一面肯定杜尔伯特和绰罗斯系的卫拉特王公们具有共同的族系，同时又写道，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他不能说出究竟是什么时候杜尔伯特和绰罗斯分离了。[2] 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拒绝阐明和鄂尔勒克之前土尔扈特部各执政者的活动等等。[3] 加班沙拉勃的保留意见使我们有一定根据得出结论，《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的作者使用过某些文字史料，并且有意识地不谈这类未能得到证明的卫拉特历史事件。这个情况提高了《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这部卫拉特史料的价值。

13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原著，最初

---

〔1〕加班沙拉勃（Габан-Щараб）：《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Сказание об ойратах），卡尔梅克手稿，原本，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国立大学图书馆藏书，木版，325，编号15536，第2页。

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副教授布尔杜科娃曾盛情地将这一手稿的影印本连同译文初稿交给我使用。借此机会，特向布尔杜科娃表示深切的谢意。——译者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页。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5页。

是由波兹德涅耶夫于1885年以石印本出版的。[1] 更早一些时候，这本故事就被雷特金译成了俄文，并发表在《阿斯特拉罕省报》上。[2] 雷特金精通卡尔梅克文，这决定了译文的高质量，因此可以深信不疑地使用它。

看来，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手头掌握有某些蒙古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常常使他陷入困境，因为不能解开症结，不能为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提供有条不紊的明确概念。他写道："据说，蒙古的编纂家们叙述过远古时代蒙古游牧区的情况，也许在当时，他们所叙述的那些事件的故事
14 是清楚的，可是，对于距当时事件很远的现代编纂家来说，就很难把其中杂乱无章的东西弄清楚。"[3]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也像加班沙拉勃一样，预先说明他没有可能引证权威的史料来充实所记载的资料和看法，因此，按照他的意见，记载可能会有错误。譬如说，在叙述和硕特部的王公世谱时，他在附注中写道："这里和后边，在计算人名和继承情况方面，似乎有错误，可是目前，我们还无法校正它们，因为手头没有为此所必需的史料。"[4]

不过，从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所写的《故事》中，完全肯定了一本史料，即他在注释里直接引证了一本温柴特阿尔达加勃士的编年史。[5] 这个温柴特阿尔达加勃士和加班沙拉勃提到的阿尔达加勃士可能是同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Батур-Убаши-Тюмен）：《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Сказание о дэрбэн-ойратах），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калмыков），圣彼得堡，1885年版，第49－90页。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雷特金（Ю. Лыткин）译，载《阿斯特拉罕省报》（Астраханские губерн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859年，第43，47，49，50期；1860年，第11、12期。

〔3〕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历史文献》，第52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4〕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历史文献》，第56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5〕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历史文献》，第54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一个人，即我们还不太清楚，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却使用过的那部编年史的作者。

直到目前为止，在俄国的，尤其是在外国的研究蒙古人和卫拉特人的历史文献中，上述卡尔梅克史料还几乎完全没有被利用。这既由于这类史料太少，也由于许多东方学家对于蒙古史料的意义一般估计不足。我们只知道一个把卡尔梅克人的《故事》用作研究蒙古史史料的尝试，那就是雷特金于1860和1861年在《阿斯特拉罕省报》上发表了一部详细而又很有趣味的史纲，题目是《卫拉特历史资料》。除了已经提到的两本《故事》之外，作者还使用过《咱雅班第达传记》、萨囊彻辰的著作、16世纪末卫拉特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巴什洪台吉所率部众的史诗传说和《江格尔传》，作者也亲自同许多“身孚众望”的卡尔梅克人交谈过。根据这些材料，雷特金才编出了一部极为详尽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叶的卫拉特史纲。史纲的缺点在于，作者没有越出领主生活中的政治、宗教和军事事件的范围，完全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而且提供的卫拉特对外政策史方面以及他们与邻国经济联系方面的资料很少。 15

我们对于论述卫拉特历史的突厥语文献还不太了解，研究得更少。然而考虑到卫拉特与东土耳其斯坦和中亚各突厥语系民族自古毗邻并有各方面的联系，可以初步认为，在这些民族的文献中一定会有不少有关卫拉特人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情况的重要资料。我们主要是根

据巴托尔德[1]和瓦利汉诺夫[2]的著作来判断这一点的。不过，无论我们从这种文献中汲取的有关卫拉特人的资料是多么少，它还是对中国和蒙古的史料作了重要补充。特别是对于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前半叶这一时期，无论中国的，还是蒙古的史料都谈得很少。因此，不能不对至今还未研究察哈台兀鲁思的历史表示惋惜，它在这方面比术赤兀鲁思要不顺利得多，其实，揭示察哈台汗国的历史演变情况，会大大有助于填补15、16世纪卫拉特历史上的许多空白点。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考古、民族志研究所不久前公布的材料，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3]

16

最后，我们谈一谈论述卫拉特人历史的俄国史料，这些史料对17和18世纪意义格外重大。如果没有这些史料，就不可能复现，更不可能了解准噶尔汗国的历史。其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是：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和科学院档案馆的有关文件。它们几乎包括所有派往卫拉特王公处的俄国外交代表团的文件资料以及卫拉特派来俄国的外交代表团的材料；俄国边防当局就他们和卫拉特各

---

〔1〕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土耳其斯坦旅行报告》（Отчёт о командировке в Туркестан），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15卷，圣彼得堡，1904年版，第2、3期；巴托尔德：《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ы），伏龙芝1927年版；巴托尔德：《突厥人及蒙古人社会风习与经济制度的联系》（Связ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быта с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укладом у турок и монголов），载《喀山国立大学考古、历史和民族志学会学报》（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и Казан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第34卷，喀山，1929年，第3－4期；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емиречья），伏龙芝1943年版。

〔2〕瓦利汉诺夫（Ч. Валиханов）：《关于1858—1859年南路（小哈布拉）六城的状况》（Остоянии Алтышаара или шести восточны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ан-лу/малой бухарии/в 1858—1859гг.），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ЗИРГО），圣彼得堡，1861年版，第3册；瓦利汉诺夫：《准噶尔简史》（Очерки Джунгарии），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61年，第1、2册。

〔3〕伊勃拉吉莫夫（С. К. Ибрагимов）：《玛苏达·贝·奥斯玛尼、库赫斯坦尼的阿布尔海尔汗史》（Сочинения Масуда Бен Османи Кухистани "Тарихи Абулхаир-хани"），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学院学报》，阿拉木图，1958年版，第2(7)期；伊勃拉吉莫夫：《卢兹别罕的米赫曼乃蛮和布哈拉——论述15—16世纪哈萨克斯坦历史资料》（"Михман-Намен и Бухара" Рузбехана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XV－XVI вв.），载《哈萨克斯坦古代史和中古史新资料》（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ревней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第8卷，阿拉木图，1960年版。

执政者的关系给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报告;因各种事务去准噶尔的俄国官员和其他人员的一些细致盘问性的谈话;准噶尔王公们给俄国当局和俄国政府的信件;莫斯科和彼得堡就与卫拉特各公国的关系给地方当局的命令和文件、外交谈判记录等等。由于多数是原本,就使这些文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他们数量极大——成千,也可能上万。

俄国档案文件谈到了从1604年的事件开始直到18世纪60年代为止的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情况。根据这些文件几乎可以透彻研究这一个半世纪中卫拉特一年一年的历史。这些文件中记录了卫拉特外交活动和经济联系方面一切最重要的东西,记载了卫拉特的内部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系列极为珍贵的资料。某些俄国档案文件曾在18、19世纪的各种刊物上登载过,不过这类出版物的数量,比起亟待发表的东西来,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官方文件之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鄂木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的档案库中,还有专门研究准噶尔汗国和卫拉特问题的未出版过的书籍和文章的手稿,其中某些很有价值。我们尤其要指出一部著作——1761年五等文官瓦西里·巴库宁撰写的《卡尔梅克族,特别是土尔扈特族及其各汗和领主行为的记述》。[1] 这本书的作者先后在卡尔梅克汗和汗国全权代理人的牙帐里当了多年翻译,此后他长期是俄国管理卡尔梅克事务机关的成员。由于熟悉卡尔梅克人的语言、生活和风俗习惯,巴库宁能把卡尔梅克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方面有意义的资料列入他的《记述》,这就为了解整个卫拉特社会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准噶尔汗国的内部结构减少了困难。这本《记述》曾由拉祖莫夫斯卡娅加了一篇短短的前言,略加删减之后,部分刊登在莫斯科1939年第3期和第5期的《红档》杂志上。照原文校对时查明,发表的这篇文章偶有疏忽的错误。

17

不能说过去没有尝试过使用论述蒙古历史的俄国史料。俄国的历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卡尔梅克卷宗(Калмыцкие дела),119/1号档,1630—1736年,Ia卷,第1-141张。

史研究者们，尤其是西伯利亚、中亚以及卡尔梅克汗国的历史学者，曾经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类史料。最早为了学术目的而熟悉俄国档案资料的人，是西伯利亚历史学者米勒和费舍尔。自然，他们的著作也是俄蒙关系史，尤其是俄国与卫拉特关系史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后来，西伯利亚、卡尔梅克以及中亚的历史学者，在涉及俄国同准噶尔的相互关系时，都以米勒和费舍尔所利用过的资料和文件为依据。[1] 但米勒
18 和费舍尔不仅没能解决这一论题，而且，甚至没有很充分地以科学的客观态度提出这个论题。正如有部文献所指出的那样[2]，他们两人分类挑出的俄国和蒙古、俄国和卫拉特关系方面的文件，具有信手拈来的性质。此外，他们在阐述一些事件时，持有一种表现得很明显的反蒙古倾

---

〔1〕例如，阿·波波夫（А. Попов）：《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简评》（Крат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приволжских калмыках），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39 年 4 月；比尤烈尔（Ф. А. Бюллер）：《游牧和定居于阿斯特拉罕省的非俄罗斯人》（Кочующие и оседложивущие в Астрахан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инородцы），载《祖国丛刊》（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диски），第 47 卷，1846 年；涅费捷耶夫（Н. Нефедьев）：《有关原集居于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详细资料》（Подроб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о волжских калмыках，собранные на месте），圣彼得堡，1834 年版；尼·波波夫（Н. Попов）：《塔季谢夫及其时代》（В. Н. татищез И его время），莫斯科，1861 年版；克拉索夫斯基（М. Красовский）：《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人地区》（Область сибирских киргизоз），载《俄国历史和统计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и），第 2 卷，圣彼得堡，1868 年版；库罗帕特金（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喀什噶尔》（Кашгария），圣彼得堡，1879 年版；谢格洛夫（И. Щеглов）：《西伯利亚史重要资料年表索引》（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еречень важнейших данных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伊尔库茨克，1883 年版；普·斯洛夫佐夫（П. А. Словцов）：《西伯利亚历史概说》（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ибири），圣彼得堡，1886 年版；安德利耶维奇（В. К. Андриевнч）：《西伯利亚史》（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圣彼得堡，1889 年版；库罗帕特金：《俄中问题》（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圣彼得堡，1913 年版；卡塔纳耶夫（Г. Е. Катанаев）：《17—18 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及中国北部》（Киргизские степи，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в XVII 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载《俄国地理学会学报的西西伯利亚部丛刊》（Записки Зап.-сиб. отдела ИРГО），鄂木斯克，1893 年，第 14 册，第 1 期；伊·斯洛夫佐夫（И. Я. Словцов）：《西伯利亚总督们对卡尔梅克邻族的政策》（Кполитике сибирских воевод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оседним калмыкам），载《托博尔斯克省博物馆年鉴》（Ежегодник Тобольского губернского музея），1897 年第 7 期；布钦斯基（П. Н. Будинский）：《西伯利亚移民及其第一批居民的风俗》（Заселение Сибири и Быт первых её насельников），哈尔科夫，1889 年版；奥戈罗德尼科夫（В. И. Огородников）：《19 世纪初以前的西伯利亚史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 начала XIX столетия），第 I 部，伊尔库茨克，1920 年版。

〔2〕鲍戈亚夫连斯基（С. К.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17 世纪前半叶卡尔梅克历史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алмыков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载《历史丛刊》（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1939 年第 5 期。

向，一种故意引人注目的亲俄态度，这对后来整个革命前的俄国文献有相当的影响。

19 世纪末，班蒂什·卡缅斯基在出版俄国档案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档案资料是阐述俄国在整个远东的外交史的，特别是俄国与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史。[1] 多亏这些材料，他才能说明将近 200 年间俄国同中国、蒙古以及准噶尔汗国的相互关系史，而且能比米勒、费舍尔和其他前辈讲得广泛得多，客观得多。但是他也跟其他人一样，对蒙古内部的历史很少感兴趣。因此，他也就没有对蒙古王公们的生活、风俗习惯、经济、社会关系、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等等有关资料加以注意。同时，必须考虑到，班蒂什·卡缅斯基在叙述和解释历史事件时，没有越出俄国档案资料的范围，没有借助于其他史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阐明历史材料方面的某种片面性。 19

著名的蒙古学学者科特维奇进行了大量研究俄国档案材料的工作。在他之前，也可能在他之后，都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熟悉俄国与卫拉特关系史方面的俄国档案资料的内容。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劳动的成果。他的一部专论俄国档案资料问题的著作，主要具有史料学的性质。[2]

论述准噶尔汗国历史的一部重要史料是所谓 1640 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但这部法规的原本没有流传下来。法规是 1640 年准噶尔代表大会上批准的，参加过这个大会的卡尔梅克领主们，把这部法规的原文带到了伏尔加河。但是保存在卡尔梅克汗牙帐里的原文本，在 18 世纪初的一次内讧中被毁掉了。后来从伏尔加河保存的副本复制了许多抄本，其中有些已经译成俄文发表。[3] 蒙古—卫拉特法规是一部描写蒙古内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许多研究者在他们

---

〔1〕班蒂什·卡缅斯基（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1619 到 1792 年俄中外交文集》（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喀山，1882 年版。

〔2〕科特维奇：《有关 17—18 世纪对卫拉特人的俄国档案资料》。

〔3〕戈尔曼（М. И. Гольман）：《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规的俄文译本与抄本》（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и списки монголо-ойратских законов 1640 г.），载《蒙古文集》，莫斯科，1959 年版。

的著作中对这部古代文献进行了专门研究。[1]

但是，所有这些学者在评论1640年代表大会以前，促成批准法规的历史环境方面，都是仿效比丘林的。他们的学术著作远没有揭示出1640年法规之所以制定以及它之所以区别于更古一些的蒙古法学文献的社会经济因素。不过，我们在指出这个重要缺点的同时，也不能不强调上述学者的巨大功勋，他们发表这部古代文献的原文，从而丰富了科学，并为研究这部文献奠定了基础。

20

在论述蒙古和蒙古人、准噶尔和卫拉特人的俄国历史文献中，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很熟悉关于这些地区的所有俄国和西欧的文献，但是没有使用东方文字的史料，他试图写作一部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初蒙古历史的概括性著作。他对某种历史事实的本质的估价有些地方是颇可玩味的，但整体说来，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蒙古历史著作是一种根据别人的著作精心编纂而成的内容丰富的作品。

专门研究卫拉特人和准噶尔汗国的外国文献并不丰富，值得一提的这类著作的作者大概不超过10个人。按时间算，最早的一个是耶苏

---

[1]列昂托维奇（Ф. И. Леонтович）：《古代蒙古—卡尔梅克或卫拉特刑法条例》（察津·必扯克）（Древний монголо-калмыцкий или ойратский устав взысканий/Цааджин-Бичик/），敖德萨，1879年版；戈尔斯童斯基（К. Ф. Голстунский）：《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Монголо-ойратские законы 1640 г.，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указы Голданхунтайдж и изаконы，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для волжских калмыков при калмыцком хане Лондук-даши），圣彼得堡，1880年版；古尔梁德（И. Я. Гурлянд）：《从远古时期至17世纪的草原法律》（Степн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7-ое столетие），喀山，1904年版；梁赞诺夫斯基（В. А. Рязановский）：《蒙古法律，主要是习惯法》（Монгольское право，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обычное），哈尔滨，1931年版。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Г. Е.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中国西部游记》（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第2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安多和青海地区的民族志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Этнологии Амдо и области Куку-Нора），载《俄国地理学会学报》（ИРГО），圣彼得堡，第39卷，1903年第5期；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与乌梁海边区》（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и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第2卷，圣彼得堡，1926年版；第3卷，圣彼得堡，1930年版。

会士张诚[1]，他在玄烨皇帝[2]宫廷中任职多年，并不止一次地完成皇帝委托他考察与记述蒙古的任务。张诚写过一部有关蒙古人和卫拉特人的著作，且部分已经被译成俄文。[3] 目前，这部书只能作为一个目睹者的纪实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位目睹者记录了当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重要细节。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欧洲东方学者，大多数对卫拉特历史本身不感兴趣。他们中那些专门著书研究远东各民族的人，比较起来宁肯写中国，而且只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涉及蒙古人的问题，也就略微地、顺便地提一提卫拉特。霍沃思、库兰、加恩、巴德利、哈斯卢德和海尼施等人的著作是例外。霍沃思写了一本内容广博的蒙古历史著作[4]，就其性质来说，接近于上面提到过的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历史著作。霍沃思论蒙古人的著作不是以他研究过的原始史料为基础，而是以其前辈的历史著作为基础的，他对这些史籍略加分析，就一些争论问题的实质说出自己的意见和初步看法。 21

库兰的著作专讲 17—18 世纪的中亚，而又以讲准噶尔汗国为主。[5] 按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是以中国大臣王先谦根据别人的著作编纂的巨著《东华录》的部分内容为基础的。库兰也很了解俄、德、法各国作者论述中国和蒙古历史的著作。库兰把中、俄文献中的资料加以对比，他发现，中国史料只把卫拉特人描写成土匪，把他们的汗

---

〔1〕张诚（P. Jean-Francois Gerbillon，音译为“热尔皮昂”），1654 年出生于法国凡尔登市，1670 年入南锡地区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1688 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与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被康熙皇帝留在宫廷任职。自 1688 年到 1698 年，曾 8 次去东北、蒙古诸地，每次都有日记。1689 年，他同葡萄牙人徐日升神甫（1673 年来华，任康熙的音乐教师，后任钦天监监正）一起参加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担任译员。1707 年死于北京。——译者

〔2〕玄烨皇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译者

〔3〕张诚（热尔皮昂，Гербилон）：《鞑靼帝国》（О Великой Татарии），载《选自圣彼得堡各年日历的作品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ыбранных из месяцесловов на разные годы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第 1 部，圣彼得堡，1785 年版。

〔4〕霍沃思（H. Howorth）：《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 1－3 卷，伦敦，1876—1888 年版。

〔5〕库兰（M. Courant）：《17—18 世纪的中亚》（L' Asie Central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s）——卡尔梅克帝国或满洲帝国（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里昂—巴黎，1912 年版。

国描写成土匪组织，而在俄国作者的记述里，准噶尔汗国却是一个贸易发达、行政制度条理井然的国家。整个说来，库兰的著作没有越出记录和描写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范围，作者没有试图分析这些事件，对人民的生活也不感兴趣。著作的主题思想就是两种力量——满洲人和卡尔梅克人（卫拉特人）之间的冲突，双方都力求在击溃对方之后，建立自己的帝国。

加恩[1]的著作主要讲17世纪末到1725年间的俄中关系。作者本身对准噶尔汗国及其历史并不感兴趣，而是出于要估价这个汗国在俄国和清帝国的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22 《俄国·蒙古·中国》这一原著的作者巴德利[2]，把苏联档案库中的俄国档案资料作为他的著作的基础。其研究包括1602到1676年这个时期。作者在这本书一开头的导言中，试图详细考察17世纪初以前蒙古的历史演变情况。这篇导言并没有独立的学术意义，它依据的是从俄国和英国文献中汲取来的资料。至于资料本身，一般说来，作者翻译得还不错，而且是很认真的。[3]

1935年在伦敦出版了斯文·赫定中亚考察团参加者之一——哈斯卢德所写的一本书：《蒙古的人和神》[4]。1923年，作者曾住在人民蒙古，以后成了中亚考察团的一员，在新疆土尔扈特人中生活了好几年。哈斯卢德对土尔扈特的行政制度的原则阐述得相当详尽，并且援引了有关其社会关系方面的若干资料。他提到过一本手抄的古书，这本书是当地喇嘛学者读给他听，并给他详细讲解的。书中叙述了土尔扈特人的起源和历史，土尔扈特的编者们是在几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写出这本书的。哈斯卢德说，他从这个手抄本中吸取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

〔1〕加恩（G. Cahon）：《1689—1730年中俄关系史》（Histoire de la Relation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a sous Pierre le Grand/1689—1730/），巴黎，1911年版。

〔2〕巴德利（J. Baddeley）：《俄国·蒙古·中国》（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第1－2卷，伦敦，1919年版。

〔3〕参看柯津对巴德利的载于《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东方学会学报》（第1卷，列宁格勒，1925年版）中的一本书的评论。

〔4〕哈斯卢德（H. Haslund）：《蒙古的人和神》（Men and Gods in Mongolia），伦敦，1935年版。

他说："这是一部用蒙文写的，而且论其来历纯粹是蒙古的古代文件汇编，这些文件是土尔扈特汗和土尔扈特族的始祖们过去几百年往事的清晰而离奇的历史。"[1]关于这部历史，除了哈斯卢德的记载外，我们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过任何提到它的话。

哈斯卢德的书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使人们有可能详细考查某些全蒙古的和卫拉特本身的社会制度的演变情况。这些制度的发祥地是准噶尔，17 世纪初土尔扈特人和杜尔伯特人把它们带到了伏尔加河并在 23
1775 年至 1800 年又重新带回到裕勒都斯山谷一带，20 世纪 30 年代哈斯卢德就是在那里考察这些制度的。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将会谈到。

这里我们不准备再谈外国作家的其他著作，因为它们都只讲到卫拉特历史上的个别时期或个别事件。当我们后面研究到这些时期和这些事件时再回过来讲述。

研究准噶尔汗国历史的藏文史料，意义极为重大。

西藏于 16 世纪末、17 到 18 世纪在蒙古和准噶尔的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要研究和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不借助说明西藏内部情况及其与卫拉特执政者相互关系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些问题，在罗克希尔[2]、贝尔[3]、佩特奇[4]等人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过。天主教传教士德西代里[5]也记述过有关西藏和 18 世纪初一些事件的珍贵资料。

作者们用来作为上述学术著作基础的许多事实，十分清楚地揭示了 17 到 18 世纪西藏各封建集团之间尖锐的争权斗争，这些集团打着两个主要喇嘛教派——红教和黄教的旗号。这些事实说明在两藏进行

---

[1]哈斯卢德：《蒙古的人和神》，伦敦，1935 年版，第 20 页。

[2]罗克希尔（W. Rockhill）：《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n Emperors of China），莱登，1910 年版。

[3]贝尔（Ch.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牛津，1925 年版。

[4]佩特奇（L. Petech）：《18 世纪初期的中国和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莱登，1950 年版。

[5]德西代里（I. Desideri）：《西藏概况——伊卜利托·德西代里的皮斯托伊阿游记》（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1721—1727，伦敦，1937 年版。

斗争的势力的利益与蒙古封建主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这最后导致了黄教在西藏和蒙古的胜利),也说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准噶尔汗国意图利用宗教的影响和西藏的资源来反对清帝国。上述著作的价值,
24 也和某些俄国作者论西藏的著作一样,[1]取决于其中所收集的具体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才能使当时在中亚形成的历史环境恢复原貌。

苏维埃的有关蒙古、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历史文献,坚决摆脱过去的唯心主义观念,纠正对史料的不加批判的态度,以及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所固有的缺陷。苏维埃历史文献与革命前的不同,它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和对史料的精心研究,主要是注意揭示一些决定性的深远过程,这些过程决定着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演变,决定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及其阶级斗争,决定着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决定着与毗邻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相互关系。

因此,应该首先注意到蒙古人以及一切游牧民族的社会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苏维埃历史科学才充分地提了出来,并且加以解决。1930年,由于对一个吉尔吉斯游牧村进行了专门考察,首次查明了这个游牧民族在革命前存在有封建的社会关系。[2]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史料研究的第一次正面突破,过去说游牧民族永远是野蛮的,永远是氏族制度的理论独霸着史料研究。1933年,贝科夫斯基等人发表了研究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起源问题的专题讨论材料。[3] 次年,弗拉基米尔佐夫院的著作《蒙古的社会制度》一书问世,这本书很快被公认为是一个以蒙古的史实材料为基础的分析深刻的成果。弗拉基米尔佐
25 夫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和语文资料,雄辩地证明,革命前蒙古历史过程的社会经济内容就是封建制度的发展。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成为了史

---

[1]例如,参看: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中国与西藏关系史概略》(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Тибетом),载《俄罗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著作集》(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第2卷,圣彼得堡,1855年版。

[2]波戈列里斯基、巴特拉科夫(П. Погорельский И В. Батраков):《吉尔吉斯斯坦游牧村的经济》(Экономика кочевого аула Киргизстана),莫斯科,1930年版。

[3]贝科夫斯基(С. Н. Быковский)等:《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基本问题》(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енезиса и развития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莫斯科,1934年版。

学研究突出的典范，它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世界声誉，并且现在正在被各国进步学者有效地使用着。

不过，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弗拉基米尔佐夫的学术著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缺点是个别的，它们丝毫不能动摇作者的基本论点。弗拉基米尔佐夫证明，蒙古人在封建制度时代的历史发展在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是受封建社会历史总规律支配的。

弗拉基米尔佐夫没有专门研究卫拉特的历史，尽管对其个别问题曾发表过许多极重要的意见。这些我们在后面再谈。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及其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卡尔梅克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对于研究卡尔梅克历史的兴致活跃起来了。1926—1929 年，帕里莫夫的著作《17、18 世纪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历史初探》在阿斯特拉罕发表。这本书中对卡尔梅克和卫拉特历史的共同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对于卡尔梅克人从准噶尔迁移的时间和原因，以及卡尔梅克和卫拉特汗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的研究，占有颇大篇幅。帕里莫夫并不是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这应该说是因为他手头掌握的史料很不充分的缘故。

1939 年，在《历史札记》上出现了一篇鲍戈亚夫连斯基的著作——《17 世纪前半叶卡尔梅克历史资料》。作者在对卫拉特历史的某些具体资料进行确切说明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大多没有用事实和可靠的证据来加以论证。

战后年代，蒙古学在苏联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些年代里，苏维埃学者和蒙古学者的协作加强了，这点尤其体现在 1954 年出版的一部由他们共同编写的著作——《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上，其中也有相应的篇章谈到卫拉特的历史。苏联出版的国外东方各国中世纪史和近代史教科书中，也有一些篇章专门谈到卫拉特人和准噶尔汗国。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准噶尔汗国史。在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对 15 至 18 世纪卫拉特历史的基本问题的看法仍是议论纷纭，分歧很大。这说明：编纂一部有重大价值的、真正科学的蒙古民族史，在一定程度上还

是将来的事情。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搜集蒙、汉、俄、藏等文字的新史料，以及中亚各民族文字的新史料；批判地研究新旧史料：对蒙古历史上个别时期和个别问题进行专题学术研究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研究蒙古的历史。这种研究也才能避免唯心主义的歪曲，避免主观主义和公式化。现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历史学者队伍，他们已经认真着手研究自己祖国的过去，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点使我们深信，有效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已经为期不远了。

说到本书，其作者所抱目标很有限，即叙述准噶尔汗国存在时期的历史。作者认为，依据上面提到的蒙古和卡尔梅克史料，以及俄国档案资料，可以编纂出一部内容广博、翔实可靠、基本上可以解决这项任务的史料学基础资料。同时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将来学术界采用新的蒙文、汉文、藏文和突厥文史料时，他的著作将需要进行颇大的，甚至可能是很大的补充、扩展和确切说明，只有当这类史料在学术上得到通用
27 时，才可能有效地完成揭开蒙古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的工作。虽然如此，作者仍然认为，今后无论对他所叙述的卫拉特及其汗国的历史做怎样的补充和确切说明，都只能是进一步说明和补充这部历史，而不会推翻本书作者所提出的基本的论点、估价和评述。这种设想的根据是苏联档案馆丰富可靠的文件资料，以及这里使用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蒙古、卡尔梅克和中国的编年史和史籍。

我们已经谈到过萨囊彻辰的蒙古编年史、《黄金史》、《宝贝念珠》、《黄册》、《咱雅班第达传记》、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著的两本《故事》，依我们看来，这些史料在本书中是被充分利用了的。

从中国的史料文献中，我们首先必须引证至今仍是手稿的《中国皇帝康熙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与厄鲁特民族史》[1]，它已经被罗索兴由满文译成俄文，显微胶卷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关于这部历史，我们后面再详细叙述，同时还必须引证一部已经提

[1]指温达等撰：满文本《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当时应为康熙时的刻本手稿。——译者

到过的历史著作《蒙古游牧记》。

由于希望查清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前提，作者认为，对15—16世纪卫拉特历史上重要而同时又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一番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作者依据的是：蒙古史料《黄金史》、《黄册》和《蒙古源流》的原文，勃列特史奈德、波科季洛夫、乌斯宾斯基等人复述中的《明史》以及巴托尔德、瓦利汉诺夫和伊勃拉吉莫夫等人的复述和译文中的突厥文史料。

考虑到这些史料彼此间经常有矛盾，作者试图根据所有史料或大部分史料中内容相符的资料，来编一种历史大事记。在作者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研究历史事件时的片面性，并接近真实。作者采用这一方法，并不打算过高估价它的作用。他很清楚，当一种较早期的史料被以后史籍的作者利用时（像利用《黄金史》、《黄册》和《蒙古源流》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早期史料的错误和不确切的东西往往可能在后来的史籍中重现。但目前在现有史料局限的条件下，这个方法在我们看来毕竟还是最合适的。 28

现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项研究题目本身有多迫切？准噶尔汗国史的问题和苏维埃历史科学当前的任务之间的联系怎样？苏维埃历史科学是否关注对卫拉特及其汗国历史的研究，以及关注到什么程度？

对所有这些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本项研究题目和苏维埃历史科学当前的研究课题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的历史科学对充分而全面地揭示卫拉特及准噶尔汗国的历史，也像整个蒙古人的历史一样，十分关注，因为中亚，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历史命运，过去不止一次地同蒙古族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只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对蒙古和准噶尔历史过程的发展没有正确的了解，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上述这些民族的历史。

苏联出版专讲十月革命前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布里亚特、哈卡斯和巴什基里亚等历史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忽略，也不能忽略有关蒙古和准噶尔历史的事实和现象，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某些著作中的错误就是由不了解蒙古和准噶尔的

历史造成的。拿1950年出版的供中学九年级使用的苏联历史课本为例，书中在讲述哈萨克的历史时，给学生灌输这样一种思想："1758年，哈萨克人民在著名的勇士中玉兹汗阿布赉领导下，借中国军队的帮助，给了准噶尔人以致命打击，并摆脱了准噶尔的桎梏"[1]。这种说法与
29 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留待以后说明。在第2版《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中提到："准噶尔世袭贵族占有最好的牧场所引起的畜牧经济危机，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向新的领土迁移，就引起了准噶尔人与邻邦的冲突"[2]，这种论点也同样是与事实真相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些错误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历史事实。如果本书能够排除重复这类错误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各民族的历史，有助于研究游牧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演变，那么，作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作者认为应该向所有提供过批评意见和解答疑难，从而帮助了这项艰巨工作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麦斯基和康拉德院士，感谢1962年过早逝世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谢略夫、乌斯丘戈夫教授和桑热耶夫教授，并感谢一级科学研究员迪雷可夫和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其他专家。作者要特别感谢蒙古同事——锡林迪普院士和纳佐克朵尔士院士，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伊然姆兹和图德夫，他们熟悉手稿原著，并提供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

[1]《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 СССР)，第2部，莫斯科，1950年版，第55页。

[2]《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第1卷，阿拉木图，1949年版，第147－148页。

目录

修订版出版说明 / 1
修订版译者导读 / 3
中译本序言 / 13
导言 / 23

1　15—16世纪前半叶的西蒙古 / 1
1.1　从元朝被推翻到也先汗国的覆灭 / 1
1.2　15 世纪后半叶至 16 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内外形势 / 22
1.3　15—16 世纪卫拉特社会制度的若干问题 / 35
2　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前提 / 54
2.1　16 世纪后半叶的西蒙古 / 59
2.2　准噶尔汗国的形成 / 74
2.3　喇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 / 105
3　17世纪前半叶末期、后半叶初期的准噶尔汗国 / 114
3.1　巴图尔浑台吉的内外政策 / 117

3.2　17 世纪 50—60 年代的
准噶尔汗国 / 151
4　1688年的喀尔喀—卫拉特战争、准噶尔汗国与
清帝国的战争(1690—1697年) / 174
4.1　噶尔丹执政初期的内外政策
(1688 年的战争) / 180
4.2　1690—1697 年的战争及其结局 / 205
5　全盛时期的准噶尔汗国(18世纪前半叶) / 237
5.1　内外政策 / 240
5.2　准噶尔汗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 294
6　准噶尔汗国的覆灭 / 324
结束语 / 356
第一版附记 / 360

缩写词表 / 361
人名索引 / 362
地名译名对照表 / 390

1　15—16 世纪前半叶的西蒙古

30

1.1　从元朝被推翻到也先汗国的覆灭

卫拉特的历史有着许多尚未为科学揭开之谜。如:“卫拉特”一词的词源和含义;这个术语和史料中常常遇到的概念“杜尔本·卫拉特”之间的联系;后者是否意味着“四卫拉特联盟”?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联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什么原因引起的?它的组成情况和目的怎样?东蒙古人和卫拉特人长期内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15世纪中期开始的卫拉特人军事和政治活跃的衰落,以及16世纪后半叶重新活跃等问题。

上面列举的这些问题,在历史文献中已讨论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了,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部分俄国和外国的蒙古学学者都赞同19世纪初列缪兹和施米特说过的意见:“卫拉特”一词在其词根中含有蒙古语“卫拉”——“亲近”的意思,因此应该把它理解为“亲近的人”、“同盟者”。当它跟另一个含义为“四”的蒙古词——“杜尔本”连接时,就形成了“杜尔本·卫拉特”这个说法,也就是“四卫拉特联盟”。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任务在于弄清“四卫拉特联盟”形成的时间和原因,确定其参加者的组成情况,并详细考察其历史。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这个观点的。首先反对这个观点的是多尔日·班扎罗夫。他断言“卫拉特”这个词“绝不是来自‘卫拉’,而是由‘卫·阿拉特’组成的,这跟拉施德的‘оинирген’,即‘森林中百姓’相

符”[1]。

31 库库淖尔[2]历史的研究者乌斯宾斯基则走得更远。他确信“杜尔本”这个词在“杜尔本·卫拉特”这个说法中不表示“四”，而是拉施特多次提到过的一个部落的名字[3]。乌斯宾斯基的观点得到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积极支持，格鲁姆把卫拉特和杜尔本都看做是在13世纪的历史事件中起过显著作用的特殊蒙古部落。[4] 拉姆斯杰特也认为，“卫拉特”这个词可能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含义，据此，他拒绝翻译这个词。[5]

关于“卫拉特”这个词的起源和意义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从我们这方面只能说，“卫拉特”表示“联盟”，而“杜尔本·卫拉特”表示“四卫拉特联盟”的这个论点，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还没有找到证明，这点我们后面再说明。

这一论点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元朝被推翻和蒙古征服者被驱逐出中国之后，即14世纪末，紧接着形成了卫拉特联盟。比丘林坚持这一观点。按他的意见，14世纪末，在准噶尔游牧的有卫拉特三大部——绰罗斯、和硕特和土尔扈特。[6] 他们这3个部组成了联盟，并让绰罗斯部的代表马哈木当首领。[7] 后来当杜尔伯特从绰罗斯部分离出来

---

[1]班扎罗夫(Д. Банзаров)：《关于卫拉特人和维吾尔人》(Об ойратах и уйгурах)，第1卷，喀山，1849年版，第26页。

[2]库库淖尔(Кукунор)即青海。——译者

[3]乌斯宾斯基(В. Успенский)：《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附《卫拉特及蒙古简史》(Страна Кукэ-нор или Цци-хай с прибавлением краткой истории ойратов и монголов)，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6卷，1880年，第140－141页。

[4]“卫拉特”这个部落的名字在成吉思汗时代渐渐为人所知，也就在那时形成了杜尔本和卫拉特的联盟，后来这个联盟就给蒙古和中国史学家们写“四卫拉特(杜尔本·卫拉特)”提供了理由。见：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61页。

[5]拉姆斯杰特(Г. И. Рамстедт)：《“卫拉特”一名的词源》(Этимология имени ойрат)，载《波塔宁七十寿辰纪念文集》，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549－550页。

[6]比丘林把蒙古人的“部”(Поколение)同“族”(род)严格区分开来：“游牧民族的‘部’是指领主家族(дом)和领地而言，这个家族依赖民族的最高首领——汗来统治领地。领主的旁系亲属以及作为其赡养费而分出来的那部分领地叫‘族’。这样，蒙古民族分为‘部’，‘部’又分为‘族’。”见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页。

[7]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4页。

之后，卫拉特联盟就成了4个部的联盟，其成员已经不是3个而是4个部了。正是从这时候起，即从15世纪中期起，联盟开始自称为“杜尔本·卫拉特”。[1] 32

巴托尔德也认为，卫拉特联盟形成于14世纪末，但是，和比丘林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不是3个参加者而是4个——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以及辉特。[2] 梁赞诺夫斯基同意巴托尔德的意见，可是又和巴托尔德以及比丘林有所区别：他把卫拉特联盟不看做是“部”的联合，而看做是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以及其他“部落”的联盟。[3] 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生活多年，并研究过其历史的科斯坚科夫也认为，卫拉特联盟形成于14世纪末，但对其组成情况和参加者设想的又不一样。他认为，最初进入联盟的是绰罗斯，辉特以及和硕特3个部落，后来土尔扈特加入，因此就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杜尔本·卫拉特”。[4] 柯津院士跟所有上面提到的学者们不同，他认为可能是，卫拉特联盟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作为“四个联合汗国”而存在了，因此联盟也正是以这个形式参加成吉思汗帝国的。[5] 英国蒙古学学者霍沃思也认为，“杜尔本·卫拉特”是中世纪时代产生的“四个同盟者”的联合，即联盟，认为“杜尔本·卫拉特”这个词就跟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国人所知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同盟者”这个词一样。[6]

可见，我们提到的这些学者在理解“杜尔本·卫拉特”的词义方面没有分歧，他们全都认为这个词表示实际存在过的“四卫拉特联盟”。但是，他们在确定联盟的组成方面，以及在有关其参加者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上分歧颇大。按有些人的意见，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是封 33

---

〔1〕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页；雅金夫：《蒙古志》（За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圣彼得堡，1828年版，第129页。

〔2〕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72页。

〔3〕里亚赞诺夫斯基：《蒙古法律，主要是习惯法》，哈尔滨，1931年版，第33页。

〔4〕科斯坚科夫（К. Костенков）：《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人历史统计资料》（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статистигеские свебения о калмыках，кочующих в Астраханркой щбернии.），圣彼得堡，1817年版，第2页。

〔5〕柯津：《江格尔传》（Джангариаб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3页。

〔6〕霍沃思：《蒙古史》，第1卷，第558页。

建的领地，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各种蒙古部落的名称。

班扎罗夫、乌斯宾斯基、勃列特史奈德、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对卫拉特早期的历史则另有看法。按班扎罗夫的意见，“杜尔本·卫拉特”这个名称出现在成吉思汗时期。当时，所有蒙古居民被分成许多“万户”（土绵），而且卫拉特人组成了4个这样的“万户”。根据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班扎罗夫认为，“杜尔本·卫拉特”这个名称所指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4个卫拉特“万户”。他写道：“因此蒙古人还用‘杜尔本’、‘杜尔本·土绵’和‘杜尔本·土锦·卫拉特’……来代替‘杜尔本·卫拉特’。这就是四卫拉特的起源，而不是目前形式上拼凑成的4个部的联盟。”[1]

乌斯宾斯基在熟悉了一系列中国的史料和史籍之后，确定这些文献中有不少矛盾和分歧之处。根据有些资料的说法，卫拉特人在明朝统治初期分成4个“族”或是4个“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他们各有独立的汗。除了上述4个族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大的属于杜尔伯特的辉特族。[2] 在17世纪，当土尔扈特迁往俄国时，它的地盘就被辉特所占，辉特就成了“四卫拉特”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根据这些中国史料提供的资料，从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组成卫拉特联盟的是：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从17世纪初期到准噶尔汗国存在末期则是：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辉特。[3] 而从18世纪末，当土尔扈特从伏尔加河返回新疆（在原准噶尔汗国领土上形成的一个省）时，卫拉特则已成了6个部——和硕特、辉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厄鲁特的联盟。[4]

---

〔1〕班扎罗夫：《关于卫拉特人和维吾尔人》，第25页。

〔2〕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27－128页。

〔3〕这种认为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后，其地位由辉特取代的说法，似无根据。其实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后，它与其他各部尤其是与准噶尔部的联系并未中断，这在俄蒙关系档案中也有其活动的史实记载，而辉特作为四部之一的活动或代表人物，我们未见有关记载，此说不可信。——译者

〔4〕此看法出自《蒙古游牧记》卷11注，但本书作者对原观点表述很不完整。原注说乾隆平定准噶尔后对卫拉特的称呼有6种，并非认为卫拉特分成了6部分。原注者还明确指出：“其名则有六种……核其实，不过三……要其种，则自明及今止一，曰额鲁特蒙古而已。”——译者

根据另外一些中国作者的资料，卫拉特只是在明朝统治初期才定居在准噶尔汗国的领土上，而他们的某一部分则居住在长城以北的归化城和鄂尔多斯两地区之间。

乌斯宾斯基很有理由地指出了上述史料和著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矛盾。他们把“杜尔本·卫拉特”这个概念解释成4个卫拉特“部”或“族”的联合，与此同时，一会儿说有3个这样的族或部，一会儿又说有6个。并且，他们把“准噶尔”这个词当做卫拉特的一个部的名称，这是与事实相矛盾的。“准噶尔”从来就不是一个族名，它一向都表示“左方”、“左则”。当时也有人用它标志成吉思汗部队的左翼，后来每块蒙古领地都有自己的“准噶尔”，即自己的“左侧”。 34

勃列特史奈德也像乌斯宾斯基一样，原则上不接受大约在14世纪末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的想法。他的一些论断主要来源于《明史》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在蒙古征服者被驱逐出中国之后，准噶尔地区的卫拉特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1]由元朝的一个统帅猛可帖木儿管理。只是在猛可帖木儿死后，卫拉特才分成3个部落。一个部落的首领是马哈木，另一个部落的首领是太平，第三个部落的首领是把秃孛罗。他们3人都作为自己领地的独立执政者而与明朝保持着关系。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将各种文献和史料中有关卫拉特联盟的成员及其形成时间方面的资料进行了一番对比，着重指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众说不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按照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本人的意见，卫拉特与杜尔本的联盟还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形成了。他把杜尔本和杜尔伯特看做同一个东西，并且根据这点肯定，在卫拉特联盟中树立了杜尔伯特的盟主权[2]，说卫拉特联盟延续到16世纪中期，当时从杜尔本（杜尔伯特）家族中分出了保留准噶尔这个名称的左侧部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认为，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归并于杜尔本·卫拉特联盟的时间尚未查明，但是他推测，这可能要晚得多，可能是在反对

[1]勃列特史奈德：《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第2卷，第161页。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66页。

东蒙古人的斗争尖锐的时期，当时，联盟的首领由杜尔本·卫拉特系的
35 王公担任。按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意见，辉特和绰罗斯与杜尔本（格尔伯特）具有同一族系，分离以后他们才形成了独立的部。

帕拉斯在这些问题上持有独特的意见。他肯定蒙古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曾经分成两个主系——蒙古族本身和杜尔本·卫拉特，而后者"……又分化成四个部，通称为厄鲁特、辉特、帖木儿和巴加比拉特。上述厄鲁特中有一支为亚洲西部和欧洲所熟知的名叫卡尔梅克的后裔……厄鲁特人或叫卡尔梅克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至少是从蒙古君主国崩溃的时候起，就逐步分化成通称为和硕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和土尔扈特的4个主要后裔，他们从蒙古人中分出之后，就在不同王公的管辖下各自为政"。[1]

可以看出，有关卫拉特联盟的组成及其形成的时间问题始终是模糊不清、端绪紊乱的。

关于卫拉特联盟形成的原因及其宗旨问题，在史学家中引起的分歧较少。所有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些原因是企图联合卫拉特的各种力量来反对东蒙古人，以争取统治全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系的帝国。例如，比丘林肯定，组成开始有3个部、后来是4个部的卫拉特联盟的主要原因，是要同东蒙古人竞争，是因为单个部没有可能取得胜利。结盟并推出了妥懽（1418—1440）和也先（1440—1455[2]），这两个出身于绰罗斯家族的天才执政者之后，卫拉特就战胜了自己的敌人而统率了整个蒙古族。可是，随着也先的死去，卫拉特的威力也随之消亡，就此结束了它历史上虽然短暂，但却辉煌灿烂的时期。[3]

36 多尔日·班扎罗夫也队为，对东蒙古人的"仇恨"是卫拉特结合成联盟的主要刺激因素。[4]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拉姆斯杰特。他写道，从

---

〔1〕帕拉斯（П. С. Паллас）：《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звестий 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ах，сочиненное господином П. С. Палласом），圣彼得堡，1776年版，第68－70页。

〔2〕按另一些材料为1456。

〔3〕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6－21页。

〔4〕班扎罗夫：《关于卫拉特人和维吾尔人》，第23页。

蒙古政权削弱时起，特别是在元朝被推翻之后，“卫拉特这个名字变得越来越出名了。卫拉特或叫杜尔本·卫拉特（四卫拉特），作为东蒙古人的敌人出现，一心向往摆脱‘四十个’蒙古人而获得独立自主”[1]。

柯津断言，卫拉特作为成吉思汗系建立的联盟中的一员，认为自己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帝国的关系不过是一般的臣属关系。因此，当成吉思汗的后代被赶出中国之后，卫拉特就不再承认东蒙古执政者的盟主权。他们组织的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而且还追求在蒙古部落及蒙古民族中建立盟主权。[2]

我们已经说过，乌斯宾斯基和勃列特史奈德原则上不接受有关卫拉特联盟的想法，因而也不考虑它形成的原因问题。

至于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由于按他的意见，杜尔本和卫拉特的联盟早在成吉思汗在世时就存在了，所以他企图弄清楚的不是14世纪末这一联盟形成的原因，而是由于蒙古征服者被赶出中国，在蒙古形成的变化多端的形势给联盟带来了什么新的内容。按照他的意见，这一形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东、西蒙古人之间斗争的加剧，这使卫拉特联盟生机勃勃，吸引了新的成员加入联盟的行列，并且巩固了使他们结合起来的关系。[3]

可见，所有研究者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东、西蒙古人之间斗争的激烈加剧，是这一地区历史上一件意义重大、后果严重的事实。可是，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什么？进行这场斗争是为了什么？这是历史科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关于这点谈了些什么呢？ 37

从帕拉斯开始，到波兹德涅耶夫为止，他们全都试图用游牧社会“天赋”的特性来解释东、西蒙古人之间的斗争，似乎由于游牧民族的这种特性，没有掠夺战争，不入侵邻邦的土地，游牧民族便不能生存，这种解释是徒然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多半认为，卫拉特人反对其东蒙

[1]拉姆斯杰特：《卫拉特一名的词源》，第548页。

[2]柯津：《江格尔传》，第5页。

[3]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69页。

古同胞，仅仅是企图建立起卫拉特对全蒙古的统治，而最终的目的是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总进攻，并在卫拉特控制下恢复成吉思汗系帝国。[1]

乌斯宾斯基对这一斗争的解释略有不同。他认为，这场斗争的基础是代表旧草原贵族利益的卫拉特人和汉化的东蒙古人之 间的矛盾，前者忠于先辈的传统，后者则抛弃了这些传统。[2]

必须指出，在苏维埃历史文献中，偶尔也出现一些著作，它们继承着，而有时还是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学派的传统。这些著作的作者同他们的老前辈一样，不是在具体历史环境的特点中，也不是在东蒙古和卫拉特统治阶级的政策中去寻找蒙古与卫拉特斗争的原因，却是在游牧民族的心理和天赋的特性中寻找这些原因。鲍戈亚夫连斯基的一本专讲17世纪卡尔梅克历史的著作[3]，以及柯津的关于卡尔梅克史诗传说的著作——《江格尔传》[4]，就是例子。

38

在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于蒙古与卫拉特斗争原因的解释独具一格。按他的见解，15世纪和16世纪前半叶蒙古历史上的基本动力是两个蒙古贵族阶层的斗争：以称作“台吉”的成吉思汗嫡系后裔为一方，以官宦贵族、万户、千户、百户和其他大臣，以及草原贵族出身的人为另一方。在这场斗争中，东蒙古封建主是作为成吉思汗嫡系的代表人物——“台吉”出现的，而卫拉特

---

〔1〕帕拉斯：《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第73页；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32、63页；科瓦列夫斯基（О. Ковалевский）：《中国在17世纪将近半个世纪的变革》（Пересорот в Кигае около половины XVII В.），载《国民教育部杂志》第25部，1840年，第134页；科斯坚科夫：《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人历史统计资料》，第36－37页；波兹德涅耶夫：《本世纪初以前的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国的关系》，载《国民教育部杂志》第244部，1886年，第142页；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原文附有译文及说明，说明中列入了1636到1736年的喀尔喀历史资料），圣彼得堡，1833年版，第103页；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20页及结论；拉德洛夫：《关于维吾尔人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йгурах），载《皇家科学院丛刊》，圣彼得堡，第72卷，1893年，第1册，第73－76页；维谢洛夫斯基：《蒙古史讲义》（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76、97页。

〔2〕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46－147页。

〔3〕鲍戈亚夫连斯基：《卡尔梅克人历史资料》，第87页。

〔4〕柯津：《江格尔传》，第54－55页。

封建主则代表了称作萨伊特的官宦贵族的利益。[1]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解释也并不是理由充足、详尽无遗的，尽管比弗拉基米尔佐夫前辈的唯心主义学说体系前进了一大步。

意见分歧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分歧涉及卫拉特早期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我们又如何能查明真相呢？让我们看看史料吧。

《黄金史》——我们搜集到的第一部后元[2]时期的编年史说到，有一天，额勒伯克汗（1392—1399 在位）的心腹——卫拉特大臣浩海达裕陪同汗去打猎。他叫汗注意哈尔克楚克都古楞洪台吉的妻子、汗的儿媳妇鄂勒哲依图鸿郭斡。她“肤色白如雪，面颊红晕”[3]，汗沉迷于这个儿媳妇的美色，不久竟杀死了亲生儿子，把儿媳妇霸占为妻。浩海达裕期望从额勒伯克汗那里得到相当的报酬、封号和职位。可是过了不久，年轻的王妃出于报仇，害死了他，王妃诬告浩海达裕企图强奸她。 39
勃然大怒的额勒伯克汗杀死了浩海达裕。鄂勒哲依图鸿郭斡很快又向汗承认了其所做之事。额勒伯克汗确信被杀者无罪，并感到后悔，就把浩海达裕的两个儿子巴图拉丞相和格齐哈什哈召来，委派他们当卫拉特 4 个万户的执政者。但是他们两人“在蛇年，即额勒伯克汗统治的第六年杀掉汗，占据卫拉特四个万户，并分离了出去，双方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样一来，蒙古的政权转到了卫拉特方面”[4]。

《黄册》和《蒙古源流》大体上证实了《黄金史》中所叙述的资料。《黄册》省略了某些细节，而《蒙古源流》称浩海达裕是千户[5]，说额勒伯克汗答应奖赏浩海达裕帮他搞到美女鄂勒哲依图鸿郭斡的功劳，答

---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 147－148 页。

〔2〕后元是指明朝推翻元朝后，蒙古贵族在蒙古地区建立的以元为称号的一个时期的割据政权。——译者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55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69 页。应当注意，人名“浩海达裕”在我们的史料中写法各不相同：在《黄金史》中写成 Xudxai tafu，在《黄册》中为 Xudxai tayiu，而在《蒙古源流》中写成 Xudxai tayixu。

〔4〕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57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0－71 页。

〔5〕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 120 页。

应赏他宰桑封号，并让他当全卫拉特的执政者。[1]《蒙古源流》在提供这些新资料的同时，在一个问题上纠正了《黄金史》作者的说法，提出鄂勒哲依图鸿郭斡的丈夫哈尔克楚克都古楞洪台吉不是额勒伯克汗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在另一处，《蒙古源流》根据《黄册》的说法，对《黄金史》的一个记载作了准确的说明，指出额勒伯克汗杀死浩海达裕之后召来的不是后者的两个儿子，而是一个，叫巴图拉，赏给了他丞相的封号，并把自己的女儿萨穆尔公主嫁给了他，并委派他当所有卫拉特万户的执政者。同时，《黄册》直截了当地指出，浩海达裕出身于绰罗斯族。其他方面，这3本蒙古史料的记载都相互吻合。

由于这3部蒙古编年史在这些资料上相互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下列一点：在后元时期，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懽帖睦儿的曾孙——额勒伯克汗执政年代[2]的史料，才第一次提到卫拉特活动家。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也可能更早一些，在元朝掌政时期，卫拉特贵族跟东蒙古贵族，尤其是跟元朝皇帝的后裔，曾经有过多方面的紧密合作，卫拉特封建主跟皇帝后裔的关系是藩臣同君主的关系。卫拉特封建主第一个公开反对东蒙古封建主的行动就是1399年[3]杀死额勒伯克汗。此后，卫拉特就摆脱了全蒙古大汗的统治。在这个时期，正如我们的蒙古史料所一致指出的，除了当时蒙古通行的分成万户、千户等等之外，卫拉特还不知道其他行政划分。他们在民族上和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封建领地的居民，这个封建领地的首领是独裁的执政者，有时是称作“济农”的副王。

40

还有一点可以证实这些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黄金史》和《黄册》的无名作者无疑是出身于东蒙古贵族，他们不可能有亲卫拉特的观点；《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是个大封建主——鄂尔多斯的领主，更不可能是亲卫拉特者。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记载深信不疑。

---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20页。

〔2〕即在蒙古征服者被赶出中国以后又过了1/4世纪的时候。

〔3〕卫拉特千户浩海达裕死后6年。

必须指出，就连明朝的官方史书《明史》[1]也证实了上述蒙古史料中的某些重要记载。例如，根据《明史》的资料，元朝将领之一猛可帖木儿还在元朝被推翻以前（或者被推翻以后不久）就宣布自己是卫拉特的执政者，并且一直任职到死。此后，他的领地分成了3部分，每部分各有一个执政者，即由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管辖。《明史》记载，这些执政者是谋求与中国和平相处并为此遣使到北京进贡的第一批蒙古王公。

1409年，朱棣帝给卫拉特这三位执政者赏赐了封号。准噶尔的使者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只是在卫拉特征服全蒙古之后[2]，这种和平友好关系才中断了，而代之以卫拉特武装入侵中国内地的情况。因此，明朝这部史书证实了蒙古史料的下述记载：即第一任卫拉特执政者是一个曾在元朝皇帝后裔那里供过职的将领。他在世时，卫拉特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封建领地，只是在他死后，这个领地才被分割开来，而卫拉特反对东蒙古人的斗争，远不是在元朝被推翻后就立刻开始的。 41

从东蒙古分出之后，也就是拒绝从属于全蒙古大汗之后，卫拉特人就在蒙古西部扎根定居下来，在那里受自己卫拉特王公们的管理，从15世纪初开始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蒙古史料对这个政策只字未提，但《明史》的资料证明，卫拉特执政者在这些年代力求与明朝建立睦邻关系。这种政策是迫于当时西蒙古的内外形势而采取的。这一形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蒙古与中国传统贸易关系的中断，这是蒙古征服者被驱逐以及明朝跟蒙古诸汗之间多次战争造成的结果。恢复与中国的贸易，是卫拉特执政者们的迫切需要。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或者通过和平方式，或者通过战争。他们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比较好。《明史》中有许多地方提到来过明廷的卫拉特外交代表团。毋庸置疑，这

[1]原文如此。实际上，《明史》是其后的朝代——清朝修编的，为清代的官方史书，而非明代当代编的。以后遇到这种提法，均应作此理解。——译者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31－35页；勃列特史奈德：《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第161页。名为猛可帖木儿的这个人究竟指的是哪个卫拉特活动家，无论哪部蒙古史料都还全然不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未列入我们的任务。

些代表团不单是,更可能主要的不是外交代表团,而是商队。我们得提前说说,不仅15世纪初曾经是这样,更晚一些,直到18世纪也还是这样。商队的派遣证明,跟定居的农业邻邦进行有组织的贸易交流,对卫拉特人也像对东蒙古人以及所有不定居的一般游牧民族一样,有着客
42 观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同时必须指出,对卫拉特王公们来说,在15世纪初,要用战争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在其领地的西部边境,已经展开了反对蒙兀儿斯坦[1]可汗的斗争,而后者从14世纪末起就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伊犁河、博洛尔和昆仑一带加强了防御。这个时期卫拉特封建主的领地分布在一块不太大的疆土上:东起杭爱山脉的西麓,南止戈壁沙漠,西接蒙兀儿斯坦,北到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可见,当时卫拉特的领地被不定居的、从事畜牧业的汗国和公国团团环抱着。这些汗国和公国的一长条广阔地区把卫拉特领地和定居的、从事农业的国家和民族分隔开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确是唯一可能推销卫拉特剩余畜牧产品的市场和供给农业及手工业产品的来源地。《明史》证实,跟中国比较容易达成和平交易还有另一个原因:15世纪初,明朝皇帝鉴于朱元璋死后(1399年)开始的夺位斗争,力求牵制卫拉特,并企图利用卫拉特来反对东蒙古诸汗,后者当时对年轻的明朝来说是主要的威胁。

我们看到,在卫拉特西边,当时通往中亚各定居农业民族的市场之路被蒙兀儿斯坦的领土所截断。[2]

卫拉特封建主反对蒙兀儿斯坦的武装斗争,无疑比反对中国的斗争开始得更早。突厥文史料记载说,早在14世纪末就发生了卫拉特进攻蒙兀儿斯坦的事件,不过那时候他们显然没有取胜,因为当时恰好蒙兀儿斯坦执政者都赫卢克帖木儿汗完全控制了从伊犁河到博洛尔和昆

[1]蒙兀儿斯坦在中亚东部地区,14世纪由察哈台领地分裂而成。这一名称指称的是保持蒙古传统文化和游牧生活方式而未接受伊斯兰化的那部分蒙古人地区,其名称一直存在到17世纪末。——译者

[2]在我们叙述的这段时间里,蒙兀儿斯坦的领土包括整个东土耳其斯坦,以及从额尔齐斯河和额敏河到天山,从巴里坤到巴尔喀什湖和费尔干纳这片领土,卫拉特牧地的西部边界当时甚至还未达到伊犁河岸。

仑的整个领土。不错，1408 年卫拉特占领了别失八里[1]。但是，这还远没有结束蒙兀儿斯坦与卫拉特的斗争，相反，在整个 15 世纪到 16 世纪初这一时期内，斗争一直胜负变化无常地延续着。[2] 卫拉特与蒙兀儿斯坦封建主之间武装冲突的经济基础就是争夺贸易通道，争夺卫拉特通往推销市场和供应品产地的出路。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像双方封建主力求增加他们统治的领土和臣民的数量来扩大封建剥削的范围、力求攫取战利品等等这样一些因素。蒙古的、中国的、突厥文的以及 17 世纪初以来的俄国史料中，有许多资料证明，这些因素在后元时期蒙古封建领地的战争史上，在其内讧中，在其发起的对中、俄边区的进攻等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可是，许多事实仍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蒙古封建主的对外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争夺通向推销市场和供应品产地的道路，是争取在游牧、畜牧民族及定居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易。 43

在歪思汗统治的年代（1418—1429 年），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之间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1422 年，歪思汗占领了分布在卫拉特牧区迤南的吐鲁番绿洲，并将蒙兀儿斯坦的京都迁往吐鲁番。就在蒙兀儿斯坦人占领吐鲁番的同年，发生了卫拉特人进攻哈密的事件，指出这点很有意思。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封建主之间为控制贸易通道所进行的斗争。[3] 巴托尔德引证《拉失德史》的话，说歪思汗在他统治蒙兀儿斯坦那些年跟卫垃特交战61次，只打胜过 1 次。1425 年，著名的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伯克从北边侵入蒙兀儿斯坦，冬季他带兵在裕勒都斯一带的山地——直接与卫拉特牧区的南部和西部交界的地方驻扎了几个月[4]。 44

---

[1] 别夫八里也称亦力巴力，是 14 世纪 70 年代察哈台后裔在我国新疆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封建地方割据政权。——译者

[2] 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 72 页及结论。

[3]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记载卫拉特向伊犁河流域推进的初次尝试时，直截了当地写道："什么东西迫使他们这样做我们不清楚。"见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 2 卷，第 626 页。他不理解销售市场和供应品产地跟游牧民族的经济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这个销售市场和供应品产地就是发达的农业国。

[4] 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 73 页及结论。

在上述这段时间里，卫拉特执政者与其近邻——东蒙古王公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可惜，我们所知道的蒙古史料中，能据以详细研究额勒伯克汗被杀后，东、西蒙古各事件的进程以及这一地区两部分执政者之间相互关系发展情况的实际资料是很有限的。

《黄金史》的作者第一次提到卫拉特的情况时，只描述了额勒伯克汗的第5代后裔阿台执政的那些年代。阿台汗从1435年到1449年曾管理这一地区。[1]《黄金史》中说："怀着对卫拉特由来已久的积仇，阿台汗聚积起自己的蒙古人，并开始向卫拉特进军"。[2] 交战前双方各挑一名勇士进行对射。巴图鲁锡古苏特诺颜代表阿台汗兵营，而从卫拉特方面出来的是巴图鲁珪林齐。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史料指出，两位勇士原是交往已久的朋友、结义兄弟。他们两人早在交战之前就商
45 量好，万一卫拉特与东蒙古人作战，就在对射中见面。对射之后进行交战，结果卫拉特战败，浩海达裕之子巴图拉丞相战死，他的妻子和儿子妥懽均被俘虏。在结束有关这场战役的故事时，《黄金史》作了这样一个结语："卫拉特的统治权就这样转到了东蒙古人之手"[3]。但是过了不久，阿台汗依照已经成了他妻子的妥懽的母亲的请求，尊敬地释放妥懽这位贵族俘虏回去，并由两名特使伴送他。"妥懽台吉刚一到达，就

---

〔1〕应该指出：蒙古史料在列举汗的名单及注明他们执政年代方面，明显地不一致。下面的表格可以使我们对这些不一致的现象有个清晰的概念。

汗名	《黄金史》	《黄册》	《蒙古源流》
额勒伯克	1394—1401	1392—1399	1393—1399
妥懽	1401—1405	未提及	未提及
奥洛依帖木儿	1405—1418	未提及	未提及
坤帖木儿	未提及	1399—1407	1400—1402
额勒锤帖木儿	未提及	1407—1415	1404—1410
德勒伯克汗	1419—1424	1415—1420	1423—1428
卫拉台汗	1424—1435	未提及	未提及
阿台汗	1435—1449	紧接德勒伯克汗之后执政12年	1426—1438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58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1页。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59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2页。

召集了卫拉特、乌古列特、巴噶图特以及霍哈特这四个万户”[1]。很快,妥懽台吉杀死了阿台汗。《黄金史》收尾说:“卫拉特就这样夺得了对蒙古人的统治权”[2]。

《黄册》所叙述的事件过程略有不同。这部史料的作者说,巴图拉丞相——浩海达裕的儿子不是在跟阿台汗率领的东蒙古人打仗时战死的,而是德勒伯克汗死的那年,即1420年,被他的亲兄弟格齐哈什哈害死的。格齐哈什哈本人在同年逝世。不久阿台汗就出兵攻打爆发内乱的卫拉特人,击败卫拉特,俘虏了巴图拉丞相的儿子巴噶穆,并给他取名妥懽。过了些时候,妥懽被俘后获释,带领自己的“四卫拉特”袭击阿台汗,并把他杀死。[3] 上面描述过的东蒙古与卫拉特二勇士的对射,按《黄册》的记载,不是发生在那个场合,而是晚得多,在岱总汗时期。

至于《蒙古源流》这部编年史的作者,则几乎是全部的,有时是逐字逐句地转述《黄册》的故事。不过,他很有趣地谈到了阿台汗和两个卫拉特少年——赛穆沁和萨勒穆沁有过亲密友谊的事实。阿台汗对这两个少年给予了极端的信任。[4] 46

总之,我们的3部蒙古史料再一次谈到有关卫拉特的论题,仅仅是由于1425—1438年的一些事件,当时在东蒙古人与卫拉特人之间发生过战斗。正如《黄金史》所叙述的,这场战斗之前有一场“骑士般的”对射。这种对射是东、西蒙古人有过紧密联系的新证据。顺便说说,结义兄弟的风尚也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指出,《黄金史》在这里第一次说出卫拉特万户的名称[5]。有关政权从卫拉特方面转落到东蒙古方面以及反过来的情况,《黄金史》的作者总是把它跟他们双方之间某次战斗的结局直接联系起来。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1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3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63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74页。

[3]《黄册——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沙斯季娜译,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62页。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27页。

[5]按贡布耶夫的原文为卫拉特、乌古列特、巴噶图特以及霍哈特;按巴乌登的文章,则仅仅是巴噶图特。

《明史》对1400—1425年间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记载，有的场合明确和补充了蒙古史料，而有的却有分歧。根据《明史》记载，1400年额勒伯克汗的长子坤帖木儿在东蒙古登汗位，1402年鬼力赤替换了他，统治到1408年，这时登位的汗是本雅失里。还在鬼力赤汗在位时，即1402—1408年间，就开始了卫拉特[1]和东蒙古人之间的武装冲突。1409年朱棣皇帝赏给3位卫拉特执政者以尊荣封号和贵重礼品，其中特别重视马哈木。不久，卫拉特又一次侵犯了东蒙古人，而在1412年杀死本雅失里，立德勒伯克为汗。在1413年，卫拉特总执政者马哈木对东蒙古人和明朝之间建立和平关系心怀不满，又开始了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可是1414年就遭到失败。1413—1414年事件后很快发生的卫拉特同东蒙古人的交战，也以卫拉特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些情况下，马哈木向北京遣使进贡，开始和平谈判。谈判拖延了下来，而马哈木也就在那时死去，1418年来到北京的使者，已经是马哈木的儿子妥懽所派。妥懽要求中国皇帝将授予他先父的那些封号赏赐给他。北京满足了妥懽的要求，直到1422年他没有扰乱过中国边界。[2]

47

在我们看来，《明史》与蒙古史料的记载最重大的分歧是在卫拉特与东蒙古人武装斗争开始的时间方面。《明史》认为，他们之间的交战开始于鬼力赤执政的年代，即15世纪头10年，而我们看到的蒙古史料则一致认为，交战开始于15世纪30年代。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蒙古史料似乎比较接近事实真相。不然很难想象，这3部蒙古编年史的出身于东蒙古贵族的作者，对他们的祖先同卫拉特之间延续将近20年的无数次交战竟会只字不提，如果这些交战的确发生过的话。应该指出，明朝当局初次接触卫拉特人并同他们熟悉也只是在额勒伯克汗死后，即不会早于15世纪头10年初期。十分可能，他们最初有关卫拉特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

[1]顺便说一下，此处《明史》中才第一次提到卫拉特。

[2]"那时的蒙古分裂成两个独立的部——马哈木为首的卫拉特部为西部；阿鲁台率领下的为东部……东西两部之间及卫拉特人之间，一个劲儿地进行着连绵不断的权利争夺，获得临时领导权的首领立刻忙于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便从元朝皇帝众多的后裔中扶植一个人。"见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37页。

我们发现，在《黄金史》中，当谈到岱总汗接替阿台汗执掌政权时，又一次提到了卫拉特。《黄金史》讲到，岱总汗和他的兄弟阿噶巴尔济济农跟卫拉特人约定在明安·哈拉图地方会战。当东蒙古人来到指定地点时，看见卫拉特人已经在等候着他们。卫拉特军队由妥懽的儿子也先台吉率领。卫拉特人向东蒙古人进攻，不过东蒙古人却愿意跟他们开始讲和。[1] 大概，讲和成功了，因为《黄金史》的作者明确肯定，卫拉特人离开了战场，并肯定以后的事件已经是他们撤离之后又展开的。[2] 紧跟着上述冲突之后，在岱总汗和他的兄弟阿噶巴尔济济农之间，闹起了一场争端。原因是济农拒绝将一个从汗那里全副武装、携马逃来的臣民归还给汗。此后，济农认为受了委屈，决定同哥哥分离而同卫拉特联合。他遣使去卫拉特通知这一决定。[3] 卫拉特王公们听了使者的话之后，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可以让济农当汗，但济农本人的职务，即副王职务，则要交给他们卫拉特人。在这个条件下，卫拉特同意跟济农联合。[4] 济农接受了卫拉特人提出的条件，离开了东蒙古，而跟卫拉特结合在一起。过了不久，卫拉特与济农的联军发动了对岱总汗的进攻，后者没有迎战而逃到克鲁伦河。济农执政的第 15 年在那里为他的岳父所杀。

48

过了一些时候，卫拉特王公们开始提醒济农，不要忘记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济农应该登汗位，而济农的职务和封号则应当传给妥懽的儿子也先台吉。[5] 阿噶巴尔济济农对卫拉特王公们的这个提示是怎样对待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黄金史》说到卫拉特人设过一次盛宴，宴会时阿噶巴尔济以及所有跟他同来赴宴的东蒙古大臣全被杀害。《黄册》和《蒙古源流》也像《黄金史》一样，讲到阿噶巴尔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63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4 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64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5 页。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65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5 页。

〔4〕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65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6 页。Oyiradun tayisi-nar noyad ügülerün ǰinong eye nigedüye gekü bolosa jinong či garan bd. öber-ün ǰinong čolaban man-dur ög;ene ügendür min-ü bolqu bolosa eye nigedkebesü nigedüye gebe.

〔5〕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68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78 页。

49 济济农跟他哥哥岱总汗的冲突，讲到前者跟岱总汗分离，跟卫拉特结合，他们合力进攻岱总汗的情况，讲到岱总汗的被杀害和阿噶巴尔济本人之死。[1] 不过，两部史料都在这场冲突中插入了二勇士对射的情节，我们前面已说到，《黄金史》认为这段情节属于更早的时期——卫拉特对阿台汗的战争时期。

在《明史》中岱总汗（1439 年上台执政）名叫脱脱不花。这部史料中，有关目前所研究的这段时间的卫拉特历史事件的资料寥寥无几。书中只记载说，1422 年卫拉特人第一次武装侵袭中国边界，将哈密地区洗劫一空。不过，此事之后，他们立即派遣特别使团到北京为哈密事件赔情道歉。过了一年，即 1423 年，他们在妥懽领导下打败了阿鲁台指挥的东蒙古人，后者在 1434 年为卫拉特人所杀。[2]

将我们现有的几种史料中有关 15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事件的资料加以对比，可以有把握地肯定，就是在这个时期，卫拉特与东蒙古人的相互关系也绝不只是武装斗争，在各次武装冲突的间隙时间里，他们也发展了各方面的，有时是极密切的联系——通婚、结义、军事和政治上的合作等。《黄金史》的作者指出，在单独决斗中打败了卫拉特人巴图鲁珪林齐的东蒙古勇士巴图鲁锡古苏特，后来却供职于卫拉特的执政者那里，[3]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至于卫拉特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发展和平贸易的倾向在这段时间里也是继续占主要地位，只不过偶然地而且是短时间内发生过类似卫拉特人侵袭哈密这类局部冲突。15世
50 纪三四十年代卫拉特武装斗争的主要路线不是在东方指向东蒙古和中国，而是在西边指向蒙兀儿斯坦。

妥懽的儿子——也先执政的年代，在 15 世纪中叶卫拉特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所有史料对他都很注意。也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卫拉特各领地首席执政者的职位之后，继续贯彻其父巩固集权的政策，力求使各地方领主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意志。《黄金史》所记载的事实证

---

[1] 例如，《黄册》第 64 - 65 页。

[2] 勃列特史奈德：《东亚史料中的中古史研究》，第 165 页。

[3] 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73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81 页。

明，也先渴望把权力扩张到卫拉特领地以外去，进而成为全蒙古的执政者。为此，他在采取纯军事性质措施的同时，还有步骤地消灭那些反对过或者可能反对他实现独揽大权计划的东蒙古贵族代表人物。譬如，根据《黄金史》的记载，他杀了巴图鲁锡古苏特，又企图杀掉哈尔固楚克台吉[1]以及哈尔固楚克的新生儿，还杀了蒙古汗蒙哥以及其他人。在叙述完蒙哥被杀以后，《黄金史》的结语说："这就是蒙古人的统治权如何转到卫拉特方面的情况。"[2]

后来，也先进而兴兵攻打中国。《黄金史》继续说："也先制服了蒙古人和卫拉特人之后，就出征乌孙朱契特的3个万户，又战胜了他们……正当也先台吉征服朱契特回家时，中国的正德帝[3]正带兵向蒙古进发，遇到了也先……也先台吉向中国军队进攻，并打了胜仗。"[4]众所周知，由于这场战役的结果，明朝的中国皇帝朱祁镇（1436—1450年在位）落入也先之手。

此后，名声显赫的两个卫拉特人——西准噶尔的阿拉克帖木儿宰桑和东准噶尔的哈冬帖木尔随即建议也先登位称汗，而把台吉称号让给他们两人。也先借口已经把台吉称号传给了儿子而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两位卫拉特大臣对此回答心怀不满，密谋串通攻打也先。也先战败，被迫逃跑。《黄金史》中说，他很快也被捕并被杀死。 51

《黄册》还十分详细地描写了从蒙古逃生的哈尔固楚克台吉的流浪情况，他定居在托克玛克的阿克蒙哥伯颜家里，最后就在那里被杀害。《黄册》的作者也详细地叙述了人们如何按也先的命令企图害死哈尔固楚克的新生儿，婴儿的母亲——也先的女儿彻辰拜济又如何拯救了孩子。她招来许多人参加这件事，其中还有卫拉特的披甲兵格特依太保。但是，《黄册》却只字未提也先的军事措施，未提他对托克玛克和朱契特的进军、同中国的战争、朱祁镇的被俘等等。《黄册》最后

[1]前面提到过的阿噶巴尔济济农的战友之一。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76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83页。

[3]应为"正统"帝，系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译者

[4]萨囊彻辰：《黄金史》，第76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83页。

以卫拉特右侧的阿拉克和庆桑进攻也先，迫使他逃跑的情节结束了也先的故事，并记载说，也先是被一个叫巴郭的东蒙古人杀死的。[1]

与《黄金史》一书相比，《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在叙述也先的故事方面没有添入任何新的东西。他丝毫不差地复述了《黄金史》中有关也先军事远征的故事。从《黄册》中萨囊彻辰则摘取了拯救哈尔固楚克台吉幼儿的历史叙述[2]。

但是，《明史》却告诉了我们许多重要而有趣的东西。这部史料对权利集中到妥懽手中，特别是集中到其子也先手中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们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汗，而只是汗——成吉思汗后裔的一个首相，但实际上却越来越把汗排挤到次要地位，使他们变成有名无实的蒙古执政者，实际执掌政权的已经是妥懽，而更大程度上是也先。

《明史》以较大篇幅叙述也先俘虏中国皇帝的那次进军。这次进
52 军的前几年，这个卫拉特执政者对北京政府的苛求日益增大。“在对待中国朝廷方面，也先的行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一向不太有礼貌，不过从前他至少还遵守某些礼节的形式。比如：只是到一定的期限他的使臣才来进贡，而且使臣人数只限于 80 人，可是现在他们却开始以大批成群的人出场了，人数竟达两千多。”[3]

这样的使团使中国明朝及其政府感到不安。使团在不同时期从蒙古四面八方来到北京，而且成群结队，赶着牲畜以求换取相应的礼品。其中，《明史》的作者们诉说到兀良哈蒙古人的情况，他们在一个时间里开始派出如此频繁而众多的使团，致使皇帝不得不专颁诏令，要求“凡遇时节庆贺，许遣头目三五人”[4]。可是，这类限制使中国的游牧邻邦，特别是其豪富而显贵的上层分子深为不满，结果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入侵的道路。

---

[1]《黄册》，第 65 - 68 页。

[2]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 139 - 145 页。

[3]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4 页。译者按：引证与原文不甚一致。原文为：“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束，往来多行杀掠。”见《明史·瓦剌传》。

[4]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2 页。

也先也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他对中国的要求随着他的势力的增大而日益增加。《明史》说："也先借口转牧各地甚需积粮，遣使向中国边防守备当局乞粮。"[1]1448 年，也先派出 3000 人的使团到北京，中国当局未予接待。为此，也先于 1449 年出师进犯中国。[2]

重要的是，如果相信《明史》的话，那么，脱脱不花（岱总汗）是反对这次进军的。按中国的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岱总汗曾向也先表示："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如此。"[3]我们认为，这些话是蒙古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一事实的自白，同中国作战，只能使蒙古封建领地的经济状况恶化。 53

1450 年，在也先的倡议下，蒙、中政府开始议和。谈判的过程在《明史》中叙述得很有意思，揭示了战争的真实内幕。中国使臣杨善对也先说："太上皇帝朝，太师遣贡使必三千人，岁必再赉，金币载途，乃背盟见攻何也？"也先回答说："奈何削我马价，予帛多剪裂，前后使人往，多不归，又减岁赐。"中国使臣杨善辩护说："非削也，太师马岁增，价难继，而不忍拒，故微损之，太师自度价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为之，事露诛矣。即太师贡马有劣弱。貂或敝，亦岂太师意耶。"[4]

我们所引的这段对话，一目了然地介绍了中国与其游牧邻邦组织贸易的情况，介绍了贸易交流在中、蒙相互关系中的决定性意义以及买卖双方间的关系。从杨善的话中可以断定，当时的中国市场已无法容 54

---

〔1〕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4 页。译者按：原文为"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粮"。

〔2〕维谢洛夫斯基把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他写道："当游牧民族对中国蓄意谋叛时，他们变得极为吹毛求疵。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看到中国政府需要他们的帮助，便把进贡的使臣人数从 80 人增加到 2000 人。这不仅对中国政府，而且对人民压力同样沉重，因为这两千人沿途抢劫。1448 年，来进贡的也先使团达 3000 人……官员们拒绝发给赡养费……也先对此大发雷霆并调兵出征。"见维谢洛夫斯基：《蒙古史讲义》，第 79 页。

〔3〕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65 页。

〔4〕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76 页。

纳从蒙古赶来中国的数量与日俱增的牲口。[1] 而由于中国在当时是蒙古独一无二的市场，这点我们已经说过，所以市场容量的不足就不能不对卫拉特社会的内部生活及其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1.2 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内外形势

也先汗执政时期是蒙古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卫拉特领地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他凭借这些领地的势力，镇压了敌人的反抗，起到了全国统一者的作用。自然，他的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他周围的封建上层分子自私的利益，他们力求扩大封建剥削的范围，攻掠近邻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并力求创造同中国和其他农业国通商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不论也先汗主观的计划和愿望如何，客观上他的活动是与蒙古发展的
55 利益相符合的，因为克服封建割据，建立一个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蒙古强国，是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也先汗在某段时间里倒是建立起了这样的统一国家，但只是昙花一现，它的寿命没有比自己的缔造者长多少，也先一死，这个国家也立刻分崩离析了。

在也先汗执政时期，蒙古的政治中心从东方移到了西方卫拉特王公们牙帐的驻地，这个时期风起云涌的事件，吸引了俄国和外国研究者的注意力。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学者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也先汗渴望重建成吉思汗型的帝国，而且他们不是在卫拉特和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的经济、政治利益的矛盾中去寻找二者斗争的原因，却是在他们二者的心理差别中找寻这个原因，把这一斗争看做是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斗

---

[1]雅金夫写道："中国为求得其北疆的安定，历来向蒙古人交付着报酬。不过，这种保证和平的报酬不是以贡品的形式交付，而是在不降低帝国尊严的其他名义下交付的。当时，中蒙保持和平的基础是市马，即中国朝廷必须按照和约规定的价格，每年接收蒙古人一定数量的马匹。蒙古的这种臣属方式积结着中国方面的巨额亏损和极大不便。蒙古人赶来的是虚弱劣马，而且数量比合同协议的更大，尽管如此，还粗齿无理地要求按原价偿付……中国政府从自己方面压低了马价……由此双方孕育着的不满情绪年复一年地增长，最后终于达到了只有动武才能使之终了的程度。"见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8－19页。雅金夫看到了蒙、中贸易及蒙、中战争间的外在联系，但是未能洞察这些现象的本质。

争，排除任何合作、妥协与和解的可能。[1] 在我们看来，前面引过的一些资料和史料记载已经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些论点。

大部分俄国和外国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随着也先的死去，卫拉特在蒙古称霸的时期也就结束了，卫拉特本身也不再有其历史的生涯，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例如，比丘林写道，随着这位卫拉特活动家的逝世，卫拉特的威力也随之消亡，结束了"准噶尔卫拉特国家虽然短暂，却光辉灿烂的第一个时期。随着也先的死去，卫拉特就再也保持不住自己对蒙古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放弃参加整个民族的共同事务，而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原有领地的范围内。由于这个原因，从也先到哈喇忽喇这150年期间，卫拉特内部的事情很少为人所知"[2]。按比丘林的意见，这150年的时间，"卫拉特人是在声威远震之后，休养生息中度过的。因此，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在他们的历史中除了某些汗和各部领主的名字以外几乎没有保存任何东西，甚至连他们在位年限也没指明"[3]。 56

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学家格里戈里耶夫断言，在也先的辉煌时期之后，卫拉特人[4]在150年内，即直到16世纪末为止，没有参与其余蒙古地区的事务。[5]

乌斯宾斯基也像比丘林一样，把15世纪前半期称作是卫拉特历史上的英雄时期，它随着也先的逝世而告终。此后，全蒙古整个生活的中心就转到了南部察哈尔地区，蒙古汗的牙帐也迁移到了那里。[6]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概括也先死后时期东蒙古和卫拉特的历史时写道："汗位的这种不巩固情况，伴随着地方分权的过程，引起各部领主权力的加大和蒙古部落的分裂。甚至卫拉特也未能避免这种分

---

[1]波兹德涅耶夫写道："在整个明朝时期，准噶尔人简直没有一年不是在跟蒙古人的斗争中度过的。"见波兹德涅耶夫：《答维谢洛夫斯基》，第284页。

[2]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1－22页。

[3]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23页。

[4]他称之为卡尔梅克人。

[5]格里戈里耶夫：《巴图浑台吉》，载《百科辞典》，圣彼得堡，1836年版，第5卷，第76页。

[6]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53页。

裂:一部分卫拉特人以也先的儿子火儿忽答为首领,迁居干赶河,而另一部分则游牧于哈密一带。"[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另一处指出:"随着也先去世,卫拉特的政治威力也就暂时中止了。东蒙古人又重新登上舞台,他们挣脱了妥懽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2]

研究卡尔梅克历史和民族志学的学者波波夫的意见也与此类似。他写道:"准噶尔人还在15世纪中期绰罗斯家族衰落之后,就跟东蒙古人分离,而开始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部生活,不管东蒙古同族人了。
57 准噶尔人当时没有参加中国和喀尔喀之间的任何战争,他们需要的是剧烈震荡之后的休整。这些震荡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来,而最后,随着也先去世(1453年)[3]使他们的威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这个延续了150年左右的间歇时间里,准噶尔人躲开了战争的纷扰,开始跟隶属于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人进行贸易来往。"[4]

波兹德涅耶夫也写道:"15世纪中叶,在卫拉特人中出现精明能干、积极进取的也先以前,他们处于成吉思汗系的控制之下,是微不足道的。……随着也先的去世,卫拉特生活中这一短暂而辉煌的时期也随之告终:卫拉特重新分裂成许多单独的部,又变得无所作为、无关紧要。这样过了150年,直到17世纪初他们中出现新首领为止。"[5]

霍沃思跟俄国旧学派的东方学学者一样,也断言也先之死,结束了西蒙古历史上的英雄时期。[6]

可见,旧的俄国和外国文献对15世纪后半期到16世纪前半期这段卫拉特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共同看法的态度非常明确,即过分夸大也先汗的个人作用,认为似乎是他一个人创造了那个时期的卫拉特历史。同时也过分夸大了卫拉特人与东蒙古人之间武装斗争的作用和意

---

[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中国西部游记》,第2卷,第79页。干赶河,按乌斯宾斯基的意见是克穆河,而按波科季洛夫的意见则是鄂尔浑河。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88页。

[3]按《明史》记载,也先被杀是在景泰六年,即1455年。——译者

[4]波波夫:《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简评》,第42页。

[5]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第142页。

[6]霍沃思:《蒙古史》,第1部,第609页。

义，把这个斗争描绘成似乎是以建立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为主旨的不可调和的连续斗争，把卫拉特历史上的也先时期和也先以后的时期没有根据地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第一个时期具有英雄时代的特征，而第二个时期的特征则是在历史上空洞无物，是第一个时期的急剧事变之后“休养生息”的时期。他们对事实作了肤浅的分析和概括，没有揭开真正的因果关系。

那么，也先汗国崩溃之后，卫拉特封建领地的历史实际上是怎样发展的呢？ 58

《黄金史》说，也先死后岱总汗 7 岁的儿子摩伦嗣汗位，他又被满都古勒[1]接替。满都古勒死于猪年(1467)，于是汗位传给了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他的母亲是满都古勒的妻子之一，是卫拉特拜盖尔赛台什的女儿。但是这个汗很快也死了，于是赫赫有名的满都海赛音哈屯[2]当了蒙古的摄政女王。她从反对卫拉特的斗争开始，毅然着手重新统一蒙古的领土。在这场反卫拉特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7 岁的巴图蒙克就被拥立为汗，历史上称作达延汗。达延汗在其执政的年代里，完成了满都海赛音哈屯开创的统一全蒙古的事业，从而成了全蒙古的首领。他不仅使东蒙古王公，而且也使卫拉特王公们臣服于自己。达延汗执政的整个时期里，卫拉特王公们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力。《黄金史》的作者在谈到达延汗出征土默特时记载说，汗的部队里有威望的军事首领中，有一个卫拉特统帅谢古思，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为面临的战役选择了战场，并且说服汗确信这一战场的有利地形。[3] 战役以达延汗的大胜而告终，达延汗慷慨地奖赏参加征战的人员，其中也包括谢古思，颁布了豁免谢古思及其后裔纳税和服役的命

[1]《明史》作“满都鲁”。——译者

[2]“哈屯”又译为“可敦”，突厥语“夫人”之意。——译者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04 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 102 页；dayan qaran eyimü či medem-ja qeju qarač reg-ün arlarč i oyirad-un següse eče asarbai. Següsen kelebei. Eyimü nom-un tülkigür-tü buqa sayin sečikül bile gejü.

令。[1]

《黄金史》中所记载的有关卫拉特历史上也先死后时期的资料就是这些，它对这段历史仔细研究到16世纪后半叶初期。对于以后卫拉特历史上的事件，《黄金史》默无所述。这部编年史只是含混不清地说到土默特的俺答汗征服过卫拉特人，既未指明时间，也未提到地点，更未涉及这一事件的其他情况。

59

《黄册》对事件的叙述略有不同。根据这部文献中的资料，也先死后，岱总汗的儿子蒙尔古斯[2]被他母亲萨睦尔太后立为蒙古汗，称作乌珂克图汗。他即位以前，曾出征卫拉特，这次出征是他那位好战的母亲所组织的，使卫拉特遭到惨败。远征归来之后，萨睦尔太后就让自己年幼的儿子登位称汗。但是，蒙尔古斯称汗为时不久，过了一年就被杀害，由摩伦汗继位。过了两年，他也被杀。继摩伦汗登位的是他的舅舅满都古勒。满都古勒的母亲是卫拉特的亲王夫人、东蒙古阿寨台吉的妻子。满都古勒的副王就是他侄儿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前面说过，博勒呼还在幼年时，也先汗就打算杀死他。由于4位大臣的帮助，把孩子送到东蒙古满都古勒那里，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才幸免于死。满都古勒慷慨嘉奖了孩子的救命恩人，其中包括卫拉特的格特依太保，赏赐给他们最高的特权。

巴图蒙克就是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的儿子，他生于木年，即猴年(1464)。巴图蒙克刚满7岁时，满都海赛音哈屯就当了他的妻子。到虎年(1470)，她扶植丈夫登上汗位，随后便远征卫拉特，使卫拉特臣服于巴图蒙克达延汗的政权，同时强定了许多法规和条令，其中一再强调卫拉特从属于全蒙古汗的不平等地位。[3] 达延汗死于兔年(1543)，他连续控制这一地区达74年。他的妻子中还有一个女亲王古实哈屯，是卫拉特大臣凯里呼济盖尔的女儿。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105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103页；oyiradun siguse arlarcī ene qoyarnu üre doluyan üye boltala alba üqei bolturai qejü darqalaba.

[2]应为蒙古勒哷青吉斯。——译者

[3]《黄册》，第72页。

我们看到,《黄册》的作者没有印证《黄金史》中关于卫拉特统率谢古思的业绩的记载,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提及。但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达延汗登位前的一些事件。至于《蒙古源流》,它的作者复述了《黄册》所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东西,对15世纪后半叶卫拉特历史的叙述,没有增添任何独到的新内容。 60

蒙古史料中,对也先死后时期卫拉特情况的记载就是这些。尽管史料寥寥无几,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卫拉特与东蒙古封建主的相互关系,在上述时期与15世纪头几十年没有什么本质的和原则的区别。在也先死后近整整100年的时间里也跟他在位前一样,东、西蒙古之间的联系密切而多种多样。也同以往一样,武装冲突与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友谊、合作以及通婚等等关系是互相交替的。顺便说说,最后一个被公认的全蒙古大汗——达延汗,就是也先这个卫拉特汗的曾孙。某些研究者认为15世纪后半叶,东、西蒙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像前半叶一样,只不过是相互间的深仇大恨之类而已[1],而我们所研究过的蒙古史料中却没有什么记载足以证实他们的这种观点。

明朝的编年史使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想象也先死后在蒙古所形成的总形势。《明史》指出,从15世纪60年代起,蒙古出现了封建领地的执政者互不依赖、各自为政的局面。[2] 从这一记载中不能不看到这一地区发生过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首先不能不看到地方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加强,这些领主变成了自己土地的唯一的世袭所有主。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对大汗中央集权的意图竭力反抗,封建割据日益加深。原来只有一个由全蒙古大汗来执行的统一的内外政策,这时却出现了许多蒙古政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些政策的倡导人和执行人就是地方领主。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正是《明史》所说的互不隶属的蒙古地方执政者各自为政的新现象。 61

---

[1]"这两个族之间又燃起了炽烈的仇恨之火,其实这种仇恨就没有终止过,而只是由于也先的辉煌战绩暂时沉寂了一阵。而卫拉特首领对中国后来软弱无能的政策所引起的自然后果,就是东蒙古人的不满,他们又跃跃欲试地燃起了摆脱其西部邻居的可憎桎梏的渴望。"见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80-81页。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69页。

不过，所有蒙古王公对中国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共同问题，仍然是通商条件和整个市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像过去一样，遇到了中国市场容量有限的困难，市场的销路不能容纳蒙古人供应的与日俱增的大量牲口和畜产品。波科季洛夫在评述《明史》的相应记载时写道，还在更早，即15世纪初，就在军屯区一带开市，当地蒙古人可以赶着马群来赴市，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必需的用品，例如："粮食、衣服和各种器具。这种通市不是自愿的，对中国人来说带有屈辱的性质，因为中国人必须按预定的某种价格收购马匹，而价格定得很高，比实际马价要贵二三倍……中华帝国的执政者每次开设这种市场都是出于被迫的，因为蒙古人把开市作为必需的媾和条件"。在这方面，波科季洛夫还记载了1429年颁布的朱瞻基皇帝的圣旨，其中直说："在东蒙古开市，纯为慈善，为使游牧民族不致在日用必需品方面感到缺乏"[1]。

据《明史》记载，也先死后，蒙古派出了大臣孛来与中国政府议和，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王公有权定期派遣一定人数的代表团，依循有利于
62 蒙古人的某一路线去北京。[2] 至于卫拉特，按照《明史》的说法，它在也先死后的某段时间内继续独立地与中国保持联系，派去代表团和商队。"可是，随着孛来势力的增强，东蒙古像一堵城墙切断了卫拉特与中国的联系，于是卫拉特与东蒙古之间便接二连三地发生冲突。"[3]

很可能，《明史》作者所指的这些冲突，就是发生在也先死后到达延汗的统治得到巩固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冲突，蒙古史料中也提到了。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些年代，蒙古政治生活的中心开始从土拉河、鄂尔浑河以及克鲁伦河一带移向南部的察哈尔地区，蒙古大汗的牙帐也迁到了那里。与此同时，东蒙古人开始向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的

---

[1]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108－109页。

[2]波科季洛夫不了解蒙古要求开市的客观经济意义，所以他对中国同意孛来提出的条件，作了这样的评论："孛来取得了这一决议的优惠权，决议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无疑由成群结队的侍从人员陪送的蒙古使臣，这样一来便有权根据合法的理由通过大片中国领土。这就使他们有可能为所欲为地在中国的、大概是整个北部边境进行掠夺。"见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88页。

[3]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91页。

草原地区渗透，以后这一带成了他们常住的地方。[1] 结果，西蒙古人跟中国市场的通路就完全被切断了。这点不能不引起西蒙古方面进行突破包围的尝试，以保证自由通往东方。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卫拉特人遭到了失败。在整整150年到200年期间内，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完全中断。这就是中国明朝时期的史料对卫拉特的历史只考察到15世纪70年代的原因。有关16世纪和1600—1675年的历史事件，我们在明朝的史料中，以及在清朝初期的史料中，都没有发现任何记载。

首先，我们看到，蒙古的编年史编纂家们中断了有关卫拉特的叙述，而后，中国编者们也沉默不语了。我们手头便只剩下了突厥文的史料。对于15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前半叶这100年历史来说，这些史料是独一无二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卫拉特历史的脱节现象。脱节的原因在于，对卫拉特历史事件的记载，旧的中、蒙史料中断，而蒙古、中国、卫拉特、卡尔梅克、俄国等新史料还没有出现。我们在后面将谈到，突厥文史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比丘林以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断言，在也先死后的时期里卫拉特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再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卫拉特对外政策的积极性只是在方向上有所改变。由于跟中国隔绝，在争夺东方通道中遭到失败，卫拉特成了活跃在西部和北部、东土尔其斯坦、希布察克草原和中亚草原的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对这一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63

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都与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过程有关，这两个民族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国家，为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过程同反对察哈台系王朝的斗争联系着，因为它当时还控制着玛维兰纳赫尔[2]和蒙兀儿斯坦，而在那些地区，从事古老农业耕耘的绿洲和草原的游牧经济并存。上述历史过程的外在表

[1]根据施拉姆引自西宁地方志的资料看，蒙古人是在1457年第一次占领鄂尔多斯的。此后不久他们又占领了库库淖尔。参看施拉姆：《甘肃与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费拉德菲亚，1954年版。

[2]玛维兰纳赫尔是阿拉伯语，指中世纪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中文史料则称这一地区为“河中”。——译者

现则是执政者和王室统治集团的频繁更迭，以及为争夺控制贸易通道和争占重要经济、文化中心等而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15 世纪中期，希布察克草原的宫廷斗争加剧。败者逃奔东北蒙兀儿斯坦边境，那儿的执政者支持了他们，并让他们占用楚河塔拉斯河一带的谷地。15 世纪 60 年代，历史上第一个哈萨克封建国家就是在这一带奠定基础的。因为逐渐形成的乌兹别克国家的巩固对蒙兀儿斯坦诸汗没有利害关系，他们便对哈萨克贵族给予了一些援助。在 15、16 世纪之交，乌兹别克封建主们占有了中亚的定居地区，后来在这里形成了各乌兹别克封建汗国，并日益发展。乌兹别克与哈萨克的斗争在整个 15 世纪后半叶和 16 世纪，一直延续不断。在这场斗争中，作用重大的因素是双方竭力攫取和企图占有锡尔河沿岸的城市瑟格纳克、赛拉姆、土尔克斯坦等，因为这些城市是中亚游牧民族与定居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进行易货贸易的中心。哈萨克贵族迫切需要保障剩余畜牧产品畅通无阻地交换农产品和城市手工业产品，这就激发了他们侵占这些城市的欲望。可是，他们的努力遇到了乌兹别克封建主们的对抗，后者不愿让哈萨克人进入上述城市的市场。[1]

64

哈萨克封建主们为了反击乌兹别克的阿布尔海尔汗，而后反击昔班尼和昔班尼的后裔，必须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这点也说明一个事实：他们当时和其他近邻保持了和平睦邻关系，与卫拉特的关系也是如此，整整 100 年中，双方的关系没有被武装冲突的阴影所笼罩。

不过，我们说在 15 世纪后半叶和 16 世纪前三十几年内保持着睦邻关系，这一方面是指哈萨克封建主与蒙兀儿斯坦，另一方面是指哈萨克封建主与卫拉特，而对于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的相互关系却不能这么说。蒙兀儿斯坦在 15 世纪中期，分裂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东部和以

---

[1]有关乌兹别克昔班尼汗和哈萨克执政者间的相互贸易关系，编年史作家鲁兹别罕（Рузбехан）写道："希布察克草原诸汗得知，太阳汗陛下的政权得到了稳定，而蒙古人和察哈台系的政权和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之后，便开始嫉妒起来。实际上他们很清楚，由于极端缺乏以棉织物为基础的各种衣着……他们应该入侵这位汗陛下的领地，因为圣旨规定土尔克斯坦的居民不准与哈萨克商人进行任何交易，而且规定他们之间不准交往，也不准商人到他们土地上的居民中去。"引自《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阿拉木图，1957 年版，第 144 - 145 页。

喀什噶尔为中心的西部两个部分。两部分实际上已彼此独立，经常敌对，只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逐渐形成的乌兹别克国才联合一阵。 65
在这种情况下，卫拉特成了蒙兀儿斯坦内部争斗的集团常来求援的一支力量，这有助于卫拉特封建主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外乎是靠损害邻邦而占有贸易通道和攫取战利品。

若干史料一致指出，在15世纪中期，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东蒙兀儿斯坦开始强大，吐鲁番执政者与卫拉特王公之间展开了伴随着频繁战争的长期斗争。1452年，也先还在世时，卫拉特就兴兵大规模远征蒙兀儿斯坦。在这次结束于1455年也先死后的远征中，卫拉特军队踏遍蒙兀儿斯坦国土，并侵入谢米列契地区，从那儿折向南方。当他们在锡尔河谷地行进时，到达玛维兰纳赫尔边境，洗劫了塔什干绿洲和另一些绿洲，然后返回。这时期东蒙兀儿斯坦的执政者是爱辛·布哈（1446—1461年），他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歪思汗的儿子。有些史料提到1459年曾有卫拉特代表团去赫拉特拜见阿布·赛伊德苏丹。[1] 这一记载值得注意。

卫拉特和蒙兀儿斯坦争夺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哈密州，蒙兀儿斯坦、卫拉特封建主和中国3股势力都力争占有这块地方。哈密位于连接中国和西方各国的主要贸易的通道上，扼守着进出中国的门户。哈密的特殊作用曾经是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多次进行战争的根源，因为牢固占有这一地区对中国有着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哈密州一向为东土耳其斯坦的游牧民族和定居居民所注意。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哈密的执政者是元朝皇帝的嫡裔。到了15世纪20年代，如上所述，哈密州被卫拉特人所占。随后，卫拉特人又为吐鲁番人 66
所取代。15世纪中期，中国曾出师讨伐吐鲁番。3方面争夺哈密的斗争持续了很久，互有胜负地延续了整个15世纪。[2]

1470年，蒙兀儿斯坦汗的部众又一次占领哈密，并袭击卫拉特牧

[1]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74页。

[2]乌斯宾斯基：《简说哈密州》（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б округе Хами），第2、3、14页及结论。

区，俘虏卫拉特人近万名。为了报复，卫拉特于1472年入侵蒙兀儿斯坦，在伊犁河畔击溃了尤努思汗（1466—1496年）的军队，渡河并追击敌方到锡尔河彼岸。[1]

尤努思的儿子阿黑麻汗（1496—1504年）继续进行反卫拉特的斗争，由于跟卫拉特人多次交战和接触，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阿拉吉汗"[2]。阿黑麻的继承人满速儿汗（1504—1544年）也努力继续进行成为惯例的争夺哈密和反对卫拉特的斗争。1513年，他再次侵占哈密州。但是过了5年，卫拉特发动了反对满速儿汗的战争。战争以讲和告终，和解的结果是共同进攻中国的肃州城[3]。不过这场和平为时不久。到16世纪30年代，蒙兀儿斯坦的军队大败卫拉特人，迫使其中许多卫拉特人离开故乡牧地，向南方库库淖尔草原地带逃窜。在这以前，东蒙古的亦不剌台吉和他的盟友已经在这里定居，他们是1509年谋叛达延汗未遂之后逃来库库淖尔的。

将近16世纪中期，蒙兀儿斯坦日趋衰落。反对它的新势力——乌兹别克人崛起，他们开始收复中亚的绿洲和城市，使之摆脱蒙兀儿斯坦和帖木儿系的全权代理人和驻防军的控制，并且着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国家。在蒙兀儿斯坦内部，矛盾开始加剧，内乱频繁爆发，相互争斗的集团还邀请卫拉特王公参加这种内讧。突厥文的编年史中充满着对这类情况的记述。例如，大家知道的，蒙兀儿斯坦可汗满速儿的儿子和
67 继承人沙赫汗（1545—1570年）就死在与卫拉特人的一次战斗中。[4]

卫拉特封建主们对于蒙兀儿斯坦敌对封建集团双方的请援要求，通常都予以满足，因为这使他们有可能依靠蒙兀儿斯坦贵族的财富，而主要是靠这个四分五裂的汗国的人民群众，不费很大气力就能发财致富。[5]

《拉失德史》中关于吐鲁番执政者阿勃特·阿尔·拉希姆反抗喀

---

〔1〕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史略》，第75页。

〔2〕"阿拉呼"——"杀人"，"阿拉吉"——"杀人者"。这里的含义是"卫拉特人的歼灭者"。

〔3〕即今甘肃酒泉。——译者

〔4〕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240页。

〔5〕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244－248页。

什噶尔汗穆罕默德的记述很值得注意。一个卫拉特王公被邀来镇压这次起义,他率领部众逼近吐鲁番城下,洗劫了吐鲁番四郊,然后就跟阿勃特·阿尔·拉希姆缔结了协定,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婚后生了个儿子叫阿勃达拉赫,他后来就当了喀什噶尔的执政者(1570—1598年)[1]。

我们已经指出过,哈萨克和卫拉特的相互关系,在几乎整整100年间是和睦而友善的。[2] 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是在16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卫拉特和哈萨克封建主之间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斗争。哪些情况决定了和平关系转化为武装斗争呢?什么是卫拉特与哈萨克敌对的基础呢?我们对这些问题还不太清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史料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只能揣测,可能是双方都力求靠牺牲邻邦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牧地,也可能是卫拉特封建主力求攫取锡尔河沿岸的城市和通向这些城市的通路等等情况起了重大的,并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著名的英国商人和旅行家捷金松的经历,对这一揣想很有帮助。他在1557年想要通过中亚去中国,但是由于哈萨克和卫拉特之间的战争而未能去成。据这位旅行家说,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占有塔什干而引起的纠纷。[3] 我们只知道,在16世纪的中期和后半叶,哈萨克汗在反对卫拉特王公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那时卫拉特王公则由于屡败于蒙兀儿斯坦汗以及内部纷争而受到削弱。伊凡四世在16世纪70年代派往诺盖兀鲁思的俄国大使丹尼拉·古宾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据所获资料得悉哈萨克势力强大,而且已经将卫拉特置于其管辖之下。[4]

68

---

[1]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239页。

[2]"应当指出,从伊沙·布吉汗到拉失德汗时期,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一直彼此过着和平生活。"见维里亚米诺夫·泽尔诺夫(В. В. Вельяминоз-Зерноз):《关于卡西莫王和王子的研究》(Исслебование о касимозских чарях и оаревигах),第2部,圣彼得堡,1864年版,第140页。

[3]《安索奈·捷金松和其他英国人旅游俄国和波斯》(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to Russia and Persia by Anthony Jənkinson and Other Englischmen),伦敦,1886年版,第90-91页。

[4]丹尼拉·古宾记载说:"鞑靼贵族希赫麻马伊从尤尔干王子那里得到消息,听说哈萨克人要全力以赴地跟诺盖人打仗。又听说哈萨克人很强大,卡尔梅克人投降了他们……希赫麻马伊、伊苏泼和另一些与他们一起游牧的鞑靼贵族在雅依克河附近也姆河上守卫了一冬,以防哈萨克玉兹的侵犯。"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国同诺盖鞑靼人的关系》,第1册,第62-63页;也可参看维尔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关于卡西莫王和王子的研究》,第2卷,第326页。

《拉失德史》的作者曾经写过："应该把870年(1465/6)看做是哈萨克苏丹政权本身开始的时期，不过，还是上帝更了解。"[1]可能作者在这里与上述情况一样，都是指哈萨克对卫拉特的胜利。

至于16世纪中期和后半叶卫拉特与东蒙古诸汗和王公的相互关系，只能根据中国西北各省汉文地方志中的少量资料来判断。乌斯宾斯基、勃列特史奈德和施拉姆都曾利用过这些地方志。在16世纪后半叶，东蒙古的居民加紧向南部和西部迁徙，主要是迁往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据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引证中国史料时说，其原因是"为了找水和找好牧场"[2]。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默特的俺答汗，他曾
69 屡犯中国边境，并大肆洗劫，直到其领地同明帝国之间达成合法贸易和开市时为止。[3] 俺答汗指派自己的儿子充当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的执政者。[4]

就在这个时期，卫拉特人被蒙兀儿斯坦和哈萨克的对手排挤出自己的牧地，也开始深入库库淖尔。卫拉特执政者频频攻掠肃州和甘州[5]地区，威胁到库库淖尔和鄂尔多斯的东蒙古汗和王公的地位，这就引起了东、西蒙古人之间新的武装冲突。他们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552年，当时俺答汗率众出击卫拉特。中国史料和《蒙古源流》的作者对这次冲突的结局说法不一。前者断言，卫拉特战胜了俺答汗，并迫使他从甘肃退却到库库淖尔湖[6]，而后者却说，俺答击败了卫拉特人，俘获了辉特执政者玛尼·明阿图的兀鲁思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迫

---

〔1〕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39页。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591页。

〔3〕这样的市场开了两个。参看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0页；也可参看瑟利斯：《1570—1571年中蒙关系的4个文件》，引自《瑟利斯著作集》，1960年版，第2、4、12页。

〔4〕说说下面这点很有意思：当俺答汗的一个儿子破坏与中国所订的和约而攻掠了四川时，中国当局要求俺答对违约者给予适当的劝导。俺答回答说："宾兔这么做实属无可奈何，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因为在甘肃附近没有为他开辟贸易市场。去宁夏则太远，而且也不方便。"中国人不得不同意，在朱翊钧(1574年)执政的第2年，允许在甘肃为宾兔开市。见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2页。

〔5〕甘州即甘肃张掖。——译者

〔6〕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3页。

使该卫拉特集团的残余部众逃往斋桑泊和巴尔喀什湖。[1] 很难说两种说法到底哪种正确。但是,考虑到当时蒙古的总形势和1552年战役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应该承认《蒙古源流》的说法可能性更大些。《黄金史》的作者含糊提到过的几句话,也对这一揣想有所帮助。这位作者说俺答汗征服过卫拉特,说他这样一来大概就为额勒伯克汗、阿台汗和岱总汗报了仇。可是俺答汗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征服卫拉特的,《黄金史》的作者却只字未提。[2]

1562年,鄂尔多斯执政者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率兵反对卫拉特, 70
在额尔齐斯河摧毁了土尔扈特牧区。[3] 10年后,即1572年,也是这位洪台吉得悉他叔伯兄弟巴延巴图尔洪台吉出兵攻打卫拉特,便与之联合起来,共同击溃并且征服了辉特、巴图特和绰罗斯。[4]

16世纪中期和后半叶初期是卫拉特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

1.3 15—16世纪卫拉特社会制度的若干问题

《黄金史》、《黄册》和《蒙古源流》以及中国王朝编年史《明史》所提供的资料都使我们有根据断定,如前所述,14世纪末到15世纪前半叶,卫拉特不仅在民族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蒙古民族的西部分支、统一的卫拉特封建领地的基本居民。在这一时期,卫拉特人同所有蒙古人一样,分成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它恰当地把组成蒙古封建社会的军事行政体制和社会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每个万户和千户既是一定的军事单位,又是典型的封建领地。指挥一个军事单位的人,同时也就是封建统治者。直接生产者经济上从属于

---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3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111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106页。tegün-ü qoyina elbeg qaran, adai qaran, tayisung qaran-i ös-i köqečü arabarčin ǰinong-yi arabr qoruruba qeǰu, erten-ü tede bügü-de ös-ten-i duradju, kitad oyirad koyar-i dayilan yabuba qelü... oyirad dobtaiǰu...

[3]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4页。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4页。

他，为了他的利益而承担着一系列苛捐杂税、封建徭役，并且像士兵对统帅那样服从于他，而统帅又听命于最高统帅（通常是最高执政者——大汗），他们的关系就像藩臣跟宗主的关系一样，卫拉特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阶段早已成为过去了。

71 15世纪后半叶，卫拉特创立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万户和千户的位置被一些特殊的卫拉特集团所代替，史籍中称这些集团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土尔扈特以及诸如此类的“部”、“族”或“部落”。这些崭新的组织形式在卫拉特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而把旧有的万户和千户排挤到次要地位。

可是，这些组织形式究竟是些什么呢？关于它们的社会经济性质又能说些什么呢？像大部分俄国的和外国的研究者那样，认为它们属于部落型或氏族型的联合体是否恰当呢？

这是首先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所有蒙古史料，从《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史集》开始，都始终把卫拉特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来讲述。《元朝秘史》也像拉施特一样，既没有一次提到和硕特、辉特，也没有一次提到卫拉特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如果不把万户算作一种划分的话。他们完全按照“准噶尔”这个词的含义，不是用它来指某种固定的民族集团，而是指任何一个处于左侧的蒙古人的联合体。这种“准噶尔”在《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史书中出现得相当多。至于杜尔伯特，我们在《元朝秘史》里遇到过一个独立的族或部落——斡孛黑叫“杜尔伯特”[1]。它的始祖是神奇的都蛙锁豁儿的4个儿子。很难说这个“杜尔伯特”和15世纪后半叶在西蒙古卫拉特人中出现的同名杜尔伯特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继承性的联系。我们所了解的蒙古史料和卡尔梅克史料中，都没有足以证实这种继承性的资料。有些史料使我们有理由揣想，13世纪的杜尔伯特和后元时代的杜尔伯特之间可能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例如，加班沙拉勃说，杜尔伯特和绰罗斯具有共同的祖

[1]亦有译作“朵儿边”的。——译者

先。[1] 另一位编纂家——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意见也是这样。[2] 从 72
这些作者所引用的世谱表中可以得出结论:杜尔伯特只是在也先的儿子博罗纳哈勒时期,才从绰罗斯家族分离出去的,即不会早于15世纪后半叶初期。必须指出,中国史料也认为杜尔伯特人和准噶尔人(即绰罗斯人)是绰罗斯系(按另一种说法为斡孛黑)出身的人。[3] 想断定土尔扈特是否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兄弟或他的另一些伙伴的尝试,也同样是缺乏证据的。蒙古史料第一次提到土尔扈特是在1567年。加班沙拉勃这位出身于土尔扈特贵族的编年史作家态度比较认真,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谈了谈自己祖先的起源,这绝不是偶然的。可是这个问题还不能算完全弄清楚了。

不过,如果说在15世纪中期以前,组成卫拉特社会最普遍的原则是把它分成万户和千户,那么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万户和千户再不能被分为更小的单位。关于这种较小社会单位,《黄册》中很明确地谈到过,其中两次提到卫拉特活动家浩海达裕属于绰罗斯族的事实,这点前面已经说过。《黄册》的作者写道:"额勒伯克汗吩咐卫拉特绰罗斯族的浩海达裕杀死汗的弟弟。"[4] 我们这位编年史作家在另一处又指明:"浩海达裕出身于绰罗斯斡孛黑。"[5]

因此,可以完全肯定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在某一个卫拉特万户中,有个名叫绰罗斯的独特的斡孛黑,这个斡孛黑的人中出现了一批名声煊赫的卫拉特活动家,包括浩海达裕、妥懽、也先到哈喇忽喇、巴图尔浑台吉以及他的继承人等等。[6]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8、9页。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于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60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3]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27页。

[4]《黄册》,第96页。

[5]《黄册》,第100页。

[6]这样就揭示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错误,他没有充分的根据地把元以后的杜尔伯特和《元朝秘史》中的"社尔伯特"混为一谈,并且认为,这里所提到的历史活动家都是杜尔伯特家族出身的人。

73 但是，绰罗斯斡孛黑的存在使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卫拉特还有过类似于绰罗斯这样的其他斡孛黑。实际上，《黄册》的作者也谈到过，在他那个时期，即17世纪初，卫拉特分作6个斡孛黑。他说，达赖台什领导杜尔伯特斡孛黑，拜巴噶斯任乌济叶特斡孛黑的副王，呼海图占有绰罗斯斡孛黑，朱丞相管理巴噶图特斡孛黑，而希墨尔根台门奈则管理客列亦惕斡孛黑。[1] 这样，这些史料就证实了，将近17世纪初，斡孛黑完全排挤了蒙古传统的万户、千户和百户。

斡孛黑是什么？它的社会经济意义怎样？它在15—17世纪以及更晚一些时候，在卫拉特社会制度方面起过什么作用呢？

蒙古史料使我们确信，最初这个词意味着氏族、氏族公社、血缘亲属的公社，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人集体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牧场，并受一个德高望重的宗亲的领导。《元朝秘史》在讲述12—13世纪蒙古人的历史时，在谈到创立当时存在的氏族公社的始祖时，常常使用"斡孛黑"[2]这个词。[3] 关于这点，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蒙古的氏族——斡孛黑是相当典型的血缘亲属的结合体，它以父权原则和同族禁婚为基础。这种父系制的结合体多少带有以往血缘亲属关系的残余特征，经营个体经济，但有公共的牧地……这种结合体还为复仇制和特殊的祭祀制所联系。"[4]不过。这是蒙古古代的斡孛黑氏族。到成吉思汗时代，这类氏族公社在颇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传统的特征而逐渐瓦解，让位于另一些更复杂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为13世纪初蒙
74 古早期封建国家形成作了准备。蒙古史料，主要是《元朝秘史》中所记载的大量资料使弗拉基米尔佐夫能得出下述结论："12—13世纪时，被称作斡孛黑氏族的是一个复合的统一体。斡孛黑起先是由血缘亲属——领主们组成，后来有了牧奴制的封臣——'兀纳罕孛斡儿'，随

---

[1]《黄册》，第122页。

[2]原书对这类专有名词有时用斜体字标出，我们均用引号代替。——译者

[3]柯津：《元朝秘史——1240年的蒙古编年史》（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240 г.），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80、82－84、111、112、115、116、140、141、144、189页和结论。

[4]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58页。

后又产生了‘平民’奴仆——‘兀帖里·孛斡儿’和‘扎剌兀’。可见，氏族是由若干社会集团组成的。甚至可以说有两个阶级：领主兀鲁哈和显贵豪富的‘兀纳罕·孛斡儿’属于上等阶级，低级的牧奴和奴仆则属于下等阶级。一些人是‘诺颜’——‘老爷’；另一些人则是‘哈喇抽’——‘黑骨’，是‘孛斡儿抽惕’——‘奴隶’。”[1]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查明弗拉基米尔佐尔所描绘的斡孛黑内部生活的情景与12—13世纪的现实状况符合到什么程度。由于弗拉基米尔佐夫夸大了12—13世纪蒙古封建关系成熟的程度，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受到多次批评。可能这种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看来，弗拉基米尔佐夫所指的斡孛黑内部生活的某些特征，不应该像他那样归到12—13世纪，而应归到13—14世纪，或者甚至归到14—15世纪。不过，丝毫不能因此而怀疑弗拉基米尔佐夫对蒙古人的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出的总评述的正确性。

我们尤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编写《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编年史时，蒙古的斡孛黑已经很少近似于它古代的形象了，到了这时，它已经丧失了许多最初的特征。弗拉基米尔佐夫举出了大量足资证实这点的根据。《元朝秘史》的作者很随便地使用斡孛黑这个词来指称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现象，我们认为这倒是说明斡孛黑内部发生过重大变化的补充佐证。例如，这位作者常常把同样的种族集团一会儿叫斡孛黑，一会儿叫爱马克，有时叫亦儿坚和斡孛黑。[2] 曾经服役于成吉思汗的花拉子模著名商人摩诃末所属的牙喇哇赤家族也被用蒙古词斡孛黑来表示。[3] 只有在缺乏决定这个词内涵的固定标准和特征的情况下，才可能这样随意地使用它。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证

75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70页。

〔2〕其中例如，在称呼把鲁剌思、那牙罕、别速惕、斡罗纳儿、阿鲁剌惕、绰诺斯、速勒都思、亦乞列思、杜尔伯特等种族集团时，就是这样对待的。

〔3〕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189页；也可参看达木丁苏隆（Ц. Дамдинсурэн）：《元朝秘史》，乌兰巴托，1947年版，第259页。顺便指出，对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事件起过巨大作用的泰亦赤乌惕部，在《元朝秘史》中不称为斡孛黑，而称作爱马克（卫拉特部也是如此）；克列亦惕部有一次被称为兀鲁思，两次被称为亦儿坚，一次被称为爱马克；乃蛮部既被称作兀鲁思，又被称作爱马克；梅勒吉特部曾被称作兀鲁思、亦儿坚、爱马克等等。

明，这一时期的斡孛黑已经不是确切意义的斡孛黑了，它已经不像古代那样包含着血缘家族公社的涵义了，这种公社已具有当时卫拉特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内部管理方面一切固有的特征和标志。

现在，我们来看看17—19世纪蒙古和卡尔梅克的史料——《黄金史》、《黄册》、《蒙古源流》、《咱雅班第达传》，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两本《故事》，从中搜寻一下足以判断蒙古斡孛黑进一步演变情况的资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据查证，所有这些史料，除《咱雅班第达传》外，都不同程度地详细复述了《元朝秘史》中有关蒙古历史上古代斡孛黑形成的故事。不过除了《元朝秘史》谈到的那些斡孛黑之外，哪本史料也没提到有形成任何新斡孛黑的情况。根据这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对蒙古人，其中包括卫拉特人的氏族形成过程记忆犹新，但这一过程基本上在成吉思汗以前就已经结束了，这在《元朝秘史》的相应篇章中和拉施特的编年史中得到了反映。后来，到了元帝国时期，蒙古民族的聚集过程
76 完成，把以往氏族部落社会组织的残余都吞噬溶化掉了，就更谈不到任何原始意义的斡孛黑了。17—19世纪蒙古和卡尔梅克史籍的作者们对斡孛黑简直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这种斡孛黑，而且它在人民心中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不清，实则恐怕是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元朝秘史》的作者是为了确定某个种族集团或者社会集团的作用和意义而采用“斡孛黑”、“亦儿坚”、“爱马克”、“兀鲁思”、“兀鲁克”、“牙孙”这些词，并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那么在17—19世纪的史料中，我们已经见不到这样大量的近似的词了。这些史料的作者通常使用“兀鲁思”——民族一词。“斡孛黑”这个词在这里很少遇见，有时则是用于崭新的含义。例如《黄册》和《黄金史》的作者都谈到，孛儿帖赤那是蒙古斡孛黑的始祖。[1] 《黄册》在另一处谈到，成吉

[1]《黄册》，第93页；也可参看萨囊彻辰：《黄金史》，第4页；巴乌登：《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第36页。《黄金史》把这句话译作“became of the Mongol clan”。

思汗的一个岳父属于中国姓吴的斡孛黑。[1] 这本史料还说到，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出身于中国姓朱的斡孛黑。[2] 可见，《黄册》的作者给“斡孛黑”这个概念放进了全新的含义。他把只有狭隘的单个词义的家庭称作斡孛黑，中国家庭的姓——“吴”和“朱”被他当作了斡孛黑的名称。可能，孛儿帖赤那也被《黄册》和《黄金史》的作者们当作了“蒙古人”这个名字的第一个代称，并在这个意义上被当作了蒙古斡孛黑的始祖。

上述这些例子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 17 世纪，斡孛黑一词已经不是指集体经营的血缘亲属公社，也不是指原有词义的氏族，而是指单个的家庭或者指若干个家庭的组合，他们因相近的血缘亲属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并经营单独的经济。 77

我们不能肯定，在 17 世纪以前，斡孛黑氏族向斡孛黑家庭的转化过程在全蒙古范围内就已经完成。但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的发展趋向正是如此，而且在 17 世纪以前，它的发展已经突飞猛进了。[3]

那么，据《黄册》的作者说，他那个时候的卫拉特人中有杜尔伯特、乌济叶特、绰罗斯、巴噶图特等 6 个斡孛黑，这些斡孛黑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当时的这些斡孛黑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应族系名称的单个血缘家庭的组合，当然，这 6 个斡孛黑不是平民的家庭，不是阿

---

〔1〕《黄册》，第 34 页。

〔2〕《黄册》，第 56 页。

〔3〕我们在波塔宁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斡孛黑进一步演变的有趣资料。他记载说，在鄂尔多斯一个蒙古旗里，19 世纪末，共有 18 个斡孛黑和 4 个小斡孛黑（подомок），在另一个同样的旗中，有 15 个斡孛黑。不同的旗里往往有同名的斡孛黑。喀尔喀的居民在上述时期已经不记得他们祖先所属的那些斡孛黑的名称了，尽管他们对波塔宁说过，在喀尔喀的达赖卓音和儿王的旗里，还继续存在着 15 个“牙孙”（骨头）。由于我们对波塔宁有关这个旗的“牙孙”的记载十分感兴趣，便请求这个旗出身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锡林迪布把有关情况告诉我们，他热忱地答复了我们的要求。锡林迪布在 1961 年 5 月 20 日的来信中指出，关于斡孛黑的演变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他从父母和地方长老的口述中了解到，该旗的居民计算出他们祖先所属的斡孛黑共有 30 个左右，但到上个世纪末期，这些斡孛黑实际上几乎都消失了，只剩下点滴痕迹。锡林迪布所作的初步结论归结如下：“（1）斡孛黑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团体，内部禁止相互通婚；（2）斡孛黑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以小辈尊敬长辈的原则为基础，例如，小辈在新年那天应当去给长辈拜年；（3）斡孛黑的成员是一些经营个体经济的单个家庭。”

借此机会，我们对锡林迪布教授的热情答复及其提供的珍贵资料表示由衷的谢意。

拉特的家庭，而是贵族家庭、封建执政者的家庭的组合，它们属于立有
78 严密而精确的家谱的汗和王公的族系。不过，如果确有这样的贵族斡孛黑家庭，那么就不可能没有其他较小的这种贵族家庭。看来，《黄册》的作者在谈到“哈里亚特”的巴图鲁珪林奇、“特凌古特”的阿勃杜拉彻辰[1]以及“鄂尔郭特”、“翁吉剌惕”等部时，想必指的就是这类小贵族的斡孛黑家庭。至于阿拉特的斡孛黑家庭，关于他们这些平民奴仆、直接生产者、封建剥削的对象、封建老爷们积蓄财富和加强实力的源泉，《黄册》的作者却无话可说。他看不到他们的活动中有什么杰出的东西，因为他们光是干活，为自己统治者的利益去远征、打仗，同时肩负着苛捐杂税、各种徭役、封建战争和连年内讧的重担。平民阿拉特家庭这种斡孛黑，根本没有名字，没有专门的称号，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晚一个世纪的加班沙拉勃在写自己的《故事》时，还作出结论说，甚至在厄鲁特、辉特、巴图特等等这样一些斡孛黑的事务和生活中，“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这些事情都微不足道”，那么，在阿拉特斡孛黑的生活中还会有哪些事件能引起《黄册》作者的注意呢？也因此，我们在《黄册》中没有找到有关阿拉特斡孛黑的记载。

至于其他蒙古的以及卡尔梅克的史料，都只就总的和主要的方面复述和证实了《黄册》的记载。但是，我们发现，《黄金史》把“牙孙”和“斡孛黑”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分，把前者看做是后者的一部分。例如，这部书以不同的说法 3 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出身，并肯定成吉思汗的父亲属于奇渥特“牙孙”，它是孛儿只斤[2]“斡孛黑”的一部分。可见，对这条资料的含义应该理解为，在 12 世纪后半叶，“牙孙”的含义在颇大程度上已经是从血缘亲属公社独立出来了的单个家庭的组合（其姓氏为奇渥特），但是它还是氏族公社，即“斡孛黑”（称为孛儿只斤族）的组成部分。后来，由于作为血缘亲属公社的斡孛黑的日益分化，“牙孙”和“斡孛黑”的概念便越来越接近，并逐渐成了内容相同的东西。

---

〔1〕《黄册》，第 63、64 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9 页。在这一页上这样重复了两次，第 3 次提到它是在 13 页。

在我们看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19世纪的蒙古和卡尔梅克史 79
料中，“斡孛黑”这个词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最终完全消失。例如，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在他们的两部《故事》中，谈到古代的和跟他们同时代的蒙古和卡尔梅克汗以及王公们的族系以及血缘关系时，只用过两个词——“牙孙”和“鄂克”。《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谈到的一条资料很有意义，他说咱雅班第达出身于和硕特“牙孙”以及古鲁青鄂拓克，而在这个鄂拓克中，他又属于桑噶斯家庭。[1] 可见在这段对17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杰出活动家族系的详细叙述中，没有出现“斡孛黑”这个词。它被“鄂拓克”取代了。大家知道，“鄂拓克”的基础不是血缘亲属关系，而是地域关系。就其性质而言，鄂拓克是封建领地，是汗或王公的封地，它到清代称为“旗”，尽管在其内部就其实质而言，旗和鄂拓克毫无区别。显然，鄂拓克（或旗）只有在封建制度比较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因此，在11、12，甚至13世纪当然还不可能有鄂拓克，也因此，《元朝秘史》的作者对它一无所知，这也是我们在这部古代文献中没有发现这个词的原因。但是，快到17世纪时，情况有了重大变化。鄂拓克在蒙古（尤其是在卫拉特）的社会结构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这在《黄金史》、《黄册》以及其他蒙古和卡尔梅克的史料中得到了反映。这些史籍中经常详尽地谈到鄂拓克的情况。很有意思的是，《元朝秘史》中提到的许多“斡孛黑”，到了晚期的史料中都成了“鄂拓克”。例如，索伦古特、汪古惕、你吉古惕、忽儿朋等“斡孛黑”的遭遇就是这样，在《元朝秘史》中是“斡孛黑”，而在《黄金史》中却成了“鄂拓克”。不能不同意弗拉基米尔佐夫的意见，他把蒙古社会制度中的鄂拓克得到巩固归入15世纪，并认为：“由于占有游牧站附近某块领土而联合在一起的游牧家庭（阿寅勒）的组合是由兀鲁思或万户分
裂出来的，这种家庭组合称作鄂拓克。鄂拓克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 80
期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蒙古的（其中当然包括卫拉特的。——

[1]拉特纳勒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3页。

兹拉特金)鄂拓克正是以这种地域单位为基础的。[1]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另一处写道:“蒙古鄂拓克绝不是血缘亲属的结合体,而且它的首领、台什等等也根本不是族长……可以把鄂拓克(以及爱马克)看做是游牧封地、游牧领地、一个基本的封建领地单位。”[2]前面提出的问题:15—17 世纪组成卫拉特社会的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土尔扈特、巴噶图特等联合体是什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了。

综观全部已阐述的内容,显而易见,这些联合体既不是氏族的联合体,也不是部落的联合体。他们联合的基础不是血缘亲属关系,而仅仅是地域关系。我们可以肯定,所有这些联合体都是庞大的封建汗国——兀鲁思,它们被分成更小的公国——鄂拓克,鄂拓克又分成农民的阿寅勒(单个家庭的组合)和一些单个的家庭。这样,我们可以说,咱雅班第达出身于和硕特汗国、古鲁青鄂拓克、桑噶斯阿寅勒。除了兀鲁思、鄂拓克和阿寅勒之外,卫拉特领土上的居民还熟悉像爱马克的豁团这样一些组织。不过,关于这些我们准备在准噶尔汗国形成以后的章节里再论述。

卫拉特封建领地按其人口数量、组成领地的鄂拓克和阿寅勒的数目、领地所占土地面积的大小以及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强弱,而有所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加班沙拉勃非常轻视巴噶图特、辉特以及其他卫拉特领地,它们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只能说是由于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软弱无力造成的。在 16—17 世纪的历史事件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是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这几个兀鲁思。
81 至于巴噶图特、辉特等等,大概被更强大的鄂拓克和兀鲁思吞并了,因此,除辉特以外,其他在以后的史籍中就全都不再被提到了。

兀鲁思和鄂拓克的首领是世袭执政者,他们出身于上等贵族家庭,是(或者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和挚友的嫡裔。实际上他们是王朝的统治阶层,控制着西蒙古所有的鄂拓克和阿寅勒。追求发财致富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 132 页。

[2]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 139 - 140 页。

的贪欲促使他们发动反对邻邦的掠夺战争，以及为优胜于其他兀鲁思，为侵占最好的牧地、增加附属阿寅勒的数量、控制贸易通道等等而挑起内讧。我们可以同意《黄册》作者的意见，把这些王朝家庭称为斡孛黑，但附有一点保留说明：这些斡孛黑联合的只是汗或王公们的家庭成员，他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全面统治着大量的直接生产者，后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附于斡孛黑的成员，本身不包括在斡孛黑之内。

例如，加班沙拉勃在叙述准噶尔（即绰罗斯）和杜尔伯特诺颜是天神后裔的神话时，肯定说，阿芒内的10个儿子和朵蒙内的4个儿子是准噶尔和杜尔伯特兀鲁思的奠基人，他们在很久以前跟自己的臣民一起建立了这些兀鲁思。[1]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兀鲁思所包括的不是同等的具有血缘关系的远近亲属，而是老爷和仆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并且前者是进行统治的斡孛黑的成员，后者则不属于斡孛黑，他们是平民“哈剌抽”。加班沙拉勃在另一处说到，卫拉特诺颜们如何增加从属于他们的阿寅勒的数目。据他所说，土尔扈特的岱青最初总共有160家阿勒巴图[2]，后来增加到了10万个；准噶尔的卓里克图洪台吉的，则由7000个增加到4万个；土尔扈特罗布藏的，由7000增加到8000个等等。[3] 这类家庭的数量可以增加好多倍。上述例子证明，处于统治地位的斡孛黑的成员及其统治的继承性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们的兀鲁思的人数和工作人员，即从属于斡孛黑成员的阿寅勒的数目却是变化不定的。斡孛黑成员同兀鲁思其他成员的关系是西部地区的地主同被压迫农民的关系，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是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被剥夺了这种生产资料的人的关系，是封建主同依附农民的关系。斡孛黑的成员和兀鲁思其余成员不是被血缘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被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斡孛黑的成员是兀鲁思全部土地、全部牧场的垄断者和支配者，这些牧地起着游牧、畜牧民族主要生产资料

82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7页。

[2]阿勒巴指劳役，阿勒巴图指服劳役的、纳税的、从属的。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4页。

的作用。[1]

弗拉基米尔佐夫以第一流的蒙古史料和拉施特的编年史所提供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作为自己结论的根据，说明了封建制度时代蒙古人的土地和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主要特征。弗拉基米尔佐夫也证明了还在11—12世纪，蒙古人已经在严格限定的土地范围（嫩秃黑）内放牧，
83 按照完全确定的路线由一个牧场迁到另一个牧场，以季节、草层、供水情况为转移准则从一个地方游牧到另一个地方。与古代牧地为氏族公社即斡孛黑成员集体所有不同，在快到13世纪时，这些公社对牧场的所有权被剥夺的过程基本完成。封建化的贵族渐渐成了这些土地唯一的实际所有主。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大汗是土地、牧场的最高所有主，他们把土地、牧场作为“忽必”（封地），连同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的人，分配给自己的心腹，称为“临时采邑”或“领地”，终生占用。

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成吉思汗创造了一种封地，把某个‘族’、某个‘部’分给某人作领地，作为对他忠实效劳的奖赏[2]……古蒙古的‘那可儿’（亲兵）由于为军事首领冲锋陷阵，而得到首领赐给的一定数量的游牧阿寅勒作为封地，变成了这些阿寅勒的主人和统治者。与此同时，还得到了颇大数量的领土，供他们带着自己的人游牧和狩猎……把一批人分给他（指‘那可儿’——兹拉特金）指挥，这附有一项义务：他必须连同一定数额的士兵，在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继续为首领服务，士兵可以从供他指挥的阿寅勒中抽派……作为封地的‘忽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定数量的游牧家庭（兀鲁思），另一部分是足够用来赡养他们的一定面积的牧地和狩猎地（嫩秃黑）。游牧民族的注意

---

〔1〕美国学者贝康的观点是对斡孛黑演变问题采取反历史态度的例证。根据他的意见，15—16世纪在蒙古出现了两种发展倾向的斗争：一种是要彻底消灭社会上的封建组织，而使社会分裂成独立的部落组合；另一种倾向则力求建立各种部落联盟，以便恢复昔日的大蒙古帝国。按贝康的意见，如果蒙古人有可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外部因素（喇嘛教和清朝的统治）不影响他们，他们就很容易恢复部落系统的灵活制度。参看贝康（E. E. Bacon）：《斡孛黑：欧洲的社会结构研究》（Obok：a study of social struture in Eurasia），纽约，1958年版，第81－82页。

〔2〕成吉思汗的这类奖赏是不论出身门第的，如他从世袭奴隶部中分封了军功卓著的木华黎为“万户”，即部、族中万户人的统治者。随着大批为成吉思汗冲锋献身的奴隶变为新统治者，当时奴隶制的基础开始动摇，促使进入封建社会。——译者

力当然集中在人上，因为别的‘嫩秃黑’还可能找得到，因此，‘兀鲁思’这个词就开始表示划分给某个人的封地本身了。”[1]

弗拉基米尔佐夫研究蒙古社会制度的这部著作已发表将近30年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许多著作对游牧民族，包括已加入原俄罗斯帝国的和未加入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新著作大大充实了苏维埃的学术研究。研究哈萨克斯坦、布里亚特、亚库梯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的著作饶有兴趣，因为这些共和国的民族在不久以前，还主要是，或者完全是游牧、畜牧民族。这些著作中所介绍的丰富的具体历史材料和大量的实际数据，使人毫不怀疑弗拉基米尔佐夫的主要的、基本的论点不仅符合于蒙古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符合于一切游牧民族封建（或封建化）社会的历史事实，从而为阐明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途径。 84

弗拉基米尔佐夫肯定，蒙古在13世纪已经形成了封建主对土地、牧地所有权的垄断，对他的这一论点似乎再无必要引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但是，不能不指出有些研究者至今还很少注意到的某些事实。例如，《元朝秘史》谈到成吉思汗在其亲友间分配封地时说，汗向豁儿赤命令：“顺额儿的失河水[2]林木内百姓地面，从你自在下营”[3]。这样的命令只有土地所有主才能颁布，他有权根据一定的条件，把自己对该领土的所有权转让给另一个人。重要的还在于，得到这份奖赏的人也有权“不受阻碍地”占用所赐的领土，在奖赏有效的全部时间内是领土的所有主。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提供另外的解释。

再从《元朝秘史》中引用一个例子。成吉思汗问锁儿罕失剌：“你要何赏赐？”后者回答：“能否赐给俺自在下营地面，俺欲要蔑儿乞的薛凉格[4]地面自在下营。”成吉思汗命令说：“依著你，那地面内自在下

---

[1]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97、102－103、111页。

[2]额儿的失河即苏联境内的额尔齐斯河。——译者

[3]柯津：《元朝秘史》，第161页；也可参看达木丁苏隆：《元朝秘史》，第202页。

[4]薛凉格即今色楞格河。——译者

85 营。再教你子孙行……”[1]这里，汗对他所统治的全部土地拥有所有权的观念表现得更为清晰、更有说服力，正如他有权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一样，这样，这个人本身就获得了赐给他的那块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我们还提醒大家注意该史料关于成吉思汗给他亲友多次奖赏不同的兀鲁思、万户、千户等等作为封地的叙述。同时，每份这样的奖赏不仅包括组成这些兀鲁思、万户等封地的人和阿寅勒，而且还包括他们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土地、牧地、他们赖以生存的游牧区，这被看做是不言而喻的事。如果成吉思汗不是这些阿寅勒放牧的牧地和土地的所有主，他就不可能把人、把阿寅勒的居民拿来赏赐。

最后，我们再引一个《元朝秘史》中的例子，它跟正在研究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继承人窝阔台颁布了一道命令，其中规定划分牧地和水域地区。命令中说：“其分派之人，可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2]从命令的原文中可见，土地和牧地已经在什么时候被划分过了，命令中所谈的已经是重新分配牧地的问题，是再一次划出
86 游牧区，再一次把它分给使用者的问题。如果汗不是土地的最高所有主，如果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属于游牧者本人所有，属于他们的“阿寅勒”、“斡孛黑”所有，那么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命令的内容证明，土地是别人的财产，是受汗和诺颜支配管理的东西，这是与使用者的利益对立的。

如果说在帝国时代，土地是帝国君主本人——大汗的财产，那么到了后来，它却变成了占有封地的地方执政者的财产了。封地在经济上

---

〔1〕柯津：《元朝秘史》，第167页；达木丁苏隆：《元朝秘史》，第215、216页。哈萨克民族史中有一段完全相似的情况，谈一谈也很有意思。1812年内盟，即布克汗国（Внутренняя орда）的汗布克颁赐给伊塞泰·泰马诺夫一份特权书状，其中称：“我赐给伊塞泰·泰马诺夫的这份诏书，允许他和他所管辖的吉尔吉斯人，驻牧在里海一带……（略哨所名称——兹拉特金）等哨所间的冬季牧区。这一地区，无论对于他自己，或者对于从属于他的吉尔吉斯人，都将是最好的地方。这样的牧区……我现在交给泰马诺夫看管和处理。除了他和从属于他的吉尔吉斯人以外，不准其他人在他的牧地游牧”，引自沙赫马托夫（В. Ф. Шахматов）：《布克汗国和伊塞泰·泰马诺夫起义》（Внутреняя орда и восстание Исетая Тайманова），阿拉木图，1946年版，第45页。

〔2〕柯津：《元朝秘史》，第197页；达木丁苏隆：《元朝秘史》，第277页。

和政治上的巩固过程为封建割据的产生和增长创造了客观基础，封建割据取代了蒙古诺颜所统治的统一的早期封建汗国。另一方面，战争失败、起义谋叛以及其他情况使得汗的中央政权削弱，这对割据局面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至于地方执政者，他们凭借自己与日俱增的实力，并且利用中央政权的削弱，力求把赏赐给他们的土地、牧地变成他们全权所有的世袭财产。

根据这点，我们来考察一下赏赐型的封地“忽必”，即有条件的终身享用的领地变成当地汗国和公国执政者的世袭财产的情况。这方面，很重要的是指出，在《元朝秘史》中多次出现“忽必”这个词都是用来表示汗的赏赐，它包括牧地和在牧地上游牧的牧民。到17世纪时，这个词消失不见了，让位给史料中的另一个词“乌木齐”，它表示世袭财产的概念。例如，《黄册》的作者在复述《元朝秘史》所讲的成吉思汗给他的兄弟们分发封地的故事时，不把这些封地称作“忽必”，而称作他和他的同代人都了解的“乌木齐”这个词。[1]《黄册》也用这个词指称西藏的阿勒坦·桑达里图汗划分给他的兄弟们的封地。[2] 加班沙拉勃《故事》中有一个篇章的标题是：“关于卫拉特诺颜怎样把封地分发给儿子们的故事”，在这里，封地的概念也是用乌木齐一词表达的。[3]《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记载，达延汗的一个孙子必里克墨尔根（1506—1550年）有9个儿子，他们继承了父亲的一个兀鲁思后，把它分成了9部分。这时，萨囊彻辰在讲这个兀鲁思，讲遗产，讲把兀鲁思分成9部分时，也使用了乌木齐这个词。[4]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凡谈到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汗和王公把领地当遗产传给自己的儿子时，也都是使用这个词。[5]。

87

16—17世纪全蒙古的封建领地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斡孛黑的世袭

〔1〕《黄册》，第95页。

〔2〕《黄册》，第95页。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4页。

〔4〕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0页。

〔5〕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5－78页和结束语。

财产，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不需要再多引证据。可是，忽必转化为乌木齐的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在蒙古的主要地区，尤其在西蒙古卫拉特人中完成这一转化过程应当归属于哪个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困难得多。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史料都没有提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料。我们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过程可能是与成吉思汗后裔帝国的瓦解同时开始和进而发展的，蒙古封建主被赶出中国可能大大推动了它的加速发展，这一转化过程在蒙古中部和西部地区全部完成大约是在15与16世纪之交。

前面我们曾引用《明史》的证据，它使我们得出结论：在15世纪后半叶，东、西蒙古领主们的独立性显得与日俱增。我们认为这个证据反映了蒙古（其中也包括卫拉特）的地方执政者，从汗的一块土地和在其上游牧的阿寅勒的终身拥有者转变成这块土地的世袭全权所有主的情况。

88

土地和牧场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垄断财产所引起的自然结果就是把直接生产者——从事游牧、畜牧的劳动者变成了经济上的依附阶级，变成了封建剥削的对象。还在《元朝秘史》那个时代，像“纳赋者”、“服役者”、“世袭臣民”、“世袭牧奴”、“牧奴”、“臣民”、“苦役”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就已经广泛流传。《元朝秘史》谈到，成吉思汗在击溃主儿乞兀鲁思之后，把主儿乞人及其臣民都变成了他私有的世袭牧奴[1]，又说被乃蛮人打败的王罕曾请求成吉思汗帮他收回“属民和财富。”[2]《元朝秘史》还说到有“家仆”、“家人”这样一个社会阶层。[3]

蒙古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从属于处在统治地位的斡孛黑，为自己主人和封建国家的利益履行形形色色的义务。除了兵役以外，史料很少谈到这些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学术界所了解的第一个旨在调整人民赋役的法令是与窝阔台汗的名字联系着的。《元朝秘史》叙述了这一法令的内容，从中可见，压在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和各种赋役的

---

〔1〕柯津：《元朝秘史》，第126、140、143页。

〔2〕柯津：《元朝秘史》，第115页。

〔3〕柯津：《元朝秘史》，第126页。

负担是多么沉重！窝阔台的法令说："如今教百姓每安宁快活，休教他辛苦……"[1]从后面的条文中看出，汗对人民福利的"关怀"可归结如下：(1)每户阿拉特必须每年交纳一头两岁绵羊供汗食用，并按羊群的1%纳税以赡养贫苦无产的人；(2)各千户务必拨出一定数量的母马作为官房的马群，抽出若干挤奶工为官马挤奶，指派一些管理官方牧场和牧区的管理人员以及守护官库的卫兵，为每个驿站各拨20名驿站人员——马车夫和驿夫。找出若干马匹、壮绵羊作过路人之食品，按规定数量为各站提供若干奶马、拉车犍牛和马车等等。 89

如果这些算是窝阔台汗的"恩典"，那么可以想见，这项法令颁布以前，国家的苛捐杂税是如何繁重。况且还应该注意到，窝阔台的法令所调整的只是阿拉特牧户对国家的义务，而根本没有过问阿拉特及其直接统治者诺颜——阿拉特从事游牧的土地的主人之间的互相关系。我们还考虑到，服兵役和参加远征并没有豁免士兵的家庭所担负的一般赋税和各项义务。综观这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出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和人民群众受高度封建剥削的情况。[2] 当然，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也曾一度有所缓和，这一方面是由于氏族关系的残余在13—14世纪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侵略战争的胜利，蒙古封建主可以剥削被征服民族，而且他们有可能为普通士兵和他们的家庭分出一部分战利品和贡品。可是，这样"分摊"俘获物没有消灭，也不可能消灭阶级不平等现象和阶级矛盾。

蒙古社会进一步阶级分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帝国的覆灭，它使蒙古封建主的军事、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这也就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加剧。《明史》记载，15世纪中期，有个蒙古领主向朱祁镇皇帝控诉隶属于他的阿勒特中有1500户擅自离开领地，成群迁徙。这位领主没有可能用 90

[1]柯津：《元朝秘史》，第197页。

[2]某些苏联研究人员否认13世纪蒙古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例如，托雷别科夫(C. E. Толыбеков)写道："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国家所具有的剥削形式基本上是对被征服的落后游牧民族和文化先进的定居务农民族的集体(重点号是我们加的——兹拉特金)宗法封建剥削形式。"见《17—19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制度》(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казахов в XVII - XIX веках)，阿拉木图，1959年版，第176页。

自己的力量追回逃跑的人而请求皇帝援助。皇帝援助了他,逃脱的人又被送还给他们“合法的”主人。据我们所知,这件事是我们在史料中所发现的第一次直接指出关于阶级斗争的资料,后来则常常见到这类资料。它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封建从属的阿拉特牧户脱离其主人擅自“非法”迁徙,是蒙古封建社会中最早、最流行的阶级斗争形式。无须怀疑,《明史》中引用的这件事不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而且也不是阿拉特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斗争的唯一表现形式。

整个蒙古的情况大致如此,卫拉特的主要情况也大致如此。东、西蒙古在社会制度方面无疑存在着某些特点和差别。这主要涉及土地的使用形式。有关这些情况我们后面再谈。

总之,17 世纪的 3 部蒙古编年史和《明史》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某些史籍中存在过的下述观点:似乎蒙古征服者被赶出中国之后,在蒙古西部立刻或者很快就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的国家,仿佛其锋芒指向东蒙古,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类似元朝那样的卫拉特帝国。

上述史料一再证实,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头 25 年在蒙古西部地区游牧的卫拉特居民是一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首领是卫拉特封建主,他们认为自己是全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嫡裔的藩臣,这些嫡裔与东蒙古封建主保持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封建制度时代所固有的特征。

91

蒙古和中国的史料没有揭示 15—16 世纪西蒙古及其基本居民——卫拉特人各个方面历史发展的情况。只有依据突厥文的中亚和中央亚细亚的史料,才有可能全面研究这个时期卫拉特人和准噶尔的历史。这些突厥文史料所记载的资料可以使我们肯定,15—16 世纪卫拉特封建主斗争的主要方向,不是在东方反对中国和东蒙古,而是在西方反对蒙兀儿斯坦的汗和王公们。

造成东、西蒙古封建主之间的传统联系中断和前者拒绝作为藩臣效劳于成吉思汗系全蒙古汗的基本矛盾,是争夺通往中国的贸易通道和争夺中国市场上的贸易特权。上述矛盾是这两部分蒙古汗和王公之

间进行战争的主要经济基础。

这些史料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某些史籍中存在过的下述说法:似乎两部分蒙古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无休止的总体战争。实际上,这种斗争具有封建时代战争的一切典型特征,有时武装冲突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或者王朝间通婚、结盟、由一个阵营随意转到另一个阵营、频繁地由同盟者变为敌人、由敌人变为同盟者等等。[1]

无论在东蒙古还是在西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这种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普遍地由国家对土地的封建所有制过渡到私人封建所有制,并相应地由终身占有封地("忽必")过渡到世袭领地("乌木齐")。这个过程决定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一直存在到元朝末年的军事封地制度的消亡。它促进了地方封建领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促进了封建割据的发展。 92

与此同时,古代氏族公社——斡孛黑转变为数量不太大的个体家庭的组合,他们由于相近的血缘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经营个体经济。研究家们忽视这一过程,结果造成了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把16—19世纪的斡孛黑同古代蒙古氏族公社混为一谈,并且根据这一点肯定蒙古人(包括卫拉特人)保存了氏族部落的社会结构,肯定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以及其他卫拉特斡孛黑都是一种特殊的部落公社。而实际上,这些斡孛黑是由若干统治家族成员所组成的封建王朝。受统治的人民、直接的生产者群众与这些斡孛黑不相干。

这些史料证明,15—16世纪的卫拉特历史是蒙古民族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证明卫拉特的历史命运紧紧地同游牧于这一地区东部的蒙古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影响着蒙古人的命运并决定着这一整个地区的发展。

---

[1]1737年卫拉特编年史作家加班沙拉勃有充分根据地写了这一点:"杜尔本·卫拉特的诺颜们感到需要打仗时,就打仗,而和东蒙古人和解时,又互相嫁出自己心爱的女儿。"(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0页)

93

2 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前提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汗国在西蒙古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事件准备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形成。准噶尔汗国的产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蒙古社会所孕育的客观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卫拉特封建主抵御外部敌人的长期斗争和激烈的内讧，是上述客观过程的反映。只有同这些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卫拉特的内、外斗争。

科特维奇就曾指出过，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卫拉特历史很感兴趣。不过，他说："阐明这段包括 150 多年时间的史料，不仅还没有被利用，而且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宣扬。"[1]结果，研究者们在许多与准噶尔汗国形成史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有些研究者从当时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了有关卫拉特执政者原来力图重建成吉思汗帝国并对邻国大肆扩张的反映。这在当时仿佛是可能的，因为那时有一批出身于绰罗斯家族的精明强干的领袖——妥懽和也先的后裔主持着卫拉特。

持这一观点的有比丘林、波兹德涅耶夫、维谢洛夫斯基、柯津等人。其中，比丘林发表过如下论述："这一时期（即从也先时期开始到 16 世纪末——兹拉特金）过后，卫拉特人终于从长期的无所作为和朦胧状
94 态中苏醒过来了。由于感到自己有新生的活力，他们便又把注意力集中于恢复自己昔日的荣誉。但是，缺乏明智的同心协力，因此就按照个人的打算采取行动并选择方法。哈喇忽喇汗作为卫拉特的首领，希望建立君主专制，可是各部领主却要独自称王。"[2]比丘林在另一处写

---

[1]科特维奇：《有关 17—18 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第 792 页。

[2]雅金夫：《从 15 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 27 页。

道："仔细考虑一下双方关于土尔扈特从阿尔泰山迁徙到俄罗斯的资料，每个人都会确信这样的真实情况：这次迁徙跟和硕特从阿尔泰山迁往库库淖尔发生在同一时间，它并不是由于诸汗之间互相不满。上述迁移中显示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狡猾阴谋的新步骤。最初，甚至连北京政府也未能发觉这一点。……因此，卫拉特没有经过流血就获得了对亚洲广大地区——从阿尔泰山起，西至里海、南到印度边境的统治权。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卫拉特经过从也先到哈喇忽喇这150年的休养生息，增殖人口，现在又开始策划在亚洲重建古代成吉思汗式的帝国。而事情的开端又以这样幸运的结局告终，这不免引起了他们对未来的种种希望。"[1]比丘林就这样描述了这一时期事件的意义及其内幕。

波兹德涅耶夫坚决反对雷奇科夫、列佩欣、格奥尔加、帕拉斯、斯特拉霍夫、涅费季耶夫、比尤列尔、科斯坚科夫等人的观点。他们断言，17世纪初，在准噶尔地区各卫拉特（卡尔梅克）部中，接连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王公（例如，哈喇忽喇、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等人），他们力求把分散的诸部联合成一个整体。波兹德涅耶夫写道："我们对这一传说的内在含义不用特别思考就可以认定，17世纪初的准噶尔王公们力求在自己控制之下建立一个草原君主国。而和鄂尔勒克不愿服从这种控制，于是他聚集自己的5万帐属民，一起迁往俄国境内。"[2]

95

在反驳上述作者的观点时，波兹德涅耶夫引证了东方史料中若干个他没有提名的传说，也引证了《游牧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特征》一书，叙述了他对16、17世纪之交卫拉特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解。他写道："大家知道，所有游牧民族都是分单个部生活的，每个部受自己的部主管辖。各游牧部单独行动时，除了单纯的侵袭和抢劫之外，从未感到自己能强大到足以开创某种事业，除非他们中间出现一个能把他们这些零星小部结合成统一联盟的首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对外表

〔1〕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61－63页。

〔2〕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1－142页。

现自己的力量,这在东方历史上是习以为常的事实。"[1]卫拉特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一直到"他们中间出现以哈喇忽喇和他的继承人巴图尔浑台吉为代表的新首领为止。这些首领重新开始联合卫拉特诸部。这种联合完全不是追求君主专制,而且既不同于欧洲的征服藩属的领地,也不同于俄国的消灭封地。"[2]波兹德涅耶夫就是这样想象游牧民族的历史动力的。按照他的意见,一切取决于首领个人的气质和才能。"他(指首领。——兹拉特金)如有行政管理才能(像巴图尔浑台吉所具有的),便可使各部通过颁布公民集体决议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结盟。他本身如具有特殊的统帅天赋(像成吉思汗、也先等人),便可通过一次次的战争来表现自己……这就是我们观察游牧民族有史以来的生活所作出的结论。这些结论使我们对卡尔梅克人迁往俄国境内的原因,完全持另一种看法。"[3]

按照波兹德涅耶夫的意见,土尔扈特及和硕特离开准噶尔,不仅没有削弱卫拉特联盟,而且相反,大大加强了这一联盟。"而正是那个时期(即17世纪30年代。——兹拉特金),应该看做是准噶尔人更加强大的最光辉的时期。当时,卫拉特人统治了西起里海沿岸,东到阿拉善[4]和北起乌拉尔,南到印度边境的整个地区。这种实力使他们有可能接着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而到17世纪末,则把自己的征服地扩展到整个蒙古……和鄂尔勒克是在所有卫拉特部的共同知晓和普遍赞同下,率领他的卡尔梅克属民迁往俄国的。"[5]

96

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吐纪初这位影响最大的蒙古学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作为简单化分析历史现象的一例,其结果完全与历史实际相抵触。

维谢洛夫斯基在他的论述蒙古人历史的讲义中,表示同意雅金夫·比丘林对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迁离准噶尔的原因所表述的观点。他

---

[1]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2页。

[2]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2页。

[3]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3页。

[4]阿拉善即贺兰山的转音,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译者

[5]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第144页。

根据比丘林的权威意见说："这是一个为了获得新土地和重建成吉思汗帝国而经过周密考虑的计划，而绝不是出于敌意的迁离。"[1]

柯津在研究卡尔梅克史诗故事《江格尔传》的历史根源时也写道："相当有名的是雅金夫·比丘林的见解，其次是维谢洛夫斯基和波兹德涅耶夫两位教授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卫拉特首领们具有从政治上继承元朝皇帝遗产的念头，同时，在17世纪，也可能更早一些，远在15世纪的也先时期，就有重建元帝国的政治意图和计划。这种观点竟出乎意外地受到我们的长篇史诗这样不寻常的史料的支持。"[2]下面，我们将努力证明，企图借助《江格尔传》来支持比丘林、波兹德涅耶夫及其同道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指出，就连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弗拉基米尔佐夫也在他的若干著作中，模棱两可地评述了蒙古的，其中包括卫拉特的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总形势。据他说，这个时期"随着某些蒙古汗国和部落联盟的巩固，开始出现蒙古生活普遍复兴的景象……开始产生新的精神上的需要。蒙古人，特别是蒙古贵族不再满足于原始的萨满教"。[3] 关于卫拉特人，弗拉基米尔佐夫则断言："佛教在蒙古的复兴也影响了卫拉特人。那时，他们恰好处在民族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幻想筹建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试图在中央亚细亚建立游牧帝国。"[4]可靠的历史事实没有证实弗拉基米尔佐夫关于蒙古佛教复兴的意见，也没有证实他的另一条意见：似乎卫拉特民族的振奋表现于企图在中央亚细亚建立游牧帝国。

97

另一些俄国东方学者对当时事件的实质设想得有所不同。例如，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把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迁离准噶尔，同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三十几年卫拉特抵御外部敌人斗争的失败以及内部斗

---

〔1〕维谢洛夫斯基：《蒙古史讲义》，第97页。

〔2〕柯津：《江格尔传》，第79页。

〔3〕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文献》（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载《东方文献》（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彼得堡，1920年版，第2册，第99页。

〔4〕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文献》（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载《东方文献》（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彼得堡，1920年版，第2册，第112页。

争的加剧联系了起来。他写道："很明显，受东部喀尔喀人排挤的卡尔梅克人，没有希望占领准噶尔南部，他们一方面沿着额尔齐斯河谷地向西北移动，到达伊希姆河及托博尔河；另一方面则向南移动，绕过南山到库库淖尔。特别是17世纪前半叶，卫拉特人为了寻找未被占用的土地，加紧进行这种迁移。当时引起迁移的另一个原因是，准噶尔兀鲁思的首领——也先的刚毅尚武的后裔呼图克图哈喇忽喇，奋起率领杜尔本·卫拉特，着手把所有卡尔梅克部落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1]

98 乌斯宾斯基把卫拉特历史上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叶，划为哈喇忽喇时代和巴图尔浑台吉时代。他指出，在当时中国历史学者的著作中很少提到卫拉特，主要提到的是上述两个执政者为巩固中央集权，也就是为建立统一的卫拉特汗国所作的斗争。[2]

研究这一时期卫拉特历史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没有搜集到卫拉特本身的编年史和其他资料，尽管确实知道每个卫拉特王公家族都立有详细的世谱。到了18世纪准噶尔汗国被击溃之后，某些世谱落到了清朝当局手中。他们把这些资料部分地发表在中国的史地著作里。比丘林就曾利用这些史籍来写他的有关准噶尔和卫拉特的著作。有些卫拉特编年史资料和世谱则落到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手里，大概，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就是在那里见到这些资料的。正如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执政者和王公们对帕拉斯所说的，准噶尔的卫拉特人除了世谱表之外，还整理过若干历史大事记。大家知道，有一部这种大事记就是在巴图尔浑台吉及其继承人的牙帐中整理出来的。可是，所有这些资料我们都没有弄到。科特维奇在讲到卫拉特人时写道："他们所经历的命运的盛衰兴亡，使得未能保存住他们肯定曾经有过的历史文献。"[3]

我们叙述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历史，依据的是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两本《故事》、《咱雅班第达传》，此外还有俄文档案资料。

---

〔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629页。

〔2〕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6页。

〔3〕科特维奇：《有关17—18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第792页。

这些史料一起组成了相当可观的基础资料。关于两篇《故事》和《咱雅班第达传》这些论述卫拉特历史的文献的特点，我们在《导言》中已经谈过。至于俄文档案资料的主要内容，已由科特维奇在我们多次提到过的那本专著中说明了。只需要补充一点：1959 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俄蒙关系史资料》专集，其中也搜集了一些经过精选的包括 1607—1636 年间俄国与卫拉特关系方面的文件。因此阐明了准噶尔汗国存在初期的事件。必须指出，在俄国政府的代表们编写出第一个有关卫拉特的官方文件之前，俄国已经出现了论述卫拉特的资料。叶西波夫、斯特罗甘诺夫、列密佐夫和切列潘诺夫的古代西伯利亚各编年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前 3 部编年史已经发表，而且流传甚广。遗憾的是，第 4 部书至今还是手稿，收藏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存件中。而《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作为研究西伯利亚各民族和各邻族，其中包括卫拉特人历史的史料，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尤其明显，因为这部史料对卫拉特的历史以及对俄国与卫拉特的关系，一直叙述到准噶尔汗国存在的最末期，并且还记载了这位编者所验证过的若干事实。可以认为，《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中有关卫拉特历史的资料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它们都被其他史料的记载所证实了。[1]

99

我们凭借上述蒙古史料和俄国史料所得出的结论，与比丘林、波兹德涅耶夫、柯津、维谢洛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对卫拉特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看法，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而这个时期紧接在准噶尔汗国形成之前，理所当然地决定了这个汗国的形成。

2.1　16 世纪后半叶的西蒙古

蒙古牧区大量迁移是 16 世纪中期，特别是 16 世纪后半叶的突出

[1]《西伯利亚编年史》(Сибир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圣彼得堡，1907 年版。关于《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的史料学意义，参看安德列耶夫(А. И. Андреев)：《关于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ОЧерепановской летописи)，载《历史丛刊》，1942 年版，第 13 卷，第 308－323 页。

标志，它导致了牧区的普遍扩大。这种迁移是由前面提到过的东蒙古
100 亦卜喇台吉所开创的。16 世纪初，他奋起反对达延汗，但是遭到失败，于是向西逃到库库淖尔地区。从这时起，蒙古人就长期地定居在戈壁以南的草原。快到 16 世纪中期时，东蒙古封建主成了鄂尔多斯的主人。1559 年土默特的俺答汗从这里潜入库库淖尔和安多，并把这些地区作为领地遗产传给了他的儿子们。[1] 其他东蒙古王公也紧随他们来到这里那些未被占用的牧地上。

引起这些迁移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史料说，这是因为汗和王公们要寻找水草富足的新牧场。可是，他们又为什么要遗弃迁移前曾使他们感到满意的原有牧区、原有饲料资源和水源呢？无论是中国史料还是蒙古史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们只在其中发现若干间接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由于畜群增长，原有牧地不够使用，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封建经济中，有限的饲料资源开始限制畜牧业的发展，牲口总数量的增长要求增补饲料牧地。显然，所有史料都提到的蒙古牧区的重大变动，是上述情况的直接结果。

我们可以根据与 16、17 世纪有关的资料，来判断蒙古畜群数量增长的情况。例如，蒙古领主们极力要求中国开市所表现出的倔强而坚定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日益发展的畜牧业的剩余产品迫切要求有组织地换取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只有这种经济上的强烈需求，才能解释土默特俺答汗——当时南蒙古势力最大的封建主对中国明廷的政策。俺答汗屡次向中国当局建议开市，他一再强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蒙边境才能保持稳定的和平，中国人才能够无阻碍地务
101 农，而蒙古人则可安心放牧。《明史》中有这样一条资料值得注意：将近 16 世纪 30 年代，俺答汗“豪富而强大，拥兵十余万，兼有大量牲口及其他财产。他开始不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并离开西北边境上的蒙古诸

[1]施拉姆：《甘肃和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第 34 页。

部落而东迁。"[1]在我们看来,俺答汗拥有规模巨大的产业,却离开其他产业而迁到没有被任何人占用的新领土上去,而且他还渴望和平与贸易,这些事情之间无疑是存在着直接联系和依赖关系的。易货贸易问题成为蒙古执政者和中国当局谈判的主要内容。而且,每次谈判失败,蒙古封建主,首先是俺答汗本人,随即恢复对中国边境的武装侵犯。根据《明史》的记载,1571 年,当时蒙古在中国的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在 4 个市场上(大同、西宁、张家口和山西),仅两三周时间蒙古人就售给了官方和私商约 29000 匹马。大家知道,17 世纪初,中国政府单是向俺答汗的继承人每年收购的马就达 52000 匹左右。中国政府还向其他蒙古封建主购买了牲口,也有中国私商购买蒙古牲口的情况。[2]

汗和王公们给喇嘛教寺院的主教们赠送礼品的记载,也证实了蒙古牲畜数量的增长。这些主教们的畜群,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到以千、万头计。[3] 牲畜头数的增加不能不引起对牧地需求的增加。

汗国和公国被执政者人数众多的后裔不断地再分配,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而且每个继承人都要求单独的一块领地作为自己分得的一份遗产。广为流传的一个事实是达延汗把蒙古划分给他的 11 个儿子,而儿子长大了,又把分得的领地划分给自己的继承人。领地被不断地分割,必然造成封地日益缩小,其经济和政治作用不断下降。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在他们的两本《故事》中,都引用过一些资料来证明,16—17 世纪时,汗和王公们自己也为封地被分割而忧虑,并且因 102

---

[1]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151、162 页。专谈俺答汗的贸易政策的,还有一本很有趣的著作,即瑟尔伊斯的《有关 1570—1571 年中蒙议和的 4 个文件》。

译者按:16 世纪 30 年代,俺答汗还未强大起来,而且当时也未向东迁徙。兹拉特金在这里把史实弄错了,他所说的这个情况,显然系指达延汗的孙子卜赤(又称亦克汗,明人称他为小王子)。《明史》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 年)时,"小王子最逞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曰吉囊,曰俺答……"——译者

[2]波科季洛夫:《明朝时期(1368—1634)的东蒙古人史(根据中国史料)》,第 196 - 197 页;戈尔斯基(В. Горский):《满洲王朝的开创和最初的事业》(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е дел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дома),载《俄罗斯在北京的教士团著作集》,(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第 1 卷,圣彼得堡,1852 年版,第 138 - 139 页。

[3]例如,参看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 111 页。

为这个缘故，力求改进继承制度。[1] 但是，因为没有可能改变蒙古人在一般习惯法和成文法中所定下的这个古老传统，于是汗和王公们便寻找新的领土，以此作为制止封地进一步缩小和削弱的手段。

可见，畜群数量的增长和封地的日渐缩小，是16世纪蒙古封建主开始向中国长城外辽阔的西北地区迁移的主要原因，当时这一带是人烟稀少的地区。[2] 在16世纪中期，土默特俺答汗的统治是东蒙古最强大的。因此很自然，正是他首先成了鄂尔多斯、库库淖尔和安多这些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我们已经说过，他把这些土地作为遗产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东蒙古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地区的西部卫拉特封建主那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15—16世纪时，卫拉特领地所占的面积较小，只限于西部沿斋桑泊到哈喇沙尔城[3]东部到杭爱山脉的西坡，而南部，他们的牧区还没有达到吐鲁番、巴里坤和哈密。至于卫拉特领地的北部疆界，我们在史料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确切资料。只能肯定，北部疆界没有越出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与叶尼塞河上游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以及其他民族的领地的南部边界线。

103

我们已经说过，卫拉特与哈萨克历次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卫拉特封建主力求突破通向锡尔河一些城市的障碍，经过这些城市可以到达中亚市场。卫拉特人的牲畜总数量愈多，接近中国市场愈困难，对中亚市场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前面已经说过，1557年，捷金松由于卫拉特人和哈萨克人之间进行着激烈战争，未能继续去北京的旅行。后来，当卫拉特执政者直接同俄国当局发生交往之后，他们也像当时要求中国当局开市一样，坚决地争取在俄国市场上有出售牲口和畜牧业原料以换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8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年，第11期；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9页。

〔2〕据史料记载，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居住在库库淖尔地区的总共只有440户中国农民以及2560户官吏和战时移民。参看施拉姆：《甘肃和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第34页。

〔3〕哈喇沙尔即现在的新疆焉耆地区。——译者

取俄国商品的权利。如果说俄国与卫拉特的关系大体上是和睦发展的,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发展贸易交流对双方都同样有好处。

《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所记载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大致地想象卫拉特封建主的畜群数量。在1643年,咱雅班第达得到杜尔伯特昆都伦乌巴什5000头牲口的赠品。到1645年,他和其他喇嘛都得到了王公们的厚礼:咱雅本人独得1万匹马,其他高等喇嘛各得1000匹和500匹,普通喇嘛各得100匹、60匹和10匹。[1] 1647年,额尔德尼洪台吉赠给咱雅6000只绵羊。1649年,有个领主献给他100头牡牛,1000只绵羊和40匹马。从所引的这些数字可以推想出送礼人本身,即世俗封建主所拥有的牲口数量之大。据史料记载,1649年鄂齐尔图车臣汗去西藏,他准备了1万匹马作为开支之用[2],而这位汗的妻子的畜群则有大小牲口2万多头。[3] 104

有个外国人,17世纪时考察了卫拉特人的生活,写道:"他们有许多马匹、牡牛,还有水牛和绵羊……进行大规模交易:例如,赶着8000匹和1万匹马的马群去中国,还不算他们用来换取银子和各种东西的绵羊和公牛数。他们每年也赶着类似的马群去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把它们全换成商品,如软革、铜锅、黄铜杯、铁和水獭(他们认为水獭皮比其他皮好)。"[4]我们可以把这一描述看做是卫拉特封建主拥有大规模畜牧经济的补充证据。不错,不能不估计到,上述数字不是属于16世纪,而是属于17世纪中期的。不过,无论我们对它做任何修改,封建主大畜牧经济存在的事实本身和他们的畜群数量的增长,仍然是

---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9页。

[2]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12-13页。

[3]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1页。

[4]阿历克赛耶夫(М. П. Алексеев):《17世纪一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的西伯利亚游记》(Неизвест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Сибирь иностранца в XVII века),载《历史档案》(Историиеский архив),莫斯科,1936年版,第1卷,第172页。

毫无疑义的，这些畜群提供了超出领主个人需要很多倍的产品。[1]

畜群数量的增长和领地的不断缩小，促使卫拉特汗和王公们走上争夺领土的道路。16 世纪中期以前，决定东、西蒙古汗和王公们内部相互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些自古保存下来的，可以说是传统的因素，如争夺市场、控制贸易通道等等，而且还有新的因素——
105 争夺牧地，这是日益增多的畜群所必需的，也是为了满足领主们的大批继承人的要求所必需的。

据我们看来，上述这些情况对紧接在准噶尔汗国形成以前的事件，对这些决定汗国诞生的事件，提供了明确的根据。

蒙古史料《黄金史》和《蒙古源流》证明，16 世纪中期，在卫拉特封建主和东蒙古封建主之间，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武装冲突。其中第一次冲突发生在 1552 年，当时，土默特俺答汗出兵进攻卫拉特。[2] 重要的是要指出这样一点：这次武装冲突前，东、西蒙古封建主之间保持了整整 100 年没有发生冲突的和平关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达延汗执政年代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两部分封建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紧密合作，而且卫拉特的汗和王公们像忠实的藩臣对宗主那样，效力于这位全蒙古的执政者。

那么，1552 年的冲突和后来东、西蒙古人之间一系列战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主要是与土地紧张的特殊情况紧密相关的。而土地紧张的情况之所以发生和加剧，则是由于畜群数量增长，且必须满足日益增多的继承者的奢求的结果，这也是卫拉特封建主在反对蒙兀儿斯坦和其他敌人的斗争中战败的结果。

---

[1]帕拉斯对 18 世纪后半叶初伏尔加河一带卡尔梅克人的生活进行了考察，亲自证实：一个游牧者，有 10 头母牛和公牛、8 匹牝马和公马，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参看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 222 页。为了进行比较，我们提一下，根据 1878 年斯洛夫佐夫收集的资料，在哈萨克的科克契塔夫和彼得罗巴甫洛夫两个县的牧区，5 口人之家维持生活需要 5 匹马、6 头牛和 10 只羊。参看斯洛夫佐夫：《旅行笔记》（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部丛刊》（Записки Зап. Сиб. отделения ИРГО），鄂木斯克，1878 年版，第 23 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73 页。

中国史料说,1530 年卫拉特封建主被蒙兀儿斯坦的满速儿汗击败之后,越来越频繁地潜入甘肃和库库淖尔的山谷地带。这不能不引起东蒙古汗的担忧,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上述地区看做是自己的领土了。卫拉特人渴望在这些地区定居,而东蒙古人则不愿让他们进来,这就是和平关系中断,武装斗争再起的主要原因。 106

卫拉特人和东蒙古人之间新的又一次冲突发生在 10 年之后,到了黑狗年(1562),达延汗的曾孙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袭击土尔扈特,强迫他们逃窜,并且跟踪追击到额尔齐斯河河岸。[1] 又过了 12 年,到了蓝狗年(1574),鄂尔多斯执政者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和统治辉特的卫拉特爱辛别英夏之间展开了军事行动,后者遭到失败而被俘。与此同时,布延巴图尔的堂兄弟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2]跟他的儿子一起打败了巴图特鄂托克和绰罗斯鄂托克。可是不久,爱辛别英夏被俘后获释,他便聚集力量攻打布延巴图尔,击溃其部众,并杀死了布延巴图尔本人。[3]

编年史《宝贝念珠》、两本卫拉特《故事》以及俄国档案资料都讲到了东、西蒙古人之间后来的一些武装冲突,上述史料完全一致地证实,东蒙古方面的库库淖尔、鄂尔多斯以及戈壁南侧其他领地的汗和王公们,已经不再参加这些武装冲突了。戈壁南部封建主的地盘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为喀尔喀的汗和王公们所占,在这以前,他们没有参加与卫拉特人的斗争。

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记载,达延汗的曾孙,即格呼森札札赉尔[4](喀尔喀执政王朝的创始人)的孙子阿巴岱(1534—1586)与卫拉特在库勃凯尔格林地区作战,使卫拉特人败北,并强迫他们立其子苏巴

---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74 页。

[2]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即《明史》中的切尽黄台吉,是吉囊之子,吉能的从子。——译者

[3]萨囊彻辰:《黄金史》,第 180 - 181 页,也可参看雷特金:《卫拉特历史资料》,载《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 年,第 13 期。必须指出,《黄金史》的作者在描述 1552 年事件时,第一次说出卫拉特辉特兀鲁思的名称;而到 1562 年,说出了土尔扈特兀鲁思的名称。

[4]格呼森札,明代又译格列山只(Geresenje),为过延汗庶幼子,被分封到喀尔喀万户右翼。这喀尔喀万户右翼的主体由元代五投下之一的札剌亦儿(又写作札赉尔:Jalayir)部的贵族后裔属民组成,故格呼森札亦被称作札赉尔珲台吉,其后裔统治的北喀尔喀成为喀尔喀主力。——译者

哈台为执政者。这一事件的准确日期不太清楚，根据波兹德涅耶夫提供的资料，它不可能晚于1577年。[1] 在这些年代中，反对卫拉特的还有另一个喀尔喀执政者——赛因赉瑚尔汗（札萨克图汗位的奠基人），
107 他在额敏河的出口处与卫拉特作战，但没有取胜。[2] 1586年阿巴岱去世，卫拉特人趁此举行起义，杀死强加于他们的执政者苏巴哈台，恢复了独立。

这里列举的这些冲突的特点是，每次反对卫拉特的东蒙古封建主，他们的领地都直接同某一个卫拉特执政者的牧区相连。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局部的边境冲突。参与冲突的多半是某一个东蒙古的封建领地和一个卫拉特的封建领地。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卫拉特及其东蒙古近邻游牧的边境地带，而且在整个蒙古土地上也经常发生。自然，这些局部的冲突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外是侵占邻近领主的牧地、牲口和牧奴。这段时期内，整个蒙古的内讧十分频繁，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类局部内讧，而且也只追求这类局部的、有限的目的。东蒙古、卫拉特、卡尔梅克以及俄国史料的无数记载，使人对于这种情况毫无产生怀疑的余地。但是，当我们研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卫拉特人和东蒙古人之间这一连串的冲突时，发现其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倾向——东蒙古封建主极力想把卫拉特的牧区尽可能地向西挤得远些，挤出阿尔泰山一带。根据我们这些史料的记载，16世纪70—80年代时，卫拉特牧区的东侧，紧挨着东蒙古领地的是辉特的牧区，分布在辉特后面的则是土尔扈特，再远一些是绰罗斯、杜尔伯特与和硕特。[3] 后来，由于喀尔
108 喀与卫拉特的关系日趋紧张，又由于一连串的战争，卫拉特牧区分布的状况变动相当频繁。辉特执政者最早受到来自东部的侵犯，随后轮到了土尔扈特和绰罗斯。史料从来没有提到过东蒙古封建主侵犯杜尔伯

---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104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219页；也可参看柯津：《关于1587年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巴什洪台吉的卫拉特史诗》（Ойра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 о разгроме халхаского Шолой-У 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в 1587 г.），载《苏联东方学》（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47年版，第4卷，第92页；雷特金：《卫拉特历史资料》，载《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年，第8期。

〔3〕柯津：《关于1587年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八什洪台吉的卫拉特史诗》，第99页。

特与和硕特的情况，因为在16世纪70—80年代，他们的牧区分布在卫拉特西侧。同样，除了与卫拉特直接接壤的邻居以外，史料也从来没有提到有其他不接邻的东蒙古封建主参加这类侵犯活动。所有这些一再证实，当时卫拉特与东蒙古封建主之间的冲突，只具有很有限的、纯粹局部的意义，而且这场斗争的优势通常是在喀尔喀汗和王公们这一边。

同时，在西部，卫拉特的处境也不断恶化。在这里继续反对它的，一方面是吐鲁番的执政者，另一方面是哈萨克斯坦的汗和苏丹们。分散得七零八落的卫拉特封建领地无法同时在东边和西边进行斗争，因此他们遭到了多次失败。

1588年，吐鲁番执政者使卫拉特又一次遭到失败，迫使他们向东部南山和西宁城一带逃窜。同哈萨克诸汗的斗争也使卫拉特封建主节节败退。1595年初，哈萨克汗捷维克力的使者库尔马赫默德在莫斯科对使团成员乌拉兹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位使者说："现在你伯伯捷维克力王子当了哈萨克玉兹的君主，而指派他的兄弟沙赫马赫默德王子去管辖卡尔梅克人"[1]。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1595年3月赐给捷维克力汗的关于接受他入俄国国籍的谕旨中，也谈到了哈萨克对卫拉特的统治。谕旨中说："你派遣使臣库尔马赫默德携带信件来晋谒我们沙皇陛下，信中写到……你成了驾驭哈萨克和卡尔梅克两个玉兹的君主。我们沙皇陛下愿……关照你，同意接纳你们哈萨克和卡尔梅克二玉兹，使受皇恩庇护……并让你捷维克力汗和你的兄弟分别管理这两个玉兹……领取皇赏，并务须坚决遵旨行事。"[2]

109

很难说，这些证据的确凿程度和反映历史真实性的程度如何。因为在我们所知悉的任何一部蒙古、中国、俄国或者突厥文的史料中，都没有发现任何类似记载，足资证实哈萨克使者所递的申请书。这份申请书是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的谕旨中被转述出来的，它提到了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吉尔吉斯—哈萨克卷宗，1595年，第1号，第2卷，第8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吉尔吉斯—哈萨克卷宗，1595年，第2号，第1卷，第8张。

卫拉特从属于哈萨克汗的政权。无论如何,应当坚决否定全部卫拉特执政者都承认这个政权的推测。这里所说的只可能是16世纪90年代初,某一个或若干个卫拉特公国,其牧地与哈萨克接壤,由于战败而被迫一度受哈萨克统治,并可能在某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被迫效劳于哈萨克汗。于是,这些事件既反映在库尔马赫默德的申请书中,也反映在俄国沙皇的谕旨中了。暂时臣服于哈萨克的,可能是土尔扈特或杜尔伯特领地的部分居民。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在文献中和俄国史料中知名的喀尔喀执政者阿勒坦汗[1]对卫拉特的延续整整100年的长期武装斗争。这场斗争与前面列举的16世纪后半叶的武装冲突有所区别,它越出了局部边境事件的范围,而变成了大规模的战争。所有卫拉特的领地都渐渐地被卷入了这场战争。

阿勒坦汗国位于喀尔喀西北角的库苏古泊和乌布沙泊之间。最初它仅仅是札萨克图汗辽阔领地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鄂托克。它北接乌梁海人的领地,南连其他札萨克图执政者的牧区,西邻各卫拉特公国,东界土谢图汗的各鄂托克。但是,后来阿勒坦各汗在划给他们的鄂托克内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征服了居住在南西伯利亚毗邻地区的许多零星部落群和民族,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进贡者。阿勒坦各汗善于利用直接与俄国邻接这一地形的好处,在东蒙古执政者中,他们首先跟俄国进行了各方面的交流。他们开始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而很少考虑自己的宗主——札萨克图汗的利益和愿望。阿勒坦汗国的军事、政治力量变得相当强大,所以它在17世纪大约有75年的时间,在南西伯利亚的历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

110

[1]16世纪后半叶,达延汗后裔中,喀尔喀的格呼森札7子中称汗的万户逐渐形成三大集团:即右翼的扎萨克图汗部和左翼的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这里的阿勒坦汗称号是沙俄对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中三代汗的称呼。扎萨克图汗部所属的硕垒乌巴什珲台吉及其子俄木布额尔德尼与罗卜藏等先后为三代阿勒坦汗。第一代阿勒坦汗以乌布苏湖为中心,以和托辉特和兀良哈人为控制核心,领地东起色楞格河,西达布里亚特与阿尔泰兀良哈地区。由于他当时控制了卫拉特大片领土及辉特等卫拉特人,所以也有人认为第一代阿勒坦汗是一位卫拉特蒙古汗。其实他还应该是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属部。——译者

第一任阿勒坦汗是格呼森札札赉尔的曾孙和前面提到过的赛因赉瑚尔汗的堂弟硕垒乌巴什洪台吉。他就是喀尔喀与卫拉特战争的发起人。有两部卫拉特史料叙述到这场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一部是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另一部是一位佚名作者的《乌巴什洪台吉及其与卫拉特的战争史》。

这两部史料中说到,硕垒乌巴什洪台吉在猪年(1587年)同乌梁海执政者赛英马吉克联合,从杭爱山脉一带出发,率兵8万,向卫拉特进军,其中65000人是他自己的,15000人是乌梁海执政者的。联盟者率领这些军队侵入了卫拉特领地的边境,他们所走的路线我们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他们越过了纳尔哈乌海尔山,来到纳尔哈拉布洛克地区,从这里分别派出侦察员,任务是查明卫拉特人的所在地。结果,他们没有找到敌人就回来了。于是,硕垒乌巴什洪台吉召集了有"上、中、下层"代表,大概就是各级军事首领参加的会议[1],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硕垒说:"在哪里能找到他们的牧区呢?他们可能在北边游牧,也可能在南边,他们的游牧区变迁不定。"赛英马吉克反对说:"毕竟他们经常总在某一边游牧。"

赛英马吉克带领一队侦察员(200人),同他们一起登上高山,并说:"朝这个方向走到额尔齐斯河,顺流前进。当你们走到高地的一片黑色森林和低处的黄色芦苇中间时,寻找一条叫做马尼的小河,在这里渡过河,按河的顺、逆流方向寻找卫拉特人。"[2]过了几天,侦察员们押了一个卫拉特男孩回来。孩子是在额敏河口被抓住的,他自称是和硕特拜巴噶斯汗的臣民。审问时,他向硕垒乌巴什洪台吉供称,离硕垒的军队最近的是土尔扈特王公赛英先戴加的牧地。在这位王公的牧地后面——额尔齐斯河发源地一带,游牧着辉特王公赛英夏(爱辛别英夏的儿子)。再远一些是绰罗斯哈喇忽喇的领地以及游牧在纳林河发源处的杜尔伯特赛英泰白奈的领地,而最后是和硕特拜巴噶斯汗的领地。

111

[1]萨囊彻辰:《黄金史》,第199页。

[2]萨囊彻辰:《黄金史》,第199页。

所有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可以看出硕垒乌巴什和赛英马吉克是从乌梁海方面侵入卫拉特境内的;第二,入侵时,所有卫拉特领地全处在额尔齐斯河左岸的低洼地带,牧地直达伊塞克湖;第三,1552 年沿昆格河游牧的辉特,1587 年却出现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第四,1587 年,和硕特的牧区占有塔尔巴哈台西部额敏河与伊犁河沿岸地区。

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在这个时期里,卫拉特拥有大量的独立领地。每个领地实际上是不从属于任何人的完全独立的"国家"。但是,频繁的战争和伴随而来的政治、经济上的长期紧张状况,使定期的领主代表会议("丘尔干"或叫"呼拉尔")成为必要,并且产生了设立"丘尔干·达尔加"(领导者,代表会议主席)的制度。这个领导者的任务,在于使领主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这个设置不行使任何执行权,担任主席职务的人也不过是个被选出来的"协调关系者"。雷特金把
112 他称作"盟主"。在 1587 年,盟主是和硕特的执政者拜巴噶斯汗。

丧失独立的威胁变成喀尔喀硕垒乌巴什的臣民和乌梁海赛英马吉克的臣民的威胁,这要求卫拉特王公们动员起各种力量。他们派出 5 万军队,反击东蒙古 8 万人的进攻。这 5 万人的军队中有和硕特的 3 万人,杜尔伯特的 8 千人,绰罗斯的 6000 人,辉特的 4000 人以及土尔扈特的 2000 人。可见,出兵最多的是当时最强大的和硕特拜巴噶斯汗。他身边经常备有一支 16000 人的队伍,而且在卫拉特执政者中,他被认为是在宗教和管理方面最有影响和最具权威的人。

随着硕垒乌巴什洪台吉的进军而引起的各种事件到底是如何展开的呢?史料中对这些事件没有充分地阐明,其中日期和史实错乱不堪,往往用虚构的情节代替了客观的叙述。据雷特金记载,他所译的《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的原文中,有一条不是巴图尔乌巴什丘缅所写,而是另外某个人写的注释:"喀尔喀蒙古人的汗乌巴什洪台吉,希望俘获卫拉特人,并消灭他们的管理机构和宗教,于是协同乌梁海的赛英马吉克率大军来到额敏涅尔河(额敏河吗?——兹拉特金)。卫拉特诺颜们以拜巴噶斯汗为首,召集了勇猛的战士投入战斗。一个

名叫赛英谢琴柯伊的勇士(曼海伊的儿子,土尔扈特人),在额尔齐斯河岸上横渡马尼河时,杀死了蒙古汗乌巴什洪台吉。"[1]

雷特金证实,他在伏尔加河的两个卡尔梅克兀鲁思中(在和硕特与小杜尔伯特的兀鲁思中),听到过一个口头传说。根据这个传说,乌巴什洪台吉的儿子木呼儿马吉克长大成人以后,决心要向卫拉特人报杀父之仇。他出动大军进攻卫拉特,打了胜仗,并想要消灭卫拉特这个名字和他们的独立管理机构。可是,由于辉特王公赛英夏才智出众,才防止了这场危机。卫拉特人俘虏了木呼儿马吉克,迫使他发誓遵守和约。[2] 在这个口头传说中,历史的真相和虚构的情节混杂在一起,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个传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卫拉特领主与喀尔喀领主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的基础,除了其他情况外,就是争夺牧地。 113

雷特金认为,1587年的战争是卫拉特历史上的转折点。按他的意见,这次战争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卫拉特军队威力一落千丈的时期已经过去,揭开的是他们历史生涯中崭新的一页,开始恢复他们昔日的光荣。[3] 在这一时期之前,东蒙古人也像卫拉特人一样,经受着帝国覆灭的同样后果。无论东蒙古人那里的,还是卫拉特人这里的领主们都没有臣服于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卫拉特执政者"对卫拉特联盟中占首席地位的绰罗斯家族(也先死后。——兹拉特金)并未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只顾维护自身的利益……出现了许许多多领主。他们独立自主地在自己的兀鲁思里发号施令,彼此争夺兀鲁思,增强自己的力量,然后又在最强大的兀鲁思面前倒下去。只有在牵涉到所有卫拉特部的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9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年,第12期。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82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年,第13期。

[3]他写道:"从那时起,卫拉特全神贯注于恢复与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力量。1587年是他们的名望,他们的新憧憬、新生活开始的一年。"(《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年,第7期)

共同事业时，他们才联合在一起”[1]。共同的危机一经过去，内部的斗争又死灰复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卫拉特人之间进行斗争的有两个主要集团：一个以和硕特的执政者拜巴噶斯为首，另一个以绰罗斯执政者哈喇忽喇为首。后者“希望恢复绰罗斯家族从前的权势，并成为卫拉特的盟主。他靠损害许多弱小领主的利益，拼命扩大自己的力量，一面像‘秃尾灰狼黎明时侵袭绵羊’一样侵犯小领主，一面又像‘饿鹫’一样观察强大部主的动静”[2]。

114

柯津对卫拉特领地的一般情况另有想法。他认为1587年的战争证明：“拥有5万军队——只是一些王公卫队——的强大卫拉特联盟，其对手却是互不配合、彼此敌视的喀尔喀王公们。”[3]虽然，大家知道，柯津还有一些与上述说法自相矛盾的评述。例如，他写过：“卫拉特首领们所采取的军事措施是出色的，但归根结底是没有成效的，反而使蒙古族、中国人和哈萨克人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因而受到来自南部、东部和西部的三面夹攻。结果，到了17世纪初，就处于战略上和对外政策上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企图找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一方面，向西方推进；另一方面，同蒙古族达成和平协议。”[4]

若干史料所记载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雷特金对于将近16世纪末期卫拉特社会所形成的内、外政治形势的评述是正确的。事实上，游牧和定居的强大封建汗国和公国，极力堵住卫拉特封建主通往贸易市场的道路，力求霸占他们的领土和财富。而卫拉特封建主，正如我们所见，被这些汗国和公国团团围住，在16世纪后半叶，军事上屡遭失败，艰难地维护着自己的独立和封建特权。他们在一个敌人的进逼下撤退，又遭到另一个敌人的袭击。由于迫切需要贸易市场，而中国市场又被严密隔绝，所以卫拉特汗和王公们力求突破进入中亚市场的障碍，可是却遇到了蒙兀儿斯坦和哈萨克汗与苏丹的反击。由于与日俱增的

---

〔1〕他写道：“从那时起，卫拉特全神贯注于恢复与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力量。1587年是他们的名望，他们的新憧憬、新生活开始的一年。”（《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年，第7期）

〔2〕《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年，第8期。

〔3〕柯津：《关于1587年击溃喀尔喀的硕垒乌八什洪台吉的卫拉特史诗》，第91页。

〔4〕柯津：《江格尔传》，第5页。

内部需要，更由于战场上的多次失败，牧场越来越不够用，使情况更加严重。

卫拉特封建社会情况危急。只有克服分散和隔绝的状况，把零散 115
的卫拉特领地统一成一个有相当巩固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汗国，才可能找到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建立统一的卫拉特国家成了客观的需要。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卫拉特封建主就没有希望捍卫自己领地的独立自主并扩大牧地。没有这些，汗和王公们的经济就不能发展，而他们成批的子孙也就不能分到期望的遗产。因此，这种客观时势便促成了一些活动家的出现，他们能够领导为克服危机而进行的斗争。其中之一就是绰罗斯公国的执政者哈喇忽喇，他在统一卫拉特领地和建立准噶尔汗国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至于扩大牧地的出路，也终于在许多领主和属于他们的卫拉特居民向新地区迁移时找到了，占领这些地区只需要担负最小的损失和牺牲。对有些王公来说，伏尔加河下游是这样的地区，而对另一些王公来说，库库淖尔草原则是这样的地区。[1]

不过，只是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过程结束之后，上述任务才真正得到了解决。

史料在说明16世纪末卫拉特社会的内部历史事件方面相当贫乏。但是，从这些史料所记载的内容中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领主之间的内部斗争日益加剧，而且企图寻求和解途径的一切希望成为泡影。例如， 116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写道，卫拉特王公们开过多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们发誓保证，“不仅他们自己，而且他们的后代将一辈传一辈、一代传一代

---

[1]18和19世纪的研究者也指出过卫拉特社会所经受的危机的某些因素。米勒和费舍尔就已经指出过卫拉特人游牧用地不足的情况。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帕尔莫夫、鲍戈亚夫连斯基、柯津等人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对这一情况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很不充分，而且大多简直是错误的。他们中大部分人企图只用内部原因或者只用外部原因来解释卫拉特土地紧张的情况。甚至像科特维奇这样深思熟虑的严肃研究者，也倾向于外来压力起主要作用的思想。科特维奇真实地指出，土尔扈特人从准噶尔迁到伏尔加河的原因比通常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与此同时，他写道：“作者（指帕尔莫夫——兹拉特金）所真实指出的土地紧张的情况，不仅由于内部的原因，且首先而是由于外部压力所引起。”科特维奇：“评帕尔莫夫的书《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чгу Н. Пальмова《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алм ыц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время е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пределах России》），载《东方》杂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第3册。

地互不损害”[1]。但是,这些誓言所作出的保证遭到破坏也像许诺时一样轻而易举。

史料的记载可以使我们肯定,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卫拉特封建主之间内讧的基础,是争夺各自在封建地租总额中的份额,争夺剥削卫拉特农民所得的其他封建收入的份额。封建收入减少的倾向是上述危机的结果,而封建收入减少这种倾向又造成争夺进一步加剧的必然后果。封建内讧的每个参加者,都竭力靠损害其他封建主的利益,通过挤走他们或者甚至完全消灭他们的途径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2.2 准噶尔汗国的形成

在西伯利亚编年史中记载有从 16 世纪最后 30 几年开始的有关西蒙古历史的重要资料。

我们发现,俄国史料中最早提到卫拉特的是斯特罗甘诺夫的编年史,它叙述了沙皇伊凡四世在 1574 年 5 月 30 日致斯特罗甘诺夫一家的命令。命令中说:“当布哈拉、卡尔梅克、喀山汗国和其他地区的商人,携带商品来要塞找雅科夫和葛里戈里时,允许他们免税自由交易。”[2]也是这部编年史谈到 1582 年奥斯恰克人和沃古里奇人进攻古楚汗[3]的情况,他“不知往哪里躲藏,就向卡尔梅克的兀鲁思逃去。途中见到那里有马群,就赶着走了……卡尔梅克人发现之后,跟踪追击,夺回马群。古楚汗险些被擒。他从那里逃到了诺盖”[4]。

117

另一部叶西波夫编年史在简短描述西伯利亚时,记载说,在图拉河、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沿岸一带“住有许多民族: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蒙古族人……鞑靼人信奉伊斯兰教;卡尔梅克人有无宗教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见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 70 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 年,第 11 期。

[2]《西伯利亚编年史》,圣彼得堡,1907 年版,第 54 页。

[3]古楚汗是 1563 年到 16 世纪末西伯利亚汗国的汗。1598 年古楚汗被沙俄远征军司令官马萨尔斯基打败,逃往诺盖人处,不久被杀。——译者

[4]《西伯利亚编年史》,第 80 页。

信仰，不太清楚，因为没能找到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所以无法了解”[1]。

叶西波夫和列密佐夫的编年史中都有关于卫拉特的资料。我们从列密佐夫的书中得知，古楚汗时期，在伊希姆河口有一座库拉勒城。它是“防御卡尔梅克人进攻的坚不可摧的城堡，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没有比它更坚固的了”[2]。

据这两位编年史编纂家证实，卫拉特人与古楚王国崩溃的有关事件有一些牵涉。列密佐夫的编年史记载，1591 年古楚汗“为了逃避突然来临的俄国军队，带着一些鞑靼人，连同妻妾、子女逃奔到卡尔梅克边境的伊希姆、诺尔伊希姆、奥什、卡麦什洛夫……河的上游离塔拉城不远处”。塔拉将军乌萨尔斯基的后备军在这里打败了古楚汗。此后古楚汗就“带着少量部众逃窜……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斋桑湖，并偷走卡尔梅克人的大量马匹……卡尔梅克人跟踪追击，在库尔加利钦湖附近的诺尔伊希姆河追上了古楚汗，杀死许多古楚人，夺回了马群”[3]。

这就是西伯利亚几部编年史所记载的16世纪末期有关卫拉特的资料。它们证明，第一批有关卫拉特的资料进入俄国，远在俄国人同西蒙古居民建立直接关系之前。这些资料可能来源于“古楚人”，也可能来源于诺盖人和哈萨克人，他们从前曾经与俄国建立过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西伯利亚编年史的记载同时证明，在 16 世纪 90 年代，卫拉特一些领地的边界曾到达伊希姆河和鄂木河上游，离 1594 年建立的俄国塔拉城很近。也证明了在这个时期以前，卫拉特的牧区除了西蒙古本土

118

---

[1]《西伯利亚编年史》，第 111 页。究竟哪一部西伯利亚编年史是最早的，尤其是斯特罗甘诺夫编年史是什么时候编纂的，对这些问题都有争论。参看安德列耶夫：《西伯利亚史料学纲要》。

[2]《西伯利亚编年史》，第 342 页。

[3]《西伯利亚编年史》，第 352 页。据乌法的纳戈夫（M. Нагов）将军 1601 年（3 月 9 日以后）的复文证实，古楚汗的儿子们确信他们的父亲“被诱入卡尔梅克后，遭到了杀害”。参看《14 世纪后半期到 17 世纪中期有关事件的文据》（Акты, касающиеся событий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V в. до половины XVII в.），载《俄国历史丛书》（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第 2 卷，圣彼得堡，1875 年版，第 283 页。

外，还包括额尔齐斯河左岸从斋桑湖到现在的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线[1]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同时占有着额尔齐斯河中游左右两岸的草原。很可能，这是卫拉特人来到西西伯利亚草原的最早的文件证据，可能它反映的已经是属于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其他领主那5万户家庭从准噶尔开始的迁移。大约过了40年他们才最后停留在伏尔加河下游，在那里建立了臣服于俄国沙皇的卡尔梅克汗国。西伯利亚编年史作家所提到的库拉勒要塞，是古楚汗国为防御卫拉特人而设的。看来，这应该理解为，卫拉特的王公们在伊希姆河上游没有固定的游牧站和游牧区，只是有时袭击从属于古楚汗国的一些地区。值得注意的还有，卫拉特新牧区与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各部落、各民族所居住的蒙古基本地区是隔开的，这在正常的条件下恐怕是不可能的。

本身的处境迫使卫拉特领主们向西北迁移。他们北去的路为阿勒坦汗的领地所堵塞，东去的路为东蒙古领主们阻挡，西去的道路又为哈萨克封建主截断，后者力求把卫拉特人全部排挤出谢米列契以及与谢
119 米列契相连的地区。只剩下一个西北方向对卫拉特移民来说多少还敞开着。于是他们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去，首先开发了与现在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帕甫洛达尔和阿克摩林斯克等城市连接的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几乎荒无人烟。而且在我们所描述的这段时期里，总共只有几百口人游牧在当时整个西北西伯利亚这块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里到19世纪末则有200万人口）[2]。

很有意思的是，哈萨克封建主进攻卫拉特，看来也是由于牧区不足，他们指望靠侵占卫拉特汗和王公的领地来补足自己的牧地。16世纪末的形势对哈萨克人有利。他们统一在捷维克力汗的政权下，在反对他们当时主要敌人——蒙兀儿斯坦和布哈拉诸汗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巩固了他们在锡尔河谷地的地位，占领了塔什干和土尔克斯

---

〔1〕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和诺沃西比尔斯克城之间。

〔2〕卡达纳耶夫（Г. Е. Катанаев）：《17和18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和中国北部》（Киргизские степи，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в XVII и XVII столетиях），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部丛刊》，1893年，第14册，第1期，第45－46页。

坦。此外,他们还击溃了几个卫拉特公国,大概还迫使这些卫拉特公国臣服于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卫拉特人驱逐出额尔齐斯河谷地就成了哈萨克执政者的首要任务。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昔班尼汗的同时代人,《塔里赫》的作者穆罕默德沙拉思所谈到的中亚和中央亚细亚所有游牧民族在16世纪都感到土地紧张的资料。穆罕默德沙拉思写道:"和卓阿里巴哈杜尔给汗的报告说,蒙古族人畜大增,他们目前在喀什噶尔草原颇感拥挤,所以如果汗允许的话,他将同巴巴苏丹一起去打蒙兀儿斯坦……不久,和卓阿里巴哈杜尔死了,这个重要的事业就落到了喇失德汗身上。在这位汗的正确管理之下,人民的生活美好,财富剧增,以致喀什噶尔草原和山地的饲料不够饲养牲畜。"[1]看来,哈萨克、乌兹别克、蒙古(其中包括卫拉特)的封建主都同样感到需要扩大牧地,这格外刺激他们进行武装斗争。

至于卫拉特领主,他们在16世纪最后一些年中的处境,正如我们所见,是极端困难的。卫拉特社会的内部矛盾极为尖锐。史料所记载的许多事实,清晰地描绘出卫拉特王公们的利益相互矛盾冲突的情景和他们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攫取别人的兀鲁思,即属于其他领主的阿拉特牧户、牲畜和牧场;另一方面,保卫继承来的和"自己获得"的兀鲁思免受其他汗和王公的侵袭。 120

举几个例子。前面提到过的拜巴噶斯汗的兄弟顾实汗对一个土尔扈特王公说:"如果说有谁会削弱你,那就是你哥哥,你将总共只剩下五六个阿拉特家庭。"辉特的苏尔丹台什(赛英夏的儿子)曾抱怨王公们破坏誓言:"我们没有关注未来……我们卫拉特人只能低下自己的头(即屈服于异族人的统治。——兹拉特金),还有什么办法。"[2]拜巴噶斯汗的两个儿子鄂齐尔图车臣汗和阿巴赖,为了瓜分父亲的遗产,为了牧场、牲畜和阿拉特,两兄弟进行了多年的斗争,这个事实流传很广。有一个名叫楚盖尔的和硕特王公侵占了许多异族的兀鲁思。加班

[1]《文献资料中哈萨克斯坦的过去》(Прошло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источниках и материалах),第1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8世纪),阿拉木图—莫斯科,1935年版,第10页。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7、18页。

沙拉勃写道："在内乱时期，许多诺盖人丧失了自己的兀鲁思。"[1]鄂齐尔图车臣汗注意到卫拉特社会问题的情况时，对前途设想的非常悲观。他预言，所有卫拉特领地将受异国人的统治，辉特将屈服于伊斯兰教执政者，和硕特将屈服于中国和西藏的统治，准噶尔（绰罗斯）将从属于中国，土尔扈特将从属于俄国等等。[2]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在他的《故事》中也援引了许多类似性质的史实。[3]

121 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一下王公们内部矛盾冲突的唯一机构就是丘尔干，它根据丘尔干主持人的倡议偶尔举行聚会，16—17 世纪之交，丘尔干主持人是和硕特汗拜巴噶斯[4]。史料证实，这些汗和王公们的丘尔干（或叫呼拉尔）是封建民主和封建自治的一种传统形式，它绝对不让平民代表参加。这种丘尔干在所叙述的这段时期的蒙古社会制度方面起过显著的作用。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引用了一次这种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严禁向异族的，尤其是喀尔喀的王公求援来解决内部争端和冲突；严禁以强迫干粗活来屈辱卫拉特贵族人士的尊严，"哪怕他被削弱后成了臣民"；严禁把他们给出嫁的女儿当嫁妆出卖和杀死等等。这个决议中说："其他一切，还像以前蒙古盟中所规定的那样去做。"[5]与会者都发誓保证执行它，以加强决议的效力。这部史料中没有直接谈到通过这项决议的丘尔干召开的时间，不过根据雷特金的计算，是在 1616 或 1617 年。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引有前几次代表会议的决定。1640 年在所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 22 页。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 16 页。

〔3〕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 69、71、77 页和结论；《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 年第 47、49、50 期，1860 年第 11、12 期。

〔4〕雷特金在引证《蒙古和土耳其斯坦的宛人和匈奴人史》这本我们所不知道的书时说：卫拉特盟的"盟主"的职位最初交给了拜巴噶斯的祖父，然后传给他的父亲，其后才传给拜巴噶斯本人。他祖父之前，担任卫拉特丘尔干的盟主是谁，不清楚。可能，当时这个职位在绰罗斯家族代表的手里。参看《阿斯特拉罕省报》，1861 年，第 16 期。

〔5〕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 70 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 年，第 11 期。

谓全蒙古汗和王公的准噶尔代表大会上，丘尔干的思想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关于这次大会，放到后面再谈。

我们所了解的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所有丘尔干的决议，都反映了当时危机形势的特点。这些决议号召汗和王公们要团结一致，内部要友好合作并相互帮助。但是，这些丘尔干，作为唯一能讨论卫拉特封 122
建社会生存的迫切问题的形式，并没有能比较显著地影响事件的进程，特别是在内部矛盾和内讧加剧的时期，这时，丘尔干的决议往往失去了任何强制力，谁都不执行它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丘尔干首领的实力才能强迫地方王公听从。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丘尔干的主持人拜巴噶斯汗曾具有这种实力，他拥有的军队数量足以强制各公国执政者服从他的意志。可是，我们不了解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能使他们听从他的管理。史料中也没有什么资料证明他想用武力来对付丘尔干决议的破坏者。绰罗斯的哈喇忽喇却执行了不同的政策。他拥有的军队较少，但是他却坚持不懈地逐步巩固自己的权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强迫邻近卫拉特领地的执政者屈服。

遗憾的是，史料中记载拜巴噶斯汗和哈喇忽喇之间斗争的资料，寥寥无几。我们只知道，这场斗争在16和17世纪之交的卫拉特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加班沙拉勃在他的《故事》中隐晦地提到过卫拉特王公们反对哈喇忽喇的某种表现。他写道："许多卫拉特诺颜企图抓住不让他们安宁的哈喇忽喇。但是达赖台什劝阻他们说，一岁的骆驼崽不可能驮起成熟的大骆驼的重荷。"[1]我们既不清楚反对哈喇忽喇这种表现的日期，也不清楚它的细节。但是，其中有杜尔伯特家族的首领达赖台什参加，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它发生在16世纪90年代，当时杜尔伯特人还在自己惯常的地区游牧，或者才刚刚开始向西北迁移。达赖台什承认哈喇忽喇与日俱增的威力，称他是成熟而精壮的骆驼，而与他相对照，把反对他的王公们比作力量微弱的 123
骆驼崽。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2页。

根据《咱雅班第达传》作者的记载，拜巴噶斯汗死于1640年，他当时已经是个年迈的老人。到这时，卫拉特社会已经不是受一个，而是受两个平等的丘尔干领导人所管辖：一个是和硕特拜巴噶斯汗，他死后则是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车臣汗；另一个是绰罗斯的哈喇忽喇，他死后这个职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巴图尔浑台吉。不过，到这时，卫拉特联盟这个管理卫拉特社会事务的机构已经开始丧失它的作用，因为哈喇忽喇，特别是巴图尔浑台吉越来越变成独揽大权的执政者，变成准噶尔的实际大汗。

卫拉特汗和王公们初次与俄国接触的那些年代，在准噶尔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外政治形势。

俄国跟卫拉特直接联系的起因，与俄国军事人员反对“古楚人”的最后几次战役紧密相关。我们已经引用过西伯利亚各编年史提到的古楚汗和古楚人与卫拉特人相互关系的资料。俄国档案资料也证明，卫拉特王公忽而跟古楚汗及其后代发生冲突而厮杀一场，忽而又跟他们携手抗击共同敌人。例如，我们从一份致1597年元月1日由莫斯科派去的塔拉将军叶列茨基的公文中得知，1596年6月从塔拉城派了两个人去草原侦察。一个月之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在伊塞克湖地区，卫拉特人和“古楚人”之间发生了战斗。[1]

1598年，塔拉新任将军沃叶科夫收到侦察员的一份报告，其中说到500名卡尔梅克人从南方游牧到了鄂毕河畔。[2] 从此，卫拉特人渐渐变成了几年不迁移的定居民族，他们随季节和军事政治的总局势而更换游牧站的地点，但总没有离开西西伯利亚。无怪乎列密佐夫的地图把鄂木斯克附近标为“卡尔梅克草原地区”。卫拉特王公在紧临俄国领地的情况下，有一个时期表现得安分守己，避免与居民和莫斯科当局发生冲突。

124

塔拉将军加加林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于1607年元月派了一个外交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11册，第220卷，第21－26张。

[2]卡达纳耶夫：《17—18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及中国北部》，第57页。

代表团到在不远处游牧的卫拉特王公那里，建议他们转入俄国国籍。这个代表团为俄国、卫拉特建立正式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同年6月，这个外交代表团在一名卫拉特使者的陪同下返回俄国。照这位卫拉特使者的话说，他代表了5个主要执政者和45个从属于他们的执政者。据他说，50个执政者似乎总共有12万臣民。卫拉特使者代表自己的执政者请求，“不要让他们去打仗，准他们处于至高无上的沙皇的庇护之下，沿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咸水湖一带游牧。并希望在收税时，只征收他们卡尔梅克人的马匹、骆驼或母牛。对此他们叩首拜求。”[1]

从代表团的材料中可见，这个卫拉特领主集团是由杜尔伯特的达赖和土尔扈特的卓里克图所领导的，而后者的兄弟和鄂尔勒克在3年前，即1604年，就和他们分离了，并带着自己的儿子基拉山去额尔齐斯河上游独立游牧。

塔拉将军同意满足卫拉特执政者的各项请求。这事得到了莫斯科当局的赞同。莫斯科当局还让加加林再派一个代表团去卫拉特谈判。这个代表团已经是代表俄国沙皇的了，它应向卫拉特人转达“我沙皇的恩遇，并转达我们沙皇陛下赏识他们，按他们的请求准予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及他们期望的其他地方游牧，将他们置于我们沙皇陛下的庇护之下，使他们免遭哈萨克玉兹、诺盖人和其他一切敌人的侵袭……而实物税，只向他们征收马匹、骆驼或其他东西，以不使他们贫困为原则。”[2]

1607年9月21日，达赖二次派代表团来到塔拉，重申了王公们的请求，要求允许他们“沿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咸水湖一带，以及在卡麦什洛夫河一带游牧。并保护他们免遭阿勒坦汗和哈萨克玉兹的侵袭。”[3]随同代表团来了一个卫拉特商队，它赶着550匹马来出售，换取衣服、金钱和书写用纸。塔拉当局免去了这笔交易的税收，把使者遣

125

---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пи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年版，第22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第22－23页。

[3]《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第24页。

送莫斯科去觐见沙皇。

1608年元月，塔拉将军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儿子带着若干兀鲁思游牧来到了塔拉地区，游牧在离城约需3天路程的地方，还说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又派遣代表来将军处，要求允许他沿鄂木河游牧，而其他台什则继续在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卫拉特台什们照旧请求"保护他们免遭阿勒坦汗的侵袭，派军事人员帮助他们防御阿勒坦汗。希望在离塔拉城5天路程的鄂木河上修建一座城堡，使他们能安心放牧，不怕阿勒坦汗的侵犯。而为了使这座城堡不受阿勒坦汗的胁迫，他们将和我们一起保卫它"。此外，台什们同意交付牲畜实物税，"但不要向他们课收貂皮和狐皮，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种野兽，他们只猎取食用的野兽"。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莫斯科政府又令塔拉将军向达赖和其他卫拉特执政者，其中包括和鄂尔勒克，派出新外交代表团，任务是说服台什们亲自来莫斯科谒见俄国沙皇，沙皇将担保他们不受阿勒坦汗、诺盖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敌人的袭击。应当指出，莫斯科政府对卫拉特执政者为与俄国沙皇谈判可能来访这件事，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趣。在致塔拉将军的文中谈到："如果他们不相信，不肯来谒见皇上陛下，可给他们一些人质以换取信任。给多少人合适，可与他们直言，要使他们毫无顾虑地来。对他们应和蔼有礼，使之对我们的人毫无好斗的印象。"[1]

126

1607年9月20日，和鄂尔勒克的代表来到塔拉，他表示愿意与俄国和睦相处，请求允许在伊希姆河与卡麦什洛夫河一带游牧，并允许派人到塔拉进行贸易。塔拉将军转达和鄂尔勒克：不入俄国国籍，无权在俄国土地上游牧，而应离开；如果宣誓忠于沙皇，则可允许在俄国境内游牧。这时查明，和鄂尔勒克的兀鲁思总共只有3000人。[2]

我们从托木斯克将军给莫斯科政府的一份注明日期为1609年3

---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第25－27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第28－29页。

月的呈报中得知,6个月以前从托木斯克派往阿勒坦汗和中国方面去的以伊凡·别洛戈洛夫为首的代表团,未能完成任务,回到了托木斯克,原因是阿勒坦汗和卫拉特执政者之间发生了战争。阿勒坦汗国的首领和一批卫拉特执政者之间多次发生军事行动这个事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关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又一次爆发战争的记载,在许多文件中都得到了证实。遗憾的是,史料中几乎没有引述任何详细情节,我们只知道战争开始于1608年秋天,胜利者是卫拉特人。他们"把阿勒坦汗从他原来放牧的冬季牧区赶到了远处。于是,阿尔泰地区的属民便脱离阿勒坦汗,并跟他打起来了"[1]。参加这些战斗的有许多卫拉特领主,包括游牧在塔拉地区的和聚集在杜尔伯特的达赖周围的那些领主在内。而哈萨克汗和苏丹则参加了反对卫拉特的某一场战争。卫拉特王公们的团结维持了短短一段时间,不久就被新爆发的内讧所代替。1609年3月从塔拉派来了一个以戈鲁平为首的代表团到卫拉特执政者那里去。7月份,代表团返回塔拉并报告说,"据说卡尔梅克台什们都在一起游牧",他们受乌泽涅的名叫阿拜的寡妇和她的副王戈舍夫奇台什(霍硕奇吗?)的领导。报告还说,所有加入这个集团的领主当着俄国使者的面举行了代表大会。阿拜和戈舍夫奇主持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俄国方面的提议:要卫拉特执政者们发誓忠于沙皇,签订相应的条约,让主要的台什们去访问塔拉城,定期交纳实物税等等。但是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些提议,理由是:"现在哈萨克汗国正值内讧,且准备来侵犯他们。"卫拉特执政者从自己这方面提议,请塔拉将军本人带俄商到他们额尔齐斯河上游来,提议"将军及其随从人员穿戴节日盛装,同许多携带珍贵商品的客人去他们(指卫拉特人。——兹拉特金)那里,他们可与商人们进行贸易。"至于实物税,他们"从不向任何人缴纳,倒是向白卡尔梅克人收取。往后也不想给任何人缴实物税"。他们对于在俄国土地上游牧这一问题的答复也同样明确:"他们是游牧民族,不是定居的,想在哪里游牧,就在哪里游牧。"

127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第32页。

俄国方面提议不许触犯俄国沙皇的臣民——巴拉巴州和其他各州的居民，如果要控诉这些臣民，应该提交塔拉城当局审处。对于这个提议，阿拜宣称："不想派人去塔拉向将军控诉那些鞑靼人，他们自己会对付。"[1]

这个使团的材料反映出，由于卫拉特封建主战胜了喀尔喀的阿勒坦汗和哈萨克各执政者，他们的地位渐渐巩固。这一变化了的形势也反映到了卫拉特执政者与俄国的关系上。他们已经不再请求俄国沙皇保护他们免遭敌人侵犯和允许他们在俄国土地上游牧，不再表示同意成为沙皇的忠实臣民而缴付实物税等等。在与戈鲁平的谈判中，他们态度傲慢，口吻挑衅。

这个卫拉特王公集团内部发生的某些变化也很引人注意。从前它受达赖领导，可是现在却受乌泽涅的寡妇和戈舍夫奇的领导，而达赖本人在戈鲁平代表团的材料中甚至连提都没提。从前和鄂尔勒克离开达赖集团单独游牧，可是现在却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之一，并且和大家在一起游牧。加入这一集团的各领地执政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引起了俄国使者的深切关注。看来，这种景象只能用刚刚取得了多次胜利以及准备发动对哈萨克的新进军来解释。值得注意的还有戈鲁平对王公代表大会作用的叙述：大会由联合领地的那些主要执政者召集，来决定他们的对外政策。

128

离开这个集团单独游牧的还有以和硕特的拜巴噶斯和绰罗斯的哈喇忽喇为首的另一个卫拉特封建主集团。它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上游第一个集团的东南部，其中包括大多数卫拉特居民和大部分领地。无论拜巴噶斯，还是哈喇忽喇，或者这一集团中的另外什么人，在17世纪20年代末以前，都没有与俄国当局发生过交往。俄国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记载，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从卡尔梅克史料中得知，这两个卫拉特封建主集团之间保持了各方面的亲密联系：通婚、参加全卫拉特的代表大会和军事远征。

---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年）》，第38－39页。

最重要的事件是,17 世纪 20 年代中期,全体西蒙古领主接受喇嘛教作为他们的正式宗教。它比喀尔喀和南蒙古的汗国和公国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是,考虑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后面将专门研究这个事件。

几乎在 17 世纪的整个 20 年代中,卫拉特领地内出现了一种和平局面,这在 1613 年被沙皇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派到波斯沙赫阿巴斯那里去的米哈依尔·吉哈诺夫外交代表团的材料中,多少得到了证实。被当局吸收来参加制定路线的学识渊博的人士建议这个代表团先到萨马拉河[1],然后经诺盖草原[2]到雅依克河[3],由这里到乌尔根奇,再往前到波斯。这些人说:"走那条路没有危险,只需要在从事狩猎的卡尔梅克人的驻扎处加以提防……现在,在诺盖草原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只有当冰融雪化、春暖花开的时候,才有饲草,那时卡尔梅克人和诺盖人都喂肥了自己的马,这一带草原就不会没有人了,因为卡尔梅克人和诺盖人开始互相零星袭击。所以,皇上陛下,那时就不能走这条路了。"[4] 129

这一切都证明,伏尔加河的弯曲处(现在的古比雪夫地区)和咸海最南端之间的茫茫无际的空地,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地区,只是偶尔有卫拉特猎人的行踪。在夏季和秋季,这个荒凉的地区则成了卫拉特人和诺盖人为了放牧而相互进行零星袭击的场所。在所述及的这些年代里,这种袭击活动是卫拉特执政者们军事活动的唯一表现。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两个卫拉特集团中究竟哪一个参加了袭击诺盖人的活动?史料没有提供这一问题的直接答案。但是,考虑到属

---

[1]在苏联境内称作萨马拉河的有两条:一条是伏尔加河的左支流,在契卡洛夫与古比雪夫境内;一条是德聂伯河的左支流,大部在乌克兰的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境内。这里所说的萨马拉河,应是后者。——译者

[2]诺盖草原在苏联格罗兹尼省的东北部,靠近黑海的捷列克河和库马河之间。但本书所说的诺盖草原,范围很大。——译者

[3]雅依克河是乌拉尔河的古称。沙皇叶卡德林娜二世于 1775 年始将雅依克河改称为乌拉尔河。——译者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波斯卷宗(Персидские дела),1613 年,第 1 号,第 352 张;也可参看维谢洛夫斯基:《去伏尔加河途中的先遣卡尔梅克人》(Передовые калмыки на пути к Волге),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Записки ВОРАО),圣彼得堡,1889 年版,第 3 卷,第 3 页。

于哈喇忽喇和拜巴噶斯集团的卫拉特人只有经过哈萨克领地才能潜入诺盖兀鲁思，因此可以肯定，袭击活动的组织者多半是西北部那个集团的执政者。

为了防备吉哈诺夫可能遇见卫拉特人，沙皇交给他一封致“卡尔梅克汗国台什们和全体兀鲁思人”的信。信中通知他们，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登位以及派遣吉哈诺夫去波斯的事。“他们从哪儿走更好：是通过贵汗国，还是从旁越过。如果在某地需要跟你们的人同行，希望你们记得，过去在全俄沙皇瓦西里·伊凡诺夫亲王时代，你们曾写信保证效忠于我们伟大的俄国沙皇。现在，望你们按保证为皇上陛下作出努力，履行职责，让我们的使者米哈依尔·吉哈诺夫、随臣阿历克赛·布哈洛夫及其兄弟阿巴斯·沙霍夫、使者阿米尔·阿里别克及其随员和牲畜，不受阻碍地通过你们的汗国，必要时护送他们到合适的地方。”[1]

当时西北部的卫拉特封建主集团却一直坚持逐步地向西部所谓的诺盖草原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能充分满足卫拉特封建主对牧地的需要，且能有希望过不从属于任何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130

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的诺盖草原的情况有利于实现卫拉特迁移者的计划。这里居住着三大诺盖集团之一——所谓的大诺盖汗国，它游牧于伏尔加河与厄姆巴河之间的辽阔地带。

提一提诺盖人和蒙古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若干共同特征，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共同特征也决定了他们的历史命运有某些相似之处。诺盖人是游牧畜牧民族，销售产品的市场和他们所必需的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地，对他们至关重要。这方面，他们在喀山汗国[2]和阿斯特拉罕汗国[3]被消灭之后，也像15—16世纪蒙古人依赖于中国那样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波斯卷宗，1613年，第1号，第355－357张。

[2]喀山汗国是15世纪金帐汗国瓦解后建立的蒙古封建国家，位于伏尔加河中游。1552年被沙皇伊凡四世征服。——译者

[3]阿斯特拉罕汗国是15—16世纪建立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封建汗国。1556年被沙皇伊凡四世征服。——译者

地依赖于俄国。萨拉托夫地区的历史学者格拉克利托夫写道："诺盖人销售马匹的市场主要是莫斯科，而出售山羊和绵羊则主要在喀山，虽然后来俄国政府力求把这种商品也运往莫斯科。"[1]久而久之，大诺盖汗国和莫斯科的贸易联系日益扩大和巩固。诺盖执政者确信："贸易的好处比进行袭击时或与罗斯[2]公开交战时可能得到的不正当的掠获物更多、更诱人。"[3]

索洛维约夫记载说，从诺盖草原赶到莫斯科来的畜群有时达5万头。他还谈到，在伊凡四世执政年代，诺盖贵族伊斯麦伊尔不接受他的兄弟关于跟莫斯科断绝联系的建议，他解释他的这一决定说："你的属人去布哈拉进行贸易，可我的人去莫斯科。我一跟莫斯科打仗，就势必落得一贫如洗，甚至死后连一件白色殓衣都没有。"[4]诺盖人从俄国得到武器、冬衣、夏衣、呢绒、纸张、马鞍和钉子等等。

俄诺关系与中蒙关系的区别主要在于，同诺盖人进行易货贸易，对罗斯有着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它保障诺盖人实际上不受限制地销售牲畜，而跟蒙古人广泛交易，对中国经济上的好处则要小得多。经济利益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莫斯科国家和中国与他们各自的游牧邻邦有着不同性质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只是在诺盖执政者被卷入俄国同土耳其和波兰的斗争（往往演变为公开的战争）时，俄国与诺盖的和平关系才中断并让位于武装冲突。[5]

诺盖社会也像蒙古社会一样，在16—17世纪是封建社会。土地为领主所有，这就使领主们变成了统治阶级。格拉克利托夫写道："王公

---

〔1〕格拉克利托夫（А. А. Гераклитов）：《16—18世纪的萨拉托夫边区史》（История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края в XVI－XVIII веках），萨拉托夫—莫斯科，1923年版，第105页。

〔2〕罗斯是11—17世纪时对俄罗斯的称呼。清康熙初，曾将俄罗斯称作罗刹，即罗斯的转音。——译者

〔3〕格拉克利托夫：《16—18世纪的萨拉托夫边区史》，第147页。

〔4〕索洛维约夫（С. М. Соловьёв）：《俄罗斯古代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圣彼得堡，1886年版，第94页。

〔5〕诺沃谢尔斯基（А. А. Новосельский）：《17世纪前半叶莫斯科国家同鞑靼人的斗争》（Борьб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татарам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9、12、16、23页和结论。

和贵族视本身情况的不同，各拥有一定数量的兀鲁思，它是由兀鲁思人或叫普通诺盖人组成的……看来，这儿的情况大致也像卡尔梅克人晚期的情况一样，就是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农奴制的东西。”[1]

领主们的后裔人数众多，纷纷贪求获得自己的一份封建收入，这种情况也像在蒙古人那儿一样，在诺盖社会的内、外政治生活中起过不小的作用。熟知16—17世纪诺盖人历史的杰出学者诺沃谢尔斯基在评述大玉兹的情况时指出：“出现了人数剧增的失去兀鲁思的‘年轻贵族’激烈反对老辈贵族的局面。”[2]

接连不断的内讧和自然灾害使诺盖的经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头几十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诺盖兀鲁思在草原上游荡，常常离开伏尔加河中下游一带的惯常游牧区，他们不顾俄国当局的反对，迁往亚速夫草原，甚至希瓦草原，使人、畜都受到了损失。大诺盖汗国日趋衰落，它的力量渐渐消失以致不能抵抗卫拉特的攻击。诺沃谢尔斯基写道：“还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梅克人已经从雅依克河向诺盖兀鲁思进行了几次急促的突袭，大诺盖人面对这股威胁性的力量，每次都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没有能力同这种力量斗争，便退到了伏尔加河彼岸。”[3]

132

1614年3月，撒马尔罕的将军向莫斯科政府报告说，在伏尔加河右岸游牧的诺盖贵族伊斯捷列克，害怕卡尔梅克人的攻击，派出一支1700人的队伍到左岸侦察。1622年6月，阿斯特拉罕的将军呈报说，派遣诺盖使者来莫斯科并出售马匹的事，由于“一些贵族及其兀鲁思人意料到卡尔梅克人要来而延迟了”[4]。

大量的史料记载都使人丝毫不会怀疑：向伏尔加河移动的卫拉特人在诺盖草原上没有劲敌。可是卫拉特人却没有急于占领这个草原。他们完成向伏尔加河的转移，不早于17世纪30年代中期。究竟是什

---

[1]格拉克利托夫：《16—18世纪的萨拉托夫边区史》，第106页。

[2]彭诺沃谢尔斯基：《17世纪前半叶莫斯科国家同鞑靼人的斗争》，第57页。

[3]彭诺沃谢尔斯基：《17世纪前半叶莫斯科国家同鞑靼人的斗争》，第224页。

[4]格拉克利托夫：《16—18世纪的萨拉托夫边区史》，第212页。

么原因使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与伊希姆河一带逗留了将近30年呢？如果像某些研究家所肯定的那样，说他们的执政者是在酝酿建立一个新的蒙古游牧帝国的宏大计划，那么，为什么当一切条件似乎都很有利于他们的时候，卫拉特人却要拖延这种计划的实现呢？

我们有理由肯定，如此缓慢地向伏尔加河推进，反映了卫拉特领地迁移过程的复杂性。这些领地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有时受相反情况的影响。他们不愿离开故乡的牧地，不愿中断他们和卫拉特社会基本群众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情况不利的年代深感牧地不足，且强烈地感到需要扩大牧地；而在情况顺利的年代，这种要求又不那么迫切了，这就不能不影响迁移的速度。在内讧尖锐的时期，王公们走上迁移的道路；相反，在风平浪静、内部安宁的时期，便又不想迁移了。外部战争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一样。有利的战争结局造成稳定的局面；而战争失利又引起迁移。17世纪20年代突出的特征则是，在额尔齐斯河、鄂木河以及伊希姆河一带游牧时卫拉特王公们需要加速向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诺盖草原转移的因素减弱。即使在某一年他们进入了这片草原，到达了雅依克河与厄姆巴河一带，甚至渡过了这两条河，那也不会在那里久留，还是会返回能够与其余卫拉特领地紧邻的地区来游牧。关于卫拉特封建主在17世纪曾有建立游牧帝国的计划的说法，我们只能再说一遍：史料中没有任何一个事实足以确证这种说法。

133

在前面提到过的戈鲁平外交代表团以后，俄国与卫拉特的关系中断了5年左右。文献中有关这几年卫拉特内政、外交的资料寥寥无几。但是，有些年代较晚的文献中谈到，这段时期卫拉特执政者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征服了邻近较小的部落群和民族。例如，阿拜—戈舍夫奇集团征服了巴拉巴和库兹涅茨克的鞑靼人，向他们征收农、猎产品和铁制产品作为“阿尔巴”（赋税）。这个集团的执政者宣布自己是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一些咸水湖的所有主，限制俄国人采盐，并企图以此作为向俄国城市当局施加压力的手段。结果在俄国人和卫拉特人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冲突，有时导致武装冲突。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常有横暴行为和贪得无厌的情况，而卫拉特领主同样

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往往也是武装冲突的一种起因。

1616年可以看做是俄国与卫拉特正式关系重新活跃的开始。这年春天，俄国从托博尔斯克派了一个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庆的外交代表团去卫拉特。目的和过去一样——劝说卫拉特执政者转入俄国国籍，并到西伯利亚各城市去做买卖。这些使者返回托博尔斯克之后，就被召往莫斯科，去汇报谈判结果。据查，接待他们的还是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他又成了卫拉特大集团的首领。当时参加这一集团的有达赖的4个亲兄弟、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和绰罗斯的楚琥儿。“全卡尔梅克为首的台什是那位巴加德尔达赖台什。人们称他是全卡尔梅克的国王，而他本人不这样自称，他下面是他的4个亲兄弟……众台什中有很多是他的叔伯弟兄和侄儿。”楚琥儿与和鄂尔勒克作为达赖的“亲密无间的台什”加入了这个集团。彼得罗夫和库尼庆在强调这个卫拉特集团的力量时说：“到巴加德尔大台什居住的地方要一个月。再往前走要多少时间，不清楚。从卡尔梅克人的谈话中得知，4个大台什正准备去作战。每位台什各有士兵1万人。”[1]

134

彼得罗夫和库尼庆没有提到戈鲁平外交代表团时期领导该集团的戈舍夫奇和阿拜。大概，集团内部发生过某些新的纠纷，其结果是达赖台什重新上台执政。

使者们查明，“现在哈萨克大玉兹和吉尔吉斯玉兹都臣服并听命于卡尔梅克，由于拥有这两个玉兹，卡尔梅克更加强大了。以前被卡尔梅克人俘虏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巴加德尔台什一查明之后，把他们无条件地遣送回去了。两个玉兹的首领们为此对巴加德尔台什感激不尽，与他和睦相处，非常尊敬他，并一切听命于他。”[2]

特别有意思的是，彼得罗夫和库尼庆证明，他们亲眼看到在卫拉特兀鲁思中，王公们与平民们都信奉了喇嘛教。这两位俄国使者在谈及从喀尔喀来到卫拉特的传教士时说：“现在他们使卡尔梅克人信奉他

---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52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53页。

们的教，而且把他们自己的文字教给卡尔梅克人。”[1] 135

此外，两位俄国使节的叙述证明，达赖集团的内、外政治地位大大巩固。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和绰罗斯的楚琥儿承认了达赖的政权。哈萨克大玉兹的封建主和叶尼塞的吉尔吉斯人也臣服于卫拉特执政者。这一集团的内部充满着平静、和谐的气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1616或1617年召开的有达赖集团的执政者参加的全卫拉特领主代表大会。这件事可以看做是一个证据，它证明，达赖和他的藩臣们支持同拜巴噶斯和哈喇忽喇为首的卫拉特主要部分的封建主保持传统的联系。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没有什么因素迫使达赖集团的执政者急于向伏尔加河迁移。于是，他们停留在原地，在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沿着伊希姆河与鄂毕河进行游牧，从这里不时侵袭沿雅依克河与厄姆巴河游牧的诺盖人。至于他们和喀尔喀阿勒坦汗的相互关系，可以根据瓦西里·丘麦涅茨和伊凡·彼得罗夫的叙述来判断。他们两人1616年夏天在阿勒坦汗那里见到了达赖台什的使者。两位俄国使节出席了汗和这些使者的会谈。“他们在阿勒坦汗那里的时候，在场的还有卡尔梅克巴阿德尔台什和乌庆台什的使者。阿勒坦汗对卡尔梅克使者说：‘如果你们侵犯俄国的西伯利亚城市，侵犯俄国的属民或属地，我就向你们进攻，而且皇上米哈依尔·费多洛维奇大公也会攻打你们的。那时，你们卡尔梅克人就无处可逃了’。”[2]这段谈话证明，当时阿勒坦汗国和卫拉特的达赖台什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不利于卫拉特 136
人的。如果卫拉特人敢于反对阿勒坦汗的意旨，他们的使者就得被迫耐心听取阿勒坦汗的训斥和他声言要惩罚卫拉特人的恫吓。阿勒坦汗明显地夸耀自己与俄国沙皇亲近，沙皇的军队似乎一定会跟他的军队合作。达赖台什和其他卫拉特执政者考虑到这一点，怕引起战争，所以竭尽全力同阿勒坦汗保持和平。他们的第二个外交任务就是处理好与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54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309页。

俄国的睦邻关系。

1618 年初,达赖台什的使者曾来到莫斯科,当时的有关材料向我们叙述了这第二项任务。陪同外交代表团的伊凡·萨维尔耶夫在外交事务部里谈到,1617 年 5 月他受托博尔斯克将军的派遣去达赖台什处,目的在于弄清楚达赖是否打算转入俄国国籍的真实意图。他走了将近两个月才来到达赖设在斋桑湖地区的牙帐。伊凡·萨维尔耶夫说,他通过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个记载可以作为当时哈萨克与卫拉特和平关系的证明。凡是他所经过的兀鲁思中的卫拉特领主,了解到代表团的目的之后,都热情地迎送他。8 月上旬,他到了达赖的牙帐。当时,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使者正在达赖那里谈判赎回不久前的战役中被卫拉特抓走的俘虏问题。达赖在回答俄国方面的问题和提议时说:"准备接受俄国的庇护,渴望沙皇的恩惠,将遣使叩求沙皇恩赐,并准备制服不顺从俄国的人,征服不听从沙皇陛下命令的地区。"[1]

达赖台什派遣自己的代表和萨维尔耶夫同行,这些代表被送到了莫斯科。1618 年 3 月 20 日,代表们被邀在外交事务部进行谈判,他们按达赖的委托宣称:"13年前,他们开始对沙皇陛下西伯利亚的领地和城市的情况有所了解,曾来这些城市拜访过沙皇陛下的贵族和将军们。现在他们听说的关于莫斯科国家的消息有好有坏,所以巴加德尔台什及其同伴派他们来打听俄国的真实情况。"使者同时指出,以往 13 年中,"他们曾不断来到俄国城市,赶着牛马和各种牲畜各二三百头,几乎遍城皆是"。当时,有人提醒使者,过去卫拉特执政者表示过愿意入俄国国籍以免受敌人侵袭。他们回答说:"现在他们同样表示:只要沙皇陛下同意接纳巴加德尔台什和他的同伴们,他们整个卡尔梅克汗国愿意接受沙皇陛下的庇护,并完全服从沙皇的命令。无论沙皇命令他们到哪里去消灭敌人,他们都准备听命。"[2]

137

---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71 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72 - 73 页。

谈判于1618年4月14日结束，并递交使者一封沙皇致达赖的奖赏信。信中欢迎达赖表示加入俄国国籍、“效忠”沙皇和派军制服“不服沙皇者”的愿望，欢迎“赶着马群和各种牲畜，携带卡尔梅克汗国出产的商品来西伯利亚各城市，来托博尔斯克和我们的其他城市，吩咐其属民不必有任何顾虑”。沙皇这方面则答应，保护达赖免遭一切敌人的袭击，保证让西伯利亚当局友爱相待，命令他们“不使你们遭受灾难和引起纷争。对你们的商人做到关怀备至，使之丝毫不受任何人的欺凌”[1]。

我们所引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了17世纪20年代末，达赖台什对俄国的政策以及俄国对达赖的政策。双方对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与和平贸易都表示关注。达赖打算借助俄国来反对威胁其利益的阿勒坦汗和哈萨克封建主。为此，他力求查明莫斯科与阿勒坦汗国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这从1618年3月20日谈判时达赖的使者对外交事务部秘书所作的一些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秘书们以阿勒坦汗为例，希望使者信服效忠俄国沙皇的好处，达赖的使者却对阿勒坦汗本人加入俄国国籍表示怀疑，因为“阿勒坦汗住得很远，到他那儿要走将近3年，莫非在皇上这里的是他的弟兄的使者？从阿勒坦汗那里派使者来太远了”[2]。秘书们坚决驳斥了这些怀疑。谈判证明，莫斯科政府照旧认为达赖是游牧在紧挨当时俄国边境的卫拉特兀鲁思的全权执政者。达赖自愿臣服于俄国沙皇，这保障了俄国在西伯利亚地位的巩固，并为不使用武力获得新领土提供了可能。

138

但是，过了不久，卫拉特与阿勒坦汗之间又爆发了新战争。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卫拉特社会的内、外形势，并对中央亚细亚、南西伯利亚和下伏尔加河流域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所知的蒙文和卡尔梅克文史料对这场战争一无所述。目前只有俄国档案资料记载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76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73页。不了解比丘林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当时阿勒坦汗从属于卫拉特。他写道：“这位统治者(指阿勒坦汗。——兹拉特金)，虽然从属于卫拉特首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独断独行。”(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37页)

有这场战争的情况。但是对军事行动的起因和进程,对其参加者都没有任何详细记载。在1619—1624年的文件中看到的只是对这些军事行动的某一情节或局部情况有些个别的、零散的记载。不过整个说来,俄国档案资料还是为我们介绍了冲突的概貌。

1619年5月,喀尔喀的阿勒坦汗在致俄国沙皇的信中建议联兵攻打哈喇忽喇集团。他写道:"我请求互遣使者来商议我们之间的商路
139 安全问题,而卡尔梅克哈喇忽喇台什却阻碍我们办成这件好事。他们人数不多……希望您,沙皇陛下,命令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以及塔拉等地所有俄国军队和我的军队一起去打哈喇忽喇匪徒……一旦道路上清除了他们,皇上陛下和我都能有利可图,受益无穷。"[1]

这封信在很多方面都很有意义。首先它证明,17世纪20年代末哈喇忽喇在卫拉特社会中的影响剧增。阿勒坦汗甚至不认为有必要提一下形式上还是全卫拉特丘尔干的首领——和硕特的拜巴噶斯,或者提一下领导卫拉特西北集团的杜尔伯特达赖台什。当时卫拉特封建主反对阿勒坦汗的斗争是由哈喇忽喇领导的,无怪乎阿勒坦汗认为他是自己的主要敌人。而哈喇忽喇的实际力量已经如此强大,以致阿勒坦汗不得不求助于俄国沙皇。信中断言哈喇忽喇"人数不多"显然跟建议派遣托木斯克、塔拉和托博尔斯克等地的所有俄国军队去打他这一点是自相矛盾的。

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卫拉特社会内部发展的各种过程。这些过程的基本内容就是克服地方领主各自为政,以及政权逐渐集中到绰罗斯族的首领手中。哈喇忽喇和他的一个儿子楚琥儿之间的冲突也说明了这些过程。楚琥儿与父亲不和,1614年便离开了父亲而与达赖台什集团结合。我们已经提到过,达赖把楚琥儿当做自己的"亲密无间的台什。"

阿勒坦汗和哈喇忽喇双方备战,这一准备的重要环节是前者企图与莫斯科订立同盟。不过哈喇忽喇没有失去时机。他也企图靠俄国军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79-80页。

队的帮助来反对阿勒坦汗，为此也派遣了特别使团去莫斯科。这是准噶尔汗国的奠基人哈喇忽喇派往俄国首都的第一个外交代表团。很有意思的是，阿勒坦汗和哈喇忽喇的使者同时从西伯利亚出发，一起走完到莫斯科的全部路程，于同一天——1620 年元月 10 日到达首都，元月 29 日一起受到俄国沙皇的接见。[1] 140

哈喇忽喇的使者向沙皇米哈依尔·费多洛维奇谈到他们的首领愿意入俄国国籍，受沙皇保护以防御敌人，“望皇上赏识我们，把我们置于您的庇护之下，受您的恩典和吩咐，并保护我们免受敌人袭击”[2]。

1620 年 4 月 24 日，莫斯科政府交给阿勒坦汗使者一封回信。莫斯科政府拒绝了关于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反对哈喇忽喇的提议，但答应保护阿勒坦汗不受来自卫拉特执政者方面可能的侵犯：“我们沙皇怜悯你阿勒坦汗，已命令西伯利亚将军们派人保护你和你的领土免遭卡尔梅克哈喇忽喇台什及其部众的侵犯。”[3] 过了一个月，1620 年 5 月 25 日莫斯科政府又交给了哈喇忽喇的使者一封关于接受其首领入俄国国籍的沙皇谕旨：“我们沙皇陛下赏识你哈喇忽喇台什和你的兀鲁思的部众，愿赐皇恩，进行庇护。给你们薪俸和抚恤。同时命令西伯利亚各将军保护你们不受敌人的侵袭。”[4]

这个外交代表团的资料和所引的沙皇谕旨，跟莫斯科与蒙古执政者交往的其他情况不同，它们都只字未提贸易问题，这一点着重表明了代表团的军事意义。 141

阿勒坦汗和哈喇忽喇两军间的军事行动是何时开始的？在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一问题的直接答案。只能肯定，战争开始的时间不会晚于 1619 年。1620 年 10 月在乌法得到不久前从卫拉特兀鲁思来的人带回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托尔马奇·比亚东卡·谢苗诺夫谈

---

[1]“元月 10 日那几位使者一起到了莫斯科。而元月 29 日阿勒坦汗的使者、比利克图喇嘛，卡尔梅克和吉尔吉斯的使者全在这一天出现在皇宫里。”见《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92 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93 页。

[3]《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96 页。

[4]《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99 页。

到,“他听卡尔梅克人说,去年哈萨克玉兹伊施姆汗打过他们……今年,谢苗诺夫回来之前,阿勒坦汗的军队又打来了……打败了卡尔梅克兀鲁思,杀了许多人,俘去两个台什。比亚东卡目睹第三个台什捷古尔切逃到他的兄弟贝八吉什的牧区来了。”由此可见,贝八吉什——哈喇忽喇的一个儿子——和他的兄弟绰罗斯的楚琥儿、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以及杜尔伯特的达赖,一起游牧于伊希姆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一带。贝八吉什、楚琥儿以及和鄂尔勒克各有1000兀鲁思人,而达赖拥有2000。谢苗诺夫指出上述4位执政者曾到楚琥儿那里聚会,在那里决定请求俄国沙皇允许他们沿托博尔河游牧,并到乌法进行贸易,这一点值得注意。[1]

同时,在秋明也获得了有关卫拉特与喀尔喀战争的消息。一小群卫拉特人曾游牧到秋明郊外,他们谈到,“所有卡尔梅克人现在都沿卡麦什洛夫河游牧,因为阿勒坦汗的部众逼迫他们退却”[2]。以哈喇忽喇的兄弟杰伏尼盖和谢吉尔台什为首的卫拉特人,突然出现在昌内湖[3]、鄂木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现在的鄂木斯克东部)地区,可能也是这场战争的余波。[4]

1621年从托博尔斯克得悉:“目前许多台什率卡尔梅克人迁到了西伯利亚各城市附近,现在游牧在伊希姆河上游与托博尔河之间的地区……这些卡尔梅克台什游牧到这一带来,是因为遭到了阿勒坦汗和哈萨克玉兹的侵犯。”[5]

142

一些曾被卫拉特台什俘虏,于1620年10月返回乌法的巴什基尔人说:“卡尔梅克台什们受到了哈萨克玉兹伊施姆汗的巨大压迫,许多人被他杀死。同时阿勒坦汗也杀了许多卡尔梅克人,并俘走两个台什及其妻妾、儿女。”[6]

---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04、106-107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05页。

[3]昌内湖又译查内湖,位于苏联西西伯利亚巴拉巴草原。——译者

[4]《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78页。

[5]《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01页。

[6]《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03页。

1621 年夏天，许多卫拉特台什游牧在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亚梅舍夫湖地区，“因为开始是哈喇忽喇台什和梅尔根杰梅奈台什的‘黑’卡尔梅克人同阿勒坦汗打仗。阿勒坦汗打败了他们两人后，又同许多‘黑’卡尔梅克人[1]作战”[2]。当时在托木斯克也听说，许多卫拉特兀鲁思及其台什们游牧到了鄂毕河，并在楚麦什河口修起了坚固的营垒打算过冬，并打算去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之间游牧。“他们会合去鄂毕河并在那里修了城堡，因为阿勒坦汗打败了他们，俘走了哈喇忽喇的妻妾、儿女，阿勒坦汗还征服了哈萨克，把哈萨克人逐出了他们原游牧的诺盖草原……哈萨克玉兹预料自己不久将遭到诺盖人和阿勒坦汗的两面夹攻。”[3]

我们见到的有关 1619—1621 年事件的资料就是这些。从中可见，这些年卫拉特执政者既要回击哈萨克封建主，几乎同时又要回击阿勒坦汗。最初的几次战役发生在 1619 年夏季或秋季，卫拉特人战败，因此他们的牧区分散在乌法到托木斯克一带。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绰罗斯等这类大封建联合体的传统兀鲁思集团遭到了破坏，全部七零八落，犬牙交错地在那一带游牧。可能，战争的倡导者是哈喇忽喇，但他被打败，随后就使所有卫拉特兀鲁思卷入了战争，其中包括参加达赖集团的那些兀鲁思。

1622 年大概是喘息的一年。在任何一个文件中都没有谈到这一年有什么战役。可以揣想，双方都在医治创伤，准备未来的战斗。1622 年在莫斯科得悉，卫拉特王公征服了库兹涅茨克地区从事开采铁矿、冶炼和加工生铁的居民，并且强迫他们用铁器交付贡赋，“除了炮以外，还用铁制造了铠甲、头盔、长矛、尖锋长矛、马刀和各种铁器。这些铁器卖给卡尔梅克人换取的是马、牛和羊，而有的则作为赋税交给卡尔梅克人……卡尔梅克人还统治着那些住在离库兹涅茨克城镇很远的库兹涅

143

[1]沙俄把出于原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卫拉特蒙古人称黑卡尔梅克，以区别于被他们征服而从属于他们的非原来卫拉特蒙古人的其他族人。——译者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112 页。

[3]《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113 页。

茨克人,并向他们索取貂皮和各种铁制品作为赋税"[1]。获得这个情报后,莫斯科严令地方当局采取措施以保护库兹涅茨克居民,并禁止他们今后向卫拉特人出售武器和貂皮。

1622年末或者1623年初,军事行动重新开始。这点是在秋明获悉的。有人去过泽吉尔台什的兀鲁思,他们在那里听说,主要的台什们"现在正在同阿勒坦人、蒙古人、布哈拉人和诺盖人打仗,台什们之间也在混战。他们深受上述这些人的排挤,因此目前在西伯利亚各城市附近游牧"[2]。

1623年夏季,秋明将军得悉了哈喇忽喇远征阿勒坦汗的有趣消息。"卡尔梅克的哈喇忽喇台什率兵4000攻打阿勒坦汗,攻掠了他的整个兀鲁思,俘虏了许多人之后,乘胜返回。阿勒坦汗派了4000人截断哈喇忽喇台什的归路,又派3000人从后面夹攻,杀光了这位台什的人,只有哈喇忽喇和他的儿子侥幸逃脱。"[3]遗憾的是,这一情报资料没有确切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它是发生在喀尔喀与卫拉特战争的第一年(即1619年)呢,还是发生在1622—1623年?

144 1623年春天,从乌法派出以瓦西里·沃尔科夫为首的几名使者去卫拉特台什处。这年5月29日,这个外交代表团来到杜尔伯特达赖台什的兄弟满吉特那里,他宣称,"他的兄弟达赖和同伴们去打蒙古的阿勒坦汗了"[4]。据俄国使者们说,他们到达满吉特台什的兀鲁思时,"人们不时由于那位蒙古汗而感到惊惶不安……于是台什们避开他游牧到额尔齐斯河去了,而把妻妾、子女送往额尔齐斯河彼岸"。后来查明,达赖台什及其他卫拉特王公是在俄国使者到达满吉特前19天(即5月10日)去出征的。[5]

关于1623年战役的记载到这里就中断了。这些记载证实,1623年,所有卫拉特领主,包括参加达赖集团的在内,一致抵抗过阿勒坦汗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15-116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22页。
[3]《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23页。
[4]《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24页。
[5]《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25-126、129页。

及其同盟者;也证实,分裂卫拉特执政者的内部矛盾,在外来威胁面前退居次要地位;还证实,不管游牧到什么地方,他们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参加全卫拉特的事务。根据掌握的全部资料看,1623 年的战役,卫拉特人和阿勒坦汗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卫拉特人离开了战场,带走了不少喀尔喀俘虏。有些文件谈到,1625 年卫拉特内乱爆发时,"许多蒙古俘虏从卫拉特兀鲁思逃回蒙古"[1]。

1625 年的内讧使卫拉特领地的内部形势大大地复杂起来,当年的俄国文件对这次内讧几乎都有述及。领主楚琥儿和贝八吉什这两弟兄因瓜分遗产而引起的冲突是这场内讧的基本原因。他们的三弟死了,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属于死者的 1000 阿拉特牧户便成了纠纷的症结。贝八吉什不想与楚琥儿平分,要独占1000牧户。斗争开始了。所有深孚众望的卫拉特执政者不无理由地怕阿勒坦汗利用混乱局面击溃卫拉特全部兀鲁思,都急忙来劝解大吵大闹的两弟兄。起主要调节人作用的是绰罗斯的哈喇忽喇和杜尔伯特的达赖。由于他们的努力,弟兄俩达成协议,楚琥儿得到 600 牧户,而贝八吉什分得 400。可是,过了不久,楚琥儿又想夺取贝八吉什的 400 牧户。战争重新开始了。楚琥儿联合其他几位领主率兵 1 万进攻总共只有 2000 士兵的兄弟贝八吉什。战役在额尔齐斯河岸亚梅舍夫湖地区进行。贝八吉什战败,损失过半,并渡河退到额尔齐斯河左岸。在那里他加强了实力,但是被包围了。现在由达赖扮演了主要调节人的角色,他率领一支千人的队伍来到战场,命令达赖集团各兀鲁思到伊希姆河与托博尔河的上游游牧,"避开蒙古人打来"。

达赖的兄弟伊尔盖伊尔斤台什 1625 年 4 月被达赖台什召去开代表大会,"因为卡尔梅克的奇恩台什死了,其兄楚琥儿与贝八吉什台什之间发生了瓜分遗产的战争,其他台什们也卷入了这场争端。为了不使蒙古人借卡尔梅克台什之间的混战而乘机入侵,达赖台什和伊尔盖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137 页。

伊尔斤台什进行了劝解”[1]。

1624年末，托博尔斯克将军的使者雅科夫·布戈拉科夫受到达赖的接见，并与达赖就卫拉特人对塔拉县的侵袭进行了谈判。达赖拒绝了俄国方面的要求，因为“去塔拉县骚乱俄国所属边区的是哈喇忽喇的兄弟们，而哈喇忽喇台什带自己的兀鲁思游牧去了，他，达赖台什没法制服。而俄国的背叛者——伊施姆王子属于楚琥儿台什的部落，同楚琥儿一起游牧去了，没有跟他达赖台什在一起”[2]。

这一报导的意义在于，它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达赖和哈喇忽喇领地的独立性和互不依赖性，以及卫拉特王公集团的极大流动性。不久前，楚琥儿台什还作为“亲密无间的台什”依附于达赖，而现在他却完全独立地去游牧了。

146

严冬的来临迫使托博尔斯克的使者布戈拉科夫在达赖处过冬。“开春时听说楚琥儿和贝八吉什的兄弟奇恩台什死了。楚琥儿独占了他遗留的牲畜和兀鲁思人，一点也不给自己的兄弟贝八吉什。于是，贝八吉什来夺走了奇恩台什的全部兀鲁思人和牲畜。为此，兄弟间发生了争端，可能打起来了。达赖台什闻讯后，率兵一千赶来调解，并带了雅科夫（指雅科夫·布戈拉科夫。——兹拉特金），以便让他了解楚琥儿与贝八吉什之间发生的事，并呈报托博尔斯克。达赖台什来到楚琥儿台什处，将奇恩台什的牲畜平均分给弟兄俩，即各得500，并派人叫贝八吉什将奇恩台什的500人归还楚琥儿……但是楚琥儿要把1000人全部夺去，因此他联合了卡尔梅克的梅尔根杰梅奈、古扬、塔本台等台什去打贝八吉什，他们的军队共有3万人……楚琥儿台什在咸水湖下方遇到贝八吉什台什，大杀其人，大抓牲畜，并以重兵围困贝八台什……哈喇忽喇台什得此消息，前来营救贝八吉什，他有军队1万人。楚琥儿台什溃败逃走。”此后就让布戈拉科夫回托博尔斯克了。“达赖台什放雅科夫走，想随之去依蒂克河游牧……他预感这个秋天蒙古人会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37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38页。

打来。同时雅科夫在卡尔梅克汗国听说,所有台什都要去诺盖的黑沙那一带游牧,尽管他们当中没有提战争的事。但只要哈喇忽喇纠缠在贝八吉什这件事情里……卡尔梅克台什之间就免不了有一场大战,他们内部就不会有和平。"[1]

我们从布戈科夫的叙述中引用这样大段的摘录,是由于它们详尽地描述了卫拉特封建主之间斗争的内幕,描述了杜尔伯特达赖台什在消除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描述了他如何关心保持卫拉特领主之间的和平与统一这个有效反击阿勒坦汗的条件。看来,是由于哈喇忽喇的坚决干预才没有使纠纷酿成大战,而达赖台什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和哈喇忽喇一样。至于布戈拉科夫的叙述的可靠性,似乎毋庸置疑,因为叙述人在颇大程度上是上述事件的目睹者。 147

诺盖人杰伏列托夫所说的情况也证实了布戈拉科夫叙述的资料。这个诺盖人在卫拉特人那里当了五六年俘虏,1630 年 5 月逃出后,被召到莫斯科。他是贝八吉什和楚琥儿之间交战的见证人。他被俘后不久,这场战争就开始了。据他说,贝八吉什当时被杀死了。"贝八吉什的兄弟楚琥儿到贝八吉什的地方当了台什。"[2]

1625 年事件是西北部的卫拉特领主集团深深分裂的开端,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开始脱离这一集团,最后终于完全分离了出去。他的地盘为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所占。现有史料没有揭示与这一分裂有关的全部情况。俄国档案资料只断断续续地谈到 1625—1635 年的事件,断缺很多。我们发现,在蒙文和卫拉特文的史料中有关这一时期卫拉特历史的记载更少。我们多少能有把握地谈一谈的只是这 10 年中导致准噶尔汗国形成的一些主要事件。

俄国史料使我们有根据肯定,1625 年以后,达赖台什依靠杜尔伯特的基本领地,彻底与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集团断交,并开始与东南部的哈喇忽喇集团接近,而和鄂尔勒克则带着几个儿子和大部分土尔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139 - 140 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150 页。

扈特领主向阿斯特拉罕地区加速推进，带往那里的还有某些归附他们的非土尔扈特执政者的兀鲁恩。

多年以来在俄国和外国的文献中，讨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和鄂尔勒克的土尔扈特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卫拉特其余群众分离而迁往伏尔加河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两本《故事》，就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加班沙拉勃在他的《故事》中专列了一章，题目是“与杜尔本·卫拉特分离的事件发生在哪一年？”这一章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土龙年（1628年。——兹拉特金）把他们（指土尔扈特。——兹拉特金）要分离出去的打算通知了杜尔本·卫拉特的诺颜们。次年，蛇年（1629年。——兹拉特金）就分离出去了。”[1]另一本《故事》的作者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写道：后来，卫拉特称作“卡尔梅克”，1627年卫拉特联盟解体：厄鲁特（即卡尔梅克）仓促迁往西方，和硕特迁往西藏，而准噶尔部（即绰罗斯）仍留在准噶尔。[2]

148

总之，两位作者一致肯定土尔扈特人离开其他卫拉特人是在1627—1628年。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因为加班沙拉勃本人是土尔扈特的诺颜之一，并且在写他的《故事》时，距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河只过了100年。至于巴图尔乌巴什丘缅，他是和硕特的诺颜之一，他们不久前的祖先跟杜尔伯特、绰罗斯有近亲关系。这一切使我们满可以相信两部《故事》的这些记载。

俄国史料也肯定了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佐证。1630年4月，在莫斯科接待了达赖台什的使者，他们在外交事务部说，他们的台什在卡拉·库姆一带游牧，“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们——他的4个儿子游牧，其他卡尔梅克台什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达赖台什的军队有16000人，他的儿子们共有军队2万人”[3]。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9页。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54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47期。

〔3〕《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48－149页。

在这些年中，达赖与和鄂尔勒克—楚琥儿—梅尔根杰梅奈集团发生了武装冲突。达赖的使者在莫斯科提到，楚琥儿和梅尔根杰梅奈当时是达赖永世的敌人。这两个集团间的敌对关系不仅表现在武装冲突方面，而且表现在双方都唆使对方去反对俄国当局，而把侵袭俄国居民点和俄国从属边区的责任推给对方。[1] 149

我们对于使达赖集团与和鄂尔勒克分离的详情，对于他们之间敌对的原因，都一无所知。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加班沙拉勃的佐证，他曾写到，土尔扈特的执政者先通知了“杜尔本·卫拉特”（卫拉特的主要执政者）有关自己分离出去的打算，而后才分离出去，即迁往了伏尔加河。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有连续不断的冲突、纠纷和内战，但是卫拉特执政者在涉及全卫拉特的问题上，仍觉得他们有相互约束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不愿单独行动，更何况是与汗和王公们的共同意志背道而驰的行动。我们虽不清楚杜尔本·卫拉特是否同意和鄂尔勒克分离，但是他和他的儿子们出席1640年的全蒙古代表大会证实了我们的这种看法。

史料中关于这些年东南集团迁移的记载非常缺乏。只能肯定，17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喇忽喇领导的绰罗斯族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大。同时，很重要的是指出这样一点：在当时俄国的任何一个文件中，都没有提到过卫拉特丘尔干的“盟主”——和硕特拜巴噶斯的名字。1616年以后的蒙古史料，其中包括卫拉特史料，对他也只字不提了。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全卫拉特的反对阿勒坦汗和哈萨克人的所有战役都是受哈喇忽喇领导的，而他却又是一切大规模内部冲突的必然参与者，强迫参与内战的各方接受他自己的仲裁。

1630年乌法的一位翻译官费多尔·康德拉切夫在莫斯科外交事务部叙述了他一年前旅行去达赖台什处的情况。他说：“在额尔齐斯河彼岸，准噶尔兀鲁思的许多卡尔梅克人在跟阿勒坦汗的蒙古人打仗。蒙古使者在达赖台什的兀鲁思里面对他们时谈到了这点。达赖台什也 150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154、172页和结论。

曾说到，蒙古人和准噶尔人在打仗……蒙古使者之所以来达赖台什这里，是为了要他不帮助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不派人去援助。”[1]

可见，1628—1629 年间，卫拉特跟阿勒坦汗又打过一次仗，不过当时已经不是跟硕垒（他已经死了），而是跟他的儿子鄂木布额尔德尼。达赖台什没有参战。阿勒坦汗的使者曾去他那儿说服他保持中立。史料没有直接记载这次战争的结局，但间接的资料可以使我们断定，胜利属于卫拉特封建主。大概因此，紧接着这场战争之后，卫拉特封建主就大量迁回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草原，这一带又成了他们的嫩秃黑和准噶尔汗国的基本领土。

顺便提一下，17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卫拉特社会的内、外政治形势日趋巩固，这表现在各卫拉特兀鲁思已经不像 17 世纪初那样杂乱无章地在南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一带的大片土地上分散地游牧了，而是在绰罗斯王公庇护下开始集中到额尔齐斯河右岸。二三十年前曾经是卫拉特牧区中心的亚梅舍夫湖，现在又成了他们的边区居民点。1634 年秋季从托博尔斯克去这个湖采盐的考察团就遇到了哈喇忽喇的儿子顾伊舍台什的军队，他企图阻挡俄国人的去路。[2]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威胁卫拉特社会本身生存的危机渐渐消失。决定危机产生与发展的各种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由于卫拉特颇大部分居民（约 25 万人）迁往伏尔加河下游，牧场恐慌得到克服。这也反过来促使领主间的冲突有所缓和，以至消失，为他们联合起来解决统一卫拉特的共同任务减少了困难。在这一基础上，在与外部敌人，首先是与阿勒坦汗以及与哈萨克汗和苏丹的斗争方面，也出现了一个转折。

151

我们不能说哈喇忽喇的个人才智在这些成就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现有的史料记载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点无可怀疑：我们引用的确凿可靠的史实资料，第一，有说服力地推翻了认为准噶尔

[1]《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152 页。

[2]《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第 238 页。

汗国的形成只能归功于绰罗斯斡孛黑首领哈喇忽喇的个人天才这种看法;第二,证明了危机的克服和分散的卫拉特领地结合成统一的汗国都是自发的,哈喇忽喇的个人才干可能起了某种好的作用,从而比较容易地使汗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

1634 年哈喇忽喇去世,把卫拉特丘尔干第二个[1]"盟主"的职位留给了他的儿子呼图霍庆巴图尔[2]。达赖喇嘛赐给这位巴图尔以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称号,巴图尔也就以这个名字载入了中央亚细亚的史册。实际上巴图尔浑台吉成了所有卫拉特领地的专制执政者,除了那些跟随和鄂尔勒克去伏尔加河的人以外,他们在那边大约也在这一时期为另一个卫拉特汗国——卡尔梅克汗国奠定了基础。

1635 年是公认的准噶尔汗国存在的第一年。西伯利亚编年史编纂家切列潘诺夫写道:"在这几年,卡尔梅克台什们有了粗具雏形的准噶尔,因为哈喇忽喇台什的儿子巴图尔台什智勇双全,把分散的卡尔梅克国及其台什们一联合起来,就征服了布哈拉的一部分,于是从 1635 年起,巴图尔台什开始被称为浑台吉。"[3]

2.3 喇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

152

众所周知,蒙古人最初与佛教接触,还在 13 世纪。元帝国时期,佛教受到大汗们的扶持,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蒙古贵族和人民群众中推广佛教。但是尽管如此,当时佛教传播的效果仍微乎其微。随着这个帝国的衰落,佛教的影响也就烟消云散。对传统的萨满教的信仰又重新在蒙古人中占据了优势。这样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最后的 25 年。这时情况急剧变化:喇嘛教迅速变成了蒙古社会各阶层中唯一独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最早为喇嘛教在蒙古草原顺利发展铺平道路的,是东蒙古的汗和王公们。喇嘛教传入卫拉特则晚了 40 年,但是它在卫拉特也像

[1]与和硕特的拜巴噶斯同时并存的盟主。

[2]呼图霍庆巴图尔即巴图尔浑台吉。——译者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196 卷,1542 号,《切列潘诺夫的编年史》,第 184 张。

在东蒙古一样，很快就传播开了。

蒙古史料说，第一个同西藏喇嘛教头面人物接触的蒙古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鄂尔多斯执政者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在红虎年（1566），他侵入西藏，并派遣外交代表团带了一份很像最后通牒似的声明到3位主教处。声明说："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即加兵于尔。"[1]

《蒙古源流》的作者谈到，西藏的几位最高喇嘛收到这份最后通牒，久久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处理。过了3天3夜，他们投降了。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在3位西藏喇嘛的陪同下返回鄂尔多斯。

过了10年之后，到了1576年，洪台吉去拜访他的亲叔叔土默特的俺答汗。当时，俺答汗在跟中国和卫拉特的相互关系方面，取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成就。当提到这些成就时，侄儿劝叔叔相信，必须依靠忽必烈汗本人崇敬和扶持过的那个教来巩固和发展这些成就。他还
153 说，由于汗年事已高，依靠这个教尤为重要。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建议俺答汗邀请西藏最高喇嘛锁南坚错[2]来蒙古。在其他王公的赞同下，俺答汗派遣特别使团专程去西藏邀请锁南坚错。西藏的这位最高喇嘛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且很快就动身启程。1577年他来到库库淖尔，蒙古的地方领主隆重欢迎他，并慷慨奉献赠品。沿途同样隆重地把他一直迎到俺答汗的牙帐中，这已经是1578年了。夏天的第一个月，在这里举行了王公与僧侣的代表大会。这次会在元以后的蒙古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蒙古世俗政权和喇嘛教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使之合法化。这些准则在决议中被固定下来，决议由5个要点组成，称作"十善福经"。其中一个要点专讲主教的各种权利和特权，用咒语或坏事侮辱僧侣的罪犯，应该受到与被侮辱者身份相应的惩罚。另外一个要点是：禁止用属于死者的马匹、骆驼以及其他牲畜来祭献亡灵。从前都把这种牲口杀死用来殉葬，殉葬的牲口数按死者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情况而

---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75页。

〔2〕锁南坚错是喇嘛教中格鲁派，即黄教的首领。此人以后被称作第三世达赖。——译者

定。新制度规定,今后祭祀用的牲口,一律不准宰杀,而要奉献给寺院。所有俗人都必须遵守规定的斋戒日:不杀生、不妄取、不撒谎等等。[1]

俺答汗授予西藏最高喇嘛以"达赖喇嘛"称号。[2] 从此西藏喇嘛教的首领经久不变地被称为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从自己方面也慷慨授予蒙古封建主以各种世俗的和宗教的头衔和称号。这就开创了二者间的同盟,它一直存在到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之前。

据《蒙古源流》记载,若干世俗封建主对喇嘛教的影响和特权的增大,曾试图加以抵制。例如,1582年,俺答汗卧病不起。土默特曾有王公和大臣要求把喇嘛们从蒙古驱逐出去。他们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如果喇嘛们连汗都不能援救,那么,其他人还能对喇嘛指望些什么呢?[3] 不过,这类尝试既很罕见,也不是典型的。蒙古汗和王公们与喇嘛教的关系,不是这种尝试所能决定的。相反,这种关系的特点倒是利益完全一致、互相声援和阶级合作。蒙古汗和王公们采取种种措施,以便使喇嘛教能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人民群众的意识。同时,他们残酷镇压和迫害萨满教、萨满巫师及其信徒,大规模建造寺院和庙宇,鼓励阿拉特改当喇嘛,当了喇嘛就可以完全豁免赋税和徭役。喇嘛教则从自身方面劝人们相信: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是徒劳无益和罪孽深重的;俯首听命是命中注定;汗和王公的权力是神灵所赐等等。喇嘛教的首领们同时为封建阶级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一些汗和王公的没有机会成为领主的幼子,他们出任宗教职务可大开方便之门。无怪乎锁南坚错死后(1586年),俺答汗的曾孙云丹坚错[4]成了西藏的最高喇嘛,[5]即喇嘛教的主要领导——达赖喇嘛。他是整个喇嘛教史上担任过这一职务的唯一的蒙古人。至于喇嘛教,在封建神权统治的西藏,由于各封

154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198页。

[2]达赖喇嘛的全称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自俺答汗赠予锁南坚错达赖喇嘛称号后,黄教首领始称达赖喇嘛,后人追认锁南坚错以前的两世黄教主教为第一、第二世达赖,锁南坚错为第三世。——译者

[3]萨囊彻辰:《蒙古源流》,第206-207页。

[4]云丹坚错即所谓第四世达赖喇嘛。——译者

[5]《黄册》,第80页。

建集团间长期进行的争权斗争，表现为“红教”和“黄教”这两个主要喇嘛教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喇嘛教的头面人物对蒙古封建主的帮助，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

蒙古王公们一开始就积极利用喇嘛教及其影响来为自己争夺特权，而喇嘛教也认为这是巩固它在蒙古的影响和增加自己财富的补充手段，因而不拒绝任何人向他请求这种帮助。喇嘛教领导人慷慨颁封
155 轰动一时的头衔和受人尊敬的称号，以此强调汗和王公们的才能和功勋。他们广开喇嘛教万神殿之大门，把某个封建主奉为某某佛爷的呼毕勒罕（化身）。结果，在蒙古很快出现了比西藏本土还要多的呼毕勒罕。1604 年，西藏最高喇嘛派代表彻甘诺门汗（也叫满达里呼图克图和沃契达拉呼图克图）去土拉河沿岸一带观察蒙古局势。他实际上成了蒙古汗和王公的政治顾问。这一切都促使喇嘛教在东蒙古各汗国和公国中取得特殊的成效。

在蒙古西部的卫拉特人中，这一过程进行得略有不同。只是到了 17 世纪 20 年代中期，喇嘛教才开始在这里顺利发展。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认为，发起信奉喇嘛教的人是土尔扈特的诺颜——赛英台奈思麦根台曼奈。他当时与卫拉特东南部的集团毗邻，并且和绰罗斯一起游牧。[1] 大约在 1610 年，他向卫拉特丘尔干的头面人物——和硕特的拜巴噶斯以及他的弟兄和其他领主，提出信奉喇嘛教的有关建议。拜巴噶斯有意接受建议，但与西藏没有直接接触使这件事情障碍重重。可见，与东蒙古执政者的敌对关系，使得此事无法利用捷径——穿过库库淖尔直接去西藏，而必须走越过昆仑山脉那条非常艰险的路。显而易见，同西藏没有直接联系以及跟东蒙古执政者不和，是喇嘛教在西蒙古较晚传播的原因。

156 根据加班沙拉勃的资料，通过阿克苏和巴里坤开辟了一条去西藏的道路，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越过昆仑山。彻甘诺门汗以达赖喇嘛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 11 页；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 66－67 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 年，第 49 期。

代表的身份从东蒙古来到了卫拉特。加班沙拉勃谈到，最初，拜巴噶斯本人曾决心脱离尘世，出家当朵内（贵族喇嘛），因为他“多次听彻甘诺门汗说，我们的内外世界本性都是虚无缥缈的，是要毁灭的”[1]。但是其他卫拉特执政者没有同意。他们针对拜巴噶斯所处的丘尔干首领的地位，对他说：“没有你，我们将很难维持国家的统一。”[2]史料没有记载，哪些执政者反对拜巴噶斯放弃对卫拉特丘尔干的领导权，也没有说清楚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的统一”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些执政者之中大概不会有绰罗斯的哈喇忽喇，因为他独揽大权的计划只有拜巴噶斯离开之后才能实现。很可能，反对拜巴噶斯离开的，主要是那些不愿让哈喇忽喇的地位加强的执政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说的统一卫拉特国家的含义也就容易领会了。

那些反对拜巴噶斯辞职去当喇嘛的卫拉特执政者，求助于彻甘诺门汗，请他说明，让拜巴噶斯一人当喇嘛好，还是让每个诺颜各出一子当喇嘛更好，更有利于喇嘛教务。彻甘诺门汗回答说，众人积德比一人积德更好。

于是，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绰罗斯的哈喇忽喇、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和硕特的昆都仑、绰罗斯的楚琥儿以及其他许多卫拉特领主各献出一子当了朵内。至于拜巴噶斯，他当时还没有孩子，于是便从和硕特诺颜巴巴汗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也把他献出当了喇嘛。拜巴噶斯仍然留任卫拉特丘尔干首领的职务，而他的这个义子后来成了名声显赫的喇嘛教活动家，以咱雅班第达的名字载入了蒙古史册。

从《咱雅班第达传》中知道，他生于1599年。他在被献去当朵内 157
那年刚满17岁。由此可见，卫拉特封建主大约在1616年前后正式宣布喇嘛教作为他们的宗教。这样也就证实了前面提到过的俄国使者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庆的话，他们两人曾亲眼目睹1616年从东蒙古来的喇嘛们使卫拉特居民信奉了新教。[3] 1617年，咱雅班第达来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2页。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2页。
[3]《俄蒙关系史资料（1606—1637）》，第53页。

到西藏，在那里研究佛教的“学问”、理论和喇嘛寺院的实践。1639 年，他返回故乡，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展开了各方面的活动。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西蒙古兀鲁思中，萨满教的受排挤和喇嘛教的传布，也像在东蒙古一样进展得异常迅速。但是，喇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存在一些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后来卫拉特各公国和汗国的所有喇嘛教史上都留下了痕迹。在西蒙古没有建立呼毕勒罕制度，这里寺院和喇嘛的数目只有东蒙古兀鲁思的几分之一。结果，喇嘛教在卫拉特居民群众中的影响，也因种种特殊情况，终究不像东蒙古那样深入人心。

我们认为，应该从前面已经提过的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卫拉特领地的军事、政治和地理状况的特点中，去找寻这一现象的原因，这些特点决定了西藏喇嘛教和卫拉特封建主的联系不太紧密，决定了他们的相互帮助和相互结盟在当时对双方的利害关系都比较小。此外，世俗政权逐渐集中到追求独裁的卫拉特汗手里，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形成中的准噶尔汗国的首领。这个事实不可能不反映到喇嘛教与世俗政权的相互关系上。

158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无论在准噶尔汗国，还是在卡尔梅克汗国（伏尔加河的），都没有形成像东蒙古所出现的那种喇嘛教集权组织的原因。

准噶尔汗国的形成是许多内、外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下述几个基本因素。

牲畜总头数的自然增长造成了土地的相对紧张，这种情况又由于封建领地被无休止地分割而更加严重。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要求经济流通中增加新的牧地。卫拉特领地内部缺少空地，促使其执政者走上相互争夺和对外扩张的道路。与邻邦的军事斗争失败造成牧地进一步缩小，这又使封建主之间的内部斗争日趋尖锐。内讧既削弱了直接参与者，也削弱了整个卫拉特社会。这样就出现了危机，它威胁着卫拉特封建领地本身的生存。可能，正是这个时候，卫拉特封建主利用了蒙兀

儿斯坦彻底崩溃的有利形势，开始到伊犁河谷地区定居。

部分卫拉特封建主向西北人烟稀少，而且几乎不设防的库隆达草原、额尔齐斯草原和伊希姆草原迁移，这也是摆脱这一危机的尝试。迁移开始于16世纪最后几年，或者17世纪头几年。

正在探讨的这个时期里，卫拉特社会内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以拜巴噶斯汗为首的和硕特王室与以哈喇忽喇为首的绰罗斯家族之间的争权斗争。看来，在这场斗争中，拜巴噶斯代表了一部分反对中央集权的封建贵族的利益；而哈喇忽喇则依靠了另一部分贵族，他们力求统一卫拉特领地并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这样一个中央政权是有效抵抗外来进攻的重要条件，也是有效地向外扩展以便占领异族的牧地、牲畜和农奴的极重要条件。不过，这场斗争的紧张程度是逐渐增长起来的。159
特别是在最初，哈喇忽喇独揽大权的计划并不是主要的，尤其不是唯一的促使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以及许多其他领主迁居俄国境内的原因，尽管这个原因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逐渐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迫使这个集团的执政者从蒙古西部地区迁离的主要原因，是已经提到过的土地紧张。它是由于畜群增长，封地被分割得日益零散以及战争失败而造成的。也正是在这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部分东蒙古汗和王公曾一度离开蒙古中心地区，而到阿拉善、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一带定居。后来，到了17世纪二三年代，若干地方执政者不愿听命于哈喇忽喇和巴图尔浑台吉的中央集权，又一次引起内讧加剧，引起以和硕特的图鲁拜琥（顾实汗）为首的一个新的领主集团向紧挨西藏的库库淖尔地区迁移（1635—1637年）。

起初，达赖、和鄂尔勒克和其他领主的迁移，曾取得卫拉特汗和王公们的丘尔干的赞同。迁走的各执政者没有失去与他们的联系，始终参与商议全卫拉特的一切事务，参加共同攻打阿勒坦汗和哈萨克人的战争，参与接受喇嘛教事宜，参加全卫拉特的代表大会等等。某些研究者的论点是错误的：他们断言，迁移的人组成了单独的“卫拉特联盟”，目的似乎是为了摧毁他们去伏尔加河沿途的阻力；有些人还认为，联盟

的目的在于反对哈喇忽喇;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在于反对俄国当局。而实际上,这段时间也像较早的那个时期一样,卫拉特封建主忽而组成联盟,忽而废除联盟而变成昨日盟友的敌人。这些联盟寿命极为短促,它的成员极不稳定。卫拉特社会也像整个蒙古社会一样,突出的特点是封建割据。

160 史料没有提供一丝一毫的根据,足以肯定和鄂尔勒克、达赖台什和顾实汗的迁移是卫拉特封建主搞专制计划的结果。这个计划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重建成吉思汗帝国,建立新的游牧帝国。不应该把迁移看做是具有征服性目的的攻势行动,而应该看做是找寻出路的尝试,以摆脱不利的经济和外交状况。

与波兹德涅耶夫和其他一些研究家的意见相反,在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期,卫拉特汗和王公们积极的外交活动,绝不仅仅局限于跟喀尔喀封建主打仗。根据史料的记载,东蒙古与卫拉特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552、1562、1574、1587、1608—1609以及1618—1620年。而且这些战争只是到了16世纪快结束时才开始越出无足轻重的局部边境冲突的范围,而具有了严重内战的性质。蒙兀儿斯坦这个强国的覆灭和彻底崩溃促使卫拉特领主和东土耳其斯坦公国间的武装冲突大大减少,最后终于完全停止。但是,卫拉特和哈萨克封建领地的执政者之间的冲突,却日趋频繁。哈萨克封建主也深感牧场不足,而力求把卫拉特人完全驱逐出谢米列契。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之初,哈萨克执政者拥有统一的哈萨克早期封建国家的实力和资财,所以胜过了七零八落、孤立割裂的卫拉特领地,使卫拉特人遭到了失败。17世纪时,哈萨克封建主和东蒙古阿勒坦汗初具规模的统一行动,造成了对卫拉特汗和王公们的直接威胁,推动他们走上克服各自为政,建立统一国家的道路。

卫拉特封建主接受喇嘛教作为正式宗教,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这一事件的基础是汗和王公们的军事、政治利益,他们根据东蒙古封建主的经历确信,与西藏喇嘛教结盟意义重大。而对于喇嘛教来说,获得新
161 信徒也预示着将有大量特权。与东蒙古领地相比,具体历史环境的特

点既决定了西蒙古接受喇嘛教较晚，也决定了卫拉特的喇嘛教组织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差别。史料记载没有证实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他过于夸大了卫拉特人改信喇嘛教的文化、历史意义。不过，这些资料也推翻了另一种论点：根本否定蒙古人放弃萨满教而接受喇嘛教有任何积极意义。宗教思想的统一，在当时不可能不为促进全蒙古的统一奠定某种思想基础，有了这种思想基础就能克服封建割据，并在其他有利条件具备时进而统一全蒙古。同时，在发展蒙古族的文字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某些新成就，对印度和西藏的古代文化有所了解，抛弃了萨满教的某些野蛮仪式等等，也是接受喇嘛教的直接结果。

俄国对卫拉特领地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卫拉特执政者，因为莫斯科允许他们在“适宜的地方”自由游牧，答应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敌人的袭击，在贸易、收税等等问题上一再迁就，但是，要求卫拉特人用转入俄国国籍、履行“始终不渝地”服务于俄国沙皇的义务，来换取这一切。这种“纵容”政策符合当时俄国统治阶层的利益。俄国的如意算盘是：借助这些措施，不使用武力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领地。

162

3　17 世纪前半叶末期、后半叶初期的准噶尔汗国

巴图尔浑台吉及其第一个继承人僧格执政时期(即从 1635 到 1671 年),卫拉特封建国家发展的总趋势是它的内部团结和外交地位的巩固。不过,这种发展并不是始终如一和不间断的,它具有不稳定和曲折发展的特点。

与卫拉特较早时期的历史不同,史料对这几十年的历史介绍得比较详细。咱雅班第达的传记、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的两部《故事》,波波夫、乌斯宾斯基、瓦西里耶夫、施拉姆等人的著作中所搜集、翻译和综括的中国作品,还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和苏联科学院档案馆的俄国档案资料,综合起来,可以为比较充分地研究各历史事件的进程提供基础性资料。

尽管如此,仍须指出,整个说来文献中对准噶尔汗国历史上这一时期事件的研究和阐述还是不够的。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对于上述这一时期的卫拉特历史中许多重要问题(无论是一般的,还是较个别的),彼此的说法有着重大的分歧。

波兹德涅耶夫研究了维谢洛夫斯基所发表的翁科夫斯基的准噶尔旅行日记以后,写信给维谢洛夫斯基说:"原来,这位旅行家的记载与张诚的记载完全不一致,而张诚的记载又和中国史学家的记载不一
163 样……为了把这些记述的混乱情况弄清楚,由于您发表了这本日记,使我想再考察一下蒙古——卫拉特本身的两本《故事》对这一时期是怎样阐述的。顺便提一提,迄今为止,这两部《故事》在欧洲还根本没有被详细研究过……结果是,这一切虽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但同时又跟

以前知道的内容出入很大。”[1]

当时在卫拉特历史事件中占中心地位的主要人物是准噶尔汗国的奠基人和汗国的第一任执政者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他的对内政策在很多方面无疑具有进步的性质。但是研究家们对这位活动家的历史作用评价各不相同。例如，比丘林倾向于把他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他写道：“巴图尔浑台吉对于厄鲁特就像彼得一世对于俄罗斯一样，不过他没有什么组织，没有前例可循，也缺乏一些领导人。”[2]帕尔莫夫的意见有所不同，他肯定说：“准噶尔的巴图尔浑台吉俨然把自己设想成新的成吉思汗，并且抱定宗旨要使全蒙古从属于自己。他的贪权不仅阻碍了西蒙古各部落的巩固联合，而且造成了东、西蒙古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而在东蒙古人中间也出现了一个同样贪权的人，他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全蒙古的领袖，这个人就是察哈尔汗——林丹。”[3]这两位研究家对巴图尔浑台吉的活动所作的评价，就是这样有着天渊之别。同时必须指出，企图把巴图尔浑台吉和察哈尔林丹相提并论的说法之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只需看前者登位称汗和后者的灭亡是同时的就够了。其他历史学者的意见介于比丘林和帕尔莫夫的这两种极端的主张之间。[4]

关于巴图尔浑台吉死的时间，也是众说纷纭。帕拉斯把这个事件 164
归到1665年，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归到1663年，米勒和费舍尔认为巴图尔浑台吉死于1660年，而贝科夫在他的文件资料中则注明这位准噶尔执政者死于1650年。上述分歧的原因在于，巴图尔浑台吉的去世在俄国史料中没有得到任何明显的反映。我们在后面将谈到，《咱雅班

---

〔1〕波兹德涅耶夫：《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Кистории Зкнгарских калмыков），载维谢洛夫斯基：《遣往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洪台吉处的炮兵大尉翁科夫斯基代表团及其1722—1724年的旅行日记》（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чжи Цеван-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за 1722—1724 годы），彼得堡，1887年版，第239－240页。译者按：张诚（Cerbillon）为法国神甫，1638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来中国，著有《张诚日记》一书。

〔2〕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28页。

〔3〕帕尔莫夫：《17—18世纪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历史初探》，第12页。

〔4〕参看维尔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关于卡西莫储王和王子的研究》，第2卷，第381页；格里戈里耶夫：《巴图尔浑台吉》，第76页；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中国西部游记》，第97页。

第达传》唯一确凿可靠地说明了准噶尔汗国第一任执政者的死亡和出殡的情况。

巴图尔浑台吉的继承人是谁？何时开始继位？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不少争论。例如，波兹德涅耶夫反对张诚、翁科夫斯基、比丘林和其他许多学者的意见，而断言巴图尔去世到噶尔丹继位这期间，在汗国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僧格，而是他的哥哥车臣台吉（波兹德涅耶夫不知为什么称他为车臣汗）。波兹德涅耶夫写道："若仔细研究一下当时卫拉特的历史，不难发现，巴图尔浑台吉死后，在准噶尔王公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是车臣汗，而绝不是僧格，他似乎是一个只起次要作用的平庸人物……巴图尔浑台吉死后，也就是从 1653 年到这时（到 1659 年。——兹拉特金），僧格恐怕还没有被公认为准噶尔部的合法领主。如果说后来受到了公认，那是他通过比较长期的斗争和努力才获得了这个权力的。而且，统治准噶尔诸部（即绰罗斯族的各领地。——兹拉特金）的权力仍然不等于对整个卫拉特联盟的统治权，并且这方面……很难设想，僧格曾被认为是卫拉特王公大家庭中资格最老的人。"[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也迟疑而没有回答有关巴图尔浑台吉的第一个继承人的问题，只认为僧格登位是在 1665 年。[2]

165 看来，上述分歧是由于这些作者所利用的史料各有特点所造成的。众所周知，张诚只使用过满洲的官方文件和蒙古的口头传说。比丘林像往常一样仅仅参考中国历史著作，而这些史籍通常是在所写事件发生数十年之后，根据查问的资料写成的。至于波兹德涅耶夫，他只以蒙古编年史的记载为依据，而忽视了这类编年史的大部分作者受过中国官方史籍的强烈影响，并受过 18 世纪中期以前变成了清朝的政治工具的喇嘛教的强烈影响。

这一章我们所利用的主要史料是 3 部卫拉特历史著作（《咱雅班

---

〔1〕波兹德涅耶夫：《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史》，第 244－245 页。

〔2〕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 2 卷，第 642 页。

第达传》和两部《故事》)以及俄国档案资料。卫拉特资料的重要优点之一是:它们既反映了准噶尔封建主的利益和思想意识,同时又完全未受来自中国或俄国方面的影响。至于俄国的档案资料,下面将会见到,在许多方面大大补充和明确了蒙古史料,其中包括卫拉特史料的记载。[1]

3.1 巴图尔浑台吉的内外政策

17 世纪 30 年代中期,当巴图尔浑台吉上台执政时,卫拉特社会的总形势和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相比,有了明显好转。它已经不受西面和南面敌人的威胁,不久以前,这两面还都是强大的蒙兀儿斯坦的领地。后来,这一带为互相不断仇杀和争战的许多汗、伯克和苏丹所占据。而且也像以前一样,争斗的双方仍不惜邀请卫拉特领主们率兵相助。出兵干预的结果,只是更加削弱吐鲁番、喀什、和阗、叶尔羌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其他伊斯兰教领地。史料常常举出某些卫拉特领主"帮助"某一伊斯兰教执政者反对另一个伊斯兰教执政者的情况,相反,也举了个别伊斯兰教执政者"帮助"某一卫拉特领主反对其竞争者的情况。[2] 同时应该指出,在 17 世纪的史料中几乎没有提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汗和苏丹侵犯过卫拉特的领地。 166

卫拉特封建主与哈萨克封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了重大改变。如果说在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与屡遭战败的分散无力的卫拉特公国相对立的是团结统一的哈萨克国家,那么后来,力量对比就开始改变为有利于卫拉特汗和王公们了。这是由于卫拉特领地在哈喇忽喇的控制下逐渐地统一了起来,也由于捷维克力诸继承人的汗权削弱和哈萨

---

[1]作者借此机会向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的热忱协助减少了作者查阅档案存件工作的困难。同时,作者也对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员斯列萨尔丘克(Г. И. Слесарчук)和戈尔曼(И. Гольман)深表谢忱,他们为筹备出版而对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存案进行了长期研究。本章中所利用的俄国档案资料大都是他们挑选出来的。

[2]巴托尔德:《关于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谢米列契史略》;也可参看瓦利汉诺夫:《关于南路六城市的状况》。

克斯坦分裂成许多独立领地的缘故。

来自阿勒坦汗方面的威胁也有所减弱，尽管这一王朝的代表人物很长时期里还始终是卫拉特封建主在东蒙古的主要敌人。在这里力量对比的趋向不是有利于阿勒坦汗的国家，尽管在17世纪30年代时，他们还控制着蒙属阿尔泰西侧的大片领土，这片领土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是属于卫拉特封建主的。1640年夏季，被托博尔斯克将军派往巴图尔浑台吉处的一位俄国使者的一段叙述可以证实这一点。据这位使167 者说："浑台吉在蒙古边境的和布克赛尔天然界区建造了一座石城从事耕耘，并要在这座小城里居住。"[1]可见，巴图尔浑台吉本人认为上述天然界区（它的正确名称是和布克赛尔[2]）是东蒙古和他的领地之间的疆界，位于黑额尔齐斯河[3]南岸斋桑湖和乌伦古湖[4]之间，略偏两湖南侧。

整个说来，巴图尔浑台吉即位时，准噶尔汗国的外部政治地位是相当巩固的。

汗国内部的形势要复杂得多。大部分土尔扈特人和一部分杜尔伯特人向伏尔加河迁移，减少了西蒙古卫拉特居民的人口。据史料记载，大约减少了5万户，每户平均以4人计算，则减少的人口总数不下20万。巴图尔浑台吉上台执政不久，和硕特就开始向库库淖尔迁徙，更加大大减少了汗国的人口。[5] 因此认为离开故乡游牧区迁往伏尔加河一带草原和库库淖尔草原的人数不少于30万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这

---

〔1〕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38张；也可参看米勒：《西伯利亚史》（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456－465页。

〔2〕和布克赛尔即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州首府。——译者

〔3〕黑额尔齐斯河即斋桑湖以东的额尔齐斯河，又称哈喇（蒙古语"黑"的意思）额尔齐斯河。——译者

〔4〕乌伦古湖即布伦托海，应为今双湖地区。——译者

〔5〕据蒙古史料记载，和硕特的主要执政者拜巴噶斯汗本人的卫队由16000士兵组成。每个士兵以4口人之家计算，则汗的臣民就有64000人。但是其他和硕特王公也还有卫队。顾实汗离开准噶尔也不是一个人，和他一同去库库淖尔的还有不少和硕特家族的领主。所以可以认为，跟他们一起迁离准噶尔的人口，总共不少于10万。

自然不能不削弱刚刚形成的年轻的卫拉特封建国家。[1]

决定准噶尔内部局势的另一颇为重要的情况，是某些地方执政者不愿服从中央汗权，他们力求保持或恢复失去的封建自主权。 168

除了上述种种情况之外，还必须补充说明，满洲扩张的危险日益增加。1634 年，几乎与巴图尔浑台吉即位同时，满洲征服者击溃了蒙古南部最大的察哈尔汗国。随后，满洲皇帝便开始准备立阿巴孩为南蒙古封建主的统治者，这在 1636 年得到实现。

至于俄国方面则给予准噶尔汗国以一定的支持，因为俄国当局无力在这一地区执行积极的扩张政策，当时只求使俄国边境免受骚扰，所以汗国政权的巩固是与它的利益休戚相关的。同时，俄国当局极力通过和平手段[2]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巴图尔浑台吉以这个汗国执政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活动。他执政 20 年的特点不是战争，不是外交活动，而主要是针对国内情况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汗国的团结，促进汗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消除同东蒙古领主间的内讧，团结全蒙古的力量以便反击来自满洲封建主方面的与日俱增的威胁。自然，巴图尔浑台吉执行的内、外政策的基础是卫拉特封建主的阶级利益，对于他们来说，保持独立是垄断剥削汗国劳动居民的主要条件，这跟他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

〔1〕波兹德涅耶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正是 17 世纪 30 年代“应该看做是准噶尔人力量增强的最光辉的时期。当时，卫拉特人统治了西起里海沿岸，东到阿拉善以及北起乌拉尔，南到印度边境这一大片领土。这种实力使卫拉特人有可能接着又占据了东土耳其斯坦，而到 17 世纪末则进而扩大到征服全蒙古，结果只是由于满洲人的庇护才使最后这个地区没有完全服从于卫拉特的统治”。（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及其与俄国的关系》，第 144 页）

〔2〕从沙俄当时的档案记载看，俄国当时在其这一南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确实并不充足，有时一个城堡中，如库兹涅茨克堡等不过几百士兵，当卫拉特人游牧到西伯利亚一些城市时，这些边城往往向莫斯科告急求派兵增援。这是因为沙俄认为对待卫拉特这种游牧民族可以利用收买、利诱，贸易交往这类软硬兼施的手段达到使之臣服的目的，因此其扩张兵力主要放到了向西部和东部的扩张计划上了。——译者

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初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与和硕特执政者——拜巴噶斯汗的弟弟图鲁拜琥(后来称顾实汗)的冲突。后者和其他几个兄169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山脉的西部和南部,伊犁河与额敏河的谷地。史料没有记载这次冲突的原因以及冲突是如何发展的。只知道,巴图尔浑台吉和图鲁拜琥之间的关系紧张,以致引起武装冲突,但是这场冲突很快就以和解告终。[1] 不过,此后不久,图鲁拜琥和大部分其余的和硕特执政者放弃了塔尔巴哈台一带待惯的地方,而转移到东南部库库淖尔一带,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和硕特国家。[2]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蒙古史料没有直接说明,按中国史料的记载,和硕特人在库库淖尔定居是1636到1638年间的事。由此可见,他们开始从准噶尔迁离不会迟于1635年。[3]

巴图尔浑台吉曾想方设法让和硕特人返回故乡,如果这不可能,哪怕能与他们建立紧密的友好关系并能加强合作也好。史料证明,巴图尔的军队参与过顾实汗在西藏的远征,其结果,黄教派的宗教封建主以及和硕特王公成了西藏统治阶级的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把女儿嫁给拜巴噶斯汗之子鄂齐尔图台吉,与和硕特家族结了亲(并且说服鄂齐尔图台吉返回准噶尔)。1639年,鄂齐尔图台吉已经在和硕特的原牧区接待从西藏归来的咱雅班第达了,他在鄂齐尔图台吉那里度过了1639—1640年的严冬[4],在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期间,鄂齐尔图台吉始终是他的忠实朋友和同盟者。据咱雅班第达的传记和加班沙拉勃的《故事》证明,正是从那时起,卫拉特丘尔干的首领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合约尔台吉"——即绰罗斯的巴图尔浑台吉及和硕特的鄂齐尔图,后来达赖喇嘛授予后者鄂齐尔图车臣汗称号。在17世纪40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2页。

[2]兹拉特金随意把四卫拉特的一部——和硕特部称作"国家"是毫无根据的,游牧民族跟随封建领土游牧到新的牧地是很正常的现象,各部领主1640年都参加研讨本民族大事,可见仍然都是同族领主,根本没有分立为国家。——译者

[3]施拉姆:《甘肃与西藏边区的蒙古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制度》,第35页;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66页。

[4]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5页。

年代，他的领地分布在斋桑湖到巴尔喀什湖，以及楚河、伊犁河到阿亚古斯河之间，直到辉特索尔多台什游牧的裕勒都斯山。 170

巴图尔浑台吉不仅差强人意地调整了与和硕特的关系，而且也调整了与当时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和鄂尔勒克和其余土尔扈特执政者的关系。他娶了和鄂尔勒克的一个女儿为妻，从而与土尔扈特家族结了亲。我们发现，在1644年去巴图尔浑台吉处的托博尔斯克非世袭封建贵族克列皮可夫使团的材料中，巴图尔浑台吉的和解政策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和鄂尔勒克在阿斯特拉罕地区的行动使俄国当局感到不安，俄国方面建议讨伐和鄂尔勒克。这位准噶尔统治者对此建议答复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和鄂尔勒克的女儿——和鄂尔勒柯娃嫁给了他，如果打仗，让孩子们去打父亲吗？望皇上关照，不要令他去打，他不可能参战。而且，他的朋友们——其他台什也不会去打和鄂尔勒克的"[1]。

巴图尔浑台吉的政策产生了效果。土尔扈特的执政者大多数也以友爱作为回报。根据加班沙拉勃的记载，和鄂尔勒克曾对自己的儿子们说，他始终是全卫拉特盟的参加者，如果他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耽延，王公们都会等待着他。[2]

俄国史料证明，17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巴图尔浑台吉的劝说和战争的失利，土尔扈特执政者当真准备离开伏尔加河流域，返回准噶尔。阿斯特拉罕将军列普宁在汇报1645年10月到1646年元月期间各类人员为他搜集的大量情报时，在给莫斯科政府的信中写到了这一点。一个提供情报的人对将军说："远处的大卡尔梅克人（卫拉特人。——兹拉特金）召他们（卡尔梅克人。——兹拉特金）迁回原牧地，说像这样游牧到伏尔加河，只能把人员丧失殆尽……远处的卡尔梅克人不再顾虑他们回去。远处卡尔梅克人的使者喇巴（喇嘛。—— 171
兹拉特金）住在舒盖伊和马密林台什处。"另一个情报人员说："他听卡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1645年，第1卷，第19张；也可参看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87张反面至92张。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5页。

尔梅克人说，他们各台什商议之后，欲迁回原牧区，因为远处的卡尔梅克人遣使威胁，嘱咐他们迅速迁回。”第三个人报告说：“卡尔梅克台什们携兀鲁思属民，开始从萨克帕拉河天然界区向远处的卡尔梅克人那边迁移，同行的有其使者喇巴……据卡尔梅克人说，要是他们那里没有远处卡尔梅克人的使者，而他们自己的使者从阿斯特拉罕回来，能得悉俄国的阿斯特拉罕属民会与他们和睦相处”，那么他们就不考虑回准噶尔了。第四个和第五个情报人员告诉将军说：“远处卡尔梅克人的使者——喇巴……住在爱尔岑和舒盖伊两位台什的卡尔梅克兀鲁思中。据说，远处的卡尔梅克人向近处的卡尔梅克人要3000户带家小和牲畜的牧户。舒盖伊和爱尔岑台什对使者喇巴表示一定交付3000牧户。”[1]当时俄国当局收到这类消息非常之多。毋庸置疑，这些消息反映了“近处的”卫拉特领主欲返原牧区，回“远处”卫拉特人那里的计划。的确，这个计划在各执政者首先是在巴图尔浑台吉的思想上已经酝酿成熟了，他曾派遣特使带着这一任务去伏尔加河。可见，他已经不怕土尔扈特与和硕特回来将重新引起土地紧张。不但如此，他还对土尔扈特的执政者说到，离开准噶尔只会使他们损失更多人。所有这一切可以看做是一种证据，它证明，汗国的外部局势非常巩固，已经不那么害怕与邻邦发生武装冲突了；也证明内部处境基本改善，因为整个准噶尔草原当时又重新成了卫拉特的牧地。但是土尔扈特王公归来的计划却因故未能实现，原因我们后面再谈。

172

巴图尔浑台吉力求尽可能拉拢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与自己保持紧密联系。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他们间的接近不是没有困难的。1636年初，巴图尔浑台吉曾非常慎重地表示过他对杜尔伯特执政者的影响问题。当俄国使者托米拉·彼得罗夫受托博尔斯克将军的委托要求卫拉特当局把被杜尔伯特王公和其他王公俘去的俄国人查清并遣返回国时，巴图尔浑台吉回答：“他将遣使跟库依什和达赖台什谈有关俘虏的问题。他本人若遇到他们两人，也一定跟他们谈一谈……可是如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卷宗，1646年，第1卷，第53、54、56、58、60、69张。

果他们不听从，不交出塔拉和秋明的俘虏……他也无法强制他们。但是他浑台吉是不会与俄国人打仗的。”[1]不过，巴图尔浑台吉的劝告看来对达赖台什有相当的影响。因为过了不久，后者便遣使到托博尔斯克进行解释，并提出种种保证。使者声称：“达赖和库依什台什跟浑台吉是亲戚，关系友好。”[2]据俄国史料记载，达赖台什死于1637或1638年，对巴图尔浑台吉始终忠诚不渝，合作共事。

喀尔喀、库库淖尔、准噶尔以及伏尔加河流域的汗和王公们举行的大会是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是1640年9月初在准噶尔汗国领土上的塔尔巴哈台召开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44位著名的封建蒙古的活动家。喀尔喀由札萨克图汗素巴弟和土谢图汗衮布代表；年迈的车臣汗硕垒派了两个儿代表自己；也还有其他喀尔喀王公们。从库库淖尔来的是顾实汗，带了几个儿子和亲戚；从伏尔加河来的是和鄂尔勒克跟他的儿子们。大批王公代表准噶尔汗国本土出席了大会。宗教界的封建主也参与了大会的工作。只是没有南蒙古封建主的代表，不过，当时他们已经正式地并且在实际上臣服了满洲皇帝。 173

我们所知道的蒙古（其中包括卫拉特）的和俄国的史料中，对于准噶尔大会的准备情况和工作情况记载得很少。可能，藏文史料的记载会丰富一些，可是藏文史料对历史科学来说，还是无法利用的。17—19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和中国史料，以及两部卫拉特《故事》，甚至都根本没提到这次大会。《咱雅班第达传》只有一次很简要地提到，在龙年（1640）曾召开七旗（即喀尔喀）和四卫拉特的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札萨克图汗、“合约尔台吉”（指卫拉特的鄂齐尔图车臣汗和巴图尔浑台吉）等等。[3] 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史料中所能汲取的全部资料。虽然我们不了解大会的细节，但是却知道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文献中称作《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察津·必扯克）》。大会参加者隆重宣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41－42张。

[2]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42张；也可参看米勒：《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63页。

[3]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7页。

誓严守制定的法规,蒙古—卫拉特法规的原文本落到了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国,18 世纪发现后,已译成俄文发表。

说这部法规是第一流的史料并不过分。它使人们既便于了解蒙古社会的内部生活,也便于了解该社会当时的外部局势。这部法规的编写基于下述 3 个方面的目的:调整封建主内部的相互关系并排除内讧的可能;保证在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危险的斗争中,能统一部署力量并互相支援;巩固封建秩序,巩固汗和王公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

"察津·必扯克"的前面一部分条文专讲保障蒙古的内部和平问题。条文规定,如果一个执政者进攻某一个大的蒙古领地,则所有其他"蒙古人(指喀尔喀人。——兹拉特金)和卫拉特人都应该联合起来",严惩和平的破坏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和牲畜。其中一半归受侵犯者,而另一半平分给卫拉特和蒙古(喀尔喀)各执政者。如果侵犯小的领地,肇事者必须偿付罚款——"100 副铠甲、100 头骆驼和 1000 匹马"。破坏者所侵占的财产应该归还或赔偿被侵犯者。[1] 对侵犯大、小领地规定的制裁法不同,大概是由于立法者认为第一种情况有发生震荡全国的严重内讧的危险,而第二种情况则只是局部意义的冲突。

174

在"察津·必扯克"中,抵御外部危险的措施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得知敌人入侵,却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广泛告急的人,处以死刑。"凡看到或听说敌人入侵,知情不报者,处死,籍没其财产,赶走其子孙后代。"奉召不到集合地点参加进军,以及在战斗中不援救处境危急的王公者,均应处以死刑。重要的是指出,批准"察津·必扯克"的立法者认为,需处死刑的只有违犯这 3 条的人。其余所有的过错和罪行,在他们看来都不太严重,不需要如此严厉的惩处。在战斗中胆小怕死的人,应该给他穿上女人衣裳,让人耻笑。打仗时破坏制度贪图虏获物的人,应该分别酌情惩处。作战时表现英勇忘我的人,应予勉励嘉奖。[2]

---

[1]戈尔斯童斯基:《1640 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第 36 页。

[2]戈尔斯童斯基:《1640 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第 37 页。

许多条法规谈到，有必要妥善解决旧日的纠纷和相互的不满，因为这些问题长期孕育着武装冲突和内讧的可能。大会决定消除1628年以前相互有过的不满，并不准再提。“察津·必扯克”说道：“从火蛇年（1617）开始到土龙年（1628）为止，在蒙古人那里的（即在喀尔喀执政 175
者那里的。——兹拉特金）巴勒古特人、巴图特人和辉特人应当留在蒙古领地上；而在卫拉特那边的则留在卫拉特领地内。今后应立即向彼此交出所有投奔来的家庭。违者应付罚金，拖延交出1个逃跑者，应付罚金20匹马和2头骆驼……如果逃跑者来到谁家，应剥夺逃跑人的一半财产，而把他们本人交还……凡收容逃亡者并拒不交出他们的王公，应处以罚金。”[1]

毫无疑问，这些法规的基础是力求消除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的矛盾。就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法规可以看做是一个独特的和约。它对以往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的战争作了总结。它的作者对妥善解决旧日的纠纷和相互的不满，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希望以此为喀尔喀和准噶尔封建主之间新的和睦关系，甚至同盟关系扫清障碍。

喇嘛教的条文在“察津·必扯克”中占有显著地位。这些条文以法律形式规定喇嘛教为全蒙古所有汗国和公国的正式国教。这些条文公开向萨满教和萨满巫师宣战，同时鼓励阿拉特改当喇嘛。实际上，早已形成了的喇嘛教与蒙古封建主的结盟，在《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中得到了法律上的又一次肯定。

这部法规的颇大一部分直截了当地规定巩固农奴制和加强封建主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法规中规定，阿拉特随意离开自己的封建统治者，不按时完纳规定的赋税和劳役，不听从王公和官员的命令或侮辱他们，盗窃他们的牲畜等等，都要受到严惩。法规中有一条说：“凡侮辱大王公者，没收其家产；凡侮辱王公的官员或‘塔布囊’[2]者，罚牲畜9头；凡动手打了的，罚45头；凡侮辱小王公或其‘塔布囊’的，罚牲畜5头 176

[1]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第38页。

[2]“塔布囊”是汗或王公的女婿。

……从其他领主处逃奔来的人，一律遣返原处……如果供应大王公的食物中断（指食物地租的供应。——兹拉特金），罚牲畜81头；如果供应官员或其‘塔布囊’的食品中断，则罚9头；如果供应小王公或其‘塔布囊’的食品中断，罚马1匹。”[1]法规允许对违反其老爷意志的阿拉特施加体罚，而且把受罚者鞭打致死也不算犯罪——对打死他的人不追究责任：“凡高官王公及其‘塔布囊’、随臣（管家），或者小王公及其‘塔布囊’、‘代姆奇’和‘舒连克’，为了执行大汗的谕旨、法令而鞭打某人，这没有过错；若殴打致死，也不加罪。”[2]

“察津·必扯克”广泛涉及了蒙古社会内部生活及其外交状况的许多重大问题。它的条文令人信服地证明汗和王公们力求巩固蒙古的封建制度，力求以各汗国和公国结成的特殊联盟为基础来统一蒙古，这些汗国和公国是由于其执政者的共同阶级利益以及为了相互帮助来抵抗共同的外部敌人而结合在一起的。[3]

史料未提谁是召开准噶尔大会的倡议者，谁起草了“察津·必扯克”的条文以及讨论的情况如何等等问题。因此，有些史籍曾断言这一文件的作者是巴图尔浑台吉，这不能认为已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可能：巴图尔浑台吉为了联合全国的力量来反击外部敌人，曾企图克服国内的封建割据和分散性，并在这方面的尝试中起过主要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一任务，他不是像也先和达延汗时期那样强制地方执政者服从中央汗权，而是选择了谈判和商议的方法。巴图尔浑台吉对待满洲扩张的态度如何，就其细节来说，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史料可以确定，他有生之年从未同那些征服者有过接触，尽管他们成绩很大，尽管在准噶尔大会之前喀尔喀封建主已经和满洲皇

177

〔1〕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第40页。

〔2〕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第40页。

〔3〕柯津也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把蒙古—卫拉特法规认为仅仅是关于军事联盟的协议。他写道：“怎么也不能不把这个文件看做是一个采取共同行动，以防止侵略掠夺攻击的军事同盟一类的东西，其矛头主要是指向日趋强大而且已经并吞了部分蒙古人的满洲大清王朝。这个联盟包括了卫拉特联盟和大部分喀尔喀蒙古人。”见柯津：《江格尔传》，第9页。

帝保持了定期的联系，而在大会后不久库库淖尔的执政者以及达赖喇嘛本人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甚至连跟中国进行贸易交流这种有关切身利益的事，也没有迫使他与清政府发生过一次交往。准噶尔大会活动的和平与统一的方向，是与巴图尔浑台吉寻求可靠途径来巩固蒙古的封建制度并保证它的政治独立这一内、外政策的性质基本一致的，这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巴图尔浑台吉在蒙古—卫拉特法规的条文起草方面，以及在召开批准这部法规的大会方面起过主导作用的揣想是有根据的。大会不是在喀尔喀，不是在库库淖尔，也不是在伏尔加河召开，而是在准噶尔汗国的中心，在巴图尔浑台吉及其朋友与同盟者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的牧区上召开的，这一事实是肯定上述揣想的补充佐证。

《咱雅班第达传》提到，大会之后，咱雅受喀尔喀札萨克图汗素巴第的邀请去喀尔喀，这一记载值得注意。“蛇年过后（即 1641 年初）咱雅班第达动身离去……他从札萨克图汗处应邀去土谢图汗那里。随后他又接到麻哈萨马吉车臣汗的邀请。咱雅班第达用神圣的教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成了七旗（即喀尔喀。——兹拉特金）三汗的喇嘛。”[1] 喀尔喀三汗劝说咱雅班第达在喀尔喀逗留二三年，但他不肯，而在 1642 年返回了准噶尔。 178

我们有理由推测，咱雅班第达作为喀尔喀三汗的客人，在那里推行的是准噶尔大会上通过的路线。恐怕不能怀疑：他和巴图尔浑台吉一样是清朝的反对者，并且不赞成采取讨好清朝的政策。据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记载，大会后过了 10 年，即 1651—1652 年间，咱雅班第达二次去西藏回来时，跟库库淖尔的执政者——顾实汗之子和继承人达赖洪台吉进行了一次交谈。后者表示对清朝皇帝非常尊敬，并且劝咱雅班第达请求清帝协助传布教义。这位传记作者写道：“格根[2]回答：‘可能你是对的，不过汗是高傲的。回家之后我再细说。’后来咱雅班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7 页。

〔2〕格根是西藏喇嘛教对喇嘛的一种尊称，有师傅、管事之意。——译者

第达说,他确信此汗(指满洲皇帝。——兹拉特金)造孽不规。"[1]这个证据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咱雅班第达和巴图尔浑台吉对清朝执行了同样的路线。我们期望,当藏文史料将来在学术界得到通用时,能彻底阐明这个问题。咱雅班第达在1651和1661年去西藏旅行时,同喇嘛教一些高级主祭谈话的内容,那时也就会更清楚了。

必须着重指出,咱雅班第达积极促进了准噶尔大会的思想和决议的贯彻。他的传记的作者似乎记录了咱雅的一举一动,描绘了他那满腔热情的活动,描写他既风尘仆仆地奔波在汗国的领土上——从一个领主处到另一个领主处,也不断旅行到汗国境外——喀尔喀、伏尔加河、库库淖尔。这些旅行的目的在于灭绝萨满教,促进使汗国消灭封建主之间时常爆发的争吵与冲突。通过巴图尔浑台吉和咱雅班第达的努力,准噶尔汗国和这一汗国的巴图尔牙帐在短暂的时期里,成了吸引全蒙古,吸引所有蒙古汗国和公国的中心。

但是,国内的和平景象不是,也不可能是长期的。从17世纪40年代中期起,和平环境开始遭到破坏,转为准噶尔内部和蒙古其他各部内战频繁的新时期。

179 不过,在阐述汗国1634—1654年间的战争史和外交史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巴图尔浑台吉的若干值得注意的重大经济措施——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建设城市型的固定居民点。

1638年12月,巴图尔浑台吉遣使乌鲁斯凯向托博尔斯克将军普罗斯基要20头猪和10只小狗。[2] 一年后,即1639年12月,托博尔斯克将军遣往巴图尔浑台吉处的哥萨克人阿勃拉莫夫返回了托博尔斯克。与阿勃拉莫夫同来的有巴图尔的使者乌鲁斯凯和诺耶台,他们重申了自己首领的要求:除了铠甲、枪炮和铅弹以外,还要"用于繁殖的母猪10头,公野猪3头,公火鸡和母火鸡各1只以及10只小叭儿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0页。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3卷,第58张。

狗”[1]。浑台吉亲自对阿勃拉莫夫说,他需要这些牲畜是“为了在蒙古边境的基布克赛尔(应为和布克赛尔。——兹拉特金)天然界区建造一座石城从事耕耘,并要在这座小城里居住”[2]。阿勃拉莫夫在准噶尔时听说,在这座城里“浑台吉处住着一位喇巴,为浑台吉制定耕作方法。耕地的是布哈拉人,播种麦和黍,种子是从布哈拉运来的,不过浑台吉本人在此城还没有住过,他在附近的牧区游牧”[3]。

另一位俄国使者芦卡·涅乌斯特罗耶夫在1641年末返回托博尔斯克后报告说,他8月5日来到浑台吉的牧区,“浑台吉当时不在兀鲁思,他在城中自己家里,从事耕耘。使者在兀鲁思住了两周,没见到他。浑台吉让他们到城里去找他。到城里时,浑台吉骑马站在城边耕地附近,见了使者就下马问候皇上身体健康”[4]。

1642年夏,俄国当局把2只母火鸡、1只公火鸡、4头母猪、2头骟猪和10只小狗转给了巴图尔浑台吉。同年,巴图尔浑台吉还在和布克赛尔接待了另一位俄国使者拉里昂·纳索诺夫。[5] 180

因公去巴图尔那里并于1644年2月返回托博尔斯克的哥萨克伊里音,提供了关于准噶尔汗国“城市建设”的新资料。他报告说:“浑台吉现在在库布克(还是指和布克赛尔。——兹拉特金)他自己的城市附近游牧。浑台吉有3座砖城,全是白的,据说要新造第4座城。城与城之间相距一天路程。这些城市里住着浑台吉的喇巴和耕地的人,而浑台吉就在这些城市附近游牧。”[6]

还是在1644年,巴图尔浑台吉在致俄国沙皇米哈依尔·费多罗维

---

[1]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34张反面;也可参看米勒:《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5页。这一要求在1642年夏季得到了满足。

[2]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38张。现在中国新疆还留有这座古石城的遗址,但看不出人居的住房的遗存。在这界区不仅有可耕耘的特色,而且富产煤矿和食盐,是十分富庶之地。——译者

[3]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39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59张。

[5]参看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55-56张反面。

[6]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51张。

奇的信中，要求再给他10只大母鸡、5只小母鸡、7头母猪和3头骟猪。[1] 1645年，这些母鸡、母猪和骟猪都转送给了巴图尔。[2]

1650年末，托博尔斯克遣使克列皮科夫去这位准噶尔汗处，使者回来后报告说，浑台吉要求给他“木匠、泥水匠、铁匠、铠甲匠各两名……还要20头母猪、5头骟猪、5只公鸡，10只母鸡”[3]。

我们掌握的有关巴图尔浑台吉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料大致如此。完全有根据认为，他是准噶尔这些新型经济活动的倡导者和第一个组织者。后面我们还将看到，他的汗位继承人以及某些臣服于他的领主，都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他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如果这些经济事业由于某种
181 原因停顿，他们便竭力加以恢复。

巴图尔浑台吉所建造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前面引过的俄国档案文件谈到，最早的居民，也可能连城市的建设者都是喇嘛。由此可见，巴图尔首先建造的是寺院。在他之前，准噶尔没有固定的喇嘛寺院，他开创了寺院的建设。像蒙古各处一样，用石头和砖瓦修建的寺院成了定居的基地。寺院左近分布着汗和王公们的附设有各办事部门的牙帐。商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建立起货场并从事贸易。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在寺院城市的四郊播种了庄稼。据俄国史料证明，巴图尔浑台吉在很短的时期里建造了4座这种城市，因此可以认为，他既力图从俄国得到木匠和泥水匠，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寺院城市的建设。

为什么巴图尔对种庄稼这样关心呢？史料对此问题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依靠本身的生产来满足汗国对农产品的需要，几乎是巴图尔浑台吉的所有继承人都关心的事情。显然，发展本身的农业是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严肃考虑，是出于渴望汗国不再依赖外国市场供应它经常需要的农产品的考虑。17世纪中期，这方面的情况特别严重。西蒙古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断到上述这些事件发生时，大约经历了200年。通往中亚市场的道路上布满了哈萨克封建主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第1卷，第3张。

[2]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118－119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155卷，第484张。

的领地，17 世纪俄国西伯利亚本地生产的粮食甚至不能自给自足，当然不可能供应准噶尔的居民。只有东土耳其斯坦的伊斯兰教领地能充当以粮食供给卫拉特人及其汗国的角色，但是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状况变化多端，所以这一供应来源也很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的汗和王公们不能不考虑在自己的领地上发展粮食生产。只要汗国的内、外形势相当稳定，马上就出现耕田种地的局面。至于种地的人，据史料证明，不是卫拉特人，而是所谓的布哈拉人，即从东土耳其斯坦和中亚迁来的移民。这些移民有的是被卫拉特封建主俘虏来的，有的是自愿投奔准噶尔汗国的。 182

1654 年去中国而几乎途经准噶尔全境的俄国使者费多尔·贝科夫在他的文件资料中指出："在那条捷米丘尔基小河上住有布哈拉人——浑台吉的孩子们的种地人。"这些布哈拉人在浑台吉孩子们的领地内种地，贝科夫在另一处记录了他得到的有关巴图尔所建造的城市的资料。"据说，小城是黏土筑的，其中两个殿是石头的神像殿。城里住有喇巴和种地的布哈拉人。"[1]

不过巴图尔浑台吉并不是唯一的农耕组织者和城市建造者。和硕特王公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弟兄阿巴赖台吉，几乎是和他同时开始这样做的。费多尔·贝科夫见过阿巴赖建造的城市："那里住着卡尔梅克喇嘛……喇嘛的住处附近建有两个很大的佛像殿，它由焙烧过的砖砌成，他们的住房则是黏土的。喇嘛住处附近长着庄稼，有很多麦和黍，种地的是布哈拉人"[2]。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准噶尔汗国首领对内政策的基本方向及其效果的资料就是这些。这些资料证实了汗国在绥靖和统一整个北蒙古，无论是其西部还是东部，也无论是库库淖尔卫拉特人，还是伏尔加河卫拉特人的道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汗国虽没有能使全部和硕特人从

---

〔1〕贝科夫（Ф. И. Байков）：《俄罗斯使节费多尔·伊萨科维奇·贝科夫 7162（1654）年 6 月 25 日去中国的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Федора Исаковича Байкова в Китай 7162（1654）года，июня 25 Дня），莫斯科，1788 年版，第 126 页。

〔2〕贝科夫（Ф. И. Байков）：《俄罗斯使节费多尔·伊萨科维奇·贝科夫 7162（1654）年 6 月 25 日去中国的游记》，第 127 页。

库库淖尔返回，也没有能使土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返回准噶尔，但是汗国巩固了与所有卫拉特领地的合作，不管它们分布在什么地方。

巴图尔浑台吉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巩固与俄国、哈萨克斯坦和
183 东蒙古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的联系。

准噶尔汗国的首领认为，处好同莫斯科的睦邻关系有巨大意义，并竭力消除达到这点的障碍。他非常重视莫斯科政府方面所表现的善意关怀，同时把它看做是巩固其国内地位的手段之一。1644 年初，巴图尔浑台吉对托博尔斯克将军的使者哥萨克人伊里音说，他很珍视与俄国沙皇的友谊。“浑台吉向所有卡尔梅克台什夸耀皇上的恩惠，夸耀皇上赐他皇赏，并使他处于沙皇仁慈的抚育之下。”[1]

俄国当局和准噶尔汗国之间频繁地互遣使团，是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一件突出的事情。史料中保存有关于 33 个外交使团的可靠资料，其中由巴图尔亲自派出的和直接派到他本人那里来的不下 19 个。我们有理由认为，实际上使团的数量还要大得多。

那么，是什么事情把准噶尔汗国和俄国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些使团奔波的目的何在呢？准噶尔汗对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俄国的实力和影响以利于巩固他在汗国内部的统治，也是为了加强汗国对其邻邦，首先是喀尔喀领土的控制。至于俄国，它的政策的主旨在于保障俄国边境不受侵犯，保障俄国当局对那些与准噶尔汗国的领地毗邻
184 的地区享有特权。现在来举几个例子。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托米拉·彼得罗夫在 1636 年春曾去准噶尔，要求停止向俄国臣民征收实物税，并要求交还卫拉特王公在塔拉和秋明两县俘去的人。他返回托博尔斯克以后，汇报了与巴图尔浑台吉谈话的内容。浑台吉说道：“他父亲哈喇忽喇台什曾效忠皇上，没有打过各城镇、州县，也未派人进行过骚扰。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649 张。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俄国与准噶尔的关系在斯列萨尔丘克的一部著作中进行了专门研究。书名是《17 世纪中叶与准噶尔交往的历史档案资料》（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с Джунгарией Всередине XVII в.），载《俄国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经济史和史料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соп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периода феод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61 年版，第 260－265 页。

为此，他父亲很受皇上赏识。因此，他浑台吉也要效忠皇上。那些叛离俄国的人，巴拉巴鞑靼人……是他们自愿来到这兀鲁思的，并非俘来。而库拉台什背着浑台吉抓来的人，已经归还了。其余叛逃来的人，待查明后一定交还，今后不接受类似的逃犯入其兀鲁思。并且命令其属人在亚梅什湖附近协同俄国人搬盐上船，提供骆驼……过去浑台吉曾向巴拉巴鞑靼人征收过实物税，现在浑台吉恳请皇上收这个税，他今后不再去征收了。"[1]巴图尔浑台吉这番表白非常明确地反映了他想报答俄国沙皇的厚待，为此他不仅准备归还处在他的领地内的所有被俘俄国臣民，而且准备为采盐和运盐提供劳动力和运输工具，还准备为俄国国库的利益放弃征收边境居民的实物税。

1636年，巴图尔浑台吉通过俄国使者普罗特尼科夫及自己的代表库缅，直接向托博尔斯克将军表示自愿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击对俄国城乡可能发生的侵袭。[2] 当时的将军捷姆金·罗斯托夫斯基委托其使者托米拉·彼得罗夫在答复时，赞扬浑台吉愿对俄国效忠，将军方面则答应"如果浑台吉及其弟兄们受到谁的压迫，可遣使告知托博尔斯克，他们就会按谕旨从各个城市派兵援助，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犯"[3]。 185

与喀尔喀阿勒坦汗的角逐也迫使巴图尔浑台吉必须取得俄国沙皇的宠信。这点在1638年秋天带着"俄国沙皇的奖赏"去阿勒坦汗那里的瓦西里·斯塔尔科夫的分项文件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斯塔尔科夫在吉尔吉斯兀鲁思突然遇见巴图尔浑台吉的一位年轻台什所指挥的百名卫拉特武装人员。这位台什不肯说自己的名字，他对斯塔尔科夫说："皇上赏识阿勒坦汗，赐他许多赏物……可是阿勒坦汗哪方面比我们巴图尔浑台吉强……他用什么效忠了皇上，做了什么好事，从他那里又有什么好处可得？而我们巴图尔浑台吉和其他众台什却对皇上陛下大有好处：供给各城市大量牛马和其他牲畜，这使你们西伯利亚各城市肉食富足。我们还运来各种皮货进行贸易。这些东西都能使皇上得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40、41、44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0张反面。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1张。

到好处。”卫拉特人威胁说要抢去斯塔尔科夫带给阿勒坦汗的珍贵物品，但是他们没有去实现这种威胁。斯塔尔科夫对卫拉特人抗议的原因是这样解释的：“他们黑卡尔梅克人（指卫拉特人。——兹拉特金）深感不幸，因为皇上赐大量赏物给阿勒坦汗，而没有给他们，连一个台什也没赏赐过，所以他们抱怨阿勒坦汗。”[1]

斯塔尔科夫的解释不是没有根据的。巴图尔浑台吉的确因为那些年莫斯科给予阿勒坦汗的特殊优待而深感不快。浑台吉的代表在与俄国当局的多次谈判中一再转到这个话题上。1639 年末，巴图尔的使者乌鲁斯凯在托博尔斯克说：“皇上赏识阿勒坦汗，准他的使者到莫斯科皇上身边来，而浑台吉多方面为皇上效劳，皇上却看不起他，不让他的使者去莫斯科见皇上。只要皇上赏识浑台吉，准他的使者到莫斯科皇上跟前来，浑台吉将比以往更忠心地为皇上效劳。”[2]为此，莫斯科终于取消了原来的禁令，并允许巴图尔浑台吉的使者进首都。

186

但是在禁令取消之前，尽管受了委屈，准噶尔汗国的首领也还是一直“效忠”俄国沙皇的。还在 1635 年，他上台执政不久就命令领主库拉台什把侵袭时抓来的俄国臣民以及背叛沙皇迁来准噶尔的属民一一退还，而且“浑台吉不准今后再接纳俄国叛徒们来其兀鲁思”[3]。以后几年中，巴图尔浑台吉一再要俄国使者确信，如果他能看到俄国沙皇的“恩惠”，他的“效忠”也一定倍增。1639 年，他对使者德鲁任纳·库拉金说，“他的父亲哈喇忽喇台什效忠皇上多年，皇上给他父亲的恩惠和奖赏也很优厚，他父亲的使者在此之前经常在莫斯科皇上身边。而现在连蒙古使者也允许去莫斯科见皇上，却不让他浑台吉的使者从托博尔斯克去莫斯科皇上那里”[4]。

1640 年，他曾向俄国使者阿勃拉莫夫申述过类似的请求。浑台吉曾通过阿勃拉莫夫要求：“希望皇上给他一些奖赏，指派俄商携带商品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38 年，第 1 卷，第 17、18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99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49 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53 张；也可参看米勒：《西伯利亚史》，第 2 卷，第 456－465 页。

去他那里。而他则将命令库拉台什去咸水湖(指亚梅舍夫湖。——兹拉特金)过一春,在那里接受皇上的赏赐,并为皇上效劳:运盐上船。为了搬运和商人乘坐需要,随库拉台什派出拉车骆驼100头。"

俄国史料使我们可以断言,巴图尔浑台吉在自己执政的年代从未敌视过俄国。他也严格地要求准噶尔所有领主这样去做。有些王公以 187
及古楚汗的继承人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共同对俄国某些城市采取行动的建议,他都断然拒绝,力求保持与俄国接壤地区的和平。[1]

不过,更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俄国和准噶尔汗国的利益任何地方都没有抵触,也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矛盾冲突。引起经常冲突的基本矛盾是居住在边界地带的民族和部落的国籍问题,即谁是他们的君主,谁有权向他们征收实物税这类问题。如上所述,准噶尔汗国的首领有一次曾宣称准备放弃征收实物税并承认俄国沙皇有征收此税的特权。但是以后的事件证明,那只不过是巴图尔浑台吉在执政第一年所做的一种姿态而已。在以后的年代里,双方使者几乎在每次会晤时都提出征收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图瓦人、巴拉巴人以及南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其他居民的实物税问题。谈判过程中,巴图尔浑台吉向使者们建议让双方——俄国和准噶尔汗国都能为本身的利益无阻碍地向上述部落和民族征收实物税。于是就产生了实际关系中所体现的两面进贡和双重国籍的主张,后来在这一地区形成的这种实际关系存在了将近100年。正如我们所见,提出这个主张的人就是巴图尔浑台吉。1640年10月,他首次向托博尔斯克将军的代表明索伊·列密佐夫说出了这种主张。巴图尔非常坚决地表示:"吉尔吉斯人是他的属民……如果现在皇上要向吉尔吉斯人收实物税,就下令去收,可他浑台吉仍要向他 188
们收自己的税。"也就在那个场合,他对俄国政策的两面性提出了意见,他的话说明了这种政策:"你,明索伊携带皇上的赏物、礼品来我这

[1]托博尔斯克的将军普罗恩斯基向莫斯科报告说:"据从托博尔斯克和塔拉城派往浑台吉那里的托博尔斯克和塔拉的军人以及尤尔托夫的鞑靼人说,浑台吉是效忠于您皇上的,因为有些卡尔梅克台什派人去他那里,要他派人攻打俄国城市,他拒绝了。他本人不愿来打俄国城市,并制止那些台什这样做,而嘱告他们说,'如果他们要去打俄国城市,他本人就对之进行讨伐,还要把消息报告塔拉城。'"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2张。

里，而另一方面，俄国人却在攻打我的属民。”[1]

过了一年，巴图尔浑台吉的使者向托博尔斯克的将军申诉说，就在1640年那年春天，“他浑台吉的属民——吉尔吉斯人来他这里缴实物税”，托木斯克的军队袭击了他们，抓走一个吉尔吉斯人，把这人关进了托木斯克监狱。浑台吉要求采取措施以便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 1641年8月，巴图尔浑台吉告诉托博尔斯克使者涅乌斯特罗耶夫说：“巴拉巴鞑靼人是俄国属民，他们背叛皇上到他那里来了。他并未召引他们并还给了皇上，而鞑靼人情愿向他缴鹰翎作实物税，因此，他就收下了。”[3]

必须指出，这个时期西伯利亚地区所存在的国籍与实物税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在几个世纪中，居住在这一带的部落与民族间的关系只受强权的支配。战场上失败就使战败者从属于胜利者，沦为必须向胜利者缴纳实物税的所谓克什提姆。在16世纪末以前，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的封建领地是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其他许多较弱小的部落和民族都作为克什提姆从属于他们。蒙古阿勒坦汗国的建立和它的扩张，改变了原有力量的对比，吉尔吉斯人和他们的克什提姆都成了阿勒坦汗的克什提姆。新邻邦——准噶尔汗国和俄国的出现，使情况更加复杂。加剧了争夺属民的斗争，特举1644年8月22日西伯利亚衙门给托博尔斯克库拉金将军的信中所叙述的事件为例。这封信责成托博尔斯克当局寻找“没有向我们缴实物税的新州，迫使那些牧民臣服于沙皇陛下，若他们不臣服，不交税”，就用武力胁迫。将军执行了这一指示，其中马杜、吐托什和凯捷盖茨等游民不愿臣服俄国并不愿交实物税，为了使他们臣服，不得不使用了武力。不久后查明，以前他们把实物税交给“浑台吉和吉尔吉斯人，而且还有其他地方的人向他们收税”[4]。

189

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就常常发生争端和相互的不满，使贪求实物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115卷，第34、35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257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63张。

[4]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95张反面至98张反面。

税的双方有爆发严重冲突的危险。巴图尔浑台吉向克列皮科夫申诉说,俄国人夺去了从来就是向他缴纳实物税的开尔萨加尔州,并要求归还此州。[1]

我们认为,上述资料就足以说明准噶尔汗国和俄国之间在当地部落和民族的国籍问题上,以及在向他们征收实物税的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的性质。尽管我们看到,这些矛盾相当严重,但在巴图尔浑台吉执政的年代,如果不把几次纯粹局部意义的零星事件看做武装冲突的话,矛盾并没有导致武装冲突,而是通过双方实际上承认的双重国籍和两面进贡的办法得以解决。

看来,巴图尔浑台吉之所以采取忍让态度,是由于他很了解同俄国打仗是无益的,是没有前途的。这样的战争不仅会毁灭他的政权,而且会削弱汗国本身。发动反卫拉特的战争对俄国当局也没有好处。西伯利亚衙门1645年元月20日致库拉金的信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信中令他遣使去浑台吉处,"说出他的一切不对之处,但不要对他大肆寻衅"[2]。

双方不仅都不想打仗,而且还希望得到对方的军事援助以反对各自的敌人。 190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1639年巴图尔通过托米拉·彼得罗夫向俄国当局提出的建议——派浑台吉的军队去打那些会侵犯俄国城市的人。托博尔斯克的普罗恩斯基将军接受了这一建议,也保证,如果巴图尔一旦感到需要,可以给他提供军事援助。于是,1641年2月,巴图尔的使者向托博尔斯克要求:"希望皇上关照浑台吉,因为他需要借俄国军队来反击敌人,请下令拨给他1000名俄国士兵。将来为了反对背叛皇上的俄国叛徒和不顺从俄国军队的人,皇上吩咐要多少人,浑台吉一定指令如数拨给。"[3]1641年末,巴图尔在与俄国使者涅乌斯特洛耶夫交谈中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向这位俄国使者打听他的建议的遭遇。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1645年,第1卷,第21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1645年,第1卷,第44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255张。

涅乌斯特洛耶夫回答说,托博尔斯克尚未接到莫斯科政府的指示。听了这一答复,巴图尔说:"一旦皇上下令,就按皇上的意思办。"[1]

1644 年又发生了军事合作的问题,不过这次是由俄国方面倡议的。派往巴图尔浑台吉处的克列皮科夫让巴图尔交还背叛俄国沙皇而投奔他的塔拉和秋明两地的鞑靼属民,并为此答应,皇上将"奖赏"他,保护他免受敌人攻击。[2] 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在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军事行动激怒了沙皇政府,所以克列皮科夫企图说服浑台吉同俄国军队一起反对和鄂尔勒克,但没有成功。俄国当局向卫拉特大领主、和硕特拜巴噶斯汗的儿子阿巴赖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3]

191 俄国档案资料证明,准噶尔汗国和俄国之间关于军事合作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效。我们不知道有哪一次俄国和卫拉特的军队共同采取过某种军事行动。

已经提到过,莫斯科政府坚决不让巴图尔浑台吉的使者去俄国首都,这使巴图尔深感委屈和气愤。他执政的 20 年中,只有过两次直接与俄国政府在莫斯科谈判的机会:1645 年和 1647 年。第一次允许进入莫斯科的有两名卫拉特使臣,文件中称之为丘纳和塞梁。记述这个代表团活动情况的资料,保存得很少。我们只知道,这两位使者到达莫斯科时,沙皇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已经去世,接见他们的是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他们在莫斯科停留不久,同年(1645)12 月 15 日,俄国沙皇交给他们一封给巴图尔浑台吉的嘉奖信。信的措辞泛泛,没有任何具体内容,信中说:"很久以来,卡尔梅克台什们以及卡尔梅克所有兀鲁思人恭顺听命,各皇上陛下都很赏识并进行了保护……而且你们从未脱离过我们父王陛下。"信的作者指出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已死,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登位,随即代表新沙皇赞扬浑台吉效忠沙皇,答应"奖赏"他,"保护"他,允许像过去米哈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662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1645 年,第 1 卷,第 18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273 张。

依尔·费多罗维奇时代一样“免税进行自由贸易”[1]。只有一点是新内容，即提到，如果巴图尔浑台吉坚持的话，莫斯科政府允许托博尔斯克将军放他的使者进俄国首都。

至于卫拉特的第二个外交代表团，只知道它是1647年元月27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去莫斯科的，由纳也岱和塞梁二人组成。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代表团的其他资料。它是最后一个代表团。莫斯科重新禁止托博尔斯克当局放巴图尔的使者去首都，提出在托博尔斯克就地研究和解决发生的问题，只要把谈判的进行情况和结果报知莫斯科就可以了。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自然不能令巴图尔满意。1651年底，巴图尔向托博尔斯克使者贝加切夫抱怨莫斯科不愿接待准噶尔的使者。同时他补充说，“若皇上还看不起他浑台吉，不准他的使者从托博尔斯克去莫斯科，则将军们也不必留他们在托博尔斯克，让他们回卡尔梅克，并希望再也不要派使者来他浑台吉那里”[2]。 192

使俄、卫关系复杂化的争议问题中，没有和组织相互贸易有关的问题。贸易交流对双方同样有利。特引下述事件作为例证。1647年7月，在秋明获悉，一个赶着马匹和牛羊等牲畜的商队向当地走来，随商队同行的是一个由32名卫拉特人和布哈拉人组成的卫拉特代表团。秋明的将军按莫斯科的指示拒绝商队进城，而建议它去托博尔斯克，那里允许同卫拉特人进行贸易。卫拉特使者3次率商队来到秋明，每次都被迫返回。第4次接近此城后，他们宣称：“若现在还不接待他们的使者进秋明，不让他们自由贸易，则不断交、不打仗是不行的。”[3]不过，事情并没有闹到打仗的地步。大概秋明县各阶层居民都是支持卫拉特人的要求的。屠尔格涅夫将军1647年7月给西伯利亚衙门写到了这一点：“值此155年，特叩见皇上……秋明的斯特列尔人和鞑靼人的首领们、贵族子女们、斯特列尔人的百户长们、哥萨克的头目们、立陶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1645年，第1卷，第24－31、95－103、108－117张；也可参看：科学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119－121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11张。

[3]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6册，第120张反面至121张；也可参看米勒：《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519页。

宛人和德国人、契尔克斯人、哥萨克的骑兵和步兵、斯特列尔人、游猎的鞑靼军人、驿站的猎人、工商业者以及种地和交地租的农民，在聚会的
193 屋子里不时把呈文交给我——您的仆人，文中恳请皇上关照他们，准许从卡尔梅克兀鲁思来的贸易使者进秋明，并请准予打破惯例同卡尔梅克人自由贸易.以便他们不致由于没有马匹而最终死亡而不能为沙皇效劳，也使耕农不致因没有马而逃避种地。"[1]过了半年，莫斯科终于允许开放秋明同卫拉特人的贸易。[2]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它具有一些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决定定居务农民族与游牧畜牧民族相互经济关系的一些规律性。与类似的许多其他事件一样（其中某些我们已经谈到，另一些后面再谈），它证明，如果不同定居务农民族搞好交易，就不可能发展游牧畜牧业。而如果双方都由于切身利益而搞好交易，则游牧民族与定居务农民族之间武装冲突的经济基础就会消失。

1634—1654年俄国和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大致如此。整个说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和平睦邻与相互贸易的关系。当然，双方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巴图尔浑台吉需要俄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俄国对准噶尔汗国的需要。前者企图依靠俄国的帮助来巩固自己在汗国内的政权，并把汗国变成统一而独立的封建强国；而俄国当局主要是为了国库和沙皇官僚机构的利益希望巴图尔浑台吉及其从属王公们不要侵入俄罗斯领地，不要妨碍他们剥削西伯利亚当地居民。冲突的唯一根源是有关西伯利亚非俄国居民的国籍以及向其征收实物税的问题。不过这种冲突也很少发生。

194 由于史料极其贫乏，因此很难阐明这段时间里准噶尔汗国与阿勒坦汗国的相互关系。

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在他的《故事》中说道："火鼠年（即1636年。——兹拉特金）木呼儿木吉克汗（有些人叫他木呼儿乌依扎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500、501张。

[2]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132－135张。

克。——兹拉特金)想消灭杜尔本·卫拉特的统治和宗教,想俘虏杜尔本·卫拉特人,就率大军来与卫拉特人作战,打败卫拉特之后想把卫拉特嫩秃黑变成战利品。"但是受其他卫拉特王公支持的辉特执政者爱辛别英赛英夏在军事上的诡诈,使木呼儿木吉克汗的计划未能实现。结果杜尔本·卫拉特不仅摆脱了木呼儿木吉克的统治,而且把他俘虏了。但是过了不久就把他放回本土,因为他发誓今后"蒙古族决不危害卫拉特人"[1]。

加班沙拉勃也谈到了爱辛别英赛英夏和他的诡诈,但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不同,他谈得更加简洁,没有提及任何细节,甚至没有指明所述事件的日期,尽管他的《故事》中有关章节标题为:"杜尔本·卫拉特如何从蒙古人的奴役下解救了自己的鄂拓克"[2]。

所有其他蒙古史料都只字未提1636年卫拉特与喀尔喀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确实发生过,俄国史料对它多少有所记载。

1636年春天,巴图尔浑台吉对托米拉·彼得罗夫说,他现在不能派人去亚梅舍夫湖协助俄国人采盐,"因为蒙古人来进犯他们(指卫拉特人。——兹拉特金)。所有卡尔梅克台什都去打蒙古人了"[3]。1637年春,塔拉的杰姆金·罗斯托夫斯基将军派出的哥萨克首领扎多夫斯基来到顾依什台什的牙帐,但是"顾依什台什等人1636年秋天去打蒙古人了"[4]。扎多夫斯基在顾依什汗的牙帐中住了两个多月。"她(顾依什的妻子。——兹拉特金)得到消息,听说蒙古人打败了顾依什台什和浑台吉,包围了其他人。于是她想游牧到额尔齐斯河和亚梅什湖一带去,以躲避蒙古人。"[5]

195

俄国文件中谈到这次冲突的全部资料就是这些。卫拉特和俄国史

---

[1]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7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91年,第12期。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9页。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41张。

[4]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21张;也可参看米勒:《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42页。

[5]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21张反面。

料所记载的情况使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是:1636 年,卫拉特封建主与他们的东蒙古邻居之间发生过武装冲突。更多的事情我们无从知道。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喀尔喀封建主中谁参与了这场冲突,在哪里打的,结局如何,都不清楚。不过,在蒙古和卫拉特的编年史中以及许多俄国文件中都没有提到这场战争,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1636 年的这次冲突没有什么巨大意义和严重后果。

根据卫拉特、蒙古和俄国的史料,我们可以肯定另外一点:1636 年以后到巴图尔浑台吉执政终了时为止,喀尔喀与准噶尔汗国之间再没有发生过冲突。当然,也不能认为这些年代里友好已经代替了以往的仇恨。相反,以往的不信任、猜疑、时常戒备,有时就引起了无根据的关于双方开仗的传说,这些因素仍然是喀尔喀与准噶尔相互关系方面突出的表现。特以阿勒坦汗给俄国沙皇的一封信为例,这封信写于 1639 年初春,并由汗的使者梅尔根捷加递交收件人。阿勒坦汗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的信中写到,当时他们之间曾达成互相进行军事援助的协议。阿勒坦汗说道:"卡尔梅克人想来打他,所以他需要人,而什么时候要,以后函告。"[1]我们无法说,阿勒坦汗关于卫拉特封建主准
196 备进攻他的消息有多少根据,但是我们确知,他的担心并没有证实,没有任何一个准噶尔汗国的王公进攻了他。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召开全蒙古的领主代表大会,于是,众所周知的 1640 年 9 月这次大会就举行了。但是双方都预想会遭到袭击。阿勒坦汗国和准噶尔汗国两个强大汗国之间关系的紧张状况,清楚地表现在与 1639 年梅尔根捷加外交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本土的有关事件中。托木斯克将军罗莫丹诺夫斯基获悉卫拉特军队出现在阿勒坦汗的使者必经的地区,便挽留代表团在托木斯克等候。由于担心特赐阿勒坦汗的"皇赏"能否安全无恙,罗莫丹诺夫斯基问梅尔根捷加:"托木斯克有消息说,许多黑卡尔梅克人(指卫拉特人。——兹拉特金)来到了吉尔吉斯牧区,他们既未关照,也并不是来探望卡尔梅克人。到底在吉尔吉斯有无阿勒坦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38 年,第 1 卷,第 171 张。

汗的属人，能否携带皇赏通过那里？”梅尔根捷加回答说：“若有卡尔梅克人在吉尔吉斯，他们不能携带皇赏安全通过。卡尔梅克人离去，他们才可以走吉尔吉斯这条路，尽管那里没有阿勒坦汗的属人。”于是，阿勒坦汗的使者在托木斯克逗留了将近3个月，等卫拉特人离开吉尔吉斯牧区之后，才动身回家。[1] 这件事以及前面所举的阿勒坦汗曾向莫斯科沙皇请求在卫拉特军队侵犯时给予帮助那件事，都证明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巴图尔浑台吉了。

卫拉特和哈萨克封建主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情况也与此类似。在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卫拉特与哈萨克封建主之间发生过3次武装冲突：一次在17世纪30年代，一次在1643年，第三次在1651—1652年。关于第一次冲突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西伯利亚史》的作者费舍尔第一个把1635年卫拉特与哈萨克战争的资料载入历史文献。随后，列弗申、比丘林、维尔亚米诺夫·捷尔诺夫、克拉索夫斯基等人都引证费舍尔的记载写到了这场战争。但是费舍尔没有指出其记述所依据的史料。我们所知悉的蒙古史料除了《咱雅班第达传》外，对1635年的战争都一字未提。我们在俄文档案资料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这场战争的任何记载。至于《咱雅班第达传》，其中含混地提了提1643年的卫拉特进军，这次进军是反对占有土尔克斯坦城的哈萨克汗叶西姆的。在这之前，叶西姆之子扬吉儿已经被卫拉特人俘去，不过他被俘后就逃跑了。[2] 我们暂时还说不上扬吉儿苏丹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当了卫拉特的俘虏，但是他曾被俘这个事实本身大概是无可怀疑的。

197

俄国史料说到，1640年9月，哈萨克扬吉儿王子的使者曾在巴图尔浑台吉的牙帐里等候准噶尔汗国的首领回来。明索伊·列密佐夫在他的分项文件中写道：“他，明索伊交出皇赏时，在浑台吉那里的有和鄂尔勒克的儿子伊儿岑台什和哈萨克玉兹扬吉儿王子的4位布哈拉使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38年，第1卷，第154、155张。

[2]费舍尔：《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版，第442页；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11页。

者，以及达赖喇巴。”[1]遗憾的是，明索伊·列密佐夫再没有谈到这个哈萨克代表团的任何情况，使我们无从得知它来访的目的，以及和卫拉特执政者谈判的内容和结果。

俄国和蒙古史料大量地，而且是很详细地叙述了1643年的冲突及其后果。第一个带来有关消息的人是伊利英，他是1644年2月从巴图尔浑台吉那里回到托博尔斯克的。他向库拉金将军报告说：“他们到浑台吉的兀鲁思时，浑台吉不在，他同女婿科齐尔图（指鄂齐尔图车臣汗。——兹拉特金）和阿巴赖（阿巴赖是鄂齐尔图的兄弟。——兹拉特金）带弟弟楚琥儿台什和萨尔多（可能是指辉特的索尔多台什。——兹拉特金），还有黑蒙古人阿勒坦汗之子以及一些小台什，一起攻打哈萨克玉兹的扬吉儿王子，攻打亚兰图什，以及阿尔泰吉尔吉斯人去了，他们共有军队5万人……他们在浑台吉那个兀鲁思里住了4个月，直到他回来。浑台吉打仗回来接见他们时，已经是伊利英住了4个月以后（即7月20日以后。——兹拉特金）的事了。”[2]

198

伊利英的叙述证明，对哈萨克的进军开始于1643年冬季，延续到1644年仲夏，也证明以巴图尔浑台吉为首的整个联盟的卫拉特领主都参加了这次进军，甚至喀尔喀阿勒坦汗的儿子俄木布额尔德尼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受联盟指挥的军队数量相当可观。可是进军的结局却使巴图尔浑台吉及其盟友不太满意。伊利英叙述说：“浑台吉去打扬吉儿王子和亚兰图什时，所带阿尔泰吉尔吉斯和托克马克两个地方的人就近万名。然后通知扬吉儿王子。扬吉儿率兵迎战，他的军队共600人。扬吉儿在岩石中间挖了战壕，战壕里安顿了300名士兵，自己则带了300人隐蔽在石头后面。浑台吉率兵逼近战壕，扬吉儿伏兵冲出战壕，杀了许多浑台吉人。扬吉儿本人又率兵从另一面夹攻。这两次交锋就杀了浑台吉部众近万人。这时亚兰图什又来增援扬吉儿王子，率军两万，赶来作战。浑台吉见大军开到，急忙退却，并带走了从扬吉儿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115卷，第31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46、647张。

那里抓去的人。而现在那些地方据说属于浑台吉了。今春浑台吉还要去打扬吉儿和亚兰图什。”[1]

这一长段摘录对于战役的发展和战斗本身的进程描绘得有声有色。1644 年 2 月来到托博尔斯克的卫拉特阿巴赖台什的使者巴赫特伊的叙述证实了伊利英提供的资料，并作了某些补充。[2]

史料一点没谈及 1643—1644 年卫拉特与哈萨克战争的起因。这场战争对卫拉特社会有重大影响，导致内战的重新爆发。阿巴赖的使者巴赫特伊在同库拉金将军交谈中证明，巴图尔浑台吉远征哈萨克回来，损失惨重。同时这位使者补充说，参加远征的“和鄂尔勒克的部众不多。浑台吉远征回来后，就把和鄂尔勒克的人放回去了，还有阿巴赖和岱青台什的人。随之捎去书信一封，要和鄂尔勒克台什跟他浑台吉协同讨伐达赖台什的子女和昆都仑，因为他们没有配合浑台吉打扬吉儿反而出卖了他。但捎这信的使者在途中被昆都仑台什抓住，并搜去了携带的书信。于是，浑台吉跟达赖台什的孩子们和昆都仑为这件事发生了巨大的摩擦，预料他们非打仗不可了”。阿巴赖派巴赫特伊来托博尔斯克表示准备效忠俄国沙皇：“像他父亲贝八吉什[3]台什那样效忠皇上陛下。现在他，阿巴赖台什准备同昆都仑台什一起为皇上效劳，去打和鄂尔勒克台什。”[4]

199

从巴赫特伊这番话可以看出，巴图尔浑台吉能够牢牢地笼络住在伏尔加河地区逐渐形成的卡尔梅克汗国的执政者——和鄂尔勒克，使他参加全卫拉特对哈萨克的进军。杜尔伯特达赖台什的继承人忙于争夺父亲的遗产而没有参加这次进军，这激怒了巴图尔浑台吉。而和硕特拜巴噶斯汗的弟弟昆都仑台什是巴图尔的夙敌，也没有参加进军，并对巴图尔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至于昆都仑的侄儿阿巴赖台什，由于瓜分父亲拜巴噶斯汗的遗产问题而对胞兄鄂齐尔图车臣汗以及跟他结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650、651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270 - 272 张。

[3]原文系贝八吉什。阿巴赖的父亲应为拜巴噶斯。——译者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455 卷，第 270 - 271 张。

成亲密友谊和同盟的巴图尔浑台吉都有所不满。卫拉特内部封建主之
200 间的旧有矛盾重新暴露出来了，无论“察津·必扯克”还是巴图尔浑台吉的集权意图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这使巴图尔的政策所取得的内部和平和相对统一的局面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伊利英的报告证实了巴赫特伊在托博尔斯克提供的资料。伊利英在巴图尔浑台吉的牙帐中时曾查明，巴图尔与鄂尔勒克相隔很远，约需走5个月，他们间进行交往困难重重，因为“他们之间游牧着许多跟巴图尔交恶的台什：昆都仑台什、达赖台什的子女、扬吉儿王子和亚兰图什……在这年，即152年（1644年。——兹拉特金），浑台吉远征归来，派了40个人并携带书信到他岳父和鄂尔勒克台什那里去，要他岳父派人增援他并出兵攻打昆都仑台什。而他本人得从另一面攻打扬吉儿王子和亚兰图什，因为昆都仑台什不协同他浑台吉攻打扬吉儿和亚兰图什，也不派人，反倒站在扬吉儿一边称他做义子。昆都仑台什在途中截断浑台吉使者的去路，没收了书信，并且不放他们去和鄂尔勒克那里”[1]。巴图尔浑台吉不知道这时和鄂尔勒克已经不在人世，不知道他同契尔克斯人作战时，在伏尔加河右岸被杀。

巴图尔浑台吉决心向哈萨克的扬吉儿以及没有参加远征的昆都仑等卫拉特王公报仇。文件证明，他派了自己的代表到库兹涅茨克县去，在那里有组织地大批收购武器和军事装备物品。他的代表们“向俄国属民购买库亚克（一种古代军人穿的锁子甲。——兹拉特金）、盔、箭、矛和各种铁器”。同时他还派人到吉尔吉斯人那里，“下令向吉尔吉斯人要实物税和马匹，因为他的战马在战斗中大量被打死”[2]。

201 1645年春是否进行了巴图尔浑台吉所预定的对哈萨克扬吉儿的新进攻，史料对此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考虑到正是这时候对昆都仑台什集团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才结束，所以可以认为对扬吉儿的进攻没有举行而推迟了。根据《咱雅班第达传》的记载，卫拉特与哈萨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651－652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准噶尔卷宗，1645年，第1卷，第35、37、38张。

克的又一次战争发生在1652年，而且鄂齐尔图车臣汗的17岁的儿子噶勒达玛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勇猛出众，他在单独决斗中打败了扬吉儿。[1]

有关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卫拉特与哈萨克关系的史料证据就是这些。尽管史料很贫乏，从中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出，力量对比进一步改变为有利于卫拉特国家了。

至于卫拉特的内战，它在1646年爆发后立刻变得非常激烈，而且延续了好几年。《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叙述说，1646年，春昆都仑台什反击两个杜尔本·卫拉特台吉，即绰罗斯的巴图尔浑台吉以及和硕特的鄂齐尔图车臣汗。他调集军队来到库克乌苏河附近的喀拉塔拉地区，"二台吉"的军队也翻过博罗呼济尔山来到那里，在乌哈里克地区进行交战。在和硕特昆都仑台什一边的还有杜尔伯特达赖台什的儿子们。一批批新的参战者卷入了战斗。战斗以昆都仑及其盟友的失败而告终。归途中，昆都仑遇见了从乌拉尔河土尔扈特王公处回来的咱雅班第达。

咱雅了解到发生的事情后，自告奋勇愿意出面调解。1647年冬，昆都仑与鄂齐尔图车臣汗和巴图尔浑台吉举行了会晤，但是没有结果。[2]

据加班沙拉勃和巴图尔乌巴什丘缅证明，昆都仑台什在17世纪40年代末曾去西藏朝圣，途中访问了自己的兄弟图鲁拜琥（顾实汗），对他说："我已变穷，不要对我的财产萌妒忌心；我已失去威望，不要激起我的虚荣心。"[3]

202

巴图尔浑台吉和昆都仑台什之间的斗争在俄文史料中也留下了一定的痕迹。1646年5月底，因各种边境事务来到巴图尔浑台吉处的托博尔斯克使者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在自己的分项文件中谈到了这场战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1页。

〔2〕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11页。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4页。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69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59年，第50期。

争。阿尔申斯基指出，他到达前不久，巴图尔与昆都仑之间发生过战斗，“浑台吉杀了昆都仑250人，而昆都仑杀了浑台吉20人，这场战斗之后彼此讲和”[1]。史料记载证明，汗国的首领和他的盟友鄂齐尔图车臣汗采取了一些恢复汗国和平与内部统一的措施。据1648年末曾到昆都仑的兄弟额尔德尼浑台吉[2]那里去过，并在他的伊尔吉兹牙帐里住了7个月的伊凡诺夫和亚克沙古洛夫返回托博尔斯克之后说，“额尔德尼浑台吉跟和鄂尔勒克的人以及跟哈喇忽喇的儿子浑台吉相互打起来了。他们目睹……带着部众的昆都仑和多叶安布以及其他许多台什，为了进行调解纷纷来到额尔德尼的兀鲁思，想促使他同和鄂尔勒克的人以及浑台吉讲和，可是额尔德尼浑台吉不愿意。于是，昆都仑和多叶安布又带着部众同其他来调解的台什们一起动身前往和鄂尔勒克的兀鲁思进行调解”。但是调解没有成功。回托博尔斯克时，伊凡诺夫和亚克沙古洛夫了解到，“额尔德尼浑台吉把和鄂尔勒克的属民从他们的原牧区赶走了，而把那些牧区据为己有。”[3]

从伏尔加河卫拉特王公的牧区到准噶尔汗国领土的道路上所发生的冲突和公开的军事行动，看来是打破卫拉特人从伏尔加河返回准噶尔这一计划的主要原因。加班沙拉勃说，1632年土尔扈特执政者岱青的牙帐最早设在伏尔加河。“14年过去了，想到向杜尔本·卫拉特所发的誓言，他们开始返回卫拉特人自己的本土。”[4]他的话为前面引过的俄国史料所证实：1646年卫拉特领主准备从伏尔加河迁回准噶尔，但是他们没有到达准噶尔。对于因多次战败而衰弱了的和鄂尔勒克的继承人来说，这条道路是太艰难、太漫长了。他们必须用本身的力量突破通往巴图尔浑台吉领地的道路，战胜阿巴赖、昆都仑和其他敌对集团的阻击。但是依我们看来，巴图尔浑台吉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卫拉特王公从伏尔加河一带回来的事。乌法翻译官基尔扎茨基对阿斯特拉罕

203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321张。

[2]额尔德尼浑台吉名塔尔袞，据《西域图志·准噶尔部世系》记载，是昆都仑之弟扎萨克托音的儿子。——译者

[3]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131张正、反面。

[4]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40页。

普罗恩斯基将军讲到的1653年与土尔扈特执政者蒙恰克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基尔扎茨基说："听蒙恰克台什本人及其兀鲁思人说，今春蒙恰克将同其父和岱青台什一起率领士兵回远处卡尔梅克人哈喇忽喇的巴图尔浑台吉那里去。可是什么时候能到，以及他们走哪个方向，都还不知道。"[1]

看来，巴图尔浑台吉的死以及随之出现的卫拉特封建主的新内讧，迫使卫拉特人放弃了从伏尔加河返回准噶尔的计划。准噶尔汗和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执政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和鄂尔勒克的曾孙，后来的阿玉奇汗从小就在巴图尔浑台吉的牙帐里生活和受教养，只是在巴图尔死后，阿玉奇12岁时，才被送往伏尔加河。

我们的史料中也载有某些有关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卫拉特人民群众的资料。这些资料值得严重注意，它反映了卫拉特社会所存在的阶级矛盾。文件证明，1644年准噶尔汗国发生饥荒，这迫使领主们允许劳动人民暂时迁入俄国边境。关于这一情况，科斯捷列茨基兄弟向塔拉的将军报告过，他们曾去巴拉巴、楚伊、捷列宁等州收实物税，看到"在捷列宁州，浑台吉的9户属民带着妻子、儿女同我们捷列宁的属民住在一起。他们的浑台吉让他们来这里谋生，因为浑台吉那里闹饥荒。现在许多浑台吉属民在离捷列宁和巴拉巴州半天或一两天路程的近处游牧，各处共约60多户，这些人以及捷列宁和巴拉巴的属民均给浑台吉交实物税"[2]。

204

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根据莫斯科的命令，采取了把巴图尔浑台吉的臣民赶出俄国的措施，并遣使携带有关建议去准噶尔汗处。7月底，哈萨克人普罗特尼科夫和去过草原的科斯捷列茨基兄弟之一返回塔拉城汇报说，他们在原地区没有发现卫拉特人，但是回来时，"在巴拉巴州遇到浑台吉的家仆布加契卡及其妻子、儿女。他们问布加契卡是照浑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卷宗，1654年，第1卷，第54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卷，第208－209张。

台吉的吩咐住到俄国巴拉巴州来的还是擅自来的，并叫他离开这里回自己的国土去。浑台吉的那个家仆对加拉辛和费杰卡说，他是自己到巴拉巴来谋生的，不是浑台吉命令他来的，他没有欺负过当地任何居民，也没有给他们造成任何困难”。科斯捷列茨基和普罗特尼科夫所问到的当地俄国居民证明，布加契卡确实安分守己，没有欺凌过任何人。[1]

从后来的情况查明，这类事件并不是表现单个人不满的个别行动，而是说明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他们深受封建剥削的压迫，深受使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无穷战争的苦难。对这种不满的镇压延续了好多年。托木斯克的谢尔巴托伊将军1647年夏给莫斯科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205 他写道，还在1644年就在俄国所属各州出现了“逃跑来的黑卡尔梅克人[2]，他们属于不同台什并惯住在各台什所属地区”。俄国当局要求这些“黑卡尔梅克人”离开俄国境内。“可是，黑卡尔梅克人不听俄国的命令，不离开俄国领土，不离开他们占用的（俄国属民的。——兹拉特金）地段”。随后谢尔巴托伊说出了卫拉特和其他逃亡来的人可能集中的揣测，因此，会产生损害俄罗斯帝王利益的危险。“如果将来，这类逃来的黑卡尔梅克人或者其他地方来的坏人互相混在一起……或者跑到恰茨克和托木斯克的鞑靼贵族和鞑靼克什提姆那些坏人那里去，他们的人就会增多，望皇上不要等那些坏人给俄国托木斯克城干下什么坏事，望不要让他们占有俄国的许多土地。”[3]

在这种情况下，托木斯克当局决定采用武力镇压卫拉特的背叛者。被俘的逃亡来的卫拉特劳动者供称：“他们原属达赖台什与和鄂尔勒克，从这些台什那里逃出来，就住在俄国巴拉巴、捷列宁和黑水一带，已经5年了。”托木斯克将军企图查明，他们迎击俄国军队，是指望什么。俘虏们回答：“彼得·萨班斯基率兵前来时，他们走出帐篷就用弓箭向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239、240张。

[2]即卫拉特人，区别于“白的”或“迁出的”卡尔梅克人，区别于阿尔泰山民。——兹拉特金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252卷，第183－184张。

俄国人射击，这种态度对沙皇是有罪的，不过，他们对谁也不指靠。”[1]

指出下述这点很有意义：在反对卫拉特劳动人民的斗争中，俄国当局跟卫拉特封建主结成了联盟。谢尔巴托伊说：“俄国军队走后，浑台吉的堂兄弟库拉就来打那些聚集在一起的杜尔伯特属民，杀了很多人，并拉走了牛、马等许多牲口。过后，浑台吉的部下玛奇克王公又去打剩下的聚集在一起的卡尔梅克人，又杀了很多杜尔伯特人，俘虏了整个兀鲁思，并赶跑了牛马。”谢尔巴托伊在他的报告结尾写道：“那些逃亡来的卡尔梅克人原属达赖台什与和鄂尔勒克……前几年在达赖台什那里以及在和鄂尔勒克与浑台吉那里曾彼此发生混战。这些黑卡尔梅克人乘混战之际四处逃跑并来到俄国居住……已经6年多了。”[2]

就这样展开了卫拉特劳动人民戏剧般的生活史和斗争史。封建的苛捐杂税和各种劳役，在战争年代变得更加无法忍受，由于忍受不了艰难的生活条件，卫拉特劳动者离开了他们的封建统治者而跑到俄国沙皇的领地里来。他们天真地认为，在这里将可以摆脱封建战祸和封建剥削，有可能安然地劳动。他们不指靠任何人的帮助，跟按照沙俄当局的意志要驱逐他们出境的俄国军队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战斗。此后，这些阿拉特牧户遭到卫拉特封建主的军队的几次进攻而终于被歼灭了。

3.2 17世纪50—60年代的准噶尔汗国

《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写道：“1653年冬，巴图尔浑台吉去世。”[3]咱雅班第达为了参加葬礼来到准噶尔汗的牙帐，对死者做了宗教所规定的一切仪式。[4]

我们不知道巴图尔浑台吉死后的头两年，准噶尔汗国内部发生过什么事。我们所知悉的史料，没有一部提到1655和1656年的事件。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186－187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189、193张。

[3]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2页。

[4]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3页。

我们只能揣测，汗国首领之死直接地，而且是首先影响到实际上由绰罗斯族王公所把持的中央政权的巩固，加剧了准噶尔领主及其克什提姆
207 中间的离心力。我们可以根据俄国档案文件判定这一点。这些文件谈到白卡尔梅克人同卫拉特王公所进行的持久的战争，谈到俄国当局与巴图尔浑台吉的继承人——中央汗权的执掌者几乎长达10年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也谈到了个别卫拉特王公屡次侵袭俄国领地等等。

1657年3月，来到托博尔斯克的使者是巴图尔浑台吉的遗孀达里班奇、她的儿子鄂乔和卓特巴巴图尔、鄂齐尔图台吉和阿巴赖台吉、辉特的索尔多台吉、噶勒达玛和玛拉伊等人的代表。使者们要求遣送他们去莫斯科。[1] 经过一段时间，托博尔斯克将军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向西伯利亚衙门呈报说，代表鄂齐尔图台吉及其子噶勒达玛，以及"代表阿巴赖和他的儿子阿玉奇，代表伊尔加、塔尔罕、伊什盖普、阿尔达尔、玛拉伊、达叶及其子，代表卓罗克图、达沙等台什的新使者来到他那里，每位台什各有两名使者，他们为了进行贸易而在托博尔斯克过冬"[2]。可见，派代表来托博尔斯克的这些王公中没有巴图尔浑台吉的继承人僧格。应该注意到巴图尔的寡妇达里班奇不是僧格的生母，她的亲生儿子是鄂乔和卓特巴巴图尔。只是到了1664年，僧格与俄国当局才第一次互派代表团，建立了直接联系。

看来，这一切都说明，巴图尔浑台吉的家庭分裂为敌对的集团，他们的斗争在汗死后立刻就开始了，并在僧格执政的所有年代中，从未停止过。卫拉特史料对这个斗争叙述得非常详细。加班沙拉勃在他的《故事》中写道："巴图尔浑台吉把自己的兀鲁思分成两部分。他把第一部分给了一个儿子，第二部分分给其余8个儿子。"[3]巴图尔乌巴什
208 丘缅也说："巴图尔浑台吉将自己的臣民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一半给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535卷，第23－25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535卷，第62张。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4页。

一个儿子(僧格),另一半给其余8个儿子(噶尔丹是第10个儿子[1])。"[2]我们的史料没有解释这种不相等分配遗产的原因,更奇怪的是,僧格并不是死去的汗国首领的长子。但是不管这些原因是什么,僧格的许多弟兄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很自然,他们只等有适当的时机,就试图用武力根据每人的私利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这样就在旧的冲突以外,出现了发生内讧的新根源,这一次是出现在绰罗斯族的领主之中。新的冲突就其发展来看,是与很久以前的旧的冲突——我们以前说过的和硕特拜巴噶斯汗的儿子鄂齐尔图和阿巴赖之间的冲突——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卫拉特各王公集团之间为重新划分封建领地的斗争,是17世纪50—60年代准噶尔汗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结束了对1653—1654年冬巴图尔浑台吉安葬的详细描述以后,隔过1655和1656年,立即转而叙述1657年夏季绰罗斯族领地如何分为两侧——右侧或者叫南侧(布隆噶尔)和左侧或者叫北侧(准噶尔),形成了敌对阵营。僧格的哥哥们(车臣台吉、卓特巴·巴图尔等)对遗产的分配、对弟弟继承父亲的卫拉特丘尔干"盟主"职位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因而加入了北阵营,僧格的拥护者们则加入了南阵营。

僧格的弟兄们展开积极的活动,力图把尽可能多的领主拉到自己阵营来。和硕特的阿巴赖台吉追随他们而与他自己的兄弟——起来保护僧格的鄂齐尔图相对抗。阿巴赖和鄂齐尔图之间这样分道扬镳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分配父亲的遗产不均多年来怀有仇恨,他们各自都把兄弟的朋友和同盟者看做是自己的敌人。前面我们提到过鄂齐尔图台吉和巴图尔浑台吉之间所建立的友谊和同盟。巴图尔死后,鄂齐尔图把这种友谊和同盟关系转给了他的女婿僧格。这点就足以使鄂齐尔图

209

[1]据《西域图志杂录》,巴图尔浑台吉有子12人,噶尔丹名列第6。——译者

[2]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载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的古代文献》,第77页;《关于杜尔本·卫拉特人的故事》,也见载于《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年,第11期。

的兄弟阿巴赖台吉加入僧格敌人的阵营。这样,绰罗斯族内部的冲突遂开始发展成全卫拉特的内战。[1]

1657年夏季,敌对两阵营的军队聚集到额敏河沿岸准备交战,不过这次流血事件由于多年保持亲密友爱关系的叔伯弟兄——鄂齐尔图和阿巴赖的儿子噶勒达玛和察罕的干预而被制止了。他们俩带着自己的卫队来到交战的地方,要求停止战争,并缔结和约。由于两兄弟的努力,和平得以恢复。[2] 因此,僧格依然是归他继承的绰罗斯南半部领地的领主和卫拉特王公丘尔干的"盟主",也像他父亲一样,与和硕特鄂齐尔图台吉同任这一职位。

有理由认为,僧格还得到咱雅班第达的支持。据《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所写,还在僧格向鄂齐尔图的女儿求婚时,咱雅就喜欢了他。咱雅班第达把僧格看做是"一个伟大的诺颜"、喇嘛教的忠实儿子和一位亲戚。[3]

210 尽管如此,僧格的地位还是非常不稳固,而且反对他的斗争也还远没有结束。一些克什提姆利用准噶尔汗国中央政权的削弱,开始脱离汗国。首先起来反对克什提姆从属地位的是白卡尔梅克人,他们的执政者科卡阿巴科夫1658年夏天曾对托博尔斯克代表维亚特金说过,"他科卡目前正在跟黑卡尔梅克人和自己的弟兄们打仗"。维亚特金在科卡的带领下,目睹过1658年7月26日的战斗,交战结果"黑卡尔梅克人杀了许多科卡兀鲁思的白卡尔梅克人并把他们驱散了"[4]。从现有资料看,这场战斗远不是黑、白卡尔梅克人之间的第一次战斗,更

---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3页。比丘林认为卫拉特人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并认为他们之间的斗争开始于1636年。他的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参看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45页。

[2]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中流传着雷特金根据别别老人的口述所写的故事。根据这个传说故事,噶勒达玛和察罕彼此间的情谊十分深厚,以致曾在战场上多次劝阻他们各自的父亲,寻求解决争议问题的办法。每遇这种情况,两个年轻人就走到战场当中,一个带着棋盘,一个带着棋子,坐着下棋。一直下到他们的父亲为爱子的友谊所感动而停止战斗各自回家为止。参看雷特金:《卫拉特历史资料》,载《阿斯特拉罕省报》,1860年,第6期。

[3]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3页。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58年,第1卷,第9、10张。

不是最后一次。1659 年 9 月 14 日，托木斯克的将军给外交事务部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中说，科卡阿巴科夫的使者来到了托木斯克，他要求保护白卡尔梅克人免受卫拉特王公的侵袭。呈文的作者写道："我们，您的仆人，没有皇上的命令，不敢派兵去白卡尔梅克人那里……因为目前科卡和黑卡尔梅克人发生了争执，我们没有派兵是不希望与黑卡尔梅克人发生争端。而科卡的使臣对我们口述说，他要战胜他的敌人——黑卡尔梅克人。不过黑卡尔梅克人的兀鲁思很大，而且他们至今未对俄国人做过任何坏事。"[1]

白卡尔梅克执政者并不是唯一拿起武器反对卫拉特王公勒索的人。1661 年，塔拉县鞑靼居民曾武装反抗侵入他们境内的杜尔伯特王公伊什盖普，而且打败了他。于是僧格的兄弟之一鄂乔就去讨伐鞑靼人，但是也被击溃，而且他本人好容易才在 6 个活下来的士兵的掩护下逃了命。[2]

在巴图尔浑台吉死后最初的这些年中，只有和硕特的阿巴赖台吉与俄国当局保持着最密切的和经常的联系，他的领地处于当时由俄国去中国的道路上。他对第一个去中国的俄国正式使者贝可夫给予了殷勤招待和许多帮助，因此，他在俄国享有比其他卫拉特王公优越的某些特权。他的使者经常被允许进莫斯科。1662 年元月，阿巴赖的使者伊尔基木拉在莫斯科外交事务部受到接待，他说到，阿巴赖的领地处于离塔拉城 6 周行程的地方，他拥有军队 4 万人，而他的兄弟鄂齐尔图有军队 6 万人。"阿巴赖台什曾经为召回的兀鲁思人的问题，与兄弟谢库尔台什有过争执，不过现在已经和睦相处了。"[3] 1662 年 5 月，这位使者拿到了沙皇阿历克赛·来哈依洛维奇给阿巴赖的嘉奖信。[4]

211

伊尔基木拉正确地指出了阿巴赖兀鲁思人通常的游牧区的位置，不过大大地夸大了自己的统治者及其兄弟鄂齐尔图的军队人数，关于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58 年，第 2 卷，第 2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220 卷，第 361 - 368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62 年，第 2 卷，第 7 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62 年，第 55、56、59、60 张。

阿巴赖跟他的兄弟谢库尔有过争执一事的说法，无疑是一种误会。大家知道，阿巴赖只有一个哥哥——鄂齐尔图，一年前他跟鄂齐尔图的确打过仗。我们在加班沙拉勃的《故事》里，发现了一些有关这次战争的资料。在《咱雅班第达传》里也有关于此事的直接的记载。在专讲与卫拉特好风尚相抵触的行动的那一章里，加班沙拉勃写道："车臣汗和阿巴赖这两个亲兄弟彼此打仗。"[1]咱雅班第达曾做了许多努力，力求使这两位和硕特执政者取得和解，其实，他对准噶尔其他领主也一样。他积极性很高，不断奔波于国内各地，起调停人的作用，力求制止武装冲突。1656 年夏季，咱雅班第达住在阿巴赖的牙帐里，阿巴赖、鄂齐尔图的儿子噶勒达玛以及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的儿子岱青在那里当着他的面进行了会晤。[2] 咱雅离开阿巴赖处便到了土尔扈特处。

212 1658 年夏天，他从土尔扈特到过和硕特鄂齐尔图那里。1659 年春天，他出现在杜尔伯特领主戈木布的牙帐里。1660 年夏，他出席了和硕特与绰罗斯王公们的代表大会，同年秋天在他的参与下举行了和硕特的鄂齐尔图与阿巴赖的短暂会见。[3]

如果认为咱雅班第达无休止奔波的唯一目的是进行调解活动，那自然是错误的。他的传记的作者叙述说，1647 年鄂齐尔图台吉问咱雅："你为什么要到处奔走呢？"咱雅回答说："第一位的原因是传布神圣的教义，其次是收集礼品和捐款，以便酬谢在我求学时期曾给予我巨大恩惠的达赖喇嘛金库。"[4]咱雅奔波于各卫拉特领地时，确实到处宣传喇嘛教，根除萨满教，根据他编的新字母组织识字教育，自己进行翻译，而且也委托识字的喇嘛将经典文献从藏文译成蒙文，最后还收集了大量礼品、献祭的牲畜、贵重金属和其他珍品。不过，要说准噶尔汗国在巴图尔浑台吉死后，没有在封建执政者彼此普遍混战的情况下完全崩溃，这在较大程度上还是应该归功于咱雅班第达个人的努力和影响。

---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 20 页。鄂齐尔图台吉于 1657 年去达赖喇嘛处，达赖喇嘛授予他汗的封号。

〔2〕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23 页。

〔3〕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25－26 页。

〔4〕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12 页。

但是，咱雅班第达想使鄂齐尔图和阿巴赖和解的尝试并没有成功，战争未能避免。1660 年冬，鄂齐尔图车臣汗率兵 3 万进攻他的处于阿亚古斯河谷地的兄弟。咱雅班第达和其他宗教活动家企图再一次说服鄂齐尔图不要打仗。鄂齐尔图说："我听从你们的劝告，那就让阿巴赖来这里会晤。"[1]但是，阿巴赖没有来讲和。于是，牡牛年（1661）夏天的第一个月，两兄弟的军队在额敏河岸交战[2]。阿巴赖的军队总数也有3万人，此外，他那边参战的还有他的叔伯弟兄——和硕特昆都仑台什的孩子们。但是，以绰罗斯的僧格和辉特的索尔多台吉为代表的援兵也加入了鄂齐尔图这边。势均力敌的情况决定了战役的持久性。鄂齐尔图车臣汗修建了坚固的兵营。受兄弟的军队追击的阿巴赖终于开始撤退。在通过哈马尔达坂山口时，他的集团遭受了巨大损失。被迫转入防御的阿巴赖开始向他在额尔齐斯河上修建的寺院城撤退，这座城在俄国文件中以阿巴赖希特著称，并在 1657 年受过咱雅班第达的圣洁化仪式。阿巴赖在此城被敌军围困将近一个半月。被围困者由于疾病，人、畜大批死亡而损失惨重。阿巴赖的母亲（她也是鄂齐尔图的继母）赛罕珠从被包围的城市专程去鄂齐尔图处，劝他与阿巴赖讲和。由于他的调解，敌对的兄弟再次会见。此后，在战胜者的兵营里开了长时间的会议，商讨如何对待阿巴赖的问题。最后终于克服分歧，一致决定原封不动地归还阿巴赖的全部领地，归还从他那里夺得的全部财产和所有俘虏。鄂齐尔图车臣汗与阿巴赖台吉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大概，阿巴赖的使者伊尔基木拉 1662 年初在莫斯科跟外交事务部官员们谈话中所指的也就是这场战争。

213

指出史料中记载的卫拉特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卫拉特的劳动人民不可能影响他们执政者的决策，而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战争的结束，迎接和平生活的恢复。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阿巴赖台吉的军队和被围困的阿巴赖希特的居民狂喜，迎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27 页。

〔2〕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27 页。

接战争结束的消息。《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写道："在阿巴赖跟车臣汗会见时，噶勒达玛曾带了四五个人去到被围过的寺院。因为许多平民受尽了苦难，所以没有带军队的噶勒达玛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就是幸福。大家喜气洋洋，都说：'欢乐的太阳升起啦！'"[1]

214 巴图尔浑台吉死后转眼8年。我们看到，在这些年里，两个主要的卫拉特封建主集团——直接受和硕特鄂齐尔图台吉，而间接受咱雅班第达支持的绰罗斯僧格集团与和硕特阿巴赖台吉所支持的僧格的兄长们的集团，一直在进行着争权斗争。由于在战场上取得了几次胜利，到60年代中期，僧格的地位才得以巩固。与俄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期来临了，因为实际上从17世纪50年代初开始外交关系就中断了。在这10年中，只是偶尔有卫拉特某个地方领主的使臣来到西伯利亚一带的城市，而从西伯利亚各城市派出的也只是局限于地方性的回访代表团。与准噶尔汗的牙帐互派使者的外交活动则完全中断了。

1664年秋天，首先有一个商队来到托木斯克，随后来了代表僧格、代表他的叔叔楚琥尔乌巴什和一位"呼图克图"的使者。[2] 从一些文件中查明，这个"呼图克图"不是别人，正是僧格的弟弟噶尔丹，后来以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名字载入史册。根据俄国档案资料可以确定，噶尔丹生于1645年，童年时被献给了宗教界，大概因此取名"呼图克图"。可见，噶尔丹的名字第一次为俄国所知是在1664年，当时他大约20岁。

上述卫拉特外交代表团以伊尔卡切庆亚扎（据俄国文件中的称呼）为首，根据其执政者的委托，要求重新互派使者并允许卫拉特人在托木斯克进行贸易。为了答复这个卫拉特代表团，托木斯克的布图林将军派出贵族瓦西里的儿子布别诺伊去准噶尔汗僧格、楚琥尔和"呼图克图"那里。

布别诺伊于1665年6月到达僧格处。僧格对他说道："很久以前，

---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29页。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46卷，第79－82张。

他父亲浑台吉那时代，许多玉兹的坏人聚集起来跟俄国塔拉的属民巴拉巴人打仗。”僧格的父亲当时就从自己的兀鲁思中交出了所有巴拉巴人。“继我父浑台吉之后，目前由我僧格掌管全部兀鲁思。我的克什提姆、科卡的惕列乌特兀鲁思的卡尔梅克属民曾由于饥荒流落到托 215
木斯克城，至今还住在那里。而皇上陛下的将军们没有交出我的那些克什提姆，并且不放我的使者去莫斯科谒见皇上陛下。虽然皇上陛下没有下令交还我的克什提姆和我的属民，我也不缺这些人”[1]。

由僧格的话可见，巴图尔浑台吉正是让他当准噶尔汗国的首领，也可见波兹德涅耶夫以及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所提出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从僧格的话中也可以得出结论：他以前就曾派使者去过托木斯克，但是在俄国史料中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些使者的记载。僧格声明中的事务部分是专讲克什提姆问题的，从这时起直到僧格执政终了，克什提姆问题始终是俄、卫关系的中心，有时甚至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

布别诺伊在返回托木斯克途中，由于僧格的命令被阻留，整整一年未能回国。1666 年 6 月，准噶尔汗又接见了他。僧格解释说，阻留俄国使者是因为去年有消息说，喀尔喀的阿勒坦汗罗卜藏台吉的军队，协同俄国军队要来进攻准噶尔汗国。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于是布别诺伊才被放了回去。[2]

就在 1665 年夏，僧格、楚琥尔以及楚琥尔的孩子们所派的新外交代表团到达托木斯克。这一使团的部分成员被允许进入莫斯科，而另一部分则在俄国使者利托索夫陪同下被遣送回去。利托索夫于 11 月到达楚琥尔的兀鲁思，但是楚琥尔不在，去了西藏，把自己的兀鲁思交给儿子巴阿哈汗和察罕管理。1666 年 4 月，利托索夫好不容易到达了僧格的牙帐。利托索夫报告说：“他的兀鲁思在高耸的山间札伊尔舍拉莫乌杜天然界区的库苏坦小河一带。”[3] 僧格对利托索夫说：“过去， 216
卡尔梅克的台什们——我的祖父哈喇忽喇和我的父亲巴图尔浑台吉都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94、95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94、95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46 卷，第 88 张。

曾在沙皇陛下的庇护之下，而且从莫斯科皇上陛下处给他们捎来过大量皇赏。可是在我父亲巴图尔浑台吉之后，俄国的任何城市都没有派皇上陛下的使者来我僧格这里。”[1]僧格当着利托素夫的面严令白卡尔梅克人的执政者科卡和玛奇克，要他们停止对俄国领地的侵犯。

1666年夏天，僧格、楚琥尔和噶尔丹派了第3个外交代表团来托博尔斯克，布别诺伊也随同这个代表团回来了。这个以乌梁卡为首的使团曾被遣送到莫斯科。

下一个去准噶尔的俄国使者是巴维尔·库尔文斯基，他是1666年秋天被派往僧格、楚琥尔以及楚琥尔的儿子巴阿哈曼仁那里的，并携带有沙皇手谕、皇赏和礼品。楚琥尔的儿子察罕接待了库尔文斯基，说他的父亲还没有从西藏回来，“而僧格台什和他的兄弟巴阿哈曼仁都离开兀鲁思去打蒙古汗罗德桑[2]了，并请他们稍候”[3]。1667年夏季，僧格才打完仗回来。同年7月，他接见了专送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的手谕和礼品来的这位俄国使者。库尔文斯基回去时，僧格派了又一个外交代表团与他同去俄国。

与阿勒坦汗的战争是1667年的中心事件，同时也是阿勒坦汗与僧格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准噶尔汗国执政者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对这两个蒙古封建主集团长期以来的斗争作了最后的总结。著名的硕垒乌巴什洪台吉在喀尔喀西北部所建立的一个强国，由于1667年的失败，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阿勒坦汗王朝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些蒙古史料没有提及这场战争，但是一些俄国文件的记载不仅使人确信这一战争的事实确凿可靠，而且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足以判断这场战争的起因。这些记载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战争的起因是争夺克什提姆和实物税。众所周知，阿勒坦汗在17世纪曾多次使用武力强迫吉尔吉斯王公臣服并缴纳实物贡赋，而且没有遇到过卫拉特

217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46卷，第92张。

[2]罗德桑（Лоджан）即阿勒坦汗王朝的罗卡桑台吉（Лобсан тайджи）。史料中也称罗卜桑赛英汗（Лсбсан Сайн-хан）、罗卜藏（Лобдзан）、罗乌藏（Лоузан），他是第三代阿勒坦汗，也是硕垒乌巴什阿勒坦汗封号传至的最后一代。——译者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46卷，第115－117张。

封建主的反对。1667 年阿勒坦汗王朝的第 3 个代表人物罗卜藏台吉又一次入侵吉尔吉斯牧区，旨在巩固对吉尔吉斯人的克什提姆的从属地位，并征收他们的实物税。僧格本身也贪求统治吉尔吉斯，得此消息之后，遂猛攻阿勒坦汗，并击溃了他。

这场悲剧的结局展现在库尔文斯基的眼前，他在自己的分项文件中写道："6 月 12 日，僧格台什从蒙古战场回到自己的兀鲁思，俘来了蒙古国王罗德桑和他的孩子——3 个儿子：一个 20 岁，另一个 15 岁，第三个 10 岁，霸占了罗德桑的妹妹。僧格命令把罗德桑国王的右手砍到肘部，把狗肉塞到他嘴里，并把他同两个妻子交给了奥尔干诺茨基王。僧格还带来了这位蒙古俘虏的近亲以及带妻子、儿女的克什提姆共约 2000 人。僧格台什给上等人分了牲畜，准允他们住在自己附近并加以保护。"[1]

我们引自库尔文斯基分项文件的上述这段摘录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些史实资料强调了卫拉特封建主战胜曾是他们非常害怕的夙敌这件事的意义；而且还在于，这些事实说明了双方封建主之间的阶级联盟关系。只有用阶级的同源关系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才能解释给战败的"上等人"分牲畜，使他们接近汗国的统治人物，并允许他们住在汗的牙帐附近等等现象。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我们所知道的蒙古王公的历次丘尔干不断宣扬的原则得到了实现，这些原则责令王公们支持和巩固"同等门第"的人，即封建主之间的联盟与合作。

僧格的胜利推动他走上采取积极攻势行动的道路，以恢复卫拉特封建主的霸权，恢复对那些原属他们的克什提姆的统治，而这些克什提姆那时已经转而臣服于俄国沙皇，并向俄国国库交纳实物税。为了实现这种计划，僧格在吉尔吉斯留下自己的一支部队，总数约四五千人，由僧格的叔叔丹津和叔伯弟兄巴阿哈指挥。

有关事件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人给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的呈文和僧格本人的话来判断。克拉斯诺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658 年，第 3 卷，第 13 张。

亚尔斯克的呈文者写道："今年，175（1665）年，僧格台什的大批卡尔梅克军队来吉尔吉斯打蒙古阿勒坦汗的儿子罗德桑赛英浑台吉。他们卡尔梅克人……打败了罗德桑。卡尔梅克的僧格台什派了使臣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的将军处……使臣们谈到吉尔吉斯人和图巴人的问题，要求把他们放回原住地区，并放出人质。他们的实物税……让照旧交给僧格台什……说从前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的卡青人和阿里人的税是交给他父亲巴图尔浑台吉的。阿历克赛·苏马洛科夫将军对这些要求一一拒绝了……卡尔梅克使臣说，如果不放吉尔吉斯人和图巴人回原地，那么，卡尔梅克僧格台什理所当然要派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大军来攻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1]确实，1667 年 5 月，僧格的军队包围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把城郊劫掠一空。围城的人对被围者叫喊："把所有吉尔吉斯人交还我们，并放出人质，我们就停战，不然，我们不拿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决不罢休。"[2]

克拉斯诺亚尔人阐述的情况大致如此。准噶尔汗国执政者本人对事件的看法有所不同，1668 年 4 月初，他在与俄国使者伯林的谈话中详细叙述了这种看法。应该指出，准噶尔汗接待这位俄国使者非常冷淡，而且坚决拒绝执行已经成为传统的对俄国沙皇表示尊敬的礼节要求。伯林一一述说俄国方面的不满，谈到僧格进军吉尔吉斯，在那里他的部众抢劫了许多俄国托木斯克县的属民，夺走了他们的牲畜，并且向他们收了实物税；谈到僧格离开吉尔吉斯领土后，却留了一批军队在那里，命令他们攻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到这些军队侵袭卡青人和阿里人，洗劫了他们的牲畜和财产，杀害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许多俄国士兵，还俘走了一部分；谈到后来僧格和楚琥尔的使者来到托木斯克要求交出白卡尔梅克人。"这些使者还以攻打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相威胁。你们，僧格和楚琥尔的使臣两次到过莫斯科，关于迁来的白卡尔梅克人的问题并未叩求过皇上陛下，因此托木斯克没有得到皇上陛下这

219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802 卷，第 81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802 卷，第 82 张。

方面的命令。”[1]

僧格针对这番话回答说:“我的部众没有攻打过托木斯克县的任何俄国属民……我是派了使者到克拉斯诺亚尔去找过将军,因为那里住着我祖父和父亲的属民。将军并未因此对我生气。我照过去祖父和父亲那样收了他们的实物税。但是将军却没收了实物税,把我的使者关进了监狱,让他坐了3天牢。我撤离吉尔吉斯领土时,曾派人用武力征收阿里人和卡青人的实物税,我的部众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下时,将军派出军队,半夜偷袭,杀害了我的部众,我的部下才奋起自卫。希望皇上下令在俄国人中查出罪魁祸首,我也将在自己的人中进行调查。”[2]

僧格矢口否认曾经委托自己的使者代表他宣誓效忠并臣服于俄国沙皇。他说:“那是俄国人自己想出来的,他们以前就为此派代表团来过我这里。”他对归还白卡尔梅克人的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同时表示:“我知道皇上并未打我的惕列乌特人,也没有用武力抓走他们,是他们自己从我那儿逃跑的。但希望皇上陛下不准他们留在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不让他们混入俄国人中,我将亲自来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城下带走他们……如果皇上陛下的人混在那些卡尔梅克人中,就不能怪我了。”[3] 220

伯林警告僧格,这种政策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僧格对此回答说:“我已经派第6个使者向皇上陛下谈有关我的惕列乌特人的问题,如果皇上陛下还不交出他们,我就要攻打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城,就不能怪我了。”[4]

最后僧格告诉伯林,他再派出一名使者雅列姆塔儿苏孩,要求允许使者去莫斯科就惕列乌特人问题与沙皇谈判,如果这次还不把这些人交还他,“望皇上将来不要对我发怒,我会自己弄到他们的。我一定要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82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87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88、189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90张。

攻打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1]。

僧格对于1667年的事件就是这样解释的，他本人对克什提姆和征收实物税问题的态度就是这样表示的。这中间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同代表沙皇的使者谈话的那种口气。在僧格以前，还没见过任何一个蒙古执政者、蒙古王公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他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不仅由于他毁灭性地打垮了阿勒坦汗罗卜藏台吉，而且显然还由于僧格本人在汗国的地位相当巩固了。

这方面，伯林和僧格的弟弟“呼图克图”噶尔丹的谈话颇堪玩味。1668年4月6日，噶尔丹邀请伯林到自己那里，当噶尔丹了解到僧格谈话的内容以后，说：“我们，呼图克图和喇巴不是军人，我们全卡尔梅克的所有呼图克图和喇巴都主张，卡尔梅克人和台什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皇上陛下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我们那些已经迁往皇上陛下那边去的惕列乌特人。”[2]

221 但是僧格，正如我们所见，是不同意他弟弟的意见的。在汗的牙帐里，有人对伯林说：“我们的僧格台什抓了罗德桑国王回到本土后，就派了使者到卡尔梅克各台什那里去进行宣扬，也去了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和鄂尔勒克的孩子们那里，并且号召他们跟他一起进攻皇上陛下的西伯利亚城市。许多人怂恿僧格这样做，可是和鄂尔勒克台什的孩子们则遣使来说：‘你想打俄国是没有道理的，你地上的草还没割完，树还没砍完，你不要去打皇上陛下的人，况且皇上下令提供了他的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一带及一些城市，不然你能在哪里安身呢？’”[3]

看来，伯林的记述正确地反映了那些年代卫拉特封建主中间两种意见和两种情绪的斗争。同时不能否认，这里称作“和鄂尔勒克的孩子们”的那些人有远见卓识，而且对情况有合乎实际的了解。

1668年7月，伯林回到托木斯克。僧格的使者的确携带着致沙皇的信与他同来了。使者向维尔亚米诺夫将军宣称，派他来是为了迁来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92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91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93张。

的白卡尔梅克人,“如果皇上不放迁来托木斯克的白卡尔梅克人回去,僧格台什就要攻打托木斯克和库茨涅茨克城,要在托木斯克城驻扎3年”[1]。

似乎可以预料,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发表如此坚决而强硬的声明之后,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会把言语变为行动,发动对俄国西伯利亚领地的战争。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僧格才在与克穆奇克河毗连的地区把丹津和巴阿哈所指挥的部队一直留到他生命结束时吗?[2] 然而,战争却没有发生。我们不了解阻碍僧格实现其威胁的原因何在。伯林代表团之后,俄国与准噶尔互派使者的关系中断了两年。如果说1664—1668这4年中,曾有4个大的俄国外交代表团访问过僧格,那么,从伯林以后直到1670年,没有派任何人到这位汗那里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史料中没有上述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记载。但是,无论如何,僧格未敢发动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与准噶尔连接的西伯利亚地区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1670年初,为了将沙皇的赏赐面交僧格而从托博尔斯克派去的哈萨克人斯基宾回来后报告说,准噶尔汗“诚敬地”,也就是说,遵守一切礼节要求地接受了他的这份赏赐。僧格只请求斯基宾把6个跑入俄国境内的属民归还给他,[3]并威胁说,否则,当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从中国回来时,就把他扣起来,并且又以攻打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相威胁。随同斯基宾来到托博尔斯克的是代表僧格、楚琥尔及其儿子的几位使者。1670年秋,这些使者被遣送到莫斯科。[4]

222

史料中有关僧格执政年代准噶尔汗国的经济情况及其与邻国的贸易联系的资料很有限。我们从1672年由中国回来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那里得知,僧格的叔叔楚琥尔的兀鲁思里已开始从事农耕。可惜,阿勃林既没有谈到耕种土地的面积,也没有谈到耕作者的情况。可以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337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345、389、451-453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308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296张。

设想，楚琥尔台什那里的农耕是以东土耳其斯坦、中亚和俄国农业区被迫迁来或自愿迁来的农民的劳动为基础的。无论如何，楚琥尔的兀鲁思中出现农耕可以使我们认为，这个农业部门与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相比，不会是缩小了，而是继续扩大了。

至于准噶尔汗国的贸易联系，在这些年代里，只有同俄国的联系是完全稳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如果不与俄国进行贸易交流，准噶尔的卫拉特居民及其经济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俄国人与卫拉特人之间的贸易每遇较长时间的中断，就经常敏感地影响到双方的状况，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准噶尔汗国居民的状况，而为各种政治纠纷创造条件。这方面突出的是1672年8月在亚梅舍夫湖地区所发生的一件事，以列夫·波斯科钦为首的采盐团奉命从托博尔斯克来到这个地区，据查，卫拉特人来这里较早，等候着俄国人的到来，以便开始交易。“当俄国军人从开垦地走上荒原时，汗国的人就集合起来，人数很多，有骑兵和步兵，持有枪、矛、弓和火枪，占据了通路，不让俄国军人去采盐，不想给盐，而要求跟他们贸易，并按他们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各种商品。”列夫·波斯科钦不得不在俄国军人的前行小组中再增加50人，并下令向卫拉特人宣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俄国军人去盐湖，待这些军人在亚梅舍夫湖取完盐后，就跟他们自由贸易，并照规定的价格买他们的商品……卡尔梅克人这才听从了，放俄国人去采盐，并且很驯顺地、没有任何阻碍地同俄国军人进行了贸易。”[1]

223

准噶尔与中央亚细亚和中亚伊斯兰教汗国的贸易关系却具有另外一种性质。这些汗国的商人在好几百年里专门从事中国、南亚与前亚[2]各国以及欧洲所产的丝绸和其他贵重商品的贸易。伊斯兰教商人跟中国和俄国西伯利亚进行商队贸易，要通过准噶尔领土，便以自己的一些商品（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奢侈品）供给卫拉特封建主，换取牲畜和畜牧产品。这些产品又被商人们在与准噶尔毗连的西伯利亚地区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502－506张。

〔2〕前亚是指亚洲的西南部，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地中海和红海至伊朗高原一带。——译者

卖掉。最后，准噶尔的贸易，特别是其领主们的贸易，几乎全部操纵在伊斯兰教商人和俄国档案文件所称的“布哈拉人”手里。这就可以说 224
明，为什么每个去俄国的卫拉特外交代表团的成员里，几乎都有一两名伊斯兰教商人作为准噶尔汗和领主们的委托人。

僧格执政的年代里，准噶尔汗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依旧是偶尔有之的现象。例如，《咱雅班第达传》中说，1647 年，和硕特王公塔尔衮额尔德尼浑台吉打算去西藏朝拜达赖喇嘛，下令集中大批牲畜，吩咐将其中一部分运到中国出售。1653 年，鄂齐尔图台吉也这样做了，他把 1 万匹马运往中国，用卖得的钱作为去西藏的费用。

这些情况，以及类似的情况只能着重说明一个事实：准噶尔汗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没有贸易关系。不但如此，可以大胆肯定，他们之间仍然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因为卫拉特国家仍是坚持拒绝与入主中国的清朝发生任何接触的唯一蒙古领地。

到 17 世纪 60 年代末，所有喀尔喀领主已经跟清政府有了完全稳定的关系，清政府已对他们的内政、外交实行了相当有效的控制，结果使喀尔喀王公们逐渐失去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以顾实汗为首的库库淖尔的卫拉特领主，还在 40 年代就走上了与清朝合作的道路。清朝千方百计地吸引他们，力图使其靠近自己，并以殷勤照顾和厚礼加以收买。甚至以达赖喇嘛本人为首的西藏喇嘛教也与顾实汗一起同这个新王朝建立了联系。这个王朝很快就明白了：与喇嘛的友谊和联盟，为确立与巩固满洲封建主在所有喇嘛教地区，首先是在蒙古的统治地位开辟了可靠的道路。

我们不准备详细叙述17世纪中期和后半叶西藏的历史事件，以及两个主要教派——黄教和红教以宗教外形出现的封建主集团之间复杂 225
的相互关系和斗争情况。这些问题以及和硕特的图鲁拜琥入侵西藏并在达赖喇嘛为首的、其负责世俗行政事务的大臣第巴[1]管理的“黄教

[1]第巴是清初西藏世俗行政首长的称呼。1655 年顾实汗死，西藏政权逐渐转入五世达赖之手，由他任命第巴管理西藏世俗行政事务。康熙末年由清政府任命阿尔布巴等为噶伦，第巴一职始废。——译者

派”地区建立统治权等问题，在俄国和外国的文献中都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1]

只想提一提，清朝从一开始就力图把喇嘛教变成征服蒙古的工具。清朝的代表人物在征服蒙古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始终不渝地执行了这一政策。罗克希尔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说，受清政府邀请的达赖喇嘛1652年中期到达鄂尔多斯，并捎信给满洲皇帝朱由检[2]，请他来呼和浩特或者到大同迎接达赖喇嘛。[3] 这个建议在北京统治集团中引起了一片惊慌。结果颁发了一道下述内容的诏书：“太宗（1627—1644年）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朕欲亲至边外迎之……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傥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以致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不来归顺。”[4]诏书往下说到，皇帝让他的执政王大臣们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发表意见。有些汉族大臣表示反对皇帝去边境线（即长城）外迎接达赖喇嘛。而有些满洲大臣则赞成这一行，他们的理由是：“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5]

226

清政府的态度在这个文件中表达得极其明确，恐怕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明。采取这一态度可归结为下述主要3点：（1）清朝需要喀尔喀，应该使喀尔喀臣服；（2）一般的喇嘛，尤其是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享有特殊的威望；（3）要使喀尔喀臣服，其后使整个蒙古的其他部分臣服，必须把喇嘛教，首先是达赖喇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不过，如果说清朝皇帝们很了解与喇嘛教结盟的重要性，那么，他

---

〔1〕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中国与西藏关系史概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Тибетом）；罗克希尔：《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佩特奇：《18世纪初的中国和西藏》。

〔2〕朱由检为明朝崇祯帝。而这里所说满洲皇带按年代看，应是清世祖福临。——译者

〔3〕据《东华录》“顺治九年八月戊辰”条：“达赖喇嘛奏，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译者

〔4〕罗克希尔：《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第14页。

〔5〕罗克希尔：《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第15－16页。

们的敌人对这点的了解也并不亚于他们。特举吴三桂为例,他在许多年中经常派自己的代表携带礼品去拉萨,力图利用宗教的影响为他准备的反满起义服务。这方面他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他发起的每次反对满洲的行动都得到了拉萨的秘密支持。这说明,达赖喇嘛的亲信中,不光有拥清派,而且还有反清派。[1]

卫拉特史料中所记载的大量史实,足以证明喇嘛教在准噶尔汗国所享有的特权和威望并不次于在东蒙古各公国和各汗国。加班沙拉勃讲到,顾实汗战胜达赖喇嘛的对手以后,以顾实汗、和鄂尔勒克及其6个儿子、巴图尔浑台吉、昆都仑台什、阿巴赖和杜尔伯特的陀音等人为首的所有卫拉特大、小诺颜"承认达赖喇嘛是自己的喇嘛",也就是说公开宣布自己是黄教的信徒[2],并立即决定允许所有一般藏民在准噶尔自由来往。后来规定,凡抢夺藏人东西者,不论其封号与身份,一律判处死刑。[3] 咱雅班第达在卫拉特社会各阶层中都享有公认的威望。他的传记的作者记载,咱雅班第达在17世纪40年代末颁布了一项专门反对萨满巫师和萨满教仪式的决定,要求严厉惩罚萨满巫师以及叫萨满巫师来效劳的人。[4] 所有卫拉特人都称颂咱雅班第达"为国增光",因为他推崇了佛教,并赞扬了西藏这个宗教中心的作用。[5]

227

卫拉特领主,甚至连他们的妻妾都争先恐后地奔往拉萨去朝拜达赖喇嘛,献给他厚礼,以换取各种光荣封号。鄂齐尔图台吉就是这样于1657年成了鄂齐尔图车臣汗的。但是在巴图尔浑台吉和僧格执政的所有年代中,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准噶尔领主派自己的代表去北京的事。不错,有的史料说,1650(或1651)年达赖喇嘛和顾实汗从西藏派往北京的外交代表团成员中,不知怎么有个和硕特昆都仑台什的代表,名叫索诺门,不过这件事即或有过,也只是一桩悄无声息、一过即逝的

[1]罗克希尔:《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第19页。
[2]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3页。
[3]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13页。
[4]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17页。
[5]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17页。

事。[1]

我们已经了解了咱雅班第达的反满立场。很可能,准噶尔领主们对于同清朝接触持反对态度,是受他们最高主教影响的结果。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咱雅班第达第二次去西藏的时间,正是达赖喇嘛准备去北京的时间(1652 年),而且他俩在路上相遇还进行了交谈。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交谈的内容,但是不可能设想两位在交谈中不提到
228 达赖喇嘛这次行踪的目的,因此,也不可能不提到对待清朝的整个政策。谈到这里,不由地会产生一个问题:达赖喇嘛傲慢地要求满洲皇帝亲自到远离中国首都的地方来迎接他,以及他访问的时间令人注目地短暂,这是不是跟咱雅班第达交谈的结果呢?这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知,咱雅班第达在拉萨宫廷里有不少势力较大的志同道合者,否则就不可能指派以反满观点著名的桑结嘉木错担任第巴职务,这位第巴在 17 世纪末的事件中起过重大的作用,这些事件留到下一章再谈。

准噶尔汗国执政者对外政策的反满方针,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也无须怀疑,这种政策在颇大程度上是受了喇嘛教某些头面人物的鼓动。前面引过的僧格的弟弟呼图克图——噶尔丹对俄国使者伯林的申明也可证实这一点。噶尔丹申明说,卫拉特人中所有的呼图克图和喇嘛都坚决希望"卡尔梅克人及台什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发动对俄国的战争"[2]。噶尔丹这人 20 年后被清朝宣布为最危险的敌人,而这个申明正出于他之口,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准噶尔汗国对外政策的反满方针,即卫拉特封建主力求保持本国政治上的独立必然会引起冲突,清朝越快把喀尔喀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这种冲突就会爆发得越快。

在这种情况下,准噶尔汗国内部团结的巩固则变成了顺利准备将来为独立而斗争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已经看到,以咱雅班第达为代表的喇嘛教如何竭力使敌对双方和解,使各种争端和冲突得到解决,使

---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17 页。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们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191 张。

内战不致爆发。咱雅班第达支持巴图尔浑台吉，也支持他的儿子僧格。 229
僧格依靠喇嘛教及出身于和硕特族王公的盟友们的帮助，终于战胜了敌人，巩固了他在汗国内的权力。但是他的全部成就，自然，并不能解决孕育了汗国内部的离心力和腐蚀了汗国团结的根本内部矛盾。僧格终于还是成为了这些矛盾的牺牲品。

1671 年初，僧格被杀的消息传到了托博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其他西伯利亚城市。一个从准噶尔返回的库兹涅茨克县的居民向地方当局报告说："僧格台什是去年，即 178(1670)年，在他到来以前被杀的……凶手是其同胞兄弟玛阿德尔台什。[1] 当时是深夜，僧格在帐篷里睡着了。他被杀后，僧格的另一个弟兄格根呼图克图[2]聚集重兵杀了刺死僧格的玛阿德尔台什并打败了其兄车臣台什和楚琥尔台什的孩子们。"[3]

1671 年 2 月，列普宁将军派去护送僧格的使者阿勃莱的布尔切耶夫军士返回托博尔斯克后，向将军报告说："未到达僧格遥远的兀鲁思之前，在塔拉县、在巴拉巴各州就有僧格兀鲁思的牧民对他说，他们的台什僧格被他的亲兄弟玛阿德尔台什杀了，僧格的部众又杀了玛阿德尔及其儿子。而僧格的哥哥车臣台什带着 30 个人从兀鲁思逃往蒙古的赛英浑台吉处。僧格死后，他的幼弟噶尔丹呼图克图占了僧格的妻子，率众打了楚琥尔乌巴什台什的儿子布拉特满仁之后，就跑到他岳父鄂齐尔图台什那里去了。僧格的部众，游牧的和兀鲁思的卡尔梅克人向各牧区和兀鲁思奔逃得一个不剩。"[4]

1670年末，僧格被杀与噶尔丹即位的史实在许多俄国文件中得到了证实。例如，托博尔斯克的列普宁将军在给莫斯科的一个复文中说， 230
1671 年末"控制了僧格兀鲁思的格根呼图克图从黑卡尔梅克人的僧格兀鲁思遣使"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使者们在聚会厅对阿历克赛[5]说，

〔1〕玛阿德尔台什即卓特巴巴图尔，所以后面又称被巴图尔所杀。——译者

〔2〕格根呼图克图即噶尔丹。——译者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350 页。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358 - 359 页。

〔5〕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苏马洛科夫将军。——兹拉特金

僧格被他的弟兄巴图尔杀害，而格根呼图克图杀死巴图尔，现在控制了僧格的兀鲁思。

现蒙古的罗德桑（即阿勒坦汗。——兹拉特金）在蒙古的克穆奇克河一带，而离罗德桑一天路程的地方就驻扎有卡尔梅克的台什多仁科舒奇[1]和阿巴巴汗[2]……而且呼图克图格根还派了拜图汗去叶尼塞的吉尔吉斯地区以防各种迫害。[3]

从我们这些史料的记载可见，僧格是在1670年末被其兄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密谋杀害的。其他密谋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纲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次密谋具有典型的宫廷政变性质，而人民群众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相反，卫拉特劳动人民唯恐重新爆发内战，从而引起负担加重，所以认为不如离开汗国这位被杀执政者的兀鲁思，四处逃亡去寻找和平与安宁。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死者的弟弟呼图克图噶尔丹对密谋者的活动采取了异常迅速的、几乎是闪电般的对付办法。据蒙古史料记载，他取得达赖喇嘛或其心腹亲信的同意之后，就放弃自己的宗教头衔，猛攻谋害僧格的凶手，未给他们有想一想并组织任何抵抗的喘息机会。

巴图尔浑台吉及其第一任继承人执政时期，准噶尔汗国历史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准噶尔各卫拉特领地的中心与在库库淖尔和伏尔加河上建立的新汗国之间形成了新型的联系与合作；第二，力求消灭内战和统一领主们的力量以反击来自外部的威胁，来巩固封建牧奴制；第三，喇嘛教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深入，随之而来的是宗教影响的加强，使之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经济、政治组织。

231

在对内政策方面，巴图尔浑台吉主张在汗国领土上发展自己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建设寺院居民点形式的定居中心，在这方面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此同时，他千方百计地力求与其他领主保持和平的相互关系，力求巩固与他们的合作。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也不期望战争。

---

[1]多仁科舒奇即丹津台吉。——译者

[2]阿巴巴汗即巴阿哈汗。——译者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389－390页。

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争夺克什提姆以及实物税，这一方面是与俄国争，另一方面是与阿勒坦汗国争。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没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俄国，就提出了双重国籍与两面进贡的主张，根据这一主张，双方都有权向当地边境居民征收实物税。俄国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准噶尔汗，所以实际上不得不忍受这种双重进贡的制度。至于阿勒坦汗，在斗争的过程中，这个王朝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它在这种打击下一蹶不振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准噶尔汗国内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通过了所谓的蒙古—卫拉特法规（察津·必扯克）。它的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牧奴制和蒙古封建主对蒙古牧民群众的统治，也在于联合汗和王公们的人力、物力以击退来自满洲征服者方面威胁他们政治独立的危险。

这些年代里，汗国的内部团结增强，外交地位巩固。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的危机得到克服。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来自 1 644年在中国执政并建立了清王朝的满洲封建主方面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与日俱增。准噶尔领主是这些年蒙古地区唯一坚持不愿与清政府接触的人，甚至同中国进行正常贸易交流这种有关切身利益的事，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态度。准噶尔执政者的反满政策也得到了准噶尔汗国的喇嘛教和拉萨有权势的喇嘛们的支持。这时在西藏和准噶尔已经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一种独特的泛蒙古主义和泛喇嘛教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于后来在西藏喇嘛教的庇护下建立一个独立国的计划中。这样就形成了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之间的战争必不可免的形势。

232

233

4 1688年的喀尔喀—卫拉特战争、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的战争

(1690—1697年)

17世纪最后30年,卫拉特人——其实不仅卫拉特人,还有中央亚细亚和东亚许多其他民族——的历史是与僧格的胞弟噶尔丹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凡写到蒙古、东土耳其斯坦、中国、西伯利亚、卡尔梅克和部分中亚历史的作家,很少有不谈到噶尔丹这个人及其在这些国家历史上的作用的。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在噶尔丹的敌人的立场上,站在反对过他的和与他打过仗的那些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噶尔丹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噶尔丹的生平和活动史还有待于持客观态度的研究者,根据汉文、满文、蒙文、俄文以及必不可少的藏文等可靠记载,摈弃史籍中占压倒地位的,并且几乎已成了传统的概念和评价,把能够揭示噶尔丹与西藏喇嘛教领导人,与准噶尔、喀尔喀和库库淖尔领主以及与清朝和俄国当局相互关系的确凿史实,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客观地阐明噶尔丹的历史作用,也才有可能正确地解释他在1688年同喀尔喀封建主和1690—1697年同清朝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和历史意义问题。

前面我们指出过,比丘林研究卫拉特的著作的主要缺点,是他对中国史料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中国史料是研究蒙古史唯一
234 可靠的依据。因此,我们后面会谈到,他的有关卫拉特的著作中,论述噶尔丹的部分便充满了不确切的事实和错误的评价。但是他在结束对噶尔丹活动的评论时却写道:"为了取得宗教身份而在拉萨教养大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是历史上著名的、学识渊博的皇帝和立法人。他充实了他父亲巴图尔浑台吉所颁布的草原法典(即"察津·必扯克"。——兹拉特金),制定了土地封建划分的新制度,有意限制了卫拉特其他三

汗的权势。而且,众所周知,他第一个在蒙古开始铸造铜币。"[1]

波兹德涅耶夫论述卫拉特的著作,主要依据蒙古史料,更确切地说,依据喀尔喀史料。他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及其历次战争的看法,在喀尔喀历史资料中阐明得非常详尽,他的看法根据的是名为《伊莱特赫尔·沙斯特拉》的喀尔喀爱马克大事记的记载,以及清朝大事记《圣武记》的记载。[2] 但是,波兹德涅耶夫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这两部大事记不能起到完全客观的证据的作用,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噶尔丹的公开敌人的利益和观点。仅仅这一个特点就已经足以引起研究者的警觉,并提醒研究者必须批判地检验上述史料的记载。照波兹德涅耶夫的原话说:"《伊莱特赫尔·沙斯特拉》就其性质来说,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所有蒙古王公的履历表汇编,并且较详尽地罗列了他们的各种行为、功过和封爵,也像我们官员们的履历表一样,《伊莱特赫尔·沙斯特拉》有时由当地首脑机关,即喀尔喀王公全盟会议进行补充,然后被提交给满洲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此后就成了判断某一王公情况的官方文件。"[3]

可以看出,这部史料具有适应官方需要的特点。由于《伊莱特赫尔·沙斯特拉》问世时,喀尔喀封建主已经变成了清朝的忠实臣民,所以这些特点就具有更大的意义。这部大事记在1780年撰成,1796年出版,此后在1803和1840年由管理中国外藩事务的北京理藩院补充重版。显而易见,这种史料不仅反映了喀尔喀封建主的利益和观点,而且也反映了清朝的利益和观点。所以,如果只参照这部史料的记载来叙述卫拉特和噶尔丹的历史,那就意味着居心要拒绝客观地研究当时的事件。 235

关于波兹德涅耶夫所依据的另一部史料——清朝编年史《圣武记》,他写道:"我认为必须说明,这本著作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根导

[1]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88-89页。顺便提一下,比丘林有关噶尔丹铸造铜币的论断,在我们所了解的任何史料中都没有得到证实。

[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

[3]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19页。

线，只要抓住了这条线就有可能弄清楚所有一般蒙古编年史中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地叙述到的许多事实。"[1]没有必要再来证明，在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发生了150年之后所写成的这部清朝官方史书，会摆脱与卫拉特封建主及其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立的社会势力的影响，而比《伊莱特赫尔·沙斯特拉》能更多地起到客观史料的参考作用。

波兹德涅耶夫对他依据的两部主要史料的上述特点漠然不顾，所以在这些史料的约束下，他对17世纪末蒙古的历史事件作了完全错误的阐述，这些事件则是与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活动紧密联系着的。波兹德涅耶夫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结如下：噶尔丹自幼在达赖喇嘛那里受教育，1671年经同意后撇下教职，去为他被杀害的哥哥僧格报仇。噶尔丹向凶手们进攻，并把他们处以死刑，"随后他占有了僧格的全部
236 财产和土地，而僧格的这些财物的直系继承人策妄阿喇布坦带着父亲的7名心腹仆人逃奔吐鲁番"[2]。策妄阿喇布坦从吐鲁番遣使向玄烨皇帝请求臣服。后来噶尔丹醉心于大权独揽，终于"在他的控制下统一了古卫拉特联盟的各部落"[3]，迫害和残杀了所有企图反对他的人。实力增强以后，他占领了东土耳其斯坦，此后着手准备征服喀尔喀。1688年，他攻打喀尔喀。清政府曾多方设法力图阻止噶尔丹破坏和平，而当战争终于成了事实之后，清政府又竭力促使敌对双方尽快和解。但是噶尔丹不愿讲和。他侵入中国境内，迫使玄烨拿起武器。满洲与卫拉特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它以噶尔丹的溃败和自杀而告终。由于噶尔丹的侵略政策，喀尔喀被迫放弃政治独立，转而臣服清帝国。在谴责喀尔喀封建主无能制止内战时，波兹德涅耶夫写道："但是并非互相的内乱纷争注定了喀尔喀必将覆灭，必将失去自身的独立而承认自己是异邦统治下的奴隶。它之所以就在次年（1688年）覆灭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来自准噶尔人的新进攻。至于内讧，它只

---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4页。

〔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175页。

〔3〕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176页。（"古卫拉特联盟的各部落"就是指过去的"杜尔本·卫拉特"，其各部落也就是"厄鲁特四部"。——译者）

是削弱了喀尔喀,因而使敌人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它。"[1]波兹德涅耶夫在给维谢洛夫斯基的一封信中也谈到了这一论题。他写道:"不是准噶尔的进军又是什么最后毁灭了喀尔喀呢?不是同部族的准噶尔人的那种进攻又是什么使得喀尔喀人完全丧失独立而臣服了满洲人呢?"[2]

这么说来,仅仅由于噶尔丹的贪权和征服欲所引起的准噶尔人的进军,就决定了喀尔喀的毁灭和它对清政府的臣服。要是没有噶尔丹以及他的贪权和对外侵略政策,喀尔喀就能保持自己的繁荣昌盛和独立自主。从波兹德涅耶夫的论断中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237

但是,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其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这些论断缩小了问题的范围,实际上只归结为噶尔丹的性格特征及其个人对某一领主的关系问题了。这些论断把玄烨皇帝的个性和政策却说得完美无缺,认为他天生具有一个公正的、爱好和平的英明君主——他的臣民之父——的理想特征。

我们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叙述波兹德涅耶夫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观点最系统地发挥了在19世纪的文献中和20世纪一段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思想。他学识渊博,精通蒙文,在发展俄国和世界的蒙古学方面有无可怀疑的功绩,这也就是许多作者相信上述论断并在各自的作品中复述它们、引证它们的原因。例如,在格鲁姆·格尔日麦洛[3]、巴托尔德[4]、帕尔莫夫[5]和另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有关篇章的情况尤其是这样。

我们应该提前说明,我们不同意波兹德涅耶夫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噶尔丹,他的性格特征、他的个人好恶、他与某个蒙古执政者的相互关系是决定1688年战争和喀尔喀加入清帝国的戏剧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更不用说是唯一的原因。我们认为,与其说他是这些事件的制造

---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187页。

[2]波兹德涅耶夫:《答维谢洛夫斯基》,第284页。

[3]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650-654页。

[4]巴托尔德:《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社会风习与经济制度的联系》,第231页。

[5]帕尔莫夫:《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历史研究》,第12页。

者，不如说他是另一些更为强大的势力的意志与计划的执行人。这些势力向往建立一个不依附于清朝的统一的蒙古国，它应包括讲蒙语的和信喇嘛教的居民所住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地区。这些势力的中心和参
238 谋总部在拉萨，在达赖喇嘛最亲近的人们之中。与这些计划对峙的决定性力量是清朝。实现噶尔丹及其鼓舞者的计划的主要障碍，不是喀尔喀封建主，而是清帝国。可以看出，如果说拉萨在指引噶尔丹的活动，那么，北京宫廷在同样程度上是支持喀尔喀封建主的分裂主义的中心，它力图利用分裂的喀尔喀以粉碎在西藏最高喇嘛庇护下建立统一蒙古的计划，我们的面前必然会有两种对峙的势力和倾向的冲突：一方面是泛蒙古的意图，也可能是西藏某些喇嘛教领导人的泛喇嘛教的意图；而另一方面则是满、汉封建主的扩张计划，他们想侵占全蒙古，首先是侵占喀尔喀。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和他的以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为首的喀尔喀对手这双方的政策和具体活动，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对 17 世纪末蒙古各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内幕的理解。为这种概括提供丰富实际材料的一部主要史料是对噶尔丹战争的满洲官方记述——它是由玄烨专门委派的学者和大臣在战后不久编成的集体著作。经皇帝亲自审阅和批准，并为它亲自作了序。序言所注的时间为 1709 年（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这部著作篇幅很大：共有 3000 多页，分为 5 部 48 册。这部史料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完全没有任何作者的论断、看法和评价。其中除了官方的文件再没有什么别的，这些文件包括：皇帝的谕旨；玄烨给他儿子和继承人的亲笔信；文武官员的许多报告（没有删除各种谍报）；玄烨跟达赖喇嘛和喇嘛教其他最高主
239 教，跟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土谢图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来往信件。对事件的叙述从 1677 年开始，一直讲到 1698 年。有两个主要优点使这部著作区别于《圣武记》和其他许多中国史著。这部著作是战争结束后不久遗迹犹新时编成的，而且它是大量文件资料的汇编，这些资料不是摘录，而通常是一字不漏地全文引用。

我们了解到这部史料时，它还是未公布的译稿，由伊拉里昂·罗索兴准尉于 1750 年在彼得堡译完，采用的书名是《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

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1]。这一出版物的官方性质——它旨在颂扬整个清朝,特别是玄烨皇帝;旨在贬低和千方百计地揭露清王朝的敌人,首先是噶尔丹,它有这种明确的宣传目的——就足可保证有可能排除渗入其中的任何左袒蒙古的,尤其是左袒卫拉特的情绪。这使我们有权对《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所记载的绝大部分事实深信不疑。

我们有理由认为,波兹德涅耶夫也知道上述这部史料。在《宝贝念珠》的序言中谈到蒙古史方面的满洲文献时,在他谈到的许多书中有一本《西北边疆的平定与归并》,它"是研究康熙皇帝在位时有关满洲—喀尔喀与准噶尔人,或者说与噶尔丹博硕克图本人所进行的那些战争的最主要的史料。这部著作叙述与噶尔丹的战争是从康熙十六年开始的,直到他在位的第38年"[2]。根据内容和年代起讫来判断,波兹德涅耶夫所提到的这部著作就是由罗索兴译成俄文的那个满文原著。只是不清楚为什么波兹德涅耶夫本人不利用这部"最主要的史料",为什么他认为1842年首次出版的《圣武记》比这部主要史料好。据他自己说,《圣武记》中,蒙古史总共只占一章,而这一章中谈到玄烨进军卫拉特史的,又只是4节里的一节。 240

前面提到的这部满洲—卫拉特战争史,起初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这从编者给皇帝的报告中可以看出。[3]

罗索兴从头到尾把这部满文本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译完了,而18世纪的另一位俄国东方学家列昂节夫译的则是汉文原本,他从中摘录了较小一部分,译成了俄文,并题名为《有关中国人与准噶尔人1677—1689年战争的资料汇编》,于1777年出版。列昂节夫的这部译著在专家们中间流传甚广,在过去和现在的文献中都经常被引用,而罗索兴的著作至今还难以弄懂,并且很少有谁知道。有趣的是,波兹德涅耶夫在

[1]关于罗索兴的生平,参看《俄罗斯人名辞典》(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第15卷,圣彼得堡,1910年版,第422页。译者按:此书即《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5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全5部),罗索兴译,圣彼得堡,1750年科学院档案馆,第21号档,第5号,第1卷,第21张。

他的喀尔喀人历史资料中有时倒引用列昂节夫的《资料汇编》,却一次也未利用过罗索兴的《征服史》。

我们所使用的第二类重要史料是俄国档案文件,它们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补充和明确了蒙古的、满洲的、卫拉特的和其他史料的记载,有时则是这些史料的印证。

4.1 噶尔丹执政初期的内外政策
(1688 年的战争)

史料没有充分揭示噶尔丹执政头五六年的事件。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掌握有关促成这位 26 岁的年轻人——昨日的既无自己的领地,又无自己的军队的一个喇嘛——掌握政权的全部细节。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通过什么具体形式帮助他反对了其他觊觎汗位的人,这些觊觎汗位的人中有和硕特、杜尔伯特、绰罗斯和其他领地的很有声望的强大执政者。无疑的只是:噶尔丹如果没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帮助,就不可能指望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只因为喇嘛教的关系,噶尔丹才能在 1671 年秋就以准噶尔汗国执政者的身份接见从中国返回俄国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并派了使者随他同去俄国。

241

阿勃林于 1671 年 10 月到达托博尔斯克后,向列普宁将军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还在途中他就得知僧格被杀,不过他和他的同行者受到了噶尔丹和阿喇布坦(即策妄阿喇布坦)的迎送和接待。列普宁将军向莫斯科也报告了阿勃林归来的情况,同时根据阿勃林的话补充说:"为了伴送皇上的高级官员,格根和阿喇布坦二台什特派了使臣玛密杰里卜和恰德尔随同来到托博尔斯克和莫斯科……卡尔梅克的这两位使臣在使馆里说到,二台什派他们携带一份证书并伴送俄国官员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及其随行人员到托博尔斯克和莫斯科,可是他们不能把证书交给托博尔斯克,因为二台什吩咐他们要到莫斯科把它呈

交皇上陛下。”[1]

与噶尔丹并提的这位喇布坦或称阿喇布坦台什，就是策妄阿喇布坦，他是僧格的儿子，噶尔丹的侄儿。由此可见，波兹德涅耶夫关于噶尔丹夺了僧格的直系继承人策妄的汗位，又迫使后者逃奔吐鲁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策妄阿喇布坦在其父被杀后的头几年是支持噶尔丹的。他们的争执和开始仇视那是较晚的事，后面会看到，策妄阿喇布坦本人的供叙也证实了这一点。

噶尔丹急于要办的事情之一，就是与俄国政府就征收实物税问题达成协议。还在1671年夏天，噶尔丹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将军苏马洛科夫的第一封信中，在通知僧格被杀的同时，就维护自己向原属卫拉特王公的克什提姆居民征收实物税的权利，并且补充说，他对俄国当局向这些居民收实物税也不反对。苏马洛科夫在自己的一个复文中向西伯利亚衙门报告说：“皇上，175年（1667年。——兹拉特金）卡尔梅克僧格台什曾率兵攻打蒙古国王罗德桑·赛英浑台吉，并捉住了他，杀了他的许多人。僧格台什把自己的两个台什——丹津科舍奇和阿巴哈汗留在罗德桑的土地上，并随之留下卡尔梅克军队5000人，这两位台什驻扎在克穆奇克河彼岸。今180年（1672年。——兹拉特金）二台什率兵渡过该河，驻扎在离吉尔吉斯斯坦国100天路程的河这边来了……以前这两位台什从未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派过使臣，而今年一年之中，先后3次派来使臣，头两次他们的使臣口述了要求，而第三次使臣在聚会厅给了我一封丹津科舍奇的信……信中所写的以及向我——您的仆人谈到的内容，都是要求近郊鞑靼族的卡钦人、阿里人、卡马辛人、坎斯克人以及所有从台什们的属地来的人，向丹津科舍奇和阿巴哈缴纳实物税。”[2]不然，这两个军事首领就有动武的危险。这些年的文件证明，噶尔丹执政初期，征收实物税的问题仍像他的前辈僧格执政末期一样尖锐。卫拉特封建主以5000名驻防军的实力加强勒索的结果，是实

242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477－478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451－452张。

际上减少了进入俄国国库的实物税。1672 年秋天，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任将军赫鲁绍夫报告说，丹津台什派遣的使者到达他那里，递交格根（噶尔丹）的书信一封，告知派出了一个商队。使者还说："格根浑台吉
243 率卡尔梅克部众从其本土来到蒙古，并驻扎在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0 天路程的克穆奇克河，在那里过冬……据知，他们卡尔梅克台什同吉尔吉斯人和图巴人要来攻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各县城，因为台什们不断遣来使臣，要卡钦人、阿里人、坎斯克人、卡马辛人、乌吉人等向他们交付实物税。"[1]

1673 年夏，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来的信又说，代表"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梅什到了那里，他向将军宣称："格根占了僧格的位置，带兵来到罗德桑的驻地——蒙古，他所带的军队有 1 万人。使臣还对阿列克赛说，有些属民把实物税交给皇上陛下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也希望这些属民把实物税交给他格根，如果不交，他将攻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1673 年秋，噶尔丹曾离开伊犁河岸迁到叶尼塞河上游，从这里继续同西伯利亚地方当局进行交涉，维护他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的权利，同时也不反对俄国官方向这些居民征收实物税。

俄国地方当局曾担心，噶尔丹会集中兵力于边境地区，以便侵入俄国境内，为其利益用武力解决实物税问题。但是这些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噶尔丹并不愿同俄国打仗。相反，他寻求各种机会以便与俄国当局达成协议，使双重进贡合法化，即双方为自己的利益都有权向转入俄国国籍的原卫拉特克什提姆征收实物税。1672 年 12 月，卡尔瓦茨基返回托博尔斯克，他一年前被派遣去护送由莫斯科回国的僧格的使者涅乌芦思，同时把沙皇的奖赏面交这位准噶尔汗。卡尔瓦茨基报告说，他们到达以前，僧格已被杀，原定给他的奖赏转交给了格根。"格根台
244 什很诚敬地接受了皇上陛下的奖赏。"[3]噶尔丹要求把过去几年从各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568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455－546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515 张。

卫拉特王公处迁往俄国境内的臣民归还给他。同时他抱怨西伯利亚当局不念他曾效忠沙皇,曾帮助过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竟拒绝放他的使者杰伏列特舍赫去莫斯科。他还说:"如果不让杰伏列特舍赫以及原先的使者咱伊桑和恰德尔带证书和礼品去莫斯科见皇上陛下,那么,今后俄国派来他们台什处的以及前来贸易的使者,亦要受到阻拦。"[1]

莫斯科下令不要阻拦噶尔丹的使者,并遣送他们到首都。在外交事务部受到接见时,他们抱怨说:"去年,179 年(1671 年。——兹拉特金),他们到达托博尔斯克,而托博尔斯克的贵族将军伊凡·鲍利索维奇·列普宁公爵等人强留了他们 3 年。"[2]1673 年 8 月 1 日,使者们向莫斯科外交事务部递交了两封噶尔丹的信。其中一封写道:"他的族自古以来效忠于原先的沙皇陛下和俄罗斯大公,并不断遣使来往。他仿效先辈遣使咱伊桑去皇上陛下那里,希望皇上关照,不准西伯利亚贵族和将军们向他的属民征收任何赋税。并希望这些不要让别的国家知道。"在第二封信中噶尔丹写到:"他的哥哥僧格台什死后,他噶尔丹成了台什,所以派了使臣咱伊桑来见皇上陛下,但却没让他速去莫斯科,而在西伯利亚受到了阻拦。当他知道此事后,派了另一名使臣伊尔克伯克去皇上那里了解有关咱伊桑的真实情况,了解一下是谁阻拦了他。"[3]

我们掌握的有关这个外交代表团的资料寥寥无几。资料的贫乏使我们无法彻底研究事件的进程,并查明噶尔丹的使者和俄国政府之间谈判的结局。不过有一个文件对噶尔丹的信和他的使者的话叙述得比较详细。例如在噶尔丹的第一封信中说到,当他哥哥僧格在位时,俄国人就曾向他的臣民征收实物税,不过"他目前并不为这件事苦恼",这即或从前也未曾有过。僧格为此事曾遣使去莫斯科,但没有结果。现在噶尔丹接替了僧格的位子,他也派出了一个使者,却不准进莫斯科。了解到这点,噶尔丹又派了一名使者。

245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517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548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623 卷,第 547 张。

在噶尔丹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卡尔梅克族过去效忠于俄国沙皇，现在噶尔丹派遣自己的使者，目的是为了向沙皇说明俄国西伯利亚当局在征收实物税方面使僧格汗深受委曲，也为了查清沙皇是否知道此事。噶尔丹写道："他们的部众住的地方离托博尔斯克很近，随时准备效忠皇上陛下。"有关其他事务，噶尔丹委托使者口述。准噶尔使者口述的内容可归结为：噶尔丹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曾效忠沙皇，现在噶尔丹接替了僧格的位置，在此之前他是呼图克图。噶尔丹曾给予他登位后不久就通过其领地的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以重要帮助。阿巴赖台吉为阿勃林提供了护送去中国的人员。但是不久阿巴赖的哥哥鄂齐尔图车臣汗进攻阿巴赖的兀鲁思。得知这事之后，护送谢伊特库尔的阿巴赖属民惊惶不安。当时，噶尔丹的代表咱伊桑"看到他们这样不安，就离开自己的部众，为了保护俄国装有财物的车马和人员而跟他们同行到自己的台什那里。台什忠于皇上陛下，派了护送人员和大车。他咱伊桑则陪送皇上陛下的财物和谢伊特库尔到中国，又从中国返回托博尔斯克。"[1]阿勃林从托博尔斯克去了莫斯科，而将军们却把他咱伊桑在托博尔斯克强留了3年多。

关于噶尔丹给过阿勃林帮助的说法与阿勃林本人的报告不全相符[2]，大概是有些夸大。不过使者这番话本身值得玩味，它证明噶尔丹渴望博得莫斯科的好感，也证明鄂齐尔图车臣汗和阿巴赖之间，在1668—1671年又发生过一次战争。

246 至于策妄阿喇布坦的信，则是完全重复了噶尔丹的几次信的内容。其中新的一点是提到了60户白卡尔梅克人，他们原向他父亲僧格交付实物税，但是后来叛逃到托木斯克。这些人在僧格生前未被遣送回来，因此策妄阿喇布坦要求把逃跑者归还给他。这封信也证实策妄阿喇布坦在噶尔丹执政初期是跟他合作并支持他的，而关系破裂是后来的事。

莫斯科对噶尔丹有关实物税的呈文回答得相当坚决。1673年10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105－107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26号档，蒙古卷宗，1673年，第2卷，第67－68张。

月，莫斯科当局向被邀到外交事务部的噶尔丹使者说明了，俄国臣民不能向噶尔丹交付实物税。“他，台什是沙皇陛下的臣民，希望他不要收俄国臣民的实物税，不要以此激怒沙皇。”同时还对使者们说，沙皇了解到噶尔丹带着他的兀鲁思从老牧区迁到了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地区，也了解到噶尔丹妄图联合吉尔吉斯人和图巴人进攻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让使者们回去转告台什们，希望他们同俄国人和睦相处。同时给西伯利亚发了一道谕旨，责成派一个“善意的”代表团携带书信和礼物去噶尔丹那里，同时命令今后不要阻拦他的使者来莫斯科，如果他要求的话。[1]

1674 年初，一个代表鄂齐尔图车臣汗、楚琥尔乌巴什以及他们两人的儿子们和其他亲属的人数众多的外交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资料足以肯定，噶尔丹和上述领主间的冲突发生在他与策妄阿喇布坦断绝关系之前。1674 年 2 月，使者们在外交事务部递交了他们的执政者的信件。楚琥尔乌巴什在他的信中申诉说，当他去西藏进香时，噶尔丹进犯了他的兀鲁思，他称噶尔丹为免去教衔的呼图克图。他写道，噶尔丹把他的领地“连同耕地和属民完全摧毁了……我的领地完全被破坏，而我是自己领地中的老住户”[2]。由此信可见，噶尔丹侵犯楚琥尔兀鲁思不会早于 1671 年秋天，也不会迟于 1673 年夏天。我们无法确知，噶尔丹同他的叔父冲突的原因，但是和硕特的鄂齐尔图车臣汗和绰罗斯的楚琥尔乌巴什同派一个代表团的这件事实证明，这位车臣汗同情的是楚琥尔，而不是噶尔丹。可以认为，对噶尔丹的活动的一致看法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有些事实可以帮助说明这个初步看法。 247

1673 年的外交代表团肇始了准噶尔汗国和俄国之间外交关系十分活跃的新时期。保存下来的文件证明，1671—1680 年间噶尔丹派往西伯利亚各城市和莫斯科的外交代表团不少于 6 个，而从西伯利亚各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26 号档，蒙古卷宗，1673 年，第 2 卷，第 110、113、114、116、118、119 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26 号档，蒙古卷宗，1673 年，第 2 卷，第 52 张。

城市和莫斯科派去他那里的则不少于4个。

对消除边境地区紧张状态深表关注的俄国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期不致因俄国方面的过失而发生事端。俄国档案资料中反映的一件事很有代表性。1678年8月,塔拉将军派遣贵族彼得·罗曼诺夫斯基之子去噶尔丹那里,就当地属民侵犯了卫拉特的兀鲁思一事表示:"希望台什们不要因为这类由塔拉的鞑靼人所干的侵袭事件而十分愤怒……那些坏人已被捕获,并予以惩处。"[1]

另一件事也很有代表性。这事发生在俄国和准噶尔汗国间的实际贸易关系之中。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多次向莫斯科申诉,卫拉特领主们的使者,非法滥用豁免关税和不受检查的优待,损害国库收入。[2] 考虑到这种情况,但同时又不愿给双方关系重新尖锐化提供借口,托博尔斯克当局还在1670年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必须检查卫拉特使者运来的商品,又规定不向他们,而向购买这些商品的俄国商人征收关税,"每个卢布收10戈比,1匹马和1头牛各收10戈比,每只羊收5戈比"[3]。

248 1678年,噶尔丹派出的以谢别伏吉和卓和沙拉梅尔根为首的外交代表团到达托博尔斯克。从准噶尔随同他们来了一个商队。使者向将军递交了一封噶尔丹的信,信中噶尔丹写到自己的愿望,"希望保持接壤邻邦的联盟关系,希望边境不发生争端。"根据噶尔丹的要求,谢别伏吉和卓在瓦库林的陪同下被送往莫斯科。

1679年7月,谢别伏吉和卓受到外交事务部官员们的接见,他在与官员们的交谈中声称,"噶尔丹台什不希望跟沙皇陛下的人发生任何争端,为此遣使叩请皇上陛下查明争端的肇事人"[4]。使者在谈话结束时说到,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兀鲁思已转入噶尔丹之手。

噶尔丹在谢别伏吉和卓回到他那里以后不久,就表现出他准备消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329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480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306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709卷,第126-127张。

除有碍同俄国和睦相处的障碍。1680 年 6 月，他派了特使去库兹涅茨克，任务是查明过去所发生的事端中谁是罪魁祸首。这位使者在跟库兹涅茨克的达维多夫将军交谈中声称，噶尔丹要把这一调查进行到底，查明并惩办肇事人，并让其赔偿损失等等。卫拉特代表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库兹涅茨克地区引起事端的肇事人是吉尔吉斯王公叶列尼亚克。[1]

俄国档案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搞清噶尔丹执政头 10 年对俄政策的总方针，以及这些年中准噶尔汗国内部生活中的若干重要事件。开始，噶尔丹坚决维护卫拉特封建主对他们原来的克什提姆和向克什提姆征收实物税的权利，有时甚至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后来对争议问题的态度却渐渐地缓和下来了，越往后，则越坚定地谋求与俄国和睦相处。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愈来愈明显地成了准噶尔汗国对其北邻的主要外交政策。这 10 年的俄国史料中没有记入过任何一次由准噶尔汗发动的与卫拉特军队[2]的武装冲突。很明显，汗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北部，并且不能只归结为克什提姆和实物税的问题。如果说僧格认为归还克什提姆和取得向他们顺利征收实物税的权利是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且为此不惜造成与俄国的紧张关系，那么，我们确认，噶尔丹则准备牺牲克什提姆和实物税，只求巩固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而且以后还力求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

249

我们认为下述史实是可以肯定的：噶尔丹执政头几年，他和僧格的直系继承人策妄阿喇布坦曾和睦相处，并且进行了合作。噶尔丹专制政权的最初牺牲品之一是他的亲叔叔楚琥尔乌巴什。噶尔丹第一次进犯楚琥尔兀鲁思大约是在 1671 年秋到 1673 年夏之间。到 1678 年，噶尔丹杀害了鄂齐尔图车臣汗，并征服了他的领地。

1677 年，噶尔丹第一次与清政府发生外交关系。他派出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到北京“奉表入贡”，代表团在那里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 709 卷，第 178 张。

[2]原文如此，疑为“俄国军队”之误。——译者

并获得厚赏。由于这个西蒙古外交代表团是双方关系中断两个世纪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又由于它开创了清帝国和卫拉特领地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史料中特别记载了关于卫拉特人和噶尔丹的某些情况。其中关于卫拉特人的情况我们见到的是："厄鲁特，西北大国也，分部散处，各立名号，然实本一姓。"这部史料称这个部为"额鲁特"或"厄鲁特"（即卫拉特）[1]。关于噶尔丹则记载说："噶尔丹为僧格同母弟，时尚幼，弃家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未几，其异母兄车臣及巴图尔以争属产故，与僧格有隙，乘夜劫杀之，部内大乱，达赖喇嘛遣噶尔丹归，统其众。"[2]

250

我们引这段相当长的摘录，是为了指出一种根据地域和政治原则（而绝不是人种原则）把卫拉特居民划分为若干单个领地的看法，也是为了强调由于僧格被杀，达赖喇嘛专派噶尔丹回准噶尔整顿汗国秩序这一事实。

前面我们曾引用过一个俄国文件的记载，其中提到僧格的被杀促使阿拉特牧户离开封建主外逃。我们觉得这个简短的记载似乎暗示着卫拉特劳动人民的一场相当广泛而急剧的变动，他们决定用逃跑来摆脱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们的这部史料证明，达赖喇嘛打发噶尔丹回去安抚臣民，这应当理解为一项对王公进行整顿，而对劳动人民的阶级反抗进行镇压的委托。

下述史实有助于证实我们的这个初步看法：1678 年，噶尔丹执政后不久，就颁布了一项命令，目的在于严厉整顿汗国的行政秩序，巩固牧奴制关系，制止"盗窃"，不准劳动人民在汗国土地上自由迁徙。命令规定："每十帐派一人主管，主管者必严辖所属。凡有窃盗者，[十帐主管人]必上报，否则，断其双手，而其他[人]枷铁铐……总之，务须将在外旗游荡和混入之人集中起来，若未入鄂拓克，则令其迁入，若未入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1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2－13 页。

爱马克,亦令其迁入。"[1]

这个命令的另一条说:"凡应住在某鄂拓克里的人,若变更住处,则爱马克的主管须代其缴纳9头(9头牲口。——兹拉特金)。凡不从[爱马克]主管人管辖而擅离[原处]者,应罚缴9头牲口。凡将擅离鄂拓克或爱马克之人送回原处者,可从其[爱马克]主管人处得马一匹,并从余众处得到与[爱马克内的]帐篷数相等之牡绵羊……凡抓获逃亡者送交王公之人,可获得"一定的奖金。[2] 251

这个命令要求领主们对属于他们的代姆契(监督40个阿拉特牧户的户长)的活动加强管辖,责成代姆契严密地监视阿拉特的状况和行为,监督对当局命令的执行情况,反对流浪,组织对没有生活资料的人进行帮助等等。

命令中关于债务及其清算方法的条文很值得注意。"马年(1654)前[所借的]涉及巴图尔浑台吉的债务,一律无效(即废除。——兹拉特金)。但此后的债务,如有见证人,应追还,若无见证人,则无效(即不加追究)。"[3]

以上就是噶尔丹颁布的命令的内容。它包括许多行政问题和卫拉特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命令的指导思想是巩固中央汗权的封建法制和特权。它颁布的确切时间不太清楚。但从戈尔斯童斯基的资料看,不会迟于1678年,即恰恰是在以"整顿"汗国内部"秩序"为主要任务的那个时期颁布的。我们满可以把命令看做是"混乱情况"的直接结果,命令的使命就是要消除那种领主不服从中央汗权,劳动人民不顺从领主统治,牧民蓄意谋窃封建主的财产(命令中叫"窃盗"),以及王公的牧奴制特权被削弱等等混乱状况。噶尔丹没有辜负卫拉特封建主寄予他的期望。他果断地弭平了"混乱状况",巩固了中央汗权,在粉碎他的主要敌人——楚琥尔乌巴什和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反抗之后,变成 252

[1]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第58页。这里后面"[ ]"括弧里的词是戈尔斯童斯基加的。

[2]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第59页。

[3]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第58页。

了汗国独揽大权的执政者。1678 年,噶尔丹占领了东土耳其斯坦。[1] 我们认为,不必详细叙述使这块富饶而文明的地方并入准噶尔的一些事件。在瓦利汉诺夫和巴托尔德的著作中详尽地阐明了这些事件,他们两人手头掌握有原本的完全可靠的史料。我们只需提一下,东土耳其斯坦的伊斯兰教领地从属于准噶尔汗,这一方面是这些领地内部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藏喇嘛教领导人干涉的结果。瓦里汉诺夫写道:"喀什噶尔的汗亦斯美耳,这个勤勉的黑山派人迫使阿帕克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位和卓就潜入克什米尔并由此进入西藏。他晋谒了达赖喇嘛,博得了达赖的欢心,达赖遂派他携带书信去见准噶尔的浑台吉噶尔丹。信中要噶尔丹确认阿帕克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地位。噶尔丹便利用这个机会,在 1678 年征服了小布哈拉[2],并把阿帕克变成了自己的全权代理人"。[3]

巴托尔德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也大致相同。[4] 他指出,史料文献中对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有分歧。据有些资料记载,这些事件发生在 1678 年,而另一些史料则说是在 1679 年,第三种资料说发生在 1682 年,第四种资料又说在 1683 年。考虑到 17 世纪 80 年代初噶尔丹已全神贯注于喀尔喀的事务,所以应该认为,他征服东土耳其斯坦应是在 1678—1679 年间。

到这时,噶尔丹与鄂齐尔图车臣汗的斗争也结束了。1678年8月,甘肃省清朝当局审问了鄂齐尔图车臣汗的一个臣民达尔汗哈什罕,他曾被噶尔丹俘获,后来逃出,"彼言噶尔丹既杀鄂齐尔图汗,今岁二月内令其属兵丁殷实者,各备马十匹,骆驼三头,羊十只,窘乏者,马五匹,骆驼一头,羊五只。自其地起兵不知何向。"[5]

253

达尔汗哈什罕的供述使我们有可能确定,鄂齐尔图车臣汗是在 1676—1677 年间被击溃的。这个供词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噶尔

[1]沙俄及西方学者把中国新疆地区称作东土耳其斯坦。——译者

[2]18 世纪,欧洲人称中国新疆南疆地区为小布哈拉。——译者

[3]瓦利汉诺夫:《关于南路六城市的状况》,第 35 - 36 页。

[4]巴托尔德:《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第 250 页。

[5]《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40 - 41 页。

丹军队的补充、组织以及物资供应的方法——那是压在卫拉特劳动人民肩上的重荷。加之阿拉特还必须按执政者的意志抛弃和平劳动，参加进军，并为了与己无关的汗和王公们的利益而作战，同时供给士兵马匹和食物的任务也完全由劳动人民承担。

楚琥尔乌巴什和鄂齐尔图车臣汗的被击溃，终于使噶尔丹得以不受任何拘束的放手行动，变成了卫拉特丘尔干唯一的盟主。但是噶尔丹的胜利也是得来不易的。在这场斗争过程中，某些领主怕新的准噶尔汗铁拳无情，宁愿离开故乡的牧区，迁往伏尔加河或库库淖尔一带，这时以和鄂尔勒克和顾实汗的后裔为首的卫拉特汗国已经在这一带得到了巩固。例如，1672 年多次被提到过的和硕特的昆都仑台什和杜尔伯特的索诺门策零台吉，就各自带领自己的兀鲁思迁往伏尔加河。1678 年，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妻子多尔济拉不丹也迁往那里，她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国执政者阿玉奇汗的亲姊妹。噶尔丹要阿玉奇归还逃去的人，但阿玉奇不听从他。有关这些流亡者的问题成了纷争的起因。噶尔丹与阿玉奇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1687 年，阿玉奇写信给俄国当局说："以前博硕克图汗跟他是和睦的，现在他们处于战争状态……因为过去阿玉奇的属民曾逃往博硕克图处，而现在博硕克图领地的人却迁到阿玉奇处来游牧……阿玉奇台什放他们回去，但他们不走……现在博硕克图汗派来了使臣……意欲攻打阿玉奇。"[1] 254

至于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们和藩臣们，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企望在东方库库淖尔地区找到避难所。特举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孙子罗卜藏衮布为例，他于 1682 年 8 月向北京报告说："我祖、父向曾往来入贡，后以内乱，往依达赖喇嘛，今幸得稍宁。伏乞皇上……，请率所辖居龙头山[2]之地。"[3] 我们的这部满洲史料不止一次地说到卫拉特王公巴图尔济农（或称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或孙子）也曾向玄烨皇帝请赐避难所。史料第一次提到他，是在 1677 年 10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卡尔梅克卷宗，1687 年，第 5 卷，第 4－5 张。

〔2〕阿拉克阿林即龙头山。——译者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86 页。

月，当时甘肃省当局向北京报告说，巴图尔济农自称是鄂济尔图车臣汗的儿子，败于噶尔丹，率领其兀鲁思残余部众到达帝国边境，请求给他一块游牧的土地。从以后的史料查明，巴图尔济农进犯过一块蒙古土地并大肆抢劫。为此，玄烨在1684年初[1]颁布上谕："鄂齐尔图汗为噶尔丹所灭，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离其故地，来至边境，劫掠毛明安、吴喇忒，本应殄灭，但若辈皆鄂齐尔图汗所属。朕俯念鄂齐尔图汗世奉职贡……是以宥其罪戾。又罗卜藏滚卜阿拉卜滩，系鄂齐尔图汗之孙，
255 与巴图尔济农为兄弟行。"[2]玄烨因此赐给他们牧地、封号和金印。

楚琥尔乌巴什的后裔也向清朝请求保护。今年（1684）末，憨都台吉及其仆人额尔德尼和硕齐写信给玄烨，前者在信中说："臣部运衰，遭噶尔丹执臣祖楚呼尔吴巴什，灭臣父班第，臣时年十三，有陪臣额尔德尼和硕齐者挈臣逃出。"[3]额尔德尼和硕齐也写道："臣之两诺颜，乃噶尔丹之叔及弟也。无罪，而噶尔丹执之杀之，即蔑我主，何能与之共事，故掠其边境，奔遁至此。"[4]玄烨就在这次也迁就了请求人，原谅了他们曾袭击了他的臣民，赐给了避难所，分拨了游牧地。

同时，1677年夏季到达北京的噶尔丹的使者博瑞额叶图向当局表示，他目前不敢回去："来时鄂齐尔图汗、喀尔喀土谢图汗曾夹攻我台吉。近又闻归化城来贸易人言，喀尔喀色棱达什台吉率300余人，将邀劫我等喀伦，我等得在皇上边塞之内，即如金城之固，请暂居此。"[5]博瑞额叶图走到北京花了不下6个月的时间，所以可以断定，土谢图汗和鄂齐尔图汗进攻噶尔丹是在1676年末。

1678年春天，北京获悉噶尔丹准备进攻库库淖尔执政者。考虑到作战地区可能靠近中国边境，玄烨便发布了一道谕旨，其中说："噶尔
256 丹兴兵往攻西海厄鲁特，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去，则毋庸置议，若来

---

[1]应为1685年5月。——译者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24－125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18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19页。

[5]《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0页。

自近边，欲经大草滩前去，则将军张勇……务须令其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仍整饬我军，严加防护，一面放噶尔丹过往，一面奏闻。”[1]在这件事上明显地表现出清政府避免与噶尔丹冲突，并在他与库库淖尔执政者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愿望。

同时，北京当局了解到，居住在甘州[2]城郊的当地唐古特人（番族），在僧格生前是给僧格交贡赋的，而现在交给噶尔丹。1678 年秋天，噶尔丹遣使向番族各头人建议去河套议事。清朝当局也查明，“噶尔丹邻近诸彝，有从之者，亦有从之而复去者。噶尔丹向有侵西海之意，因人心不一”[3]。

占领库库淖尔成了噶尔丹的夙愿，这点在张勇 1679 年 8 月收到的噶尔丹的来信中得到了证实。张勇在叙述这封信的内容时向北京报告说：“噶尔丹遣其寨桑莽奈携随从三十余人，致书于臣，言我台吉向欲通使，因地方有事未暇，今特遣人献马三匹，貂裘一袭。又言，我台吉云：西北一带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系我祖与伊祖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因系将军所辖之地，不敢轻举。”[4]

我们面前逐渐展现出了噶尔丹的行动计划，他追求在达赖喇嘛庇护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噶尔丹首先巩固他在准噶尔汗国内的独裁政权，并把汗国变成作战的主要根据地，通过对俄国的适当政策以保证后方的安全，并把汗的牙帐迁到原阿勒坦汗的领土上——靠近未来的战场。随后，他便在西喀尔喀领主中展开了积极的征募工作，同时开始准备进占库库淖尔。从他给张勇的信中可见，他甚至不太隐瞒自己企图染指库库淖尔，并借口他父亲巴图尔浑台吉曾与顾实汗一起为争夺这一地区而战斗过，说明他有权占有这个地区的一部分。

为了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立足于库库淖尔，噶尔丹与那里的几位执政者建立了姻亲关系，娶了顾实汗的一个孙女为妻，并把女儿嫁给顾

257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32－33 页。

〔2〕甘州即今甘肃张掖地区。——译者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42 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53－54 页。

实汗的一个孙子。可是他对库库淖尔的计划没有得到顾实汗的继承人的赞助,他们不愿为未来的、不会由他们起主要作用的统一的蒙古国放弃自己的特权。于是就出现了噶尔丹和库库淖尔各执政者之间的冲突。不可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这一冲突,这是喇嘛教和噶尔丹实现大国主义计划首要的严重障碍。后面我们会看到,甚至连拉萨喇嘛教的领导人也不能使库库淖尔封建主倒向噶尔丹一边。库库淖尔领主们让步的限度是他们同意保持中立和不介入噶尔丹占据喀尔喀的斗争,不介入他以后与清朝的战争。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阻止了噶尔丹在1678年武装入侵库库淖尔的行动,但是这种入侵的主张本身已经是这一冲突的反映,是噶尔丹及其幕后支持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要用武力解决这一冲突的尝试。

清政府在这些年对噶尔丹以及准噶尔汗国执行了一种极为谨慎的政策,以避免造成任何麻烦和紧张关系,同时采取措施消除对清朝的利益可能产生的威胁。1679年夏,张勇向北京报告,噶尔丹放弃进军库
258 库淖尔的计划而派了3万人去征服吐鲁番。这时玄烨下了一道谕旨:"噶尔丹素称强悍,人马繁众,然其住牧地方与甘、肃两地相去甚远,……然彝情甚为叵测,……严饬各汛固守边疆。"[1]

这时清帝的使臣祁他特从北京到噶尔丹那里,1683年夏,他向政府呈交了一个有关此行的报告。祁他特在报告中谈到,噶尔丹得悉来了使者,曾说:"中国使臣从无临我厄鲁特者,今闻遣使前来,不胜欣悦。"[2]有关准噶尔执政者接待清朝使者的礼节方面的谈判情节,很觉别致。准噶尔执政者建议遵照北京的规矩,"部臣受之上奏……我国虽无部院而有寨桑,若使寨桑接受,是行中国之礼也"[3]。

1682年12月28日,噶尔丹接见了祁他特,他对不久前中国发生的反清暴乱很感兴趣。噶尔丹问曰:"闻中国有寇乱,迟至数年始灭。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2页。译者按:此条系将军张勇的奏报,不是玄烨的谕旨。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93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95页。

其信然乎?”祁他特回答说:“比年曾有寇盗窃发,我皇上……渐次收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尽皆底定矣。若似尔地旷野,何至持久耶。”

1683年元月末,祁他特动身回国。噶尔丹派了使者携带礼物随他同去北京,礼物中有400匹马、60头骆驼、300张黑貂皮、500张银鼠皮等等。[1] 259

祁他特外交代表团的材料证明,噶尔丹力求给北京使者们留下一个印象,使他们感到准噶尔汗国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它的执政者跟中国执政者的地位完全相等。重要的是要指出,北京的使者这次对噶尔丹想跟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要求,没有予以反对。可以想见,他是根据北京的指示行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见有资料提到过他在准噶尔汗国牙帐中的行为受到了北京的指摘。

我们可以用有关赐给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封号的一件事来证明上述情况。1679年9月,噶尔丹“以达赖喇嘛授为博硕克图汗”函告北京。[2] 这个通知使清朝政府很窘。理藩院研究了这一问题,查明从前均由北京授予敕印,“从无以擅称汗号者(指卫拉特的。——兹拉特金)准其纳贡之例”。所以本不应接受噶尔丹破坏体统献来的礼物,但理藩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考虑到噶尔丹台吉“敬贡方物,特遣使入告,应准其献纳”[3]。玄烨同意了理藩院的建议,收下了噶尔丹的礼品,从而默认了他有权得到达赖喇嘛赐予的汗的封号。

北京在这些年对噶尔丹采取如此有意和解的态度,是由于中国内部局势的紧张,吴三桂掀起的反满起义(1675—1684年)的火焰还没有熄灭,又发生了南蒙古的纷扰(1676年),而且日益加剧,其首领是察哈尔汗林丹的曾孙布尔尼,同时喀尔喀的事件也使中国惊忧不安。关于这些事件我们到后面再谈。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未敢冒险恶化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 260

但是无论如何,喇嘛教首领赐给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极幸福的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96-97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7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9页。

执政者”)的称号绝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也先以后绰罗斯族领主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得到汗的封号。哈喇忽喇不是汗,巴图尔浑台吉不是汗,僧格也不是汗,噶尔丹之后准噶尔的任何执政者也都不是汗。可是1679年刚满34岁,总共才统治准噶尔八九年的噶尔丹,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并对所有阻碍其计划实现的人残酷镇压的时候,喇嘛教就授予了他“极幸福的汗”的封号,正式表示赞许和厚待。这一事实是喇嘛教与噶尔丹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的又一佐证。噶尔丹实际上代表着达赖喇嘛周围一些权要人物的利益。

17世纪80年代初,清帝国的内部政治地位已根本上得到巩固。反满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但是喀尔喀蒙古领地从属于噶尔丹的危险日益加剧,这在清政府看来是一个孕育着危险纠葛的现象。应该指出,清朝对蒙古政策的关键所在是无条件地、不妥协地坚决反对任何政治上统一蒙古的可能性,尤其反对喀尔喀与卫拉特国家统一起来。

我们不准备记述一些众所周知的喀尔喀事件,这些事件与扎萨克图汗领地的夺位斗争有关。它们为噶尔丹的干涉奠定了基础,这就最终导致了1688年的战祸以及绝大部分喀尔喀封建主在实际上和法律上转而臣服清朝。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玄烨直接领导下从事编纂清朝官方历史的人,对这些事件是如何阐述的。

261 我们的这部满洲史料记载,1662年在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领地上,开始了争夺汗位的斗争。参与者有罗卜藏台吉(最后一个阿勒坦汗),但是他遭到了失败,而于玄烨执政第9年(1670),在卫拉特的噶尔丹的保护下逃走。[1] 玄烨执政第20年(1681),噶尔丹把罗卜藏台吉交给了新的扎萨克图汗成衮。

我们从1684年初玄烨发给达赖喇嘛的一道敕谕的有关记载中,了解到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敕谕中说:“先是,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

[1]俄国史料也证实了这段记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苏马洛科夫曾向莫斯科报告说,1671年他收到噶尔丹的一封信,通知说:“卡尔梅克人与蒙古的罗卜藏赛英汗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纷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623卷,第381张)。

汗两次陈奏，疏言：自康熙[1]元年罗卜藏变乱以来，我弟兄子侄，多投左翼，屡索不还，曾往诉达赖喇嘛，蒙谕七旗曰：扎萨克图汗尔七旗当共尊之，其变乱以来，子弟人民流入左翼者，俱应发还。因差扎尔布奈前来莅盟，乃土谢图汗不至。皇上系我大众之主，谨以此情上闻。至是，上念喀尔喀累世恭顺，职贡有年，不忍子弟人民离散，遣阿齐图格隆等，赍敕往谕达赖喇嘛，令其遣使议和。"[2]

同年(1684)12月，阿齐图格隆返回北京，带回达赖喇嘛书信一封，其中顺便说道："其喀尔喀左右翼议好之事，曾遣扎尔布奈往盟。始则 262
右翼不从，继则左翼不服，是以未能协和。……今仰遵圣旨，复遣参巴陈布库图克图，令于十二月到喀尔喀国定议。"[3]但是达赖喇嘛的这位代表到达呼和浩特城就死了，这使玄烨又致函达赖喇嘛，他写道："前因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奏陈土谢图汗许还属裔而不还，许赴会盟而不赴"[4]，玄烨要达赖喇嘛派一名新代表去喀尔喀代替已死的参巴陈布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答复说，指派噶尔丹西勒图，并决定让噶尔丹西勒图在喀尔喀边境会见玄烨的使者，以便共同努力使敌对双方和解。

1686年10月，噶尔丹西勒图和玄烨的代表阿尔尼报告说，委托他们所办的事已顺利完成。他俩写道："臣等于八月十六日召集喀尔喀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宣示圣谕。臣等复于二十二日召集伊等晓谕之曰：我等来时曾降训旨谕尔等……谕毕，色棱阿海台吉等跪言曰：我七旗喀尔喀俱系一祖之子孙，向皆和好。自罗卜藏肇乱以来，互将人民隐占，……然钦遵圣旨和好息争与否，在吾两汗耳。……臣等遂令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行相问抱见礼，又令左右二翼众台吉亦行相问抱见礼，于本月二十三日，令汗及济农、大诺颜、台吉等检选所属六十余 263
材能寨桑，俱于噶尔亶西勒图、折卜尊丹巴[5]前悬挂佛像(菩萨。——兹拉特金)，设立重誓，两翼互相侵占之台吉、人民，令各归本主。一切

[1]兹拉特金引文中为康熙的满文名字额勒海台方。——译者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14－115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20－121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22页。

[5]兹拉特金引文中多出"呼图克图"几字。——译者

应结事件，俱审拟完结。”[1]

根据所引的各文件证明，清政府在这些年对喀尔喀延续了10年以上的剧烈内战，的确很操心。应该注意到，清朝对蒙古的政策在各个时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起初清人主要是要削弱蒙古封建领地，所以力求利用内部矛盾冲突，唆使一个蒙古领主去反对另一个。到17世纪80年代初，眼看库库淖尔、喀尔喀和蒙古其他各部臣服于骤然强大的卫拉特统治者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危险越来越明显，情况就变了。如果喀尔喀继续削弱下去，就会使噶尔丹的计划易于实现，所以清政府不再坚持过去的做法，而开始竭力制止喀尔喀的内战。

这时，北京对噶尔丹本人的态度也开始改变。清政府以前有意和解的政策，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硬。这最早表现于对卫拉特在中国贸易的问题上，玄烨在1683年末从北京发给噶尔丹的书函证明了这一点。这位清朝皇帝写道：“自声教既一以来，尔历世相承，虔修职贡，聘问有
264 年，朕嘉尔尽心敬顺，往来不绝，故向来尔处所遣之使，不限人数，一概俱准放入边关。前此来使无多，且头目人等善于约束，是以并无妄行作乱者。比年尔处使来，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沿途往回，抢夺边塞外蒙古马匹牲畜。进边之后，任意牧放牲畜，践食田禾，捆缚平民，抢掠财物，妄行者甚多。……用是限定数目放入边关。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其向来不用尔处印验，另行纳贡之厄鲁特噶尔马带青和硕齐、和硕特之博洛库济台吉、杜尔伯特之阿尔达尔台吉、图尔古特之阿玉奇台吉等所遣贡使，放入边关者，亦不许过二百人。”[2]

我们几乎全文复述了这个文件，因为它肇端了噶尔丹与玄烨之间有关贸易问题的一批来往信件，还因为它反映了北京对准噶尔汗国政策的变化。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8－152页。有关呼伦贝尔地区和解大会的情况，也可以参看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68－70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08－109页。

1年后,1684年秋,噶尔丹不顾北京政府的态度,又派了1名由3000仆从伴同的代表去中国。但是北京当局坚决不让进入国内的人超过200名。为此噶尔丹于1685年夏致函玄烨,信中说,他向达赖喇 265
嘛报告了北京不准进入中国的使者和商人超过200人的这一决定。他写道:"若妄行果真,上谕诚是。但自古以来四厄鲁特贸易向有旧制,我等未便废也。若仍遵旧制,则凡事皆宜矣。"[1]

我们不知道噶尔丹信中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旧制。我们只知道他的理由并未改变北京的态度。玄烨的有关限制卫拉特代表人数,即只许200人入境的决定仍然有效。

1687年4月,噶尔丹又发了两封信给北京。其中一封信中他重新要求允许卫拉特人在中国自由贸易,并再次强调这种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满洲政府仍然固执成见。更严重的是噶尔丹寄给阿尔尼大臣的第二封信。信中他叫北京政府的大臣们注意1686年和解会议时,喀尔喀最高主教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对达赖喇嘛的代表噶尔丹西勒图的应受指摘的态度。噶尔丹回顾了喀尔喀纠纷的历史,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亲兄弟土谢图汗在纠纷中的作用,达赖喇嘛的调解(第一次调解的尝试因土谢图汗的过错而没有成功)以及噶尔丹西勒图使团的成果,同时写道,他欢迎这个结果。但是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竟敢自认为与噶尔丹西勒图身份相同,得知这种侮辱达赖喇嘛代表尊严的失礼行为,喀尔喀的和平给他带来的愉快就被打消了。他写道:"前内大臣来时,据云圣主之意,以为法门者,黄帽法门,喇嘛者,达赖喇嘛也。诸使 266
臣当视有裨于黄帽法门者而行之。我等乃黄帽之施主(信奉喇嘛教者。——兹拉特金)。故……致书于诸大臣,大约道法以何者为善,其明白致复。"[2]

这个文件中非常清楚地揭示出噶尔丹的观点及其整个政治立场。自认为是达赖喇嘛的主要代理人和黄教利益的捍卫者——"黄帽之施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25-126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71-172页。

主”，所以，他干预所有在他看来是破坏宗喀巴[1]教规和冒犯达赖喇嘛威严的事。从噶尔丹的信中可见，他当时曾向玄烨的代表说明过这个观点，这些代表也曾向他说明，玄烨同样维护黄教和达赖喇嘛的利益。我们不知道达赖喇嘛本人和拉萨的其他宗教领导人是如何使噶尔丹具有这种思想的，但是我们的史料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噶尔丹的政策是受到拉萨支持的。

不过，北京决定对噶尔丹的信不予答复。不久，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告知玄烨，他收到噶尔丹来信，其中写道：“枯冷白尔齐尔之盟，尔与西勒图抗礼踞坐，大为非礼。达赖喇嘛道法遍及十方，西勒图者系宗喀巴座上之喇嘛，特遣以主盟议事者也。”[2]北京当局这次仍决定不加干涉，对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报告，也像对噶尔丹的信一样，置之不理。

然而，噶尔丹和喀尔喀最高主教间的冲突却渐渐扩大并日趋尖锐。1687 年 6 月，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向北京递交了一份报告，说他也收到了噶尔丹的一封信，指责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触犯喇嘛教规，使自己与达赖喇嘛本人的代表噶尔丹西勒图居于同等地位。土谢图汗写道：
267 “近闻噶尔丹遣伊属车臣吴巴什者，令右翼会盟。即盟所读其誓书略曰，汝右翼人等毋得违扎萨克图汗号令，违者即为叛教，以罗卜藏赛英台吉为例。又闻噶尔丹移营前来，由阿尔台山阳进三黑格尔之地。扎萨克图汗亦移营前往会之。又噶尔丹不许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来归左翼，今其移营前往，且令右翼诸诺颜等随扎萨克图汗环绕安营。噶尔丹前书之词既甚凶狠，今侦得复欲加兵于我，倘或不备，则坐受攻伐，如欲备之，恐蹈先举之愆。”[3]

在答复这份报告时，以玄烨的名义劝告土谢图汗不要破坏和平。1687 年 9 月给喀尔喀和准噶尔领主们分送了一份玄烨的命令，建议切

---

[1]宗喀巴（1357—1419 年）是西藏的一个喇嘛。1409 年，他创立西藏喇嘛教的格鲁派，即黄教。明末，和硕特部的顾实汗进入西藏，支持黄教封建主集团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黄教成为正宗，宗喀巴实际成了喇嘛教的教主。——译者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73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74－176 页。此扎萨克图汗已经是成袞萨喇的儿子。

勿发动战争。土谢图汗和喀尔喀的另一些领主又向北京递交了一份报告说："噶尔丹书至，我等曾遣使致复，彼言我乃黄帽大施主，心不释然，终必在此伺察等语。我喀尔喀之在彼国者，及厄鲁特向与我等通好者，俱言噶尔丹分南北两路来伐是实。我喀尔喀右翼人等，除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带青台吉之外，余者俱言兴兵是实。我界上人等惊惶，屡促我等赴彼，是以率兵起行……详视噶尔丹之状，大有争执礼体是非之意。"[1] 268

接到这个令人不安的情报之后，北京政府决定要求达赖喇嘛出面调解这个新的冲突，并向土谢图汗和噶尔丹再次发出维护和平的命令。

1688 年 6 月，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使者在北京讲到了事件的进展情况，他奉命来呈报喀尔喀最高主教处境极为困难的有关情况。使者说："去年噶尔丹率兵三万余分道而来，诱我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达尔马西里诺颜等叛去。我土谢图汗以为前年（即 1686 年。——兹拉特金）七旗业已誓和，今若辈叛者何也？乃领兵将此三人拘回。又闻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滚占滚卜等，领兵来掠右翼班弟带青台吉、巴尔丹台吉、卜图克森库图克图等的人畜而去，土谢图汗因追杀多尔济扎卜，其所掠卜图克森库图克图、巴尔丹台吉等五人，不知所在，其余台吉及属裔尽行收回。又闻噶尔丹领兵三路而来，土谢图汗与西海罗卜藏滚布领兵至噶尔丹所驻喀喇厄尔其克、察汗厄尔其克之地，遇达赖喇嘛使者所遣人，言皇上及达赖喇嘛使汝与厄鲁特和好，宜各领兵而退。土谢图汗不敢违，已率兵退……今噶尔丹自杭爱山后掠取右翼卫征哈滩巴图尔、车臣诺颜、伊尔登台吉、左翼昆都伦博硕克图 269 等，至忒木尔地方，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与战，阵亡几及百人，噶尔旦台吉及厄尔奇木带青等八人仅免。又闻丹津温卜、丹济喇、杜噶尔阿拉卜滩等，率兵来取厄尔德尼沼之地，其地距我所驻只二日程。"[2]

阿喇尼大臣的报告几乎同时送到北京，他经由喀尔喀领土去俄国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77－178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88－191 页。

色楞格斯克城，俄国使者柯罗文已在这里等候他。阿喇尼在报告中描述了他在喀尔喀碰到的情况。他写道："未至哲卜尊丹巴所，距七八日程，闻噶尔丹兵已至厄尔德尼沼，臣不之信，一面遣臣偕来内阁侍读海三代乘驿赴哲卜尊丹巴所详察情形，臣亦一面探听。闻噶尔丹兵击败卫征哈滩巴图尔、昆都伦博硕克图，又收服达尔马西里诺颜台吉兵众，向厄尔德尼沼而来。土谢图汗子噶尔旦台吉逆击之，为所败，不能与其妻、子会，……噶尔丹兵尽掠厄尔德尼沼居民，直抵喀喇卓尔浑之地，距哲卜尊丹巴所居仅一日程。哲卜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媳及喇嘛班弟（青年服役喇嘛。——兹拉特金）等共三百余人夜遁。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窜，昼夜不绝。土谢图汗不知存亡。"[1]

270

指派去参加喀尔喀车臣汗诺尔卜葬礼的清政府的使者，于1688年春天和夏初给北京捎来了有关喀尔喀事件的补充消息。这些使者报告说："抵车臣汗所，探之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领兵四百前来哨探，土谢图汗子噶尔旦台吉击杀之。是以噶尔丹领兵前来，败额尔济根卫征哈滩巴图尔之军，焚厄尔德尼沼，取土谢图汗之居。土谢图汗奔赴翁音，哲卜尊丹巴……遁至车臣汗旗下额古穆尔地方。本欲募兵往援，因车臣汗部众亦各奔窜，恐为厄鲁特追及，舍克鲁伦河而南，向我苏尼特喀伦而来。"[2]报告结尾表示担忧，怕席卷全喀尔喀的骚乱会波及内蒙古地区。

北京政府讨论了形势之后，决定暂时不放喀尔喀难民入内蒙古地区，之所以这样做，正如议政王大臣向玄烨呈报的那样：他们是"窘迫来奔……姑俟一月以内，……再行确议"[3]。玄烨同意这一建议，并批准这样做。

这时，北京又收到噶尔丹的一封信。信中说："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违达赖喇嘛之教，不尊礼西勒图，我告之以礼法，归好为是，而彼反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93－195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97－198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99页。

以为非，竟兴兵而来。我于此仗达赖喇嘛之灵，来毁其居，彼两人者，不为众所许，殆无所往，即往亦不纳也。”[1] 噶尔丹的使者们口头转达了噶尔丹的请求：“倘哲卜尊丹巴往投皇上，或拒而不纳，或擒之畀我。”[2] 271

议政王大臣们按玄烨的提议讨论了噶尔丹的要求，都主张即或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进入中国境内，也不能交给噶尔丹。皇帝同意了。根据皇帝的指示，把噶尔丹的一些信件的抄本和北京政府的答复一并发送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备查。

满有理由认为，清人对噶尔丹及其国家的政策到这时已经完全确定下来，观望和不干预的时期结束了。噶尔丹对喀尔喀各领主的胜利使清帝国感到卫拉特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和喇嘛教的最高主教有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这是清帝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清政府把反对噶尔丹并彻底消灭他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于是，清政府开始动员满、蒙、汉各族军队，集中到喀尔喀河地区，并着手储备粮食，准备运输工具。

至于噶尔丹，他占领了喀尔喀的领土之后，竭力吸引喀尔喀各领主倒向自己这边，孤立他心目中的主要敌人——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然后再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北蒙古国。

满族大臣津进的报告粗略地说明了噶尔丹企图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他报告说，车臣汗的一位宰桑的儿子阿拉卜滩曾到他处，说他们原在克鲁伦河南岸游牧，但是“六月初八日，厄鲁特前军数百人猝至……后见噶尔丹亲率兵一支过河下流而去，遣人来召我父至彼军中，且给以印文……我父不得已挺身前往，追至第四日，地名对诺克及之。召入谓之曰：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吾仇也，故追彼至此，与汝等无涉，惧扰汝者，故给汝印文，令汝安居。……汝等及其余喀尔喀皆应属于我矣。汝等其降我，能降者来秋遣使……因给以人畜而归”。[3] 272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02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03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18 - 219 页。

他的印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噶尔丹秉教博硕克图汗檄受车臣汗大小众台吉：前者我两家通使不绝，缘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事，兴兵来追此二人，以致身涉汝地。今思图后好，特召达颜寨桑示之以意，并发此檄。汝等若以吾言为是，当照此檄而行。"[1]

273 可是争夺喀尔喀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土谢图汗聚集兵力准备跟噶尔丹决战。1688 年 8 月，他致函玄烨说："臣自昔诚心职贡，以为或遇劲敌至于危急，希及救援。今噶尔丹兴兵攻我，事势危急，我兵虽少，且与噶尔丹一战决之。恐不能御，伏乞天朝发兵救援。"[2]

玄烨让议政王大臣集议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请求。他们作出了有特殊意义的回答："土谢图汗虽为厄鲁特所欺，请救本朝，似不便遣兵相助。向使土谢图汗早如四十九旗归于本朝，噶尔丹必不敢侵犯，即使侵犯，本朝必不忍坐视。"[3]

玄烨同意了这一建议并给土谢图汗发了有关复函。

可见，清政府这次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喀尔喀领主像内蒙古领主一样，放弃政治上的独立，并且不仅在实际上，而且是正式成为清帝国的臣民，在这种条件下就可以在军事上援助他们反击噶尔丹。历史的客观进程使喀尔喀封建主得出结论：不可能再继续保持政治独立了。问题在于把喀尔喀的命运交到谁的手里：交付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及跟随他的卫拉特封建主，或者交付清朝及跟随它的满、汉封建
274 主集团。以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喀尔喀领主们否决了第一个方案，他们宁愿把喀尔喀交给清朝。

1688 年 8 月，噶尔丹和土谢图汗的军队进行了决战。北京得到的一份报告说："土谢图汗与噶尔丹于八月初三、四等日[4]相遇于鄂罗会诺尔之地，鏖战三日，厄鲁特兵夜袭善巴额尔克带青之营，破之，喀尔喀属下诸台吉星散。土谢图汗独身力弱，越翰海奔至哲卜尊丹巴所。"[5]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20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21 - 222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23 页。

[4]兹拉特金引文中为初一、初四等日。——译者

[5]《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31 - 232 页。

得此报告后，北京加紧了军队的动员工作。

1688 年 9 月是喀尔喀独立的最后 1 个月。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土谢图汗所称的“支持我方的”其他领主，单个地或集体地向北京请求完全入帝国国籍，赐给他们游牧的地方，给予他们武装保护等等。

玄烨再次征求了议政王大臣们的意见。这次大臣们支持喀尔喀领主们的要求。玄烨便批准了这个意见。喀尔喀正式地，而且在事实上成了清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同时意味着喀尔喀与卫拉特的战争结束了。如果噶尔丹决定现在要继续为实现他的纲领而斗争，那么他的对手就不是弱小而分散的喀尔喀领主，而是实力雄厚的清帝国。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的战争就势必变成准噶尔汗国反对清帝国的战争。但是噶尔丹是倔强的，不想停止斗争。于是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战争就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4.2　1690—1697 年的战争及其结局

275

清廷在喀尔喀的汗和王公们承认自己是清帝国的臣民的情况下，立即进攻准噶尔，对清帝国已无多大好处。更符合清廷利益的做法是使噶尔丹跟他的喀尔喀敌人和解，从而使喀尔喀摆脱卫拉特军队的占领。说服噶尔丹罢战撤兵远返西部的准噶尔汗国境内，清政府就有可能着手“驯化”喀尔喀，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使它的人力和物力服务于满、汉封建主，并逐步着手准备征服准噶尔本土，准备这场必然艰巨而所费不赀的斗争。因此，当时清廷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噶尔丹与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和解。

1688 年 8 月，北京得到噶尔丹同达赖喇嘛的使者齐齐克达赖霍木布进行会谈的报告，这位使者是为了进行调解，在鄂罗会诺尔战役前不久，来到噶尔丹这里的。在这次谈判中噶尔丹曾反问：“我若与土谢图

汗和，则吾弟多尔济扎卜之命，其谁偿之？我尽力征讨五六年[1]，必灭喀尔喀。”[2]

同年（1688）秋天，北京向噶尔丹派出一个以拜里和阿齐图两位大臣为首的使团，给噶尔丹带去了玄烨的手谕和礼品。返回北京后，使者们报告说：“噶尔丹遇之殊为恭顺，以入边贸易事，托阿齐图等奏言……限贸易人毋过二百名，我兄弟台吉等不知其故，以为出自我意，不容彼贸易，皆与我不和。”[3]

276 我们不了解玄烨给噶尔丹的手谕的内容，但在噶尔丹的回信中他再次提到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破坏达赖喇嘛教规，进攻卫拉特，“横行如此，实系恣肆无道之人也。彼既悖道蔑法而行，则我之理直矣”[4]。

碰上噶尔丹这种毫不让步的表现，玄烨又找自己的诸议政王商议。这次他们建议不必着忙，延缓一个月再作决定。

1688 年末，噶尔丹又与清廷大臣阿南达和商南多尔济喇嘛会晤，并向他们表示，喀尔喀居民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唯有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除外，因为他们两人破坏宗喀巴之教和玄烨的旨令，杀害了喀尔喀领主和他的弟弟，抢劫了他们的财产，而后则公开对他宣战。他们“坏教构难，诚无地可容之人也。今若灭此，想中华皇帝与达赖喇嘛之心亦得安矣”。了解到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在中国境内之后，噶尔丹说：“他们无论去何处都休想逃出吾手。”[5]阿南达和商南多尔济报告说，后来噶尔丹再次提出贸易问题，“曰：厄鲁特从来进贡贸易各自分行，今概不得往来，我国之人，殊为忧苦。”[6]

玄烨把使者的这个报告交诸议政王讨论。他们在决议中指出，皇

---

[1]兹拉特金引文中为“即或再征讨六年”。——译者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26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49－250 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50－251 页。

[5]此段引文有误。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5 原文为：“噶尔丹又问哲卜尊丹巴所居何地？臣等答以在边汛之外，及众喀尔喀亦填居边上。噶尔丹言：不放彼入边，彼将何往！”——译者

[6]《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59－262 页。

帝虽然对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必须承认，噶尔丹对土谢图汗的每条指责实属有理，而且义正词严。所以议政王们建议："应遣人敕于达赖喇嘛，命遣一有名大喇嘛，同本朝所遣大臣前往，召 277
集噶尔丹、土谢图汗等，令土谢图汗等自陈其过……如皆允服愿行，则约期于来年会阅。"[1]。玄烨赞许这些建议，但是，即刻得到通知的土谢图汗却拒不接受。

1689年元月，北京致函达赖喇嘛，而同年4月致函噶尔丹，内容几乎毫无差别。玄烨再次叙述了喀尔喀领主间冲突的全部历史，这一冲突后来演变成土谢图汗和噶尔丹之间的冲突，同时他还提到了他和达赖喇嘛共同采取过的力求使敌对双方和解的尝试。他给噶尔丹的信中写道：但是"喀尔喀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自作弗靖，违旨兴戎，又先发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又杀尔弟多尔济扎卜，是自取灭亡耳。尔因彼先举，遂兴兵破喀尔喀，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朕亦不深责尔……今喀尔喀为尔所败，其汗、济农、诺颜、台吉等率举国之人，前来归朕，朕……故受而安插……而严责其兴戎之罪……"玄烨最后写道："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交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特遣使前来。"[2] 278

这位皇帝指示其使臣，在同噶尔丹的亲信吉尔噶郎宰桑谈话时应强硬地暗示，"噶尔丹倘不奉诏，则绝尔等每年进贡贸易之路，厄鲁特人众必大失利矣"[3]。

可见，玄烨一面承认过去流血事件的过错在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同时又企图通过"严词"训斥他们两人，推说他已使肇事者受到了惩罚从而安抚噶尔丹。皇帝希望说服噶尔丹接受这样一点：对战争肇端者罚以口头训斥就可以了事，这种申斥就算补偿了卫拉特封建主所受的损失。玄烨希望噶尔丹忘却自己的纲领，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为争夺喀尔喀而战，并希望他能对清人只口头训斥他的敌人的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62－263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82－291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81页。

做法，表示满意，因为他的这些敌人已投靠清朝。

对卫拉特封建主来说，意义极为重大的贸易问题，在玄烨的信中甚至连提都没提，只是在跟卫拉特国家的一位次要活动家谈话时，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暗示方式顺便提了一下。

显然，噶尔丹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样的和平。

阿喇尼[1]及其同事回到北京后便向玄烨呈交了一个与噶尔丹谈判情况的报告。他们于1689年8月7日到达噶尔丹处，噶尔丹在8月14日的会谈中表示，他准备接受清人的庇护，“但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等，首作祸乱，无故起兵”。阿喇尼回答说：“至尔屡次章奏，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始降敕书，谕止战争，仍归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2]8月22日，阿喇尼得到噶尔丹给北京的回函。准备归来时，北京的使者告知噶尔丹的大臣丹济喇和格罍古英，达赖喇嘛和玄烨的使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人为了进行调解也很快就要来这里，并诘问：你们“亦此语复之，抑或有他语乎？”[3]

279

不久，达赖喇嘛的代表善巴陵堪卜到达北京，他代表第巴转达：“但擒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全之。”[4]

玄烨不打算跟达赖喇嘛闹翻，清廷需要喇嘛教，即或不能作为它的意志的执行者，至少也可作为同盟者。因此皇帝弄清第巴——教阶制度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支持噶尔丹的立场后，立即下令派遣外交代表团去达赖喇嘛处，任务在于使喇嘛教首领认识这种立场是错误的，认识玄烨的公正态度，似乎他对喀尔喀和卫拉特怀有同样的好感。玄烨给达赖喇嘛写道：“朕遣尚书阿喇尼使于噶尔丹，据其所奏，言噶尔丹败于策旺拉卜滩[5]，下人散亡略尽。”[6]这本满洲史料在这里第一次提到

---

[1]阿喇尼亦作阿尔尼，为理藩院尚书，清朝文献多写作阿喇尼。——译者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09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10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13页。

[5]即策妄阿喇布坦。——译者

[6]《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15－316页。

策妄阿喇布坦的名字。阿喇尼代表团即是1689年8月底离开噶尔丹牙帐的，可见，策妄阿喇布坦进攻噶尔丹的兀鲁思肯定是发生在1689年春天或夏初。

1690年春天，清政府加紧准备对噶尔丹的战争。玄烨下令，如果噶尔丹攻打喀尔喀人，就向他开火。与此同时，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明显地证明它决心全力支持土谢图汗和噶尔丹的其他喀尔喀敌人。特举1690年2月阿南达大臣发给喀尔喀车臣汗的一份玄烨的命令为例。其中通知与噶尔丹进行和平谈判的事项，但却预告说，由于噶尔丹狡不可信，所以喀尔喀的汗和王公们必须协力相机行事。[1] 车臣汗答复北京政府时表示靠皇帝之助，他“何畏于噶尔丹。彼兵果来，我等协力捍御，当分十二扎萨克（即鄂托克。——兹拉特金）之兵一万备之”[2]。 280

当时，噶尔丹顺利结束了1688年的战役，返回科布多河谷地，在那里建立了他的主帐，并从那里开始准备进一步争夺喀尔喀的斗争。看来，噶尔丹认清了公开保护其敌人的清政府的政策的真实含义和可能后果，便竭尽全力希望与俄国达成军事联盟。噶尔丹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利用这些年使俄国与清帝国相互关系日趋复杂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利用俄国与土谢图汗之间的这类矛盾冲突，在1689、1690以及后来几年中，不断追求与俄国当局达成协同作战的协议，反对“共同敌人”，即土谢图汗及支持他的人。1690年元月，噶尔丹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携带信件到达伊尔库茨克，会见了基斯梁斯基将军和柯罗文特使。达尔罕在与后者会谈中说，噶尔丹驻扎于色楞格河上游的科布多地区，准备继续打仗。他把自己的家留在喀尔喀与准噶尔的边境上，要求俄国军队开往克鲁伦河跟他的军队联合。这件事在给柯罗文的信中也谈到了。考虑到不久前土谢图汗攻打色楞格斯克和乌金斯克的战役以及清军对阿尔巴津[3]的进攻，柯罗文决定不拒绝噶尔丹的建议以备万 281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28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29页。

[3]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译者

一。他在信中答应俄国军队将以相应的行动支持卫拉特军队进攻土谢图汗。柯罗文在达尔罕回去时,派了哥萨克人基比列夫去噶尔丹处,委托他转交这位准噶尔汗一封书信,并就共同对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可能采取的行动继续谈判。[1]

基比列夫回国后呈交的分项文件所记载的有关准噶尔与喀尔喀的情况,有关他目睹的清军与噶尔丹的军队第一次大战的情况,都很值得玩味。他说到,1690 年 3 月底他随同达尔罕宰桑到达伊犁河,在那里遇见伊尔金宰桑,噶尔丹委托此人管理归顺他的喀尔喀王公集团的事务。基比列夫从这里通过喀尔喀草原走了 6 周到达克鲁伦河,在这片草原上他看到了毁灭性战争与人民群众苦难深重的无数活生生的证据。在克鲁伦河地区,他和一支卫拉特士兵的队伍同行,这些士兵(400 名士兵携同妻子儿女)护送达赖喇嘛和玄烨的使者——济隆呼图克图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去噶尔丹那里。5 月中旬这支队伍遭到 800 名喀尔喀士兵的袭击,发生了战斗,结果进攻者溃逃,约 150 人被打死。

后来,使者们途经克鲁伦河与乌尔扎河到达呼伦湖,由此沿乌尔顺河和喀尔喀河前行。7 月 20 日,他们到达噶尔丹的牙帐,噶尔丹当天便当着济隆呼图克图的面接待了基比列夫并接收了柯罗文的信。7 月 22 日,清军进攻噶尔丹的军营,据俘虏们供称,清军总数达两万人。基比列夫写道,“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噶尔丹带上俄国使者“去观战作证”。他对使者说,打仗不是反对清朝皇帝,
282 而是反对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鄂罗会淖尔战役之后,噶尔丹追击敌人约 6 周,到尚达海河才追上,这已经是在中国境内。在这里与拥有数百门大炮和无数小型枪炮的 10 万清军进行了战斗。战后,这支清军带着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于夜间撤下几门大炮撤走了。噶尔丹没有追赶他们,“因为他现在不跟中国皇帝打交道,将来会有对付他的时候”。噶尔丹从尚达海河折回,归途中,玄烨派来议和的伊拉古克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121 号档,第 685 卷,第 202 号,第 7 - 38 张。

三到达克鲁伦河噶尔丹驻地。噶尔丹提出的主要和解条件是惩办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交他处理或在有噶尔丹代表出席的条件下在北京处决，或者把他们送交达赖喇嘛。此外，噶尔丹要求玄烨把女儿嫁给他。

基比列夫于1691年2月初返回伊尔库茨克，他带来的资料就是这些。[1]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噶尔丹预见到将来在某一遥远的时期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直接对清帝国的武装斗争。而且他认为，在没有除掉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前，他在喀尔喀的胜利不能认为是彻底的胜利。他认为这些年里自己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跟俄国缔结共同作战的协定来反对土谢图汗和清朝皇帝。在他看来，他们是他和俄国政府共同的敌人。为此，他准备向俄国作出任何让步，甚至领土方面的让步。[2]

俄、卫之间有关军事联盟的谈判使北京政府惊慌失措。玄烨指使大臣索额图破坏这些谈判，在指示中说："尔曾至泥卜潮（即涅尔琴斯克。——兹拉特金）[3]，俄罗斯人识汝，汝可谕其使人，言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国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4] 283

不过清政府受到的是一场虚惊。俄国当局很快就放弃了可能利用噶尔丹为俄国政策谋利的想法。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没有足以支持噶尔丹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干涉蒙古和清帝国的事务。

拉萨喇嘛教领导人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1690年和往后一些年中，它具有明显左袒卫拉特和亲噶尔丹的倾向，不过这种倾向用一种对清帝国和玄烨本人忠顺的表面现象伪装着。为了执行皇帝的建议，达赖喇嘛派遣济隆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代表去见噶尔丹，他应在途中与玄烨的代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会晤，然后两人同去噶尔丹处，说服他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第685卷，第202号，第10－21张。

[2]参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尼布楚衙门办公厅卷宗，第215卷，第71张。

[3]泥卜潮即尼布楚的音译。——译者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44－345页。

同意中国皇帝提出的议和条件。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向北京报告说,1689 年 9 月,他和他的同伴们离开肃州。11 月初,他们到达通钦湖,先派出一名随从人员去查明噶尔丹的驻地。11 月下半月初,当此人到达噶尔丹处"并告以故",噶尔丹曰:"我军已启行,且旷野不能会也,其约见于他米尔地方。"[1]得知这一情况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遂轻装疾驰。十二月初五日至
284 他米尔之北齐劳图河,噶尔丹不至。遣人至额德尔河侦探之,河之两岸俱有噶尔丹兵马行踪,臣与济隆呼图克图尾之前往"[2]。

从这个文件可见,1689 年末噶尔丹率全军撤离了驻扎约一年的科布多河谷地那个营地,而开始了新的进军。也查明了他的路线:科布多地区——他米尔河——额德尔河往下,大概经由鄂尔浑河与土拉河到克鲁伦河,再由此到呼伦湖和贝尔湖,这两个湖的后面已经展现出可能作战的战场。达赖喇嘛和玄烨的使者就沿着这条路线跟着不急于进行和谈的噶尔丹的行踪前进。1690 年 5 月,柯罗文的代表基比列夫在克鲁伦河地区加入了这些使者的行列。1690 年 6 月,他就同他们一起到达噶尔丹处。过了两天,基比列夫目睹了噶尔丹的军队与清军的第一场大战。

完成了作战准备之后,清军司令部为避免噶尔丹了解到清军的兵力雄厚而撤退,决定强迫敌人艰险地通过戈壁沙漠,使之必然出现交通线拉长、军队供应间断的现象而无法后退。于是北京向噶尔丹派出了使者,任务是使噶尔丹不致想到撤退。为此,指示使者:"对他谈话必须态度温和,用顺水推舟的话迎合他,务必使他没有任何逃跑的念头。"完成任务并确信噶尔丹不打算放弃他所占领的地盘之后,外交代表团应当分头工作,一个使者应尽快地去清军司令部"秘密通知司令部遣使前往牵制噶尔丹逃跑"。但是,如果使者们未能说服噶尔丹,如
285 果他开始撤退,那么他们应当向司令部转发一项命令:"全军进攻噶尔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322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323 页。

丹，如果他要逃窜，……应跟踪追击，彻底消灭。”[1]

可见，到1690年夏季，清政府已坚信必须消灭噶尔丹的势力。那么清政府到底为什么要打仗呢？如果相信官方文件和外交谈判，可以认为玄烨和噶尔丹之间分歧的主要之点（如果不是唯一的一点）就是关于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应受什么惩罚的问题，至于他们的过错，不仅噶尔丹，就是玄烨也认为证据确凿。前者认为必须将他们处死或至少是可靠地根除后患，而后者却建议只作口头训斥。清帝和准噶尔汗之间似乎并没有其他争议问题，即或有，双方也都只字未提。

当然，实际上问题根本不在土谢图汗和库伦的呼图克图这些人身上。这些活动家的个人安全对玄烨来说，正如立即处死他们对噶尔丹来说一样，并没有多大的切身利害关系。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援引玄烨本人的话来证实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从这些话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皇帝发动这场战争并要进行到最后胜利，绝不是为了喀尔喀及其王公们的利益。至于噶尔丹以及背后支持他的力量，力图实现的目的，我们已经提到过，并且后面还要提及。

与北京当局的担心相反，噶尔丹根本不打算撤退。相反，他满怀决心要把建立一个统一的喀尔喀—卫拉特独立国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迈出的第一步应当是消灭投靠清朝的他的主要敌人——土谢图汗和库伦的呼图克图，或者使他们无能为害。

指挥清军的阿喇尼在自己的作战报告中记载了与卫拉特军队在黄鼠日（7月21日）所进行的一次战役。阿喇尼获悉卫拉特军队两万人到达乌尔会河的情报后，立即开始进军。7月21日黎明，他望见卫拉特军营，即令“所选蒙古勇士二百余攻之，令喀尔喀兵五百，驱其所掠。286
未及战，诸部落（即内蒙古领地。——兹拉特金）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遂退。厄鲁特分两翼，阵而立，我军次队继进，厄鲁特发鸟枪，军退，前队兵及喀尔喀兵复进。喀尔喀畏其鸟枪，先却，诸部落兵力薄，亦退。厄鲁特增兵，从山上绕出我左右，我军不能进，遂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373－374页。

敛兵归”[1]。

基比列夫只说明噶尔丹“打败了”进攻他的“中国军队”，而阿喇尼却叙述了噶尔丹通过什么方式做到了这一点。1691 年 3 月，噶尔丹的使者们在伊尔库茨克跟基斯梁斯基将军的交谈中叙述到这次战役的另一些详细情况。“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2]

287

乌尔会河得胜之后过了几天，噶尔丹开始撤回。满洲和俄国的文件都提到了他的撤退。我们无法确切说明这次撤军的直接原因。噶尔丹的使者们在伊尔库茨克曾说，他们的汗在交战后第二天便从乌尔会河的阵地撤退，到草原上去寻找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可是这些使者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噶尔丹撤离长城是因为济隆呼图克图转交噶尔丹一封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劝告停止流血事件，并保证清朝政府将来会把他的“敌人”交给他。“博硕克图汗信赖达赖喇嘛的使者济隆呼图克图的话而停了战，并从长城撤往草原。”[3]

当然，噶尔丹并未打算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他本应积极搜捕自己的“敌人”，不应修建设防阵地而坐等清帝国的重兵压境。可是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来到长城脚下取得胜利后过了一天，却从这里撤回了克鲁伦河呢？我们没有什么资料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管迫使噶尔丹撤退的原因是什么，总之，这使北京极其惊慌。北京方面明白，噶尔丹会逃出他们可能追及的范围。北京方面对此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牵制噶尔丹。为此目的，清军司令部决定再派使者去噶尔丹处，建议他稍候亲王的来临，似乎亲王是专被指派来跟他进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380－381 页。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121 号档，1691 年，第 258 号档，第 215 卷，第 43 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121 号档，1691 年，第 258 号档，第 215 卷，第 46 张。

行和谈以及来全权签订和约的。如果噶尔丹不愿等候亲王而撤军，则必须组织追击并消灭他。[1]

1690年7月，噶尔丹遣使北京，解释他越过了中国边境卡伦线是为了追击自己的敌人，但他的军队没有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妄行”。玄烨在复函中再次强调左侧喀尔喀人，即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的欺诳，他们“对尔（指噶尔丹。——兹拉特金）兴兵妄动，朕弗之直也”。玄烨写道，他建议当年召开喀尔喀王公大会，彻底搞清所发生的纷争，确定是非，重建扎萨克图汗的领地等等。“岂有正事尚未议定，即可言执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以畀汝乎。”最后玄烨通知噶尔丹说，他从西宁获悉并已向达赖喇嘛上告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发生冲突。“夫兴戎，非美事也。朕且将与达赖喇嘛共议调和。”[2] 288

玄烨力图说服噶尔丹停止撤退，留在大戈壁南侧某处等候交出他的主要敌人。这样就可以使帝国的武装力量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迅速给噶尔丹以毁灭性打击。至于策妄阿喇布坦，据我们这部史料记载，还在1690年元月，北京就遣使去过他和他母亲阿努哈屯那里，并带去玄烨手谕，其中要他们“详尽申诉”他们与噶尔丹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清政府打算利用策妄阿喇布坦来反对噶尔丹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7月中旬，济隆和伊拉古克三两位呼图克图派使者到清廷大臣阿密达处，通知了噶尔丹发表的声明：他自入中国，秋毫无犯，然而据他获悉，进攻他的“军队云集。又闻有内大臣且至，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亦在军中，……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3] 这样的声明可以看做是一个警告——不要迫使噶尔丹必须把清朝也当做自己的敌人。过了不久，噶尔丹和济隆呼图克图又派来了使者，他们代表自己的统治者声明，玄烨“君南方，我长北方[4]，并表示噶尔丹正等着玄烨的代表来进行和谈。噶尔丹仍然企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清帝国的执政者讲 289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1691年，第258号档，第215卷，第32张；也可参看《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18－419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25－428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42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46页。

话。他还在期望曾答应过他的和谈的圆满结局。

玄烨又回派了一些代表到噶尔丹处，他们将礼品面交噶尔丹，并使他确信皇帝的弟弟很快就会来到，他似乎是受委托来最后议和的。7月下半月，这类外交代表团不断从一方来到另一方，力求造成一种真在准备和谈的表面现象。而实际上遣使只有一个目的——把噶尔丹牵制在原地并掩盖准备好的、最终要毁灭他的袭击。玄烨希望亲自指挥面临的战役而于7月中旬离开京都，前往军次。这表明在他心目中与噶尔丹之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7月底，济隆呼图克图的又一名代表来到清军司令部，使者表达了济隆呼图克图的不满，因为他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不遗余力地企图说服噶尔丹和平解决矛盾冲突，眼看就要成功时，阿喇尼大臣却发动了对噶尔丹军营的突然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达赖喇嘛托付给他的调解使命能取得成效。[1]

290 指挥清军的这位大臣在报告这个外交代表团的情况时则写道："臣等钦遵谕旨，以遣使羁縻为务，仍令前使持书往答。"[2]在这封信里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一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

1690年8月1日就在乌兰布通进行了决定这次战争结局的决战。我们用清军总指挥的话来说明一下这次战役的情况。他写道："七月二十九，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

---

[1]可能这里指的是1690年3月噶尔丹的使者在伊尔库茨克向基斯梁斯基谈到的那次战役。据他们说，乌尔会战斗之后第二天，噶尔丹便撤离军营到草原上去找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了。大约过了5个星期(即7月最后几天)，噶尔丹在尚杜海河上碰到了玄烨的叔叔和儿子为首的又一支新军队。俘虏供称，这支军队总数约15万人。噶尔丹遭到了突然袭击，因为他对济隆呼图克图的话信以为真，这位呼图克图劝他相信清人愿意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因此他在草原行军中没有设置必要的防御措施。噶尔丹不打算与中国作战，他忙于寻找土谢图汗和库伦的呼图克图。中国人包围了噶尔丹的军营，但他们被击退了。参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第258卷宗，第215卷，第46－48张。有关这次战役的其他资料，我们在任何一部史料中都没有找到。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60－461页。

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1] 291

由这段描述可见，清军虽拥有大量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炮兵，仍不能彻底击溃既没有炮兵，而且数量上比敌人少两三倍的卫拉特军队。在力量对比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卫拉特军队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刚毅顽强的精神和具有组织反抗的能力。

收到呈文后，玄烨命令总指挥“速进兵追剿”。此外，他要求：“此后当何以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清，勿留余孽，其详议以闻。”[2]这个命令非常清楚地揭示了清政府进行战争的真实目的。“穷其根株”（即根绝阻碍扩张政策的力量）——这就是清廷用意所在。关于土谢图汗及库伦呼图克图的个人命运，这一指示在所提到的战争纲要中并不占任何地位。噶尔丹打算夺取喀尔喀，将其并入准噶尔之后组成独立国，这就威胁了满洲封建主的切身利益。因此噶尔丹及其“同党”应该消灭。能否牢固占有喀尔喀取决于能否击溃噶尔丹。

第二天战斗还在继续。总指挥向北京报告说：“此日即前进剿杀余寇，见噶尔丹所据险恶，坚壁抗拒，故使我将士暂息，而噶尔丹适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复理前说，请以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畀之，且云 292
一二日内，济隆呼图克图即来讲礼修好。……初四日，济隆果率其弟子七十余人来。”[3]

可见，清军历4天之久仍未能粉碎卫拉特军队的反抗。但是后者的处境极端困难，济隆呼图克图的干预除了企图挽救噶尔丹免遭击溃之外，不能有别的看法。他说，玄烨“乃一统宇宙之主，博硕克图汗不过小部头目，何敢妄行，但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致有此误。彼今亦无索土谢图汗之意，但祈……以哲卜尊丹巴遣送其师达赖喇嘛。……故使回就水草之地相候”。总指挥说，他准备不管怎么都要进攻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65－466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69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70－471页。

噶尔丹的军营，济隆呼图克图听后说，他将“力说噶尔丹勿索哲卜尊丹巴而出边外”。

总指挥间济隆呼图克图能否担保他往来期间噶尔丹不远逃，不抢劫中国边境居民。济隆对此回答说，只要我方“休征罢战，彼焉敢行劫，断不远去，必待我也”[1]。

293 当总指挥告知呼图克图说，清军各路兵正分头进军，如果不了解济隆呼图克图和清军司令部谈判情况，必将去进攻噶尔丹，“济隆惶迫曰：如此，事败矣。将奈何？”总指挥为了安慰呼图克图，他表示可以给那些部队的指挥员增发印文一道，“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即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济隆呼图克图对这一表示感到非常高兴，收到印文，他便返回噶尔丹兵营。

总指挥在结束自己的报告时写道，尽管对噶尔丹不可信赖，“但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臣等欲即进剿，则厄鲁特据险坚拒”，所以他认为他作出的决定是唯一可行的。但是当奉天的、科尔沁的和其他正在途中的军队一到，“齐行夹击，灭此狡寇，如有可除之机，断不误也”[2]。

我们所引的这个报告证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到失败，这迫使他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也证明达赖喇嘛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对于拯救噶尔丹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并尽了最大努力使他和他的残余兵力免遭极其惨重的打击。

总指挥的行动在清帝国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愤怒的反应。玄烨的议政王们指责总指挥，怪他放过了如此有利的机会，并建议组织追击噶尔丹。皇帝赞同议政王们的意见。他也认为总指挥做得不对，认为此役
294 “所关甚巨”，罪犯理当惩罚等等。

噶尔丹未等开始新进攻便从乌兰布通地区向北撤退。总指挥报告说：“噶尔丹迫于追袭，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渡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72－474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74－477页。

脑儿。臣等欲追,而马力不能前进,又恐噶尔丹去远,因与济隆呼图克图约,使噶尔丹近我而止,以定礼好"[1],待援军一到,再追击噶尔丹。

但是噶尔丹需要喘息机会,便捎来一封倍,信中写道:"达赖喇嘛明鉴,遣济隆额尔德尼来,责以礼法,今倘蒙皇帝惠好,则自此不敢犯喀尔喀。谨以信文为验。"[2]

8月11日,清军总指挥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去噶尔丹处。4天后他返回时,又捎来一封信。噶尔丹承认自己的过错是侵入了中国境内。"又伊拉古克三云:噶尔丹顶佛像设誓曰:我自恃理直,追索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而深入边讯,置佛天于前,而不以己之罪为罪可乎。……乞鉴宥我罪?凡有谕旨谨遵行之。今往界上,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候旨。"[3] 295

在答复这位"认罪者"时,玄烨再次强调清政府无私的立场,似乎除了让大家过和平幸福的日子外别无所求。他给噶尔丹信中写道:"今尔以誓书来请罪求和,……尔今率尔兵出塞而居,不得擅犯我属下部落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尔倘有窘迫,奏闻于朕,朕必如前抚养,断不念尔旧愆。"[4]

这样,噶尔丹第一次进军东方以惨败告终。噶尔丹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期望在他的同盟者——扎萨克图汗和其他喀尔喀王公的部队支持下,不仅击溃喀尔喀的敌人,而且保卫住在反对清帝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他的军队进入内蒙古境内是冒险的,或者说是错误的。无论是把这看做噶尔丹的主要"罪过"的达赖喇嘛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还是衷心忏悔所犯"罪孽"的准噶尔汗本人都是承认这点的。我们不了解他进入帝国领土所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错,1690年9月,噶尔丹曾发了两封信给玄烨,主要是谈在中国的贸易问题,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嗣以远来,粮畜匮乏,妄行(指进入中国境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83-484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85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90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495-496页。

296 内。——兹拉特金)获戾。"[1]可能确实是这种情况促使他在内蒙古草原冒险行军。我们知道,喀尔喀惨遭破坏,已是一片废墟,无论如何绝不能作他的军队的供应基地。不过也可能是由于他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得到内蒙古汗和王公们的同情。后面我们将看到,以后他也还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当时,噶尔丹的主要王牌就是借口达赖喇嘛的支持,我们后面会看到,达赖喇嘛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实际上就不单是一个使者,而且还是噶尔丹的积极助手。还在1690年玄烨就已了解到这一点,而拒绝接见济隆呼图克图,拒绝与他谈话,指责他同情噶尔丹。[2] 这位皇帝绝不是偶然地断然要求噶尔丹不以任何形式与臣服清朝的王公们进行联系。

噶尔丹战败后在艰难情况下开始向科布多地区撤退。卫拉特普通士兵和他们的家庭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在俄国史料中发现有这方面的某些记载。例如,1691年7月来到色楞格斯克的3个卫拉特人说:"他们是卡尔梅克领主博硕克图汗的士兵,当博硕克图汗由于马匹缺乏和饥饿,为避开与中国人打仗而于白月(即2月。——兹拉特金)撤到蒙古领土汗乌拉附近时,他们脱离了博硕克图汗,因为他的军队里由于牲畜缺乏饥荒严重,人员大批死亡。"[3]从这些难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噶尔丹和他的军队1691年2月才到达汗乌拉(现乌兰巴托地区的一座山)。噶尔丹力争允许在中国贸易的坚定态度也说明了卫拉特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他在致玄烨的一封信件中写道:"自喀尔喀变乱以来(即1688年以来。——兹拉特金),贸易不行,吁请恩赐白金,以育众庶。"[4]

噶尔丹处境艰难的消息也传到了北京。玄烨决定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此加以利用。他写信给噶尔丹:"汝厄鲁特牲畜已尽,无以为食,极
297 其穷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继,……今果穷困无食,不能归故土,其移近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18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22页。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第258卷宗,第216卷,第136张。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36页。

边汛，朕当厚加恩赐。如决计入降，益从优抚养。”[1]

清帝国加紧准备继续反对噶尔丹的战争。北京宫廷发出命令，要求改善军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情况，研究西北部可能的行军路线，黄河的航行条件等等。同时进行着多伦淖尔大会的最后一些准备工作，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正式宣布喀尔喀成为清帝国的组成部分。

1691 年 5 月 1 日在这个大会上举行了宽恕土谢图汗的仪式，赦免他引起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而应受的惩罚：土谢图汗出面请罪，喀尔喀王公们请求赦免土谢图汗，最后宣读了玄烨赦免罪犯的诏令。

玄烨决定把最终妥善解决蒙古问题的情况告知达赖喇嘛，给他发去一函，其中顺便表示对济隆和伊拉古克三两位呼图克图的活动的不满，说他两人“不能仰副朕与尔之心，噶尔丹挟济隆、伊拉古克三而行，称兵大举，携其妻子杀掠喀尔喀而来，深入我边汛之内”。同时强调噶尔丹处境极端困难，可能决定去找达赖喇嘛，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斟酌情况自行处理。皇帝警告，如果噶尔丹哪怕胆敢稍稍欺负一下喀尔喀人，就要消灭他。[2]

1691 年末，北京收到了达赖喇嘛的回信，他指责济隆呼图克图没能及时阻止噶尔丹要求交出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事，不过认为济隆呼图克图为使卫拉特人与喀尔喀人和解尽了一切努力。使者口头向玄烨转达，达赖喇嘛始终把奠定和平看做自己的任务，还在战争开始之前，土谢图汗和噶尔丹就都“遣使西海台吉，各请助兵，达赖台吉来告于我，我谓喀尔喀、厄鲁特皆我护法施主，尔等和睦，我则喜悦，不得有所偏助也”[3]。 298

但是达赖喇嘛未能说服皇帝。皇帝坚持认为济隆呼图克图有罪，他不仅没有制止噶尔丹，反倒怂恿了他。玄烨写道：“以前项事情揆之，未必济隆一人之意如此行事也。尔近侍之人，通同贪利而欺蔽汝，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556 – 558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658 – 665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713 – 714 页。

狗庇噶尔丹之所致也。”[1]

1690 和 1691 年的事件使北京确信，噶尔丹并非单独行动，他在达赖喇嘛的亲近人物中间还有一批很有影响的“同党”。但是，噶尔丹的拥护者也要同噶尔丹一起被消灭的严重警告仍被置若罔闻。1692 年夏季，玄烨的亲信伊拉古克三公开转到噶尔丹方面，逃往科布多地区投靠他，噶尔丹是 1691 年夏末率残部来到这里的。

这时噶尔丹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与准噶尔汗国基本领土的联系为策妄阿喇布坦所截断，后者的地位已经稳固并准备用武力阻止叔叔回国。对库库淖尔的卫拉特领地噶尔丹是没什么指望的：库库淖尔领主们甚至在他军事得手的时期也是中立的，而现在，当他屡遭失败之后，更谈不上会给予积极的援助了。喀尔喀一片荒芜，草原空旷无人，居民四处逃散。对俄国给予帮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噶尔丹的政权就局限在科布多地区的范围内。策妄阿喇布坦剥夺了他的领地——每个封建主力量和势力的主要源泉。

299

1691 年春天，从托博尔斯克派了一个非世袭的封建贵族马特维依·尤金去噶尔丹处，他在途中遇到从噶尔丹牙帐来的一位喇嘛。该喇嘛告知说，策妄阿喇布坦带着 4 万人的军队游牧在额尔齐斯河谷地。参加噶尔丹进军东方的士兵也有 4 万人，可是归途中，约有半数死于痘疫。

1691 年末，尤金到达噶尔丹的牙帐，和他交谈过 5 次。噶尔丹对于俄国根据 1689 年尼布楚条约向清政府作出的领土上的让步表示遗憾。[2] 不过沙皇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它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尼布楚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贸易，而噶尔丹及其计划则已经不能使俄国统治集团感兴趣了。

对于噶尔丹的选择存在着两种可能：要么停止斗争并放下武器；要么为了占有喀尔喀恢复攻势行动。他选择了后者。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714－715 页。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196 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 78 张。

1692年秋季，噶尔丹遣使带信去北京。在这封信中，除了把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呼图克图交给他这个原来的要求外，噶尔丹第一次提出了把喀尔喀王公和一般阿拉特遣返回他们的喀尔喀故乡牧区的问题。他装作一点不知道办理喀尔喀正式转入清帝国国籍手续的1691年多伦淖尔大会，同时暗示他认为自己对喀尔喀和喀尔喀人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

噶尔丹曾接受达赖喇嘛帮助的资料也值得注意。我们不了解这个帮助的范围和性质，但是毋庸置疑，没有这个帮助噶尔丹不可能在遭到1690年的失败之后竟如此迅速地恢复了元气。拉萨是他唯一的思想支柱和当时补充其物资的唯一来源。如果没有宗教界的支持，噶尔丹未必能保持住自己的藩属以及那些还拥有属民和一定数量牲畜的领主。没有本人的领地、富足的金库和自己的军队的宗主君，对这些领主没有什么好处；而宗主君本身，处于这种情况，也没有力量迫使藩属俯首听命。因此宗教界的支持，它的宗教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噶尔丹本人的领地和富有的金库。 300

至于噶尔丹与策妄阿喇布坦的冲突，我们可以根据后者给玄烨的一封信来判断它。策妄阿喇布坦写道："我国内自交恶，因柰冲鄂木卜擅权毒杀我弟，与我亦不睦。我国人民交恶离散，职此之故。"[1]我们还可以从噶尔丹的使者1696年7月同清廷大臣西喇的交谈中，得到有关冲突经过的补充资料。那些使者说到，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孙女阿海原来许嫁给策妄阿喇布坦，但把她接来时，噶尔丹却霸占了。1678年住在噶尔丹处的索诺木喇布坦过世。于是策妄阿喇布坦便夺了5000士兵悄悄离开噶尔丹。噶尔丹带了2000士兵赶上了他，盘问引起不协调的原因。策妄阿喇布坦回答说，他们之间不可能和睦，因为噶尔丹强夺了他的未婚妻，整死了他的弟弟。1690年，当噶尔丹去东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51页。策妄阿喇布坦的母亲阿奴哈屯给玄烨写信说："我等奉达赖喇嘛之令分出，博硕克图汗违达赖喇嘛教，多为不义，杀索诺卜喇卜滩，又与策旺喇卜滩及我亦皆反颜，是以各自分散。"见《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552页。

方时，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1]。

301 但是，不管冲突的原因如何，双方的关系终于变得不可调和地敌对起来。应该指出，拉萨采取过促使这两个汗和解的措施，但看来毫无成效。我们知道有两次这样的尝试。一次是从 1693 年 2 月北京收到的一封达赖喇嘛的信中获悉的。其中顺便提到：“但厄鲁特大半附策旺喇卜滩，虽谕以修好，若厄鲁特不从……”[2] 1695 年 4 月，北京收到的达赖喇嘛和第巴的信，谈到了第二次尝试。信中说，为了使敌对双方和解，曾派代表去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处。达赖喇嘛和第巴还请求皇帝保留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的汗号，“且加敕印恩赐”[3]。两位写信人在结尾时请求玄烨把他的戍兵撤出与西藏毗连的中国西北地区，理由是所有领主都忠于清朝，他们谁也不会蓄意谋叛。

上述信件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它们证明拉萨真正关心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的和解，同时也证明前者的力量增强，后者的力量削弱。达赖喇嘛和第巴关于给侄儿和叔叔都授以汗号的建议，有可能是计划把卫拉特国家分成两半：西部让策妄阿喇布坦称汗，东部以噶尔丹为首。可能，双方准备根据这一计划议和。至于拉萨当局建议驻防清军撤出鄂尔多斯和库库淖尔，其意图非常明显——便于所有这些计划实现。但是拉萨的策划破产了，未能使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和解。有关撤
302 军的建议则使玄烨勃然大怒，他认定这个建议是想帮助噶尔丹。他下令复函拉萨，信中直截了当地向西藏世俗执政者第巴宣称，“尔欲我罢戍，非幸噶尔丹得苏，使乘间来扰乎”[4]。

噶尔丹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并展开了备战工作。他对喀尔喀的领土要求，也像要求把土谢图汗及库伦呼图克图交给他一样，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拒绝，回答这些要求的行动是开展空前规模的征兵和储备物资。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627 – 1628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795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882 – 883 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883 – 884 页。

噶尔丹能以什么来与此对峙呢？他在喀尔喀与内蒙古的领主中加紧宣传鼓动，邀请他们转到他这边来。我们不了解他散发给王公们的信件的原文，不过信件的数量看来是相当大的。1692 年冬天，一位内蒙古领主把噶尔丹的使者偷偷交给他的几封信转寄给北京。同年 11 月，北京发函给噶尔丹，专就他的使者递交秘密文件的事说："今尔所遣奉贡使人，持尔书来与朕属下蒙古，告以尔语，皆以奏闻于朕，朕尽知之矣，此等谲诈……何能欺人。且朕属下蒙古，皆世受豢养厚恩，岂能负朕而堕汝计乎。据尔书云，为宗喀巴之法而行，朕……此地所行，皆宗喀巴之法。"[1]敕书的内容证明，噶尔丹首先是作为同教者向王公们发出号召，企图用宗教性质的理由来感动他们。

在继续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北京政府似乎是为了和谈而邀请噶尔丹游牧到靠近边境的地方来。例如，1693 年 2 月 13 日，北京给噶尔丹写信说："尔今疏言……请将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于所奏三言中，以一言为定，逐出七旗归于故土，则皇帝覆育之蒙古再不为非矣。"[2]为了商讨这些问题，北京建议他徙牧近边。 303

北京方面明知噶尔丹不可能长期留在不大的科布多绿洲，他肯定想要扩大自己领地的范围，而由于通往西方的道路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堵，所以对他来说，只可能向东方的土拉河与克鲁伦河伸展。1694 年 3 月，玄烨下令加紧准备进军。命令说："今已暮春，正草盛之时，噶尔丹与策妄阿喇卜滩战，或近至边境，亦未可定。"[3]

北京从数量不断增加的难民方面深深了解到噶尔丹处境困难。难民谈到了噶尔丹那里食物缺乏，他意欲在自己领地上种庄稼等情况。北京依旧不许噶尔丹的使者在帝国境内贸易，尽管他多次提过这一要求。1694 年 5 月，噶尔丹的又一位使者在两千人的陪伴下到了边境，其中一千多人是妇女儿童。这个代表团根本不准进入中国，据主管机关对这一决定的解释，是因为卫拉特人旅游至国内的目的纯属间谍 304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779－780 页 。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808－809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826 页。

性质。

必须指出,噶尔丹的确派过许多间谍打入中国的蒙古和其他地区。我们这部史料多处记载有处决噶尔丹密探的情况。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间谍多半是喇嘛。例如,1695 年揭露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 8 名徒弟所领导的总数为 200 多人的一整套间谍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员不但是奸细,“且煽惑蒙古之心”。[1]

1694 年玄烨给噶尔丹的信的总内容,归结起来不外乎认为后者在乌兰布通战役中可能被完全消灭,但据说是怜悯了他。噶尔丹要求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唆使喀尔喀人叛乱以及谋求统治他们,这就破坏了他自己的誓约,而且重新提出的这些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过了,不可能再予以审理。现在又陷入了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开代表大会和进行谈判。噶尔丹必须亲自前来参加这些活动,迁徙到边境附近游牧并提供人质——最亲近并最忠于他的丹济拉和丹津俄木布。如执行这些条件,他可以得到 6 万两银子的奖赏,那时也将会研究允许卫拉特人在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

1694 年和 1695 年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1695 年夏天,噶尔丹从科布多地区出发,8 月,他的军队到达克伦鲁河沿岸。这时他仍像以前一样继续试图吸引喀尔喀和内蒙古的领主们。估计到这点,玄烨采取了相应措施,意图诱骗噶尔丹到清军集结地区并加以消灭。[2]

侦察兵报告说,噶尔丹总共只有两万士兵,他不想向喀尔喀境外移动,他的主要基地是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游。确信噶尔丹不打算迎击清军之后,玄烨的统帅部被迫决定去进攻噶尔丹的基地。为此应派遣军队通过戈壁沙漠,在艰难的条件下组织相应的供给、联络等工作。玄烨决定随军进行这次远征。大臣和高级军事首领们预见到这种远征中必不可免的艰难困苦,纷纷劝说皇帝可以信托他们去完成战役,他本人
305 应该留在京城。但皇帝回答说,噶尔丹为人狡诈,不比寻常小寇。前年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974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919 页。

来犯我藩塞,语极凶悖”。尽管当时也派了部队去打他,但是指挥军队的大臣和将军们“遇噶尔丹之兵而辟易”。因此,不得不另派大军去攻打噶尔丹。“是时诸王大臣皆在军中,竟使噶尔丹逸去。……近者噶尔丹……又煽诱诸蒙古,不无顾望而持二心者。倘不早为之剪灭,恐其势渐张。”[1]

可见,噶尔丹被清朝看做是比以前所有叛乱者都更为危险的敌人。他力求把蒙古人住的那块领土从清帝国割去。这会使被清人征服的其他民族群起效尤。因此玄烨没有把如此重要的战役委托给统帅和亲王们,而决定亲自率兵并随军经由戈壁去完成这次艰难的远征。

作战计划规定兵分 3 路行进:东路、中路和西路(出甘肃)。军队装备有各种口径的炮、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行军路上设有驿站和军需食品库,以保证供应。每个士兵戴着盔甲,配有备用的马、急用的粮食和弹药。大部分省份的物资都被动员起来保证部队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不能精确确定这支去攻打噶尔丹的军队的总数,不过有根据认为,包括辅助人员在内,投入战役的总人数约有 40 万。

1696 年 2 月底,东路、中路和西路各部队都从自己的基地出发,行军路线与目标对蒙古人,特别是对喀尔喀人严守秘密,因为他们可能通知噶尔丹,从而使整个战役发生困难。为此,军中严禁架篝火,一昼夜只能吃一顿饭。[2] 306

1696 年 4 月,玄烨统帅部获悉,噶尔丹的军队由两万卫拉特士兵和据说是俄国派来的 6 万辅助军组成。这一消息引起统帅部一片惊慌。许多大臣向玄烨进谏力主停止进军。玄烨把这些大臣邀到自己的帐篷里,对他们反复强调指出了准备这次远征所耗费的巨大精力,这次远征对帝国命运的巨大意义,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们勤勉供职的情况。他警告大臣们:“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3]

玄烨战胜了统帅部本身的反对派之后,坚决指挥部队继续行动,急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042 - 1043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152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216 - 1217 页。

速向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上游推进。噶尔丹的兵营驻扎在以巴颜乌兰为中心的地区。

根据不断观察噶尔丹兵营动静的清廷侦察员所得资料判断,噶尔丹还不知道临到他头上的可怕力量。4 月中旬,玄烨写信给他在北京的儿子说:“我军将展哨前进,侦探声息,以待后营齐集。噶尔丹仍在车克楚(侦察员之一。——兹拉特金)所探之地,实为我师之幸。”[1]在另一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说到,根据侦察兵 4 月 21 日获悉的情报,“噶尔丹在克鲁伦河地方……朕之大营距噶尔丹所在不过五程,噶尔丹似茫无知觉”[2]。

307

但是,生活实际对玄烨的作战计划作了修改。西路总指挥伯费杨古[3] 4 月 21 日呈来一份报告,说他的军队 2 月 29 日从宁夏出发,不能按计划于 4 月 24 日到达土拉河,而只能在 5 月 4 日至 6 日到达。西路军的迟误为噶尔丹敞开了向西撤退的道路,使包围他的计划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为了赢得时间,不让噶尔丹从安排好的包围中溜掉,玄烨于 5 月初遣使给噶尔丹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大军已集中到边境,本准备出动,但停下来了,因为他希望避免战争和流血事件。玄烨谈到召开谈判和平与贸易问题大会的老建议,劝说噶尔丹相信“朕断不以计诱人,尔勿疑畏,尔若疑畏退而避去,则事无了期矣”[4]。

1696 年 5 月 6 日,使者们携带此信和礼品走近卫拉特前哨,哨兵们叫使者回去等候噶尔丹的命令。卫拉特首领们说,他们已经知道皇帝率兵来到,他们请求皇帝暂缓开始进攻,因为噶尔丹驻扎在土拉河南岸,“若即来薄我,我当避去。若必穷追,我亦能拒”[5]。他们建议一名使者返回玄烨处,另一名留下等候噶尔丹的答复。

我们不了解噶尔丹是否回答了玄烨的信,如果回答了,谈了些什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236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243 - 1244 页。

[3]从后文看出,作者将伯费扬古当做人名。按:伯,是费扬古的爵位。费扬古 14 岁时袭其父三等伯,所以有时称伯费扬古。——译者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303 页。

[5]《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327 页。

么。我们只是从清军统帅部所审问的卫拉特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噶尔丹曾登上高山研究清军的部署，然后下令从克鲁伦河沿岸撤退。玄烨怕噶尔丹这次又远逃西部而无法追及，便又遣使说服他留在原地不要走，因为皇帝来这里似乎就只是为了和解。而实际上他下了命令立即追踪撤退的敌人。 308

总数约14000人的伯费扬古的精锐先遣部队，5月3日也迫近土拉河并占领了噶尔丹军队的大小退路。

5月10日，清军占领了噶尔丹牙帐驻地。一切都证明卫拉特军队混乱地仓忙逃窜。俘虏们说到噶尔丹的司令部内开始出现他和他的战友们不和的情况。玄烨给他儿子写道："于初十、十一、十二此三日，前进穷追，其溃窜狼狈之状，总不堪观，妇人稚子悉自杀戮，弃之而去。……由此观之，其去盖已远矣。若费扬古兵得及堵剿，此贼决不能脱。"[1]

看来卫拉特军队士气不振。卫拉特劳动人民艰难地忍受着战争的重负，出现了投诚者和脱离自己分队的人。这些人转述了老百姓伤心的话："吾辈之苦难何时了？"伯费扬古报告说，一群难民落到他手中：五女三男、八个孩子，他们有少量牲畜。这些难民们谈到，他们同所有卫拉特人一起沿克伦鲁河上游撤退，到肯特山时，他们感到，"我主待我不如前，是以逃回，欲捕捉禽兽为生"[2]。

5月13日，在特勒尔济河的昭莫多地区，噶尔丹的军队遇到了伯费扬古的军队，双方进行了交战，结果卫拉特人战败。伯费扬古向皇帝报告说，噶尔丹有一万人，这次战斗中被打死两千余人，被俘约百人。清军人数上和技术上的压倒优势早已注定了战役的结局。卫拉特残兵四散，噶尔丹本人同一群亲信向西方逃亡。 309

昭莫多的失败使投诚者更加络绎不绝，其中两个是多次被噶尔丹作为使者派往玄烨处的官吏。他们是卫拉特统治者信赖的人，了解很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355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26页。

多情况，因此他们所谈的有关噶尔丹，有关他的计划，他失败与撤退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很值得玩味。其中丹巴哈什哈说："噶尔丹向来有才，亦得人心，自悔其深入乌兰布通之战，乃近居克鲁伦、土喇等处，思以言语煽惑喀尔喀及内地蒙古，使首尾不相自顾，彼时可图大事，满洲闻之必然出兵，师少则与之战，师众则委地而退。满兵既旋，复蹑袭其后，如此不数年，自然财赋耗竭，必致疲敝。"[1]

照这个投诚者的话看，噶尔丹没有料到这样一支大军能通过戈壁而来，并且由皇帝亲自率领。5月7日黎明，他的军队开始由克鲁伦河撤退。噶尔丹原打算拒战于拖诺山，但是未能阻止军队的逃跑。"又欲于额黑穆布尔哈苏台，在柳林中卧骆驼接战。闻西路军声息"[2]，噶尔丹决定猛击西路军。这时他总共只有5000左右士兵，而枪支不过两千，加之由于5昼夜的慌忙撤退，沿途又干旱得株草不生，马匹和牲畜精疲力竭，许多人不得不掉队。因此，噶尔丹到达昭莫多时远没有带齐所有的人。此外伯费扬古的部队预先占领了所有高地，而卫拉特人"就一小坡，徒步拒敌"。他们无法抵抗枪炮的猛烈射击。于是满洲骑兵包围了整个卫拉特军队，抓走了许多妇女儿童，以及大牲畜约2万头、小牲畜4万多头。丹巴哈什哈解释说，他背叛噶尔丹是"自惜生命"[3]。

310

丹巴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了噶尔丹的计划，可以看出，他打算在喀尔喀中心地区巩固实力，并争取喀尔喀和内蒙古王公们转向他这方面，他不主动进攻清朝，但等有利时机回击清朝要制服他的企图。我们无法说明拉萨如何参与制订这个计划，但是不能不指出卫拉特俘虏的口供，他们曾听噶尔丹说，他原"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4]。

玄烨识破了噶尔丹的计划，对他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55－1456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57－1458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55－1462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76页。

5月19日，玄烨率部队主力登上归途。皇帝设想噶尔丹可能去库库淖尔求救，就给当地领主颁发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要求他们见到噶尔丹就加以逮捕，并立即转送到清朝当局手中。同时警告王公们若不执行命令，“此后永以贼论”[1]。玄烨力求从肉体上消灭噶尔丹本人以及“整个叛根”。

与此同时，玄烨命令他的统帅们要所有蒙古王公和台吉交出他们收到的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其他世俗统治者和大主教所写的信件。[2] 311
显然他准备镇压噶尔丹在拉萨的袒护者。1696年6月，玄烨再次行谕库库淖尔，直截指摘第巴向教徒们隐瞒达赖喇嘛之死（10多年前已死去），及鼓励噶尔丹的军事阴谋而使他自认为是代表达赖和受达赖喇嘛之托去行动等罪行。玄烨要求库库淖尔领主博硕克图济农把自己的儿媳妇——噶尔丹的女儿以及所有在博硕克图济农那里的噶尔丹的属民押送给他。[3] 不久，他又颁布了一项命令，其中说，玄烨将向达赖喇嘛派遣外交代表团。“果达赖喇嘛尚在，则面见朕使臣，晓谕噶尔丹，遵朕旨行，朕凡事俱无所复言，亦略无所介意。”[4]

玄烨确知达赖喇嘛早已过世，是死者的儿子第巴在以喇嘛教首领的名义活动，借口达赖喇嘛在入定，不愿见任何人，不许任何人去打扰他。但是玄烨必须使教徒大众确信第巴确实欺骗了他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才打算遣使去拉萨。

这样就开始拔除“叛根”。

1696年7月，噶尔丹回到塔米尔河地区，他的战友阿喇布坦、丹济拉、丹津俄木布、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人也相继到达，只有那些落到清朝当局手中的人以及投奔策妄阿喇布坦或去库库淖尔的人没有来到。噶尔丹及其战友们的士兵不到5000人，他们的牲畜寥寥无几，许多人连帐篷也没有。他们召开了一个会，会上了解到，在即将来临的严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509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566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569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619－1620页。

冬，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没有食物，没有住处，没有可靠的供应来源。在这个会上对如何克服困难发生了分歧。结果丹津俄木布和阿喇布坦
312 离开了噶尔丹。噶尔丹、丹济拉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留在塔米尔河。

这时玄烨力求严密封锁噶尔丹根据地的出路而把他困死在根据地。他写信给策妄阿喇布坦说，务必不失时机地派兵四处搜查[1]，“如生擒噶尔丹，则擒之来；杀之，则以其首来”[2]。对库库淖尔执政者，玄烨则继续坚决要求把噶尔丹的女儿逮捕并押送至北京。

1696 年 9 月，一位宰桑离开噶尔丹投诚清朝当局，他说：“噶尔丹困穷已极，糗粮庐帐皆无，四向已无去路，狼狈不堪，日下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日大雪深数尺，”[3]谁也不指望他能熬过今冬。

清军统帅部从各方面弄到的全部情报都同样说明了一点：1696 年秋天与冬天，噶尔丹处境极端困难。不久又了解到他的战友阿喇布坦带了 1000 名士兵投奔策妄阿喇布坦，而噶尔丹则驻扎在颓河以捕鱼为生。

玄烨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看到自己的这个敌人最后终被打倒，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1696 年 9 月，他再次给噶尔丹写信劝他同意加入清帝国国籍，答应给他和他的所有大臣各种好处。[4]

噶尔丹像对待以前类似的来函和建议一样未予答复。

1696 年 11 月，玄烨了解到噶尔丹总共只剩下几百个人了。他写信给儿子说：“食用既乏，天时寒冽，溃散逃亡者甚多，亦有死者。……噶尔丹虽云前往哈密，令谘访彼知地势之人……仍遶旧地而行。度其
313 情势，难奔他所，既无可往之处，事更易图。”[5]

玄烨希望加速镇压噶尔丹和消灭“一切叛根”，决定随统帅部迁往宁夏，接近噶尔丹牙帐。他在诏令中写道：“务获噶尔丹杀之，朕心始

---

[1]汉文原著中没有这句话，但作者引文中有，我们把它处理在引文外了。——译者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765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869 - 1870 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885 - 1886 页。

[5]《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019 - 2020 页。

毕。”[1]

1696 年底，清军扣留了一群自称为达赖喇嘛和第巴的使者的人以及一些库库淖尔王公，他们到噶尔丹那里“通问于噶尔丹”后，现在返回。噶尔丹的 3 位使者跟他们一起来拉萨和库库淖尔执政者那里。清军没收了他们的 14 束文件，史料对其内容只字未提。

同时，噶尔丹也遣使到玄烨处建议开始和谈。皇帝答复使者：“尔还语噶尔丹，凡事务必觌面会语，不然，则事无终局。彼如不来，朕必啮雪往讨，断不中止。”[2]

实际上，玄烨接着就决定向噶尔丹的兵营和牙帐进军。但是过了不久他不得不改变出发的命令，因为吃完了残剩食物的军队中已是一片怨声。于是他命令编成两支小部队——约两三千人，以便开往噶尔丹处。皇帝决定随军亲征。

噶尔丹还没有丧失对较好前途的希望。他把信件分发到蒙古各地，说服领主和喇嘛们转到自己方面来。可是这些信件为团团包围了他的兵营的清军所截获。

1697 年元月，噶尔丹的儿子塞卜腾巴儿珠尔在哈密地区打猎时被捕，并被送到清军统帅部。按玄烨的命令，被捕者“囚之槛车，解送京师，官兵填巷盈衢，聚观拥视”。[3] 314

1697 年 3 月，清军发动了对噶尔丹牙帐的总进攻。当时卫拉特投诚者提供给玄烨统帅部的资料说明，噶尔丹大概已经无力对进攻者作任何抵抗。留在他身边的人数不断减少，而且据投诚者说，他也不阻拦任何人，允许每人行动自便。继续留在他身边供职的为数不多的战友中，滋长了一种不满情绪，因为噶尔丹不管春天已经来临，仍不做任何计划，什么事都不做。他的一位战友直言不讳地说：“我辈……居于此，……而待毙乎？且汝又欲扶宗门之教以行事，致四厄鲁特、七旗喀尔喀已略尽矣。尔国已破……。我辈从汝，自始至终惟汝意所欲行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042 - 2043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075 - 2076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284 页。

……今不能忍，忿恨而发。”[1]目睹者转告说，噶尔丹默默地听完这些愤怒的指责，一语未答。

尽管走投无路，他仍顽强地拒绝玄烨和他的亲信向他提出的投降建议。可能噶尔丹还在期望拉萨的帮助，那里他的指导者和盟友第巴主持了宗教事务。实际上，第巴为了帮助噶尔丹的确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由于他的努力，策妄阿喇布坦回避参加对噶尔丹最后一块根据地的进军。策妄阿喇布坦本人对清政府派来的代表说：“遵旨领兵来
315 剿噶尔丹，行至萨克萨忒呼里克二十日程之地，有达赖喇嘛使人达尔罕厄木齐言……尔等当各居其地，不得兴兵。遂按兵而退。”[2]

这时第巴曾企图召开全体库库淖尔王公的代表大会。其中一个王公把他收到的一封藏文信转寄给玄烨统帅部。信中建议：“达赖喇嘛、第巴两人遣人谕青海诸首领，俱于正月二十八日在察罕托落海地方会盟，缮修器械。尔可令尔属下人，亦缮修器械，于来月初四五间，昼夜间行，务期必到期会之地。”[3]我们不确切了解这次大会的目的，但是要说它和援救噶尔丹的问题没有联系，那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怎样，玄烨统帅部对这点是确信不疑的。皇帝的众议政王大臣认为：“第巴仍党噶尔丹而诳我。”[4]

1697 年 3 月，玄烨又致函噶尔丹建议其投降。[5] 但是这封信到时，噶尔丹已经死了。1697 年 3 月 13 日晨，他在察阿木塔台地区得病，当天晚上就死了，终年 52 岁。3 月 14 日夜，他的尸体被火葬。玄烨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到了这点：“噶尔丹之死，仰药自杀是实……但噶尔丹尸已焚，即系全尸，其首也一乾腊而已。前吴三桂尸亦焚，取之于决囚之地，舂碎抛弃，榜样甚明。”[6]

316 噶尔丹之死结束了军事行动。清帝国胜利了，喀尔喀成了帝国的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303 - 2304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333 - 2334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338 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338 页。
[5]《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407 - 2410 页。
[6]《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474 - 2475 页。

一部分。但是准噶尔汗国却作为一个独立的蒙古国而继续存在。

本章所引的文件令人信服地征明，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是拉萨喇嘛教一些权威人士的傀儡，这些人受达赖喇嘛和第巴的领导，力求在喇嘛教领导人控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神权的独立蒙古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这一目的。它决定着噶尔丹的内外政策以及对某一蒙古领主的态度。所有支持建立蒙古国这一计划的人都是噶尔丹的盟友，所有反对这一计划的人都是他的敌人。

喇嘛教领导人对噶尔丹各个阶段的活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使各等级的、人数众多的喇嘛阶层为噶尔丹服务，并为此目的利用了宗教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如果没有宗教界的帮助，噶尔丹就不可能占据东土耳其斯坦，击溃土谢图汗及其同盟者，也不可能在节节败退之后还支持了几乎整整10年。

拉萨和噶尔丹的计划遇到了以玄烨皇帝为首的满洲贵族的坚决反对，玄烨比自己的大臣和议政王们更早了解到，拉萨和噶尔丹的计划隐藏着对清廷利益何等可怕的危险。噶尔丹已经覆灭之后，玄烨在总结整个战役时说："噶尔丹曾破回子中之萨马尔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牙尔勒、哈思哈尔、赛尔门、土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喀尔喀焉能抵敌，是以七旗数十万众，一岁之中丧亡略尽。喀尔喀之汗、诺颜、台吉等……悉皆款塞来归。其时若不允其内附，……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则尔时噶尔丹之势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搆难。……噶尔丹假索取喀尔喀为名，遂犯我边境，尚书阿尔尼帅蒙古兵逆战于乌尔会之地，我师大北，噶尔丹乘势遂直抵乌兰布通。……左翼军虽能胜敌，而右翼军不能制胜。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噶尔丹亦自知其无济，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卜多者，不过数千人耳。……倘事或未成，则……靡中国之脂膏，事朔荒之边塞，其名恐未能免矣。"[1]

317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523－2539页。

造成噶尔丹失败的决定性原因在于,他甚至借助宗教界也未能把大多数蒙古王公团结在自己和自己的纲领周围。加之,由于他过分僵直与专横的政策,策妄阿喇布坦也成了他公开的敌人之一,后来策妄阿喇布坦实际上把他逐出了准噶尔汗国,使他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噶尔丹未能把库库淖尔王公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他们若积极支持,就会使形势从根本上转变为有利于噶尔丹,大大增加人力与物资的来源,保证与拉萨联系的可靠的交通线。很难说,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汗国可能给了噶尔丹什么样的帮助,但他竟然使这个汗国的执政者——阿玉奇重新对他产生反感。

拉萨所制定的泛蒙古的和泛喇嘛教的计划符合蒙古封建主的利益,但是这种计划丝毫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蒙古人民群众的状况。对于他们来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战争跟平时的封建战争没有任何差别,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他们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没有任何的好处,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好处。准噶尔汗国人民群众的处境及其情绪在我们前面引过的一句话里得到了最好的反映:“吾辈之苦难何时了?”

5 全盛时期的准噶尔汗国 319

（18 世纪前半叶）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死后，卫拉特国家就由策妄阿喇布坦掌管。在策妄阿喇布坦，特别是在他的继承人噶尔丹策凌执政时期，是准噶尔汗国的全盛时期，是它在东亚和中央亚细亚的国际生活中起最积极作用的时期。

准噶尔汗国这段历史的特点是：它同中国和俄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中亚和东土耳其斯坦各封建领地的外交和经济联系，显得格外活跃。这些联系在上述各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若明若暗的遗迹。

正是这种情况使研究者对 18 世纪前半叶卫拉特国家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并且写了大批书籍和论文。作者们力图尽可能充分地叙述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揭示这些事件的原因和内在意义。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以俄文的为最多。[1] 但是文件和其他史料则发表得仍然很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档案库中，还有更多的文件资料有待整理发表。

由于缺乏史料学基础以及研究者对现有史料抱有不加批判的态度，结果在叙述和解释事件上产生了许多错误和不确之处。例如，波兹德涅耶夫依然只是盲目地遵循 18 世纪的蒙古史料和 19 世纪的中国史料，而忽视俄国档案文件的记载，所以他从否定的角度来描述准噶尔汗国及其活动家们，同时对清帝国的政策及其执政者却加以美化。有几 320
部专论这一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著作是波兹德涅耶夫写的。在这些著作中，他坚持了这样一种见解：正是卫拉特人，即准噶尔汗国的执政

---

[1] 班蒂什·卡缅斯基：《外交事务文集》；维谢洛夫斯基：《派往准噶尔洪台吉处的使团》，《18 世纪西伯利亚历史文献》，圣彼得堡，1882 年和其他年代。

者——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是当时战争以及其他国际纠纷的罪魁祸首。[1] 在谈到喀尔喀本身的历史事件时，波兹德涅耶夫写道："喀尔喀新的混乱时期的罪魁还是那些准噶尔人，现在为首的是策妄阿拉布坦，他不久前还表示忠诚于满洲人，并向他们寻求保护，以免受到噶尔丹的侵犯。"[2]波兹德涅耶夫企图单纯地用卫拉特汗的恶意来解释中央亚细亚和东亚各国18世纪前半叶复杂的历史过程，这是同史料的记载有很大矛盾的。从这些记载看，波兹德涅耶夫的观点是经不住批判的，是应予否定的。还必须指出，在他的《喀尔喀历史资料》这部研究上述时期卫拉特历史的主要著作中，有许多事实上的错误和不确之处。

帕尔莫夫和维谢洛夫斯基对策妄阿喇布坦的活动作出相反的评价，是对这个时期研究得还很不够的证明。前者认为，策妄阿喇布坦是中国的傀儡，[3]而后者却说他不仅力求征服整个蒙古，而且要征服中国。[4]

关于准噶尔汗国执政者的侵略政策，许多学者都写到了。维谢洛夫斯基写有关于曾出使策妄阿喇布坦处的翁科夫斯基代表团的书，米纳耶夫在评论这本书时写道："策妄阿喇布坦同他的前辈一样是个好战派。看来，他有宏大的侵略计划。就是这种计划使他同中国人争战，当他遭到惨败时，就不得不向俄国皇帝寻求庇护。"[5]柯津断言，在清人统治时期，"十分明显，准噶尔自认为是过去元帝国的民族和历史权利的继承者，因此，也是这个大国对各藩属和各民族宗主权的继承者……，由此就产生了16—17世纪（和硕特的顾实汗），甚至18世纪（准噶尔的策妄阿喇布坦）准噶尔人多次占领这些地区的事实，不管引起

321

〔1〕参看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75页以后；波兹德涅耶夫：《致维谢洛夫斯基的报告书》，第284页；波兹德涅耶夫：《关于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第246页以后。

〔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75页。

〔3〕帕尔莫夫：《伏尔加河一带卡尔梅克人历史初探》，第13页。

〔4〕维谢洛夫斯基：《派往准噶尔洪台吉处的使团》，第27页。

〔5〕米纳耶夫：《寻金》，载《国民教育部杂志》，第257分册，1888年，第247页。

这些占领的表面借口是什么。”[1]

在研究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卡尔梅克、中亚、俄国以及这些国家同东方各国关系史的大批著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有关准噶尔汗国的问题。这些著作一部分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表，是一些通俗的科学普及读物，没有独立的学术价值，而另一部分则是对我们祖国的历史能扩大和加深认识的重要研究成果。这第二类中，多数著作的特点是，作者只使用了俄国的史料，忽视了蒙古历史自身的发展过程，所以他们的研究仅局限在俄国同准噶尔关系的范围之内，同时还有意无意地美化当时俄国统治集团的政策。[2] 但苏联学者们研究西伯利亚历史问题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尽管准噶尔汗国本身的历史并不是他们注意的重点。[3]

国外文献中可以指出来的有库兰的论17—18世纪中央亚细亚若干历史问题的著作以及加恩论彼得一世时期俄中关系的著作。库兰的书是一部资料汇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作者从俄国和中国史籍中以及到过中国和中央亚细亚各国的旅行家与传教士发表的札记中汲取来的。库兰把满洲和卫拉特双方的政策方针作了对比。按照他的意见，满洲执政者和卫拉特执政者的目的都是靠牺牲另一方来建立自己的帝国。这一观点在书的一个标题中已经反映出来，这个标题是：《是卡尔梅克人的帝国还是满洲人的帝国?》库兰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上述这种对比，使问题过于简单化，结果也就使他的书失掉了独立的科学意义。至于加恩的学术著作，作者则只是从中、俄两大强国之间争夺势力的角度来

322

〔1〕柯津：《江格尔传》，第78页。

〔2〕克拉索夫斯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地区》；乌索夫（Ф. Усов）：《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统计资料》（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йска），圣彼得堡，1879年版；谢格洛夫：《西伯利亚史重要资料年表》；斯洛夫佐夫：《西伯利亚历史概况》；安德里耶维奇：《西伯利亚史》；瓦京：（В. А. Ватин）：《18世纪米努辛斯克边区——西伯利亚史探讨》（Мин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в XVIIIв. Этюд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米努辛斯克，1913年版。

〔3〕参看巴赫鲁森（С. В. Бахрушин）：《16—17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化史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 и XVII вв.），莫斯科，1927年版；库尔茨（Б. Г. Курц）：《16、17、18世纪的俄中关系》（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 XVII,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哈尔科夫，1927年版。

考察17世纪末至18世纪纪头三十几年准噶尔汗国的历史的。

这两部著作对我们揭示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执政时期卫拉特国家的内、外政策史，都没有多大帮助。

我们研究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准噶尔汗国历史所使用的主要史料，是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特别是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收藏的俄文档案资料。这些资料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其中有大量有关准噶尔汗国对外政策方面的史实资料，同时也提供了有关卫拉特社会内部生活方面的不少资料。上述这些资料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原本文件，其中包括分项文件和旅行纪事，到过中国或准噶尔汗那里的俄国使者萨瓦·弗拉季斯拉沃维奇·拉古津斯基、洛连涅茨·兰格、马克西姆·埃蒂格罗夫、列昂季·乌格利莫夫的日记，西伯利亚总督们和西伯利亚、奥连堡边区与伏尔加河沿岸俄国一些政府官员的呈文、报告和查讯单，卡尔梅克汗和王公们的报告与信件。还有一些经过查证的俄国政府各类公文、命令和指示的副本也很有价值，准噶尔汗国首领致俄国当局信件的译本，间或也有原本。

323

毫无疑问，在记述18世纪前半叶卫拉特和卡尔梅克活动的史料缺乏而又弄不到藏文史籍的情况下，俄国档案文件就具有头等重要的史料意义，这种史料使得有可能揭示历史事件的客观进程。当然，绝不能不考虑到，俄国档案资料反映了俄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官方的政策，因此就要求研究者进行严格的批判分析。但是，对于这些档案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一般说来，研究者是完全可以作为依据的。

5.1 内外政策

卫拉特国家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在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统治时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事件重压下，仍没有垮台。噶尔丹本人虽然丧了命，他认为自杀比免不了被俘和受辱处决要好，但准噶尔汗国仍然作为西蒙古封建主的一个独立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了60年之久。

在前一章里已经指出过，噶尔丹自从1688年侵入喀尔喀境内之

后，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准噶尔本土，直到他死为止，一次也没有返回。准噶尔汗的这个宝座实际上是个虚位。在这种情况下，策妄阿喇布坦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看来当时他没有碰到任何人的反抗。

从何时起把策妄阿喇布坦算作准噶尔的汗呢？事实上他在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在世时已经成了汗，但外界，即准噶尔周围的民族和国家，承认他是汗国的执政者，却是在噶尔丹死后。所以把1697年称作策妄阿喇布坦执政的头一年是比较正确的。

我们手头的史料无法彻底研究策妄阿喇布坦自从同噶尔丹分裂以后到他登上汗位这20年（1678—1697）的活动情况。他怎样巩固自己在汗国的地位，怎样逐渐变成卫拉特国家的实际执政者，对于这些我们所知无几。但是，我们知道，准噶尔的领主们和人民没有起来为保卫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权利而反对策妄阿喇布坦。后者始终没有对遇难的汗国执政者给过任何援助，并且对这位执政者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实际上，噶尔丹在世时，他已经篡夺了噶尔丹的政权。 324

这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噶尔丹的大国主义计划是不怎么得准噶尔的人心的。不用说人民群众，甚至领主们，都不愿卷入这样一桩冒险的事业——企图在拉萨喇嘛教主们的庇护下建立“大蒙古国”。可能这项计划得到了准噶尔大封建主和最大封建主以及上层喇嘛的支持。但是，没有参加17世纪90年代噶尔丹的战争而仍在准噶尔境内游牧的中小封建主，不愿为这个计划牺牲自己切身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置噶尔丹于不顾的原因。不尊奉策妄阿喇布坦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一群王公——噶尔丹最亲密的战友们和策妄阿喇布坦个人的仇敌。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归顺清帝国比回准噶尔受策妄阿喇布坦的统治要好。[1]

应当指出，史料没有证实文献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似乎策妄阿喇布坦为了讨好玄烨，当噶尔丹的尸体以及他的儿子、女儿刚落到他的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585－2587、2601、2608页及2614页以后。

手中时，他就自愿交给了清朝当局。[1] 据史料记载，玄烨为了要“根株尽绝”，的确千方百计想尽快把噶尔丹的子女和至亲以及噶尔丹的骨灰弄到手。为此，玄烨多次向策妄阿喇布坦发出有关谕旨并派遣使者，但策妄阿喇布坦却利用各种借口长期回避履行这些要求。

325

我们这部史料说：“噶尔丹之尸……差人护解，倘若隐匿，不行擒解，……尔贸易之人亦不许通行矣。上项情事，亦已明谕。”[2] 只是到1698年9月，准噶尔汗国前任执政者的骨灰才送到北京。根据玄烨的谕旨，骨灰在北京各城门陈列示众。

至于噶尔丹的女儿，策妄阿喇布坦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只得于1699年夏天送去了。[3]

策妄阿喇布坦以准噶尔汗身份作出的第一次大的对外行动是同哈萨克汗头克的战争。1698年春，策妄阿喇布坦写信给玄烨说，开战“非愿为此也”，说战争的起因是头克的背信弃义。他曾请求策妄阿喇布坦解救当时被噶尔丹俘去后送往拉萨给达赖喇嘛作为献礼的那个儿子，并且答应“愿与之好”。策妄阿喇布坦应允了头克，解救了他的儿子，并且“为予保护”特派500人护送到他父亲那里。但头克“反尽杀臣五百人，后又杀臣属下吴尔赫德巴图尔台吉，掠取其人民，续又掠我吴礼扬罕（即乌梁海。——译者）百余户人”。此外，头克汗的人马对从伏尔加河沿岸前来准噶尔的商队进行了袭击，商队中有策妄阿喇布坦的未婚妻——阿玉奇汗的女儿。“去岁秋，臣商人自鄂罗斯归，彼又掠之。”由于这一切情况，“臣是以兴兵而往，恐圣上谓臣喜事好兵，故陈此自白”[4]。

326

我们摘引了策妄阿喇布坦的这封信，并不是因为它能证明准噶尔

---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76页以后。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619－2623页，2661－2662页。

〔3〕应当指出，玄烨宽恕了噶尔丹的后代。噶尔丹的女儿钟济海被嫁给满族大臣，而对其儿子塞卜腾巴儿珠尔则授予一等台吉身份。参看《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662页。

〔4〕《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2657－2660页。

汗有理，哈萨克汗有罪。无论对策妄阿喇布坦的高尚，还是对头克的无私，我们都没有根据相信。可以预先说一下，在准噶尔汗致玄烨的信中谈到的那类过失方面，这两位汗多少都有同样的根据相互埋怨。1698年的战争是卫拉特和哈萨克封建主之间武装冲突的新时期的开端。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来自准噶尔的危险开始变成威胁封建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主要危险。如果说17世纪，准噶尔汗国反对哈萨克汗和苏丹的战争是在1643年和1681—1684年间，那么，在策妄阿喇布坦执政时期，这类战争就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发生——1711—1712年、1714年、1717年、1723年和1725年。就连这个时间表也还不是详尽无遗的，因为哈萨克汗和苏丹对卫拉特封建主的历次反击还没有统计在内。

这些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类似策妄阿喇布坦信中列举的事实，即使是全部合乎实际的，也只能作为开始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世纪哈萨克—卫拉特战争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策妄阿喇布坦写信给玄烨，目的是在表白他对哈萨克人开战的理由，但促使他写信的动机问题倒是值得注意的。史料使我们确信，同波兹德涅耶夫和帕尔莫夫的看法相反，策妄阿喇布坦既不是清廷的傀儡，也不是它的仆从，因此他没有向清朝报告自己行动的义务。但引起这位汗国执政者想到有必要写这么一封信却有别的重要原因，即17和18世纪之交准噶尔汗国内外形势的特点。 327

虽然汗国顶住了噶尔丹执政时的风波与灾难，然而它受害还是匪浅的。噶尔丹战争的结果，使汗国丧失的领土有：阿尔泰山东坡、科布多河谷地和乌梁海的广阔牧场。收复失地的问题差不多在整个18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执政者同中国清朝政府的相互关系中，始终占首要地位，由此可见，这些损失具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除领土外，汗国还损失了一部分居民，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有的自愿移居准噶尔境外。损失的这部分人的数量很难确定，只知道噶尔丹进入喀尔喀时带了一支3万人的军队。假定一家出兵一名（在蒙古常常是这样），就可以设想出噶尔丹从准噶尔带走了大约3万户家庭的人。每家以2—3人计算（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儿童留下），那么总共约7万人。分析

一下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汗国来说，这7万人中永远丧失的大约5万。

卫拉特国家损失的牲畜——国家的主要财富，数目也很可观。只要考虑到，仅仅1696年5月在昭莫多地区一个月的战斗中，噶尔丹的军队丢给清军的牲畜大的就有2万头，小的则有4万多头，[1]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某些概念了。

不难理解，所有这一切在军事方面也削弱了准噶尔汗国。

尽管大多数卫拉特领主支持策妄阿喇布坦，把招致灭亡的内讧危险缩小到最小的程度，但是策妄阿喇布坦却不能不顾及到，他有着以丹济拉、丹津俄木布、杜噶尔拉卜滩等噶尔丹原战友为代表的劲敌，他们中大部分人住在库库淖尔，在那里跟当地执政者——敌视策妄阿喇布坦的顾实汗的后裔们联合了起来。

328

噶尔丹军事上的失败及其死亡，策妄阿喇布坦在那里的地位还来不及巩固，准噶尔本土的动荡局势，所有这些情况为从北部和西部，从俄国和哈萨克斯坦方面对汗国施加压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众所周知，18世纪初，俄国殖民化的新浪潮席卷了叶尼塞河、托博尔河以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区。18世纪头15年至20年中，额尔齐斯河沿岸全部谷地被并入俄国，而在此以前，额尔齐斯河上最靠边的俄罗斯居民点是切尔诺卢茨克域郊村（在鄂木河流入额尔齐斯河的河口往下约60公里的地方）。[2] 叶尼塞河中上游的谷地也同样迅速地被征服了，而1701年时，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南侧连一个俄国居民点都没有。[3] 俄国殖民化的成就必不可免地引起排挤卫拉特牧区的现象。于是在俄国与准噶尔汗国间就出现了新的矛盾，它们逐渐变得越来越尖锐。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矛盾构成了18世纪俄、卫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们有根据认为，18世纪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的空前恶化也是以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1461页 。

〔2〕巴赫鲁森：《16—17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化史纲》，第273页；乌索夫：《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统计资料》，第5页。

〔3〕瓦京：《18世纪米努辛斯克边区》，第18－19页及第27页以后。

领土的矛盾为基础的。哈萨克的汗和苏丹们需要补充牧场,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地来回奔波,但未能找到无人占用的空地。依我们看,这也就可以说明他们和卡尔梅克人、巴什基尔人等等多次发生冲突的原因。哈萨克封建主利用准噶尔出现的形势,于17世纪90年代把自己的牧区向东方和南方——卫拉特国家这边推进。同时应该指出,领土争端在准噶尔与哈萨克的关系中虽起主要作用,却并不是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唯一原因。各方封建集团力求控制贸易通道和贸易中心、占夺对方的财富等原因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329

结果,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准噶尔汗国被挤在有限的土地上,而且来自外部的压力有日趋加剧的倾向。在汗国的东部边界,喀尔喀的封建领地的地盘为强大的清帝国所占,它明显地企图继续向西部扩张;而汗国的北部和西北部边界分布着同样强大的俄罗斯的领地。

策妄阿喇布坦上台时卫拉特国家的形势就是这样。情况相当复杂,要求他非常谨慎地处理。要是他敢于在几条战线上同时冒险展开斗争,那对他来说,不利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只能从巩固中央政权着手。后来的事件表明,策妄阿喇布坦对这项任务完成得很有成效。顺便说说,我们在《切列潘诺夫编年史》有关1716年的那些篇章中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其中写道:"以前称作策妄阿喇布坦的额尔德尼硕鲁克图浑台吉在1697年执政,他仿效其叔博硕克图汗的那套办法,使分散在各地的卡尔梅克兀鲁思俯首听命,从而大大增强了实力,致使他不仅能继续进行开始于博硕克图汗的对蒙古人和中国人的战争,并且由于打败西藏和唐古特地区的汗和驱逐达赖喇嘛,而成了这一带的危险人物。"[1]

策妄阿喇布坦在执政初年避开了可能破坏与中国关系的一切事情。他就对哈萨克汗头克发动战争一事给玄烨的信,应该看做是这种策略的一种表现。他表面上装得好像俯首听命——自认如果不是玄烨的藩臣的话,也是他的学生,好像他打算把自己的每一个步骤都告知玄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157、158页。

烨。看来，1702年秋天，当他率2500名兵士，强迫附属于他的吉尔吉
330 斯兀鲁思从叶尼塞河谷地撤回到他领地的内地时，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消除俄国与卫拉特可能发生的纠葛。[1] 1698 年战争的结果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在此后 15 年以上的时间里，准噶尔汗国没跟任何人打过仗，而在它的各段边界上都保持了和平。在这些年，策妄阿喇布坦着重致力于解决汗国的内部生活问题。许多史料证实，他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力求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我们从翁科夫斯基的记事簿上发现不少足资证实上述情况的有趣资料。根据翁科夫斯基的资料和俄国外交事务部的其他材料，1734 年编辑了一部准噶尔汗国内部状况概述。顺便说说，概述中提到，策妄阿喇布坦“在其叔博硕克图死后成了全体属民的统治者，达赖喇嘛授予他另一个名字——额尔德尼硕鲁克图巴图尔浑台吉……翁科夫斯基到来之前，30 年左右很少见有庄稼，因为当地人不会耕地。现在他们的耕地越来越多，不仅由布哈拉臣民播种，而且许多卡尔梅克人也从事耕耘，因为浑台吉曾就此下过命令。他们的庄稼有：茁壮的小麦、黍、大麦、稷。那里的土地含盐多，所以蔬菜也长得很好……几年以前，浑台吉开始造武器，据说他们那里产铁，可用来做铠甲、盔，还开始用皮革当原料做呢绒，现正在制造书写纸。”[2]

托博尔斯克贵族埃蒂格罗夫于 1729 年从托博尔斯克出使准噶尔汗处，他笔记中也提到，他和同伴们从塔尔金斯克山口下来接近汗的牙帐时，“走过一片草原，草原上有浑台吉领地的布哈拉人和卡尔梅克人在种地”，然后他们又“朝察罕乌苏河右边布哈拉人的耕地旁穿过草原。”[3]

331 同时引证一下加班沙拉勃的记载。一般说来，他评论策妄阿喇布坦很审慎，虽然在卡尔梅克贵族看来，此人对待阿玉奇汗的儿子桑扎卜的行为是非法的、不公正的：策妄夺走他的 15000—20000 名属民之后，

---

[1]《18 世纪西伯利亚历史文献》，第 1 册，第 232 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4 年，3a 卷，第 1 张反面至第 4 张反面。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9 年，1730 年，第 1 卷，第 60 张。

把他和六七个仆人遣送到他父亲处。加班沙拉勃写道:“卓哩克图洪台吉为臣民们做出的事(功绩。——兹拉特金)不多。他强占了卡尔梅克人(桑扎卜的人。——兹拉特金),得到的好处很少……不听从劝告……不关心人民,却仍然把臣民们招来种地。且把此事归入所做的好事之列。”[1]

《西伯利亚历史文献》记载,俄国钳工泽列诺夫斯基18世纪初在策妄阿喇布坦那里搞过造枪的事,而《文献》中未提名的另一些俄国人,在他那里组织过皮革生产。[2]

我们没有根据夸大农业,特别是手工业生产在汗国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策妄阿喇布坦以及他的继承人时期汗国本身的农业都不能满足内部的需求,在国外市场上不断购买粮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策妄阿喇布坦执政年代卫拉特手工业的性质及其内部的组织情况,可以通过一个卫拉特妇女的话来判断,她向翁科夫斯基的妻子抱怨说,汗国“全年要向所有兀鲁思抽调300名以上的妇女去浑台吉的主帐驻地,她们整年得为自己的生活费给军队缝制军服和盔甲”[3]。这番话多少描绘出了一幅典型的图画:封建执政者为了满足军队和宫廷的需要,根据简单合作制和强迫牧奴劳动(这里指游牧、畜牧者)的原则建立企业、作坊,牧奴们在这些企业里履行一种独特的国家劳役。由兀鲁思执政者指派他们去服役,这些执政者也是向宗主——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尽藩臣的义务。 332

在造枪、制革、制造铁器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企业里,生产的操作方法本身会引起劳动分工,但有关这类企业中组织生产过程方面的资料我们没有掌握。可能,在这些企业里,特别是在汗国出现的大炮生产中,劳动分工也已经开始发展,同时简单合作发展为手工工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史料对此默无所述。由策妄阿喇布坦,随后又由他的继承人噶尔丹策凌所建立的生产企业对汗国经济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

[1]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29页。

[2]《18世纪西伯利亚历史文献》,第1册,第525页。

[3]维谢洛夫斯基:《派往准噶尔洪台吉处的使团》,第149页。

很小的。我们对这些企业的出现,与其把它看做是汗国已经定型的经济部门的一种发展,不如把它看做是这两位执政者的政策中某些无疑具有进步倾向的一种表现。因为手工业在准噶尔并没有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

根据我们的史料来判断,东土耳其斯坦封建领地对策妄阿喇布坦没有反抗,而且早在噶尔丹生前就承认了策妄阿喇布坦对自己的统治。不管怎样,在1697年以后,这一带领地和汗国的这位新执政者之间,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武装冲突。俄国外交事务部1734年给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的报告中写道,策妄阿喇布坦"迫使叶尔羌、吐鲁番、喀什噶尔、阿克苏和另一些属于他的城市里所住的布哈拉人服从自己的统治并开始征收贡赋。而把这些城市的汗、伯克和上等人带走了,这些人已经在浑台吉那里经营耕耘……在浑台吉那里游牧的布哈拉人,除种地的以外约有两千人。称作布鲁特的民族,也被制服,他们游牧于图斯库勒湖(即伊塞克湖。——兹拉特金)附近"[1]。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策妄阿喇布坦在自己周围集聚了相当数量的伊斯兰教贵族代表人物,曾统治东土耳其斯坦的王室后裔,以及"上等人"(富裕商人)。这些汗、伯克和"上等人"开始在策妄阿喇布坦那里经营耕地,这应理解为策妄阿喇布坦给他们赏赐了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靠"种地人"(农民)服役的庄园。看来,这种制度对双方都合适,因而消除了冲突的可能性:策妄阿喇布坦的金库可以得到农业产品,而伊斯兰教地主们在卫拉特王国像在自己家园一样依然是地主。甚至也可能,卫拉特汗的巩固的政权比他们故乡的地方执政者动摇不定的政权更牢靠地保障了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况且,因为当着汗的面,在汗身边,可以说是在他眼皮底下,所以伊斯兰教的地主们失去了或者几乎失去了搞阴谋和叛乱的可能,这就保证了东土耳其斯坦的贡赋能按时交到汗的金库,而对汗国局势的稳定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据我们所知,18世纪的整个前半叶,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伊斯兰教领地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

333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4年,3a卷,第1张反面。

这些领地的伊斯兰教贵族与卫拉特封建主之间保持了紧密的联盟关系。

策妄阿喇布坦也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在力求建立和巩固同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汗国，同库库淖尔的和硕特领地的友好联系与合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通婚。前面已经提到过，1698 年跟哈萨克人打仗的起因中，有一个原因是哈萨克人袭击去策妄阿喇布坦处的商队，与商队同行的有他的未婚妻——阿玉奇的女儿。此后不久，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儿达尔马巴拉离开准噶尔去伏尔加河，于 1701 年成了阿玉奇的妻子。

在宗教系统方面，卡尔梅克汗国和准噶尔汗国也保持着联系。经由准噶尔去西藏的这条路，对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汗国来说是最方便的捷径。从俄国这条河两岸去朝圣的人和来自拉萨的传教士，在和平时期通常经由准噶尔到达旅行目的地。只有在非常情况下，例如，威胁旅行者安全的战争时期，他们才被迫放弃这条惯走的捷径。这时要从伏尔加河到达拉萨就不得不艰难地经由西伯利亚，再穿过整个中国，从东部到遥远的中国西部。例如，1698 年经过西伯利亚和中国去西藏朝圣的阿玉奇汗的亲戚阿拉布珠尔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在归来途中他被阻留在北京了。我们下面会看到，这是清政府为特别代表团准备的一种借口，是为了联合阿玉奇共同对策妄阿喇布坦发动武装进攻。[1] 曾任卡尔梅克汗国最高喇嘛职务的著名喇嘛教活动家硕呼尔喇嘛，1718 年从拉萨回伏尔加河也是走的这条路。[2]

334

大体上可以说，策妄阿喇布坦跟卡尔梅克执政者们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友好联系。不错，我们不了解有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直接参与策妄阿喇布坦打仗的任何事情，尽管后者在这方面也曾采取过一定的部署。不过他却排除了清人利用卡尔梅克汗国的力量来武装反对卫拉

〔1〕《彼得大帝在位时政府枢密院发出的报告和判决》，第 2 卷，第 2 册，圣彼得堡，1883 年，第 352－353 页。

〔2〕参看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3－1725 年，第 6 号，第 281 张反面；1630－1736 年，第 119/1 号档，1a 卷，第 11 张。

特汗国的可能。

史料说明,18 世纪 20 年代,卡尔梅克贵族界某些人物曾酝酿过把卡尔梅克人从伏尔加河迁走而与准噶尔汗国合并的计划。为此,1724 年,他曾遣使向策妄阿喇布坦请求"庇护"。但是这个计划毫无结果,这主要是因为许多领主不愿离开他们已经住惯了的伏尔加河草原,此外也怕遭到阿玉奇的儿子桑扎卜那样的命运。桑扎卜于 1701 年带了 15000—20000 属民迁到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后者却夺走了他的所有属民,而把他跟十来个仆人打发回伏尔加河。[1] 有趣的是,某些文件中指出,达赖喇嘛支持卡尔梅克人与准噶尔汗国合并的计划,他委托硕呼尔喇嘛把他希望卫拉特人合并的意见告诉卡尔梅克王公。"几年前,硕呼尔喇嘛到达后代表达赖喇嘛宣称,他奉达赖喇嘛旨意向阿玉奇汗转达,希望他们卡尔梅克人脱离俄国的庇护,迁回自己唯一合法的汗那里去。阿玉奇汗、其妻子达尔马巴拉,以及硕呼尔喇嘛和叶姆奇格隆(赐给喇嘛医生的高级教衔。——兹拉特金)都建议让他们迁到浑台吉那里,跟浑台吉商量并告诉他达赖喇嘛的命令,希望他对这个命令不要置之不理,不要让他们像汗的儿子桑扎卜那样倾家荡产。"[2]

335

俄国政府密切注意卡尔梅克与准噶尔的联系,力求维持自己对他们的控制。1720 年 2 月,阿玉奇在答复俄国当局的质问时,给彼得一世写道:"我向浑台吉屡次遣使是为了我儿子的事,他离开我时,带了许多卡尔梅克属民去浑台吉处。当时,浑台吉把所有迁到他那里的兀鲁思和卡尔梅克人攫为己有,只把我儿子本人放了回来。当我向他要这些兀鲁思和卡尔梅克人时,他虽然也答应归还,却至今没有交还。为此我频繁遣使为了得到他的真情实话。"[3] 虽然卡尔梅克汗国的执政者们一再要求,策妄阿喇布坦仍未把夺自桑扎卜的人退还,而是分给了自己的领主们。

---

[1]参看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1728 年,第 9 卷,第 200 - 210 张;1723 - 1725 年,第 6 卷,第 153 张和 304 张反面,第 340、355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8 年,第 9 卷,第 203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0 年,第 2 卷,第 3 张反面。

策妄阿喇布坦跟库库淖尔的和硕特执政者的关系比较复杂，后者这时实际上已经正式成了清人的臣民。结束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战争之后，清人大大巩固了在库库淖尔的阵地，迫使和硕特领主宣誓忠于清廷，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清军入驻库库淖尔，而噶尔丹以往的某些老战友、策妄阿喇布坦的公开敌人也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我们没有掌握有关策妄阿喇布坦为了调整与库库淖尔执政者的关系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却知道他没有成功，因为和硕特王公大多数仍是他的敌人。波兹德涅耶夫在引证一部中国史料时，摘录了丹济拉和丹津喇布坦在1705年给玄烨的请求书。这两位噶尔丹的老战友写道："现在，当所有蒙古人……都在您坚强的庇护下生活时，难道可以唯独让他怀着恶意阴谋留下来吗？他一旦巩固了实力，迟早必将起另一个小噶尔丹的作用。因此出兵……不是更好吗？"[1] 336

策妄阿喇布坦在库库淖尔没有取得成功，便把注意力转向西藏，那儿的世俗执政者是顾实汗的孙子拉藏汗。跟后者谈判的结果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儿成了拉藏汗的儿媳妇。

这些年中调整同中国和俄国的和平关系，对卫拉特国家的命运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策妄阿喇布坦在自己执政的头12—15年中，主要是力求使中、俄两国政府相信他爱好和平，愿意避免争端和冲突。他最初的部署之一，就是调整17世纪最后几年在与俄国毗邻的边境地带所积累的事端。我们不准备谈准噶尔汗的使者和俄国当局之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每一件事，因为这些问题在文献中阐述得相当广泛。我们只提一下《切列潘诺夫编年史》中的一些记载：1701年元月24日，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阿卜杜尔叶尔克宰桑从托博尔斯克被遣送到莫斯科。在这之前，策妄阿喇布坦的代表曾到"不和睦的吉尔吉斯人"那里，调查发生冲突的情况和肇事人。这部编年史提到，要是吉尔吉斯人的罪责查证确凿，那么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会把吉尔吉斯王公"科尔奇

[1]维谢洛夫斯基：《派往准噶尔浑台吉处的使团》，第259页。

克·叶尼亚科夫的头”交给“托木斯克”[1]。两年后,1703年元月10日,
337 阿卜杜尔叶尔克宰桑从莫斯科返回托博尔斯克,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由这里被尊荣地送回国去。[2] 正是在这时期,策妄阿喇布坦为了消灭冲突的策源地,派出了自己的一支大军到南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地区,借助这支军队把所有吉尔吉斯人从这里带走,迁到了伊塞克湖地区。

这些年,策妄阿喇布坦对中国也表现了同样的克制态度。北京时常遣使去他那里,为了说服准噶尔汗国的这位执政者仿效达赖喇嘛以及喀尔喀蒙古王公、内蒙古和库库淖尔那样加入清帝国的国籍。1703年,使者博珠对策妄阿喇布坦说:“他们都管理着自己的百姓,在自己的牧区里和平地生活,保持执政者的尊严,难道他们不如你?但是由于这一切,由于崇敬至圣的皇上的仁德,他们都承认了皇上对自己的最高权力,同所有蒙古人一样,接受封号和职衔,得到赏赐,并在皇上陛下的庇护下纯享清福。”[3]但是,玄烨没能说服这位准噶尔汗放弃独立去当清帝国的臣民。策妄阿喇布坦一面千方百计地强调对中国皇帝深怀敬意,与这位皇帝的相互关系方面避免发生纠葛,同时力求解决一项主要任务——巩固汗国和自己在汗国的统治。

对这种政策,北京方面并不是始终无所察觉。就在1703年,玄烨向自己的诸议政王大臣指出:“以前策妄阿喇布坦上奏中常表示忠诚和景仰之心。可是当噶尔丹被消灭,以及他取得对哈萨克人的胜利并获得一定数量的战俘之后,他逐渐变了。现在他归并了一些土尔扈特人(指桑扎卜的卡尔梅克人。——兹拉特金),就越来越目空一切。”[4]

338 过了不久,策妄阿喇布坦开始要求把以前属于准噶尔汗国的领土归还给他。噶尔丹被击溃之后,这些领土转入清帝国之手,帝国当局又把它们转交给了喀尔喀领主。当波兹德涅耶夫引证扎萨克图汗爱马克

---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103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111张。

[3]波兹德涅耶夫:《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史》,第258页。

[4]波兹德涅耶夫:《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史》,第257页。

的一部蒙古大事记时，写道："大家知道，噶尔丹战争发生前，准噶尔人牧区所占之地直到科布多河下游一带，甚至到东边更远的地方。在乌兰科姆以及克穆河、克穆奇克河一带，他们和喀尔喀人犬牙交错地居住着。而噶尔丹溃败之后，喀尔喀牧区便远远向西边推移，越过阿尔泰的那一面而一直扩展到额尔齐斯河。策妄声明要求归还的正是这些土地，他向满洲政府宣布，从伊犁河东部起到克穆河与克穆奇克河之间的一些地方历来属于准噶尔人，所以现在应当归还他们。"[1]

领土问题在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之间具有基本矛盾的意义，这一矛盾使他们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

有些研究者指出，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政策有某些相似之处，认为前者是后者事业的直接继承人。例如，波兹德涅耶夫率直地写道："策妄阿喇布坦企图着手做的，也就是噶尔丹为之斗争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控制下联合古卫拉特联盟的所有4个部落，成为卫拉特各部的一个独立的汗，而且完全恢复准噶尔领地的原来边界。"[2]

不过，如我们所见，噶尔丹的计划完全不是那样简单的，他的计划远远越出了波兹德涅耶夫所谈的那些目的。此外，在噶尔丹和策妄阿喇布坦的政策中不仅有相似之处，也有极其重大的差别。如果说噶尔丹占据喀尔喀荒无人烟的大片领土而需要属民，因为没有属民，土地便没有任何价值，就会毫无用处，所以他曾向玄烨要求把喀尔喀原居民送还家乡的牧区，那么策妄阿喇布坦则至少在初期需要的不是人，而正是领土，因此他要求把从前划入卫拉特国家境内的土地归还汗国，以便他的属民和他们的牲畜游牧。[3]

北京政府预见到与准噶尔的战争不可避免，并清楚地意识到在当地完全没有任何军队供应基地的这种遥远地区作战是十分艰巨的，便开始寻找同盟者，想借助他们使这个不驯服的汗国屈服。1712年派往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76页。

〔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76页。

〔3〕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80页以后；波兹德涅耶夫：《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史》，第260页以后；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90页；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要》，莫斯科，1957年版，第68页以后。

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阿玉奇处的图理琛大臣的外交代表团，就是这种初次尝试。一些史料说，早在1709年，北京就想利用阿玉奇作为同盟者来反对策妄阿喇布坦，当时阿玉奇的代表为了查明阿喇布珠尔的下落曾到过北京。当时在北京的俄国商人胡佳科夫曾被满洲政府的大臣邀去，请他通知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关于他们的使者即将前往伏尔加河的事。加加林在给外交事务部的报告中写道："中国为何遣使，商人未能知悉，他们只约略表示阿玉奇的一位亲戚16年前就在中国并已经供职8年，似乎遣使就是为了这件事。不过，显然是为了更重大的事情，因为中国一般从来不往任何地方派遣使者。据有些中国人透露，是为了劝诱阿玉奇跟中国人一起打卡尔梅克领主浑台吉……若没有阿玉奇参加，中国[皇帝]没法独自打他。"[1]1712年6月26日，政府枢密院决定同意中国使者到伏尔加河会见卡尔梅克汗，但预定，如果他们"招引阿玉奇去攻打卡尔梅克领主浑台吉，那就告知阿玉奇不要去，因为浑台吉跟沙皇陛下很和睦"[2]。

340 清人唆使阿玉奇攻打准噶尔汗国的企图没有成功。不只由于俄国当局的"忠告"，而且卡尔梅克汗国执政者本人也不倾向于攻打策妄阿喇布坦，这些情况决定了图理琛使团的失败。

策妄阿喇布坦的军队和清帝国的军队间的战争一直延续到玄烨生命结束(1722年)，一般说来这在文献中阐述得相当充分。[3] 我们只提一下，这场战争对清帝国来说，是艰巨极了。它的军队几遭失败，大量的军事开支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状况，接连不断地压在喀尔喀身上的苛捐杂税、徭役贡赋使喀尔喀居民怨声载道，日益不满。至于准噶尔汗国，它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不能不促进汗国局势的稳定和策

---

[1]《彼得大帝在位时政府枢密院发出的报告和判决》，第2卷，第2册，第353页。

[2]《彼得大帝在位时政府枢密院发出的报告和判决》，第2卷，第2册，第353页。

[3]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83页以后；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94页以后；乌斯宾斯基：《库库淖尔地区或青海》，第174－178页；代西德里：《关于西藏的记述》，第147页；罗克希尔：《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第37－41页；佩特奇：《18世纪早期的中国和西藏》，第28－30页；贝尔：《西藏的今昔》，第39－40页。

妄阿喇布坦本人地位的巩固。可能就是在这些胜利的影响下，这位汗国执政者实际上就产生了要占领整个喀尔喀的愿望，而不只限于以前属于卫拉特的喀尔喀西部。对这个问题我们到后面再谈。

1716年末，策妄阿喇布坦企图占领西藏。他利用西藏和库库淖尔接二连三的叛乱和内讧，派出一支由大策凌敦多卜指挥的军队开往拉萨。1717年9月，西藏的这座主要城市被卫拉特人侵占；准噶尔汗成了西藏的实际主人。

但是清政府不能容忍喇嘛教的中心和喇嘛教的领导权转入卫拉特的汗和王公们之手。1719年，玄烨便动员了大批军队开进西藏。1720年春天，卫拉特军队战败，于是在西藏的卫拉特军队被肃清了。清廷行政当局对西藏敌视清人的分子采取了一项根本性的措施，即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给过噶尔丹或策妄阿喇布坦某种帮助的人。西藏重新并入清帝国。但是在准噶尔本土，清军依旧屡遭失败，不过这也没有给准噶尔汗国带来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拖延了下来。军事行动几乎一到每年春天便重新开始，而严冬来临时又暂时停止，到第二年春季再次开始。虽然准噶尔汗国基本上是在自己的本土或邻近本土的地区作战，因而在部队供应方面遇到的困难比较小些，但是战争也大大动摇了这个国家落后的经济。

341

1716—1720年，俄国与准噶尔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时形势就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已经提到过，策妄阿喇布坦在执政初年曾为调整与俄国邻接地区所积累的许多冲突做过不少努力。但是后来，随着地位的巩固，他开始日益加深地从让步转为苛求。实物税的问题又成了第一位的争议问题，策妄阿喇布坦又恢复了原来的政策：派人到俄国当局认为是臣服俄国的那些地区和州县去征收实物税。但是过了不久，在这个老的争论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与18世纪初开始的俄国居民点和军事防御线迅速向南部的额尔齐斯河与叶尼塞河上游推进有关的新问题。在某些边境地带开始发生冲突，互相抱怨和不满更加频繁。

1713年底，加加林派切列多夫到策妄阿喇布坦处要求准噶尔汗停止向巴拉巴州的居民征收实物税，并严惩1710年侵袭俄国城市的准噶

尔属民，这座城市位于比亚河与卡通河之间，经过3天的战斗之后，侵袭者破坏了这座城市。[1] 策妄阿喇布坦答复切列多夫说，巴拉巴人自古以来是他们汗的属民，俄国人使汗国及其居民深受委曲，并说“比亚
342 河与卡通河上有一个修有鹿砦的沙滩，即他们的土地，他们破坏了那个鹿砦，并不准重修”[2]。策妄阿喇布坦派了一名使者携带致加加林的信件随同切列多夫去托博尔斯克。其中一封信说道：“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库兹涅茨克等城建造在他们的土地上，应该拆走，否则，他将派兵攻占这些城市。”[3]

自切列多夫使团起，双方开始专门就领土争端和确定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的国界问题，不断互遣代表团、双方交换文件和进行谈判。

直到1758年汗国灭亡时为止，这些谈判还没有完结。

由于加加林的冒险计划，俄国与准噶尔的关系，性质特别尖锐，他力求侵占东土耳其斯坦西部的叶尔羌河地区，据传说，那里有丰富的金矿。加加林向彼得一世呈交过一份从额尔齐斯河到叶尔羌河修建一连串防御点的计划草案。这位西伯利亚总督在说服彼得一世确信其草案的现实性时，明显地低估了一种情况，即所谈的领土大部分是属于准噶尔汗国的，而这个汗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不打算把这些土地让给俄国沙皇。

我们不打算详细阐述跟布赫戈利茨考察团有关的事件，因为当时米勒已经对这些事件做过详尽记述。我们只提一下，加加林的计划曾得到彼得一世的赞许。1714年5月22日，当这位沙皇率领准备同瑞典海军进行海战的舰队驻扎在喀琅施塔得时，签署了任命中校布赫戈利茨为考察团团长的命令。8月，布赫戈利茨便离开了莫斯科。11月30日，他到达托博尔斯克。1715年7月，他率领一支2932人的队伍，
343 偕同一大批俄国商人从这里出发。1715年10月1日，考察团到达亚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年，第2卷，第44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595－1736年，第1卷，第14－15张；也可参看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亚洲卷宗，1713－1742年，第8卷，第1－2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595－1736年，第1卷，第14－15张；也可参看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亚洲卷宗，1713－1742年，第8卷，第1－2张。

梅舍夫湖，在那里开始围筑鹿砦，并留下过冬。[1]

这时策妄阿喇布坦对考察团的目标所抱的否定态度已经完全明确了。布赫戈利茨到达托博尔斯克时，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也正在那里，尽管加加林还企图使这些使者相信，考察团并无征服目的，它的任务只是勘查矿藏，然而俄国人的队伍向额尔齐斯河上游推进并在亚梅舍夫湖附近修建要塞却真使卫拉特执政者惊恐万分。

1715 年 12 月，布赫戈利茨向彼得一世报告了事情的进展情况和他们碰到的困难。沙皇在哥本哈根收到了这份报告，1716 年 2 月 4 日，他从这里发出复示，其中一再强调这个考察团的重大意义。彼得一世写道："您的信于 12 月 27 日收悉，信中说，你们到达了额尔羌（指叶尔羌。——兹拉特金），人少，很不安全，因为有浑台吉的军队。鉴于曾给总督加加林公爵就此事各有关事项发过旨令，并附有你的呈文副本，同时后来他到彼得堡时，又令他不仅要执行命令，而且要亲自为这事专程去你们那里，以确定全部真实情况，所以现又给他发函确认这一切全属必要。"在信末"又及"中，彼得一世补充说："至于你所提的士兵逃跑问题（因为西伯利亚当局对所有闲散人员都一概接受，让他们自由居住），已函告总督加以禁止。"[2]

1715 年冬天，布赫戈利茨派了中尉特鲁勃尼科夫携带书信一封去见策妄阿喇布坦，企图打消对考察团的目的和性质方面的疑虑，但是特鲁勃尼科夫遭到哈萨克人的侵袭，被他们拘留而当了将近一年的俘虏。布赫戈利茨的信也就未能交给策妄阿喇布坦。编年史作家切潘诺夫写道："即或他收到这封信，也不见得能打消疑虑而不听信已经纷纷传说的有关俄罗斯军队进入他的国土的流言。"[3]1716 年 2 月 9 日，一支近万人的卫拉特军队，由策凌敦多卜率领逼近亚梅舍沃要塞，用突袭占领的尝试失败之后便转入包围。2 月 21 日，策凌敦多卜致函布赫戈利

344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96 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 1 卷，第 145、147、152 张。

[2]《彼得一世给一位上校的信》，载《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历史与古物皇家学会读物》，莫斯科，1868 年，第 2 册，第 5 部分，第 14 页。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 196 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 1 卷，第 157 张。

茨，其中写道，从前准噶尔汗与俄国沙皇“和睦相处，进行贸易并互致慰问。那时俄国人经常往返，从未修城”。而现在他们却擅自背着沙皇在卫拉特的国土上修起了城市。策凌敦多卜要求俄国人撤走，否则“我将围困城堡，不准你们的人外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住在其中……待你们粮尽挨饿时，我定将攻占此城。……如果撤走，则像从前那样进行贸易，和睦而友爱地生活。”[1]

托博尔斯克派给布赫戈利茨的增援部队全被卫拉特军队捕获。为了调停冲突，加加林于1717年2月派了中尉切列多夫到准噶尔汗那里去。但是策妄阿喇布坦十分气愤，以致对接待俄国使者的事连听都不想听，而把这位使者整整扣押了5年。[2]

哈萨克的汗和苏丹们企图利用俄国与卫拉特的紧张关系。1716年9月11日，“代表全哈萨克玉兹”的两名使者来到加加林处，送回了一年前被布赫戈利茨派到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去的特鲁勃尼科夫中尉。据使者说，特鲁勃尼科夫被卫拉特人抓住，遭到他们抢劫并被禁闭了起来。哈萨克人把他从卫拉特人手中夺回，现送他回国。不过使者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俄国人与哈萨克人取得和解，以使之共同攻打卫拉特人。“他们的汗和整个哈萨克玉兹愿与沙皇陛下的属民和睦相处……如果
345 沙皇责令他们哈萨克玉茨跟俄国人一起，或让他们单独进攻卡尔梅克领主浑台吉……则他们的汗和全玉兹有两三万人常备待命。”加加林认为不宜拒绝哈萨克执政者的建议，因为“这个邻居比卡尔梅克领主还近……而且对于后者，来自哈萨克玉兹的危险……也是……经常的”。加加林回答说，“西伯利亚省不会发动对哈萨克玉兹的战争……倒同意他们去打卡尔梅克领主。如果将来沙皇陛下命令派兵去打浑台吉，即可协同作战，到时再通知他们”。这位西伯利亚总督的用意很简单，“如果卡尔梅克领主了解到哈萨克玉兹进攻他有皇上陛下的配合，

---

[1]米勒：《关于沙金、为沙金进行的活动以及在额尔齐斯河修建鄂木斯克、热列津斯克、亚梅舍沃、谢米巴拉丁斯克和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等要塞的情况报道》，载《有益的娱乐性作品与译文》，圣彼得堡，1760年，1、2月，第45－46页。

[2]参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167张。

则建城的事就会遭到反对，所以我不希望卡尔梅克领主跟皇上的人打仗”。最后，加加林请求彼得一世发函给策妄阿喇布坦，证明建城的事不是西伯利亚当局自作主张，而是根据他的命令行事的。[1]

彼得一世在去荷兰途中收到加加林的报告。他批示说：“按他的意愿发函。不过如果他们安分守己，就不要同他们打仗。”1716 年 12 月 18 日，彼得一世签发了一封致准噶尔汗的信，其中说，他已命令加加林“在西伯利亚地区，额尔齐斯河沿岸和斋桑湖，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探寻金、银、铜矿，并为此在需要的地方筑城”。现在他，彼得了解到，“您，浑台吉和自己的兀鲁思人在上述地区附近有住所，因此，望您对筑城不要进行任何阻挠，而给予必要帮助……我们……希望您也像阿玉奇以及其他卡尔梅克领主一样，同沐皇恩，可以允许您和您的属民随意在那些地方居住，尽管那些地方属于我西伯利亚边区”。以后彼得一世又通知策妄阿喇布坦，说他已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如果您安分守己，在筑城和寻矿方面不加任何阻挠，就绝不会从那些地方被驱逐……我们的属民也绝不会进行任何破坏和欺凌，而且还命令保护您免受外敌的侵犯”[2]。 346

1717 年 3 月 7 日，彼得一世的信随维利亚诺夫捎往策妄阿喇布坦处，加加林又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致汗国执政者的信交他带去。但是已经不可能挽救布赫戈利茨考察团了。1717 年 4 月 28 日，亚梅舍沃残余的驻防军（约 700 人）破坏了要塞，上了船，没有受到卫拉特军队的任何进攻，便沿额尔齐斯河撤往托博尔斯克。这个考察团沿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途中在鄂木河口建筑了要塞和鄂木斯克城。

1717 年 6 月 27 日，维利亚诺夫受到策妄阿喇布坦的接见，这时汗的牙帐设在穆扎尔特山下。准噶尔汗对俄国当局的行动依然十分不满，一直把维利亚诺夫看管到 1718 年 2 月底。1718 年 3 月 1 日，他才又接见了这位使者。汗对使者抱怨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拉斯诺

[1]参看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第 122 号档，吉尔吉斯—哈萨克卷宗，1716 年，第 3 卷，第 1－2 张反面。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595－1736 年，第 1 卷，第 16－17 张。

雅尔斯克的管事人在他的土地上筑城并要他的属民交实物税。他把维利亚诺夫放回托博尔斯克,并交给他一封致西伯利亚总督的信。这时汗的牙帐已在霍尔果斯河上。[1] 策妄阿喇布坦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要俄国当局停止向他的属民征收实物税,并拆去在他的土地上建筑的城堡。

这时准噶尔汗国的形势使它的执政者不能真的冒险牺牲同俄国的和平关系。他们正面临一场同清人争夺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南部地区的斗争,同时哈萨克汗和苏丹的进犯也在预料之中,这些汗和苏丹力求恢复自己在谢米列契的地位,并从那里赶走卫拉特封建主。在西藏的失败,接着哈密、吐鲁番两城又于同年被清军占领,这在准噶尔汗国执政者的牙帐中引起了惊慌。他们已经看清,不能对清朝、俄罗斯帝国和哈萨克汗这三大强敌同时进行有效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卫拉特封建主不得不对俄国做出巨大让步。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同利哈列夫考察团的联系上。他是1719年由彼得一世派来调查加加林的活动的,同时还受命"尽可能达到斋桑湖……傍湖筑造要塞……但不要发生战斗,以免徒有伤亡和招致其他损失"[2]。

347

1720年5月,利哈列夫带领一支由440人组成的小部队从托博尔斯克出发,顺利地到达斋桑湖。在湖畔游牧的卫拉特居民一看到俄国人,就向内地逃去。在斋桑湖地区留有卫拉特军队约两万人,守卫汗国边界,以防清军可能的进攻。指挥这支军队的是策妄阿喇布坦的儿子和继承人噶尔丹策凌。

编年史作家切列潘诺夫写道:"大家听说来了俄国人,都非常吃惊,因为他们以为,俄国人同中国人约定在这里会师,联合攻打卡尔梅克人。"但是,当弄清了来的只是俄国人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之后,卫拉特军队就在8月1日开始从湖岸上向载有俄军的船只射击。8月2日,根据卫拉特方面的倡议双方开始谈判。卫拉特人坚持要俄国

[1]参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183-184张。

[2]维谢洛夫斯基:《18世纪西伯利亚历史文献》,第2册,第183页。

人后撤。俄方代表回答,“他们从来不想打仗或肇端敌对行动”,他们仅仅对额尔齐斯河上游进行调查并勘探“采矿地点”。和平恢复了,双方互相祝贺。“许多卡尔梅克人高兴俄国人踏上归程,都来欢送俄国船只。”[1]利哈列夫在返回托博尔斯克途中,修筑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

这时,1716年由加加林派往准噶尔的中尉切列多夫仍然留在策妄阿喇布坦的牙帐中。这位汗得到斋桑冲突已经和平解决的报告后,十分高兴。他把切列多夫叫到跟前,对他诉说他和他的属民所受的屈辱,由于这些屈辱才发生了争端,并谈到他为了消除冲突的根源,把争议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和惕列古特人都撤走了,而这时俄国的部队却进入了卫拉特国家境内,并在亚梅舍夫湖旁筑城。他在强调愿与俄国友好相处并和平贸易时,同意不阻碍探矿。作为交换条件,策妄阿喇布坦请求:“(1)保卫他免受中国人和蒙古人的侵袭,则他将像阿玉奇汗那样生活;(2)从中国人那里把蒙古人夺回交给他,就像把满古特人交给阿玉奇那样;(3)让他照旧向那些老属民征收实物税;(4)不接纳从他那里逃走的卡尔梅克人并交出他们。”策妄阿喇布坦对切列多夫说:“100年前,使者们曾对领土划过管辖范围,沿鄂木河、鄂毕河黑岬为界。”他表示答应“俄罗斯人在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河汊处修筑要塞——额尔齐斯河上游这一带用来建造要塞是再合适不过了。希望尽快行动,不要让中国军队占去而在那里修堡。并希望让他浑台吉及其属民在谢米巴拉特要塞附近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自由游牧”[2]。

348

策妄阿喇布坦同切列多夫的谈话描绘出1720年准噶尔汗国的外部局势。当时汗国的军队在西藏战败,清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哈密和吐鲁番并威胁焉耆,这严重地威胁到汗国的生存。当时哈萨克汗和苏丹们为了夺取谢米列契也准备进行新的战斗,而“俄罗斯人”也一直在不停地扩充自己的领地,已接近到塔尔巴哈台山和萨彦岭。在这种情况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1卷,第201-205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595-1736年,第1卷,第22-24张。

下，准噶尔执政者决定依靠俄国，打算借俄国的帮助来反击他认为是主要敌人的清军。他请求派来军队，并在据说仿佛是卫拉特的土地上——斋桑湖以北沿黑额尔齐斯河建筑要塞。

349 准噶尔汗国执政者所提出的纲领还包括这样的条款：由俄国保证卫拉特封建主有向他们的克什提姆征收实物税的权利；遣返逃犯——主要指不堪封建剥削的重压而逃入俄国境内的卫拉特劳动人民；最后，向清人“夺回蒙古人”，即喀尔喀的蒙古居民，并转交给卫拉特汗管辖。这就是“像阿玉奇汗那样”，即转入俄国国籍的讨价。值得注意的还有策妄阿喇布坦提出的关于俄国与卫拉特划过国界的说法。仿佛是在17世纪初曾沿鄂木河至鄂毕河黑岬一线划定过两国边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说法在后一时期的俄国与准噶尔的关系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为了就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策妄阿喇布坦派了博罗库尔干到俄国去，他于1721年到达彼得堡，并于同年9月晋谒彼得一世。在由博罗库尔干转交的致沙皇的函中，策妄阿喇布坦请求“沙皇陛下保护他浑台吉免遭中国汗的侵凌”[1]，博罗库尔干又代表自己的汗口头请求派遣两万左右俄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汗就能够借助这支军队“解除由于中国方面的压迫而受到的威胁”，并占领喀尔喀。博罗库尔干在谈判时又一次提出了策妄阿喇布坦在致沙皇的信中谈到的关于准噶尔汗国与俄国的疆界问题。他们指出，从前卫拉特人游牧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没有人排挤他们，而现在俄国人却在那里筑起了要塞。为了避免争议和冲突，准噶尔汗从那些地区撤走了臣属于他的居民，因此，开始感到牧地不足。他请求沙皇许可他的属民“在额尔齐斯河两岸自由”游牧。[2]

彼得一世决定利用准噶尔汗国执政者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帝国的机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2－1723年，第1卷，第11张；1731年，第2卷，第168－175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2－1723年，第1卷，第12张；1595－1736年，第1卷，第27张。

会，派使者翁科夫斯基到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去继续进行谈判。 350

但是，威胁准噶尔汗国生存的危险果然像策妄阿喇布坦和他的亲信所说的那样大吗？事实说明，汗国执政者对他面临的困难是有些夸大了，清人距离实现自己对卫拉特国家的计划还远得很。

伊兹麦洛夫的专项文件中的资料在这方面是有说服力的。他是1719年夏季由彼得一世派往中国去的。1720年6月，大臣图理琛来色楞格斯克会见伊兹麦洛夫。这位大臣按玄烨的嘱托通知说，清军将兵分5路进攻准噶尔汗国，“因为他听说，俄罗斯方面进攻浑台吉的军队已经开往亚梅舍沃”[1]。过了两天，为了回答伊兹麦洛夫的提问，图理琛补充说，指挥清军的是玄烨的一个皇子，这支军队的每个团部配有“大炮十尊，小炮百尊，用大车和骆驼载运”[2]。1720年11月初，伊兹麦洛夫这时正在距离色楞格斯克50公里的一个蒙古地方，图理琛通知他说，清军在准噶尔大捷，并夺得了几座城市，策妄阿喇布坦请罪求和的使者已经到达北京。图理琛还说，玄烨请俄国使者接见从准噶尔来的使臣，并向他说明策妄阿喇布坦的抵抗是无望的，清帝国将和俄国军队协同对付他。[3]

伊兹麦洛夫断然拒绝参与这一预定的骗局，这激怒了图理琛。他表示，如不听从，俄国使者就要被扣留，并且不供应食物。11月12日，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从城里出发上路，在城边鸣炮3声为他尊贵地送行”[4]。在同一天，伊兹麦洛夫也离开此城，向北京进发，不过他和随行人员“从城里出发时却没有受到对浑台吉使者那样的恭送”[5]。 351

上面引的这件事证明，尽管清军占领了哈密和吐鲁番，但1720年的战局对清朝却没有什么可慰藉的，战争的结局还很渺茫。这就是北京为什么伪装要同俄国沙皇进行军事合作，企图以此来影响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迫使后者投降的原因。玄烨力求使俄国与准噶尔关系恶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25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27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42－43、45－47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48张。
〔5〕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48张。

化并唆使俄国去攻打准噶尔汗国，所以他建议俄国商人去中国经商，不要走东路，即不要经过西伯利亚，而沿额尔齐斯河上行，以3个月的时间走到北京，走这条路则“利多弊少”。这一建议被伊兹麦洛夫拒绝了，不过他表示希望在清人平定准噶尔汗国之后，商人们可能会走这条路去北京。[1]

玄烨的代表们在1720年12月26日致伊兹麦洛夫的函中，说到了中国由于在准噶尔发生的战争而感到的各种困难。他们写道：“而我们现在有战事，在这方面沙皇[陛下]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只是我们的臣民遭受巨大的破坏。”[2]1721年2月11日，中国方面交给伊兹麦洛夫一件备忘录，其中第8项说：“现在同浑台吉的战争正将近结束，为此中国人要在额尔齐斯河地区建筑要塞，并派驻自己的军队……俄罗斯使者和商队可就近通过该地区。”[3]

在伊兹麦洛夫外交代表团的材料中，不时涉及准噶尔问题，而且不限于上述情况。整个说来，这些材料使我们可以肯定，在这段时间内，对准噶尔汗国的斗争是清帝国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斗争使清帝及其352背后的满、汉封建主以及支持他们的东蒙古封建主遭受巨大损失，并孕育着各种政治纠纷。清人在将近1721年前所取得的成就，是最低限度的。玄烨和他的大臣们不得不把对汗国的武装斗争同复杂的外交手腕结合起来，它旨在吸引俄国，或者至少吸引卡尔梅克汗国来参加这一斗争。清帝国当局对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所表示的尊敬：出入中国城市都鸣礼炮致敬，这一点也是引人注目的。

俄国在北京的非正式使节洛连茨·兰格的报告，也证实了上述情况。他在1721和1722两年中，常和北京的大臣们以及玄烨本人见面并经常交谈。1721年10月21日，兰格在写给彼得堡的报告中说：“同浑台吉（即同准噶尔汗国。——兹拉特金）的战争使中国人极端困难，因为，据我所知，这支由20万人组成的军队每年由于瘟疫而减少着

[1]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93、96张。

[2]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125－126张。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国卷宗，1719年，第3卷，第171张。

……且对粮食的需要量极大，以致不得不以倒毙的骆驼、马匹和其他牲畜充饥……军队大批病死迫使他们在每年开春重新补充新兵。”[1]在同一个报告中兰格又写道，玄烨要“浑台吉就破坏和平赔罪，但浑台吉不肯。他去年(1720)曾令其使节向清廷表示，如果中国皇帝同意宣布蒙古草原为自由国家，他就同意讲和”[2]。一年后，即1722年10月，兰格说：“浑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兹拉特金)根本不愿跟中国讲和，除非把哈密重新让给他，并宣布蒙古人为自由民。”[3]

可见，对于准噶尔汗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清军从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所有地区撤走，以及“解放”喀尔喀，即实际上使后者归并于卫拉特国家而建立一个在绰罗斯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蒙古国。 353

在战争进行中，卫拉特的指挥官们制定了自己的战术。卫拉特指挥部深知他们的军队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炮兵，没有进攻敌人的设防阵地的能力，所以一般只限于在开阔地带同敌人周旋。兰格向彼得堡报告，好像策妄阿喇布坦通过自己的使者在北京宣称，“如果中国军队开到他们那里来，他随时准备与之交战，因为他的民族不善于进攻中国要塞的防御墙，如果中国人离开防御墙去他们本土一带，他将立即率兵跟随前往”[4]。

战争的种种困难以及不能说服俄国进行军事合作来对付策妄阿喇布坦，使清帝及其大臣们大为恼怒。兰格报告说，玄烨的几位大臣来到他那里，表示不满俄国同准噶尔汗国的友好，这个汗国是清帝国的敌人，而俄国却又愿意同清帝国友好。大臣们坚持说：“对两帝之中的一方敌对的人，其他一方也应视为仇敌。”[5]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中关系(1721－1722年)卷宗，第2卷，第13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中关系(1721－1722年)卷宗，第2卷，第13－14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中关系(1721－1722年)卷宗，第2卷，第45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中关系(1721－1722年)卷宗，第2卷，第45张。

[5]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中关系(1721－1722年)卷宗，第2卷，第44－45张。波兹德涅耶夫对这些军事行动的总结描写得有所不同。他深信玄烨能酌情自由调整事件。他引证《圣武纪》写道，1722年，军队按玄烨命令开进乌鲁木齐，但后来又照他的命令“确定皇军继续向北推进以便占领策妄的牧区”。后来当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恳求皇帝饶恕准噶尔人”时，玄烨便“宣布逐步撤出中国军队”(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288页)。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所处的地位是最有利的，双方都需要它的帮助。因此，1722 年夏，由策妄阿喇布坦派去托博尔斯克的阿桑霍吉外交代表团便显得很有意思。这位使者向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大公叙述俄国人和卫拉特人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良好的关系，然后指出，354 当俄国人开始向额尔齐斯河上游推进，并在那里修筑城堡，把卫拉特人从他们的牧区赶走之后，这种关系才恶化起来了。现在策妄阿喇布坦得悉，俄国打算派兵来反对他，如果消息可靠，俄军要来压迫他，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归顺清帝国并入清籍。大公切尔卡斯基对阿桑霍吉表示，俄国沙皇从来不曾想到过派兵去打准噶尔，散布这类消息的只能是那些想恫吓策妄阿喇布坦而迫使他归顺清帝的人。[1]

翁科夫斯基外交代表团出使策妄阿喇布坦处，是 1722—1723 年间俄国与卫拉特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不准备谈这个代表团的历史，因为和它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在当时已经由维谢洛夫斯基发表了。据知，代表团的目的是要说服策妄阿喇布坦向托博尔斯克派全权代表，以便签订关于他自愿根据像阿玉奇汗那样的条件转入俄罗斯国籍的条约。给翁科夫斯基的指令第 5 款说，将来此项条约签订之后，“陛下就可以下令像保护自己的臣民一样保护他免遭别人侵犯，并可首先发函说服中国皇帝不要欺凌浑台吉，因为他已是皇上的臣民。假如中国皇帝不听，则要设法用强力迫使他同意。对于浑台吉的其他敌人，皇上可以用武力防御。可令其他邻近民族听从浑台吉管理，这方面有西伯利亚的军队予以协助”[2]。

但是，翁科夫斯基的使命并没有完成。策妄阿喇布坦拒绝转入俄罗斯国籍，并且没有接受翁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关于在汗国领土上修筑要塞并派俄军驻防其中的建议。这种急转直下变化的态度，是由于并355 入俄国的计划始终遭到准噶尔汗左右的一些权威人物的反抗造成的。这个计划的反对派由于玄烨之死和胤祯即位而大大加强了。策妄阿喇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2－1723 年，第 1 卷，第 2－3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2－1723 年，第 1 卷，第 15 张。

布坦对翁科夫斯基的回答很能说明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说："原先他曾请求修城，因为中国人当时攻打他的兀鲁思，而现在中国老皇帝死了，其子登位，并遣使来表示希望依旧和睦相处。同时蒙古与和硕特（来自库库淖尔。——兹拉特金）的使者也抱同样的目的来过。而且现在中国人的情况很糟，为此，现在他浑台吉已不需要城市了。"[1]

策妄阿喇布坦又一次把关于征收实物税和关于边界这些老的争论问题提到了第一位。他对翁科夫斯基说："他们怀疑，并且认为，一旦额尔齐斯河被拿下，就会逼近他们。"[2]无疑，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俄国居民线一意向前推进使策妄阿喇布坦和准噶尔的许多其他领主异常惊恐。

策妄阿喇布坦又派了一位使者多尔济随同翁科夫斯基去俄国。这位使者于1724年4月4日在彼得堡受到彼得接见。在谈判进行中，多尔济没有受委托谈判有关准噶尔转入俄罗斯国籍以及俄国人在汗国境内勘查矿藏等问题。他受权谈的只是希望俄国和准噶尔汗国和谐相处，希望彼得一世发布命令，一旦策妄阿喇布坦遭到进攻时来保护他，希望俄国当局把从准噶尔逃来的人遣返回去。这位使者的使命只此而已。1724年9月28日，多尔济得到彼得一世致策妄阿喇布坦的只泛泛表示同意维持传统友谊的复函以后，就启程回国了。[3]

显然，由于玄烨之死在汗国东部边界上所出现的平静局面，又使汗国执政者的对外政策回到了惯常的轨道。在南西伯利亚的争议地区又出现了由策妄阿喇布坦派去的征收实物税的人[4]，他的使者于1726年在北京又一次提出了把哈密、吐鲁番和划入喀尔喀的疆土还给汗国的问题。[5] 卫拉特封建主对谢米列契地区哈萨克牧地的逼攻加紧了。1723年，策妄阿喇布坦聚集大量兵力，重重打击了哈萨克斯坦的大玉 356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6年，第2卷，第21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6年，第2卷，第21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4－1725年，第2卷，第1－36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4－1726年，第6卷，第1张。
[5]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320页。

兹和中玉兹各领地，征服了其中的大部分，使之变成自己的进贡者。[1]

有理由认为，就是在这些年策妄阿喇布坦也没有放弃使喀尔喀归并于准噶尔的念头。波兹德涅耶夫援引喀尔喀爱马克的大事记中的话说，准噶尔汗利用每一个得到的机会，发动喀尔喀居民起来反对清朝当局。为此目的，汗"经常鼓动被满洲人俘去而散住在喀尔喀各牧区的厄鲁特人和乌梁海人骚动……这类在准噶尔人影响下发生的骚乱……，在喀尔喀各地几乎每年都有，并一直延续到策妄阿喇布坦死去"[2]。

1723年，在库库淖尔爆发了一次由顾实汗的孙子罗布桑丹津领导的和硕特领主的大暴动。暴动的目的是要推翻清政权并恢复过去和硕特领地的独立。暴动者与准噶尔的卫拉特国家保持着接触。不过，过了一年，这次暴动就被清军镇压下去了。罗布桑丹津本人在策妄阿喇布坦处找到了藏身避难的地方，后者坚决拒绝了北京当局关于交出逃犯的要求。

这几年，准噶尔汗国同清帝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处于休战状态。1725年8月，兰格从北京写信给彼得堡说，清军撤离了准噶尔边界，"不过中国汗和浑台吉之间还没有媾和，因为浑台吉要求退还从他那里夺去的布哈拉省的哈密和吐鲁番，而中国人却不愿让出来"[3]。曾领导俄罗斯外交代表团同中国进行谈判，结果于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的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1727年5月在他的分项文件中也写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中国人还未跟浑台吉媾和，因为他们不肯交出从浑台吉那里夺去的城市，为此浑台吉不愿讲和。不错，他们的军队守着这一地盘，浑台吉没敢进行决战，尽管中国人从未超过44000人，不过他们宣扬说似乎有20万人，而浑台吉一批批地消灭了大量敌人。"[4]

357

---

[1]列夫申：《吉尔吉斯—哥萨克（或吉尔吉斯—哈萨克）汗国和各草原记述》，第79－82页；《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234页。

[2]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320－321页。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俄关系卷宗，1725年，第3卷，第31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俄关系卷宗，1725－1729年，第62/1号，12a卷，第1部，第450张。

关于策妄阿喇布坦执政时期卫拉特国内人民群众的状况，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少。但是从一个卫拉特逃亡者的讲述中，可以对此问题略悉梗概。他是1726年5月逃到上额尔齐斯要塞的，从那里被遣送到托博尔斯克。这个名叫拜司哈朗的卫拉特人生于巴颜·乌兰地区。他的父亲死于准噶尔汗的牙帐中，他的哥哥4年前决定逃往伏尔加河，但被抓住，“挨了鞭子，并用炽铁在双颊和额头上烙了印，还涂上了墨水……拜司哈朗本人那时还年幼，所以没有动他”[1]。我们曾提到过的跟翁科夫斯基的妻子谈过话的那个卫拉特女人说，由于同中国打仗，向属民们“征收骏马和各种牲畜”送往那里（指前线——兹拉特金），因此他们现在赤贫如洗……那里现在是否还有许多军队，她不知道。只是8年前（谈话是在1723年。——兹拉特金）那才真是胆战心惊。不过她没说因为谁的缘故。她又说：“我有舌头和智慧，但不敢说，不敢做，因为禁止大家跟俄国人讲任何事情，不然要处死……现在我们大家都为跟俄国人恢复了往日的友谊而高兴，在这以前总盼望我们能被人抢走运到外国去。”[2]

358

我们所引的卫拉特社会这两个普通成员的谈话，描绘出准噶尔汗国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他们无依无靠，饱受奴役，卫拉特封建主却依靠他们进行战争并发财致富。

1727年末，策妄阿喇布坦死了。此讯最初是由中士伊里音于1727年12月13日送到托博尔斯克的。他奉总督之命，去准噶尔谈判把1716年亚梅舍沃战斗中被卫拉特人抓去的俘虏和抢走的财产交还给俄国的问题。据伊里音讲述，策妄阿喇布坦的继承人噶尔丹策凌怪罪他的继母谢特尔扎布——故汗之妻，同阿玉奇的几个派到汗的牙帐来的使者共谋毒死了他的父亲。许多档案文件证实并补充了伊里音的这段话。从这些文件中弄清，这场悲剧的开端要上溯到1723年，当时策妄阿喇布坦派了一位使者去伏尔加河，撮合自己的女儿嫁给阿玉奇汗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6年，第1卷，第4张。

[2]维谢洛夫斯基：《派往准噶尔洪台吉处的使团》，第149页。

的儿子;为了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谈判,于1724年从伏尔加河又派了宰桑叶和阿布盖去准噶尔撮合策妄阿喇布坦的几个女儿嫁给阿玉奇汗的其他3个儿子。策妄阿喇布坦亲切地迎接了卡尔梅克使者,并答应"送自己的女儿们前往就亲,还以百名少女陪嫁,并派8000人护送"[1]。1727年又有几位新使者从伏尔加河派到他这里来,这些使者到后,准噶尔汗暴亡。阿玉奇汗的使者们被怀疑毒死了策妄阿喇布坦。于是惩治开始了。噶尔丹策凌处死了卡尔梅克外交代表团的4个成员,把两个流放了,把叶和阿布盖也关入监狱,折磨了一年,最后把他的继母谢特尔扎布和她的3个女儿酷刑处死。[2]。他继母的儿子罗卜藏索诺,噶尔丹策凌的异母兄弟,还在出事前就逃到了伏尔加河,因而得免于死。卡尔梅克汗国最高喇嘛硕呼尔喇嘛于1726年2月就对少校别克列米舍夫说过,罗卜藏索诺从准噶尔逃走是因为:"他哥哥(即噶尔丹策凌。——兹拉特金)……要聚兵打他,他出于害怕投奔我们。现因亲属身份(阿玉奇汗的孙子。——兹拉特金)深受尊敬,与他同来的有8个人。"[3]

359

罗卜藏索诺本人则解释他来伏尔加河的原因说,"他索诺是死去的阿玉奇汗的外孙,来卡尔梅克兀鲁思是因为他在其父浑台吉的兀鲁思时,兀鲁思全军都爱戴他,希望他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浑台吉的大儿子——索诺的异母兄弟对此很嫉妒,就向他俩的父亲——浑台吉蓄意进行挑拨,从而造成索诺跟他父亲之间的仇恨,浑台吉便决意杀死索诺"[4]。

准噶尔新汗噶尔丹策凌对索诺的逃跑和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另有一番解释。他派赴俄国的第一位使者博吉尔于1727年12月13日来到托博尔斯克,1728年2月1日到达莫斯科,并由彼得二世接见。他递交了本国汗的一封书函,函中写道:"我弟弟去卡尔梅克后与敦多卜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7-1729年,[6·н·]卷,第80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9年,第8卷,第73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6年,第6卷,第159张反面。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9-1730年,第16卷,第22张。

鄂姆布联合，给我继母捎来毒药，想害死我。继母不敢来毒死我，怕被我父察觉，她要遭大祸，便想毒死我父亲。她果真下了毒手，我父便中毒而死。”[1]

这样或那样涉及上述事件的文件虽多，但终归没弄清：什么原因使得叶和阿布盖在准噶尔汗的牙帐留住了两年多之久？1727 年从伏尔加河又遣使去策妄阿喇布坦处是为了什么目的？毒品在全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对谁、由谁和为了什么目的下毒？一些史料的记载使我们能够讲出一种揣想，即关于结亲的谈判不是叶和阿布盖使团和其他卡尔梅克汗国代表来的唯一目的，预定结亲这件事本身只是为了达到某些更为重大的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可能与卡尔梅克领主们从伏尔加河回准噶尔的计划有关。我们在前面已经根据文件谈到过，在 18 世纪 20 年代，卡尔梅克汗国某些较有影响的人物极力拥护返回准噶尔的想法。我们本可以大量罗列出证实这种情况的文件[2]，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题目不属于我们的任务。只提一下，这类计划对策妄阿喇布坦来说应该是最满意的，而一些不满意俄罗斯当局行动的卡尔梅克王公也拥护它。

360

像卫拉特社会那样落后的封建社会中，执政者的更迭在统治阶级中几乎总是要伴随产生一些程度不同的重大内部纠纷。纠纷的原因是争夺继承权。牙盾尖锐的程度、它们持续的久暂和深度直接取决于斗争集团的力量对比。得胜的集团一上台执政，就从镇压竞争者来开始自己的活动。

在准噶尔汗国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策妄阿喇布坦死后在汗的牙帐里展开的尖锐斗争，谈到噶尔丹策凌如何用处死、流放和其他刑罚来对付那些参与阴谋和毒死准噶尔汗的嫌疑犯。史料记载使我们能够推测，这些事件基本上起因于噶尔丹策凌和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7－1729 年，[6·н·]卷，第 58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3 年，第 8 卷，第 29－30 张；1723 年，第 6 卷，第 304 张反面，第 345、355 张；1726 年，第 9 卷，第 10 张反面；1727 年，第 5 卷，第 300 张反面；1728 年，第 10 卷，第 73－75 张。

他的同父兄弟罗卜藏索诺这两个集团的争权斗争。噶尔丹策凌集团胜利了,与之为敌的人或被消灭,或使之不能为害。但罗卜藏索诺本人却逃往伏尔加河,像噶尔丹策凌不无根据地预料到的那样,他从那里还可能进行争夺汗国政权的斗争。这就是噶尔丹策凌竭尽全力要抓住逃往卡尔梅克汗国的这位竞争者的原因。

361 为此目的,噶尔丹策凌曾致函卡尔梅克汗国执政者,函中除通知有关被揭露的阴谋和他对参与阴谋的人所采取的措施以外,还写道:"若尚未忘怀我们祖先……从和鄂尔勒克至今的友情并愿共享幸福,则请将索诺和敦多卜鄂姆布(罗卜藏索诺的岳父和同盟者。——兹拉特金)两人逮捕后交出,我要向他们报仇雪恨。"[1]噶尔丹策凌也曾不止一次地向俄国政府要求引渡索诺和他的妻子儿女。罗卜藏索诺一死,这件事才算自然了结。1735 年 7 月,正式通知来外交事务部进行谈判的准噶尔汗的使者说:"该索诺已死,没有留下子女,而他的妻子……因为是俄罗斯臣民……不应引渡。"[2]

噶尔丹策凌在内外政策方面严格遵循策妄阿喇布坦的路线。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也关心发展农业和各种手工业,这些在他当政时期都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去过准噶尔或者在那里住过的俄国使者、商人和手艺人等目击者的许多记载,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1729 年从西伯利亚派往准噶尔汗处的翻译人员埃蒂格罗夫就曾在自己的旅途札记中写过,在塔尔金山口一带"有布哈拉人和卡尔梅克人在浑台吉领地上耕地",他是"沿察罕乌苏河右岸傍着布哈拉人的耕地走的"[3],他在伊犁河与额敏河的谷地以及塔尔巴哈台山区也看到了耕地。

1731 和 1732 年曾在噶尔丹策凌领地的俄国使者乌格里莫夫少校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入了许多有趣的见闻和观察所得。根据他的记载,在伊犁河谷塔尔金山口左近用小型沟渠从伊犁河取水灌溉耕地。在古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32 年,第 6 卷,第 139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35 年,第 1 卷,第 69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9 - 1730 年,第 1 卷,第 60、73、76 张。

尔布利金河谷有布哈拉人耕种土地，他们在那里筑有“板泥”住房，看起来是自成村落的。[1] 362

汗的牙帐近旁就有一座园子。乌格里莫夫写道：“我到过这个园子，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布哈拉人，他奉主人之命看守园子……园子里的树木品种繁多。上述园子周围约3俄里长，围以1俄丈多高的砖墙。”[2]根据乌格里莫夫证明，在准噶尔，这样的园子相当多。这些园子是由布哈拉人，即出身于东土耳其斯坦的人，一手建立起来并侍弄着的，但是却属准噶尔汗和卫拉特贵族所有。噶尔丹策凌把一座园子送给了一个瑞典军官列纳特作领地用。他是布赫戈利茨考察团的参加者，1716年被卫拉特人俘虏，在准噶尔组织制造大炮和臼炮。[3] 1732年9月，乌格里莫夫又访问了一个属于噶尔丹策凌本人的园子，这个园子坐落在伊犁河谷哈沙图诺尔湖畔。“园子围有砖墙，周围约5俄里或更多一点……其中还有不少其他砖砌的建筑物和禽舍……后来又给看了一些植有颇多果树和蔬菜的园子。”[4]

在噶尔丹策凌执政时期，准噶尔汗国的农业和园艺总共有多大规模，靠国内的生产对汗国农产品的需要到底能满足到什么程度，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掌握资料。但是可以不夸大地认为，在噶尔丹策凌执政时期，也像他的父亲和祖父执政时期一样，种庄稼是受奖励的，从事农业的不仅是“布哈拉”[5]人，也有卫拉特人，虽然前者的数目比起后者来大概要超过许多倍。此外，在卫拉特封建贵族中间，由东土耳其斯坦移民经营的园艺业也得到了推广。封建赋税和徭役往往消耗直接生 363
产者的绝大部分劳力，这大大阻碍了农业在汗国基本居民中的发展。特举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所记载的一件事为例。1744年末，一个卫拉特臣民对俄国哥萨克波伊洛夫说：“一位准噶尔宰桑来到坎斯克州，传达准噶尔领主噶尔丹策凌的命令，要准噶尔各州以及在塔乌捷列古特人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6张、115张反面。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6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37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99张。
[5]布哈拉人是当时沙俄对从新疆移去的维吾尔族人的称呼。——译者

中，每 50 人交纳 33 件皮袄”[1]。战争对汗国经济的影响特别严重。有劳动力的男性居民往往全部被拉去打仗，在牧区留下的只是老人和妇孺。1732 年 12 月 1 日，乌格里莫夫少校写信给西伯利亚总督说：“今年夏天，他们那儿只剩下一些教士和布哈拉人，还有少量被他们领主经常带去打猎的卫拉特人。兀鲁思的其余卡尔梅克人连小孩全被打发去为反对中国人和哈萨克玉兹服役了。”[2]

噶尔丹策凌曾做过不少努力来改善汗国已有的手工业和搞好几项新生产。中士伊里音从准噶尔回去之后讲到，那里已在自力制造枪支、火药和子弹，提炼硝磺、钢铁。[3] 列纳特在发展铸造生产和大炮生产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准噶尔汗对他的工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列纳特对乌格里莫夫说过，他制成并交给噶尔丹策凌的军队使用的计有 4 磅炮 15 尊，小炮 5 尊和 10 磅臼炮 20 尊。[4] 库兹涅茨克城贵族索洛金给俄国送来了有关这项生产的有趣资料。他是 1716 年被卫拉特人俘去的，在卫拉特人中间生活了 14 年，然后被释放回国。当列纳特需要人手“把铁矿用舢板运到特克斯尔湖彼岸时，就拨给了他100名俄罗斯俘虏，其中就有他索洛金，他干这项工作一直干到他被释放回俄国以前”[5]。

364

索洛金讲到，湖的四周铁矿相当多，它自古以来就由卫拉特人自己开采，然后绕湖运到对岸山上的树林之中。在这个树林里用老法熔炼，现在已改用熔炉，用炼出的铁“制造（现在还是自己制造）刀矛、盔甲等等。他们那里这类匠人现在已近千人”。不久前，被俘的瑞典军官列纳特改变了往熔炉输送矿石的方法，造成了舢板，把矿石由湖的一岸输送到另一岸，再从这里“由浑台吉的属民取去，运到山上熔炼”[6]。

据索洛金证明，准噶尔制造大炮开始于 18 世纪 20 年代中期，当时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5 年，第 2 卷，第 17 张反面。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年，第 2 卷，第 376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7－1729 年，[6·н·]卷，第 74 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年，第 2 卷，第 360 张。
〔5〕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年，第 1 卷，第 217 张。
〔6〕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年，第 1 卷，第 218 张。

策妄阿喇布坦还在世。在这以前,列纳特还伙同另一个瑞典俘虏杰别什中尉,把呢绒生产搞得很好,并把这门手艺传授给了卫拉特人。“现在在浑台吉的兀鲁思里有不少本族人的制呢匠。”[1]

噶尔丹策凌在同乌格里莫夫谈判时一再着重表示自己希望得到俄国方面的帮助,来搞好汗国的各种生产。1733 年 3 月,他通知乌格里莫夫要遣使携函随他同去俄国,信中请求安娜女皇“派几名会造大炮和臼炮并能教会我属民射击的大炮行家,暂来我处进行教练……同时请派一些会造各种东西——像你们造的那种金、银和丝绸之类——的工厂行家,来教会我们的属民。我特派两个人随同这位使臣去学制铁,……希望他们能精通所有铁器手艺”[2]。

喀尔喀人丹仁于 1732 年被卫拉特人俘虏,1747 年逃出,他在托博尔斯克对地方当局说,他曾亲眼看到卫拉特人用当地硝石和硫黄制成火药。“准噶尔人用某种混合物制造火药,把可燃的硫黄和硝石研细与碳混合。他不了解他们是否铸造大炮,因为他经常待在羊圈里。”[3] 365

综观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725—1750 年间,准噶尔汗国的工艺活动是沿着以下 3 个方向发展的,即武器与军备的生产、纺织业、装饰品和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企业”都是为了汗的金库收入而工作的,并且都是以供应汗宫和上等贵族的需要为目的的。这种工艺活动的基础是为国家服役的阿拉特的强迫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艺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是不大的,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它们的存在与否主要决定于政治局势的好坏。

科托夫希科夫中士在 1748 年早春因公事去过塔尔巴哈台噶尔丹策凌的侄子达瓦齐领主的兀鲁思。据他了解,那里“有称作布哈的银矿和铜矿厂。用这些矿造什么东西,不清楚。以前噶尔丹策凌时期由于达瓦齐诺颜的要求,上工的人多则千名,少则 500 名。现在策妄多尔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年,第 1 卷,第 218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 1733 年,第 3 卷,第 46、141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8 年,第 1 卷,第 21 张。

济纳默齐执政，什么人也不给，因为他跟这位诺颜不和……这个工厂里有一个俄国行家，两个帮工和一个翻译官……借助火药钻探采矿。用铜矿制造器皿……派到这个工厂上工的约3000人”[1]。

也是在1748年，经常住在准噶尔的商人阿伊别克巴霍穆拉托夫讲道：“噶尔丹策凌时期办过的铜厂、银厂现在倒闭了，因为无利可图，却花费了巨大劳力。俄罗斯行家伊凡·比尔杰加和同伴们在他们的主帐里都无所事事（即不干活。——兹拉特金）。去年制成一尊铜炮，不过，试炮时炸裂了。他们有小型铜炮约20尊，是瑞典人阿列纳尔（即列纳特。——兹拉特金）造的……那些炮由骆驼运送。据说，火药、铅弹和铁器都是卡尔梅克人自制的。铜器和银器现在不铸造了。”[2]过了两年，1750年春，俄罗斯当局从准噶尔居民那里得到消息说，“噶尔丹策凌时期曾制造过火药、铅弹、火枪、马刀和铠甲。现在这类东西都得自大布哈里亚地方，那里有准噶尔的工匠”。还是这些人说，我们提到过的比尔杰加在伊犁河一位宰桑那里“造红色油性革。虽然去年这行手艺还站不住脚，可是现在却造得挺不错。这些油性革都被收入国库，还不准卖给百姓”[3]。

366

噶尔丹策凌一死（1745年），准噶尔的内部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也影响到手工业方面，有的收缩了，有的停歇了等等。不过就整体看，噶尔丹策凌着重发展发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经济政策，无疑是收到了良好效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卫拉特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卫拉特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以及同中国、俄国和其他邻国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准噶尔同清帝国的相互关系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两国的相互关系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和中央亚细亚广大地区的国际总形势。

波兹德涅耶夫把清帝国和准噶尔汗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评论噶尔丹策凌时写道：“这位准噶尔新执政者阴险谲诈不下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8年，第1卷，第37张反面。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8年，第1卷，第26张正反面。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0年，第1卷，第14、15张。

于其父，生性好战并多次进攻中国边境。皇帝对准噶尔人的骄横无状忍无可忍，终于在自己登基的第7年（1729）决定对准噶尔人加以惩罚。”[1]按照波兹德涅耶夫的意见，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之间的一系列 367
新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它不可归结于一个人的性格不好和另一个人的耐心不足。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玄烨之死和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中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了。但代替战争的却不是和平；把两国推上互相斗争道路上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斗争双方所抱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显然，18 世纪初引起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打仗的原因，到了 20 年代末仍然在作祟。军事行动的重新开场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都在精心准备。可以看出，噶尔丹策凌在采取措施给自己的军队配备炮兵和火器，做好战争需要的贮备。胤祯政府[2]也照样做了，把军队集中在喀尔喀境内的喀尔喀与卫拉特的边界上，动员人力，准备马匹，同时还继续寻求同盟者，借助他们就可以使准噶尔汗国腹背受敌。[3]

拉古津斯基的分项文件表明，还在 1728 年 3 月间，他就得到了消息，说清政府准备从北京派代表去准噶尔边境，同噶尔丹策凌的弟弟进行谈判，他这个弟弟已背叛了汗，“并为此来加入中国国籍，答应把浑台吉全部领土和俄罗斯的阿玉奇汗都带来入籍，如果皇上肯对他格外施恩的话”[4]。后来弄清，震动北京的这个传说——噶尔丹策凌的弟弟来到边境——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据我们设想，这是事出有因的，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噶尔丹策凌和他弟弟罗卜藏索诺（即索诺巴图尔） 368
之间的冲突，后者离开准噶尔去伏尔加河了。但是这个情节还是有意思的，因为它反映了北京当局深切关怀寻求同卫拉特国家进行斗争的同盟者，而不惜接受任何这类建议。

根据拉古津斯基的报告，他在 1728 年 3 月间同清政府代表谈话时

---

〔1〕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 331－332 页。

〔2〕胤祯政府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祯，年号雍正。——译者

〔3〕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要》，第 78－81 页。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俄关系卷宗，1725－1729 年，第 62/1 号，12a 卷，第 786 张。

请他们注意,准噶尔汗国执政者曾不止一次地向俄国皇帝建议共同出兵进攻中国。这些建议都一概被拒绝了:俄国“与中国皇帝陛下和睦”。他的对话人对此回答说,汗国执政者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忽而倾向俄国人,忽而又倾向中国。但这时他们“殷勤地问,浑台吉和俄罗斯臣民阿玉奇汗相离多远,他们之间住着什么民族,浑台吉的边界距俄罗斯边界多远,老阿玉奇汗死了没有,谁得了他的汗位”。[1] 从这些问话中可以看出,1728 年清帝国政府又在认真研究能否拉卡尔梅克汗国共同对付卫拉特国家。

1735 年 11 月,一个在 1731 年被卫拉特人俘去的满洲士兵亚德哈从准噶尔逃到了俄国。

亚德哈对俄罗斯当局说:“他们噶尔丹策凌的属民杀死了我军的许多人,还俘走了一些……并夺走 5 尊铜炮。”[2] 另一个俘虏——1728 年被派往博尔赫城(巴里坤)的中国人楚万东,也提供了同样的消息。他在那里过了两年,“中国军队与噶尔丹策凌的军队并战。就在这次交战中,他同另一些中国人一起被俘”[3]。有理由认为卫拉特宰桑巴图蒙克并没有夸大,当时他向乌格里莫夫少校报告过“战胜中国人的情况,说 1730 年和 1731 年他们曾 3 次击败中国人,屡战屡捷”[4]。

369

参加过一些战役的列纳特于 1732 年 5 月向乌格里莫夫叙述道,1731 年夏天,一支大约有 5000 人的卫拉特军队,配有由列纳特本人指挥的“一个不大的炮兵队”,向柳勃钦(柳克琼吗?)城进军,但在临近该城时遭到 15000 名满洲人的袭击,当即阵亡 400 人,“其余的人由我救护出来。但是后来,就在那个夏天,卡尔梅克人又同中国人在阿尔泰附近进行了一次战斗,我也参加了。卡尔梅克军队约有 3 万人,而中国人则在 4 万以上。卡尔梅克人却打垮了中国军队,俘虏了约 7000 人,缴获铜炮 5 门……同年,在中国人战败之后,有 6000 名蒙古人在显贵王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俄关系卷宗,1725 - 1729 年,第 62/1 号,12a 卷,第 800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8 年,第 4 卷,第 2 - 6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3 年,第 2 卷,第 48 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 1733 年,第 3 卷,第 15 张。

公参加下自愿归附于噶尔丹策凌……他们被迁到伊敏尔河附近”。[1]

1732年5月，噶尔丹策凌对乌格里莫夫说道：“前年（1730年。——作者），中国人打我们的巴里坤湖……有2万人，我们当时消灭了他们1万人。而去年另一次，4万人来打阿尔泰，也几乎全军覆没，并且被俘了1万人……这次战斗以后，有1万户蒙古人脱离中国人而归附我们。”[2]可见，噶尔丹策凌的叙述是跟列纳特对乌格里莫夫的谈话相符合的。他的叙述基本上和在主要方面也为波兹德涅耶夫所引用过的蒙古和中国的史料所证实。[3] 所以，卫拉特军队在1729—1731年战斗中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如此，噶尔丹策凌还是很希望获得俄国的军事援助。他对乌格里莫夫说，在1731年失败以后，清人没有派遣任何使者去他那里，“故我也无需派人去。他们倚仗人多势众。我虽没有那么多人，但自信能对付他们这一帮子人。既然他们愿意厮杀一场，我现在就打发军队开往他们阿尔泰一带去”。正是由于预见到可能有新的战斗，噶尔丹策凌便决定请求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派遣俄国军队。他对乌格里莫夫说：“我这样说，并非害怕或希望和解，不过我倒为他们着急……如果他们自己不想和解，我也决不讲和。如果他们举兵前来，光是他们这些人，我是能够对付得了的。”俄国军队的援助则会使他有可能转守为攻，这正如他所说的，无论对他还是对俄国，都会带来“好处”。[4] 毫无疑问，这种“好处”在他看来至少可以使喀尔喀合并于卫拉特国家。但是他对俄国军事援助的指望却落了空。

370

噶尔丹策凌步其先辈的后尘，仍然没有放弃归并喀尔喀的想法。1732年8月初，被汗派往阿尔泰去见卫拉特军队的司令小策凌敦多卜的信使哈达沙拉卜，回到汗的牙帐，他告诉俄国商人杰维亚季亚罗夫斯基说，有10万清军驻扎在准噶尔边境的莫多察罕湖天然界区一带，“据说那里修建了一个不小的要塞……有3万卡尔梅克军队在等待着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年，第2卷，第360－361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45页。

[3]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第332－335页。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46张。

他们”。但是,据了解,清军无意离开要塞,开始进攻后,又无意进入战场。噶尔丹策凌指示策凌敦多卜:“如果到8月23日中国军队在阿尔泰附近仍未跟他们发生冲突,那么……当天就转移到蒙古人那里去。”哈达沙拉卜信使带来了策凌敦多卜给噶尔丹策凌的报告,其中说,“他已经派遣了精干的人去蒙古人那里……使之投入准噶尔治下,勿使他们坐以待毙”。[1]

1732年8月23日,小策凌敦多卜的3万军队开往东方土拉河和克鲁伦河方面。但是这次进军没有给准噶尔汗国带来胜利。策凌敦多卜的军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受到噶尔丹策凌信任并直接获得前线消息的列纳特告诉乌格里莫夫说,9月16日,汗的牙帐获得策凌敦多卜的报告。报告说,8月23日,他的军队从驻地进军;8月26日,于莫多霍托城与敌军22000人进行战斗并击溃了他们;8月29日,策凌敦多卜继续向东方前进,目的在于“把蒙古人全部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策凌敦多卜已于两天前派去了精干的人,使他们不要坐以待毙,而按同一信仰全部转到他们卡尔梅克人方面来”。某些当权的喀尔喀王公确实已转到卫拉特这边。策凌敦多卜指望“全部蒙古人都归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2]

371

1732年9月17日,噶尔丹策凌本人也把同样的消息告知了乌格里莫夫。汗说,中国人在边境修建了一座城市,该城遭到卫拉特军队的袭击。“已经派人去蒙古人那里,使他们不管中国人,而毫无顾虑地转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教规。”[3]

但是,噶尔丹策凌牙帐里高兴得并不太久。10月21日,一名信使到达那里,他带来了卫拉特军队在喀尔喀境内被清军打得大败的消息。卫拉特人起初捣毁了喀尔喀喇嘛教首脑的住持地——鄂尔浑河畔的厄尔德尼昭寺院,获得了俘虏和战利品,但是“中国军队在该地附近的隐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94-95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00-101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01-102张。

蔽处理伏着，并在那块狭窄的地方重创卡尔梅克军队”[1]。列纳特把一位参加过战斗的卫拉特炮手寄给他的信拿给乌格里莫夫看，那个炮手说到，10 名炮手中有 3 名被打死、2 名受伤、3 名被俘，损失了 1 门大炮和 3 门臼炮。[2]

卫拉特军队对哈萨克人作战的不利消息使情况更加恶化了。“一些从卡尔梅克派去打哈萨克人的军队也蒙受巨大损失而撤回，险些全部不能脱身。起先扬言，从哈萨克人那里掳获了许多属人和牲畜。后来则为许多人都丢下成群的牲口而徒步归来，令他们小心谨慎地驻扎在最边远的兀鲁思中以防哈萨克来侵袭，并且人少不准外出。”[3] 372

1732 年 11 月，策凌敦多卜的残余部队解散回家，一些高级军官则到汗的牙帐受审，并且“罚他们穿妇人衣服，因为他们在中国军队进攻时没有坚持抵抗，便扔下战旗，撇下部队逃跑了”[4]。

噶尔丹策凌没有对乌格里莫夫隐瞒，1732 年秋天他的军队在喀尔喀遭到失败。1733 年 3 月，在乌格里莫夫动身回国前不久，噶尔丹策凌向他谈了他本人对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作战的历史的一些看法。他说，还在策妄阿喇布坦在世时，清人就不止一次地向准噶尔汗国发生冲突。玄烨死后，他的继承人胤祯曾派使者到噶尔丹策凌那里，建议解释和消除由来已久的误会，确立清帝国和汗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向清政府交出 1723 年在库库淖尔起义的首领罗布藏丹津和在准噶尔避难的这次起义的其余参加者。噶尔丹策凌决定接受胤祯的建议并向他交出罗布藏丹津。噶尔丹策凌对乌格里莫夫说道：“为了真诚地就以往的一切争端进行谈判和协商领土问题，我曾派遣使臣到他们那里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 年，第 3 卷，第 111 张反面。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 年，第 3 卷，第 111 张反面。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 年，第 3 卷，第 113 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 年，第 3 卷，第 115 张。

373 去。”[1]但是准噶尔汗的使者还没有到达阿尔泰，就得知清军向准噶尔开来。使者们立即退回。清军很快就向巴里坤地区的卫拉特部队进攻，但被击退。“所以，这次争端的肇事者是中国人，而不是我们。从那时到现在他们已同我们作战3年了。但是在战争中我们总比他们幸运而多次打败了他们……然而去年9月……中国人打垮并俘虏了我方3000人。不过这还是他们头一次走运。”[2]

在这次谈话中，噶尔丹策凌的下述说明是令人注意的：他登上汗位后，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与清政府谈判“土地”问题，即把并入喀尔喀的领土归还准噶尔汗国的问题。

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之间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内的冲突对于后者与俄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于1726—1727年间俄罗斯大使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的谈判进程和结局发生了明显的影响，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为以下事实的证明：这两个强国几乎同时都向俄国建议缔结同盟以共同反对他们的另一方。关于噶尔丹策凌通过乌格里莫夫少校提出的有关建议，我们已经说到过了。至于清帝国，它的使臣曾于1731年两次来到俄罗斯首都进行这方面的谈判。

他们于1731年1月声称，他们奉命将其君主进行的反对准噶尔汗的战争之事详细告知俄国政府。这次战争是由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首先发动的，他被打败并且“服毒自杀”。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未经其余诸汗和高级僧侣的认可，在其7名谋士的赞助下就擅自凌越其众多叔伯而继位称君，并着手效法其叔父的罪恶行径”。清帝国是能
374 够打败策妄阿喇布坦的，但是由于皇上爱好和平而没有这样做。策妄阿喇布坦死后，噶尔丹策凌即位为汗。“他虽曾请求皇恩，但只识效法

---

[1]波兹德涅耶夫以另一种方式叙述了关于噶尔丹策凌打算把罗布藏丹津交给清政府的情况。他谈到了罗布藏丹津和罗布藏硕伦企图杀害汗的阴谋。噶尔丹策凌揭露了阴谋分子，决定把其中为首的一个交给中国当局。但是波兹德涅耶夫没有指明出处，即他是从哪里得知这些情况的。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蒙古或俄国史料都没有片言只字谈到过这一阴谋，也没有提到罗布藏硕伦的名字，此人可能指的就是罗布藏索诺。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42张正反面。

其父的罪恶行径……因此，中国皇帝为平安计决定预防祸患，以武力制伏轻蔑皇恩和仇视安宁的人……并命令这些使者代表皇上在俄罗斯宫廷……声明，当中国军队进攻准噶尔人并占领其土地时，……如果女皇陛下对其中一些土地有所要求，可向他们中国方面申明，则这些土地可以让给俄国方面。”[1]可见，清朝代表坦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他们同意与俄国瓜分准噶尔的领土。但是清政府想从俄国得到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它希望准许自己的代表前往伏尔加河去卡尔梅克汗那里，他们应当说服这位汗起来反对噶尔丹策凌；他们还应当说服当时还住在卡尔梅克汗国的罗布藏索诺进行反对噶尔丹策凌的斗争，许愿让他在胜利后登上准噶尔汗的宝座。胤祯向沙皇政府建议瓜分准噶尔时，是指望用这种代价来换取俄国对这些计划的同意，并协助执行这些计划。

安娜·伊凡诺芙娜政府对待这种建议的态度是极其审慎的。准许清朝的使臣去伏尔加河，但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让卡尔梅克汗国拒绝有关干涉准噶尔事务的建议。关于瓜分准噶尔领土的方案，则向中国代表们表示：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感谢友好坦率的通知，祝愿胤祯及其军队顺利成功，“如果中国皇帝的军队占领了他们敌人的某些与俄罗斯帝国接邻的土地，那么虽然女皇陛下拥有如此辽阔的领土，而无意于增并别人的什么土地，但是友好地从中国军队所占有的土地中添并一些……是可以同意的”[2]。

同时，安娜·伊凡诺芙娜政府还告知使臣们，今后凡属与卡尔梅克汗国有关的问题，应向彼得堡打招呼，而不许直接跟该汗国打交道。 375

一些清朝外交代表团成员获得允许后，便在外交事务部秘书（后来是顾问）巴库宁的陪同下前往伏尔加河。使臣们受到卡尔梅克汗策凌敦多卜的接见，便建议他配合清军反对噶尔丹策凌。他们力求夺回策妄阿喇布坦从桑扎卜那里夺走的土尔扈特人，并开辟从伏尔加河经过哈萨克斯坦和准噶尔草原到西藏的捷径。皇帝的使臣们同罗布藏索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年，第1卷，第206－208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年，第1卷，第210张。

诺举行了单独的谈话，劝说他带头反对噶尔丹策凌，并答应在取占准噶尔汗位方面给以援助。

这些建议被策凌敦多卜拒绝了。他按照彼得堡的指示行事，声称："没有女皇陛下的命令，不能出兵准噶尔，就连浑台吉之子罗布藏索诺，他虽希望加入中国军队，但是没有女皇陛下的意旨，他同样也不能那样做，不能同意使者的意见。"[1]他补充说道，他已向彼得堡呈送详细报告，附去了他对使臣转给他的胤祯来书的复函副本。清帝的使臣带着这一答复离开卡尔梅克汗国，登上归途。

同罗布藏索诺的谈判内容在索诺给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的信[2]中谈到。罗布藏索诺写道："中国使者对我宣称，他们的皇上意欲致力于我的事业……目前我觉得是有利时机，考虑到这点，我打算到那里去。因陛下以前对我有恩……我理当听从尊命。"[3]

376 罗布藏索诺并不反对接受清朝的建议，但是由于彼得堡持否定态度，并且很快索诺本人也死了，遂停止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始终由巴库宁陪同着的这一批使者还没有抵达中俄边界时，就碰上了从北京赴彼得堡的新的外交代表团。《切列潘诺夫编年史》写道："他们是为庆贺女皇即位而来的。他们来到的时候，为庆贺彼得二世而来的第一批使者正在回国途中，但还没有来得及越过边界。"[4]

在第二个北京外交代表团动身之前，皇帝已要求把在卡尔梅克"处于不幸和极大屈辱中"的噶尔丹策凌的兄弟罗布藏索诺送往北京。北京应当为他派来专使。北京还要求允许居住在伏尔加河一带的卡尔梅克人起来反对噶尔丹策凌，他们联合哈萨克人、布鲁特人和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居民，是能战胜和赶走噶尔丹策凌的。

俄国政府拒绝让北京的新使者去伏尔加河。它于1733年1月声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119/1号，1a卷；第46张。

[2]原信是用卡尔梅克文写的，译文出自巴库宁之手，均藏于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31年，第2卷，第9－10张。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列潘诺夫编年史》，第248张。第一个外交代表团的正式目的是庆贺彼得二世即位，但当它到达彼得堡时，在位的已经是安娜·伊凡诺芙娜了，为了庆贺她，又派来了第二个外交代表团。

明，它祝愿中国在对准噶尔汗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但不能强迫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支持皇帝，因为从伏尔加河到准噶尔路途遥远，并且“浑台吉与俄国和睦相处，不应当对他采取敌对行动”。同时告知北京，罗布藏索诺已于前不久死去。[1]

虽然俄国政府拒绝了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双方关于干预它们的斗争的建议，但在客观上俄国的立场是有利于准噶尔汗的：解除了准噶尔的后顾之忧，使它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危险。要说俄国的立场拯救了准噶尔汗国，使之免于崩溃，也未必是过甚其词。 377

同时，1732 年秋天卫拉特军队在喀尔喀的失败对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的相互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双方都相信不能依靠武力来解决积怨和争端，形成了僵局。摆脱僵局的唯一出路是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双方开始谈判。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并且进行得不顺利。阻碍谈判进行的是边界问题。噶尔丹策凌要求把阿尔泰山东部到杭爱山脉和叶尼塞河上游的土地归还准噶尔，但是北京，尤其是喀尔喀诸汗和王公不同意。[2] 据《圣武记》的材料，喀尔喀的执政者要求沿阿尔泰山脉和额尔齐斯河一线确定喀尔喀和准噶尔的疆界，把他们双方的领土用一条“无主”地带划开。准噶尔的执政者则坚决拒绝这些要求。[3]

胤祯在世时开始的谈判到 1739 年他的继承人弘历在位时才结束。双方都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同意以阿尔泰山脉和乌布萨泊为界。这条线以东的土地被承认属于喀尔喀，以西的土地则属于准噶尔汗国。结果卫拉特国家丧失了其原有领土的一大部分，但保留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和约规定恢复通商，以及恢复朝圣者出入西藏的行动自由。

战争的总的结局如何，交战双方接近实现各自的目的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又不得不放弃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对清朝说来，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准噶尔汗国这个独立的卫拉特国家，使之隶属于

〔1〕班蒂什·卡缅斯基：《外交文件汇编》，第 205 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4 年，3a 卷，第 6 张反面。

〔3〕瓦西利耶夫（В. Васильев）：《大清皇朝开国绥服蒙古记》（Приведение в покорность монголов при Дай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载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西北蒙古概要》（Очерк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第 325 页，圣彼得堡，1883 年版。

自己的政权，并把准噶尔变为清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目的没有达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清帝国遭到失败而准噶尔汗国获得胜利。
378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知道的，卫拉特封建主的主要目的则是归并喀尔喀和在这个基础上组成一个在绰罗斯家族统治下的独立统一的北蒙古封建国家。但这一目的也没有达到：卫拉特封建主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计划，犹如被迫放弃占夺阿尔泰以东的领土的期望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准噶尔汗国遭到失败而清帝国获得胜利。把这些结局加以比较对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准噶尔的损失最小，而获利最大。卫拉特封建主保存了自己的国家，从而使得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国家——清帝国以及与其同盟的东蒙古封建集团的计划遭到失败。最后，卫拉特封建主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因而保存了恢复无论对清朝或其他可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潜在能力。

俄国的统治集团也是这样估计战争的结局的。俄国政府关心于保存独立的卫拉特国家，把它作为加强自己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势力和地位而斗争的王牌，但同时又把准噶尔汗国看成一种觊觎南西伯利亚霸权和力图消除那里已有的俄国矿业、城市和其他据点的危险力量。俄国和卫拉特的关系在这些年打上了深刻的两面性的印记，尤其在外交事务部1735年9月从彼得堡发给西伯利亚总督普利谢耶夫的指令中，这种两面性就得到了反映。这个指令在谈到其他重要问题时也谈到了俄罗斯政府对准噶尔与中国之间订立和平条约的态度。指令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从您那里获得的报告，他们的领主（指噶尔丹策凌。——兹拉特金）早已开始同中国人议和，可能目前他们之间还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则这个邻居还不会得到行动自由，不过在某种情况
379 下，最应提防的还是这个邻居。"[1]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彼得堡对于清政府提出的参与反对卫拉特国家的斗争并协力摧毁这个国家的多次建议，却始终加以拒绝。

那么，这些年俄国与卫拉特的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内容是什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5年，第1卷，第377张。

么？哪些矛盾使准噶尔汗国和俄国疏远了？许多俄国档案文件使我们有可能很有把握地肯定，这段时期俄国与准噶尔的关系主要是由相互贸易、划定边界、征收实物税、归还俘虏和逃亡者等问题决定的。我们就准备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易货贸易在整个游牧民族，其中也包括蒙古族的历史上起着何等特殊的作用。论述17和18世纪俄国与卫拉特关系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相互关系之所以主要是和平睦邻关系，其决定性原因就是双方对相互交易在经济上都有等同的切身利益。正是这一点在18世纪也像17世纪时一样，为和平解决争议问题和各种冲突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类问题和冲突在噶尔丹策凌执政年代是相当多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位准噶尔汗在1729年9月曾对俄使埃蒂格罗夫说，他希望与俄罗斯帝国保持传统的友谊。“希望仍像过去伟大的皇帝（指彼得一世。——兹拉特金）和像我父亲那样和睦友爱地相处……我也希望把沙皇与我父亲之间的睦邻关系作为准绳去生活。”[1]我们下面将证明，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就是用这番话来表达对俄政策的真实基础的。自然，害怕不幸必须对中、俄两线作战，这在确定政策的和平性质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起更大作用的还是怕丧失实际不受限制地推销其产品的俄国市场和这一实力雄厚的商品供给地。应当指出，这些年俄国对准噶尔汗国政策的基础是力求不使争论酿成武装冲突，而是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说，彼得一世亲笔所写的1721年元月19日的指令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责成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做到使西伯利亚居民“跟浑台吉和睦相处而不要加以欺凌”[2]。 380

噶尔丹策凌在其执政的18年中为了同俄国政府直接进行谈判，曾在1728年、1730年、1733年和1741年向俄国首都派过4个大的外交代表团。这些年中派到噶尔丹策凌那里去的则有3个俄方外交代表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9－1730年，第1卷，第32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6年，第2卷，第7张；1733－1734年，第1卷，第156张反面。

团:1729 年托博尔斯克派出的埃蒂格罗夫代表团,1731—1733 年彼得堡派出的乌格里莫夫代表团,以及 1742—1743 年奥连堡派出的米勒少校代表团。除了这些外交代表团外,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和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经常互派使者,交换函件,这些往往是俄国与卫拉特两国政府直接谈判的准备。在 1722、1729、1746、1747、1748 和 1750 年被派往准噶尔汗那里去的托姆斯基中士就是一例。他在 1746 和 1748 年,一年两次去准噶尔汗那里。[1] 这一切证明两国外交关系非常活跃,这种关系反映了与两国有关的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谈判中占首位的问题之一是贸易问题。俄国与准噶尔贸易量的不断增长,使得有必要调整这种贸易,照顾俄国商人及俄国国库的利益。当这种贸易未超出亚梅舍沃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地区以前,还不需要做这种调整。但是从 18 世纪 20 年代开始,准噶尔商人成了西伯利亚市场、伊尔比茨克集市,甚至这些市场、集市以外的显著因素。我们的一些史料中没有关于准噶尔与俄国贸易动态的详尽记载,不过亚梅舍沃和谢米巴拉丁斯克海关 1724—1725 年的资料提供了这方面的梗概。1724 年从准噶尔通过上述两个城市运入托博尔斯克的商品价值是 3633 卢布 24 戈比,1725 年则为 3621 卢布 40 戈比,1726 年为 16203 卢布 70 戈比,1727 年为 11679 卢布 42 戈比,1728 年为 12233 卢布 91 戈比,5 年中总价值为 47371 卢布 67 戈比。

381

而这些年从托博尔斯克和亚梅舍沃运往准噶尔的商品主要是呢绒。1724 年价值 4446 卢布 60 戈比,1725 年价值 3691 卢布,1726 年价值 4837 卢布 81 戈比,1727 年价值 4041 卢布 45 戈比,1728 年价值 18413 卢拉 24 戈比,5 年中总价值为 35430 卢布 10 戈比。[2]

当然,所引的这些数字未包括俄国与准噶尔贸易的全部数额,但就是这些也可以证明这种贸易逐步变成了具有全俄罗斯意义的因素。无阻碍地日益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并免交关税的准噶尔商人比俄国商人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3 卷,第 43 - 44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9 - 1730 年,第 1 卷,第 37 张。

更为有利。俄罗斯国库也开始对俄、准贸易感兴趣。没有国家的调整使这种贸易完全由地方当局擅自处理,这引起了许多冲突。例如,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曾向准噶尔商人收税,而接替加加林的切尔卡斯基又把收来的关税退还给商人。总的说来,西伯利亚当局不认为免收商人的关税是可行的,因为担心国库要受重大亏损,"因为这些商人的来往商队很多,商品数量很大"[1]。噶尔丹策凌为捍卫准噶尔商界的利益,大力参加商界的业务,坚持保留俄国商人在准噶尔贸易和卫拉特商人在俄国贸易都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征收任何赋税的旧制度。

噶尔丹策凌执政的整个时期一直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乌格里莫夫少校出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据俄国政府提出的下述原则去签订特别的通商条约:准噶尔商人有权在亚梅舍沃和谢米巴拉丁斯克自由贸易,在这些地区他们的商品可以不受海关检查,不收关税;他们也有权把商品运到俄国其他城市,但这时就要征收规定的关税;俄国商人在亚梅舍沃和谢米巴拉丁斯克贸易也豁免关税,当俄国商人来准噶尔时,准噶尔当局可酌情向他们征收适当的赋税。 382

乌格里莫夫未能使卫拉特政府同意遵守这些原则,因此通商条约没有签订。后来,尽管多次就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恢复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虽然没有签订条约,贸易本身却未曾停止过。我们有根据认为,准噶尔汗国的执政者硬不让步,在颇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拒绝俄国方面的建议,不太影响贸易活动本身,它照常发展着,在俄国没有遇到比较严重的阻碍。准噶尔商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俄国有时向他们收税,有时却不收。

俄国与准噶尔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是比较复杂和尖锐的。策妄阿喇布坦于1713年就俄国人在属于他的领土上修建比斯克要塞和比卡通要塞所提出的抗议,应该认为是这些矛盾的最初表现。一年后,他更进了一步,宣称俄国人修建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也是在他的土地上,因而应当撤除。1716—1721年,由于俄国向南部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2年,第4卷,第43张。

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发源地推进以及修建亚梅舍沃要塞，俄国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这个要塞区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战斗，并以要塞和据守其中的驻防军被围而告终。1719年，策383 妄阿喇布坦首次提出这样的说法：近100年来，即17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多次谈判曾确定俄国和卫拉特领地以鄂木河—鄂毕河黑岬沿线为界的国界线。此界以北的领土属于俄国，此界以南属于准噶尔。稍晚一些，噶尔丹策凌对这一说法作了确切说明和补充，指出这条国界沿线上曾造有禁林，而在鄂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上雕刻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噶尔丹策凌的使者在1742年断言，“曾议定双方不准越过此线。那些土地上住着他们的属民。但俄罗斯方面却越过上述国界而修建了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和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要塞，还在库兹涅茨克县建立了杰米多夫铜厂，要求将这些全部撤除”[1]。

从1719年起，国界问题成了准噶尔和俄国代表每次会晤时进行谈判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1729年9月，噶尔丹策凌对埃蒂格罗夫说：“看，你们的城市造在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上是为什么呢？那可是我的领土啊！”[2]

1737年7月从准噶尔来到托博尔斯克的商人阿瓦斯巴伊受噶尔丹策凌的直接委托向总督布图林宣称，“这些河流入海洋，从河口到河源自古以来是他们的领地，可现在俄罗斯大臣却改成了俄国地名。以前鄂木斯克河口上方从未有人来过……而现在所有那些地方也全取了俄国的地名”[3]。1742年3月来彼得堡谈判的噶尔丹策凌的使者喇嘛达什面交大臣切尔卡索姆公爵一封自己统治者致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的信。信中噶尔丹策凌详尽阐述了准噶尔方面的观点。他写道，过去在“伟大的沙皇和我们几位强大的领主执政时期，俄国人与我们的人经常来往于两国之间并捕捉野兽，因此发生争端。有鉴于此，两国君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2年，第2卷，第178－182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9－1730年，第1卷，第33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7年，第2卷，第5－6张。

主同意标定国界，于是在黑鄂木河河口造有禁林，立标定界，并约定从 384
那时起双方任何人不得进入他方捕捉野兽、建造要塞和其他住房……从此两国居民不再经常往返越界……可是后来另一个沙皇（指彼得一世。——兹拉特金）执政时，你方却在黑鄂木河口外建造了要塞（指亚梅舍沃要塞。——兹拉特金），为拿下要塞我们曾出兵，为此当时发生了不小的冲突。现在你们的人又在我们的地方筑堡、捕兽、挖金、取铜……如果你们在我国土地上依旧这样待下去，那就是把我的土地攫为己有，而我是不能交出这些土地的。虽然我原可派人逐出你们那些人，但是，首先，考虑到我们间订有友好条约，其次考虑到你们正在同土耳其人打仗，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可能被认为是没有信义的人……为此请下令撤出你们的上述人员。否则，我决不能容忍他们在我的土地上生活”[1]。

可见，噶尔丹策凌的立场，他的论据和要求都是他父亲的路线的直接继承。这一立场在18世纪整个上半叶内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噶尔丹策凌死后，他全神贯注于内战的继承人，已经筋疲力尽而无法维护自己先辈的要求，这时关于国界的争端才算停止了。

至于俄国方面，它坚决否认卫拉特执政者的论据，一意维护俄国占有这些争议地区的权利，但同时力求使这事不致弄到极端尖锐的程度，并采取措施以防万一发生可能的武装冲突。俄国政府断言，他们从来没有同准噶尔进行过有关国界的任何谈判，卫拉特执政者没有任何证据，足资证明他们关于鄂木河沿线似乎为一致同意的国界的说法。

应该指出，卫拉特封建主希望得到的这块领土，顺额尔齐斯河延袤
1000公里，而且包括的范围一端为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另一端为 385
鄂木斯克和整个巴拉巴草原，当时从俄国中心地区通往东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的独一无二的陆路通道就是越经这片草原的。自然，俄国统治集团无论如何绝不会同意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

国界问题跟实物税问题紧密联系着。汗国执政者肯定上述领土属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2年，第2卷，第160－161张反面。

于准噶尔汗国，从而要求承认他们也有向居民征收实物税的独有的权利。根据这点，1742 年 6 月，噶尔丹策凌的使者提出一份他们的克什提姆的详细清单，这些克什提姆曾经只向卫拉特国库缴纳实物税，而后来在俄国当局的压力下才停止向他那里交付实物税，或者被迫既向准噶尔，也向俄国交这种税。清单中提到的克什提姆的爱马克分布在与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毗连的地区，他们的总数约有 5000 多帐篷（帐篷即家庭）。

噶尔丹策凌要求把有争论的领土和准噶尔各汗以往的所有克什提姆都归还给他[1]，而俄罗斯当局则坚决要求把拘留在准噶尔的所有俄国人和所有本来的俄国臣民送还俄国。首先是在 1716 年亚梅舍沃战斗中被抓去的几百名士兵和军官，以及 1701 年策妄阿喇布坦从桑扎卜那里强夺去的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15000—20000 帐）。

为了解决日积月累的争论问题，沙皇政府于 1731 年派遣了公使级的正式代表乌格里莫夫少校去准噶尔，给了他必要的委托书和签订有关条约与协议的全权证书。在给乌格里莫夫作的许多指示中，其中一条说到，如果噶尔丹策凌或其亲信提出国界问题，他应该拒绝他们的要求，还要指出在黑鄂木河上从来未有过任何卫拉特禁林，卫拉特人也从未到那些地方游牧过，额尔齐斯河黑岛上的小城属于古楚国王，“此城及其居民被俄罗斯军队征服，小城烧毁……，而卡尔梅克人没去过那里，也没去游牧过”。沙皇政府还把俄国沙皇 1595、1633 和 1644 年的一些手谕副本交给了他作为证明，“其中也附带记有巴拉巴异乡属民的情况，说他们自古以来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而不是卡尔梅克领地的臣民”。[2]

386

乌格里莫夫受到了噶尔丹策凌的热情接待，多次与他会晤并进行了事务性的谈话。他就有关贸易、国界、实物税等全部问题跟汗国的高级官员们进行了细致的谈判。但他的使团的收获却是微乎其微的。唯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42 年，第 2 卷，第 275－277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 年，第 2 卷，第 340－341 张。

一的成绩就是乌格里莫夫从准噶尔带了将近400名俄国人回国。

为了继续进行已开始的谈判，噶尔丹策凌派了以宗杜伊扎姆苏为首的使团去彼得堡，但这次出使的成效同样微小。这个使团随同乌格里莫夫离开准噶尔于1734年3月到达首都，受到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两次接见。1735年7月，外交事务部交给了使团一份俄罗斯政府对所有谈判过的问题的答复。“听取和接过答复之后，使臣说，他们对于这一答复不满意，声称准噶尔原有的领土被俄方侵占，现在他们在这里时不作出划界的决定，那么以后他们的领主对此就没什么希望了。”[1]至于实物税，俄国政府的答复从法律上承认了两面进贡这一暂时状况。[2]

喇嘛达什外交代表团（1741—1745年）是噶尔丹策凌力图有利于己方地解决争议问题的最后尝试。但是这个使团也没有成功。

总之，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为争取把卫拉特人和臣服于他们祖先的其他民族以前曾游牧过的喀尔喀和哈萨克斯坦一带的广阔领土归还汗国的多年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卫拉特封建国家把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土地让给喀尔喀，而把额尔齐斯河与叶尼塞河中上游谷地让给哈萨克斯坦之后，被迫处于拥挤的状况。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用暴力解决与清帝国的领土争端也以准噶尔汗国的失败而告终。 387

卫拉特封建主尽较大努力猛攻哈萨克人，因为后者一直没有停止把卫拉特人完全挤出谢米列契的斗争。噶尔丹策凌执政年代，哈萨克与卫拉特边界上的形势极为紧张。这里经常驻有双方的大批军队，一方为保卫卫拉特牧区免受哈萨克军队的侵犯，另一方则为了一旦卫拉特军队侵入哈萨克斯坦境内，起先遣部队的作用。武装冲突是常有的现象。哈萨克封建主方面尽管也偶有胜利，但总的说来，军事行动进行得很不顺利。他们遭到了经常的、有时则是巨大的失败，因此被迫抛弃呆惯的地方而游牧到遥远的咸海、乌拉尔河以及伏尔加河去，这就引起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5年，第1卷，第49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5年，第1卷，第56张。

了咸海沿岸、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拉尔河沿岸各草原上原居民与这些外来人之间的新冲突。俄国史料中有很多描述上述草原地区紧张状况的记载。18 世纪 40 年代初卫拉特封建主所取得的胜利暂时竟使哈萨克中玉兹各执政者变成了他们的藩属和进贡者。

5.2 准噶尔汗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一般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演变是其发展史中研究得最差的一个方面。这主要是因为能为学术界利用的有关文物遗迹为数极少,这些遗迹要能令人信服地和客观地揭示出游牧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能揭示出所有制的形式和类型以及这些社会的阶级结构等等。史料的缺乏使进行研究的人不得不依据各种间接的资料去研究游牧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历史问题,这就为形形色色公式化体系的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公式化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研究者个人的观点,而不是真实的史实。唯一例外的是弗拉基米尔佐夫论述蒙古社会制度的一本名著,其中每个结论和每个总结都是以蒙古编年史中汲取来的丰富的具体史实和语言学材料为基础的。我们发现托雷别科夫的一本论述哈萨克社会制度的著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其中有关各国和各历史时期的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推论,占了很大篇幅。[1] 作者主要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具体史实材料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纯理论的基础上,引用各学派、各流派许多作者著作中的话来对这种理论加以论证。

388

托雷别科夫的基本论点并不是独创的,我们在波兹律涅耶夫、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维谢洛夫斯基、拉德洛夫、格里戈里耶夫等人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论点。托雷别科夫认为,世界上定居民族所特有的封建制度的一般规德不适用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超越所谓宗法封建关系。托雷别科夫断言,这种关系是一种具有

[1]托雷别科夫:《17—19 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关系》。

特殊的经济基础和特殊的上层建筑的特殊社会经济形态。[1] 不过就是这个论点也不是什么新颖的。拉德洛夫早在19世纪末就写过："王公、官员、民族、国家、省份、所有制等等概念，在游牧民族生活中所具有的含义，并不是定居民族那里的那种含义。同样，战争与和平也不像在文明的定居民族那里那样影响到游牧民族的社会关系。"[2] 389

托雷别科夫的观点与史实有显著的矛盾，它只能使理解游牧民族的历史发生困难。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巴托尔德的意见："笔者通过对东方史的研究越来越意识到一些简单的真理，即：在东方也像在西方一样……是同样的历史演变规律在起作用。"[3] 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申述。真实的历史事实、史料记载都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作者在提供有关准噶尔汗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材料时，依据的出发点是：卫拉特人整个本质的和主要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是与东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那里的类似过程与现象相符合的。基于这点，作者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吸取卡尔梅克和喀尔喀方面的资料来详述准噶尔的情况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自然，这也要考虑到时间和具体环境的影响。

蒙古、中国和俄国的史料记载使人毫不怀疑，17—18世纪，蒙古的每块封建领地都有完全固定的领域，从属于该领地执政者和所有主的居民，在这块领域的范围内游牧。汗和王公们之间为重新分配牧地，为攫取较广阔的好牧场不断进行着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领地的范围经常是固定了，又变更了，而后又重新确定。不过在一定时期封建领地的范围都是严格确定的。破坏规定而擅入别人领地，就被看做是强力入侵和战争的开端。已经提到过，1640年法规承认领地边境不可侵犯 390

---

[1] 参看托雷别科夫：《17—19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关系》，第291、376页。

[2] 拉德洛夫：《维吾尔人问题》，第65页。

[3] 巴托尔德、阿里斯托夫：《突厥系部落和民族的种族组成初探及有关其人数的资料》（Заметки об этническом составе тюрских племен и народности и сведения об их численности），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学报》，1897年，第11卷，第355页。

的古代法制，并规定对其破坏者严加制裁。

但实际生活比法律准则更为有力。牲畜数量的增长、一批批新继承人的出现，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使游牧畜牧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的发展和牧场面积有限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极其简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游牧畜牧经济只有在不停地扩大牧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如果牧地够用，就不需要占有新牧地，但是只要现有牧场不能满足汗和王公们的需要，备用空地又都用尽，那么，重新划分封建领地、重新分配牧地的斗争就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应该指出游牧民族"土地紧张"的独特性质。特举一个例子。17世纪初古楚汗的3个儿子带着几百个属民游牧于雅依克、伊谢季与米阿斯等河的上游，约占面积30万平方公里（19世纪末这一带住有200万人）。正如他们对乌法的一位非世袭贵族阿尔捷米耶夫所说，他们还是单独地游牧，"因为住在一起就无法糊口"[1]。游牧民族的"土地紧张"与其说决定于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不如说决定于牲畜的数量，以及土地的质量——其肥沃程度和保障水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前的文献中所广泛流传的关于游牧畜牧者可以"任意地"、"自由地"迁移而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物、任何时间限制的看法，是极为错误的。熟知蒙古牧区的张诚亲自证实，17世纪末，这个地区中的"每位领主均住在自己的领域里，若转牧到毗邻领地，则被认为是有损他本人尊严，有损其臣民尊严的事"[2]。

391

17—18世纪的史料中记载有相当多的关于蒙古人牧地紧张，以及由此引起重新划分牧地的斗争方面的资料。这类资料有一些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了。新资料中，巴库宁所叙述的别克列米舍夫少校关于18世纪20年代卡尔梅克曾爆发激烈内战的报告值得注意。"尽管别克列米舍夫力求阻止他们发生内战，但制止不住，因为领主人数日增，都

---

〔1〕《与14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中期的事件有关的文据》（Акты, касающиеся событий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V в. до поповины XVII в.），载《俄罗斯历史丛书》，第2卷，圣彼得堡，1875年版，第282页；也可参看卡达纳耶夫：《17—18世纪的吉尔吉斯草原、中亚及中国北部》，第56页。

〔2〕张诚（热尔皮昂）：《关于鞑靼帝国》，第256页。

不愿受别人支配，都想占据好地方游牧。所以别克列米舍夫无法指望避免其中一些领主被击溃和被杀死的结果，正像过去阿玉奇汗就曾谋害过自己所有的亲戚而独占了他们的兀鲁思一样。”[1]

别克列米舍夫对卡尔梅克内战的原因和可能出现的前景的这种见解，同卡尔梅克封建主本身的见解是一致的。1725 年夏天，一个卡尔梅克领主集团向俄国当局提出的要求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要求，“能让他们带兀鲁思去察里津境内留到冷天，因为考虑到他们卡尔梅克人的内战从来持续不断，只要领主不减少，就谈不上有和平。因此，他们打算到河水结冰时，集聚全部兵力开往策凌敦多卜那边去，或者消灭那边的领主，或者失去自己的领主，使他们的兀鲁思只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2]。

土地紧张是内讧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卫拉特封建主的对外战争。卡尔梅克领主多尔济纳扎罗夫 1727 年 2 月写信给彼得堡说，1726 年秋季“哈萨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来到我们的泽穆河一带游牧，为保卫自己的领地，我们反击了他们”[3]。

392

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过，18 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汗国深感牧地不足。1721 年夏天，策妄阿喇布坦的代表博罗库尔干受汗的委托在彼得堡说，“从前，其属民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上游，无人排挤他们。现俄国人却在那里修建起小城。为避免冲突，浑台吉将其属民从这些地方迁走了，因此牧区不够。浑台吉请求皇上准其属民不受阻碍地在额尔齐斯河两岸游牧”[4]。11 年以后，即 1732 年，卫拉特大臣巴图尔宰桑被噶尔丹策凌委派与俄国使者乌格里莫夫进行谈判，乌格里莫夫要求把拘留在汗国的俄国人送还俄国，这时巴图尔宰桑说：“对于我们，另一件事比人更重要，那就是土地。可你们对这事却没有认真地答复。为了土地，我们愿交出更多的人（俄国人。——兹拉特金），因为你们自己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 年，第 119/1 号，1a 卷，第 48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 年，第 119/1 号，1a 卷，第 33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7 年，第 11 卷，第 129 张反面。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22－1723 年，第 1 卷，第 12 张。

也明白，我们需要土地。如果那些地方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过问。亚梅舍沃之争是争地，而不是争人。”[1]

众所周知，蒙古各封建领地的首领是汗或王公，领地是作为父亲的遗产传给他的，而他本人到一定的时候也可能，而且应该把领地传给自己的继承人。封建领地作为“乌姆齐”，即该“斡孛黑”的世袭财产，一代传一代。每位领主对外界、对其他领主来说，都是自己领地的无可争议的所有主。要否定这种所有权就意味着战争，因为只有通过武力才可能从封建主那里夺得他的领地、他的乌姆齐。

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乌姆齐是什么呢？仔细观察所有史料如何形容它时，我们首先就发现，乌姆齐被十分清楚地划分成兀鲁思和嫩秃黑。大家知道，12—13世纪蒙古的封建领地也同样被分成这样两个393部分。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封地（忽必）由两部分组成——即由一定数量的游牧家庭（兀鲁思）和足以赡养这些家庭的一定面积的牧场和狩猎场（嫩秃黑）。”[2]蒙古封建领地的结构在封建制度的整个时期内保持不变。巴库宁这位熟知当时卡尔梅克生活和风俗的专家曾说过：“卡尔梅克族分成了各个兀鲁思（而俄语里的兀鲁思，正如这一描述最初所指的那样，意味着民族）。”[3]

史料引用了许多资料，从这些资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兀鲁思”一词向来指的只是从属于封建领地的所有主——即某领主的属民、百姓、直接生产者。我们不准备引这方面的资料，因为对于“兀鲁思”一词的含义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论。

封建领地的第二部分是嫩秃黑。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某种社会经济单位能够游牧的空地，蒙语叫嫩秃黑，而突厥语叫尤尔特。”[4]现代蒙语中，嫩秃黑这个词也指居住地、牧区、地区，而“嫩秃黑”和“兀鲁思”两词结合起来则组成“本地人”、“本地居民”的概念。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08张反面。

〔2〕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111页。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51张。

〔4〕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的社会制度》，第43页。

于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时蒙古的每个领主是兀鲁思（即居住在其领地中的属民）的土皇帝以及嫩秃黑（即组成其封建领地的土地、牧场）的所有主。

史料是否证实了我们这个结论呢？无疑是肯定的。

例如，《咱雅班第达传》记载说，1639 年，咱雅在属于鄂齐尔图台吉的塔尔巴哈台过冬。[1] 1644 年，咱雅又来到鄂齐尔图台吉这里，这次是到哈拉塔尔地区，它也是属于鄂齐尔图的。[2] 这本史料还说到，咱雅与和硕特的阿巴赖、土尔扈特的岱青以及鄂齐尔图台吉的儿子噶尔达玛会晤的情况，同时指出，噶尔达玛是匆匆动身的，其理由就是他的嫩秃黑处于没有主人管理的状态。 394

罗索兴的那本《历史》记载有许多描述领主们是其属民所游牧的土地的所有主的有趣事实。前面提到过，由于 1688 年卫拉特军队侵入喀尔喀，几乎喀尔喀的所有王公和普通牧民都曾离开故土，打破了汗国和公国的疆界，争先恐后地跑入清帝国境内。由于这种狼狈逃窜，封建法制本身的基础一度被破坏，汗和王公们丧失了自己的嫩秃黑和兀鲁思，失去了与藩臣和牧奴的各种联系，牧奴阿拉特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封建主在哪里，实际上摆脱了他们的统治。大概需要重新恢复封建制度的各种正常社会联系和关系，对此清帝国当局大为费心。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作为游牧畜牧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和牧地的封建所有制问题，得到了特别明显而令人信服的表现。《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中所大量引用的，来源于蒙古领主或由他们提供的文件中，这类用语真是五花八门，如“我的牧区”、“我的土地”、“他的土地”、“车臣汗的土地”、“哲卜尊丹巴的牧区（即嫩秃黑。——兹拉特金）”等等。[3]

举几个例子。一位领主请求玄烨把他喜爱的库库淖尔地区赐给他

---

〔1〕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5 页。

〔2〕拉特纳勃哈德勒：《咱雅班第达传》，第 8 页。

〔3〕《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30、186、191、197 页及第 199 页以后。

游牧。皇帝征求达赖喇嘛的意见。达赖喇嘛回答，不能满足这位领主
395 的要求，“因为那一带地方早已分配完了并已住满了人”。玄烨令地方当局为请求者找寻一块合适的地方，把它四面立界，并记入相应的簿册中。[1]

车臣汗的孙子噶尔丹多尔济被公认是其父领地的合法继承人。由于他年幼，便为他指定了监护人。玄烨的诏令规定：“俟其到日，仍归本地（指监护人。——兹拉特金）毋得以噶尔丹多尔济年幼，欺凌谋占，务期同心一意，共相扶掖。”[2]

我们不可能谈到史料所记载的所有事实，它们太多了。我们只能提一提这些事实不仅证实了领主对牧场的所有权，而且证实了喀尔喀的土地开始变成清帝国的国家财产的过程。帝国攫取了支配这块土地、分块赐给汗和王公们，以及批准他们作为所赐土地的实际所有主的最高权力。重要的是指出，清帝对蒙古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没有废除地方领主的实际所有权，相反，正如喀尔喀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倒是巩固了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和作为土地所有主的地位，保卫了他们的所有权不受其他封建主的侵犯。这也就是使东蒙古封建主能长期忍受外国统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喀尔喀最大的寺院之一——纳罗班钦寺院的院史中，发现了一些有关蒙古土地所有制的有趣资料。这部院史是由寺院的原住持喇嘛大主教杰利卜呼图克图向美国研究者弗里兰德讲述的，这位研究者把呼图克图提供的资料广泛运用于自己的一本研究蒙古公社和氏族
396 制度的专著中。[3] 我们所进行的检验证实，呼图克图所报道的基本事实确凿可靠。

他说到，清朝在其统治初期给各蒙古领主“赏赐了土地和一定数量的牧户（即嫩秃黑和兀鲁思。——兹拉特金）”[4]。胤祯（可能是玄

---

〔1〕《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145 - 146 页。

〔2〕《中国康熙皇帝征服游牧于大鞑靼的喀尔喀和厄鲁特民族史》，第 296 页。

〔3〕弗里兰德（H. H. Vreeland）：《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纽黑文，1954 年版。

〔4〕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 13 页。

烨)执政年代所建立的纳罗班钦寺院很快获得了盛名,吸引了众多的信徒拜倒在它的门墙下。其中有些人献身寺院受其庇护,或游牧于寺院左近,并以自己的劳动为寺院执事服务。这就出现了同占有这些牧户的原领主的冲突。积极支持蒙古地区的喇嘛教的清政府终于把这个所有权分给了纳罗班钦寺院[1],寺院所在地的世俗领主和硕齐拜谢也把自己领地南边的一块地献给了寺院。有趣的是,这个领主同时还企图把自己领地外的一个小封建主所居住的一块土地并入自己的奉献之列。这个小封建主坚决抗议和硕齐拜谢的横行霸道,这才迫使他从自己的奉献中去掉了这块引起了争端的土地。[2]

纳罗班钦寺院的这段历史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在蒙古寺院地产形成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不断复现。

我们来看看与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汗国有关的文件。1732 年 5 月,巴里亚京斯基公爵向外交事务部报告说,已死的罗卜藏索诺的寡妇向他抱怨说,"她丈夫死后,汗把她丈夫的那块小小的兀鲁思,其中包括他们私人的属民都攫为己有了。她,切凌巴尔扎要求归还汗夺去的那些属民,要求给她和她剩下的属民指定一块单独的地方进行游牧"[3]。 397

这里所谈的是划出一块土地,给一个已死领主的寡妇作独占的领地,以补偿全卡尔梅克土地的主人——汗从她那里夺去的那块土地。应该注意到,卡尔梅克汗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当时是在俄罗斯皇帝手里,但是丝毫不妨碍卡尔梅克汗成为这块土地的实际所有主,他把土地分给小领主作了领地,有时又从他们那儿强夺回来。

众所周知,在不好的气候条件影响下,牧民不得不转牧到距离较远的其他封建领地去寻求出路。这些领地的执政者有权酌情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穷困牧民到自己的领地上来,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这块土地的所有主和唯一的支配者。杰利卜呼图克图在同弗里兰德的谈话中,就是

[1]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 13 页。

[2]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 19 - 20 页。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32 年,第 6 卷,第 721 张。

这样说明这一问题的。[1]

在蒙古，直到19世纪末既没有土地买卖，也没有土地出租。那么，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它是以领主支配牧区这一独占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巴库宁在《卡尔梅克民族记述》中说，给各领主分配季节性牧区的事，由称作“扎尔戈”的、起部长特别理事会作用的这种专门机构管辖。这个机构由8名常设成员组成，他们由汗从他的亲信和定期轮换的地方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中委派。巴库宁写道：“这个‘扎尔戈’每年春天
398 和秋天在上述代表出席下，决定什么地方给某个诺颜及其兀鲁思过夏和过冬，经汗批准后，通过那些代表告知他们的诺颜，这样就不会常有争端。”[2]

亲自考察过卡尔梅克游牧情况的帕拉斯，叙述了兀鲁思里的一些集团和家庭之间分配游牧地区和牧场的情况。“卡尔梅克玉兹（即汗国。——兹拉特金）或兀鲁思向新牧地迁徙时……先派人为汗或王公，为喇嘛以及为礼神的帐篷选择最好的地点，然后向其他人宣告有关出发的事项。先有一批人打头，全族随之出发，并各选合适的住地。”[3]

这就揭示出，在游牧畜牧经济条件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活动内幕。土地的主要所有主——汗批准汗国的牧区分配，首先保证自己和最高喇嘛有足够数量和较好质量的牧场，然后为自己的藩臣、小领主指定游牧地。藩臣们也首先保证自己和自己的亲信有较好的牧地，剩下的就归从属于这位领主的普通牧民、直接生产者使用。

时间较晚近的描写19到20世纪蒙古社会中土地关系的史料，说明了这种土地关系的演变，同时也完全证实了巴库宁、帕拉斯和另一些人的资料。例如，从杰利卜呼图克图的材料中了解到，形形色色的自然条件有时改变了土地使用的形式，但是丝毫没有破坏封建社会的基

---

〔1〕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43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140张。

〔3〕帕拉斯：《历史通报汇编》，第223页。

础——封建主对土地的独占权。杰利卜呼图克图证明,20 世纪初给各个家庭指定冬季牧场已成了纳罗班钦领地的惯例,不管这些家庭的社会地位如何。并且在这些冬季牧场上造有石头的畜圈,积有备用的燃 399
料。[1] 但夏季牧场通常却不给各家指定,尽管各个家庭每年都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到同一个地方去。可是在赛音诺颜汗的一个旗中,全部土地"在各个家庭之间被分成四季牧场。这块土地的特点在于,它是由不能防风的平地组成的,两侧的谷地从平地直通到山里。只有这两侧的谷地单独在各家庭中进行分配,每户沿自己的谷地迁移,夏天驻扎在下部,冬天在上部。"[2]

杰利卜呼图克图报道的事实证明,在封建所有制的绝对统治下,根据当地条件的不同,这种土地的使用可以有各种形式。在有些情况下,任何一个季节也不给使用者指定牧场和驻扎地;在另一些情况下,只指定冬季牧场;第三种情况则指定冬季的、夏季的以及其他所有时间的牧区。

这些有关领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有关指定冬季牧场,有时还指定夏季牧场的资料,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馆的许多文件所证实。这些文件已在纳佐格多尔济教授写的一本论述革命前蒙古农民运动的著作中被部分发表。[3]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某些资料。一份阿拉特的申诉书中说:"本旗的一块牧地面积窄小,四周是山岩和森林,牧场好坏不等。因此过去每户分给一段土地,这已成了惯例。"[4] 在另一份阿 400
拉特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的领主把牧场专供自己的牲畜用,"而禁止其他台吉和有牲畜的阿拉特使用牧场……,因而(他们)完全丧失了游牧的嫩秃黑"[5]。在第三个文件中引用了扎萨克图汗爱马克中一个旗

---

[1]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 42 页。

[2]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 43 页。重点号是我们加的。——兹拉特金

[3]纳佐格多尔济(Ш. Нацогдоржи):《外蒙古阿拉特运动史》(Из истории ара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о Внешней Монголии),莫斯科,1955 年版。这一著作中所发表的文件一般未注明时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它们绝大多数属于 19—20 世纪初。

[4]纳佐格多尔济:《外蒙古阿拉特运动史》,第 11 页。

[5]纳佐格多尔济:《外蒙古阿拉特运动史》,第 9 页。

的阿拉特对其领主的控告，这个领主允许一个邻近旗的居民“在自己的嫩秃黑中游牧，并向他们收使用土地税”[1]。再看一个文件，它谈到1846年土谢图汗爱马克的领主巴尔达尔多尔济要求归还一群迁往邻旗的阿拉特。但是那些人不愿回去，便向巴尔达尔多尔济和他们当时游牧的那个旗的领主请求允许他们不返原地，他们同意为此向两边的领主缴贡赋。[2]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多次游历蒙古、考察并研究过蒙古居民生活状况的波兹德涅耶夫写道：“不论去那个帐篷，每个蒙古人必定会告诉你，他游牧的那块地方属于谁。”[3]

最后让我们看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盛行的把蒙古的土地出售和出租给各种欧洲的企业和机关、给中国政府机关和私人的情况，其中，土地出售者和出租者是领主们，他们把所得的款项装入自己的腰包。[4]

可见，在封建时代，蒙古的土地是领主独占所有制，而表现这种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则是领主支配牧区的专有权。使用土地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当蒙古领主遇到资产阶级对其土地的需求时，自行支配牧区的权利就按自然演变的方式，在没有发生任何内部震荡的情况下变成了出售土地和出租土地的权利。蒙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历史倾向大致如此。

401

---

〔1〕纳佐格多尔济：《外蒙古阿拉特运动史》，第14页。

〔2〕纳佐格多尔济：《外蒙古阿拉特运动史》，第13－14页。

〔3〕波兹德涅耶夫：《佩弗佐夫旅游蒙古和中国内陆北方各省随笔》（Очер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Монголии и северным провинциям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итая М. В. Певцова），载《国民教育部杂志》，1885年3月，第94页。

〔4〕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央蒙古》（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莫斯科，1893年版，第99页；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和蒙古人》（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第1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10、37页及第57页及以后；《莫斯科去蒙古的贸易考察团》（Московская торгов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Монголию），莫斯科，1912年版，第110－115页；巴拉诺夫（А. Баранов）：《扎萨克图亲王的旗中的喀喇沁人——满洲与蒙古资料》（Харачины в хошуне Чжасакту-вана），哈尔滨，1907年版，第3、4、6页及第12页及以后。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土地、牧场在蒙古游牧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生产资料的作用。否认土地在游牧畜牧经济中起生产资料作用的研究者所持的论据是：牧民没有对牧地施加劳动，牧地是“天然牧场”，马克思所说的关于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物质的那一番话适用于这类牧场。马克思写道：“在它（物。——兹拉特金）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牧场、野生森林等等。”[1]不过上述研究者在这里引证马克思的话是不适宜的。牧地在游牧畜牧生产中不是一般意义的“天然牧场”，不能说这些用地没有间接表现出游牧畜牧者的劳动。牧民投入迁移中的巨大劳动不仅是为了开发新牧地，而且是为了要使已经用过的老牧场恢复肥力。迁移是牧民恢复被用过的牧场的饲料资源唯一可行的办法，它使牧民有可能到适当的季节重返老牧区。把天然牧场当做自然界无偿的礼物来利用的定居农业，确实没有为天然牧场投入劳动，但是，如果游牧畜牧者不保证牧场的供水，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不是一年几次地聚集自己的畜群、财产和全家，迁往有时远隔几十、几百公里的新牧地去，那么，就不可能利用牧场的资源。季节迁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恢复牧地的收获量，不然迁移就成了类似于因为酷爱阳光、清新空气和旅行等等而进行的娱乐性郊游了。资产阶级的史著通常就是这样来解释迁移的意义的。史料和文件资料所提供的真凭实据使人毫不怀疑，畜牧游牧经济的决定性生产资料就是土地、牧场。 402

属于清帝国和俄国的所有蒙古地区的情况都是这样，准噶尔汗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不过那里在18世纪时，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和使用形式的历史演变情况没有全部完整地表现出来罢了。

但是在谈准噶尔汗国之前，先简要地谈谈牲畜在蒙古民族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是必要的。

无需证明，畜牧经济是指其生产活动旨在繁殖家畜的这样一种经济，家畜是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生产的产品是它的工作人员劳动的产

[1]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3卷，第49页。

物。当然,在游牧经济的物质生产中,对家畜的利用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某些牲畜被用作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这样使用牲畜不是典型的,不是主要的,而是很偶然的,并且只涉及少量家畜。典型而有代表性的现象是:牲畜是游牧畜牧者劳动的产物及其财富的基本形式。牲畜多就意味着富有;牲畜少就是贫穷。牧民产业的积累过程主要表现在属于他的牲畜头数的增长。

牲畜在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贸易交流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匹、牛羊和骆驼实际上是牧民们能够向自己的定居邻族提供,而且已经提供过的用来换取他们的经济产品的唯一商品。蒙古的"进出口"贸易的最大部分属封建主的经济,他们由于剥削直接生产者而把成千累万的畜群和马群集中在自己手里,用这些牲畜换得奢侈品、武器等等。牲畜能提供一切:食物、住房、衣着、客货运输的交通工具和各种进口货。牲畜几乎是"货币"的唯一形式。正因为如此,繁殖牲畜就成了生产的目的。托雷别科夫否认牲畜起劳动产品的作用,而断言它是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其根据是:牧民"在牧放自己的牲畜时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使牧场的草由于牲口吃了而变成奶、毛、肉、皮革、粪肥等等"[1]。但是在这种研究方法下必须承认,无论是奶、毛,还是肉都不是最终产品,它们在制造乳制品、毡、汤、鞋、燃料等等东西时,本身变成了生产资料,变成了劳动工具。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按照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的无限循环,使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变化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不过这已经不是什么研究,而是一种庸俗化。自然,游牧社会的牲畜和土地无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关系中,都是密不可分地相互联系着的。没有土地,没有牧场,牲畜便不可能繁殖;没有牲畜,则土地和牧场也失去了任何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也应该说土地和牲畜作为游牧民族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的因素具有统一性。但是统一性不等于同一性。无论它们之间如何紧密地联系着,土地和牲畜在生产和社会关系中各自完成着不同的作用。如果说土地是主要

403

[1]托雷别科夫:《18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制度》,第16页。

生产资料，那么，牲畜则是这种生产的目的，是它的主要产品。如果说土地是游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牲畜在这一社会所生 404 产的总产品的分配方面同样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说对土地这一主要生产资料的关系使游牧民族的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土地所有权使所有主变成封建主，使没有这一所有权的人变成封建附庸，那么，对牲畜的关系则决定了畜群占有者的财产状况，它使一些封建主或阿拉特富有，使另一些封建主或阿拉特贫穷。

畜牧业在这个时期蒙古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是巨大的。牲畜是普遍渴望得到的对象。封建主以苛捐杂税和各种贡赋的形式尽可能多地向阿拉特夺取牲畜，他们常组织偷赶邻族的牲畜，攫取牲畜是内战和内讧的主要任务之一。封建附属的阿拉特农户常常反抗封建主，力求保护自己的牲畜不被他们出于贪婪而侵占，采取擅自迁走，隐瞒属于他们的牲畜总头数的办法，有时则转为更积极的引起攫取和瓜分封建主的畜群的阶级斗争形式。[1]

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为争夺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不难理解，领主们由于是土地的独占所有者，同时因剥削附属的阿拉特牧户，积累了数以千万头计的大畜群。有些例子我们前面已经举过，其中有咱雅班第达传。史料中有关封建主之间争夺牲畜的资料非常丰富。[2] 应当考虑到，争夺兀鲁思的斗争归根结底也还是争夺牲畜的斗争，因为兀鲁思，即附属的阿拉特牧户，对领主们的好处主要是由于这些牧户拥有私人的畜群，因此 405 能承担苛捐杂税和贡赋。没有牲畜的贫苦牧户，封建主是不需要的。杰利卜呼图克图说到，1890 年当他参与管理纳罗班钦寺院时，他双亲的家里有 10 头牛、30 匹马和 3 头骆驼的私人畜群，可是后来这个畜群增长到 200 头牛、2000 匹马、300 头骆驼和 7000 只绵羊（以前没有绵

[1]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要》，第 53－55 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3－1725 年，第 6 卷，第 214、226 张；1727－1728 年，第 18 卷，第 129 张反面；1630－1736 年，第 119/1 号，1a 卷，第 36 张以后。

羊)。[1] 为了对牲畜集中到封建主的产业中的情况有个概念,我们提一下,杰利卜呼图克图和从属于他的400阿拉特牧户共占有78000只绵羊(呼图克图占9%),1600头牛(呼图克图占12.5%),1200头骆驼(呼图克图占25%),2800匹马(呼图克图约占80%)。[2] 我们没掌握17和18世纪畜群集中到封建主产业中的有关资料,但是我们可以满有理由地认为,当时的情况也不会是另一种样子。我们的史料对蒙古大封建主畜牧经济的组织原则谈了些什么呢?据了解,这种经济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把牲畜一小批一小批地分给附属阿拉特牧户去放牧,他们有私人的畜群,足以担保封建主不受可能的损失。杰利卜呼图克图说,在纳罗班钦寺院,绵羊、牛马都按分成制的原则交去放牧,分成制即把不大的畜群、羊群和马群,分给附属的阿寅勒,由他们承担一定量的奶和毛交付酬金的制度。杰利卜呼图克图的7000只羊的私人羊群分成300到800头的小群,交给有私人畜群约300只绵羊的牧户去放牧。被交牧的羊群的数量取决于牧户私人畜群的大小和劳力保障的情况。据这位呼图克图说,牧户获得70%的毛,以及夏季的全部羊奶和全部小羊羔。至于骆驼,在纳罗班钦是由雇佣的牧人进行放牧。[3]

406 有充分理由认为,纳罗班钦寺院领地在这一方面的情况也不是仅有的,把牲畜分给有财富的阿拉特去放牧,在蒙古是普遍现象,并且是封建主经济共同的基本组织原则。不管怎样,革命后蒙古的人民政权机关已切实查明,在20世纪20年代,约有20%的阿拉特牧户继续在类似于前面所描述的条件下为原封建主和其他经营大畜牧业者牧放牲畜。[4]

我们已经指出过,蒙古的领主是自己领地里一切嫩秃黑和一切兀鲁思的所有主。但是,在这两种形式的所有权中,实际上存在着重大差别。领主对嫩秃黑是全权独占的所有主,但对兀鲁思却不尽然。蒙古

---

[1]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101页。

[2]托雷别科夫:《18—19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制度》,第31页。

[3]托雷别科夫:《18—19世纪哈萨克社会经济制度》,第97页。

[4]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страна нов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莫斯科,1950年版,第180-181页。

习惯法和成文法——王公丘尔干的许多决议和汗的指令，以及清朝就蒙古事务方面和俄国政府就卡尔梅克事务方面颁布的法令，虽赋予领主们买卖和赠送阿拉特的权利，但禁止杀害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封建主并不是自己兀鲁思的全权所有主。

整个蒙古的情况是这样，卡尔梅克的情况是这样，准噶尔汗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卫拉特社会的结构相当复杂。所有研究者一致指出其中有若干阶层，但是在确定阶层的数量和性质上却众说不一。按比丘林的意见，卫拉特人分为两个阶层——军事的和宗教的，而前者又分成贵族与纳税者两个集团。[1] 鲍戈亚弗连斯基认为卫拉特人有3个阶层——军人、黑人和奴隶。[2] 哈斯卢德却认为有4个阶层：白骨（即贵族）、黑骨（即纳税者）、达尔罕（即豁免贡赋者）以及宗教界。[3]

让我们来看看史料中对阶层问题谈了些什么。 407

《乌巴什洪台吉史》记载过“上、中、下层”代表的会议。[4] 《咱雅班第达传》也几次以不同方式谈到过“上层、下层和中层”、“大、小诺颜”、“宗教界和俗人”、“贵族和老百姓”。[5] 鲍戈亚弗连斯基又发现在“察津·必扯克”法规的条文中提到过兀鲁思的官吏、旗手、号手、卫士、内侍官、军人、平民、奴隶、大小王公。[6] 杰利卜呼图克图证实，纳罗班钦领地的居民分为两个阶级——台吉和哈拉抽，即贵族（白骨）和“黑骨”的阿拉特。后者又根据他们的权利和缴纳贡赋的情况分为：哈姆哲尔格、阿勒巴图和达尔罕。[7]

在俄国档案资料中，以及考察和研究过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国生

---

〔1〕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27页。

〔2〕鲍戈亚弗连斯基：《卡尔梅克历史资料》，第83页。

〔3〕哈斯卢德：《蒙古的人和神》，第118页。

〔4〕《黄金史》，第214页。

〔5〕戈尔斯童斯基：《咱雅班第达传》，第9、17、20页。

〔6〕拉特纳勃哈德勒：《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规》附《噶尔丹洪台吉的补充敕令和卡尔梅克汗顿杜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律》，第36、38页及第40页以后；也可参看鲍戈亚弗连斯基：《卡尔梅克历史资料》，第83页。

〔7〕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11－12页。

活情况的学者和游历家的著作中，也记载有某些重要资料。而卡尔梅克人，照科斯坚科夫的话说，从准噶尔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带到俄国来了。[1]

总括史料记载使人确信，蒙古社会，其中包括卫拉特社会，在这个时期也像各封建社会一样分成两个主要的阶级——封建主和牧民阿拉特（即普通的游牧畜牧者）。封建主阶级是土地、牧地的独占所有主，牧民阿拉特阶级则没有土地所有权，因而是封建从属阶级。两个阶级又各分成不同阶层的集团。喀尔喀和南蒙古的阶层制度最为明晰，那
408 里由于清人的法令，对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最充分、最严格的规定。但是大家都知道，清朝的法令没有给蒙古的社会结构带来任何原则性的变化，它遵行的路线主要是从法律上把那里存在的社会体制加以固定，并使之符合于清朝的利益。这使得我们有可能肯定，准噶尔汗国的社会制度与喀尔喀和南蒙古加入清帝国之前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在卡尔梅克汗国则存在过与准噶尔汗国相同的社会关系，但是略有改变，这些改变是后来受俄国社会制度的影响而在卡尔梅克出现的。

卫拉特封建社会的首领是绰罗斯族（或叫斡孛黑）出身的汗。这个汗的地位、其政权的稳固程度是以他个人的领地——他的“土地财产”的资源为基础的，而且是由这些资源决定的。准噶尔汗的“土地财产”就是他个人领地中的以及他的近亲绰罗斯领主们的领地中的土地、属人和牲畜。1724 年春，一位有威望的卡尔梅克封建主多尔济纳扎罗夫生动地描述了汗的土地财产的作用和意义。多尔济说道：“不管谁当汗都一样，给他的好处就是封号和首席地位，他的财产只能来自他本人的兀鲁思，而其他领主各占自己的兀鲁思并自行管理，汗想要得到他们的东西都是不应当的，这也没人会听从他。”[2]从这番话可以明显看出，汗的政权的稳固、政权的威信是和汗的土地财产的面积与财富

---

〔1〕科斯坚科夫：《卡尔梅克历史和统计资料》，第 32 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23－1725 年，第 6 卷，第 178 张反面。

成正比的。上述情况也可解释汗和汗位追求者们为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而进行激烈斗争的原因。例如，卡尔梅克阿玉奇汗的父亲朋楚克，“竭力削弱自己的叔伯兄弟及其孩子们的兀鲁思，因此彼此发生冲突，他击溃了反对自己的亲侄儿扎尔布……占有了他的兀鲁思”[1]。17—18世纪的卫拉特历史上这类事件屡见不鲜。前面我们引用过卡尔梅克王公们对他们内乱原因的看法，也列举过他们引证“谋害”亲属并占有其兀鲁思的阿玉奇的行动作为解决内部冲突的范例的引文。哈喇忽喇和巴图尔浑台吉当时的做法也完全一样。汗凭借着包括许多兀鲁思和大片嫩秃黑的土地财产的实力，并拥有大批军队，就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领主，使他们俯首听命。 409

准噶尔汗是卫拉特封建国家中占第一位的人物。封建官职等级级别稍低一些的是其他大王公——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以及其他大兀鲁思的执政者，即台吉，俄国史料和学术著作中称之为台什。这种台什的领地也由许多兀鲁思组成，其首领是台什的亲属。他的斡孛黑的成员都是独立的执政者[2]，但又从属于该台什。这种兀鲁思的执政者在卫拉特史料中称小王公，以区别于台什和汗——大王公和洪台吉。每位台什拥有自己的领地，这是台什控制小王公的主要条件。因此关注自己领地的扩大和巩固始终是卫拉特台什们注意的中心问题。

领地中有若干独立兀鲁思的王公、诺颜们把兀鲁思分成几部分，分给近亲或战友作领地。这样的每份领地也叫兀鲁思或爱马克，而其领主和执政者则叫宰桑。巴库宁写道，卡尔梅克的“每个兀鲁思各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和诺颜，而每个诺颜各有几名宰桑，他们中又各有自己的爱马克，就像俄国贵族有自己私人的农庄一样。他们这些爱马克中往往都有一些帐篷，数量不等，有的有5个、10个或更多一些，有的则有几百个、成千个或者更多。诺颜死后，其兀鲁思按份分给他的儿子们，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4张。

[2]正因为历史上中国游牧民族这种层层分封土地的制度造成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把生活的地方看做是本民族的领土，民族领土观念就成了他们的一种传统观念，也容易依靠各自的领地各自为政。本书作者基于此把各自为政的卫拉特四部都看做是独立国家，其实只是分别各自游牧的部落，或族的领地都是中国卫拉特蒙古族。——译者

其中大儿子较他的其他弟兄得到的要略多一些，这样的每份领地后来
410 称为特殊兀鲁思。宰桑死后，他们的爱马克也是这样分配”[1]。

帕拉斯也记载说，“王公（台吉）通常是把掌管自己百姓（兀鲁思）的权力……留给长子。而其余孩子则各分给数量不大的家庭，他们对这些家庭来说，也像王公对自己的百姓一样是宗主（诺颜），但不跟统治王公的兀鲁思分离，对他有某种从属和臣服的关系，也服从他的全部军事设施与和平设施”[2]。科斯坚科夫也证明：“台什是分成兀鲁思的整个部的执政者……最好、最大的兀鲁思由台什本人直接管理，而把不太大的分给儿子和兄弟们去管理并借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诺颜有时赋予自己以‘台什’称号，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台什，对这个政权是藩臣关系……为了就近控制爱马克，诺颜往往把它们分给自己的远亲或挑选过的称作宰桑的人。”[3]宰桑是世袭制，但领主——“把爱马克交给某人管理的诺颜，可以撤销他而转交给另一个人管理，这个人也就叫宰桑”[4]。

卫拉特史料——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和加班沙拉勃的两本《故事》，《咱雅班第达传》和俄国档案资料都证实了写这方面问题的巴库宁、帕拉斯、科斯坚科夫以及其他人的考察。贝可夫、翁科夫斯基、埃蒂格罗夫、乌格里莫夫的旅行日记和许多其他各种文件都证明，准噶尔汗国统治阶级的结构类似于卡尔梅克，证明那里也存在以汗为首的不大的一批大王公，他们下面有一大批依附于大诺颜的小王公，再下面则是依附于小王公的大批宰桑。

411 把准噶尔汗国和卡尔梅克加以比较，我们发现有一个重大差别：准噶尔汗国的中央集权比卡尔梅克牢固得多。毫无疑问，从巴图尔浑台吉时期起到噶尔丹策凌执政末期止，即100多年中，在准噶尔汗国没有卡尔梅克那么多长期严重的内乱。准噶尔汗的政权便比较容易对付大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51－52页。

[2]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300页。

[3]科斯坚科夫：《卡尔梅克历史和统计资料》，第30－31页。

[4]科斯坚科夫：《卡尔梅克历史和统计资料》，第32页。

小王公的分立主义意图，严惩每个企图抗拒汗的意志的人。当故汗的位置应由某继承人去继承的时候，这种抗拒行为往往由于执政者更替而发生。僧格接替巴图尔，噶尔丹接替僧格，噶尔丹策凌接替策妄阿喇布坦时就是这样。这些新汗上台时发生的骚乱每次都以“合法的”汗位继承人——绰罗斯斡孛黑的代表的胜利告终，而他的敌人如果还活着就不得不去伏尔加河或库库淖尔逃生。从内乱的角度看，特别平静的时期是18世纪前半叶。

用什么可以解释汗国的这种比较稳固的团结呢？看来，这里起作用的原因总结起来有这样一些：汗的土地财产的实力、他的相对军事优势、保证每个封建主能靠剥削阿拉特和跟定居邻族进行贸易交流来发财致富的巧妙的内外政策以及与清帝国和哈萨克封建主的战争的顺利等等。

宗教界王公，最高喇嘛们组成了准噶尔封建主的特殊集团，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如前所述，渐渐地通过王公丘尔干的一整套决议，特别是1640年法规而确定了下来。准噶尔的最高喇嘛阶层也像在整个蒙古一样，几乎仅仅是从封建主出身的人中进行补充，这些人主要是领主们很少有机会占据世俗执政者地位的小儿子们。贵族斡孛黑的这些小后代以教主的身份入主寺院，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他们也像其世俗同胞一样，可以得到兀鲁思作为领地，成为巨大畜群的拥有者。为他们分出专门的嫩秃黑，允许他们在世俗王公的牧场上无偿地，而且不受阻碍地放牧。他们剥削好几百，甚至好几千牧奴的劳动。喇嘛们在国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巨大威望，巴库宁写道，“这些群众为他们造大林场，以下跪表示尊敬，另外还把大喇嘛（汗国的最高喇嘛。——兹拉特金）或呼图克图当做自己的小佛爷。所以一般在卡尔梅克族和蒙古族中，诺颜和宰桑们都很乐意得到宗教头衔”[1]。

412

我们可以认为，咱雅班第达的威望和财富可能是特殊的现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他的传记与宗教界任何其他大活动家的传记之间有什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134张。

么质的差别。特引有关卡尔梅克汗国最高喇嘛硕呼尔的资料作为例证。他是1718年应阿玉奇的邀请来到伏尔加河的,阿玉奇"十分尊敬地迎接他,并给他一个卡尔梅克兀鲁思作为领地……其中当时共有4000帐篷。该硕呼尔喇嘛本是土尔扈特的卡尔梅克人,是一位宰桑的儿子"[1]。硕呼尔满10岁时,被送往西藏"去求学,在那里过了20岁时,学了唐古特语和有教衔的喇嘛应具备的其他学问,并做了当地一所寺院的喇嘛……和归那个寺院管辖的一个地区的主管"[2]。很可能,以王公斡孛黑中的诸小儿子补充许多最高喇嘛,也在准噶尔汗国的团结方面起了它的作用,而使王公领地的追求者人数日增的现象同满足他们要求的有限可能性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矛盾正是破坏卡尔梅克封建主阶级内部团结的主要力量。而在准噶尔汗国这种力量的作用则小得多,到18世纪前半叶就完全没有了。

413 总之,准噶尔汗国的封建主阶级分成4个集团:大王公、小王公、宰桑和高级喇嘛。上述集团的阶层差别在汗国的法令中并未作出完整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封建主的社会地位、权利和特权都取决于他们归属于某个集团。史料证明,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占有的等级。大王公作为自己领地全部牧场的所有主,把游牧用地在从属于他的小王公——独立兀鲁思的领主中进行分配。小王公是自己领地的全部嫩秃黑的所有主,并把它们在宰桑中进行分配。同时各级封建主都为了本人经济的需要而留下最好的牧场。宰桑与诺颜、小王公和兀鲁思领主不同的是,宰桑可能在任何时候由于诺颜、小王公和兀鲁思领主的裁夺而丧失领主权,变成一种好像无领地的贵族式的人。这种行动对于诺颜则不能用和平方式来实现。至于宗教界的王公,他们跟世俗同胞一样,是各兀鲁思和嫩秃黑的领主,跟世俗领主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被豁免了世俗领主需要尽的各种义务。

处于卫拉特社会另一极的是它的主要生产者阶级——阿拉特。这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11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11张。

一阶级分成两个阶层:阿勒巴图——从属于世俗王公和沙比纳尔——从属于宗教封建主。阿拉特阶级是支撑封建的卫拉特社会和准噶尔汗国整个大厦的基石。阿拉特的劳动是封建主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和封建国家稳定的决定性条件。阿拉特牧户为了在自己私人的小型的,但却是独立的畜牧经济中繁殖家畜而从事劳动。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保证封建主经济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到头来还得为封建国家的利益承担各种劳役。阿拉特完成许许多多劳役,但他们在封建社会中却没有任何权利。帕拉斯写到过:"台吉或叫诺颜,对自己的属民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按自己的旨意把他们随便送人,处以肉刑,下令割去他们的耳、鼻或截断肢体,只要不是明显地杀死。"[1]阿拉特为国家所服的最主要的劳役就是兵役。"蒙古族的每个平民或黑人(哈喇肯)一般都是军人,并应备有战马和武器,以便自己的王公一声令下便立即奔赴战场。"[2]

414

准噶尔汗国中阿拉特的义务基本上没有通过法律详细规定。我们只知道,1640年法规的某些条文和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一些指令曾要求阿拉特及时地严格完成他们所承担的赋税和劳役,同时以泛泛不加强制的形式劝说王公们莫使阿拉特负担过重而应关心他们。阿拉特牧户以牧奴的依附关系受自己主人的牵制。任何一个阿拉特均无权擅自离开其王公或宰桑的领地。反对阿拉特擅自迁移的斗争始终在蒙古和准噶尔汗国的封建法令中占主要地位。前面我们列举过一个"逃跑者"被摧残的事,他因逃跑而被毒打并被野蛮地打下烙印。还举过另一件事,即迁离主人处的阿拉特家庭同意为两个主人——老的和新的——同时承担劳役,只要不强迫他返回原地。卫拉特法律规定不仅要严惩逃跑的阿拉特本人,而且还要严惩接受他们和窝藏他们的王公。1640年法规规定窝藏逃跑的阿拉特,要比杀人受更严厉的惩罚,违者罚100副铠甲、100只骆驼和1000匹马。

---

[1]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299页。

[2]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390页。

立法者频繁地提出反对阿拉特擅自迁移问题的这一情况，以及对窝藏者惩罚得异常严厉，都证明：第一，阿拉特的这种逃跑现象成风，因而威胁到封建经济的巩固；第二，不择手段地，甚至借助窝藏逃跑的阿
415 拉特来增加自己兀鲁思的居民，对领主本身有切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史料并未证实否认那些研究者认为封建蒙古存在农奴制的见解，他们用单纯军事组织性质的理由来解释禁止离开该封建主领地范围的原因。假如问题只归结到这样一点上，那么，19—20 世纪当远征和战争已经不再使蒙古封建主感兴趣的时候，阿拉特就可以，也应该有权在国内到处自由迁移了。但是，大家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使阿拉特固定在封建领主土地上这点，直到 1921 年革命前还一直有效。[1]

封建主的大规模畜牧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足够的牧地和足够数量的独立阿拉特牧户，他们能以自己的劳动保证照料畜群并加工该封建经济的畜牧产品。阿拉特最重要的劳役就是牧放主人的牲畜，并且这些牲畜的完好无恙也像小牲畜的完好无恙一样，是由阿拉特私人畜群来保障的。拥有成千上万的羊和马，成百成千头的牛和骆驼的大规模经济又怎么能用另外的办法来组织照料畜群呢？在准噶尔汗国也像在整个蒙古一样，奴隶劳动在生产中只起不大的作用。把牲畜分给独立的阿拉特牧户去放牧是封建主组织大畜牧经济最典型和最适宜的形式。史料记载证明，17—18 世纪时，在拥有牲畜方面，准噶尔存在着极大的财产不均现象。封建主的产业中牲畜越多，他需要的能承担牧放
416 这些牲畜的独立阿拉特牧户也就越多，他们有能力保障牲畜的完好无恙和进行扩大再生产。在这样的经济组织下，封建经济发展的客观经济利益就造成了使阿拉特被固定在土地上，以及封建主渴望增加附属于他的独立阿拉特家庭等现象。在我们看来，17 世纪的卫拉特封建主和 17—18 世纪的卡尔梅克封建主彼此之间为争占兀鲁思，即争夺独立

[1]杰利卜呼图克图提供的事实可以作为上述情况的例证。1916 年，他决定维修自己的寺院。一个住在邻近旗里的蒙古木匠向他自请效劳。呼图克图与该旗的领主进行谈判，说服他暂时让出这个木匠。参看弗里兰德：《蒙古公社和氏族制度》，第 115 页。

的阿拉特家庭，为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属民，为使他们依附在自己的领地上而进行连绵不断的斗争，其经济意义也就在于此。史料中满篇皆是这种斗争的描述。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引用许多史料中的记载。感兴趣者可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和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的卡尔梅克、准噶尔、诺盖和吉尔吉斯—哈萨克等卷的存档文件中，找到这类资料的丰富记载。

卫拉特封建主的牧奴制在俄国资料中也得到了证实。特引1755年7月呈报枢密院的《外交事务部论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臣民哪些是自由民，哪些是牧奴》这一文件为例证。这个文件中提出允许俄国人购买"异教徒"，其中包括卡尔梅克人，"带有卖出者（即他们的汗、领主、台什）所给的身份证的……所有这类人，都是永世牧奴……同样，他们的汗和其他领主、族长等也可以拿这些卡尔梅克人随便送人……以他们签名盖章的信通知赠送的事或连信带人一起送来"[1]。所引的这份文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从事劳动的阿拉特在准噶尔汗国和卡尔梅克的社会地位和俄国农奴[2]的地位没有区别——双方的情况都是直接生产者依附在自己主人的土地上，主人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送等等。

总之，阿拉特有义务牧放主人的畜群，同时直到年迈高龄还得保持自己的武器装备的完好，准备为主人的利益一经召唤便去打仗。此外，他应当用自己的经济产品向领主缴纳实物代役租，完成国家的各种劳役（缝制服、在汗的作坊里工作、制造军用装备品等等），战时大车运输服役等等。正因为阿拉特牧户有义务完成这些劳役和其他许多劳役，所以阿拉特中就形成了阿勒巴图阶层（阿勒巴——劳役，阿勒巴图——服劳役者）。在准噶尔汗国中这一阶层的情况也是这样。 417

准噶尔的第二个阿拉特阶层是沙比纳尔。这个阶层是由于喇嘛教得胜和宗教封建主出现而产生的。沙比纳尔（来自"沙比"一词——"门徒"、"见习修道士"）是高级喇嘛的牧奴，并为这些喇嘛的利益，像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55年，第119/5号，第17卷，第43－46张。

[2]此处原文为 крестьянин（农民），而文中说"主人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送"，故应为农奴。——译者

阿拉特—阿勒巴图为世俗封建主的利益一样，承担同样的劳役。但是沙比纳尔完全豁免为领主和封建国家服役。他们不服兵役，不服国家的劳役。他们是宗教界王公的完完全全的世袭属民，这些王公剥削他们也像世俗封建主剥削其阿勒巴图一样，而且基本上使用同样的方法。甚至在司法方面，沙比纳尔也不属世俗行政机构管辖，而属宗教机构管辖。

增加沙比纳尔的人数，对于作为封建主的宗教界王公大有裨益，但这要靠减少许多阿勒巴图才可能达到。阿勒巴图很乐意当沙比纳尔，因为宗教封建主对他们的剥削最厉害也比世俗领主的剥削轻一些。基于这点，世俗的和宗教界的封建主之间便发生了斗争，并且逐渐加剧。例如，俄国档案资料中所记载的一件事说的就是这种斗争。1732 年末，一个叫列克坚的阿拉特从卡尔梅克“逃来”察里津，他说“他以前曾经是属于领主敦多卜达什兀鲁思的宰桑纳克拜的。由于不愿在那里奴颜婢膝地效劳，所以还在年幼时他就到……兀鲁思去当格隆爱姆钦的沙比纳尔了，而且结了婚，住在这个兀鲁思的单独帐篷里……去年他被敦多卜鄂姆布俘虏。这个敦多卜的卡尔梅克人得知他不是本来的沙比纳尔之后，就夺走了他的全部牲畜和东西，带往自己的兀鲁思，他就到了列克别伊宰桑的爱马克中……”[1]。所引的这件事不仅对于卡尔梅克，而且对于准噶尔汗国也是有代表性的。

418

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与喀尔喀和南蒙古不同，在准噶尔和卡尔梅克没有哈姆扎加阶层。我们知道，喀尔喀和南蒙古在并入清帝国之前也没有这个阶层。由此可见，哈姆扎加阶层是清朝当局造成的，他们力求彻底整顿蒙古军队的组织，从有兵役义务的人的名单中取消了世袭牧奴（哈姆扎加）、沙比纳尔和达尔罕。

达尔罕基本上是由阿拉特牧户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阶层，由于特殊的功勋而豁免了一切赋税和劳役，并享有某些其他特权。据阿布里加齐说：“达尔罕是指不交贡品的人。他来汗家里时，谁也不能阻拦他，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732 年，第 6 卷，第 739 张。

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假如他犯了罪,可以累犯9次不受惩罚。9次之后就要处罚了。这种权利还世袭相传直到第9代。"[1]从现有全部资料看,达尔罕阶层在准噶尔为数不多,它对卫拉特社会的生活未发生显著影响。

试图把卫拉特有兵役义务的人划分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做法应予否定,因为服兵役是阿拉特与阿勒巴图应服劳役之一。

卫拉特社会中,除了封建主和阿拉特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奴隶阶层。重要的是必须指出,17—18世纪的蒙古和卫拉特史料中很少提到奴隶,有关他们的资料我们在这些史料中见到的实在太少了。这一情况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奴隶劳动在卫拉特社会的生产实际中没有太大意义。史料还证明,奴隶仅仅是或者几乎仅仅是战斗中抓来的俘虏,本来的卫拉特人变成奴隶的情况看来是极为罕见的。准噶尔的奴隶是可以卖给俄国商人和官吏或运往中亚奴隶市场去的商品,但并不是每个俘虏都变成奴隶并去出卖。俘虏在汗国很被珍视,因为可用他来赚到赎价或交换自己被俘的人。 419

噶尔丹策凌和他的大臣们拒绝了乌格里莫夫少校把俄国俘虏连同他们在准噶尔娶的任何种族的妻子都放回俄国的要求。噶尔丹策凌的代表巴图尔宰桑对乌格里莫夫说,这点"不可能做到,因为他们的妻子是哈萨克人和布哈拉人,我们经常要用他们交换俘虏"[2]。噶尔丹策凌本人对乌格里莫夫所说的话也一样,他当时竭力想讨好俄国政府以期得到军事援助,便同意把俘虏和他们的妻子放回俄国,"只是哈萨克女人除外,因为我们与哈萨克人商定,双方都不把俘虏弄到任何其他地方去,要在以后进行交换"[3]。巴库宁在归纳他对卡尔梅克社会的实际生活的多年观察时,曾写到俘虏的作用,"抓了俘虏,往后进行赎

[1]《阿布里加齐的往事》(История Абуль-Гази),载《别列津出版的东方历史学家丛书》(Библиотека восточ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издаваемая И. Березиным),第3卷,第1部,喀山,1854年版,第53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04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3卷,第127张。

换”[1]。

19—20世纪的旅行者和研究者的著作中有一些关于卫拉特、哈萨克和俄国其他游牧民族那里的奴隶和俘虏的资料。[2] 所有这些资料也像较早期的史料一样证明了前面得出的结论:奴隶在卫拉特社会的生产劳动中不起任何显著的作用。

420 准噶尔汗国居民的总数有多少?比丘林引证过19世纪20年代发表的《新疆志略》[3],认为18世纪中期准噶尔总共约有20万帐篷(即家庭),总计60万男女人口,其中将近半数是汗本人的土地财产中的组成部分。[4]

很遗憾,我们在蒙古史料中找不到对准噶尔行政设施和政治制度的完整描述,因此不得不利用俄国档案资料和对卡尔梅克汗国的记述。但是“霍顿”这个由相近血统关系联系在一起共同进行游牧和管理事务的家庭集团,无疑是卫拉特社会的基层组成单位。根据科斯坚科夫的考察,卡尔梅克的霍顿是由曾祖父、祖父、父亲、儿子和孙子组成的,由其首领,即这个大家庭中年龄最高的代表管理这一结合体的事务。[5] 霍顿的组成人数不定,它可以联合5个、10个、50个家庭。据现有全部资料看,这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公社,从它共同使用牧场这点看,可以认为土地使用的公社形式在卡尔梅克占优势,这是肯定的,因此在准噶尔也肯定是这样。

几个霍顿组成爱马克,或叫鄂拓克——封建领地的基层。爱马克或鄂拓克的集团组成兀鲁思,而兀鲁思的总和就是卫拉特封建国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35张。

[2]佐勃宁(Ф. Зобнин):《吉尔吉斯草原的俘虏、奴隶和丘列古特人的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невольниках, рабах и тюленгутах в Киргизкой степи),载《1902年谢米巴拉丁斯州的备忘手册》(Памятная книжка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 1902г.),谢米巴拉丁斯克,1902年版,第6册;《勃罗涅夫斯基少将的笔记》(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а Броневского),载《祖国丛刊》,1830年,第119、120期。

[3]杜曼(Л. И. Думан):《18世纪末清(满洲)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инского(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Синьцзяне в конце XVIII век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第42-46页。

[4]雅金夫:《从15世纪迄今的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第130页。

[5]科斯坚科夫:《卡尔梅克人历史和统计资料》,第32页。

家——准噶尔汗国。

准噶尔汗借助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扎尔戈来管理国家。巴库宁曾写道:“用他们的话说叫扎尔戈,而用我们的话说是法庭。它通常设在汗的住所附近,在一个单独的帐篷里,由汗最信赖的重要宰桑参加,其中往往有一两名汗能信得过的教士,照他们古老的习惯,其人数不超过8人,准噶尔各汗和主要领主——他们称之为‘叶赫诺颜’,即大王公的扎尔戈中,也往往保持这个人数。” 421

这个政府机关的需要由定额的司书、监管员、听候差遣的服务员和其他仆人照料。在扎尔戈的公廨里还放有写在白布上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扎尔戈的8名主要成员被称作图沙喇格齐和扎尔格齐,即顾问、助理和法官,而所有这些人总称为沙伊达,即大臣。

“全卡尔梅克族的管理事宜,都要由这个扎尔戈来决定。并在这个机构中起草汗给卡尔梅克领主们的有关……公开事务的指令。初稿提交汗核准,然后誊清并盖上汗的大印,它保存在汗最信任的一个首席宰桑那里。”[1]

扎尔戈对诉讼进行审理。对特别重大的事件和法官间意见不一的判决才呈交汗审批。我们不能很有把握地说明扎尔戈成员之间的分工情况,但是从乌格里莫夫外交代表团的材料中得知,他们中有一个是汗的金库总管,即有点类似于财政部长的人。

巴库宁论述扎尔戈的作用和活动的资料也为帕拉斯的观察所证实。他写道:“这个扎尔戈被认为是政府的议事会和全汗国主要的上诉法院。”[2]相同职能的类似机构存在于每个兀鲁思中,“以便在自己的臣民间行使司法权”[3]。它也称作扎尔戈。

卫拉特社会的内部生活以及封建政权机关的活动,不仅受习惯法,而且受成文法准则的控制,其中1640年法规具有最重大的作用。

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执政年代,准噶尔汗国开始在东亚和 422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卡尔梅克卷宗,1630-1736年,第119/1号,1a卷,第139-140张。

[2]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300页。

[3]帕拉斯:《历史学报汇编》,第300页。

中央亚细亚起巨大作用，在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历史上和对外政策方面占据了显著地位。它变成了一个有较高组织水平的统一的卫拉特国家，具有牢固的中央政权，顺利克服了地方王公分立主义的倾向。

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力图巩固准噶尔这个卫拉特封建国家的团结，加强汗的政权的影响和地位，发展自身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则是汗国成为当时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决定性原因。

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把喀尔喀归并于准噶尔汗国，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绰罗斯王朝控制下的统一的蒙古国。这一对外政策的局部任务是恢复巴图尔浑台吉时代存在过的汗国边界。为此，两位准噶尔汗力求夺回 17 世纪末转归喀尔喀的那部分领土以及 18 世纪初并入俄国的领土。准噶尔执政者所以要推行这种对外政策，既迫于卫拉特封建主自私的阶级利益，也迫于牧场资源的大量缩减。牧场减少造成“土地紧张”，使卫拉特国家面临新危机的威胁。

准噶尔汗国的对外交政策的纲领不可能不遭到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政府的反对。清朝抱定宗旨要坚决地、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汗国，因为它已成为骚扰帝国西部和西北部边境的重要祸源，清朝决意除掉卫拉特封建国家而把准噶尔并入帝国，这就会使帝国在西部和北部更加
423 扩张。于是就发生了冲突，它导致了一系列的战争。1739 年的和约一方面反映了清帝国的失败，它未能摧毁卫拉特汗国而被迫承认它是一个主权国，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准噶尔执政者的失败，他们不仅未能达到归并喀尔喀而建立统一的蒙古国的目的，而且被迫放弃对已转归喀尔喀的那部分领土的要求。

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的领土争端没有导致战争，因为双方都害怕战争。汗国没有力量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俄国则忙于解决与其西部边境形势有关的更重大的任务。长期的外交谈判没有从任何一个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准噶尔的执政者未能达到归还喀尔喀和南西伯利亚牧地的目的，便热衷于猛攻哈萨克封建主，后者也力求靠牺牲卫拉特国家而扩大自己的领地。哈萨克封建主由于内部涣散，不能抵抗因统一而强大的准噶尔汗国的进攻。18 世纪上半叶，这个汗国成了威胁独立的封建哈萨克斯坦生存的主要危险。准噶尔的多次猛击把哈萨克封建领地挤出了谢米列契，其中若干领地则处于卫拉特国家的控制之下。

卫拉特封建主对牧场的独占所有制构成了准噶尔汗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基础。准噶尔汗国是卫拉特封建主的国家，是他们统治的工具，它通过剥削阿拉特以及借助对外贸易和对外战争来保证他们发财致富。在卫拉特国家中，土地占有的等级被合法化了，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整套封建等级制度。

牲畜是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畜牧劳动的产品，起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纵然不是唯一的形式）的作用。为了分配国家的这种主要财富，为 424
了争夺阿拉特所生产的大量总产品中的份额，卫拉特社会的阿拉特和封建主这两个阶级之间，以及封建主阶级内部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准噶尔汗国人民群众的处境极端困难。阿拉特受其领主的剥削，被束缚在领主们的土地上，丧失了种种权利，被迫为封建主及其国家的利益完成许许多多的劳役，他们当时看不到摆脱自己苦难处境的出路。他们进行反抗和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擅自迁徙或转入能豁免兵役和豁免某些其他劳役的沙比纳尔阶层。

425

6 准噶尔汗国的覆灭

噶尔丹策凌的死和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中间相隔13年。这些年的历史的基本内容是卫拉特封建国家不断加速瓦解,而于1758年终于被消灭。清帝国和准噶尔汗国的斗争几乎延续了一整个世纪,以有利于清人的结局告终。清军不仅彻底消灭了卫拉特国家,而且以杀戮数十万卫拉特居民而获得全胜。

这些年的凄惨事件在比丘林有关准噶尔和卫拉特人的一些名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关于这些事件,雷奇科夫、利波弗采夫、列弗申、瓦利汉诺夫、维纽科夫、克拉索夫斯基、瑟切夫斯基、库罗帕特金、班蒂什·卡缅斯基、库尔茨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写过。如果说比丘林和利波弗采夫的著作基本上是以中国的史料和史籍为依据的,那么雷奇科夫、列弗申、瑟切夫斯基和班蒂什·卡缅斯基则大都是根据俄国档案文件写的。其余作者通常是步上述历史学者的后尘,偶尔用他们所找到的一些文件或援引各地的传说和神话加以补充。

从国外的文献中,我们只能指出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库兰的著作,以及专门研究1755年准噶尔军事行动的著名东方学家海尼施的著作。库兰是从准噶尔汗国为在中央亚细亚建立卫拉特帝国而斗争这个角度来研究准噶尔汗国史的。按库兰的见解,卫拉特国家要达到这个目的,
426 就不可避免地要和清帝国发生冲突,因为清帝国也力求靠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来扩大自己的疆域。库兰认为,为建立帝国而斗争是准噶尔汗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根据这点,他把研究局限于准噶尔汗国的对外政策史方面。

海尼施赞同库兰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50年代的事件不是局部的小事件,而是有国际意义的大事件。他写道:“问题在于中央亚细亚

是归满洲国家，换句话说，是归中国呢，还是变为新的蒙古大国。”[1]库兰和海尼施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典型的传统看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海尼施的著作中有他从满文译成德文的一些文件，很有价值，它们阐明了1755年军事行动的进行情况。

在准噶尔汗国最后几年的历史事件中，正如许多史料所确认的，有3个主要参与者：卫拉特本国、清帝国和俄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要求吸收卫拉特文、满文（或汉文）以及俄文的史料。但是我们没能弄到卫拉特文史料，大概它们在1754—1758年的战火中全被毁掉了。满文和汉文的史料看来大多数还封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档案库中，有待发表。我们多少可以利用的是在《蒙古游牧记》和海尼施的著作中所公布的某些材料。

我们所知的蒙文和卡尔梅克文史料中，没有这一时期的卫拉特历史资料。于是很明显，我们手头只可能有俄国史料。但是只根据俄国档案资料能否充分而全面地叙述准噶尔汗国覆灭的历史呢？能否揭示历史活动家的作用，揭示人民群众参加这一时期事件的真实规模及其性质呢？

当然不能。俄国档案资料不能详尽无遗地回答提出的这些问题。427
但它们完全能够，而且也正在对卫拉特封建国家的瓦解和崩溃提供基本上客观可靠又比较详细的情况。

俄国史料之所以具有比较客观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帝国处境特殊，它的统治集团虽然也想保持独立的准噶尔汗国，但又不无理由地怕准噶尔过分强大。俄国对卫拉特这种骑墙态度的结果，是俄国当局一直在有组织地留心观察汗国所发生的事件。奥伦堡和托博尔斯克成了进行这种观察的要地。来自准噶尔的和有关准噶尔的所有情报都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里。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省的省长们定期地、相当频繁地向彼得堡提供“有关当地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中附有与准噶

[1]海尼施（E. Haenisch）：《1755年中国在伊犁的领土扩张》（Der Chinesische Feldzug in Ili im Jahre 1755），柏林，1918年版，第4页。

尔邻接的各地区和各要塞送到省署的许多呈文。这些附件中有当地军事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使者和信使、商人及其经理人的各种口头和书面报告,也有短期路过准噶尔或长期居住在那里因而目睹一些事件的人们的各种报告。档案资料中占有很大地位的大量资料,是普通卫拉特人和来自准噶尔的卫拉特贵族代表所提供的,他们反正参与过那里展开的斗争。阿睦尔撒纳在当时的卫拉特历史上起过卓越的作用,与他的生活和活动有关的材料,他个人对俄罗斯当局的口头和书面请求,同他以及同他的使者的谈判等等材料,特别值得玩味。重要的是要指出,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材料,绝大多数都是附有提供人亲笔署名的原本文
428 件。同时,最高枢密院、外交事务部和俄国其他政府机关给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的总督、军事指挥人员的命令抄本,这些机关给沙皇的报告,以及同清帝国政府机关的来往外交公文,都具有很大的价值。

上述材料主要收集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中,有的收集在"吉尔吉斯—哈萨克卷宗"和"卡尔梅克卷宗"中。文件数量很大,内容包罗万象。如果把其中的资料加以对比和验证,就有可能确定一些无可争辩的或者十分可能的事实,这样就可以提出(我们相信这点)一部基本上可靠的关于那些年事件的大事记。

如果说列弗申和雷奇科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利用了奥伦堡档案中涉及准噶尔汗国覆灭情况的某些文件的话,那也只限于跟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有关的部分。瑟切夫斯基远为广泛地收罗了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边区总署的档案,而班蒂什·卡缅斯基则吸收了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库的档案,这有助于更好地阐明18世纪中期的一些与俄、中两国在蒙古和准噶尔问题上的矛盾有密切关系的事件。与上述研究者的著作不同,我们对卫拉特国家覆灭史的叙述,在我们看来,基本上是充分而又全面地利用了前面提到过的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珍藏的文件资料的。我们有意识地不去研究与那些年的主要事件无关的,以及对主要事件没有重大影响的个别事实,特别是属于这类事实中的:接继汗位时间很短的执政者从准噶尔派往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的外交代表团,与这些执政者的谈判等等。

1962年末，为了纪念喀尔喀和准噶尔的蒙古人的解放斗争，纪念阿睦尔撒纳和青衮杂卜的起义，在乌兰巴托发表了年轻学者伊然姆兹的一部著作：《1755—1758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伊然姆兹的研究完全以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蒙、汉档案原件和编年史原稿为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应该指出，由伊然姆兹的书公诸学术界的新史 429
料，大体上与我们前面列举过的一些史料完全一致。

噶尔丹策凌之死，在汗位的继承人和觊觎者之间引起长期的内讧，这终于决定了卫拉特国家的瓦解和覆灭。

噶尔丹策凌有3个儿子和好几个女儿。长子喇嘛达尔札在他父亲死的那年刚满19岁，次子策旺多尔济纳木札尔刚13岁，幼子策旺达什刚7岁。噶尔丹策凌遗嘱由次子继汗位，他遂于1746年登位称阿扎汗。但是他在位时间不长。1749年被谋篡推翻并杀害。喇嘛达尔札成了准噶尔汗，号称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洪台吉。可是，他执政时间也不长。有爵位的卫拉特贵族不愿承认喇嘛达尔札这个非显贵出身的人为汗，因为他是噶尔丹策凌的私生子。所以又出现了废喇嘛达尔札，立年幼的策旺达什为汗的新阴谋。但阴谋被揭露，参与者受到了严惩。

俄罗斯的大臣别斯图热夫·柳明在1756年1月27日把这些事件告知了卡尔梅克汗国的全权代理人：对策旺多尔济，“参加密谋的准噶尔宰桑起先把他废了，然后杀了他，并不让近亲的继承人——大策凌敦多卜的孙子继位，而让纳木札尔的儿子达巴齐[1]即位，推噶尔丹策凌私生子，喇嘛达尔札摄政，称之为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洪台吉”。而达巴齐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逃奔中哈萨克玉兹阿布赉处，“逃往那里的还有和硕特族诺颜阿睦尔撒纳”[2]。

政权落入喇嘛达尔札之手使汗国的形势更加紧张。从卫拉特大臣 430
纳乌哈特和加班格隆给西伯利亚总督米雅特列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

[1]策旺多尔济即策旺多尔济纳木札尔。纳木札尔是大策凌敦多卜的长子，全名应为纳木札尔达什。达巴齐即达瓦齐，下同。——译者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127张。彼得堡弄错了，认为阿睦尔撒纳出身于和硕特贵族。其实，他属于辉特部。

“除了那些同他(喇嘛达尔札。——兹拉特金)观点一致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鄙贱的,他们感到受了极大侮辱,于是几乎整个准噶尔都心向达巴齐诺颜”[1]。

于是便又出现了一个争夺汗位的人—— 达巴齐,他的族系出身使他有权优先继承汗位。他的氏族领地也像另一个卫拉特诺颜阿睦尔撒纳的领地一样,在塔尔巴哈台,达瓦齐当时跟阿睦尔撒纳联系紧密,关系很好。

他们两人积极参加了反对喇嘛达尔札的斗争。起初他们遭到失败,1751 年被迫逃往哈萨克中玉兹,在阿布赉那里避难。一年后,他们两人返回祖国,并重新开展反对达尔札的斗争。喇嘛达尔札在 1753 年初被他们杀掉,达瓦齐当了汗国的统治者。但是这里一些“势力较小的宰桑和诺颜崛起”[2],他们也立自己的傀儡——纳默库济尔噶尔为汗。准噶尔一下子出现了两个汗。不过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推翻了纳默库济尔噶尔和托古斯哈什哈,并杀了这两个人,重新称汗。[3]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阿睦尔撒纳正如同代人所写的“真是不惜自己的生命”帮助了达瓦齐。为了报答他的效忠,达瓦齐答应封给他富庶的领地。镇压了敌人的反抗之后,达瓦齐于 1752 年末与 1753 年初之间开始当卫拉特汗。

但是,这时的汗国已经远不是噶尔丹策凌时期的那种情况了。汗国进入了衰落时期,这首先表现在卫拉特国家的统一被破坏,中央汗权的威信和强制力崩溃,而这种威信和强制力是汗国强盛的主要条件。

密切注视汗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清人,立即利用了卫拉特汗国削弱
431 的这个机会。自从缔结 1739 年和约以来,双方——清帝国和准噶尔汗国——都力求不破坏共同议定的疆界,而且都警惕地守卫着它。清军大批驻扎在巴里坤、哈密、莫多库勒、哈喇乌苏、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地区。虽说清帝国和卫拉特汗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却也没有任何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6 卷,第 36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6 卷,第 36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6 卷,第 36 张。

睦邻关系，没有任何贸易往来。

1750年出现了卫拉特国瓦解的最初征兆。这年11月有几户卫拉特人从准噶尔逃走，他们决定到清帝国去寻找生路，逃避内讧和战争所带来的损害。过了几个月就有大批由代姆奇（代姆奇是40户家庭的户长）带领的卫拉特家庭投奔中国。

当时在北京也出现了从卫拉特汗国逃来的官员。于是卫拉特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社会各阶层的人转入敌对阵营的现象。

清朝当局慷慨赠送礼品给每个投诚者，让他们享受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待遇，并赏给贵族和官吏的代表人物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封号和身份。同时清政府又开始备战，它正确地认定，在内部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准噶尔汗国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反抗。弘历政府为了行将到来的战争着手动员兵力。

1751年春天，喇嘛达尔札的使者来到北京。他表示愿与皇帝友好往来，答应维护和平，但要求给他10万两银子作交换条件。喇嘛达尔札的提议遭到拒绝，并且向他的使者宣称，“希望他们（指卫拉特人。——兹拉特金）今后不要派外交代表团来北京，因为他们不是为派代表团，而是为做买卖而来的”[1]。1751年秋，这个卫拉特外交代表团返回了准噶尔。

1752年，清政府加紧了对卫拉特的战争准备。喀尔喀接到一项命令，要对适合服兵役的男人和他们的武器毫无例外地进行普查和登记。定于1752年夏季在额尔德尼召检阅喀尔喀部队。这里修了要塞，从要塞卫墙到卫拉特边境没有一连串岗楼和哨所，这些地方都由喀尔喀王公的军队把守。从1753年春天起，配备有炮兵，储备有大量武器、装备和粮食的清军新部队开始在准噶尔边境集结。

1753年秋天，又有以噶尔丹策凌的两个孙子和两个宰桑为首的3000多户卫拉特人从准噶尔逃到中国。看来他们对达瓦齐在争夺卫拉特汗位中得胜心怀不满。清朝执政者为有这些投诚者万分高兴。诺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1卷，第4张。

颜和宰桑都被送到北京，光荣头衔和奖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弘历皇帝并不吝啬。清政府开始强行向喀尔喀劳动者征收马匹和其他家畜，以便分给穷困的卫拉特人。清政府给逃过来的诺颜们拨了喀尔喀东南角极边的、远离这些诺颜故乡的达里甘加地区作为牧地，而拒绝了把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之间的地区拨给他们的请求。因此，在投诚者中很快滋长了一种不满情绪，他们已经对离开准噶尔故土感到后悔了。不久，守卫在卫拉特边境的清军扣留了两个企图从清朝领地逃往准噶尔去的背叛者。经搜查发现他们携带着一封致准噶尔王公的信。信中说到，清朝当局不相信投诚过来的人，也不给他们丝毫自由，说清朝当局在准噶尔边境加紧补充军队，并说卫拉特应当加强兵力，提高警惕，驻兵于边界附近，“如果战争爆发，他们这些跑过来的人愿帮助浑台吉”[1]。

清朝执政者加速准备向准噶尔进军。被指定入侵准噶尔汗国的军
433 队中，除满族士兵以外，开始广泛吸收汉人、南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他们都要在满人领导下作战。清政府公然准备利用已形成的有利形势，入侵准噶尔并永远消除卫拉特封建主的这个国家。这次它估计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担当这一任务，所以没有在伏尔加河寻找同盟者，也没有来求援于俄国。

至于沙皇政府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就是在这样危急的年代里仍然没有改变。俄国和卫拉特的贸易在噶尔丹策凌死后也丝毫不受限制，继续顺利发展。为了避免纠葛，俄国政府甚至照旧不阻挠汗国在俄国这样一些地区征收实物税：像巴拉巴草原、阿尔泰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那儿居住着入俄国国籍已 100 多年的原属卫拉特汗的克什提姆的居民。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与准噶尔接壤的广阔边境地区巩固自己的阵地，这一地区大约起自咸海沿岸而延伸到阿穆尔河，筑起了巩固的防线，这些防线逐渐向东南部、现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深处推进得越来越远。1745 年，俄国正规军的 2 个步兵团和 3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1 卷，第 53 张。

个骑兵团首次开进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停地抱怨说,要把军事政治形势从根本上改变到有利于俄国方面,则这些军队仍然太少了。

1755 年初,清军势必侵入准噶尔的形势已非常明显。西伯利亚驻军司令克罗弗特将军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做到,"万一敌人进而侵犯当地的俄罗斯边防要塞和前哨,由于急迫需要并由于正规和非正规部队人数极少,可根据部队的要求,根据紧急需要的情况,从工厂和库兹涅茨克的主管部门,以及外来的哥萨克中抽人增援,以便很好地反击敌人,不使忠实的臣民破产,不使皇上的军队蒙受耻辱。而且要让每人都有能用的自卫枪支"[1]。1755 年夏天,克罗弗特向外交事务部就应否接受从满人的刀剑下逃到俄国境内求生的难民问题述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不应接受他们,因为清帝国的军队会追踪难民而出现在俄国。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在"上额尔齐斯河以及其他防线的要塞里,驻防小队人数极少,假如恶贼和敌人进犯,不仅无能驱除他们,恐怕连自卫都不可能"[2]。 434

这个关于俄国军力软弱的报告并不夸大。虽然这时已经修筑好了 3 道主要的边境防线,并已设计了第 4 道,在这些防御工事中也驻有军队,有些地方还配有炮兵,但这些防线全长达 2500 公里,要塞彼此相隔 30 多公里,要塞之间空无守卫,部队很少而增补兵员估计是不可能的。[3]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地方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的顾虑是完全有根据的。

噶尔丹策凌的继承人喇嘛达尔札看到俄国兵力不足,曾于 1751 年要求俄国当局拆毁修建在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防御工事。他断言,这块地方是属于准噶尔汗国的,因而那里的居民也是卫拉特汗的臣民。

哈萨克与卫拉特的相互关系继续使俄罗斯当局极为不安。哈萨克封建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利用卫拉特国家的衰弱。还在1745年,奥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 - 1757 年,第 4 卷,第 8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 - 1757 年,第 4 卷,第 28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 - 1757 年,第 4 卷,第 250 张。

435 伦堡省长涅普留耶夫就不得不劝说中玉兹执政者放弃他们入侵卫拉特兀鲁思的打算。沙皇政府力求不让卫拉特与哈萨克封建主之间发生新的武装冲突,但同时又竭力阻挠他们双方力量的联合,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利益的严重威胁。沙皇政府对喇嘛达尔札和哈萨克汗阿布尔海伊尔间通婚的提议极感不安。1749 年,为娶阿布尔海伊尔的女儿曾专门派来了一个外交代表团,哈萨克封建主原准备接受喇嘛达尔札的求婚,可是因未婚妻病夭,这桩事就此结束。

当准噶尔展开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时,哈萨克封建主特别卖劲。他们乐于接受邀请,参与汗位争夺者的武装斗争,从而加剧了卫拉特国家的解体和混乱。1751 年秋,中玉兹的执政者阿布赉,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把被喇嘛达尔札击败的卫拉特诺颜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收留在自己那里避难。当这个消息传到彼得堡时,彼得堡于 1752 年 8 月 31 日给奥伦堡涅普留耶夫和捷弗凯列夫将军发了一道命令:"要竭力争取前者(指达瓦齐。——兹拉特金),因为他是目前有希望控制全准噶尔族的人,而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人,因为是那里的准噶尔统治者的叔伯兄弟,为了往后的事,尤其是关于准噶尔领主对西伯利亚领土纠缠不已的要求,应尽可能加以抚慰并召来奥伦堡。"[1]

为执行政府的命令,涅普留耶夫和捷弗凯列夫于 1752 年 9 月从奥伦堡派出亚科夫列夫大尉。涅普留科夫和捷夫凯列夫在 1755 年 8 月 10 日给政府的报告中,在提到这件事时说:亚科夫列夫"在该玉兹已经找不见他们这两位领主了"[2]。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返回了准噶尔,组织对喇嘛达尔札牙帐的突然袭击,把喇嘛达尔札抓住杀了。紧接着,他们在阿布赉苏丹的帮助下击溃已经提到过的纳默库济尔噶尔集团和支持他的杜尔伯特王公。达瓦齐当了准噶尔汗。

436 还有一个目睹者——派往准噶尔学习卫拉特语的托博尔斯克贵族阿历克赛·普洛特尼科夫的报告谈到了这些年的事件。他在喇嘛达尔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316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316 张。

札的牙帐时，曾见到部队聚集到那里，为了“搜查逃跑的诺颜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和班珠尔”[1]。同时喇嘛达尔札遣使向阿布赉苏丹要求交出逃犯。阿布赉借口连丧家之犬也不准交出的风俗回绝了这一要求。1752年8月21日，使者带着这样的回话离开哈萨克。1752年9月9日，喇嘛达尔札命令军队“从边境的兀鲁思出动，分批开往吉尔吉斯人（指哈萨克人。——兹拉特金）那里，每个诺颜和宰桑各带单独的一个小队”[2]。普洛特尼科夫于1752年11月7日离开喇嘛达尔札的牙帐，次日他来到杜哈勒宰桑的兀鲁思，他的一支500人的队伍驻扎在纳伦河。12月9日深夜有急使来杜哈勒那里报信说，发现了“逃跑的诺颜”的踪迹。根据普洛特尼科夫的观察，“下民不信现在的这位领主能长期掌政”[3]。

史料没有记载有关1752年最后几周和1753年上半年一些事件的情况。只知道，1753年8月23日，彼得堡正式通知喇嘛达尔札的使者说，俄国政府获悉他们的汗被杀。[4] 过了8个月，1754年4月27日，外交事务部参赞巴库宁对准噶尔使者说，达瓦齐诺颜杀死他们汗的消息已经完全证实。从这些资料可以得出结论，喇嘛达尔札是在1753年初被杀的。

但是达瓦齐的登位并未巩固汗国的政权。过了不久，他的不久前的同盟者和朋友阿睦尔撒纳使起来谋叛新汗。许多史料证实，他们两人在反对喇嘛达尔札的时期和达瓦齐即位初期曾保持友谊与同盟。关于他们一起逃往阿布赉那里去的情况，别斯图热夫·柳明在前面提到过的一封给卡尔梅克汗国执政者的信中补充说，他们两人在阿布赉苏丹那里的“时间不短，后来达瓦齐诺颜在准噶尔人民中召来一批人，突袭喇嘛达尔札领主并把他杀了”。但是部分诺颜不愿服从达瓦齐而“带了一批人离开了他”[5]。从另一些史料了解到，正如我们已谈过的

437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西伯利亚衙门卷宗，1746—1754年，第1卷，第80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西伯利亚衙门卷宗，1746—1754年，第1卷，第80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西伯利亚衙门卷宗，1746—1754年，第1卷，第80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6年，第4卷，第1张。
[5]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127张。

那样，达瓦齐即位后不久就开始反击萨拉满济的儿子纳默库，1753 年末阿睦尔撒纳击溃了谋叛达瓦齐的噶尔丹多尔济和纳默库济尔噶尔。[1]

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联盟的基础是什么呢？史料没有提供能够有把握地回答这一问题的资料。大家知道，两位诺颜的领地位于塔尔巴哈台，而且相依为邻。达瓦齐是巴图尔浑台吉的直系后裔，满有理由争得汗位。至于阿睦尔撒纳，他不属于卫拉特贵族中有威望的阶层。尽管在所叙述的这个时期他控制有大约 5000 户牧奴，他却出身于小贵族“察罕图克辉特”（白旗辉特）。阿睦尔撒纳的祖先在 17 世纪初曾同和鄂尔勒克的土尔扈特人一起离开准噶尔，在 18 世纪初以前生活在伏尔加河一带。他的祖父于 1701 年随同桑扎卜从伏尔加河来到准噶尔就被留住了。阿睦尔撒纳的父亲伟征和硕齐娶了噶尔丹策凌的女儿，[2]婚后 1722 年就生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的第一个妻子是德勒克多尔济——杜尔伯特一位王公的女儿，她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第二个妻子是他的死于天花的哥哥的遗孀比杰伊，她有一个儿子布楚克。

根据许多史料记载无可争辩地得出结论，1754 年以前，阿睦尔撒纳不仅对达瓦齐应该登汗位没有异议，而且千方百计帮他占据了这个位子，把达瓦齐的敌人看做他自己的敌人。据宰桑诺乌哈特和加班格隆说，达瓦齐答应把游牧于古尔班—莫多地区的一些兀鲁思赐给阿睦尔撒纳以酬其功。可以认为这些资料是真实的。

438 在这一时期，以阿布赉苏丹为首的中玉兹当局积极援助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1753 年 12 月 26 日，维列弗金准尉向自己的司令员报告了他所获得的有关达瓦齐和萨拉满济打仗的资料。“这些吉尔吉斯人对达瓦齐曾给以帮助，经过他们的帮助，粉碎了许多卡尔梅克兀鲁思，并带来了俘虏……阿布赉苏丹曾率自己的兀鲁思去进行这种帮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3 卷，第 51 张。

[2]《藩部要略》卷 10《厄鲁特要略二》：“策妄阿喇布坦侦拉藏汗嗜酒无谋，以女博托洛克为噶尔丹丹忠妇。”又载：“阿睦尔撒纳方孕未产，其母博托洛克改适辉特台吉伟征和硕齐而后生。”则阿睦尔撒纳之母不是噶尔丹策凌之女，应是其姐。——译者

助。”[1]1754 年 1 月 4 日，维列弗金又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说到，1753 年 12 月“从各吉尔吉斯兀鲁思中抽了 5000 士兵去援助达瓦齐，以便消灭杜尔伯特，因为杜尔伯特不愿臣服于达瓦齐，而想拥立纳默库济尔噶尔……乌梁海人则站在达瓦齐一边，前些时候派去的吉尔吉斯—哈萨克军队摧毁了卡尔梅克的两个州”[2]。援助达瓦齐的部队里的一个哈萨克头人在 1753 年 12 月 30 日告知维列弗金说：“根据达瓦齐的命令，两个卡尔梅克州被摧毁，达瓦齐把妇女和男、女孩子给了吉尔吉斯人……并把被摧毁的两个州的牲畜给了吉尔吉斯人很少一部分，只够食用，而其余牲畜全由达瓦齐独占。”[3]1753 年 12 月 31 日，维列弗金正面遇见一支由千名哈萨克人组成的队伍，开到准噶尔来帮助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

内战使居民穷困到了极点，也使卫拉特封建国家不断削弱。1754 年 2 月 9 日，色楞格的警卫司令亚戈比向彼得堡报告说，1753 年 9 月又有几千户以王公们为首的卫拉特家庭从准噶尔逃到喀尔喀。这些王公归顺清朝当局指挥后，解释他们从准噶尔迁来的原因是“两个浑台吉领主之间不和睦”[4]。但是，如我们所见，受阿睦尔撒纳和中玉兹封建主支持的达瓦齐，在 1753 年末到 1754 年初成了汗国独揽大权的执政者。

从这时起就开始了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之间相互敌视的历史。至于这种敌视的原因何在，我们无从了解真实情况。也许，是由于达瓦齐没有履行自己许给阿睦尔撒纳的诺言。 439

1754 年五六月间，乌梁海宰桑库图克的兄弟向骑兵司务长安德列·别谢德诺夫诉说了准噶尔来临的“不幸时刻”。他说：“他们的大人们不和睦。现在，达瓦齐汗已经跟哈萨克玉兹联合，阿睦尔撒纳则跟中国军队联合，彼此打仗，战争从去年冬天（即从 1753—1754 年冬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2 卷，第 1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2 卷，第 4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2 卷，第 4 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 年，第 1 卷，第 8 张。

天。——兹拉特金)起就开始了。军队驻扎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科布多河之间……为此现在他们那里把最后一些人都赶到那一带去增援达瓦齐汗。"[1]

1755年4月3日被派往边境地区搜集情报的库兹涅茨克非世袭贵族马克休科夫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叙述到一个曾在卫拉特汗的牙帐里供过职的平民比列尔·坦什凯向他提供的有关准噶尔事件的消息。这个比列尔·坦什凯说:"现在他们的统治是达瓦齐汗……还有另一个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阿尔巴撒纳汗(即阿睦尔撒纳。——兹拉特金)……达瓦齐汗对自己的外甥说,一地不能并存二王。"阿睦尔撒纳就根据这个理由要求分给领地并要求把"坎斯克、卡拉科尔斯克、捷列斯克州以及塔乌捷列乌茨克等州的人转交他管辖",但达瓦齐回绝了。于是阿睦尔撒纳集结"各地的"军队约6000人,于1754年夏季攻打达瓦齐,但达瓦齐聚集的"人数众多",杀死了属于叛逆外甥的"许多男人,俘获了女人。这次战斗是在额尔齐斯河上游进行的"。阿睦尔撒纳败逃中国。马克休科夫指出,另一些卫拉特人的谈话基本上证实了比列尔·坦什凯的叙述。[2]

骑兵司务长别谢德诺夫还向司令部提供过其他类似资料。1754
440 年8月,他曾在乌梁海而与当地头人们多次交谈。其中一人告诉他:"春天,他们阿尔泰的宰桑们曾去帮助达瓦齐汗……。现得悉这些宰桑已返回,并带来了阿睦尔撒纳的妻子和儿女,还俘虏了许多人。而阿睦尔撒纳本人带着所有宰桑逃往蒙古方面。"[3]库图克宰桑对别谢德诺夫说:"他们的领地很不安宁,为搭救达瓦齐汗大家都曾去效劳过,而且也挽救了他,可是又把阿睦尔撒纳诺颜和他的全部土地毁坏了。他的妻子儿女、牲畜财产以及全部生计被一抢而空,纷纷带回各自的领地加以瓜分。阿睦尔撒纳则带300人经由捷列茨科耶湖逃往蒙古领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1卷,第44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年,第1卷,第41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2卷,第44张。

土。”[1]

如果说阿尔泰的宰桑们去搭救达瓦齐是在1754年春天，那么他们完成任务之后于同年8月都已回到家里，所以毫无疑问，决定阿睦尔撒纳命运的战役发生在1754年夏初，也就是达瓦齐的汗位最终确立后的几个月内。

史料证明，哈萨克封建主也积极参与了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之间的冲突。阿睦尔撒纳认为光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希望战胜达瓦齐，就派自己的弟弟巴尔济尔去向阿布赉苏丹求助，请求这位中玉兹的执政者提供4000匹马和骆驼，1万只母绵羊和公绵羊，“答应将为此偿付无论什么要求的报酬”。阿布赉苏丹给了阿睦尔撒纳所请求的帮助，阿睦尔撒纳则偿付给贵重毛毯、武器以及在达瓦齐的兀鲁思里俘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随后阿睦尔撒纳又建议中玉兹执政者，待达瓦齐全力反击在博罗塔拉河等候他的阿睦尔撒纳时，去袭击达瓦齐的牙帐。[2] 阿布赉也没有拒绝这个要求。史料记载表明，中玉兹的执政者们在阿睦尔撒纳1754年溃败之后，曾多次侵入准噶尔汗国境内，从那里劫走大批俘获物——牲畜、俘虏和贵重物品。[3] 441

达瓦齐战胜了阿睦尔撒纳之后，于1754年8月遣使去北京提出和平友好建议。有关该外交代表团的资料我们从色楞格警卫司令亚戈比给米亚特列夫总督的一个报告中找到了。亚戈比报告说，“达瓦齐于今年夏季最后一个月派了5名贵族首领携带礼物通过巴里坤卡伦去北京见中国皇帝……同时授权这些首领请求中国皇帝与他达瓦齐和平相处，并把浑台吉的所有叛逃者送回他的领地。但因这些首领至今还在北京，所以听不到有关此事的更多情况”[4]。准噶尔汗认为，与中国和平相处是巩固自己政权的途径。但清政府不支持他的倡议。清人对这种和平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打算消灭卫拉特国，也正是为了这个目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2卷，第44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年，第2卷，第10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1卷，第46、57、61张；第2卷，第1、4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1卷，第53张。

的，他们才决定利用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被打败之后，经由捷列茨科耶湖、科布多和乌兰科木逃往喀尔喀，他在那里向清朝当局表明自己愿效忠清朝的心愿。他被遣送到北京，在宫中愉快地受到接见。弘历皇帝封他一等亲王封号并答应帮他夺取准噶尔汗位。清朝把阿睦尔撒纳视为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消灭准噶尔汗国的合适工具。[1]

几十年来一直妄想消灭卫拉特国的清帝国，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宿愿的可能性，王公们的内讧为侵入准噶尔敞开了大门。这就是阿睦尔撒纳请求给予军事援助去推翻达瓦齐的要求能得到北京全力支持和同情的缘故。

442

大量史料记载——其中色楞格警卫司令亚戈比的原报告和呈文占很大篇幅——描绘出一幅20万清军集结于喀尔喀和准噶尔边境的鲜明图景。清帝国当局和司令部忙坏了手脚。1754年冬，他们一直在大量征兵，以便在1755年初春以前完成进攻准噶尔的准备工作。清军司令部决定让全体士兵骑马，这就掀起了大规模强征战马的浪潮。当局毫不犹豫地收走了在外贝加尔守卫俄中边界的边防军的马匹和骆驼，[2]并在半路上不管商人们的死活拦截商队，夺走他们的马匹和骆驼。一切服从于准备决定性的进攻。正如目击者叙述的那样，为了供养集中在那里的军队，“各种食品由各地大量源源运往”边境，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3] 每个士兵都装备了火枪、马刀、梭镖40支装的弓箭，部队还拥有强大的炮兵。

1755年初，弘历皇帝发出命令，责成所有喀尔喀领主率领自己下属的“军人和适于参战的非军事人员火速赶到浑台吉的边境参加蒙古军”[4]。这次，有关当局甚至连法律规定永远豁免兵役的沙比纳尔也

---

[1]海尼施：《1755年中国在伊犁的领土扩张》；也可参看雅金夫《准噶尔和土耳其斯坦的过去和现状的记述》，第1、2卷，圣彼得堡，1829年版。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年，第1卷，第48张；1754年，第1卷，第50张；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卷宗，1750年，第1卷，第1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4年，第2卷，第12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年，第1卷，第50张。

征用了。

到了1755年春天，入侵清军已经做好进军准备。清军中不仅有满人，还有汉人、南蒙古人和喀尔喀人的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满族将军班第指挥的北路军，出乌里雅苏台，渡过乌伦古河、青格里河以及艾兰湖向博罗塔拉河谷地进军；另一路由满族将军永罕指挥的南路军[1]，沿巴里坤—乌鲁木齐这条路向博罗塔拉河谷地进军。各路部队都有投奔清朝的卫拉特领主指挥的强悍的先头部队。阿睦尔撒纳指挥北路军的先头部队。[2] 443

1755年初春，全军出动，两路清军都侵入了准噶尔汗国境内。史料记载的部队的总人数多少不等——9万到20万人。4月底两路军队在艾比湖附近的博罗塔拉河谷地会师后向伊犁河进逼，过河后没遭到任何抵抗，没放一枪一炮，继续前进。

1755年7月25日，亚戈比报告说，“汉、蒙军队到达伊犁时，准噶尔人便跟一些首领一起向他们投诚……没有发生跟浑台吉的战斗，因为浑台吉希望和平……准噶尔领主达瓦齐不希望发生战争，而是乞求和平……为了求得和平，他打算派自己的儿子带礼物去北京谒见中国皇帝”[3]。从1754年夏季起就在达瓦齐的牙帐里而到1756年夏季才返回色楞格斯克的俄国哥萨克布尔科夫报告说，达瓦齐“为了跟这些蒙、汉军队打仗，集中自己的部队约3万来人，可是当准噶尔人得知阿睦尔撒纳在蒙军中之后，大部分人便撇下达瓦齐纷纷投奔蒙军去了。因而达瓦齐眼看自己毫无希望，为了活命只得逃跑以求保全”。[4]

达瓦齐试图阻止，至少是暂时阻止清军侵入准噶尔，而派出由他儿子率领的一个外交代表团去北京，再次表示愿意和平友好。为了表示诚意，他把准噶尔汗的战旗送给弘历皇帝，并表示，如果皇帝同意的话， 444

[1]永罕应为永常，南路军应为西路军。——译者

[2]我们从前面提到过的海尼施的书中借用了这些资料。有关北路军的记载又被俄国史料所证实。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年，第1卷，第75－76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年，第2卷，第11张。

他愿亲自去北京。1755 年 8 月 7 日,亚戈比根据可靠消息了解到喀尔喀收到弘历皇帝的诏令,“皇帝宣布,浑台吉的领主达瓦齐请求中国皇帝接纳他入中国国籍,为此他派出自己的儿子和 6 名随行使节……他还送了自己的红旗一面作为请求入籍的保证……达瓦齐希望归顺中国皇帝的原因是阿睦尔撒纳背叛他而投靠了中国方面”[1]。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清政府需要的不是与汗国保持和平,而是要完全消灭它。所以达瓦齐这次的建议也没有得到答复。

1755 年 5 月 14 日,由阿睦尔撒纳率领的入侵军先头部队进入特克斯河谷地,在那里和达瓦齐的少量部队接触。这位汗没有应战,撇下妻子儿女,避开阿睦尔撒纳朝喀什方向逃去。7 月 8 日,达瓦齐被库车城的穆斯林执政者抓住并被转入阿睦尔撒纳手中,后者把俘虏送到了清军最高统帅部。这时偶然出现的哥萨克布尔科夫证明,达瓦齐认出他和他的伙伴是俄国人之后,请求他们“把他的情况告诉俄罗斯方面,他不希望有任何争执,目前却落到如此不幸的境地。但是不许达瓦齐跟他说更多的话”[2]。三四天以后,达瓦齐被送往北京。

根据这个布尔科夫的证明,清朝当局当时在准噶尔全境散发藏语传单,劝说卫拉特居民入清帝国国籍,还以皇帝的名义答应为此给予优异的奖赏并保护他们不受外敌侵犯。

弘历皇帝在热河打猎时,得到了俘获达瓦齐的消息。他下令将达瓦齐送往张家口,在那里关押到皇帝返回北京时为止。其他与达瓦齐一起被俘的诺颜和宰桑们都被直送北京并关入监狱。

445 曾使清朝如此仇视和惧怕、玄烨皇帝及其两代继承人都对之进行过战争的准噶尔汗国,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了。清朝当局的大肆准备看来是多余的,浩荡的满、汉、蒙大军也是不必要的,汗国实际上已经无力自卫了。卫拉特封建主向胜利者乞怜,甚至无意反抗。由于王公间无止境的内讧而士气沮丧、没有领导、极端贫困和疲惫不堪的卫拉特人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56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6 年,第 1 卷,第 57 张。

民是无法抗拒征服者的。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准噶尔汗国崩溃了。

占领了卫拉特国家之后，清朝当局在准噶尔推行了他们在以前占领的蒙古地区所规定的行政系统，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准噶尔管理系统。全卫拉特汗的制度被废除，这就消灭了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汗国。清朝当局在汗国的废墟上建立起4个互不从属的独立公国——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以及绰罗斯，这些公国的执政者直接受北京管辖。

于是，1755年夏末准噶尔之战告终。满、汉封建主和东蒙古封建主获得胜利。他们抓住了达瓦齐，使卫拉特王公们俯首听命，消灭了汗国本身。祝捷声中清朝当局立即从准噶尔撤军，把军队遣散回家。他们不能拖延这件事——在像准噶尔这样遥远的边疆供养大量军队实在太困难了。他们还不能不注意到，在离这支军队不远的后方——喀尔喀有一种危险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和扩大，这种情绪有使他们在准噶尔的胜利化归乌有的危险。

这些年来，喀尔喀的人民群众也像在30年代战争中那样，重新感到清朝军事政策在自己身上的重荷。喀尔喀具有简单产业的劳动人民，他们的主要财富，除了帐篷之外，就是少量的马匹和大小牲畜。这些劳动人民对于清军以及皇家的官吏和信差来说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奶类和肉类的供给者。毡子、毛皮和其他畜产品都被清朝当局以动员和征用的方式夺走了。除了这些，喀尔喀劳动者越来越频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们必须自备武器弹药，丢下生产劳动去参加各种阅兵式和军事训练。总之，大部分男人脱离生产，被打发去打仗。如果注意到这种种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人民群众中滋长起一种推动其解放斗争的反满情绪。 446

至于蒙古的王公们，则是极力将战争的重负转压到劳动人民的肩上。因此就产生了阶级冲突，加剧了这一地区的阶级斗争。例如，据史料记载，在鄂嫩河北面车臣汗爱马克的达赖拜塞旗内出现了人数达200的“盗匪”，他们袭击边境哨所和卡伦，袭击个别兀鲁思，抢走马匹和其他牲畜。车臣汗派出一支300人的部队去讨伐这些“盗匪”。部队的领队派了50个士兵和11名什长到叛乱者那里劝降，但那些人“不

放他们到自己跟前，用鞭子乱打，夺走马匹，把他们赶回来了”。车臣汗不得不重新派出一支千人的队伍去讨伐“造反者”。[1]

卫拉特劳动人民的处境更为困难，长期内讧和外来侵略的重担都直接落在他们身上。战争的灾难波及各处的劳动人民。如果说过去他们还可以逃跑，可以随意从一个封建领地迁逃到另一个封建领地，从准噶尔迁往俄国，去寻求生路，那么现在，他们就连这种可能也没有了。在昔日的卫拉特国家的领土上，到处都是清帝国的走卒们统治着，他们建立了适合于征服者利益的秩序。

越境逃入俄国的路被封闭住了。无论是喀尔喀的，还是卫拉特的
447 劳动人民，在这些年都不敢越过俄国国境。他们害怕会被强迫迁出俄国而送回蒙古或准噶尔，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对逃跑行为的严惩，这样的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例如，卫拉特劳动人民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很乐意能去俄国，“但只是不敢要求，因为他们中有的卡尔梅克人到了俄国城市却不让定居，而被送回给准噶尔领主，领主便用各种苛刑和毒打折磨他们，使他们不敢再逃跑”[2]。

这就是这段时期没有像30年代那样发生普通卫拉特人大规模自发进入俄国国境的原因。[3] 但是卫拉特和喀尔喀的王公们越来越频繁地开始向西伯利亚当局要求准允他们带属民一起迁入俄国境内，王公们还常常表示同意加入俄国国籍。

形势迫使清帝国执政者赶紧从准噶尔和喀尔喀撤军。俄国边境当局的报告证明，1755年9月在与俄国毗邻的准噶尔地区已没有清军，他们被召回或返回了常驻地区，被动员入伍的士兵已遣散回家。只在喀尔喀和准噶尔的一些重要地点还留有少量驻防军。

有根据认为，弘历皇帝打算以隆重的仪式来庆祝最后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卫拉特封建国被强并入帝国版图的胜利。仪式定在多伦淖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年，第1卷，第81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年，第1卷，第69张。

〔3〕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要》，第79－81页。

尔[1]举行,64 年前也是在那里以同样的仪式正式宣布了喀尔喀对清朝的归顺。亚戈比 1755 年 8 月 7 日关于弘历皇帝诏令的报道就是这一揣测的根据,诏令要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2]和库伦的活佛火速前往多伦淖尔,皇帝本人也准备去那里宣布"浑台吉人转入中国国籍的重大喜讯"[3]。 448

但是在北京还没来得及庆祝对准噶尔汗国的胜利,复员的士兵还没来得及回到家园,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阿睦尔撒纳脱离中国国籍,带上 500 人的一支队伍回准噶尔去了。[4]

从亚戈比 1755 年 10 月 19 日的报告和以后发生的事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睦尔撒纳对借助清人帮他成为全卫拉特汗的事大失所望,便于 1755 年 9 月背弃清帝国而发动了武装斗争。当时他在喀尔喀,因押送俘虏达瓦齐而来到喀尔喀的西部边境。阿睦尔撒纳带有一支卫拉特士兵组成的不大的队伍,联合一些喀尔喀军事首脑,其中有车臣汗爱马克中的德勒克王和凡济尔王。阿睦尔撒纳攻打守卫边境的满军,击溃了满军之后逃往准噶尔。满军司令部派出一支庞大的队伍跟踪追击,但追兵返回,未抓住逃犯。

阿睦尔撒纳的起义并逃回准噶尔使北京极为惊慌,弘历大怒,复员的士兵又被重新召回所属部队。亚戈比向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报告说,复员的"第一批遣返人员现在已经到达了自己地区的尼布楚主管机关,而到达土谢图汗的主帐和还没有到那里的人全被拦住,根据上述阿睦尔撒纳逃跑的通知,把他们派回浑台吉边境参加军队"[5]。同年(1755)11 月,亚戈比得到新消息说,"今年秋天第二个月以前,原入了中国国籍的浑台吉投奔者阿睦尔撒纳,击溃了边防卡伦之后,朝他自己的浑台吉人这一方逃跑"。根据同一份资料得知,阿睦尔撒纳带走

---

[1]应为热河,即现在河北省承德。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12。——译者

[2]敦多布多尔济已于乾隆十年死去,此时在位的土谢图汗应为敦多布多尔济之兄延丕勒多尔济。见《藩部世系表》卷 2。——译者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58 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91 张。

[5]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92 - 93 张。

449 了少量卫拉特士兵，以及“蒙古军人中几个善战的人……现在由于他的逃跑，中国方面惴惴不安……，为此重征退伍军人入伍，开往浑台吉边境”[1]。

当时，阿睦尔撒纳先住在塔尔巴哈台，而后住在伊犁河上卫拉特汗原来的主帐中，利用1755—1756年冬季的几个月，重新组织军队。他写信与全准噶尔的王公们协商，邀请他们跟他联合，把征服者逐出卫拉特领土而重建独立的卫拉特国。

有些诺颜和宰桑响应了阿睦尔撒纳的号召，也有一些拒绝了他的邀请，这些人或者认为屈从一个出身不够高贵的人有损自己的尊严，或是怀有宿仇。不跟他联合的还有那样一些兀鲁思：其执政者曾支持过达瓦齐反对过阿睦尔撒纳，因而害怕报复。尽管如此，阿睦尔撒纳的拥护者仍在1755年末、1756年初宣布他为汗。1756年2月17日，卡拉科尔州的一位宰桑对俄国司令部的代表们说，阿睦尔撒纳“现住在达瓦齐诺颜住过的大帐地区拥有军队约万人……据知，他已经取代达瓦齐汗而成了准噶尔的领主”[2]。

但是过了不久，阿睦尔撒纳阵营中发生内讧。一群王公脱离了他，爆发了武装冲突，阿睦尔撒纳终于溃败。这迫使他回到伊犁河，以便重新积聚力量。他向阿布赉求援，阿布赉同意援助，带兵1万来到准噶尔。可是连这样的帮助也未能改变局势。得知满洲大军追迫后，阿睦尔撒纳撇下准噶尔于1756年夏初逃往中玉兹阿布赉苏丹处，再次在那里避难。[3]

450 清帝国当局也不失时机。他们严惩了那些在北京方面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过错使阿睦尔撒纳得以逃往准噶尔的人。按弘历的旨令，库伦活佛的亲兄弟喀尔喀著名的封建主额琳沁多尔济土谢图汗解京处死，因为他负责守卫喀尔喀—卫拉特边境，却没有阻止这次逃亡事件。

---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189－191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220－221张。

[3]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载《蒙古人民语文学和历史学》（Фил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杂志，莫斯科，1958年，第303－304页。

同时清帝国开始新征大量军队，以便二次进军准噶尔，但这次是征伐阿睦尔撒纳。1756 年 1 月 11 日，亚戈比报告说："由满人、蒙古人和索伦人组成的蒙古军差不多有 40 万人，已到浑台吉地区……由 6 位将军指挥，5 位是满人，第 6 个叫沙达尔王，是蒙古的霍朵霍人。"这支军队里带有好多手艺人——"包括汉族、蒙古族、沙哈尔族（察哈尔族。——兹拉特金）……以便在河上修建渡口和各种船只"[1]。弘历令将军们"于 3 月份（1756 年。——兹拉特金）把部队开进浑台吉地区，火速捉拿阿睦尔撒纳，并将浑台吉人消灭或使他们归顺"[2]。

清朝当局那时已经企图引诱中玉兹执政者反对阿睦尔撒纳。他们派了一个总数为 30 人的特别使团去哈萨克，该使团于 1756 年 1 月出现在乌梁海兀鲁思，宣称打算穿过俄国领土取捷径去阿布赉那里，因为经由伊犁的那条路被阿睦尔撒纳截断了。他们没有被准许通过俄国领土，只得撤回，没完成任务。[3] 可是哈萨克封建主们实际上几乎没有离开过卫拉特的兀鲁思，一会儿"帮"这个活动家，一会儿又"帮"那个，每次都带回大批牲畜和俘虏之类的战利品。参与这类军事行动的封建主不仅有中玉兹的，还有其他哈萨克封建领地的。据目睹者口述，"他们购买来的，或通过其他方法弄来的许多财物和俘虏，运到小玉兹就成了一本万利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爱丘瓦克也"打算袭击准噶尔"[4]。 451

其实，云屯蚁聚在准噶尔的清军并未碰上有组织的敌人，他们轻易地战胜了遇到的一些零散的反抗中心，遂开始对卫拉特居民进行大屠杀。1756 年 7 月，为寻找阿睦尔撒纳，2000 名清军进入俄国境内，迫近躲着一些卫拉特难民的科雷万工厂。同年 10 月 25 日，一支人数更多的满军迫近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想带走这里的乌梁海人——卫拉特汗过去的臣民。得知阿睦尔撒纳躲在阿布赉苏丹的牧区之后，队伍开往中玉兹。1756 年 8 月，阿布赉苏丹的后备军和清朝皇帝的军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306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309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170 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 年，第 4 卷，第 317 张。

队发生了战斗，哈萨克人战败后，便向俄国的防御线撤退。哈萨克执政者向俄国当局请求保护，使他们摆脱满洲军的追击。

许多卫拉特兀鲁思的封建执政者也开始向俄国当局请求保护，要求加入俄国国籍。这种情况早在1753年就开始了，当时一些诺颜和宰桑抱怨“生不逢辰”，了解到有入俄国国籍的可能之后自愿归并于俄国的运动日益扩大。到1755年9月大约已经有40名卫拉特宰桑等待沙皇政府就他们转入俄国国籍问题作出决定。与此同时，有几万难民、王公和农民，带着劫余之物，带着家小徒步或坐车从卫拉特汗国的边远地区源源不断地来到俄国边境，以摆脱征服者的无情刀剑，在俄国土地上寻找逃生之路。

俄国政府处境困难。它在这一地区兵力薄弱，却碰上了清朝扩张政策向准噶尔境外，向东土耳其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等领土伸展的直接威胁。彼得堡颁布一系列命令规定了自己对准噶尔事件的态度。它决定执行不干涉卫拉特汗国内部斗争的既定政策，“因为干涉他们的内部纠纷，保护一方反对另一方，这没有任何理由和好处”[1]。

452

俄国政府完全清楚跟强大的卫拉特汗国毗邻对西伯利亚可能造成危险，因为汗国执政者继续企求占有西伯利亚的部分领土，向居住在那里的他们过去的臣民征收实物税。同时，过分削弱这个汗国也与俄国的利益相抵触，他们尤其不希望清帝国完全征服准噶尔。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在1756年6月26日向彼得堡报告说，如果清军征服卫拉特和哈萨克，那么俄国边区“处境就会极端危险”[2]。

沙皇政府考虑到当时的特点，要地方当局接纳卫拉特难民，给他们避难处并允许他们在所希望的地方游牧，力求不让清政府干扰他们。应回避清人可能提出的要求，推说卫拉特人不是清帝的臣民，同时说明俄国过去和现在都未曾干预准噶尔汗国的内政，清政府也不应干涉，更何况1731年清政府的使者自己在彼得堡说过，皇帝不反对俄国接纳准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37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年，第10卷，第25张。

噶尔难民，甚至提出过把卫拉特领土的一部分转交俄国。[1] 俄国边境当局根据这些指示开始接纳卫拉特难民，逃来的难民直到1758年还络绎不绝。

1756年6月奥连堡得悉，阿睦尔撒纳溃败后，又从准噶尔逃到阿布赉那里。涅普留耶夫和捷弗凯列夫决定邀请阿睦尔撒纳来奥连堡。1756年7月1日，他俩向他致函，建议"为了更加……宁静和安全起见"可到他们这里来。[2] 委派巴什基里亚的头人阿勃杜尔·卡斯金诺夫去中玉兹，正式的任务是叫他向阿布赉查明，为什么哈萨克商人没到奥尔斯克来，俄国商人带着商品在那里等候。而非正式的任务则是叫他把俄国当局的信瞒着哈萨克人秘密交给阿睦尔撒纳。 453

阿勃杜尔·卡斯金诺夫于1756年8月1日从奥连堡动身，8月底到达阿布赉的兀鲁思。这位苏丹正在同满洲人打仗，于是卡斯金诺夫不得不等候中玉兹执政者回来，一直等了一个半月左右。阿睦尔撒纳也参加了这次进军。阿布赉战败，负伤而归。阿睦尔撒纳也回来了，被安置在一个有30个哈萨克人看守的帐篷里。据了解，阿布赉一直警惕地监视着阿睦尔撒纳，"使他不致从他们那里悄悄溜走"[3]。

卡斯金诺夫确信，他不能亲自见到阿睦尔撒纳，便跟阿睦尔撒纳的亲信们进行了联系，"他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以至想到自己的苦难处境不禁凄然泪下"[4]。阿睦尔撒纳通过亲信告诉阿勃杜尔说，阿布赉苏丹待他跟他同来的230名卫拉特人如同囚犯，强迫他们陪同哈萨克队伍去打满洲人，说他打算从阿布赉这里逃跑，要求把这事预先通知俄国边防长官。次日晨，来了一支阿布赉的哈萨克队伍，这支部队带着阿睦尔撒纳和其他卫拉特人出发去打满洲人。阿睦尔撒纳见到阿勃杜尔·卡斯金诺夫时，请他向奥连堡转达自己的谢意。后来，卡斯金诺夫查明，阿布赉苏丹不仅使阿睦尔撒纳处于俘虏状况，而且把他和家人隔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247－251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322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557张。
[4]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557张。

离，给以极微薄的供养，不给牲畜，甚至也不给帐篷。卡斯金诺夫把他在中玉兹兀鲁思里的所有见闻写成书面报告，于1756年10月31日呈
454 报涅普留耶夫和捷弗凯列夫。[1]

这时为了对付征服者的残暴行为，卫拉特人的自发反抗在准噶尔开始加强。早在阿睦尔撒纳逃奔阿布赉苏丹之后，据目击者谈，卫拉特人就已经开始聚集兵力攻打满、蒙、汉人的队伍和驻军。但是卫拉特战士的分散行动无法使准噶尔挣脱遍布全境的清帝国军队的铁蹄。这些军队尽管遭受了损失，却仍继续向该地区的纵深推进。

1756 年秋末，阿睦尔撒纳在阿布赉苏丹处呆了 5 个月之后又出现在准噶尔。他在塔尔巴哈台山区度过 1756—1757 年冬季，重新攒积兵力以反击清朝统治者。他指望联合喀尔喀的反满力量，那里在 1756 年夏天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首领是大封建主青衮杂卜。[2]

当时喀尔喀的形势极为紧张。阿睦尔撒纳的起义和在准噶尔的军事行动的重新开始，掀起了抓丁、征用和苛捐杂税的新浪潮。当地的满洲军、政当局受盛怒的皇帝的催促，开始无偿地夺走喀尔喀居民最后的马匹和剩余牲畜。事情弄到恰克图—库伦驿道上的驿站因没有替换的马匹而停止了工作。结果过往的官吏、商人、外交信使都不可能有健马以替换疲惫不堪的弱马，而按规定和习惯，驿站上应该经常有足够数量的驿马。战争的苛捐杂税之外又加上天灾：1755—1756 年这个不吉利的冬天，严寒逼人，积雪很深，引起牲畜大量倒毙。这个地区痘疫蔓延。在这些条件下，从 1755 年夏天起曾一度平息的反满运动又猛烈爆发。
455 纷纷传说弘历皇帝强迫喀尔喀喇嘛教首领——活佛留在自己身边，因为不信任他，不许他和土谢图汗返回故乡，这种传说加剧了喀尔喀的骚动。这些流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弘历强令活佛在处决他的兄弟额琳沁多尔济时前往观刑，清朝当局把阿睦尔撒纳逃跑归咎于额琳沁多尔济。尽管活佛多次苦苦哀求皇帝饶恕他的兄弟，额琳沁多尔济仍

---

〔1〕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第 307 页。

〔2〕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第 308 页。

于1755年4月被绞死于北京。而在这事之后，皇帝还不愿放活佛和土谢图汗回家。只是当活佛暗示，他长期不在家可能促使喀尔喀人民走极端时，皇帝才对这位蒙古喇嘛教首领的坚决要求作了让步。1756年夏，活佛和土谢图汗到达库伦，将要焚毁的、被处决者的尸体也运到了这里。为了纪念额琳沁多尔济，在库伦的庙宇里很长时间还照活佛的指示做着追悼仪式。

1756年7月以前，青衮杂卜曾在准噶尔的清军中服役，指挥过喀尔喀部队的一支2000人的队伍。他因喀尔喀统帅额琳沁多尔济被处死而义愤填膺，奋起起义，把从属于他的军队撤离前线，并率领它返回他的祖传领地所在的喀尔喀库苏古泊地区。青衮杂卜从这里分派急使到喀尔喀各王公处，邀请他们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反对满洲征服者。与此同时，他与卫拉特的反满力量以及当时回到了准噶尔的阿睦尔撒纳进行了联系。在答复清朝当局要他投降的要求时，青衮杂卜宣布，他不怕威胁，因为全喀尔喀都反对满洲人，任何喀尔喀人都不支持他们，也不加入他们的军队。[1]

青衮杂卜的起义在全蒙古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领地处在通往准噶尔的交通线上的喀尔喀王公们，撤除了哨卡、驿站，而迁到清朝当局势力达不到的边远地区。这使得在准噶尔作战的清军的通讯联系和供应工作严重恶化。由于不信任喀尔喀王公，而且担心自己在蒙古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北京政府从准噶尔撤出了全部喀尔喀军队，把他们遣回喀尔喀。 456

清朝当局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来挽救它在蒙古的地位。他们在准噶尔继续惨无人道地消灭卫拉特居民，而在喀尔喀则极尽挑拨离间、间谍活动、高价收买和恐怖手段之能事。1757年1月17日，清朝当局抓住了青衮杂卜，将他押往北京。他的两个藏匿起来的儿子也被搜查出来押送北京。1757年6月12日，青衮杂卜和他两个儿子被处决。青衮杂卜的第3个儿子才7岁，养在喀尔喀西北部的亲戚家里，也被派去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5－1757年，第4卷，第482张。

的特务就地秘密处死。被逮捕押往北京处死的还有其他许多起义的参加者,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40 名次要的起义者在库伦本地当众被处死,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喀尔喀许多其他高级官吏被革职、降职、褫夺封号和身份。同时代的人说:“全蒙古都在疑惧中,他们的主要蒙古首领会一个个被铲除掉。”[1]

1758 年 1 月 24 日,活佛去世,终年 34 岁。两个月之后,土谢图汗爱马克的盟主延丕勒多尔济逝世,又过了两个月埋葬了土谢图汗本人。有理由认为,那时相当明显地采取公开反满方针的这 3 位喀尔喀活动家之死不是偶然的,清朝政府是插手了这一事件的。他们被毒死的传说,当时在喀尔喀广为流传。俄国使者勃拉季谢夫和亚戈比少校 1757 年初从北京回来时,遇见一支押送王公达玛琳的妻子儿女去北京的满军,这位王公原打算逃往俄国,结果在不久前被处决。

457

喀尔喀人民群众的处境极端困难。被夺走牲畜而完全破产的蒙古农民变得赤贫如洗。史料说:“整个蒙古族中有大量成批没有食物吃的穷人……沿途(从库伦到恰克图。——兹拉特金)行乞,甚至一俄里的地方就有乞丐 10 个以上,跪在地上请求施舍。”[2]

但是,喀尔喀蒙古族自发的反满暴动,在未发展为大规模武装起义之前就被镇压下去了。

就在那时候,阿睦尔撒纳重新收集兵力继续反抗清朝在准噶尔的统治。据史料证明,他在 1756 年安排了跟青衮杂卜的联系和接触,计划在 1757 年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这件事是一些乌梁海头人告诉俄国军事当局的。据了解,这些头人曾亲自于 1756 年末去过阿睦尔撒纳那里,从他的话里知道了这一情况。乌梁海头人们曾供给阿睦尔撒纳食物和马匹。他们也承担阿睦尔撒纳和青衮杂卜之间的通讯联系。青衮杂卜在一封信中说到他拥有 3 万军队,“而且还有 3 个边区的汗(即

---

[1]瑟切夫斯基:《1846 年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边防公署顾问瑟切夫斯基所编中国边境史札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ка 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советником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ого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Сычевским в 1846г.),载《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和古物皇家学会读物》,莫斯科,1875 年,第 2 册,第 155 页。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2 卷,第 446 张。

3 个喀尔喀汗。——兹拉特金)打算帮助他”[1]。

阿睦尔撒纳在与青衮杂卜加强联系的同时,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帮助。1757 年 1 月,他为此遣使去彼得堡,带有一封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的信。1757 年六七月间,俄罗斯当局在彼得堡进行了跟他的代表达瓦宰桑的谈判。达瓦代表阿睦尔撒纳请求俄罗斯当局帮助他把所有卫拉特人和卫拉特兀鲁思聚集到他的管辖之下,要求为他在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湖之间修建一个要塞,用俄国兵力保护阿睦尔撒纳和卫拉特人免受清军蹂躏等等。达瓦收到的答复是,俄国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所提出的入俄国国籍的条件,因为这可能引起同中国的冲突,而俄国不愿跟任何人打仗,不过如果阿睦尔撒纳本人愿意,可以带一批数量不大的随从人员在俄国安全避难,这“不仅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在吃、穿和其他救济方面都做到称心如意……只要他本人愿意,一直可以供养”[2]。如果他不能接受这些建议,而决意要留在准噶尔夺取卫拉特汗位,那么俄国方面对他这样做“绝不加以阻碍,而且将来也不会干涉他和准噶尔人民的事,除非他本人提出什么意外情况,那就另当别论”[3]。1757 年 9 月 23 日,达瓦离开彼得堡,带回了沙皇政府的复函和给阿睦尔撒纳的礼物。

458

当达瓦去彼得堡时,在准噶尔重新展开了军事行动。随着 1757 年春天的来临,阿睦尔撒纳率领一支自己的拥护者组成的队伍开往东方喀尔喀卫拉特边境,期望在这里与青衮杂卜汇合,因为他还不知道后者的死讯。得知青衮杂卜的悲惨结局之后,阿睦尔撒纳在巴里坤袭击了清军驻防部队,并把它消灭了。1757 年春季和夏季,阿睦尔撒纳及其同伙所领导的总数达万人的卫拉特部队,在塔尔巴哈台山区和伊犁河谷地一带开展了反抗清军的攻势行动。这些部队尽管英勇作战,但仍无法抵抗人数和装备超过他们很多倍的清军,它猛烈反击了起义军并转入新的进攻。卫拉特人失败了,讨伐者残酷地杀绝了所有被俘的人。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第 6 卷,第 24 - 28 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6 卷,第 79 - 81 张。

[3]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6 卷,第 79 - 81 张。

从伊犁地区“跑到”俄国境内的德勒克格隆——最高喇嘛之一，在他1757年7月17日的信中说，清军把“所有落到他们手里的准噶尔人，不管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统统杀死”[1]。

1757年7月22日，清军司令部的代表出现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地
459 区。他们在与当地军事当局谈话时声称，他们被派来消灭叛乱的卫拉特人和捉拿阿睦尔撒纳，并说他们在博罗塔拉河谷地击溃了若干卫拉特兀鲁思，但没能抓住阿睦尔撒纳，他逃跑了。考虑到阿睦尔撒纳除了去俄国，无处可逃，清军司令部希望知道，是否发现他在俄罗斯境内，以便军队“不致徒然空找他”。同时谈到，为了搜索阿睦尔撒纳和其他“此类凶犯”，在不远处就有皇帝内弟所率领的总数达5万人的追兵。[2] 清军司令部表示希望俄国当局把阿睦尔撒纳交给它。

北京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把阿睦尔撒纳和卫拉特解放斗争的其他首领弄到手。还在1756年底，北京就曾发函彼得堡，通知俄国政府说，卫拉特族入了清帝国国籍，阿睦尔撒纳是逃奔哈萨克的叛徒，已派兵去哈萨克要求交出他及其同犯。俄国政府在1757年5月20日复函中断然拒绝交出卫拉特难民的要求，推说卫拉特人及其王公们不是清帝的臣民，他们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人。这封信中说，清朝当局无权要求把阿睦尔撒纳交给他们，而只能请求。俄国当局没有义务必须交出他，但是如果阿睦尔撒纳在俄国境内被发现的话，为了友谊可以交出。这种答复使弘历怒不可遏。在北京的俄国政府代表勃拉季谢夫报告说，北京竟公然以同俄国开战相威胁。

1757年6月14日北京政府再次致函彼得堡，通知说，清军夺得阿睦尔撒纳的大车，车中发现4封俄国边防指挥官的信，他们建议阿睦尔
460 撒纳入俄国国籍。中国政府据此指责俄国当局支持卫拉特“叛匪”，并强硬要求交出阿睦尔撒纳及其同谋者。

这时阿睦尔撒纳节节败退，于1757年7月28日来到谢米巴拉丁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年，第2卷，第232张。

[2]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年，第2卷，第245张。

斯克要求避难。他受到当地司令部的接待，两天后被送到亚梅舍沃，在那里查明他得了天花。在亚梅舍沃要塞给他进行了治疗。7 月 31 日，他被送往托博尔斯克，于 8 月 20 日到达。8 月 22 日，阿睦尔撒纳在同西伯利亚副总督格拉勃连诺夫谈话时说，他决定照其他卫拉特王公那样逃入俄国境内，是在他确信“准噶尔已整个被毁灭以及无数人民被杀害”之后。[1]

阿睦尔撒纳接近俄国边界时，遭到了阿布赉苏丹的哈萨克部队的突然袭击，阿布赉苏丹这次行动是与清军联系过的。阿睦尔撒纳因而丧失了全部牲畜和财产。他的属人或者被打死，或者被哈萨克人俘去，阿睦尔撒纳跟 8 个侥幸保全的人逃到了额尔齐斯河。他要求把他的通过各种途径潜入俄国境内的属民（约 4000 人）遣送到他那里来。

阿睦尔撒纳被迁到托博尔斯克近郊，他在那里过得非常满意，等待达瓦从彼得堡回来。可是，1757 年 9 月 15 日阿睦尔撒纳又得了痘症，6 天以后就死了。这个起先曾是达瓦齐的盟友而后成为死敌，起先背叛自己的民族投奔清帝国而后在两年的时间里又领导了反对征服者的解放斗争，成为这场解放斗争的旗帜的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的（终年 35 岁）、急风暴雨般的一生。蒙古人民怀念阿睦尔撒纳，把他当做最后一个反对外国征服者的全民解放运动的领袖，当做一位争取蒙古独立的战士来怀念他。

这时清军司令部正在不断寻找阿睦尔撒纳，得到他淹死在额尔齐斯河的传闻之后，司令部专门派人坐木筏顺流而下，任务是搜遍整个河底。当北京政府接到阿睦尔撒纳被俄国当局拘留，并在拘禁时患天花死去的正式通知以后，便要求交出尸体。沙皇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于 1757 年 11 月 1 日命令西伯利亚总督把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到边境的恰克图，邀请清朝行政当局的代表来那里，以便使他们能确信阿睦尔撒纳已死。1758 年 2 月 18 日，北京政府致函俄国当局，信中解释了它坚持自己的要求的理由。理由有两条：“他，因为是出名的叛匪和鄙视

461

[1]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准噶尔卷宗，1757 年，第 2 卷，第 250 张。

我(皇帝。——兹拉特金)的恩惠的人,根据我们的法律,无论如何不能宽恕",以及"为使俄国人不受他诡计多端的蓄意欺骗"。[1]

1758年3月13日,清朝当局的代表来到恰克图,他们确信阿睦尔撒纳的确死了。可是这没有多少效果。1758年3月28日,北京政府又给俄国当局发来一封信,坚持要求把尸体交给满洲当局,"以便众民看到这个恶棍,确信其死亡"。[2] 俄国当局对这一要求的坚决拒绝促使俄国和清帝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757—1759年,彼得堡和北京之间的来往信件几乎全部讲的是交出阿睦尔撒纳的尸体以及引渡逃入俄国的卫拉特起义者的问题。[3]

462 准噶尔的毁灭性战争到1759年才结束,这年清军消灭了卫拉特人在裕勒都斯山区的最后一个解放斗争的基地。

准噶尔汗国就这样被消灭了。所有史料一致指出,大批卫拉特居民被屠杀,这是清军司令部有计划进行的。《切列潘诺夫编年史》肯定,在准噶尔"人、畜全部被杀绝无遗,连俘虏也不放过,只有那些能够逃入俄罗斯边境的人才得了救"[4]。该民族总人口不下60万人,只有逃入俄国的三四万人活了下来。

准噶尔汗国最后几年的事件决定了它的衰落和灭亡,这些事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巴图尔浑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执政时期粗具规模的卫拉特国家,在经济方面、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新现象(发展农业、园艺、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国家的政治集中制等等)

---

[1]《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两份中国文据》(Д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листа об Амурсане),载《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和古物学会读物》,莫斯科,1868年,第4册,第10页。

[2]《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两份中国文据》(Д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листа об Амурсане),载《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和古物学会读物》,莫斯科,1868年,第4册,第13页。

[3]1761年12月14日《圣彼得堡》报道说,阿睦尔撒纳死去的消息使清朝帝国政府"眉开眼笑","而且阿睦尔撒纳对于他们是这样宝贵,以至他们还要弄到他的尸体,以便对尸体举行一种仪式,根据这种仪式他们的人民就会看到,如果他活着落到他们手里,应该被他们如何处死。但是西伯利亚总督认为这样做是下流无耻的,就代以另一种方式去满足他们,即他们可以在边境对他的尸体作两次检验:可先由蒙古指挥员派来几名急使验尸,然后再从北京当地为这件事派享有官衔的著名人物阿斯哈尼阿姆鲍到边境来"。

[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96号档,《切烈潘诺夫编年史》,第362张。

还很薄弱，无法抵制封建专擅和地方割据的重演。这终于造成封建无政府状态和残酷内战的重新爆发，其结果是卫拉特封建国家的解体和无力抵抗清帝国的进攻。

年轻的辉特领主阿睦尔撒纳在这一时期的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阿睦尔撒纳开始是许多参与封建内讧者之一，后来由于沽名钓誉的勃勃野心，成了汗位的争夺者。他遭到失败后，为了报复而向清朝求援，希望借清朝的帮助登上准噶尔汗的宝座。但是，实际结果却不是清人 463
帮助了他，而是他帮助清朝占据了准噶尔汗国。因受骗而大失所望之后，阿睦尔撒纳起义了，他领导了全卫拉特反对清朝外来统治的斗争，而跟青衮杂卜一起，还领导过喀尔喀的反清斗争。

464

结 束 语

准噶尔汗国的历史以及它以前的历史(至少从 14 世纪末起),都是蒙古整个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民族一直到 17 世纪都是以一个民族、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而出现的。真实的历史事实否定了文献中常见的一种观点:卫拉特人和“蒙古人”是只具有共同语言的不同民族。

的确,事实说明由于某种原因从蒙古族中曾经分离出若干集团,它们后来形成为说多种蒙古话的种族和民族。例如,南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就是这样,他们分别在 17 世纪 30 年代和中期脱离其余蒙古人而把自己的历史命运与中、俄两国的人民联系了起来,结果渐渐形成为住在苏联的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和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另外的民族。南蒙古和布里亚特分出之后,蒙古的成员就只剩下了喀尔喀和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覆灭以后,蒙古就只剩下一个喀尔喀(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了。

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种普遍观点:似乎东蒙古人和西蒙古人(即卫拉特人)是世仇,他们之间接连进行毁灭性战争,一部分蒙古人一直妄图统治另一部分蒙古人。实际上,史料表明,从14世纪末起到准噶尔汗国灭亡为止,
465 东、西蒙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特点不仅表现为战争,而且表现为长期和平、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通婚,以后还表现为与喇嘛教中心——拉萨的共同宗教联系。而他们间冲突的基础则是其封建执政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跟在中国的贸易特权有关。从蒙古封建主同一阶级的两部分人利益的这种冲突中,我们可以找到理解 15—16 世纪东、西蒙古之间,以及蒙古封建主和明朝之间历次战争的性质和原因的关键。用类似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西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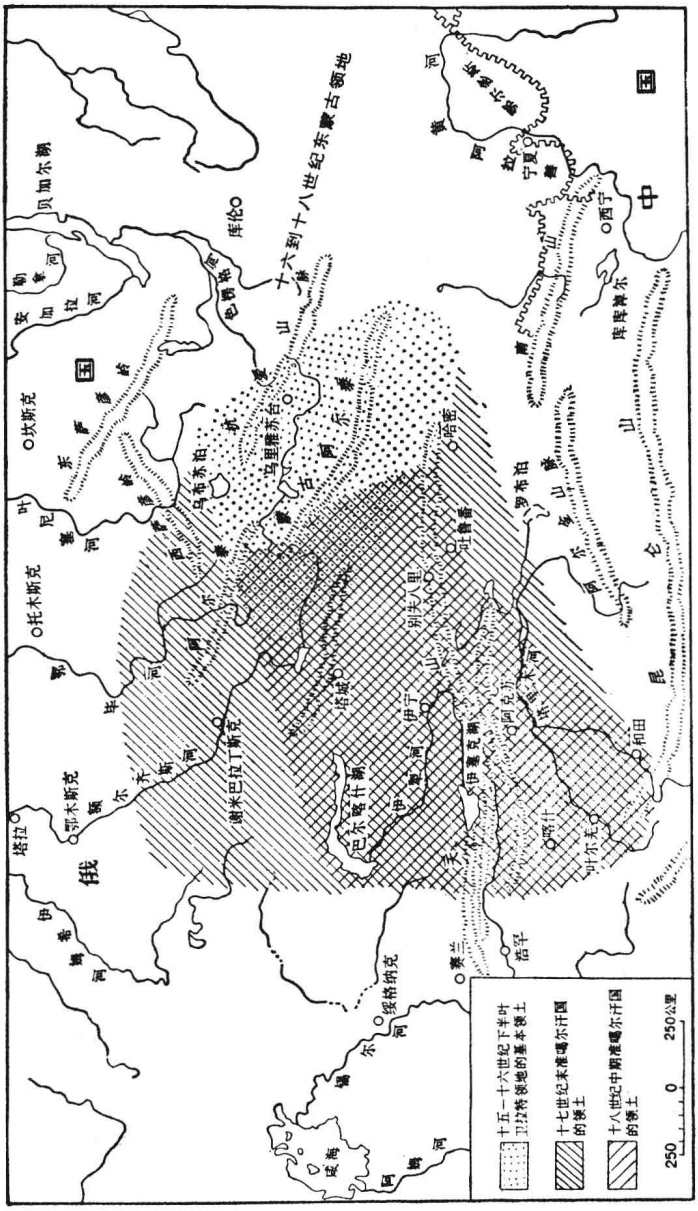
与蒙兀儿斯坦、西蒙古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战争，所不同的只是，这方面的斗争是为了争夺通向中亚的贸易通道，而且这个原因还不是唯一的。除了这个原因以外，牧地的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把汗和王公们推向争夺水草丰富的新土地的斗争。

至于东西蒙古的人民群众，他们对这些战争并不关心，只起农奴军为领主服役的从属作用。中国和中亚市场也像新牧地一样，都是蒙古封建主大畜牧经济所极端必需的，而蒙古阿拉特的小户经济对它们的需要程度则要小得多。可以认为，阿拉特从夺得的市场和新牧地得到的好处未必能抵偿这些战争中人力、物力的消耗。

史料的无数记载描述了蒙古人（其中包括卫拉特人）物质生产形式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可它们并没有证明，而是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过去广为流传的一些看法：认为游牧畜牧业的生产技术特点使牲畜变成决定性的生产手段，而使土地失去生产手段的作用。这就排除了出现一般土地私有制的可能，尤其不可能出现封建土地私有制，决定了必然保留氏族公社和氏族部落组织，使得放牧劳动者不可能依附于土地，推动游牧民族走上掠夺战争的道路（似乎游牧社会所有成员对这些战争在经济上有着同等的利害关系），使得游牧民族没有可能在他们的发展中超越封建制度的萌芽阶段等等。 466

史料记载不容置辩地证明，封建制度的一般发展规律在已进入这一发展道路的游牧民族那里也充分地起着作用，证明游牧业本身绝不能创造只有它特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证明不是游牧畜牧经济独具的生产技术特点，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某一游牧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内容和达到的水平。事实有说服力地证明，蒙古人民（其中包括卫拉特人）的主要部分在其历史发展中已经逾越过早期封建制度而进入了发达的封建制度阶段，这一阶段的内容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国内封建割据、阶级矛盾尖锐、手工业跟农业完全分离的前提形成等等。在准噶尔汗国，蒙古人的封建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那里出现了建立在牧奴劳动基础上的“公营的”汗管的手工工场的萌芽，农业开始扩展等等。卫拉特封建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已非常临近

这样一个阶段:向定居过渡已逐渐成为继续前进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但是,18 世纪 50 年代的悲惨事件中断了这个过程。



15—18 世纪卫拉特封建领地和准噶尔汗国示意图

(按原书附图译制)

由上面这段话可以得出结论:在游牧畜牧经济范围内向前发展的客观可能性,不受封建制度早期阶段的限制;这种经济的生产技术特点
467 本身,并不能成为走向封建生产方式更高阶段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应该注意,史学界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一个游牧民族在完成了发达的封建制度所固有的一些过程之后,不放弃游牧的经济形式和生活习惯,不过渡到定居,就会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即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形成的阶段。但是在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关系在游牧民族中有可能发展的范围内,它们的发展是完全符合封建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的。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定居民族的封建制度在本质上、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重大区别的。

准噶尔汗国的历史和整个蒙古的历史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准噶尔汗国的灭亡打破了在中央亚细亚所形成的均势局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国际纠纷。清帝国于1758年占领准噶尔,又于1759年占领东土耳其斯坦之后,把自己的疆界一直推向俄国和中亚各汗国的边界。这些汗国的执政者当真吃惊起来,担心自己领地的政治独立。瓦利汉诺夫满有根据地写道:"过去曾危及中亚的强大的准噶尔的覆灭,最后,伊斯兰教的小布哈拉的被征服,使整个亚洲都惊恐万状。"[1]准噶尔汗国的覆灭,在俄国的统治集团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他们直到18世纪90年代都在严重担忧清军会侵入俄国境内。

不过,清帝国的执政者并没敢冒险去执行自己的扩张政策。他们的军队只停留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和北部的边界上。清帝国所以放弃进一步征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蒙古后方还没有把握,怕
468 在那里再爆发民族运动,这会使它用武力得来的胜利化为乌有。

由于击溃准噶尔汗国而急剧紧张起来的这一地区的国际形势,后来,逐渐变得不那么紧张了,战争的危险开始减弱,到了18世纪末,就完全消灭了。

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历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

[1]瓦利汉诺夫:《关于六城市的状况》,第47页。

第一版附记

本书由马曼丽同志担任主要的翻译工作，第五章的一部分是李健、赵辉杰二同志协助翻译的；崔志筠、王哉伍二同志参加了全书的校阅工作；原书引用的汉文资料及中文人名、地名、书名的查对，是杨建新同志作的；刘珊珊同志在翻译疑难问题上给予了指导，王宏钧同志从专业角度对全书译文进行了审校；刘存宽同志对序言提出了宝贵意见。

缩写词表

ААН——科学院档案馆

АВПР——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

ВОАО——考古学会东方部

ВОРАО——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

ЖМНП——国民教育部杂志

ЗВОРАО——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

ЗИРГО——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丛刊

ЗРГО——俄国地理学会丛刊

ИИРГО——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

ИРГО——俄国地理学会学报

ИРАН——俄罗斯科学院学报

ЦГАДА——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

人名索引

Абабан-хан 见 Баахан-хан

Абай(阿拜)
126,127,133,134

Абаков Кока(阿巴科夫·科卡)
210,215,216

Абарзына-хан 见 Амурсана

Абас 见 Аббас-шах

Абатай-хан(阿巴岱汗)
106,107

Абахай(阿巴孩) 168

Абахан-хан 见 Баахан-хан

Аббас-шах(Абас)(阿巴斯沙赫[阿巴斯]) 128,129

Абдаллах(阿勃达拉赫) 67

Абдул-Ерке-зайсан(阿卜杜尔叶尔克宰桑) 336

Абдулла-Сэцэн(阿勃杜拉彻辰)
78

Аблай-сутан (Аблай-хан)(阿布赉苏丹[阿布赉汗])
28, 429, 430, 435, 438, 443, 449 – 454,460

Аблай-тайджи (Аблай-тайша, Абулай, Облай-тайша)(阿巴赖台吉[阿巴赖台什,阿巴赖])
120, 182, 190, 197 – 199, 203, 207, 209 – 214, 226, 229, 245, 394

Аблай-хан 见 Аблай-султан

Аблин Сеиткул(阿勃林·谢伊特库尔) 222,241,244,245

Абрамов К.(阿勃拉莫夫)
179,186

Абулай 见 Аблай-тайджи

Абулхаир-хан,правитель Младшего жуза(阿布尔海伊尔汗,小玉兹执政者) 435

Абулхаир-хан,правитель Узбек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阿布尔海伊尔汗,乌兹别克汗国执政者) 64

Абульгази(阿布里加齐) 418

Абу-Сеид(阿布赛伊德) 65

Авас-бай(阿瓦斯巴伊) 383

Адай-хан(阿台汗)
44 – 47,49,69

Аджа-хан 见 Цеван-Доржи-Аджа Намжил

Айчувак-султан (Айчувак-салтан)

（爱丘瓦克苏丹） 451
Ак-Мункз-Баян（阿克蒙哥伯颜） 51
Алак-Тэмур-чинсанг（阿拉克帖木儿宰桑） 50
Алдар-габжи（阿尔达加勃士） 12,14
Алдар-тайджи （Алдар-тайдзи）（阿尔达尔台吉） 207,264
Алексеев М. П.（阿历克赛耶夫） 104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 191,211,216,218
Алтан-хан（俺答汗） 58,68,69,100－102,105,152－154
Алтан-Сандалиту-хан（阿勒坦桑达里图汗） 86
Алтын-хан 见 Алтын-хан Омбо-Эрдени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Лобдзан，Лоджан，Лоджан-Сайнконтайша，Лодзан-тайдзи，Лоузан，Лубсан-Сайнхан，Лубсантайдзи，Сайн-контайша，Адтын-царевнч）（阿勒坦汗罗卜桑［藏］台吉［罗卜桑，罗德桑赛英浑台吉，罗德桑台吉，罗乌桑，罗卜桑赛音汗，赛音浑台吉，阿勒坦王子］） 215－218，220，221，229，230，242，243，261，262，267
Алтын-хан Омбо-Эрдени（Алтын-хан，Алтын-царь）（阿勒坦汗鄂木布［俄木布］额尔德尼［阿勒坦汗，阿勒坦国王］） 150，151，183，185，195，196，198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Алтын-царь，Олтын，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洪台吉［阿勒坦国王，乌巴什洪台吉，硕垒乌巴什洪台吉］） 11，15，107，110－112，125－127，135－144，147，149，150，216，407
Алтын-царевич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Алтын-царь 见 Алтын-хан Омбо-Эрдени
Алтын-царь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Алутай（А-лу-тайя）（阿鲁台） 47，49
Аманай（阿芒纳） 81
Амида（阿密达） 288

Амир-Али-бек(阿米尔阿里别克) 129
Амурсана(Амур Санан, Амурсан, Амурсанай, Абарзына-хан)(阿睦尔撒纳[阿巴尔撒纳汗]) 427－430,435－441,443,444,448－455,457－463
Ананьда(阿南达) 276,280
Андреев А. И.(安德列耶夫) 99,117
Андриевич В. К.(安德里耶维奇) 18,321
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安娜·伊凡诺芙娜) 332,364,370,374－376,383,386
Ану-хатунь(阿努哈屯) 288,300
Аппак-ходжа(阿帕克和卓) 252
Арабджур(阿拉布珠尔) 334,339
Арани(阿喇尼[阿尔尼]) 262,265,269,278,279,285,286,289,317
Араптан 见 Цэван-Рабдан
Араптань(阿拉卜滩[阿喇布坦]) 272
Араптань 见 Цэван-Рабдан
Аренар 见 Ренат
Аристов Н. А.(阿里斯托夫) 389
Артемьев Г.(阿尔捷米耶夫) 390
Аршинский Д.(阿尔申斯基) 202
Асан-ходжа(阿桑霍吉) 353,354
Ахай(阿海) 300
Ахмед-хан(阿黑麻汗[阿拉吉汗]) 66
Ациту-гелун(Ацитуй-гелун)(阿齐图格隆) 261,275
Ачай-тайджи(阿寨台吉) 59
Аюка-хан(Аюкай, Аюкатайдзи)(阿玉奇汗[阿玉奇,阿玉奇台吉]) 12,203,253,254,264,318,325,331,333－335,339,340,348,349,354,358,359,367,368,391,408,409,412
Аюка, сын Аблая-тайджи(阿玉奇,阿巴赖台吉之子) 207
Баатыр-тайша 见 Цзотбабатур
Баатырь-контайша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Баахан-манжи(巴阿哈曼仁) 216
Баахан-хан(Абабан-хан, Абахан-

хан)(巴阿哈汗[阿巴巴汗,阿巴哈汗])　215,218,221,230,242
Баба-султан(巴巴苏丹)　119
Баба-хан(巴巴汗)　156
Баисхалан(拜司哈朗)　357
Байбагас-хан(拜巴噶斯汗)
73,111－113,120－123,128,129,135,139,149,151,155,156,158,167,169,190,199,208
Байбагиш-тайша(Байбагуш)(贝八吉什台什)
141,144－147,199
Байгачев И.(贝加切夫)　192
Байков Ф.(贝科夫)
164,182,211,410
Байри(拜里)　275
Байту-хан(拜图汗)　230
Бакунин В.(В. 巴库宁)
17,375,376,391,393,397,398,409,410,412,419－421,436
Балдан-тайдзи(巴尔丹台吉)
268
Балдар-Доржи(巴尔达多尔济)
400
Бальжур(Балвжир)(巴尔珠尔)
436,440
Банзаров Доржи(道尔日·班扎罗夫)　30,33,35,36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班蒂什·卡缅斯基)
18,319,376,425,428
Баньди(班第)　442
Банди-Дайцин-тайдзи(Дайцин-тайдзи)(班第岱青台吉[岱青台吉])　267,268
Баранов А.(巴拉诺夫)　400
Бартольд В. В.(巴托尔德)
15,27,32,43,44,65－67,166,237,252,389
Барятинский Н. П.(巴里亚京斯基)　396
Батор-хонь-тайцзи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Батраков В.(巴特拉科夫)　24
Бату-Болот(把秃孛罗)　34,40
Бату-Менко(巴图蒙克)　368
Бату-Мункэ-Даян-хан(Бату-Мункэ,Даян-хан)(巴图蒙克达延汗[巴图蒙克,达延汗])
58－60,62,66,87,99,102,105,106,177
Батула-чинсанг(巴图拉丞相)
39,45
Батур　见 Цзотба-Батур
Батур-джинун　见 Батур-Эрхеджинун
Батур-дзинун　见 Батур-Эрхеджи-

нун
Батур-зайсан(巴图尔宰桑) 392,419
Батур-контайша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Батур-Убаши-Тюмен(巴图尔乌巴什丘缅) 12－14,27,72,75,79,87,98,102,110,112,113,116,120,121,148,155,162,194,201,202,207,208,410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Баатырь-контайша,Батор-хоньтайдзи,Батур-контайша,Батур-хун-тайчжи,Хото-Хоцин-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巴图尔浑台吉[巴阿德尔浑台吉,呼图霍庆巴图尔浑台吉]) 56,72,94,95,98,123,151,159,162－165,167－173,177－204,206－210,212,213,215,216,218,222,226－228,230,231,234,251,257,260,409,411,422,437,462
Батур-Эрхе-джинун(Батурджинун Батур-дзинун)(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巴图尔济农]) 254
Бахаму 见 Тогон
Баху(巴郭) 51
Бахмуратов Айбек(巴霍穆拉托夫·阿伊别克) 365
Бахрушин С. В.(巴赫鲁森) 321,328
Бахтый(巴赫特伊) 198－200
Баян-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巴延巴图尔洪台吉) 70
Баян-Мункэ-Болхо-джионг(巴延蒙克博勒呼济农) 58,59
Бебе(别别) 209
Беклемишев В.(别克列米舍夫) 358,391
Белоголов И.(别洛戈洛夫) 126
Березин И.(别列津) 418
Беседнов А.(别谢德诺夫) 439,440
Бестужев-Рюмин(别斯图热夫·柳明) 429,436
Бе-Фянь-гу(伯费扬古[费扬古]) 307－310
Билик-Мерген(必里克墨尔根) 87
Биликту-лама(Биликталоба)(比里克图喇嘛) 140
Бильдега И.(比尔杰加) 365,366
Бинту(宾兔) 69
Бира Ш.(比拉) 3

Бирер-Таншике(比列尔·坦什凯) 439
Битей(比杰伊) 437
Бичурин Н. Я. (Иакинф)(比丘林[雅金夫]) 5－8,19,31,32,35,37,54－56,63,93,94,96,98,99,138,163－165,196,209,233,234,339,340,406,420,425,441
Богатыр-тайша 见 Далайтайша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С. К. (鲍戈亚弗连斯基) 18,25,38,115,406,407
Боджир(博吉尔) 359
Болай(孛来) 61,62
Боочжу(博珠) 337
Борджигин(孛儿只斤) 78
Боро-Айялху(博罗纳哈勒) 72
Борокудзи-тайдзи(博洛库济台吉) 264
Борокурган(博罗库尔干) 349,392
Ботоэ-Элету(博端额叶图) 255
Боудэн Ч. (巴乌登) 9,38,39,44－46,48－50,58,69,76
Бошокту-дзинун(博硕克图济农) 311
Бошокту-хан 见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хан
Братищев В. (勃拉季谢夫) 456,459
Бретшнейдер Э. (勃列特史奈德) 8,27,33,34,36,41,49,68
Броневский(勃罗涅夫斯基) 419
Бубенной В. (布别诺伊) 214－216
Бугачка(布加奇卡) 204
Буголаков Я. (Якунька)(布戈拉可夫[雅可夫]) 145－147
Буйнос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А. И(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 207
Букей-хан(布克汗) 85
Булат-манжи(布拉特满仁) 229
Бурдукова Т. А. (布尔杜柯娃) 13
Буринай(布尔尼) 260
Бурков Ф. (布尔科夫) 443,444
Буртэ-Чоно(孛儿贴赤那) 76
Бутчеев А. (布尔切耶夫) 229
Бутуксень-хутухта(卜图克森库图

克图） 268
Бутурлин И. В.（布图林） 214,383
Бухаров А.（布哈罗夫） 129
Бухгольц И.（布赫戈利茨） 342－344,346,362
Буцинский П. Н.（布钦斯基） 18
Бушукту 见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хан
Бушукту-хан 见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хан
Буян-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布延巴图尔洪台吉） 106
Быковский С. Н.（贝可夫斯基） 24
Былин В.（伯林） 218－222,228
Бэгэрсэн-тайша（拜盖尔赛台什） 58
Бэддли Дж.（巴德利） 21,22
Бэкон Э.（拜柯） 82
Бэлл Ч.（贝尔） 23,340
Бэнь-я-ши-ли（本雅失里） 46
Бюллер Ф. А.（比尤列尔） 17,94
Вакулин Г.（瓦库林） 248
Валиханов Ч.（瓦利汉诺夫） 15,27,166,252,425,467
Ванжил-ван（凡济尔王） 488
Ван Сянь-цянь（王先谦） 21
Ван-хан（王罕） 12,13,88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瓦西里·伊凡诺维奇） 129
Васильев В.（瓦西利耶夫） 162,377
Ватин В. А.（瓦京） 321,328
Вейс-хан（Увейс-хан）（歪思汗） 43,65
Вельяминов С. Я.（维尔亚米诺夫） 221
Вельяминов-Зернов В. В.（维尔亚米诺夫·泽尔诺夫） 67,68,163,197
Венюков М.（维纽科夫） 425
Веревкин（维列弗金） 438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维谢洛夫斯基） 12,37,52,55,93,96,99,129,162,163,236,319,320,331,336,354,358,388
Вильянов Г.（维利亚诺夫） 346
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 Я.（弗拉基米尔佐夫） 7,12,24,25,38,73,74,79,80,82－84,96,97,161,388,393
Воейков С. И.（沃叶科夫） 123
Волков В.（沃尔科夫） 144

Врилэнд Х.（弗里莱德）
395－397,399,405,407,415
Выйджен-Хатан-батур（卫征哈滩巴图尔） 269,270
Вяткин Дм.（维亚特金） 210
Габан-гелун（加班格隆）
430,437
Габан-Шараб（加班沙拉勃）
12－14,27,71,72,75,78－81,86,87,91,98,102,120,122,148,149,155,156,162,169,170,194,201－203,207,211,226,331,410
Гагарин М. П.（М. П. 加加林）
331,339,341－347,381
Гагарин С. И.（С. И. 加加林）
124
Галдама（噶勒达玛）
201,207,209,211,213,394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хан（Бошокту-хан, Бушукту-хан, Бушухту, Галдан, Кегень）（噶尔丹博硕克图[博硕克图汗,博硕克图,噶尔丹,格根]） 19,164,208,214,216,220,228－230,233－261,263－319,323－325,327－330,332,335－338,341,373,411,414
Галдан-Доржи（噶尔丹多尔济）
395,437
Галдан-тайджи—автор《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э》（噶尔丹台吉[《宝贝念珠》的作者]） 10
Галдан-тайдзи（噶尔丹台吉）
269,270,288,289
Галдан-Церенс Галдан-Чирин（噶尔丹策凌） 319,320,322,332,347,358－381,383－387,392,411,419,422,425,428,430,432－434,437,462
Галдан-ширету-лама（Галдан-ширету, Ширетуй）（噶尔丹西勒图喇嘛[噶尔丹西勒图,西勒图]）
262,263,265,266,270
Гарма-Дайцин-хошоуци（噶尔马岱青和硕齐） 264
Гедин Свен（斯文赫定） 22
Гелей-Гуен（格罍古英） 279
Гераклитов А. А.（格拉克利托夫） 130,131
Гербилон 见 Жербийон
Георга И. Г.（格奥尔加） 94
Головин Ф. А.（柯罗文,戈罗文,戈洛文） 269,280,281,284
Голстунский К. Ф.（戈尔斯童斯基） 19,174,250,251,407
Голубин П.（戈鲁平）
126－128,133,134

Гольман М. И.（戈尔曼） 19,165
Гоман-лама（谷曼喇嘛） 12
Гомбо（戈木布） 212
Гомбоев Г.（贡布耶夫） 9,11,46
Горский В.（戈尔斯基） 101
Грабленов В.（格拉勃连诺夫） 460
Григорьев В. В.（格里戈里耶夫） 56,163,338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格鲁姆·格尔日麦洛） 20,31,33－36,43,86,68,72,97,115,163,164,237,388
Губин Д.（古宾） 68
Гуйлинчи-багатур（巴图鲁珪林奇） 44,49,78
Гуйличи（鬼力赤） 46,47
Гун-тэмур（坤帖木儿） 44,46
Гуньджан-Гумбу（滚占滚卜） 268
Гурлянд И. Я.（古尔梁德） 19
Гуши-хан（Туру-Байху）（顾实汗［图鲁拜琥］） 120,159,160,167－169,172,178,201,224,227,253,257,321,328,336,356
Гуши-хатунь（古实哈屯） 59
Гэрэсэндзэ（格呼森扎扎赉尔） 106,110
Дава（达瓦） 457,458,460
Даваци-хан（Даваци,Дебача,Табачи）（达瓦齐汗［达瓦齐,达巴齐］） 365,429,430,432,435－445,448－460
Давыдов И.（达维多夫） 248
Даен（达叶） 207
Дйсун-хан（То-то-бу-хуа）（岱总汗［脱脱不花］） 45,47－49,53,58,59,69
Дайцин-тайдзи 见 Баньди-Дайцин-тайдзи
Дайчин-тайша（Дайчин）（岱青台什［岱青］） 81,202,203,211,394
Далай-бэйсе（达赖拜塞） 446
Далай-тайдзи（达赖台吉） 298
Далай-тайша（Богатыр-тайша,далай,Далай-Батур,Далай-батур,Талай-тайша）（达赖台什［巴加德尔台什,达赖,达赖巴图尔］） 73,122,124－127,134,135－139,141,142,144,150,156,159,160,172,199－201,205,206
Д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达赖洪台吉） 178

Далай-Чойнхор-ван(达赖卓音和儿王) 77
Дамба-хасиха(丹巴哈什哈) 309,310
Дамдин(达玛琳) 457
Дамдинсурэн Ц.(达木丁苏隆) 75,84,85
Данжин(丹仁) 364
Даньдзила(丹济喇[丹济拉]) 269,287,304,311,312,327,336
Даньдзин(Должин-Кошючи,Донжин Кожечи)(丹津[多仁科舍奇]) 218,221,230,242,279
Даньдзин-Омбо(Даньдзин-Гомбо)(丹津温卜[丹津俄木布]) 269,304,311,312,327
Даньдзин-Рабдан(丹津喇布坦) 336
Дарибанчи(达里班奇) 207
Дармабала(达尔马巴拉) 333,335
Дармасири-ноян(达尔马西里诺颜) 268,269
Дархан-зайсан(达尔罕宰桑) 280,281
Дархан-хасиха(达尔汗哈什哈) 252,253
Дархан-эмци(达尔罕厄木齐) 315
Даши-тайша(达沙台什) 207
Даян-хан 见 Бату-Мункэ-Даян-хан
Дебача 见 Даваци-хан
Дебеш(杰别什) 364
Девлет Шиха(杰伏列特舍赫) 244
Девлетов(杰伏列托夫) 147
Девникей(杰伏尼盖) 141
Девятияровский(杰维亚季亚罗夫斯基) 370
Дегинь(狄庚) 5
Дезидери И.(德西代里) 23,340
Декдехей-мерген-ахай(Декдехый-Мырген-ахай,Дыкдехый-мергы-нахай)(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 267,268,277
Делег-ван(德勒克王) 448
Делег-гелун(德勒克格隆) 458
Делег-Доржи(德勒克多尔济) 437
Делиб-хутухта(杰利卜呼图克图) 395,397－399,405,407,415
Дельбек-хан(德勒伯克汗[塔里巴汗]) 44－46
Демидов(杰米多夫) 333

Джагатай(察哈台) 15
Джалбу(扎尔布) 408
Джан Юн 见 Чжан Юн
Джанцихай(钟济海) 325
Джарнай(Джарбунай)(扎尔布奈) 261,262
Джебдзун-Дамба-хутухта(Джабдзун-Дамба, Джебдзун-Дамба-кутухта)(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折卜尊丹巴]) 263,265,266,268－272,274－279,282,285,287－291,292,294,298,299,302,304,353,394
Дженкинсон А.(捷金松) 67,68,103
Джинтей-хан 见 Чжу Ци-чжэнь
Джирун-хутухта(Джирим-кутухта, Дзирун-кутухта, Джирун, Дзирун-эрдени)(济隆呼图克图[济隆,济隆额尔德尼]) 281,283,284,287－290,292－298
Джучи(术赤) 15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Сайн-Лайхор-хан(Сайн-Лайхор-хан)(札萨克图汗赛因赉湖尔汗[赛英赉湖尔汗]) 106,110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Субуди(札萨克图汗素巴弟) 172,173,177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Ценьгунь(札萨克图汗成袞) 261,262,288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Шара(札萨克图汗萨喇) 267,268,277,295
Дзиргалан-зайсан(吉尔噶郎宰桑) 278
Дзирун-кутухта 见 Джирунхутухта
Дзирун-эрдени 见 Джирун-хутухта
Дзонхава(Дзункаба)(宗喀巴) 266,276,302,314
Дзорикту(Зорокту)(卓哩克图[卓罗克图]) 124,207
Дзу-чинсанг(朱丞相) 73
Дзункаба 见 Дзонхава
Дова-Сохор(都蛙锁豁儿) 71
Доен-Онбо тайша(Доен-Анботайша)(多叶昂布台什) 202
Домонай(朵蒙纳) 81
Дондук-Даши(敦多卜达什) 417
Дондук-Омбо(敦多卜鄂木布) 359,361,418
Донжин Кожечи 见 Даньдзин
Донжин-Кошючи 见 Даньдзин
Дордзиджаб(多尔济扎卜) 268,270,275,277
Доржи(多尔济) 355
Доржи Назаров(多尔济纳扎罗夫) 391,408

Доржи-Рабдан(多尔士拉卜丹) 12,253
Дугар-Рабдан (Дугар-Арабтань, Рабдан)(杜噶尔拉卜滩[杜噶尔阿拉卜滩,喇布坦]) 269,327,311,312
Думан Л. И.(杜曼) 420
Духар(杜哈勒) 436
Дылыков С. Д.(迪雷科夫) 29
Дянь-Джайсан(达颜寨桑) 272
Елецкий(叶列茨基) 123
Елизавета(伊丽莎白) 457
Ельден-тайша 见 Ильден-тайша
Ереняк(叶列尼亚克) 248
Ереняков Корчик(科尔奇克·叶列尼亚科夫) 336
Есим-хан(Ишим-царевич,Ишим-царь)(叶西姆汗[伊施姆王子,伊施姆王]) 141,142,145,197
Exe-Абугай(叶和阿布盖) 358,359
Жадовский Н.(扎多夫斯基) 194,195
Жербийон(Гербилон)(张诚[热尔皮昂]) 20, 162, 164, 165,390,391
Зайсан(咱伊桑) 244,245
Зая-Пандита(咱雅班第达) 10, 11, 14, 27, 75, 79, 80, 98, 103, 123, 156, 157, 162, 164, 165, 169, 173, 177, 179, 197, 201, 206, 208, 209, 211 - 214, 224, 227, 228, 393, 394, 404, 407,410,412
Зеленовский(泽列诺夫斯基) 331
Зенгил-тайша(泽吉尔台什) 143
Златкин И. Я.(兹拉特金) 339,367,404,406,447,449,454
Зобнин Ф.(佐勃宁) 419
Зорикту-хунгайджи 见 Цзван-Рабдан
Зорокту 见 Дзорикту
Зундуй-Замсу(宗杜伊扎姆苏) 386
Иакинф 见 Бичурин Н. Я.
Ибири-тайджи(亦不剌台吉) 66,69
Ибрагимов С. К.(伊勃拉吉莫夫) 16,27
Иван Ⅳ(伊凡四世) 68,116,130
Иванов Ф.(伊凡诺夫) 202
Измаил(亦斯美耳) 252

Измайлов Л.（伊兹麦洛夫）
350,351
Илагугсан-хутухт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279,281－283,288,289,292,294,297,298,303,311,312
Иларион（伊拉里昂） 24,225
Илден-тайдзи（伊尔登台吉）
269
Ильден-тайша （Ильден-тайша, Эльдень）（伊尔岑台什［爱尔岑台什,爱尔岑］） 171,197
Ильин Г.（格·伊利英）
180,183,197,198,200
Ильин Д.（德·伊利音）
358,363
Инь Чжэнь（胤祯）
355,367,372,374,375,377,396
Иондон-Джамцо（云丹坚错）
154
Ирка（伊尔卡） 207
Ирка-Чечень-Янзан（伊尔卡切庆亚扎） 214
Иркебек（伊尔克伯克） 244
Ирке-Илдель-тайша（伊尔盖伊尔斤台什） 145
Ирки-мулла（伊尔基木拉）
211,213
Ирким-зайсан（伊尔金宰桑）
281
Иса-Буга-хан（伊沙布加汗）
67
Исмаил-мурза（伊斯迈伊尔贵族）
130
Исуп（伊苏泼） 68
Ишжамц Н.（伊然姆兹）
29,428,429
Ишим-царевич 见 Есим-хан
Ишим-царь 见 Есим-хан
Ишкеп（伊什盖普） 207,210
Иштерек（伊什捷列克） 132
Канси 见 Сюань Е
Канхи 见 Сюань Е
Карагуль 见 Хара-Хула
Каракула 见 Хара-Хула
Каракула-тайша 见 Хара-Хула
Карвацкий И.（卡尔瓦茨基）
243
Каскинов А.（卡斯金诺夫）
453
Катанаев Г. Е.（卡塔纳耶夫）
18,119,123,390
Кафаров П. И.（Палладий）（卡法罗夫［帕拉基］） 10
Каэн Г.（加恩） 21,321,322
Кегень 见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хан

Кибирев Г.（基比列夫）
281,282,284,286
Кирасан（基拉山） 124
Киржатцкий В.（В. 基尔扎茨基）
203
Киселёв С. В.（基谢略夫） 29
Кислянский Л.（基斯梁斯基）
280,286,289
Китат（祁他特） 258,259
Клепиков В.（克列皮科夫）
170,180,189,190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科瓦列夫斯基）
37
Козин С. А.（柯津）
10,32,36,38,73,75,84,85,88,
93,96,99,107,114,176,321
Кондратьев Ф.（康德拉切夫）
150
Конрад Н. И.（康拉德） 29
Костелецкий Ф.（科斯捷列茨基）
204
Костенков К.（科斯坚科夫）
32,37,94,407,410,420
Котвич В. Л.（科特维奇）
4,19,22,93,98,115
Котовщиков М.（科托夫希科夫）
365
Кочюрта 见 Очирту-Цецен-хан
Кошевчей（弋舍弗奇）
126,127,133,134
Красовский М.（克拉索夫斯基）
18,197,321,425
Крофт（克罗弗特） 433,434
Куйша-тайша（顾伊舍台什）
150,172,194,195
Кулагин Д.（库拉金） 186
Кула-тайша（库拉台什）
184,186,205
Кулмагмет（库尔马赫默德）
108,109
Кульвинский П.（库尔文斯基）
216,217
Кумян（库缅） 184
Кунделень 见 Хундулен-тайша
Кундулен-бошокту（昆都仑博硕克图） 269
Куницын И.（库尼庆）
133,134,157
Куракин Г. С.（库拉金）
189,197,199
Куран М.（库兰）
21,321,322,425,426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库罗帕特金）
18,425
Курц Б.（库尔茨） 321,425
Кутук（库图克） 439,440

Кучум(古楚)
116－118,123,187,386,390
Куян(古扬) 146
Кзрий-Худжигэр(凯里呼济盖尔)
59
Ладзан-хан(拉藏汗) 336
Лама-Даши(喇嘛达什)
383,386
Лама-Доржи(Эрдени-Лама-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喇嘛达尔札[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洪台吉])
429－431,434－437
Ланг Л.(兰格)
322,352,353,356
Левшин А.(列弗申)
196,356,425,428
Лекбей(列克别伊) 418
Лекден(列克坚) 417,418
Лемпил-Доржи(延丕勒多尔济)
456
Леонтович Ф. И.(列昂托维奇)
19
Леонтьев А.(列昂节夫) 240
Лепехин И.(列佩辛) 94
Лигдан(Ликдан-хан)(林丹[林丹汗]) 163,260
Липовцев С.(利波弗采夫)
425
Литосов В.(利托索夫)
215,216
Лихарев И. М.(利哈列夫)
347
Лобдзан-Гумбуй 见 Лубсан-Гомбо
Лоджан 见 Алтын-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оджан-Сайн-контайша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одзан-тайдзи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озон-Даньжин 见 Лубсан Даньдзин
Лоузан-Шоно (Шоно, Шуну, Шоно-батур)(罗卜藏索诺[索诺,索诺巴图尔])
358－361,368,374－376,396
Лубсан(罗布藏) 82
Лубсан-Гомбо(Лобдзан-Гумбуй, Лобдзан-Араптан)(罗卜藏袞布[罗卜藏滚布,罗卜藏滚卜阿拉卜滩]) 254,268
Лубсан-Даньдзин(Лозон-Даньжин)(罗布桑丹津)
356,372
Лубсан-Сайн-хан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убсан-тайдзи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убсан-Шэлэн(Шоно)(罗布藏硕伦[索诺]) 372
Лыткин Ю.(雷特金) 13 - 15, 106, 107, 111 - 114, 121, 209
Маатыр-тайша 见 Цзотба-батур
Майдари-хутухта 见 Цаганно-мун-хан
Майский И. М.(麦斯基) 29
Максюков И.(马克休科夫) 439
Малай(玛拉伊) 207
Мамерень-тайша(马密林台什) 171
Маметелип(玛密林台什) 241
Мангит(满吉特) 144
Мандугули-хан(满都古勒汗) 58, 59
Мани-Мингату(玛尼明阿图) 69
Мансту-хан(满速儿汗) 66, 67, 105
Мантухай-сайи-хатунь(满都海赛音哈屯) 58, 59
Манхай(曼海伊) 112
Меньшой-Ремезов(明索伊·列密佐夫) 187, 188, 197
Маркс К.(马克思) 401
Масальский И. В.(马萨尔斯基) 117
Масуд Бен Османи Кухистани(玛苏达·贝·奥斯玛尼·库赫斯坦尼) 16
Маха Самади Цере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Шолой
Махаму(Махмуд)(马哈木) 31, 34, 40, 46, 47
Махмуд-Шарас(穆罕默德沙拉思) 119
Махмуд Ялавач 见 Ялавач Махмуд
Мачик(马奇克) 206, 216
Мерген-Дега(梅尔根捷加) 195, 196
Мерген-Тэмэнэ-тайша (Мерген-Темень-Тайша)(梅尔根杰梅奈台什) 142, 146, 149
Мергус-хан(Угегту-хан)(蒙尔古斯汗[乌珂克汗]) 59
Миллер, майор(米勒少校) 380
Миллер Г. Ф.(米勒) 17, 18, 115, 164, 167, 172, 179, 186, 192, 195, 342, 344
Минаев И. П.(米纳耶夫) 12, 320, 321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 128,129,135,140,180,191,195
Молон-хан(摩伦汗) 58,59
Мончак(蒙恰克) 203
Мостарт А.(摩斯塔尔特) 9
Мункэ-Тэмур(猛可帖木儿) 34,40,41
Мункэ-хан(蒙哥汗) 50
Мухаммед-хан(穆罕默德汗) 67
Мухур-Маджик(Мухур-Мучжик, Мухур-Уизанг)(木呼儿马吉克[木呼尔木吉克,木呼儿乌依扎克]) 112,113,194
Мыш(梅什) 243
Мятлев В.(米亚特列夫) 430,441,448,452
Нагов М.(纳戈夫) 117
Найчун-Омбо(奈冲鄂木卜) 300
Накбай(纳克巴伊) 417
Накбарджи-джинонг(阿噶巴尔济济农) 47-50
Насонов Л.(纳索诺夫) 180
Наугат(Ноугат)(纳乌哈特) 430,437
Нацогдоржи(纳佐特多尔济) 29,399
Намеху-Жиргал(Намеху, Унемкай-Жиргал)(纳默库济尔噶尔[纳默库,乌涅姆盖济尔噶尔]) 430,435,437,438
Неплюсов И. И(涅普柳索夫) 434,435,452,454
Неурус(涅乌庐思) 243
Неустроев Л.(涅乌斯特罗耶夫) 179,188
Нефедьев Н.(涅费捷耶夫) 18,94
Новосельский А. А.(诺沃谢尔斯基) 131,132
Ноедай(诺耶台) 179,191
Ноугат 见 Наугат
Облай-тайша 见 Аблай-тайджи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奥戈罗德尼科夫) 18
Ойратай-хан(卫拉台汗) 44
Олой-Тэмур(奥洛依帖木儿) 44
Олтын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Ончон(鄂乔) 207,210
Орлюк 见 Хо-Урлюк
Очир-Дара-хутухта 见 Цаганно-мун-хан
Очирту-Цецен-хан (Кочюрта,

Очирту-тайджи, Учюрта)（鄂齐尔图车臣汗[鄂齐尔图,鄂齐尔图台吉]） 12,103,104,120,123,177,1825,197,199,201,202,207－209,211－214,224,227,229,245－249,252－255,3020,393,394
Палладий 见 Кафаров П. И.
Паллас П. С.（帕拉斯） 35,37,94,98,104,164,389,410,413,414,421
Пальмов К. К.（帕尔莫夫） 25,115,163,237,320,326
Певцов М. В.（佩弗佐夫） 400
Петех Л.（佩杰赫） 23,225,340
Петр Ⅰ（彼得一世） 21,163,322,334,335,342,343,345－347,349,350,355,379,380,384
Петр Ⅱ（彼得二世） 359,376
Петров И.（彼得罗夫） 135
Петров Т.（彼得罗夫） 133,134,157,172,183,184,190,194
Плещеев（普利谢耶夫） 378
Плотников А.（普洛特尼科夫） 436
Погорельский П. В.（波戈列利斯基） 24
Позднеев А. М.（波兹德涅耶夫） 10－14,37,55,57,72,87,93－96,99,101,102,106,112,113,116,120,121,148,155,160,162－165,167,194,202,208,215,234－237,239－241,263,319,320,324…
Поилов Б.（波伊洛夫） 363
Покотилов Д.（波科季洛夫） 6,7,27,37,41,47,52,53,56,60－62,101
Попов А.（阿·波波夫） 17,56,57
Попов Н.（尼·波波夫） 18
Попов П. С.（普·波波夫） 6,162
Поскочин Л.（波斯科钦） 223
Потанин Г. Н（波塔宁） 31,47,77,377,400
Пронский П. И.（普罗恩斯基） 179,187
Пунцук（布楚克） 408,437
Пучковский Л. С.（普契科夫斯基） 8,10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 В.（拉古津斯基） 322,357,367,368,373

Радлов В. В.（拉德洛夫）
37,389
Разумовская В.（拉祖莫夫斯卡娅）
17
Рамстедт Г. И.（拉姆斯杰特）
31,36
Ратнабхадра（拉特纳勃哈德勒）
11,79,103,169,173,177,197,201,206,209,211,227,393,407
Рашид-ад-дин（拉施特）
10,31,71,74,75,82
Рашид-хан（剌失德汗）
67,119
Ремюза А.（列密兹） 30
Ренат（Аренат）（列纳特［阿列纳特］） 362－364,366,369,371
Репнин Б. А.（阿·列普宁）
170
Репнин И.（伊·列普宁）
229,241
Рокхил В.（罗克希尔）
23,225,340
Романовский П.（罗曼诺夫斯基）
247
Ромодановский И.（罗莫丹诺夫斯基） 196
Россохин И.（罗索兴）
27,239,240,394
Рузбехан（鲁兹别罕） 16,64
Рычков П.（雷奇科夫）
94,425,428
Рязановский В. А.（里亚赞诺夫斯基） 19,32
Сабанский П.（萨班斯基）
205
Савельев П. С.（萨维利耶夫）
11
Саган-Сэцэн（Санан-Сэцэн）（萨囊彻辰） 6,8,8－10,14,27,39,40,46,51,69,70,87,105,152
Саймучин（赛穆沁） 46
Сайн-Лайхор-хан 见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Сайн-Лайхор-хан
Сайн-Маджик（Сайн-Мачжик）（赛英马吉克） 110－112
Сайн-Сэрдэнги（Сайн-Серденкой）（赛英先戴加［赛英谢琴柯伊］）
111,112
Сайн-Тэбэнэ（赛英泰白奈）
111
Сайн-Тэнэс-Мерген-Тэмэнэ（赛英台奈思麦根台曼奈） 155
Сайн-хя（赛英夏）
111,113,120
Сайхан Чжу（赛罕珠） 213
Салмучин（萨勒穆沁） 46

Самор Гунджи(萨穆尔公主) 39
Самор-Дайху(萨睦尔太后) 59
Санан-Сэцэн 见 Сдаган-Сэцэн
Сандань(三代) 269
Санджин 见 Санжиб
Сандзай-Джамцан(桑结嘉木措) 228
Санжеев Г. Д.(桑热耶夫) 29
Санжиб(Санджип)(桑扎卜) 331,334,335,337,375,385,437
Себевди-ходжа(谢别伏吉和卓) 248
Сеган-тайша 见 Сенге-тайша
Сегус(谢古思) 58,59
Сеиткул Аблин 见 Аблин Сеиткул
Сейкул-тайша(谢库尔台什) 211
Семба-Чемба-хутухта(参巴陈布库图克图[参巴陈布呼图克图]) 262
Семёнов П.(谢苗诺夫)
Сенге-тайша(Сенга-тайша ,Сеньга, Сеган-тайша)(僧格台什[僧格]) 162,164,207－210,213－222,224,227－230,233,235,241－246,249,250,256,260,411
Сенгил-тайша(谢吉尔台什) 141
Сеньга 见 Сенга-тайша
Серен-Ахай-тайдзи(色稜阿海台吉) 262
Серройс Х.(瑟拉伊斯) 69,101
Сетерджаб(谢特尔扎布) 358
Сира(西喇) 300
Скибин П.(斯基宾) 222
Слесарчук(斯列萨尔丘克) 165,183
Словцов И. Я.(伊·斯洛夫佐夫) 18,104
СловцовП. А.(普·斯洛夫佐夫) 18,321
Содном-Джамцо(锁南坚错) 153,154
СоловьевС. М.(索洛维约夫) 130
Солтон-тайджи(Солтон-тайша, Султан-тайша)(索尔多台吉[索尔多台什]) 120,197,207,213
Солтон-тайша 见 Солтон-тайджи
Сонгот(索额图) 282
Соном(索诺门) 227
Соном-Рабдан(索诺木喇布坦) 300

Соном-Церен-тайджи（索诺门策零台吉） 253
Сорокин И.（索洛金） 363,364
Сорхан Шира（锁儿罕失剌） 84
Старков В.（斯塔尔科夫） 185
Страхов Н.（斯特拉霍夫） 94
Строгановы（斯特罗甘诺夫） 116
Субагатай（苏巴哈台） 106,107
Султан-тайша 见 Солтон-тайша
Сумароков А.（苏马洛科夫） 218,230,242,243,261
Сырян（塞梁） 191
Сычевский（瑟切夫斯基） 425,428,456
Сэцэг-бэйджи（彻辰拜济） 51
Сюань Е（Канси, Канхи, Элхе-Тайфань）（玄烨[康熙、额尔克台方]） 7,27,236－240,249,253－255,258－267,270,271,273－285,287－292,295－298,300,301,303－316,324－326,329,336－338,340,350－353,355,356,367,372,394－396,445
Табачи 见 Даваци-хан
Табын-Ухан（塔朋乌罕） 12
Табытай（塔本台） 146
Тайманов Исетай（伊塞泰·泰马诺夫） 85
Тайпин（太平） 34,40
Тайцзун 见 Чжу Ю-цзинь
Талай-тайша 见 Далай-тайша
Тарсухай（塔儿苏孩） 220
Тархан（塔尔罕） 207
Татищев В. Н.（塔季谢夫） 18
Тауке-хан（头克汗） 325,326,329
Тевеккель-хан（Тевеккель, Тевкель-царевич, Тевкельцарь）（捷维克力汗[捷维克力，捷维克力王子]） 108,109,119,166
Тевкелев А. И.（捷夫凯列夫） 435,452,454
Тевкель-царевич 见 Тевеккель-хан
Тевкель-царь 见 Тевеккель-хан
Тегурчай（捷古尔切） 141
Темкин-Ростовский М. М.（杰姆金·罗斯托夫斯基） 184,194
Тимур（帖木儿） 44
Тиханов М.（吉哈诺夫） 128,129

Тогон(Бахаму)(妥懽[巴噶穆])
35,44,45,47－51,55,56,72,93
Тогон-Тэмур(妥欢帖睦儿)
39
Тогус-кашка(托古斯哈什哈)
430
Тойн(陀音)　26
Толыбеков С. Е.(托雷别科夫)
89,388,389,403,405
Томский С.(托姆斯基)　380
Торгун-Эрдэни-хунтайджи　见 Эрдэни-хунтайджи
То-то-бу-хуа　见 Дайсун-хан
Трубников М.(特鲁勃尼科夫)
343,344
Туглук-Тимур-хан(都赫卢克帖木儿汗)　42
Тудэв В.(图德夫)　29
Тулишен(图理琛)
339,340,350
Тургенев И. Ю.(屠尔盖涅夫)
192
Туру-Байху　见 Гуши-хан
Тусету-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Доржи
Тушету-хан Гомбо(土谢图汗袞布)　172,177
Тушету-хан Дондок-Доржи(土谢图汗敦多卜多尔济)
447,450,455,456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Доржи(Тусету-хан)(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土谢图汗])
238,255,261,262,265－282,285,287－292,294,297－299,302－304,316,400
Тюменец В.(丘麦涅茨)
Тюна(丘纳)
У Сань-гуй(吴三桂)
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Увейс-хан　见 Вейс-хан
Угримов Л.(乌格里莫夫)
322,361－364,368－373,380,382,385,386,392,410,419,421
Угэгту-хан　见 Мергус-хан
Угэдэй-хан(窝阔台汗)
85,88,89
Угэчи-хашига(乌格齐哈什哈)
39,45
Узеней(乌泽涅)　126,127
Уйзен-хошучи(伟徵和硕齐)
437
Улуг-бек(兀鲁伯伯克)　44
Ульдзейту-Гоа(鄂勒哲依图鸿郭斡)　38,39
Ульдзей-Тэмур(额勒锥帖木儿)
44

Унемкай-Жиргал 见 Немеху-Жиргал
Унзат-Алдар-габжи(温柴特阿尔达加勃士) 14
Унковский И.(翁科夫斯基) 162 – 164, 320, 330, 331, 350, 354, 355, 357, 410
Ураз-Мегмет(乌拉兹穆罕默德) 108
Урлюк 见 Хо-Урлюк
Урлюкай 见 Хо-Урлюк
Урускай(乌鲁斯凯) 179, 185
Урхедей-Батур-тайдзи(乌尔赫德巴图尔台吉) 325
Урянка(乌梁卡) 216
Усов Ф.(Ф. 乌索夫) 321, 328
Успенский В.(乌斯宾斯基) 8, 27, 31, 33, 34, 36, 37, 56, 66, 68, 69, 72, 98, 162, 169, 340
Устюгов, Н. В.(乌斯丘戈夫) 29
Ухидэй-Дайбу(格特依太保) 51, 59
Учин-Тайша(乌庆台什) 135
Учюрти-тайша 见 Очирту Цецен-хан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108, 109
Фишер. И. Э.(费舍尔) 17, 18, 115, 164, 196, 197
Хадан-Шараб(哈达沙拉卜) 370
Ханьду-тайджи(憨都台吉) 255
Хара-Хула (Каракула, Каракула-тайджи, Карагуль, Хархула)(哈喇忽喇[哈喇忽喇台什]) 55, 72, 94, 95, 97, 98, 111, 113, 115, 122, 123, 128, 129, 135, 138 – 143, 145, 147, 149 – 151, 156, 158, 159, 166, 184, 186, 203, 216, 260, 409
Харгацуг-тайджи(哈尔固楚克台吉) 50, 51
Харгацуг-Тугуренг-Тэмурхунтайджи(哈尔克楚克都古楞鸿台吉) 38, 39
Хаслунд Х.(哈斯卢特) 21 – 23, 406
Хатун-Тэмур(哈冬帖木儿) 50
Хи -Мэргэн-Тэмэнэ(希墨尔根台们奈) 73
Ховорс Х.(霍沃尔思) 21, 32, 57
Ходжа-Али-бахадур(霍查阿里巴哈杜尔) 119
Хорхудай(火儿忽答) 56

Хорчи(豁儿赤) 84
Хото-Хоцин-Батур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Хо-Урлюк (Орлюк, Урлюк, Урлюкай)(和鄂尔勒克) 13,94,124-127,134,135,141,147-149,151,156-159,160,170,172,190,197,199,200,203,205,206,211,221,226,253,361,437
Хошучи-бэйсе(和硕齐拜谢) 396
Хрущов А. Ф.(赫鲁绍夫) 242
Хубилай-хан(忽必烈汗) 152
Худяков П.(胡佳科夫) 339
Хундулен-тайша(Кунделень)(昆都仑台什[昆都仑]) 156,199-203,212,226,227,253
Хундулен-убаши(昆都伦乌巴什) 103
Хунь(Сюань Е)(玄烨[Сюань Е]) 20,260,261,293,325
Хун Ли(弘历) 8,377,431,432,441,442,444,447,448,450,455,459
Хутухтай-Сэцэн-хунтайджи(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 70,106,152,153
Хутхай-Тафу(浩海达裕) 38-40,45,72
Хутхайту(呼海图) 73
Хэниш Э.(海尼施) 9,21,425,426,441,443
Цаган(察罕) 209,215,216
Цаган-Араптан 见 Цэван-Рабдан
Цаган-номун-хан(Майдариху-тухта,Очир-Дара-хутухта)(彻甘诺门汗[满达里呼图克图,沃契达拉呼图克图]) 155,156
Цебден-Бальжир(塞卜腾巴尔珠尔) 314,325
Цебек-Доржи-Намжи 见 Цеван-Доржи-Алжа-Намжил
Цеван-Даши(策旺达什) 429
Цеван-Доржи-Аджа-Намжил (Аджа-хан,Цебек-Доржи-Намжи,цеван-Доржи)(策旺多尔济纳木扎尔[阿扎汗,策旺多尔济纳默齐,策旺多尔济]) 365,429
Ценгуньжаб(Шадар-ван)(青袞杂卜[沙达尔王]) 428,450,454-458,463

Ценгунь-Шара(成袞萨喇) 267
Церен-Даши(色稜达什台吉) 255
Церен-Дондоб, старший(大策凌敦多卜) 340,344
Церен-Дондоб, младший(小策凌敦多卜) 370,372
Церен-Дондок (Черен-Дондук)(策凌敦多卜) 375,391,429
Цецен-тайджи(Цецен-хан)(车臣台吉[车臣汗]) 164,208,230
Цецен-хаи Норбо (Чечен-хан)(车臣汗诺尔卜[车臣汗]) 270, 272, 280, 394, 395, 446, 448,456
Цецен-хан Шолой(Маха Самади Цеценхан)(车臣汗硕垒[麻哈萨马吉车臣汗]) 177
Цзин-Дзинь(津进) 272
Цзотба-батур(Баатыртайша, Батур, Маатыртайша)(卓特巴巴图尔[巴阿德尔台什,巴图尔,玛阿德尔台什]) 207,208,229,230,249,250
Цицик-Далай-хамбо(齐齐克达赖霍木布) 275
Цукер(楚盖尔) 120
Цэван-Рабдан(Араптан, Араптань, Араптарь, Зориктухунтайджи, Раптан, Цаган-Араптан, Эрдэни-Журюкту-Батыр-контайша, Эрдэни-Шурукту, Эрдэни-Шурукту-контайша)(策妄阿喇布坦[阿喇布坦,阿拉卜滩,卓哩克图洪台吉,喇布坦,策罕阿喇布坦,额尔德尼硕鲁克图,额尔德尼硕鲁克图浑台吉]) 82,163,207,235,236,238,241,246,249,272,279,288,298 – 301, 303, 311, 312, 314, 315, 317,319 – 361,364,372 – 375, 382,385,386,392,411,422,462
Чадыр(恰德尔) 241,244
Чеыур 见 Чохур-тайша
Чекчу(车克楚) 306
Черердов И.(切列多夫) 341,342,344,347,348
Черен-Дондук 见 Церен-Дондок
Черень-Балзана(切凌巴尔札) 396,397
Черепанов И.(切列潘诺夫) 99,151,247,299,329,336,343,344,346,347,376,462
Черкасский А. М.(切尔卡斯基) 353,354,380,381,383

Чечен-ноян(车臣诺颜) 269
Чечен-тайша(Чечень)(车臣台什) 229,249,250
Чеге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Норбо
Чечень-убаши(车臣乌巴什) 266
Чжан Юн(张勇) 256,257
Чжу Ди(朱棣) 40,46
Чжу И-цзюнь(朱翊钧) 69
Чжу Ци-чжэнь(Джинтей-хан)(朱祈镇[正统汗]) 50,51,90
Чингисхан(成吉思汗) 31 – 34,36,38,51,72,73,75,76,78,81,83 – 90,92,93 – 95,96,160,163
Чин-тайша(奇恩台什) 145,146
Чохуртайша(Чекур,Чокур,Чокуртайша,Чокурубаши,Чокурубашитайша)(楚琥尔台什[楚琥尔,楚呼尔乌巴什,楚琥尔乌巴什台什]) 134,1,35,139,141,144 – 147,149,156,197,214 – 216,219,222,229,246,247,249,252,253,255
Чуванчей(楚万车) 368
Шадар-ван 见 Ценгуньжаб
Шайнань-дордзи(商南多尔济) 276
Шакур-лама 见 Шохур-лама
Шамбалин-хамбо(善巴陵堪卜) 279
Шамба-Эрхе-даэцин(善巴额尔克带青) 274
Шара-Манжи(萨拉满济) 437,438
Шара-Мерген(沙拉梅尔根) 248
Шарас Махмуд(沙拉思穆罕默德) 119
Шастина Н. П.(沙斯季娜) 10,45
Шах-Магметь-царевич(沙赫马赫默德王子) 108
Шахматов В. Ф.(沙赫马托夫) 85
Шах-хан(沙赫汗) 67
Шейбани-хан(昔班尼汗) 64,119
Шигустэй-Багатур-нойон(锡古苏特巴图鲁诺颜) 44,49,50
Ширендыб Б.(锡林迪布) 29,77
Ширетуй 见 Галдан-Ширетулама
Шихмамай(Ших-Мамай-мырза)(希赫麻马伊[希赫·麻马伊

贵族]) 68
Шмидт И. Я.(施米特) 5,9,30
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见 Алтын-хан Шолой-убаши-хунтайджи
Шоно-батур 见 Лоузан-Шоно
Шохур-лама(Шакур-лама, Шухур)(硕呼尔喇嘛) 334,335,358,412
Шрам Л.(施拉姆) 62,68,100,102,162,169
Шункей(舒盖伊) 171
Шуну 见 Лоузан-Шоно
Шухур 见 Шохур-лама
Щеглов И. В.(谢格洛夫) 18,321
Щербатой О. И.(谢尔巴托伊) 204-206
Элхе-Тайфань 见 Сюань-Е
Эльбек-хан(额勒别克汗) 38-40,44,46,47,69,72
Эльдень 见 Ильдень-найша
Энгельс Ф.(恩格斯) 401
Эрдэни-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见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Эрдэни-Журюкту-Батыр-Контайша 见 Цэван-Рабдан
Эрдэни-Лама-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见 Лама-Доржи
Эрдэни-хошоуци(额尔德尼和硕齐) 255
Эрдэни-хунтайджи(Торгун-Эрдэни-хунтайджи, Ирдени-контайша)(额尔德尼洪台吉[塔尔袞额尔德尼浑台吉,额尔德尼浑台吉]) 103,202,224
Эрдэни Шурукту-контайша 见 Цэван-Рабдан
Эринцин-Доржи(额琳沁多尔济) 450,455
Эрким-дайцин(厄尔齐木带青) 269
Эсельбейн-хя(Эсельбейнсайн-хя)(爱辛别英夏[爱辛别英赛英夏]) 106,111,194
Эсен-хан(Эсен-тайджи, Эсень)(也先汗[也先台吉,额森]) 30,35,47,48,50-62,65,72,93-97,113,177,260
Эсень-буга(爱辛·布哈) 65
Этыгеров М.(埃蒂格罗夫) 322,330,361,379,383,410
Юдин М.(尤金) 299
Юй(睿[王]) 225
Юнус-хан(尤努思汗) 66
Юнхан(永罕[永常]) 443
Ядха(亚德哈) 368

Якоби, В. Ф.（弗·亚戈比）
438,441－444,447,448,450
Якоби И. В.（伊·亚戈比）
450,456
Яковлев（亚科夫列夫） 435
Якунька 见 Буголаков Я.
Якшагулов（亚克沙古洛夫） 202
Ялавач Махмуд（Махмуд Ялавач）
（牙喇哇赤·摩诃末） 75
Ялантуш（亚兰图什）
197,198,200
Янгир（杨吉儿） 197－201
Яншань（杨善） 53,54

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балай-хит　阿巴赖希特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 Внутрен-ней Йонголии　内蒙古自治区

Азия　亚洲

Акмолинск　阿克摩林斯克

Аксу　阿克苏

Алашань　阿拉善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雅克萨)

Алма-Ата　阿拉木图(库尔班·阿里麻图)

Алтай　阿尔泰山

Алтайские горы　阿尔泰山脉

Амдо　安多

Аму-Дарья　阿姆河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ршун(р.)　阿尔顺河(乌尔顺河)

Астрахань　阿斯特拉罕

Аягуз　阿亚古斯河(爱古斯河)

Баин-Ула　巴颜乌兰

Балхаш　巴尔喀什湖

Бараба　巴拉巴

Бараб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巴拉巴洲

Бара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巴拉巴草原

Баркуль　巴里坤(巴勒库尔)

Баркульский караул　巴里坤卡伦

Бийск　比斯克

Бий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比斯克要塞

Бикату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比卡通要塞

Бия　比亚河(阿勒坦河)

Болор　博洛尔

Большая Бухария　大布哈拉(大布哈里亚)

Болх(Баркуль)　博尔赫(巴里坤)

Боротала　博罗塔拉河

Боро-ходжир(г.)　博罗呼济尔山

Буир(оз.)　贝尔湖

Булугун　乌伦古河

Булун-тохой　布伦托海城

Бурут　布鲁特

Бурят　布里亚特

Бурят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СССР　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Великая стена　长城
Великая Татария　大鞑靼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нголия　内蒙古
Внутренняя орда
　内盟(布克汗国)
Волга　伏尔加河(额济纳河)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东亚
Восточная Монголия　东蒙古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东土耳其斯坦
Ганг-анур(оз.)
　甘加淖尔(刚阿脑儿)
Гань-гань　干赶河
Ганьсу　甘肃
Гань-чжоу(Гань-джоу)
　甘州(张掖)
Герат　赫拉特
Гобь　戈壁
Голландия　荷兰
Гурбан-Модон　古尔班莫多
Гучен　古城
Датун　大同
Дадзишань-Алинь　大碛山
Джаир Шера Моудун
　扎伊尔舍拉莫乌杜
Д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Джунг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准噶尔汗国
Дойнок　多伊诺克(对诺克)
Долоннор　多伦淖尔
Европа　欧洲
Ем　也姆河
Енисей　叶尼塞河(谦河、剑河)
Желез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热烈津斯克要塞
Жэхэ　热河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
Зайсан　斋桑湖(斋桑泊)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西蒙古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亚
Западная Халха　西喀尔喀
Или　伊犁河
Илийская долина　伊犁河谷
Индия　印度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茨克
Иртыш(Иртиш)
　额尔齐斯河(额儿的失河)
Иртышская степь
　额尔齐斯草原
Исеть(р.)　伊谢季河
Иссык-куль
　伊塞克湖
　(图斯库勒、特穆尔图淖尔)
Итык　伊蒂克河
Ишим　伊希姆河
Ишимская степь　伊希姆草原
Казанские орды　喀山汗国

Казань　喀山
Казахстан　哈萨克斯坦
Казацкие орды
　哥萨克玉兹(哈萨克玉兹)
Казачья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哥萨克大玉兹(哈萨克大玉兹)
Калмыцкое ханство(Колматцкие орды)　卡尔梅克汗国
Калмыцкая степь　卡尔梅克草原
Камышлов(р.)　卡麦什洛夫河
Канск　坎斯克
Ка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坎斯克州
Кара-Кум　卡拉库姆
Карашар　哈喇沙尔(焉耆)
Кара-Эрцик　喀喇厄尔其克
Каспий　卡斯皮(里海)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атунь　卡通河
Кашгар　喀什
Кашгария　喀什噶尔
Кашмир　克什米尔
Кем(р.)　克穆河
Кемчик(Кемчюк,Кэмчик)
　克穆奇克河(克穆齐克河)
Кентейские горы　肯特山
Керсагаль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开尔萨加尔州
Керулен　克鲁伦河
Кибоксары(Кобук Саур,Кубак)
　基布克赛尔
　(和布克赛尔,库布克)
Китай　中国
Киргизия　吉尔吉斯
Киргизские степи
　吉布吉斯草原
Киргизские орды　吉尔吉斯玉兹
Кобдо(ур.)　科布多(地区)
Кобдо(Хобдо)(р.)　科布多河
Кобдоский оазис　科布多绿洲
Кокчетавский уезд
　科克契塔夫县
Колыванский завод
　科雷万工场(克雷完工场)
Копенгаген　哥本哈根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德
Кубкэр-гэрийн　库勃凯尔格林
Куйбышев　古比雪夫
Кузнецк　库兹涅茨克
Кузнецкий уезд　库兹涅茨克县
Кукунор(Хухунор,Кукэ-нор)
　库库淖尔(青海)
Куку-хото(Хухухото)
　库库和屯(呼和浩特,归化)
Кулара(г.)　库拉勒城
Кулундинская степь
　库隆达草原
Кунг(р.)　昆格河

Куньлунь　昆仑山
Кургальчин(оз.)
　库尔加利钦湖
Кусутан(р.)　库苏坦河
Кяхта　恰克图
Ленинград　列宁格勒
Лондон　伦敦
Лхасса　拉萨
Любчин(г.)　柳勃钦城
Мавераннахр　玛维兰纳赫尔
Малая Бухария　小布哈拉
Мани(р.)　马尼河
Меньшая орда　小玉兹
Миас(р.)　米阿斯河
Минган-хара
　明安哈拉(明安哈拉图)
Минусинск　米努辛斯克
Мин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米努辛斯克边区
Могулистан　蒙兀儿斯坦
Модон-хотон　莫多霍托城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Модон-куль　莫多库勒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蒙古人民共和国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Музарт　穆扎尔特
Мукден　奉天
Налха-Ухэр(г.)
　纳尔哈乌海尔山
Нань-Шань　南山
Нар-Хара-Бурок
　纳尔哈拉布洛克
Нарын-гол　纳伦河
Нибчу(Нерчинск)
　尼布楚(泥卜潮,涅尔琴斯克)
Нин-ся　宁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诺沃西比尔斯克
Ногайская степь　诺盖草原
Нор-Ишим(р.)　诺尔伊希姆河
Обь　鄂毕河
Одесса　奥德萨
Олохой-ноур　鄂罗会淖尔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м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鄂木斯克要塞
Омь　鄂木河
Онгин　翁音
Онон(р.)　鄂嫩河
Оренбург　奥连堡
Оренбургский край　奥连堡边区
Ордос　鄂尔多斯
Орск　奥尔斯克
Орхон(р.)　鄂尔浑河
Ошь(р.)　奥什河
Павлодар　帕甫洛达尔
Пекин　北京
Передняя Азия　前亚
Персия　波斯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 уезд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县
Поволжские степи
　伏尔加河草原
Польша　波兰
Россия　俄罗斯(俄国)
Русь　露西
Рянзан　梁赞
Сайрам　赛拉姆(赛尔门、赛兰)
Сакпара(р.)　萨克帕拉河
Сакса(р.)　萨克萨河
Самара(р.)　萨马拉河
Самархань　萨马尔罕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圣彼得堡
Саратов　撒拉托夫
Саратовский край
　萨拉托夫边区
Саянские горы　萨彦岭
Селенга　色楞格河(薛凉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谢米巴拉丁斯克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谢米巴拉丁斯克要塞
Семиречье　谢米列契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нин　西宁
Синьцзян　新疆
Сира-Мурен-Бира(р.)
　锡拉穆连河(什拉磨楞河)
Сира-Тала
　锡拉塔拉(大草滩,黄草滩)
Слобода Чернолуцкая
　切尔诺卢茨克村
Средний жуз　中玉兹
Средняя Азня　中亚
Степи Дешт-Кипчак
　希布察克草原
Сунютский караул　苏尼特卡伦
Сучжоу(Суджоу)　肃州(酒泉)
Сыгнак　瑟格纳克
Сыр-Дарья　锡尔河
Сычуань　四川
Талки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塔尔金斯克山口
Тамир(р.)
　塔米尔河(他米尔河)
Тара(г.)　塔拉城
Тарбагатай　塔尔巴哈台
Тарбагатайские горы
　塔尔巴哈台山
Тарский уезд　塔拉县
Ташкент　塔什干
Текес　特克斯河
Телецкое(Телеское)озеро

捷列茨科耶湖(阿勒坦湖)
Теми-чюрги(р.) 捷米丘尔基河
Темур 捷穆尔(忒木尔)
Терельджи(р.) 特勒尔济河
Терен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捷列宁州
Техурик(р.)
捷呼里克河(忒呼里克河)
Тибет 西藏
Тобол 托博尔河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
Токмак 托克马克
Тола 土拉河
Тонкинь(оз.) 通钦湖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омский уезд 托木斯克县
Тоно-Алинь 托诺阿林(托诺山)
Тоул 河套
Туин(р.) 推河(颓河)
Тура 图拉河
Туркестан(г.) 土尔克斯坦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
Турфан 吐鲁番
Турфанский оазис 吐鲁番绿洲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ускуль
图斯库勒
(伊塞克湖,特穆尔图淖尔)
Тюмень 秋明
Тяньшань 天山
Убса(оз.) 乌布沙泊
Удинск 乌金斯克
Узбекстан 乌兹别克斯坦
Улан-Батор 乌兰巴托
Улан-Бутун 乌兰布通
Улан-ком 乌兰科姆
Улхун(р.) 乌尔会河
Ульза 乌尔扎河
Улюнгур 乌伦古湖(布伦托海)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扎布哈朗特)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ал(р.) 乌拉尔河(雅依克河)
Урга 库伦(乌兰巴托)
Ургенч 乌尔根奇
Урумчи 乌鲁木齐
Урянхай 乌梁海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乌梁海边区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
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
(铿格尔图拉,石山口)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
Уфа 乌法
Ухарлик 乌哈里克
Фергана 费尔干纳
Фрунзе 伏龙芝
Хакасия 哈卡斯
Халха 喀尔喀

Халхин-гол(р.) 喀尔喀河
Хамар-Дабан(пер.)
哈马尔达坂山口
Хами 哈密
Хангай 杭爱山
Хангайские горы 杭爱山脉
Хан-ула(Ханай-олой) 汗乌拉
Хара-Джоргонь 喀喇卓尔浑
Хара-Тала 喀拉塔拉
Хара-Усу 哈喇乌苏
Харбин 哈尔滨
Хасак 哈萨克
Хасхар 哈思哈尔
Харьков 哈尔科夫
Хашату-нор(оз.) 哈沙图湖
Хотан 和阗(和田)
Хоргос(р.) 霍尔果斯河
Хуанхэ 黄河
Хубсугул(оз.) 库苏古泊
Хулун(оз.) 呼伦湖(呼伦池)
Хурэ-Бэлчир 呼伦贝尔
Хуху-усун 库克乌苏河
Цаган-Усун(р.) 察罕乌苏河
Цаган-Эрцик 察罕厄尔其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央亚细亚
Цзун-Мод 昭莫多
Цилоуту(р.) 齐劳图河
Цин-хай 青海
Чаган-Толохой 察罕托洛海
Чаны 昌内湖(查内湖)
Чахар 察哈尔
Черный Иртыш 黑额尔齐斯河
Черный Мыь 黑岬
Черный Омь 黑鄂木河
Черный Остров 黑岛
Чжанцзякоу 张家口
Чингиль 青格利河
Чу 楚河(吹河)
Чумыш 楚麦什河
Шандахай(р.) 尚达海河
Шанси 山西
Эби-нор 艾比湖
Эгумур 额古穆尔
Эдер-Бира(р.) 额德尔河
Эмба 厄姆巴河
Эмель 额敏河
Эмнель(Эмель)
爱姆涅尔河(额敏河)
Эрдени-Джоу(Эрдени-дзу)
厄尔德尼沼
Эхей-Бургасутай
额黑穆布尔哈苏台
Южная Азия 南亚
Южная Монголия 南蒙古
Южная Сибирь 南西伯利亚
Юлдуз 裕勒都斯
Яик 雅依克河
Якутия 亚库梯

Ямышево(Ямыш)(оз.)
亚梅舍沃湖(亚梅什湖)
Ямыше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亚梅舍沃要塞
Яркенд 叶尔羌(莎车)
Яркенд(р.) 叶尔羌河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已经出版

林悟殊著:《中古夷教华化丛考》 定价:66.00 元

赵俪生著:《弇兹集》 定价:69.00 元

华喆著:《阴山鸣镝——匈奴在北方草原上的兴衰》 定价:48.00 元

杨军编著:《走向陌生的地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 定价:38.00 元

贺菊莲著:《天山家宴——西域饮食文化纵横谈》 定价:64.00 元

陈鹏著:《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 定价:62.00 元

王颋著:《内陆亚洲史地求索》 定价:83.00 元

〔日〕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编译:《隋唐帝国与东亚》 定价:38.00 元

〔印度〕艾哈默得·辛哈著,周翔翼译,徐百永校:《入藏四年》 定价:35.00 元

〔意〕伯戴克著,张云译:《中部西藏与蒙古人——元代西藏历史》(增订本) 定价:38.00 元

陈高华著:《元朝史事新证》 定价:74.00 元

王永兴著:《唐代经营西北研究》 定价:94.00 元

王炳华著:《西域考古文存》 定价:108.00 元

李健才著:《东北亚史地论集》 定价:73.00 元

孟凡人著:《新疆考古论集》 定价:98.00 元

周伟洲著:《藏史论考》 定价:55.00 元

刘文锁著:《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 定价:88.00 元

张博泉著:《甫白文存》 定价:62.00 元

孙玉良著:《史林遗痕》 定价:85.00 元

马健著:《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 定价:76.00 元

〔俄〕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完整版) 定价:82.00 元

乌云高娃著:《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 定价:67.00 元
杨军著:《夫余史研究》 定价:40.00 元
梁俊艳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 定价:88.00 元
〔乌兹别克斯坦〕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
《16—18 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修订版) 定价:85.00 元
成一农著:《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定价:76.00 元
杨铭著:《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 定价:86.00 元
殷小平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 定价:50.00 元
耿世民著:《西域文史论稿》 定价:100.00 元
殷晴著:《丝绸之路经济史研究》 定价:135.00 元(上、下册)
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定价:160.00 元(上、下册)
韩儒林著:《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 定价:58.00 元
〔美〕查尔斯·林霍尔姆著,张士东、杨军译:
《伊斯兰中东——传统与变迁》 定价:88.00 元
〔美〕J. G. 马勒著,王欣译:《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 定价:58.00 元
顾世宝著:《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 定价:42.00 元
杨铭编:《国外敦煌学、藏学研究——翻译与评述》 定价:78.00 元
牛汝极等著:《新疆文化的现代化转向》 定价:76.00 元
周伟洲著:《西域史地论集》 定价:82.00 元
周晶著:《纷扰的雪山——20 世纪前半叶西藏社会生活研究》
定价:75.00 元
蓝琪著:《16—19 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 定价:58.00 元
许序雅著:《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 定价:65.00 元
汪受宽著:《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 定价:96.00 元
刘雪飞著:《上古欧洲斯基泰文化巡礼》 定价:32.00 元
〔俄〕T. Б. 巴尔采娃著,张良仁、李明华译:
《斯基泰时期的有色金属加工业——第聂伯河左岸森林草原带》
定价:44.00 元
叶德荣著:《汉晋胡汉佛教论稿》 定价:60.00 元

王颋著:《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 定价:86.00 元

尚永琪著:

《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 定价:52.00 元

桂宝丽著:《可萨突厥》 定价:30.00 元

篠原典生著:《西天伽蓝记》 定价:48.00 元

〔德〕施林洛甫著,刘震、孟瑜译:

《叙事和图画——欧洲和印度艺术中的情节展现》 定价:35.00 元

马小鹤著:《光明的使者——摩尼和摩尼教》 定价:120.00 元

李鸣飞著:《蒙元时期的宗教变迁》 定价:54.00 元

〔苏联〕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

《准噶尔汗国史》(修订版) 定价:86.00 元

敬请期待

许全胜著:《黑鞑事略汇校集注》

张文德著:《朝贡与入附——明代西域人来华研究》

张小贵著:《祆教史考论与述评》

贾丛江著:《汉代西域汉人和汉文化》

王永兴著:《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考释》

薛宗正著:《汉唐西域史汇考》

李映洲著:《敦煌艺术论》

〔俄〕波塔宁著,〔俄〕奥布鲁切夫编,吴吉康译:《蒙古纪行》

〔苏联〕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

徐文堪编:《梅维恒内陆欧亚研究文选》

〔苏联〕K. A. 阿奇舍夫、Г. A. 库沙耶夫著,孙危译:

《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

徐文堪著:《古代内陆欧亚的语言和有关研究》

刘迎胜著:《小儿锦文字释读与研究》

李锦绣编:《20 世纪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选粹》

李锦绣、余太山编:《古代内陆欧亚史纲》

郑炳林著:《敦煌占卜文献叙录》

陈明著:《出土文献与早期佛经词汇研究》

李锦绣著:《裴矩〈西域图记〉辑考》

李艳玲著:《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前期西域绿洲农业研究》

许全胜、刘震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

张小贵编:《三夷教论集——林悟殊先生古稀纪念》

李鸣飞著:《横跨欧亚——马可波罗的足迹》

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路上的使者与商旅》

杜斗城著:《杜撰集》

林悟殊著:《华化摩尼教补说》

王媛媛著:《摩尼教艺术及其华化考述》

〔日〕渡边哲信著,尹红丹、王冀青译:《西域旅行日记》

李花子著:《长白山踏查记》

芮传明著:《摩尼教东方文书校注与译释》

马小鹤著:《摩尼教东方文书研究》

段海蓉著:《萨都剌传》

〔德〕梅塔著,刘震译:《从弃绝到解脱》

郭物著:《欧亚游牧社会的重器——鍑》

王邦维著:《玄奘》

冯天亮著:《词从外来——唐代外来语研究》

芮传明著:《内陆欧亚中古风云录》

李锦绣著:《北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文献》

〔日〕荒川正晴著,冯培红译:《欧亚的交通贸易与唐帝国》

孙昊著:《辽代女真社会研究》

赵现海著:《明长城的兴起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明中期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华喆著:《帝国的背影——公元14世纪以后的蒙古》

杨建新著:《民族边疆论集》

〔美〕白奕克著,马娟译:《大蒙古国的畏吾儿人》

余太山著:《内陆欧亚史研究自选论集》

淘宝网邮购地址:http://lzup.taobao.com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准噶尔汗国史　修订本
作者=（苏）拉特金著；马曼丽译
丛书名=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页数=401
SS号=13313407
出版日期=2013.04
出版社=兰州市：兰州大学出版社
ISBN号=7-311-04084-1
中图法分类号=K289
原书定价=86.00
主题词=准噶尔-民族历史-研究
参考文献格式=（苏）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　修订本.兰州市：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04.